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上　册

〔美〕巴巴拉·塔奇曼 著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45



商务印书馆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下　册

〔美〕巴巴拉·塔奇曼 著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45



商务印书馆

2 024 4065 2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1911—1945）

上　册

〔美〕巴巴拉·塔奇曼 著
陆　增　平 译
王　祖　通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4年·北京

2 023 5462 9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1911—1945）

下　册

〔美〕巴巴拉·塔奇曼 著
陆　增　平 译
王　祖　通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4年·北京

Barbara W. 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The Macmillan Company

根据麦克米伦公司(美) 1978 年版译出

内 部 发 行

SHǏDÍWĒI YÚ MĚIGUÓ ZÀI HÚA JĪNGYÀN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1911—1945)

(全 两 册)

〔美〕巴巴拉·塔奇曼 著

陆 增 平 译

王 祖 通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3017·370

1985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508 千

印数 10,200 册　　印张 24 7/8

定价：3.35 元

译 者 的 话

本书是一本介绍史迪威主要政治经历的书籍，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史迪威在中国三十三年的活动情况。内容包括史迪威同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蒋介石集团的腐败无能和消极抗日的丑恶行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正确立场和积极主张，他本人对各种问题的态度，等等。特别是通过史迪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几年的在华使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年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书中史料丰富，对于了解和研究中美关系颇有参考价值。虽然作者的介绍比较客观，但毕竟摆脱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观点，因此书中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限于水平，译文有不妥之处，敬希指正。

1983 年 12 月 18 日

前　言

本书的主题写的是美中关系，从广义上说，也是美国与亚洲的关系。阐述这个主题的资料是史迪威将军的毕生经历。为什么偏要借重史迪威呢？因为他集下列两者于一身，即既有以中国为活动中心的经历，又有美国人教养背景和性格的典型性；也因为他同中国的联系之长竟长达决定现代中国的整个时期，即从激动人心的1911年革命开始的时刻起到1944年国民党政府衰弱的年头止；又因为他在下列各个时期的服役是反映时代特征的棱镜：1920年到1923年军阀时代他曾充任语言教官，1926年到1929年蒋介石逐渐得势上台时期他曾任美国驻天津的第十五步兵团的军官，1935年到1939年日本侵华期间他曾任驻华武官，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是战区司令官；还因为在这整个历史时期的最后和最重要的几年间，他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人物。这位暴躁、尖酸刻薄而又有勇无谋的"醋性子乔"① 本来不是担任这个角色的理想人物。但是由于他通晓中国语言，了解中国国情，对中国人民友好，对自己的任务满怀信心，办事坚韧不拔，加上官职地位和权力，在他身上体现了他的国家在亚洲所作的最大努力，而且体现了后经事实证明的他的国家在亚洲的经验

① "醋性子乔"(Vinegar Joe)是史迪威的绰号。又译"尖酸刻薄的丘八"。——译注

的悲剧性限度。

我深知贸然去探讨美国对华政策领域所具有的危险性；因为在共产党人打败了蒋介石并使美国所作的巨大努力落空后，美国对华政策就成为众矢之的，激起了近代公众生活中一场最令人恼火而且危害最大的攻讦诋毁。尽管如此，但中国是使我们卷入东南亚的根本原因，所以为探讨这一政策而冒一番风险是值得的，即使问题是不易对付的。我还有相当的理由补充说一句，本书叙事截至1946年止，但着重于溯本追源，达到遥远的往昔。1945年，史迪威将军曾写信给西点军校毕业班的学员指出："你们将听到许多议论，说这代人或那一代人惹出乱子，把我们拖入了战争。全是胡言乱语。所有尚在人间的各代人物对我们所干的事情都是负责的，而已经不在人世的各代人物也是如此。"

我想对史迪威将军的日记稍加说明，因为他的日记自然是他的传记作者的主要资料。但我这样做未免胆大妄为了，因为他的日记本来就不让别人看的。他在1906年的一本袖珍日记本扉页上题有明确的警语："这个小日记本干你屁事！"出于尊重私生活不容侵犯的权利，我并不抱有某些人的观点，即认为后代人有某种"权利"了解一位知名人物的私事，即使他本人并不希望让别人知道。但就史迪威而言，历史的需要已经逾越私事秘而不宣的成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让史迪威说过的原话来澄清关于他的指挥权的争议已经成为重要和必要的事情了。征得他的家属同意后，前驻华记者白修德把史迪威1942至44年这一时期写的战时日记和信件汇编

成集，以《史迪威文件》的书名在1948年出版。他的家属还把这些文件的原稿连同其他战时文件也交给关于中缅印战区的官方陆军史作者查尔斯·罗曼诺斯和赖利·森德兰使用，最后这批文件又赠送给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市的胡佛图书馆供公众使用。既然决定了上述做法，那么让一个传记作者接触史迪威的其他档案，包括有关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的经历乃是合乎逻辑的结果了。史迪威夫人把她所保存的迄今尚未发表的全部日记、信件、文件、剪贴资料合订本、家庭像册等材料都供我使用。这些材料在这部传记中将进一步叙述。

《史迪威文件》是轰动一时的畅销书，问世以来，一直是历史学家们从中引述极其宝贵的历史事实和引用生动引语的作品。然而，令人感到矛盾的是，即便情况如此，但本人的日记并不能表现其人的真面目，或者说，无论如何不能完全表现其人的真面目。如果只读史迪威的日记，人们只能得到片面的印象；用史迪威自己的话来说，他在有意识地用日记发泄"暴躁脾气"。脾气暴躁是他本人的主要天性，而特殊的使人深感挫折的局面也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使他愈益暴躁。他对日记中记载的内容感到不满足，后来又在更大本的笔记本或活页纸上重写，并充实了记载的内容。全部记录他都妥加保存。有时他连重写时的情景也加以记录："写呀，写呀，真不得了。"或者："我奋笔疾书，潦草不堪，为的是不向暖气片发泄怒气。"在别人身上可能转瞬即逝的一切烦躁忿怒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了。他的尖酸刻薄在他有生之年得到别的品质的弥补，然而确实一直是有些过份的。

最后，我明知道本书就其问题的性质，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是不公平的。因为本书，尤其是后半部分集中叙述中国历史的困难时期和军事活动能力问题，而后者在中国历来是没有好的声誉的；因而本书的消极面过于突出了。使中国人在世界各文明民族中居于前列的美德、艺术想象力、哲学思想、骨气道义力量、聪明智慧、善良性格和吃苦耐劳等的品质，本书也没有作应有的记叙，对此作者只能表示歉意。

致　谢

很多人为本书作过贡献。于此，我特向他们的帮助和指教表示感谢。首先我要感谢约瑟夫·史迪威夫人，感谢她允许我查阅和引用她保存的她丈夫的全部文件和家书，并在我查阅这些材料过程中给了我热情友好的招待；感谢贝蒂·史迪威夫人不辞劳苦地为我誊写史迪威的日记和整理他的文件；感谢史迪威将军的长女南希·史迪威·伊斯特布鲁克夫人① 和他丈夫欧内斯特·伊斯特布鲁克将军在我撰写本书的整个过程中表示了自己的透彻见解并提供了许多情况；感谢史迪威将军的妹妹斯图尔特·怀尔德夫人为我追忆了往事。

我特别感谢哈佛大学东亚问题研究所的费正清教授，他不惜抽出时间阅读了本书的手稿并以他的卓识提出意见；感谢史迪威当年的高级助手和在其他岗位上与史迪威同事多年的弗兰克·多恩准将给了我同样的帮助并始终慷慨地提供情况；感谢包瑞德上校兴致勃勃地给我指导并诚挚地说服我“降低对史迪威领导魅力评价的调子”，包瑞德上校从1927年到1945年一直在中国工作，其间大部分时候同史迪威共事；感谢马歇尔将军的传记作者福雷斯特·波格博士，他随时慷慨地回答我的问题；感谢前中缅印战区物资供应处主任雷蒙德·

① 南希·史迪威·伊斯特布鲁克夫人又译史文思。——译注

A. 惠勒中将的热情关注和在安排采访和引见方面给予的帮助。

我还应当感谢许多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事件并亲自答复我的问题、作过解释、回忆过一些经历和提供过其他各种帮助的人物，诸如：特雷弗·杜普伊上校和塞缪尔·B. 格里菲思将军，他们两位不约而同地分别鼓励我着手进行刚刚在我的脑海中出现的计划；前军政部对外联络局局长商震；前军械署长俞大维，前交通部长张嘉璈和曾经在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工作过的霍勒斯·殷；参加过缅甸战役的前中国三十八师的四名军官在台湾为我提供了他们当年耳闻目睹的情况，为了避免使他们为难，我不得已不提他们的姓名。另外，对于前驻华外交官和前中国科官员埃德蒙·克拉布、谢伟思、约翰·巴顿·戴维斯、约翰·埃默森、菲利普·斯普劳斯和约翰·卡特·文森特，我感谢他们提供了他们十分了解的事件的情况和人物的情况；感谢克拉布夫人、谢伟思夫人和文森特夫人作了补充；感谢罗斯福总统的同事艾夫里尔·哈里曼大使、塞缪尔·罗森曼法官、本杰明·V. 科恩和总统的女儿詹姆斯·霍尔斯特德夫人、伊尔·蒙巴顿伯爵，蒙巴顿在百忙中挤出一个上午的时间，津津有味地作了回忆；感谢约翰·凯瑟克和彼得·弗莱明，他们从英国的角度提供了进一步的见解并款待了我；感谢在中国和中缅印战区工作过的记者埃德加·斯诺、白修德、蒂尔曼·德丁、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埃里克·塞瓦赖德；我还要感谢与史迪威将军一起共过事的军官、他的朋友和其他同事：奥马尔·布雷德莱五星上将、雅格布·德弗斯上将、马修·B. 李奇微上将、马克斯韦尔·泰勒上将、艾伯特·

C. 魏德迈上将、弗兰克·罗伯茨少将、托马斯·廷伯曼少将、H. L. 博特纳少将、托马斯·阿姆斯准将、托马斯·贝茨准将、W. E. 克里斯特准将、E. J. 麦克纳利准将、弗雷德里克·芒森准将、亨利·A. 拜罗德大使、乔治·迪米特里亚迪上校、小托马斯·阿姆斯上校、约翰·马格鲁德夫人、西蒙·博利瓦·巴克纳夫人、詹姆斯·麦克休夫人、保罗·琼斯夫妇、迪安·腊斯克、约瑟夫·艾尔索普、狄隆·里普利、理查德·M. T. 扬、罗杰·希尔斯曼；史迪威的家属埃利斯·考克斯上校和夫人、本杰明·史迪威博士和已故的莫尔斯·迪尤尔先生。

我特别感激切斯特·鲍尔斯大使使我有可能去阿萨姆；当我到达那里时，J. L. 瓦特夫妇热情招待我，J. 福肯先生陪同我，我谨向他们表示感激之情。对于哈里·科利尔上校和福克斯·巴特菲尔德先生在台湾的协助，美国领事馆的艾伦·惠廷先生和威廉·惠策恩上校在香港的协助，我也铭记在心。

在协助我查阅材料方面，首先我应当感谢国家档案馆军史部的约翰·E. 泰勒先生、斯坦福市胡佛图书馆的肯尼思·格莱齐尔博士。我特别感激研究史迪威活动的前辈、不计其数的中缅印战区陆军史部分的作者之一查尔斯·罗曼诺斯先生对我的好意帮助和为我作的说明，还要感谢他在军史科科长办公室的同事斯戴策恩·科恩博士、查尔斯·麦克唐纳先生和哈纳·泽德里克夫人；感谢西点军校战术和工程学教授托马斯·格里斯上校、美国陆军军官学校图书馆档案和历史科的约瑟夫·奥唐奈、国家档案馆影片部的莱恩·威廉斯先

生、国防部副官署的塞穆尔·波姆兰兹先生和他的工作人员；国防部书刊处的方特上校、韦伯上校、厄本女士、斯普里格女士；海德公园罗斯福图书馆前馆长伊利莎白·德鲁里女士和她的继任人詹姆斯·奥尼尔博士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口授历史研究室的朱丽·霍女士和伊利莎白·B. 曼逊夫人；耶鲁大学图书馆手稿和档案科主任赫尔曼·卡恩博士和他的助手朱迪思·希夫小姐，他们曾帮助查找史汀生文件；国务院历史处处长威廉·富兰克林、纽约公共图书馆参考书部工作人员、杜克大学的多萝西·伯格女士和西奥多·罗普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的鲍大可教授、威廉斯学院的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教授、斯坦福大学的利曼·万·斯赖克教授。

我非常真挚地感激我的女儿和女婿露西和戴维·艾森堡、杰西卡和阿尔马·塔奇曼以及我的丈夫莱斯特·塔奇曼博士。他们在我写作的过程中提供了宝贵的批评意见，并负担绝对必要的审读工作——一个作家（或者说我本人）如果没有这种帮助就会一筹莫展。

目　录

前言…… 1
致谢…… 5
序言　危机…… 1
第一章　一名军官的基础…… 8
第二章　看到革命的来访者——中国,1911年 ……32
第三章　世界大战——圣米耶尔和山东……56
第四章　派驻北京——军阀年代,1920—23年……83
第五章　“胜任团”与蒋介石之发迹 1926—29年…… 124
第六章　“醋性子乔” 1929—35年…… 169
第七章　出任武官：中国最后的机会 1935—37年… 198
第八章　驻华武官：中日战争 1937—39年…… 226
第九章　匆忙备战 1939—41年…… 282
第十章　“派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1941年12月—1942年2月 …… 321
第十一章　“一顿狠揍” 1942年3月—5月…… 363
第十二章　被保护者 1942年6月—10月…… 431
第十三章　“我和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孤立无援” 1942年8月—1943年1月 …… 467
第十四章　总统的政策 1943年1月—5月 …… 500
第十五章　史迪威必须走 1943年6月—10月…… 538

第十六章　中国在开罗会议的时刻 1943 年 11 月—12 月 ……570
第十七章　公路修复 1943 年 12 月—1944 年 7 月……599
第十八章　“整个亚洲的前途危若累卵” 1944 年 6 月—9 月……657
第十九章　“胜任”的限度 1944 年 9 月—11 月…… 699
第二十章　“现在——我们该脱身了” 1945—46 年 …… 739

序言　危机

1944年7月，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处在高潮之际，美国政府正式要求蒋介石委员长任命一位美国人、约瑟夫·W.史迪威中将指挥全中国的武装部队。这项建议是史无前例的；从来还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直接指挥过一个盟国的国家武装部队。史迪威将军已经是中缅印战区一位取得了成就、引起了争议、并同一些人闹翻了脸的人物，人们知道他是不受蒋委员长欢迎的人，在此以前，蒋就曾要求美国把他召回去；因此上述建议就更加奇特了。

然而，中国的情况被认为"已经绝望"了，需要"采取非常手段"。使中国继续作战，保持其战斗潜力，防止日本巩固对大陆的控制，这些目标对美国的战略和战后政策都是极为重要的。罗斯福总统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整个亚洲的前途处于危急关头。美国在亚洲作出的巨大努力也有落空的危险。"他说，他完全了解"你对史迪威将军的意见"，但是"我看没有别的人具有消除现在威胁着中国的灾难所需要的那种能力、魄力和决心"。

日本人向中国迄今未被他们占领的地区发动的全面进攻，加速了危机出现。日军4月间发动了攻势，迅速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毫不容情地攻击中国软弱无力的防御力量，形成扼杀自由中国和攻占美国空军基地所在地区的威胁。在战争

的这一阶段，美军横渡太平洋西进发动攻势，使日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他们的海上补给线因受到从华南基地起飞的美国空军的攻击而大大地削弱了。日本人发动这次攻势的目的是拔除美国的这些空军基地，确保从满洲到东南亚的陆上交通畅通无阻，切断自由中国同可能在中国沿海登陆的美国军队的联系。

敌人迅速得胜和中国缺乏协同防御的情况表明，敌人的目标很可能实现。假如这些目标真的实现了，天晓得战争会拖到何年何月。那末日本就能把它的交通线统统衔接起来，拔除美国尔后出击的基地，从而加强了他们对大陆的控制，即使日本本土诸岛被攻陷，日本政府退而可以迁到大陆去。

此外，更加暗淡的前景已经隐约出现。如果中国被打垮了，美国对远东的整个政策目标很可能成为泡影。这个目标乃是要求胜利后有一个强大和稳定的并足以取代日本以维护远东和平的中国。但是中国的抗战已进行七年了，这比任何国家的抗战时期都长，根本谈不上强大，而是被动挨打，被敌人封锁；由于敌人的占领，经济崩溃，政府疲惫，贪污腐化，情况日益恶化。由于担心共产党人在内部进行挑战，中国为抗战而作的努力已经瘫痪了。蒋介石为消灭共产党，在1937年国共休战之前，打了整整十年的剿共之战，结果是枉费心机。如果他的政府现在垮台了，中国就会由于内讧而分裂。即使国民党政府在因日军新近的进犯而缩小了的零星地区幸存下去，其内部的失败主义情绪和腐朽现象将会加剧。最后，即使能在这场战争中撑持下去，但疮痍满目的中国有没有能力迫使日本投降？有没有能力保持自己的完整？如果中国没有

这个能力，谁能成为维护亚洲稳定的擎天柱呢？

这些就是向美国的政策投下阴影的令人不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发展结果是消极的，那就会断送为战争而作出的巨大努力。罗斯福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是希望强大的中国成为战后和平的四大支柱之一；美国在战争期间之所以始终不渝地支持中国，也正是出于这种指导思想。军事战略方针与这种思想是一致的；它本来的意图是由中国人在大陆作战，而不是美国人在大陆作战，但它需要以中国国土作为目前作战的空军基地，到将来则为地面部队作战的基地。更重要的是，要在大陆上箝制一百万日军，还有赖于中国坚持抗战。否则他们就可以腾出手来还击横渡太平洋的美军逐岛冒险进军的攻势。代表远东最后一个自由国家的重庆政府的瓦解、投降或同日本勾结，就会导致亚洲其他国家同日本妥协，从而使罗斯福最为担心的事得以实现。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原因，才决定美国从事长期艰难的行动来向中国供应军需物资，激励和动员中国，并重新打通经缅甸的后门。这就是自珍珠港事件以后一直由史迪威将军肩负的任务。

在长江三峡以西偏僻的重庆市栖身的政府没有任何阻止日军进攻的防御计划。只有政治手腕而没有军事才能的蒋委员长完全依赖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空中力量及其自信的司令官陈纳德将军的保证来保卫自己。陈纳德将军曾保证说，如果能从他的美国同胞那里得到充分的补给，他可以遏制，甚至打败日本军队。这个方案最符合那个委员长的心意，因为有人来替他打日本，他就可以把中国有限的军事力量保存下来，用于对付国内的敌人。他没有把精锐部队投入对日作战，而

是按兵于华北共产党控制地区的边境上。其他地方的异己势力也使他长年辗转不安。他在华南一些地方军的司令官中的宿敌，由于重庆屡次失败而日益焦虑不安，正在鼓动再搞一次类似历来是中国祸根的那种分裂活动。

在这种种压力之下，蒋介石既不愿意冒险把嫡系部队投入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对日作战中去，又不愿意让那些不可靠的部队得到美国人的训练、武器和装备，因为他担心有朝一日这些部队会为人所利用，调转枪口与他为敌。美国能够给他的一切援助——武器、金钱和军需品——他都是迫切需要的，然而需要这些东西不是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因为他预料无论如何同盟国会打败他们的），而是为了达到他这个总裁认为对他的国家最为重要的目的——维持国民党政权的生存。这就是束缚他的阴谋，正是这种阴谋驱使他同史迪威进行了长期的纷争。

史迪威没有提出派任何代替中国军队作战的部队的建议。他一向认为，一个航空队并不比保卫其机场的地面部队好多少。现在日军的进攻给他的论断增添了极大的说服力。他的目标和使命是使中国地面部队能够发挥战斗力，为此去训练、武装和装备中国军队，保证其粮饷和医疗条件，以便形成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他对一位记者说过："如果我能证明一个中国军人不亚于任何盟国军人，我就死而无怨了。"他通过指挥两个军的中国部队在缅甸的作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计划用美国教官和装备在中国训练六十个师，但是他在实施这个计划的过程中不得不进行无休无止的斗争去克服种种挫折和拖延，而这些挫折和拖延有一部分是人为的。

在蒋介石看来，美国人每训练一支部队，就会动摇他的控制力。可是他又不能拒绝这个计划，因为他得完全依赖美国的援助，但是他可以拖延、阻挠或挪用补给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这两个顽固的人，同样坚决、互抱敌意的所谓盟友，为了中国的命运而斗得不可开交。蒋先后三次自己要求或指使别人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而史迪威也不讲策略地直率表示他看不起这个委员长。

史迪威以"醋性子乔"的绰号而闻名于世是有道理的，他为人十分正直，办事认真，他非常憎恶这方面有缺陷的人，特别是某些身居高位的人如此，他尤其疾恶如仇。他之不逢迎不为他敬仰的人，尤如哑子之不能讲话。如果把没有班子协助而他能完成的工作交给他去做，他会欣然接受。当时他已经是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副统帅、指挥驻印的中国陆军的司令官和该军赴缅作战的战地指挥官，他在中国战区的名义是蒋介石的参谋长、中国陆军训练与作战司令部首脑和执行租借法案对华调拨物资的主要官员。其中每一个职务都有相应的参谋班子、组织庞大、文牍繁多。他憎恶空谈和奉承，讨厌虚荣做作；他宁愿撇开这些而去遍地水蛭和毒菌的缅甸丛林与真正的敌人作战；他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在前线，他和格兰特将军① 一样，总是脱掉佩带军官徽章的制服，使自己舒适自在一些。别人常常可以看到他穿着便服汗衫、美国大兵的皮靴，戴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硬边军帽在距火线不到几百码的地方同一位中国营长并肩而立，嘴里，

① 格兰特（U. S. Grant，1822—1885），在美国内战时期是联邦陆军总司令，后成为美 国第十八位总统。——译注

嚼着口香糖，用烟嘴吸香烟，口操汉语谈话。他这时六十一岁，体形单薄，瘦骨嶙峋，身高五英尺九英寸，斑白的短发，满脸皱纹，但显得严肃、刚毅，人们不免会认为他身体虚弱。实际上，他的体质之虚弱犹如钢丝。他曾于几个不同的阶段在中国供职，先后经历了军阀割据、国民党崛起和中日战争等几个时期。作为一个军官，他一向关心士兵的福利，无论是美国士兵还是中国士兵。但他的一片关怀之心并不是逢场作戏，而是毕生奉行、始终不渝的，有时甚至具有爆炸性地那样强烈。在美国公众眼里，他是在战败时举世闻名步行走出缅甸的英雄①；在美国士兵眼里，他是“乔大叔”；在他始终不喜欢的英国人（他喜欢的那些人除外）眼里，他是“不好惹的”；在《中缅印战区简报》的记述中，突出地描绘了他的专心致志和幽默感，而他的幽默感“只有遇到雨季和在自负而无才干的大人物面前却丧失殆尽”。他的座右铭是“Illegitimati non carborundum”，这话他自己译成“不要让那些杂种把你压垮”。

为了使蒋介石容易接受对史迪威的任命，美国把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当时只有马歇尔、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和阿诺德是四星上将。

让一个外国人指挥中国的武装部队的建议无论如何是不适合蒋介石的胃口的。然而，罗斯福提出建议时使用的口气之粗暴，在一位国家元首和盟友对另一位国家元首和盟友之间几乎是带侮辱性的，这表明是一项最后通牒。美国居于优势地位，但是整个中国历史注定让中国人顺从是不容易的。蒋

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史迪威指挥的部队在缅甸一役，被日军打散，他带领和鼓舞部分人员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从缅甸步行撤退到印度。——译注

“原则上”接受，但是提出修正条件，坚持要控制租借法案的物资，施展曲解和敷衍的手法。中国人从需要出发，能够巧妙地玩弄以弱胜强的技艺，蒋要出了一切策略和诡计。他要求派特使前去“调整我和史迪威将军的关系”，华盛顿便派去了前陆军部长帕特里克·赫尔利将军。蒋对他百般拉拢和搪塞；于是华盛顿急躁起来，加大了压力。两个月过去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9月12日，赫尔利会见了蒋介石之后，泄了气，说这个委员长“很难办”，问题依然如故。送别时，蒋以一半出于东方人的谦逊做作，一半出于真正的愤懑的口气说：“史迪威将军在中国比我的权力还大。”

事实当然恰恰相反，但是居然说出这句话来就表明了一个美国人的奇异命运，后来他认为他提前五年离开了中国，而且他的生涯就此结束，同中国永别了。

第一章　一名军官的基础

1911 年 11 月，二十八岁的史迪威中尉第一次到中国。那时这个古老的独立国家刚刚蹒跚地步入二十世纪。在他到达中国六个星期以前，革命爆发了，从一座城市蔓延到另一座城市，与大清帝国军队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战斗，革命即将推翻腐朽的清朝政权。这场革命由于是偶然爆发的，后来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因为它未能填补上它所铲除的东西留下的真空。这个把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团聚在一起的君主政体还没有稳固的继承人。敌对的派系斗争使国家四分五裂，外国入侵势力蜂拥而至，侵害了它的主权。中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刚刚到来的世界最动荡时代的狂风暴雨之中的，既失去了团结力量，信心也受到了削弱。

这位离开在菲律宾的军职外出度假的客人，就传统而言，是最地道不过的美国佬。他是尼古拉斯·史迪威的第八代直系子孙。尼古拉斯·史迪威于 1638 年从英国迁移到美国，在斯塔腾岛、长岛和曼哈顿置了产业。他母亲的祖先姓福勒，也是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到美国的，世世代代都没有脱离定居美国的殖民者的主流：英国人、法国新教徒和荷兰人。尼古拉斯·史迪威的后裔到乔·史迪威出生时大约有一千六百人。其中理查德·史迪威上校和加勒特·史迪威将军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

置身军界与其说是乔有意选择的生涯，不如说主要是由于父亲的一时心血来潮使他走上这条道路。他的父亲本杰明·史迪威博士是一位仪表堂堂、聪明、英俊的绅士，有舒适的生活条件和多种功夫并不太深的本领。他是约翰·史迪威的儿子。约翰是一位"懂生意经的、习性良好的"绸缎商。他在靠房地产投资获得相当可观的钱财之后退休了，定居在扬克斯，在那里造了一所俯视赫德森河的漂亮房子，成了扬克斯银行的理事和监理会教派的一大支柱。此后，这个家族一直住在扬克斯。

本杰明·史迪威二十一岁时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法学学位，但是没有从事法律工作。他于 1880 年与玛丽·皮恩结婚，生了一个女儿，后来迁移到佛罗里达州的帕拉特卡附近的一座种植园，打算兴办南松木材业。1883 年 3 月 19 日，他的长子出生在这里，为纪念在他出生时进行照料的一位行医的朋友而取名沃伦。这个名字来自波士顿的约瑟夫·沃伦博士。沃伦博士拒绝了军医署长的职务而担任了危险更大的战地指挥官，结果在邦克希尔战斗中阵亡了。

本杰明·史迪威放弃了木材业之后同全家一起回到了扬克斯，并去学医，取得了学位，但是这个职业也没有吸引住他，使他真的行医。1892 年，他家里增添了二儿子约翰和二女儿玛丽，全家搬到了伯克郡的大巴林顿附近的一个农场。史迪威博士决定在那里做个乡间绅士。四年以后他得出结论，认为自己没有尽到对社会应尽的把才能贡献出来的义务，因而又回到了扬克斯，在那里接受了一家公用事业单位、西切斯特照明公司的一个职位，最后成了该公司副总经理。

清教徒式的道德心是一个人不干工作就是罪过。这种道德心曾使史迪威博士惶恐不安，现在他终于安心了。后来，史迪威博士就愉快地做扬克斯的一个杰出公民了。他担任了当地中学董事会会长和西切斯特几家银行和公司的理事之职。由于本杰明·史迪威博士仪表堂堂而又和蔼可亲、很有风趣，他家里的人和当地公众都照直视他为一位有教养的人物。他的一个女儿对他的评价是："爸爸是令人难忘的。"他有表现出明显的才干和杰出人物的姿态所需要的风度和手段。然而，他从未在比扬克斯更艰难的地方最充分地利用过，或者说考验过他的才干。他曾在1889年美国建国一百周年之际带领全家去巴黎，带他们游览了英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给家乡的《扬克斯政治家报》寄回了一系列写得很出色的有趣的旅行见闻。他能绘画，善弹琴，在抚育孩子方面要求严格，有高度的道德标准，每日三餐前都主持全家的祷告，还滔滔不绝地给他们讲故事，给他们各种启发、忠告和指导，他得到了儿子和女儿的莫大崇敬。孩子们认为——或者被教育得习惯于认为——爸爸真了不起，他总是正确的。

家里人管乔·史迪威叫沃伦，他是个活泼、精力旺盛、聪明伶俐的孩子，常常干出爬上房顶，把兔子淹死在饮马槽里的事。他极端讨厌每逢礼拜日要他一天作三次的祈祷，包括去教堂、主日学校和晚祷时听人讲道。他六十多岁时在写给女儿的信中回忆了"由于被迫去教堂和主日学校而形成的罪恶的习性。由于看到宗教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好处，我劝你不要相信那一套，而要用常理办事"。

沃伦和他爸爸一样口才很好，但是他的心思和精力都用

到体育运动上去了。他喜欢打网球，在赫德森河上划赛艇，还是扬克斯高地橄榄球队的四分卫。一个同班同学说，他是那个球队的“动力、鼓舞力量和战地指挥官”。在他的指挥下，1899 年的扬克斯代表队打败了纽约市和西切斯特市的所有预科学校的球队。扬克斯公立中学十分高兴，给其球队队员们发了酬金。在田径队中，沃伦的专长是四百米赛跑。他的兴趣很大，以至出面组织西切斯特校队竞赛联盟的田径赛，他曾帮助建立这个联盟。他还当了《扬克斯政治家报》的体育记者。后来组织体育运动成了他毕生的社会活动，他切望使自己的身体状况保持在运动员水平。

1899 年，他中学毕业的那一年，校长托马斯·贝克博士作结业报告时称他是个模范学生——后来事实证明，这番话说得有点过早了。校长说，这个学生“各科学习成绩优良”，“精力充沛，有办事能力……这些都有益于学校的事业”，他“没有坏习惯”，“完全可以信赖”。

史迪威博士本来为孩子们选定了耶鲁大学，但是现在他认为沃伦十六岁进大学年纪太小。他有个理论，认为孩子留在家里学习最好，于是他决定让这个有才气、明慧、精力特别充沛、极为能干的儿子留在扬克斯，在他从五岁起除了一个短时期以外一直在那里学习的学校里再留校学习一年。可惜事与愿违，正是这种过份的保护改变了乔·史迪威的发展方向，使他进入了军界。可以预料得到的是，由于感到厌倦，他很快就抛掉了可贵的表现。他拉了几个朋友组织一个称为“四巨头”的俱乐部，在学校的阁楼里用木板搭了一个隐藏处，在那里玩纸牌。有一次他们用绳子把校长的办公桌吊在棚顶上，

还有一次在学生们的课桌上分放了林堡干酪。在1900年的高年级舞会上，他们模仿当地的撒野风气干了一件后来被称为冰淇淋大战的恶作剧。在沃伦率领下，这四大强盗袭击了茶点部，同守卫者大战一场，在无意中"猛击"了贝克博士，接着抢了冰淇淋桶和糕点盘子逃之夭夭。第二天，教务委员会举行了特别会议，处理这件丑闻。会议决定对这几个犯过的孩子分别给予停学、开除和不准毕业的处分。只有沃伦例外，因为他已经毕业了。

史迪威博士最初不相信史迪威家族的人会有什么不循规蹈矩的过失，但是他经过调查证实确有这种令人不快的事。他认为需要训导：必须使沃伦参军。他似乎并没有采取严厉的或惩罚性的态度，只是对沃伦说："在赫德森河上游有一个好地方。你在那里可以打网球。"虽然爸爸的决定使沃伦不能到耶鲁大学玩橄榄球了，但是就人们所知，他当时并没有表示反对。美国刚刚在古巴结束了一场"打得很漂亮的小小战争"，仍然在菲律宾与叛乱分子作战，美国步兵此时正同其他外国军队一道打开一条道路去北京解救被义和拳分子包围的一些公使馆。在这种情况下，当一名军人的前景对一个遭受着父亲的压力和念够了中学课程的男孩子来说，的确可能是有吸引力的。

无论如何，看来他已经以他特有的劲头努力争取进入西点军校。一个邻居记得他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因为他有一个有趣的想法，以为这样躺着，身体就可以伸长四分之一英寸，投考军校所需要的身高就达到了。

由于现在申请进入这所军事院校已经为时过晚，史迪威

博士便出面走门路了。通过对街的一个邻居、军校校长麦金利的朋友的帮助，沃伦被定为候补学员。在填写入学申请表时，史迪威博士先用铅笔轻轻地填写之后才让儿子用钢笔照着描写。在录取考试的严峻考验时刻，沃伦觉得数学没考好，但是当校方无情地宣读不合格者的名单时，他吃惊地注意到自己被留在及格者的行列里。

他现在置身其中的学生集体不是代表一个在欧洲社会中形成的那种军人阶层。到 1900 年为止，从西点军校毕业的近四千名军官中，只有一百三十九人，即百分之三点五的人，是早先毕业生的子孙。由于国会历来担心出现"黩武主义"，一直保留指定学员进入这所军事院校的权力。由于担心军人阶层会逐渐发展起来，国会倾向于撇开军官们的儿子，而赞成吸收文职人员的儿子。它指定的学员主要是保守的、当地出生的中等和中上等阶层出身的人。入学年龄限制是十七岁至二十二岁。史迪威是最年轻的学员之一。1900 年 7 月录取的这批新学生都奔跑到电报局去给家里报信，然后，正象史迪威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就"回到了地狱"。

对于 1900 年在西点军校的第一学年，用这几个字来描述并不过份。在那个时候，折磨学生的教学方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而在两名学生由于受不了这种折磨而退学接着丧命之后，国会于 1901 年进行了一次调查。被叫去作证的学生之一是比史迪威高一班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尽管他本人并不愿意出面作证。他曾在上了一节"操练"课之后，躺在吊床上抽筋。教官要一年级学生蹲在刺刀上；赤身露体地跑步，同时往他们身上浇满桶的凉水；捆住大拇指把他们吊起

来;让他们在澡盆里头朝下倒立;长时间地伸直臂膀举枪;让他们"出汗"(7月天气裹在毯子或雨衣里);吞食塔巴斯哥辣酱油;吃大量的食物,例如一大盘子糖蜜或者两百个梅干;强迫他们打架;在桌子底下吃饭和忍受其他各种各样的耻辱。

这些练习并非完全胡来。这样做的理由是,象政府死板的例行公事一样,据说是为了训练学生自我控制和抑制恐慌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养成服从权威的习惯。军队这一行的核心是纪律,纪律的要素是服从。由于这种东西不是有独立意志和理性的人能自然而然地就具备的,人必须经过训练,养成服从的习惯,因为有朝一日多少人的生命和战斗的胜负可能取决于这种习惯。合乎道理的命令是很容易服从的;反复无常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显然愚蠢的要求才能培养遵守纪律的习惯。在西点军校,肃立训练——保持挺胸、下颚和腹部收紧的僵硬姿势——就是这类训练的象征和要素。

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肃立、肃立、肃立,操练、操练、操练。老天爷……疲惫不堪、起来做早操、喝水、休息、班操练、午饭、擦枪、班操练、收操、晚饭前在周围地区进行连操练……熄灯号、睡觉、四点半起床号,一直进行肃立训练,吃饭时每吃一口饭之间都不例外,一次肃立训练一个半小时。"高年级学生把肃立训练变成了经常的折磨。有时一年级学生受这种训练时"肩甲骨之间拉上一条薄纸(湿了以后象马肚带一样)"。夏季住露营帐篷期间,他参加了一次折磨人的"晚会"。他只能描述一些零散的情节,"吸烟,用香烟头戳人的下颚。还有十分莽撞的行动。真是少有的娱乐。瞎胡闹。一群疯子。架起枪观看他们几个小时。"乔(从这时开始,除了他家里的人以外

谁都这样称呼他)想家了,非常痛苦,神情呆滞,此后他在整个一生中常常担心陷入这种状态。“有一次睡过了头,直到枪声响了——吓死了……整理好床,匆匆收起帐篷,捆起围帐,喝了一大口水,塞进衣领和袖口……一直咒骂不停。”

他总算在从图书馆借来的惊险小说中找到了寄托。他借阅的书籍有《绑架》、《咆哮营的幸运儿》、《所罗门国王的洞窟》、《在两面国旗下》、《悲惨世界》和他最爱读的德昆西① 写的《一个鸦片烟鬼的自白》。最后这本书他借阅的时间最长,有两个星期,而别的书他只借了二至五天时间。

一年级终于结束了。象走出黑暗的隧道而见到阳光一样,他变成了高年级学生。这时,这所陆军军官学校的课程是为了从头造就一个军官而设置的,集中讲授军人所需要的技术知识,而不怎么注意一个平民的可能更广泛的需要。这里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绘制地图和观察地形特点方面极其熟练,而对人的历史和人的习性不很通晓。文科只限于一门历史课和一门英语、文学以及作文的综合课程。此外,军校学员除了学习军事科目,还学习法文、西班牙文、数学、化学、法律和“自然哲学”(就是对自然科学的概述)。军事科目中除了操练条例以外,有军械与射击术、测量学、防御工事学、战术学和两年的绘画课,其中包括地形学、测量制图法、阴影和影像绘制法、直线配景法、色彩理论和着色法、战场侦察轮廓绘制法、制图法历史、工程学、军械制图法、徒手风景画等等,项目之多足可

① 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1785—1859),英国小说家和评论家。——译者

以培育出一个莱奥纳多①。

军校学员军事学习的最后一个科目是由军事工程系教的“战略战术”。最初称为“战争科学”。当时人们认为唯一值得教的内容是工事构筑。后来，这所军官学校杰出的教官之一丹尼斯·哈特·马汉把这门课程加以改革和充实，发展成为学习从过去的战斗和著名将领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战术和战略原则。马汉任教的时间是1832至1871年，在这个时期中，拿破仑的各次战役就是范例，其进攻精神就是主题。当时强调的是速度、机动性、突然性和进攻战的其他组成部分。到史迪威进军校时，美国南北战争的经验已经取代了拿破仑的经验。甚至1898年的那个可疑的经验也成了教学内容，因为它主要提供了需要避免的而不是值得效仿的教训。

乔显示出了善于学习语言的特长。他在第二学年时法文成绩是第一名，其他方面的学习也相当好，但是缺乏当年使罗伯特·李、约翰·珀欣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这样一些前辈在毕业时军事才干名列第一的那种高度认真精神和自信心。乔两次因为“操练时发笑”而被记过，而有这种过失是不能当上尉的。另几次记过是因为“吃晚饭时在食堂里扔食物”，“在棒球队离去时在浴室里喊叫捣乱”，“预先安排好使两名学生挥拳格斗”和“下午点名时躲在宿舍里”。

在干这些事之外，他的体育活动量仍然很大。他养成了早饭前跑步几英里的习惯。他是越野长跑队队长，1903年在一英里赛跑中获胜，1904年在田径赛中获得了几个项目的优

① 莱奥纳多，意大利著名画家、雕刻家、建筑学家、工学家(1452—1519)。——译注

胜分数，第二天又参加了两次划船竞赛。把篮球运动引进军校是他的功劳。他组织了1903至1904年的第一支篮球队，并担任了教练员和运动员。尽管他比较瘦小是个缺欠，在校的最后一年仍然当了橄榄球校队的选手。一连两年中，他除从事体育运动外，以余下的精力担任连队"舞会"的组织者，或者叫作社交活动代表。

取得了尉官学员军衔之后，他毕业于该校，毕业成绩即使不是十分突出，至少也是很不错的，在一百二十四人的一个年级中名列第三十二位。这比起前十名来要差得多。那些人由于可以优先选择兵种，常常把和平时期工作最有意思的兵种工兵的位置全部占据了。乔又不喜欢骑兵。他虽然会骑马但是讨厌马，称马为"吃燕麦的家伙"，说马头的形状表明它们的头脑象恐龙。他选择了步兵。1904年6月15日，二十一岁的史迪威得到了少尉军衔的任命。那一年的年鉴说他成了"填写祖先是美国人的极少数几个人之一"。这时他是个身材挺拔而整洁的人，身高五英尺九英寸，体重一百四十五磅，容貌端正，留着整洁的短头发；一脸直爽的神情，还有一双严肃的黑眼睛。他在日记中写的有关毕业日的唯一的评论是"终于得到了这块羊皮"。① 当时和以后一样，一些令人难忘的事件使得他成了一个言谈简洁的人。

当史迪威在西点军校为进入陆军作准备的时候，陆军正经历着它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改革。在陆军中供职在1900年时还是一种不够理想的职业，而经过清洗、改编和改革之

① 羊皮(Sheepskin)，指用羊皮印制的毕业证书。——译注

后，到 1904 年时至少在理论上已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即使这种改变大部分还只是纸上的，但是至少职业化的基础已经奠定了。促成这次改革的与其说是不久前的战争，还不如说是陆军部长伊莱休·鲁特。

1898 年动员进兵古巴时发生的混乱暴露了陆军行政系统很不得力，已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陆军当时没有参谋本部，而是在十个实际上是独立的局——诸如军需局、军饷局、军粮局、军令局——的领导下作战。单独一道命令是不能使武装部队的任何一支队伍立即行动的，因为所需要的武器和补给品、辅助部队和运输工具等都要得到主管局的命令。掌管各个局的军官可以长期任职，这往往会助长他们的惰性。

鲁特于 1899 年被任命为陆军部长去改革陆军体制。他按照一个很明白的道理和原则行事，这就是“养兵的目的是备战”；正规陆军只是一支核心力量，“绝不是打任何战争所依靠的全部力量”。他的第一步改革是建立参谋本部。这项改革是以西点军校最卓越的毕业生之一埃默里·厄普顿将军和英国人斯潘塞·威尔金森二十年前的基本构思为依据的。参谋本部，正如威尔金森的书名所表示的那样，将起“陆军大脑”的作用。它将取代各个局而行使行政工作职能。它还有一项对美国陆军来说完全是生疏的任务——制订作战计划。

鲁特创立了陆军军事学院，为战略工作培养人材。他还改进了炮兵、骑兵和步兵学校战斗部队军官进修的课程和设在利文沃思堡的指挥参谋学院的课程。他建立了作为晋升标准的考核制，确立了战斗部队军官与参谋官轮换职务的原则。整个体制还要经常受到实战的考验。鲁特成功地使国会在

1901 至 1903 年的几届会议上通过了他的改革方案。虽然陆军部的各个局还不能一下子都放松控制，他确实为建立一支组织统一的陆军奠定了基础。

在规模上，陆军已经从战前的两万八千名士兵和两千名军官的兵力扩充到了菲律宾战争的高潮时的十万人。其后，国会不顾有人高喊反对"军国主义"仍然授权建立一支最少拥有六万人的陆军。到 1904 年，即史迪威从西点军校毕业进入部队时，陆军人数又减少了，只有大约五万名士兵和三千名军官。在名义上，陆军有三十一个步兵团和十五个骑兵团。这些部队，再加上炮兵部队和工兵部队，分驻到美国和国外的四十五个地方。一个团的建制是三个营。每个营的满员兵力是八百人，分为四个连。在 1904 年的和平时期，平均每个地方的驻军仅仅是一个团的骨干力量，大约七百人，还不到一个营的兵力。

除了在菲律宾仍然有零星的战斗之外，在美国国内，兵营生活并不艰苦。同印地安人的最后一次武装冲突是 1890 年发生的，但是一些地区和这些地区在国会中的代表反对废除"拴马柱"要塞或者巩固这些地区的企图。这些小兵营继续消磨时间，进行日常的操练、步枪射击练习、擦枪、死记硬背操典，只要能想出办法使士兵和军官闲不住就行。重点是准确性。枪法是最受崇尚的，因而美国军人比欧洲军人枪法高明。工作日到中午结束。普通士兵住的地方从他们的妻子为军官们当洗衣妇的那个时代起就叫做"一排肥皂水房屋"。他们的薪饷在 1904 年是列兵每月十三美元，上士最低四十五美元，外加合格射手奖两美元，优秀步枪射手奖五美元。那时，军人

性情粗野，公众对他们没有好感。

总的来说，美国不赏识自己的陆军。由于故意避开有尖铁的钢盔、胸甲、熊皮帽和大红领章，他们对这些穿着在欧洲引起的喜爱与尊敬也就毫无感受了。1900 年出现短时的帝国热之后，国会对拨款又极端吝啬了。铁路上的运兵车在行车先后次序方面比货车还低一等，必须停在侧线上等待客车和货车走过之后再行驶。由于公众非常轻视军人，国会于 1911 年感到有必要规定对歧视军人的任何公共娱乐场所罚款五百美元。

从 1904 年起看来会出现长期的和平，在这种情况下，史迪威现在已置身其中的军官阶层可望过有保证、相当舒适但是平平淡淡、无法有很大作为的生活了。薪水并不十分可观，一个新任命的少尉年薪一千四百美元，一个上校年薪四千美元。生活水平是由级别决定的，1904 年时晋级工作处于停滞状态。从指挥官——以及指挥官的妻子——逐级往下，级别决定了在官场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包括住房在内。在同级军官中，是按任命时间再分高低的，因此，一位 6 月间提升的军官在同新来的但在 5 月份提到同一级别的军官争夺一套理想的房子时就可能吃败仗。在下午的招待会上，最高级军官的妻子喝的是咖啡而不是喝茶，因为在美国咖啡是更受欢迎的饮料，更多的人往往聚集在桌上有咖啡的那一头，所以人们认为咖啡比茶高一等。

由于工作地点和住处是在一起的，由于学校设在驻地，由于驻地经常变化使军官不能同当地居民建立联系从而只得彼此结交，由于生活不稳定，由于军报上登载的社交简讯使每个

人都知道谁结婚、谁和谁是牌友、谁在哪个驻地宴请了谁，因而，军事生涯逐步变成了彼此关系密切的——同民间生活的紧张关系和政治对立相比——几乎是一个纯洁的社会。尽管级别引起了相互忌妒和相互施展阴谋，军队里还是有一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其表现形式是敬礼。操典中称敬礼为“军界同胞间相互表示致意和问候的信号”。军校逐步确立的法规规定军官要成为既遵守普通的荣辱和言行原则，又懂得个人对同僚要忠诚老实的有教养的人。法规认为对指挥官——无论是团级上校还是总司令——的忠诚既是军中关系也同样是个人间的关系。

在同作为“行政官的右手”的总司令的特殊关系中，军队承认自己是从属于民政权力的。军队深知自己处于国家仆人的地位。从西点军校的座右铭“职责、荣誉、国家”开始，军官运用的概念就是职责。为了能够在任何时候都遵从任何行政当局的命令去履行职责并且干得卓有成效，军队必须培养不带党派成见的思想，从而能够不加怀疑地执行命令。从理论上说，军队认为自己有义务自成系统，力戒普通的政治热情，就象宗教界戒肉一样。西点军校毕业生联合会的一条细则是“莫谈政治”。据《军务报》说，军人“几乎没有想到”他们的选举权，也很少使用自己的选举权。

由于生性好动，史迪威选定菲律宾作为他这个初出茅庐的军官首次服役的地方。那里是美国军队当时正投入战斗的唯一的地方。作为一名西点军校毕业生，尤其又是他那个年级名列前茅的学生，他可以表示自己愿意干什么。在被分配

到第十二步兵团以后，他于 1904 年 10 月乘船出发，他坐的是“谢里登”号运兵船，这条船是陆军于 1898 年购买的三艘昔日横渡大西洋的运牛船之一。在夏威夷停留了一下之后，这几艘运输船分别花了三十天到四十天时间才航行到马尼拉。乔设法消磨时光，他在甲板上做操，读书，睡觉，吃东西，苦攻西班牙文，同朋友们一起“发牢骚”，同军官太太们谈话和自己写信——有一天就写了八封厚厚的信和十六张明信片。他的文笔已经轻松流畅，此后一生中都是如此。他还记载了另一个特性：不加入“每天晚上都要喝醉的酒徒行列”。这些人当中有一位H上尉，“象喝牛奶一样狂饮”。史迪威从来不是个戒酒者，也不反对别人喝酒，但是他喝酒一直很少。

美国在发现自己象“旧世界”① 任何对领土贪得无厌的凶恶国家一样参与了到国外进行征服的行动时感到十分难堪，由于这一征服行动遭到了积极抵抗，美国就更加感到难堪。为了美国在良心上过得去，政府赶忙在菲律宾扶植文官统治，在叛乱实际上还没有结束时就宣布叛乱已经结束了。虽然在阿吉纳尔多② 于 1901 年被俘之后有组织的民族运动已经瓦解，但是，许多岛屿部落拒绝了他敦促他们投降的要求。他们用可以致命的大砍刀代替供应量日益减少的火器，继续以游击战方式进行抵抗，常常向被占领地区发动猛烈的袭击。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在他抵达菲律宾前的三个月里，仅在宿务省就有八百零三个摩洛人在“冲突”中被打死。

他不久就投入了军务，在开往海岸的行军途中“遭到了大

① “旧世界”，指东方古国。——译注

② 阿吉纳尔多(Aguinaldo)，菲律宾摩洛族起义领袖。——译注

砍刀的袭击，差一点吓死”。1905 年 2 月，他所在的部队第一营第四连被派往萨马(三描)境内的甘多拉河上游与普拉杰族叛乱分子作战。他“翻山越岭向圣何塞进发，到处是沼泽地、蔓草、泥浆、山丘、断层、瀑布……天黑时在树林中宿营。士兵们站着就睡着了。整夜下雨。士兵们全身湿透了，满身是泥等等。真他妈的见鬼！”第二天他们又冒雨踏上了一条很难走的山间小路。士兵们相继掉队。到达圣何塞时，他们发现那里已空无一人。派到前面去探路的几名菲律宾侦察员惊动出一群普拉杰人，于是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战斗。随后他们又遇到了五十名砍刀手，但是那些人逃跑了。乔在日记中写道，在丛林中奔波了两个星期之后“大口地喝水——呸！”在河边上扎营整休时，他立即就组织了体育活动。“造了一条有座位、桨和桨架的‘巴罗达’①——有趣极了，萨马河上出现的第一只八桨轻赛艇。”

恢复行军以后，乔在短短几个小时的军事行动中就接受了一堂在任何军事院校都得不到的指挥课。出发后的第二天，全连就没有食用水了。连长急着要到达有水的地方，快速走在前头，告诉乔留在队尾防止部队散失。乔押着一个普拉杰族俘虏遇到上士躺在小路上，热得昏了过去。在他停下来想唤醒上士的那一瞬间，队伍前进了。他想喊他们停下来，但是他的声音被茂密的丛林遮住了，队伍中没人听到。他只好与俘虏轮流背着失去知觉的上士挣扎着前进，在迷了路时要返回来找路，没有水，口渴难熬，身上只有一支三点八毫米口径的柯尔特式手枪，随时担心普拉杰人“跳出树丛把我们宰

① 巴罗达(Baroda)，印度巴罗达人使用的一种小船。——译注

掉”。没有人回去找他们。他越来越疲乏，渴望在天黑前抵达某个地方，最后终于听到了前面有谈笑声。当他踉踉跄跄走进营地时，全连在吃晚饭，连长对他们的到来毫不在意，只说了一句“你们回来了？”没有派人去找过失踪的这个上士和这个少尉。多亏乔的耐力他们才活着回来了。倘若他在敌占区精疲力竭地倒下去，他的生命就可能在离他的二十二岁生日只有两天的时候在萨马结束。对于一个指挥官职责的这次体验——或者说缺乏体验——深深地印刻在他的头脑里，使他一直不能忘怀。三十年以后他写道：“我至今不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回来，福尔斯上尉是否想到过采取什么措施。”

在帕奈沿海小小的吉马拉斯岛上的乔斯曼营驻地，生活没有那样艰苦。在将军寓所娱乐的一个晚上很快被概括为“粉黛绝色、军人、侍者、英国式的四对舞”。他对当地的一切事物都很感兴趣，从儿童用羊齿菜当风筝玩一直到当地人偷粮食的办法——凿穿石板楼板，再把楼上的粮袋钻个洞，让粮食漏到在下一层张开等着的口袋里。战术演习，操练，熟习条令，步枪练习，手枪射击，打网球，赛船和与“骑兵笨蛋们”比赛等活动使他忙个不停。乔组织徒步旅行和游戏，为连队舞会布置舞场，为陆军部翻译了一本关于当前日俄战争中围攻旅顺的法文小册子和一部论述“智利军事地理”的西班牙文著作。作为俱乐部执行委员会的首要成员，他“决定把气氛活跃一下”。其中一件事就是他同骑兵举行追击比赛时的一个插曲。在那次比赛中他有意要证明步兵的优越性。他把士兵们排列在战壕里，发给他们一些床单。当骑兵冲锋时，他们都站起来挥舞床单，把那些战马吓得乱作一团，这使乔特别得意。

尽管搞了这些名堂，或者说正是由于这些名堂，第四连连长在鉴定报告中称他各方面极为突出，说他“特别聪明、刻苦和办事成效卓著”。

在菲律宾服役一年两个月后，1906 年 2 月他接到通知，要他到西点军校现代语系任教官。他在日记上作为一件自豪的事写道，他是“1904 年第一个回国的人”。他还列出了向他表示祝贺的七个人和没有向他表示祝贺的九个人的名单，这就表露出他是过份敏感的人。

他立即抓住任用他教外语的机会申请两个月假期和经欧洲回国的许可，以便象他写的那样，从西贡乘法国班船去法国，借机“每天同法国人来往和交谈”，提高他的法语水平。他的申请在各局处转来转去，尽管他连发急电，直到他必须乘 4 月份的运输船出发时还没有得到答复。在日本的长崎（运输船都要在那里加煤）他又发了一封电报，这次终于收到了复电。这封复电证明，鲁特的改革对办事不讲效率的恶习仍然无可奈何：这封电报是用在日本没人能译出的电码发来的。乔不得已只能乘那条运输船继续东进，只是到了下一个军队驻地夏威夷（因为那里能译这种电码）才知道上面写着：“假期获准，经欧洲回国。”那时已为时太晚了，他火冒三丈，显然气得说不出话来，这样他途经旧金山回国了。

在军队里，通过实践学习的机会是靠不住的，这样或那样的教学和训练是和平时期军官的主要工作。史迪威在充任教官的前三年里是教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第四年又给他增添了一项任务，担任战术教官，后来又从教外语转为教历史。

由于对那些脑子迟钝，不够用功或不诚实的学生已经很不耐烦，他愿意帮助任何真正想学习的人。他在战术系供职期间始终是篮球、棒球和田径队的教练，第四年还充当了橄榄球助理教练。陆军体育协会 1908—09 年季度报告说："由于史迪威少尉不倦地工作，篮球队办得十分成功。"把团体运动项目分配给战术系是由于方便还是出于哲理原因，这还有讨论的余地，但是这些运动本身就是战术，尤其是橄榄球，这种运动的方式后来经常出现在史迪威和其他指挥官的计划和谈论中。据 1909 年级的雅格布·德佛斯将军说，作为一名教练员，史迪威说话是"尖刻的，但是他使你想干好。我真想为他效尽犬马之劳"。

然而，军校里的活动还不能使他满足，由于离家很近就更是这样。他坐不住，有好奇感，在 1907、1908 和 1909 年，每年夏季他都以学习西班牙语为理由请假去"海外"。这三次比他当年请假去提高法文的运气要好，他成行了，三次远航到拉丁美洲的一些地区。第一次是政府出钱，以执行"秘密任务"的形式去危地马拉考察地形。他奉命化名旅行，不准携带有可能暴露身份或表明他是政府人员的任何物品。任务是为现有的略图增添详细准确的地形，提供有关桥梁、浅滩、渡口、铁路、公路、运货马车、拉车马匹、港口、码头、防御工事、电话和电报线、河流、湖泊、运河、城市、小镇、村庄、兵营、人口分布与密度、粮食、燃料、饲料、政治状况、疾病和气候的情报。这次使命的期限是六个星期。

史迪威在危地马拉徒步和骑骡子周游，有不少新发现。他发觉这个国家到处有跳蚤咬人，枯燥无味，自己也因痢疾和

发烧而病倒，几周以后就想回家了。然而他始终坚持观察，把实际情况和他的看法记入笔记本，自己也深为后来在中国也常见到的沉闷压抑局势所触动。这种局势激起了他在国内是不会有的那种对百姓的同情和对他们的统治者的愤怒。他写道，危地马拉人不愿意多干一点工作，因为他们的劳动成果都被那些常常是"贼、甚至比贼还坏"的政府官员所窃取。史迪威对官员、土地所有者和专业阶层形成了"不佳的看法"。他写道，使农民不识字和接受不到教育，这"很符合政府的意图，政府可以随时把他们从农田里带走，放到军队里无限期地当兵，不关心他们的家人是否在挨饿。然而他们什么也讲不出来，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他这种感情后来在中国时又重复出现了。他的一位好友说过："史迪威有出于本能的开明豁达和同情心。但是他在思想和政治上则是保守的。"

次年，即 1908 年，他利用暑假与他的一位朋友和同学、外号叫"饥饿"的弗朗西斯·霍尼柯特少尉漫游了墨西哥。他们俩凑成了好斗的一对，因为霍尼柯特是常备军里有名的优秀剑手，而史迪威是优秀射手、陆军步枪射击队队员，当时的一家报纸称他为"美国二十名神枪手之一"。他们从华盛顿开始，参观了军事学院和国会图书馆。乔说："国会图书馆是个桃子①。"这是他对它的最高称赞。他把真正喜欢的东西都称为"桃子似的"。

他们在墨西哥徒步或骑马旅行了两个星期。在此期间，乔作了大量的有关墨西哥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农业、宗教和

① 桃子(Peach)，另一意思是"好东西"。下文中的"桃子似的"(Peachy)意思是"极好的"。——译注

阿芝特克族的象形文字的笔记。经古巴回国后，他和“饥饿”把墨西哥风味带到了在平静湖举行的一次化装晚会上。他们出席时“打扮成两个女人，袒露着肚子和大腿。扮演一次蒙特佐马① 的女儿，大获成功”。这次晚会是8月份在艾迪隆山区举行的十四天娱乐活动中最精彩的一次。他们的休假也就此结束了。在这次活动中他们忙个不停地参加野餐、网球赛、徒步旅行、舞会，同朋友外出打猎，同姑娘们去爬山。这一次他的日记没有刻薄的评论，而是罕有地承认同“诚挚友好的高尚人”玩得很快乐。

在动身去墨西哥之前不久，二十五岁的史迪威认识了那位后来与他结婚的姑娘。她是他妹妹玛丽在私立学校的同班同学、锡拉丘兹市的威尼弗雷德·A. 史密斯。乔除了这个姑娘以外迄今还没有真正恋爱过。他曾在父母的同意下把这个姑娘的照片随身带到菲律宾去。父母之所以同意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有助于使他行为端正”。在毕业那一年，他在西点军校舞会上的舞伴不是照片上那个轮廓不很清楚的姑娘，而是他的当时只有十三岁的妹妹。后来，玛丽为了报答他的情谊，也邀请他参加她们学校举行的六月舞会，并要他带“饥饿”同去，作她的朋友温妮② 的舞伴。温妮是个十九岁的漂亮姑娘，有一双活泼的眼睛和鬈曲的头发。

霍尼柯特少尉穿了一身很讲究的、带有红臂章的蓝色野战炮兵服装。但是温妮却倾心于玛丽的哥哥、身穿笔挺的白

---

① 蒙特佐马(Montezuma)，另译蒙特斯马，是墨西哥第二十五代国王，在位时间是1503至1520年。——译注

② 温妮，威尼弗雷德·A. 史密斯的爱称。——译注

色夏装的史迪威。她觉得"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人，也从未见过这么迷人的深褐色眼睛"。他们在一起感到很愉快。他问她是否可以给她写信。一年以后，他邀请她参加西点军校的军官舞会，但是她母亲不信任军人，未允许她去。然而他来参加了她的中学毕业舞会。此后，在母亲的陪同下，她到西点军校去看他，并会见了他家里的人。他在一封信中称她为"甜桃"，这使她不快。但是1910年春天，她参加了那一年西点军校的舞会之后，他们订了婚并在当年10月结婚。他在婚礼前夕写给她的一封信中说："结婚以后我将比未婚时更加爱你……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照料你，使你幸福。但是我绝非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我会常常需要你的帮助，也就是说当我烦躁、发脾气和郁闷的时候……如果有时候对我不能忍耐了，亲爱的，你要记住我会纠正过来的。我唯一的希望是永远使你幸福。因为我一心一意爱你。"

甚至在恋爱时，史迪威也不想只呆在国内。在每年一度的渴望到"海外"的心情推动下，他去中美洲度过了1909年的暑假；1910年，利用订婚与结婚之间的时间再次申请给予考察地形的任务。他在写给陆军部的信中列举自己的条件是懂西班牙文和有以前的经验，斗志昂扬（虽然有点含糊）地说，他不在乎这个工作的性质，"只要我去那些国家是符合美国利益和对付它们的"。尽管他有这样的战斗热情，国务院和参谋长仍然没有批准他的要求。由于新近同尼加拉瓜发生了"磨擦"，国务院希望避免使事情复杂化。而参谋长则"考虑到对过去到过那里的一些人的影响"暗中反对派年轻军官去执行这类任务。

结婚前不久，史迪威恰好碰上开始实行派遣性任务和团队勤务轮换制的新规定。根据这些规定，在和平时期，少校以下的战斗部队军官六年里必须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团内服务。这些规定是旨在把到华盛顿执行派遣性任务的任职时间限制在四年之内。1912 年国会通过法案，把这些规定制定成法律，以后称为满族法令，以纪念同时把陆军官僚赶出华盛顿和把满族人赶出北京的行动。由于发现史迪威在第十二步兵团的第一服役期不够规定的期限，再次分配他回到团里。1911 年 1 月，他同妻子一起乘坐“谢尔曼号”运输船启程去菲律宾。

他第二次到这个群岛服役只是在距马尼拉很近的威廉·麦金利堡兵营执行日常驻地任务。除了他于 3 月份晋升为中尉是件新鲜事以外，每天进行全连闭着眼睛都能做的操练，到可以消磨掉时间的下午一点结束的兵营学校去学习，另外，为了把余下的精力耗尽就为士兵们组织“班卡”① 划船比赛，以及教他们在河上架竹桥。他一直注意墨西哥正在发生的革命，要求调到边界上去“活动”，但是没有成功。到 9 月，他已经积蓄了三个月的假期，于是决心同妻子利用些时间多看一看东方的特色。然后她将回国等待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

他们于 9 月 14 日乘船去日本，先抵达长崎，从那里开始游览了内海海滨，一直游览到广岛。史迪威逢山必登，疾步至巅。他在笔记中写道，当他花了一个半小时登上宫岛山顶时，“向导对我的腿功惊叹不已”。在以后的六个星期里，在无止境的好奇心和充沛的精力促使下，他同温妮细致地游览了日本。他立即开始学习日语。有一次在火车站买牛奶时闹了个

① “班卡”，菲律宾等国使用的有舷外护木和竹篷的独木舟。——译注

笑话。事后查了字典才知道他误说成要“妈妈的奶”。他记录下来的话是十分详尽的，但是这时他对日本还不很熟悉，他的记录主要是记实，没有判断和看法。

虽然报纸上满篇是有关中国革命的惊人事件，但是史迪威显然被日本所吸引，而没有去注意，因为他在日记上根本没有提到这些事件。11 月中旬，他的妻子回美国，他在送别妻子后自己继续旅行，亲眼去看了中国。

第二章　看到革命的来访者

——中国，1911 年

史迪威是从上海进入中国的；上海是通商口岸中最大的港口，也是这种口岸的缩影。他第一眼看到的是外国军舰——两艘日本的、两艘法国的、一艘英国的、一艘德国的和一艘美国的——不是以客人的身份而是以占领者的身份停泊在上海港咖啡色的水面上。中国这座由外国企业发展起来的大都市和商业首府大体上已经成了外国控制的租界。上海市处在中国的大动脉和亚洲最繁忙的河流长江的入海口。中国的一半工业都集中在上海地区，一半贸易都是通过上海的码头进行的。史迪威在吴淞口第一次见到了黄包车，看到了江面上的舢板和行驶着的小帆船。进入上海市区以后，他的第一个印象是“大吃一惊”。大多数外国人抵达上海时都有同感，因为他们本来下意识地预期能看一看东方的异国风光，而看到的却是一座西方式城市的高大旅馆、银行、宽阔的马路和公园。从旅馆的窗口眺望，史迪威认为上海很象美国的费城。在公共租界的马路上，他诧异地看到了从英属印度雇来当警察的裹着头巾、个子高大的锡克人。

革命只是使史迪威增加了一点兴奋，而没有给他造成很大不便，因为这次革命也象大多数重大剧变一样，目击者不会十分注意，但在历史上是显著的。他到中国地界游览了一次，

看到了飘扬着革命旗帜的叛乱势力募兵站。旗帜上的帝国黄龙已经换成了红底上有十二个锯齿的黑色太阳。他同一些军人交谈时注意到他们背着中国造的毛瑟枪，看上去都是“品德很好的小伙子”。他看到贫民窟里躺满了象蚊蝇一样密密麻麻、衣衫褴褛的乞丐，那里堆满了垃圾，有肮脏得令人作呕的水沟，有一个苦力为了三十美分脚力钱扛着一大摞箱子从码头送往旅馆，一个走街串巷的小商贩在卖桔子瓣，一座寺院里有一批身穿白色丧服的哀悼者，“一些贵妇人站在门廊的灯光下，她们穿着华丽，配戴珠宝，但是每一张脸都显得呆板、没精打采。”他走进一家明代开设的茶馆，注意到通向茶馆的小桥是之字形的。中国人认为之字形可以避邪，因为鬼魂行走不能拐弯，到拐角处就会跌落水中。他又在别处看了各家各户供奉的佛和神位之后说，在中国信仰宗教的主要目的“看来是为了吓跑不断企图伤人的魔鬼”。

由于偶然的机会，也许是由于敏锐的观察，他抓住了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情况——惧怕给人带来灾祸的那些妖魔鬼怪。外国人被称为“洋鬼子”，有时加上“长鼻子”或“长毛”一类的形容词，他们在中国人心目中总是与魔鬼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本能一直是不让外国人玷污她。1898 年以前，清王朝没有负责处理同别国关系的外交部，因为他们不希望也认为没有必要建立这种关系。要求通商、传教或者建立联系的外国人一直与理藩院打交道。

有史以来，中国一直自认为是文明的中心，周围都是野蛮人。它是中央王国（世界的中心），它的皇帝是秉承天意的天子。中国人由于深信自己的道德准则优越，认为中国之所以

伟大应归功于她的圣贤制定的社会秩序原则，这些原则是由一批有学识的杰出人物怀着仁爱之心对全体和睦人民实施的。不幸而居住在中国疆界以外的人则是"夷人"，当然是劣等人。如果他们坚持要来中国，应当带着，其实也是要求他们带着贡品，并且要磕头表示归顺。

从马可·波罗时代到十八世纪，访问中国的西方人，由于惊奇和出于羡慕，都是按照中国对自己的评价来对待中国的。中国有记载的历史始于公元前两千多年，它的青铜器同金字塔一样古老，它的古典文化与希腊的古典文化处于同一时代，它的儒家伦理学经书即使不早于旧约全书至少也在新约全书之前。中国发明了造纸法、瓷器、丝绸、火药、钟、活字印刷术，修建了世界奇迹之一的长城，创造了精美的纺织品和陶器以及寓意深奥、富于表现力的绘画艺术，而当时欧洲的绘画艺术仍然是原始而平淡的。

在辽阔、壮丽而古老的中国，到处是龙脊寺庙、大理石桥梁、平整的稻田、多层的宝塔，上有一位神圣的君主和一批卓越的朝臣，下有无数勤劳的劳动人民，没有遭到过西方发生过多次的宗教战争的破坏，是基督教势力范围以外的至高无上的文明古国，礼节严明，崇文尚学而蔑视战争，因而游历中国的欧洲人说中国是理想王国，似乎确实象中国哲学家们说的那样找到了理性治国的秘诀。倘若果真如此，中国存在的民众贫困的矛盾现象就令人迷惑不解了。一些观察家也很难弄清楚为什么腐败现象和朝代的衰颓循环不已，它的文化总是象没有制动装置的车轮一样无休无止地在昔日的车辙中旋转。但是这种疑问并没有十分妨碍西方人的习惯，他们总是

把中国理想化，使之适应西方某个时代的理论。

但是在十八世纪末叶，当西方军舰和商人涌向中国海岸购买茶叶、丝绸和棉花时，他们发现对方毫无通商的热情。由于有优越感而闭关自守的中华帝国不希望叫做英国、法国、荷兰的这些原始岛屿的异国人不断进来消耗掉中央王国的财富，而带来交换的只是些毫无价值的东西。他们长着丑陋的大鼻子，举止粗野，穿着滑稽可笑的衣服，紧袖管、瘦裤腿、紧领口、后面有尾巴前面却敞开着的礼服。这些都不是通情达理的人穿的服装。

一个只有与世隔绝才自感安全的守旧社会感觉到了纠缠不休的西方构成的威胁。于是中华帝国政府采取了拒绝、回避、推迟、禁止等一切可能的办法阻止洋人入境、定居或建立正式关系。躲在北京紫禁城异常幽静的"大内"的朝廷，对外国人前来敲中国大门的声音置若罔闻。前来要求签订通商条约的外国使节只有按照三跪九叩的礼仪晋见天子方可入境。克服了无数的困难才到达北京的一批英国使节，由于不肯磕头结果空手回国。

西方商人由于是用银子购买中国货的，所以没有完全被禁止。根据一套旨在防止他们的人闯进来而不是禁止他们的钱流入的规章，商人们被限制在距首都北京尽可能远的、最南部的广州港，并且只能同设在城外的"商馆"——包括住所、办公室和库房在内的设施——作生意。为了打消他们长期定居的念头，不允许他们带妻子来。为了不让他们学习中文，朝廷宣布给外国人当教师是违法的。

即使有这么多的限制，贸易还是扩大了——货款是用致

命的鸦片偿付的。欧洲和美国对茶叶和中国工艺品的需求使商人们大有发财的希望，可是用钱购货的单方面交易不能扩大和有利可图。在把印度和波斯出产的鸦片引进中国市场以前，外国人拿不出什么中国人愿意要的东西。随着中国人对鸦片需求的扩大，这种东西后来成了得到英国东印度公司许可的运货人和接踵而来的美国趸船贸易商运来的主要货物。从此商人发了财，贸易扩大了许多倍，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也开始依赖这方面的收入。

中国人尽管嘴里说这种贸易是非法的，实际上也靠它发了财。交易人和经纪人拿到了佣钱，各级官员则苦心进行朝廷会视而不见的欺诈。他们包抄走私船，虚张声势地追捕一番，追赶那些趸船，但保持安全距离，打一阵炮，然后冠冕堂皇地向远在北京的皇帝报功。由于东方风气是重形式而不重实质，这种作法满足了中国人讲求面子的心理需要。迅速发展起来的鸦片贸易加剧了清朝政权日益严重的腐败。西方人不时也感到羞耻，但是他们算算贩卖鸦片的收益，也就逐渐心安理得了。对双方来说，这个大规模的假面舞会不是相互尊重的好做法。

这种局面终于酿成了 1839 至 42 年和 1856 至 60 年的鸦片战争，这两次战争决定了以后中国同西方交往的性质。由于海关收入受到了损失，吸毒在人民中造成了日益严重的恶果，担心挡住外国人的封锁线行将瓦解，中华帝国政府决定必须结束鸦片贸易。而渴望推销棉花和其他制成品的英国人则强烈要求开放其他港口和用条约形式把贸易权肯定下来。从根本上说，涉及到的问题不仅仅是鸦片，而是中国人要限制交

往，西方人则要扩大双方的交往。结果是西方占了上风。

中国那些由于清朝政府漫不经心任其生了锈的老式海岸炮根本对付不了英国的快速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果是签订了南京条约。这个条约实际上使中国向西方开放了，为以后的外国入侵开辟了道路。根据这个条约，中国除了长久割让香港以外，还从广州到上海开放了后来称为通商口岸的五座沿海城镇。在这些地方，英国人可以携带妻子居住，可以建立领事馆，设立依据英国法律审判触犯英国法律的人的法庭，还可以按照百分之五的固定关税通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以长矛作武器的中华帝国军队被英法两国远征军击败于北京城外，结果是承认和扩大了治外法权原则。外国人得到了出入十个新的通商口岸、在长江航行以及在全中国旅行的权利。他们甚至获得了在北京派驻外交代表和居住的权利以及传教士在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拥有财产的权利。随着中国的最后屈服，贩卖鸦片就合法化了。美国和俄国虽然没有直接参战但也都参加了签订条约的谈判。在打开中国门户的过程中，美国始终跟在英国人后面；英国人在前面打开一道门，美国人就跟着进去，这样既没有参加侵略又得到了好处。

中华帝国政府过去是靠着声威进行统治的，但是由于被野蛮人打败了，这种声威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年代里，灾难激增。对农民的税收增加了，执政的官吏贪污腐化成风，权威下降了，权力分散了，土匪活动猖獗，国家主权的根基开始倒塌。1850 年，一切腐朽现象和人民的不满终于发展成了一次规模巨大的称为太平天国的人民起义。这次起义历时十五年之久，在使两千万人付出了生命之后才

结束。太平军依靠被压迫人民的力量，成功地在南京建立起一个与北京对峙的首都。“天意”已经不再授与不可信赖的王朝，朝代的交替看来已近在眼前。但是，外国人为了确保通过条约夺得的特权，支持了中国政府。在他们的帮助下，政府收复了南京，屠杀了十万太平军。中国这次没有成功的“法国大革命”被镇压下去了。

从此以后，在中国靠着外国帮助维持下来的相当于“波旁皇族”的宫廷开始依赖入侵者。依赖的一个方面是极其重要的岁入。在革命造成的混乱时期，英国人和美国人开始替中国政府征收关税。由于他们工作效率高，渎职现象少，因而使北京从这个来源得到的收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双方通过协定把这种制度推广到所有的通商口岸，并且使之成为一种永久性办法，由一名英国人担任监督，下属海关人员都换成了外国人。

许多中国人开始形成一种想法，认为自己的国家要想对付西方的威胁，必须在保持本国观念的同时用西方的技术武装自己。要么改良，要么灭亡。似乎西方的办法可以不顾各种联系地单独拿过来用于中国。这次“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引进了西方训练陆军和海军的教程，兴建了制造西方武器的兵工厂，不顾保守派的激烈抵制在北京开办了一所学校，除了一成不变地学习中国教育之本的经书以外还增设了西洋课程。作为一个陆路运输基本上依赖手推车的国家的第一要素，他们主张兴修铁路，此外还主张架设电报线，开工厂，造机器，建立邮政系统，特别是革新学制。但是反动势力反对得很厉害，加上缺少一个象当时的日本明治天皇那样果断的倡导者，这

个现代化计划没有发动机，不能产生动力。以思想狭隘又十分威严的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朝廷设法使改良派无法达到预定目标。

慈禧主宰下的政府依靠的是一个满脑子中世纪思想的贵族集团和一支松松垮垮、办事效率很低的官吏队伍。变革的动力是外国人。铁路是外国资本和影响渗透的渠道。中国政府把修建铁路的权利出卖给争相得到这种权利的外国人。雇用的外国顾问越来越多；传教士的队伍也膨胀起来，他们的到来表明中国需要救助；外国棉花和其他产品输往中国，造成了手工业的衰颓。中国对外国的依赖愈大，中国人的不满情绪愈甚，最后酿成了"事件"。但是，每一次事件的结果都是无可奈何地又签订一个"不平等"条约，进一步丧失了主权，外国人又增加了治外法权，他们一脚又踢开了一个通商口岸的大门。外国人开发了中国的资源，但是却渐渐削弱了它利用这些资源的意志和能力。

西方资本主义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发展到了猖獗的地步。大清帝国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但是毫无成效，结果于1885年被西方抢去了两个属国——法国夺去了东京和安南，英国夺去了北缅。同一年英国还取得了十个通商口岸。在这十年之内，另一帮野蛮人（中国人习惯地称为"倭奴"或"倭寇"的近邻）又夺去了第三个属国。1895年日本突然强大起来，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中国，迫使它放弃了高丽（委婉的说法是让它"独立"）、福摩萨、佩斯卡多尔列岛①，付出一大笔赔款，最严重的损失是割让了大陆上的战略要地辽东半岛。辽东半岛是

① 福摩萨、佩斯卡多尔列岛，即我国台湾岛和澎湖列岛。——译注

满洲的门户和控制了经海路去华北的要道。

对这一敌手的出现感到惊愕的欧洲列强，在想独占满洲的俄国的怂恿下，匆忙地联合起来迫使日本吐出了辽东，然后它们自己又赶忙分别从仍然因败北而胆战心惊的中国手里夺得了各种租借地、特许和特权。俄国赶走了日本，自己却取而代之，夺取了辽东半岛上的租界，在旅顺港为自己修建了海军基地，在大连修建了一个商港和铁路车站。英国夺取了旅顺口对面的山东半岛上的威海卫，在该市北部为自己修建了海军基地。德国在山东半岛上的黄海岸边的青岛市获得了一个海军基地和铁路车站，还获得了开矿权。在南方，英国夺得了香港对面大陆上的九龙市，法国在与印度支那相连的广州湾海岸上取得了一个海军基地，还获得了修建从印度支那通往华南的云南省的一条铁路的特许。

接着，这几个国家为了向中国提供它对日赔款所需要的贷款而争吵起来。贷款是仅次于兴修铁路的最好的渗透方式。竞争助长了贪婪，于是列强坐下来划分“利益范围”了。它们都拿到了得到认可的开发资源优先权和将来万一瓜分中国时可以进一步并吞地盘的立足点。这时掠夺气势日盛，瓜分中国的议论日增，使垂涎三尺但又碍于原则的美国十分苦恼。

南北战争之后刚刚繁荣起来的美国，在未侵占别国领土从而不受良心责备的情况下参加了开拓中国的活动。1898年，这种既谋取利润又照顾原则的办法被海约翰奉为一种对外政策原则。称为门户开放(虽然不是他去开放)的这一原则听起来是厚道的、高尚的、是保护中国的，其真意却是要渗透

之门一视同仁地向大家都开放。

此时美国对中国的渗透是商业与宗教双管齐下。为每户人家的油灯供应煤油的美孚油公司的代理商可能找到了较多愿意购买的顾客，但是对两国关系有更大影响的还是那些传教士。

中国的辽阔国土引起了传教士们的兴趣。中国似乎是未来的理想之乡。其民众一旦皈依，基督教，甚至讲英语的民族就有了主宰世界的希望。传教士们不顾中国人感到适宜的社会和伦理结构，硬是要他们改换成个人神圣和民主原则支配一切的社会和伦理结构，不论这些主张是否适合中国的生活方式。亲眼看到了中国在十九世纪的苦恼的传教士们必然以为中国不能自理，他们的问题只有在外国帮助下才能解决。狂热的、无孔不入的美国传教士把“美国援助东方”看作自己的使命，把它变成了向国内教友大会作报告时的口头禅。他们由于都需要依赖国内的赞助者提供经济支持，就得能说服人们相信从事这项事业是值得的。美国各地的教友大会都听取了回国的传教士用幻灯片讲述的中国人民的长处和未来的基督教徒的巨大泉源。在公众的印象中是美国通过门户开放主张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再加上传教士的宣传，人们就觉得中国是美国的保护国，从而自然感到有一种施恩义务。

1898 年，中国一度出现了一线希望，它力图维新。被日本打败之后，中国一向轻视的这个邻国变成现代军事强国的事实使它大为震动，使维新派再次振作起来。在年青的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他们提出了一个庞大的现代化计划，其中包括发展运输和工业，兴办学堂和报纸，改革行政机构，还有一项

最激烈的主张，即废除以书法和儒家学说为基础的旧的考试制度。光绪皇帝发出了圣旨。旧制度动摇了。中国为获得新生而奋斗了一百天。但是守旧派控制着最强大的武装部队。西太后发动了势不可挡的政变，逮捕了维新派领导人，处决了其中的六个人，把她的侄子囚禁在紫禁城内一个湖心宫殿里，她自己又登上了王位。这个周围是宦官的锦衣粉面暴君当政后，危机四伏的清王朝不数年终于灭亡了。

由于屡遭挫折和侮辱，1899 至 1900 年的大危机——义和拳叛乱爆发了。灭洋即使不是全部宗旨至少也是他们的口号。鼓动者是一批称为“义和拳 (Harmonious Fists)”(外国记者将其译为 “Boxers”)① 的秘密社团。他们的领导人是一些迷信狂，认为中国的一切弊端都是外国人造成的，因而煽动民众热衷于屠杀，并自称有蔽弹之术。他们相当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纯亚美利加党党徒 (Know-Nothings)②。义和拳运动并不是一次真正的叛乱，而是一场野蛮、残忍的滑稽剧。这个运动燃遍北方，其目的并不是反抗满族人，反而打着皇帝和清朝的旗号。实际上这场运动是依赖政府支持的，因为政府既想借义和拳运动把人民的不满情绪转移到一只替罪羊头上，又把统统赶走外国人的最后梦想寄托在它身上。义和拳运动首先是在整个华北地区分散爆发的，屠杀了二百名传教士和他们的家属，还屠杀了至少两万名“二鬼子”，也就是皈依的中国人。他们随后聚集到北京，包围了外国公使馆。

① 义和拳的两种英文译文。——译注

② 1853 年出现于美国的秘密团体，其正式名称为 American Party。该党以剥夺所有外国人和天主教徒的政治权利为目的。该党党员被称为 Know-Nothings(直译为无知狂)，是因为他们宣称对该党的活动一无所知。——译注

积六十年仇恨而气得发抖的清朝廷，尽管意见不一，终于向西方列强宣战了。

六个国家的派遣队组成的一支外国军队从沿海登陆杀向北京，去解救被围困的各国公使馆。营救部队为了对义和拳的袭击进行报复，一路上肆意烧杀掠夺，以示惩罚。一位目击者、老报人托马斯·米勒写道："部队对沿途每座市镇、每个村庄和每幢农舍都先掠后焚。"他的结论是，外国派遣队经过的道路"将给世界未来的许多代人留下道义上的污点"。在北京，据美国公使说，外国军人和文职人员，从将军到列兵，从公使到随员，从主教到教士都曾"偷盗、抢劫、掠夺，普遍干下了玷污自己名誉的事情"。胜利者强加给中国的条件十分苛刻。十二个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宣布中国犯有"践踏文明"罪和践踏国际法罪。北京市中心的交民巷成了外国驻军控制的治外法权区。两年内不准中国从外国进口武器。从北京到海滨的要塞被拆除而授权外国军队维持通往北京的道路畅通。向中国索取了巨额赔款，并以海关岁入作为保证金。中华帝国的四名官员被处决，一些人被革职或处以终身流放。

外国企业不论多么可恨却把中国拖进了二十世纪，发展了它的经济，唤起了民众的政治觉悟，打破了它的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显然需要维新，想铲除满族压迫者的愿望日趋广泛。受过西方教育的二十八岁的基督教徒孙中山博士于 1894 年组织了第一个致力推翻清王朝的秘密社团"兴中会"。他出生于受西方影响时间最久的广州地区，在檀香山受过西方教育，在香港学过西医。追随他的人是一部分维新派。当时维新运

动正在以多种形式出现——大胆的学生剪去了象征着顺从满人的那条长辫子；文艺复兴正在冲破经书僵硬的模式。甚至清朝官吏(他们并非都是顽固分子)也开始动了起来，于1904年兴办了第一批本国的公立学校。1905年9月，帝国政府发布了一项告示，废除了公元前一世纪就开始实行的科举制，这就拆去了中国的文化长城。清朝廷为了维持王权，愿意树立新的门面，答应五年以后制订宪法，还答应经过一个适当时期对人民进行教育之后通过选举产生议会。学校课程中采纳了西方学科，教会学校作为获得新学问的源泉而扩大了。进步的中国人象日本人一样为西方的做法所吸引，因为他们认为，对付西方挑战的办法就在其中。

日本在1904至05年的日俄战争中获得的惊人胜利激励了"自强派"。日本的榜样看来是值得效仿的。希望得到适合新时代的高等教育的学生去东京留学了。美国在1904年制订的排华法案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由于美国人激烈反对靠进口廉价"苦力"铺设横贯大陆的铁路而制订的这个法案专门规定永远禁止雇用中国工人，而别的阶级例外。1905年，中国人的不满情绪爆发成为抵制美货运动。这场运动蔓延到从北京到广州的二十五座城市，并且带有反清的革命情绪。这时敌人被结合在一起了；剥削者和外国人将在一场彻底解除对中国的一切束缚的大革命中都被抛却。然而抵制美货运动没有扩大到抵制西方思想；具有新思想的中国人仍然认为西方化是革新的必要手段。

从美国和欧洲归来的留学生与那些身着绸缎长袍的清朝官吏的精神面貌大不相同。前者获得了工程学、农学或政治

学的学位，穿西服戴眼镜，表情庄重，形成了一个新阶级；后者头戴瓜皮帽，上面有表示官级的帽顶，留着长长的胡须，看上去似乎拖到了胸前。

由于不久前获得了夏威夷和菲律宾群岛而刚刚转向亚洲的美国，此时被在东亚的企业机会和向远东出口商品的销路的美景弄得眼花缭乱了。中国十分重要，看来是美国将来能有所作为的地方。据说海约翰说过，谁了解了中国谁就能执今后五百年世界政治之牛耳。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05年曾经断言："我国今后的历史主要将取决于我们在与中国相邻的太平洋上的地位，而不是与欧洲相邻的大西洋上的地位。"1908年，他免除了义和拳运动后该给美国的那部分赔款，将尚未支付的部分拨作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的教育经费。这个明显的姿态是个起广泛宣传作用的英明之举。很久以来美国人和中国人都列举这件事作为表明两国特殊关系的象征。

美元外交就不那么无私了，而是同其他国家一道疯狂地迫使中国接受用于修建铁路的利率很高的贷款。中国人举目四望，总是可以看到祖国部分国土、主权和一些重要事业设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外国人的轮船依据条约权利航行于中国内河。外国人的银行为中国工业和贸易提供资金，控制着中国海关收入和外债利息的支付。外国人还为中国的富有公民提供了可靠的存款处。外国法庭实行治外法权法，外国邮政局分发享有治外法权的邮件。在上海的外国租界，中国居民要纳税，但是不能参加选举，还不能进入某些公园，他们可能遭到警察逮捕。

在那些通商口岸(其中很多通商口岸在内河)，身穿制服的外国海关人员是人们司空见惯的；附近开辟一个治外法权区供外国人经商和居住。在中国人居住区，人群拥挤，一片喧嚣，气味难闻，呼叫、争吵、大笑声汇成了无休无止的嘈杂声音。在码头上，轮船冲撞帆船和小舢板，船夫尖声叫着，乘客们在一包包货物中间穿行。大街上到处是小摊贩、黄包车、手推车，富人坐着轿子，前呼后拥的保镖们吆喝行人让路，苦力们用竹扁担挑着沉重的担子，瘦狗钻到脚下寻找残渣剩食，男人们蹲在露天阴沟边上。

到了一桥横架的运河，这一切都突然中止了。在运河的另一侧是一个平静而整洁的世界。干净的街道两侧绿树成荫，一名身穿白色制服的警卫坐在椅子里打盹儿，一艘配有闪亮的铜部件的白色小炮艇停泊在沿江公路附近。住宅区外面有一个通常称为维多利亚公园的娱乐区，里面有网球场、板球场和俱乐部。英国人管理的任何俱乐部不准中国人入内，而绝大部分俱乐部又是英国人管理的。每到下午，租界的上层人物便乘着轿子到这个公园游览。中国轿夫穿着各领事馆和商号的不同的制服，英国使馆的服装是白底红边，庞大的英国贸易公司怡和洋行的服装是蓝底白边。在发生暴乱、土匪抢劫或其他威胁时，那艘炮艇上的身穿蓝色制服的一小队军人就会上岸在沿江公路上操练以显示力量。在这些“外港”——处于广阔而动荡不定的中国大陆上的孤立飞地——的外国人没有这种小炮艇的光临生命是很危险的。这些小炮艇都是以鸟类命名的，例如“鹬”、“野鸭”、“矶鹞”、“山鹬”。

很多人现在认为，要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的独立与平等的

地位，唯一的道路是革命。虽然外国租界是敌人，但是孙中山本人由于已非常西方化而不会反对外国人；他坚信中国由于对外国的依赖已达到积重难返的地步，没有外国贷款和技术上的帮助，维新是搞不起来的。他认为，革命的首要目的是反对清朝，因为只要中国不摆脱使它没落的掠夺性朝代的统治，就无法强盛起来，“且其软弱势将引起外族之贪欲，危及世界之和平”。他认为，革命将通过在中国建立起强有力的新式政体来促进世界和平，革命将欢迎外国援助，而列强由于认识到这种援助的作用肯定愿意提供。他夫人说：“他不是胸怀一个中国，而是胸怀全世界。”

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里，非法的革命团体先是以日本为基地后是依靠国外华侨，逐渐壮大起来，并在大陆上，尤其在南方的广东和广西两省，聚集了革命力量。由于省会广州控制着往来于香港的贸易，广东省当时是中国最富足的一个省。广东人民对革命是同情的，希望国家繁荣。在旅居河内的孙中山指导下，从 1907 至 1909 年南方爆发了六次起义，起义没有确定的目标，只是寄希望某一次起义能受到人民的拥护。1910 年，当孙中山博士正在欧洲和美国募捐时革命的发展速度加快了。革命党人在广州、汉口、甚至北京都发动了起义，但未获成功。孙博士的副手汪精卫曾去北京刺杀摄政王，结果事情败露，被叛处无期徒刑。由于武器没有运到，领导人错过了约定的时间或其他不幸和疏忽，所有的起义都失败了。但是这些起义使他们的事业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吸引了新的参加者，传播了反叛精神。

1911 年 10 月，革命党人在横跨长江的武汉三镇（汉口、

汉阳、武昌）又计划发动一次起义。他们在汉阳设立了兵工厂，在武昌的朝廷军队里进行了策反工作。

由于发生了爆炸事故，过早地暴露了准备工作，于是立即作出了进攻总督府和占领兵营的决定。在10月10日那一天(后来一直作为双十节庆祝)，这一冒险行动竟然奇迹般地成功了。驻军哗变，总督和镇统仓惶逃往上海，革命党人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突然变成了这个中国心脏地区的主人。当他们开会选举领导人时，革命委员会公推了标统① 黎元洪，随即派代表去通知他担任领导。但是这位统领得知有人来找时料想凶多吉少，便匆匆躲到床底下，可是没有藏好的一只脚泄露了机密。他被从床下拖出来时，向他提出的却是彬彬有礼的请求：要么领导革命，要么被枪毙。他作了明智的选择，以革命军都督的身份宣布推翻清王朝。

不出两天，武汉三镇全部落入义军之手。广州的同志奋起响应，这一次终于成功了，他们暗杀了镇统，建立了革命政府。这些事件在中国其他地区引起了一连串的暴动；省府被焚，总督被杀，军队哗变。一个月之内，九个省先后宣告脱离清政府，虽然不一定都归顺同一个革命政权。中国开始分裂了。

惊慌失措的清王朝于是起用了铁腕人物袁世凯。此人五短身材，健壮敦实，有一双机灵的眼睛，留一抹小胡子，长得很象克来孟梭，② 也和他一样特别能干和野心勃勃。袁于10月

① 标相当于团，标统即团长；协相当于旅，协统即旅长；镇相当于师，镇统即师长。黎元洪当时任第十二混成协统领。——译注

② 克来孟梭，法国政治家(1841—1929年)，左派激进党领袖，屡次推翻内阁，绰号是“内阁破坏家”和“老虎”，1917年11月出任内阁总理。——译注

底收复了汉口，屠杀了所有剪掉辫子的人或者支持过起义的人。革命者这时已将基地移至上海，滑稽的是竟然避难于外国租界，受到了治外法权的保护。一项交易谈妥了，于是拥有金钱、工业、兵工厂和造船厂的上海于 11 月 3 日接受了共和制。袁世凯估量了这一趋势之后，表示愿意以君主立宪为基础进行谈判。日后事实证明，他提出君主立宪时内心早在盘算自己夺取王位了。十分缺乏巩固的基地又没有一位果断的领袖的革命党人仍然尽力讨价还价。他们坚持要建立民国，但是同意让袁任总统，条件是他要把华北归并于新政权之下。北京则请他出任内阁总理，从而使他处于革命和反革命同时聘请的地位，这可能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怪事。袁接受了满族人提供的总理职位，因而使斗争复起。革命党人从上海出发沿江而上，向南京发动了进攻。

在发生这种种大事件的情况下，古老的大厦开始在混乱中解体：地方权贵借机尽量扩充势力，叛军在攻占的城市大肆烧杀，帝国主义者也在他们控制的城市趁火打劫。一无所有的难民成群结队地四处飘泊。农村比以往更苦，因为现在散兵游勇和土匪抢掠粮食和牲畜。此时土匪势力日益强盛，因为拿不到军饷的官兵向他们出售弹药或与他们携手作恶。村民们以锄头、草叉和棍棒为武器各自为战，封闭大门，筑起围墙，来客只好攀绳而入。政府崩溃的日子看来屈指可数了，但是革命势力却没有把握能够取而代之稳定时局。一位美国记者写道，革命的目的虽好，却“由于缺乏团结力量，缺乏资金和缺少一位领袖人物，到头来还是一场空……这个长期沉睡的伟大民族群情激愤，陷入了恐怖和狂热，他们终于爆发了”。

在这个时刻，史迪威于 11 月 23 日到达上海，在中国总共逗留了十七天。他仅仅看到了这场大动乱的表面现象，没有作出深刻的判断，但是他怀着好奇不已的心情去进行观察并作了记录。他得出的看法揭示了历史学家们常常忽视的一个真理——就在可怕的事件的附近，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同往常一样，好象它必须如此。游历了上海之后他乘船前往香港。他的印象是，这座富于进取精神的城市“就象挂在半山腰上一样”，俯瞰着它的宏伟壮观的海港。这里和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其他地方一样，英国的国旗插在最高点，显示着大英帝国善于经营的本事。史迪威进港时那里停泊着六艘远洋巨轮。他乘坐的轮船周围拥挤着许多小舢板，每一条舢板上居住着一户人家，连小鸡也养在船上。“妻子掌舵，孩子们划桨，人人都干事。”他在美国人开办的一个家庭客店吃了感恩节午餐，饭后乘坐缆车到了香港最高峰，从那里望下去，海港的世界驰名的风光是在“我记忆中最好的、最美妙的景象”。

他注意到了刚刚剪去辫子的中国人的怪诞模样，他敬佩英国练兵军士，说他们的“指挥、外观和效果比我们的军官平均要胜过百分之五百”。另一方面，他在后来成了一种历史性偏见的第一份报告书中又断言英国军官“一团糟。至少在香港这里是这样的。他们不整洁、脾气坏、懒散，拿着手杖闲逛，给士兵树立了坏榜样”。使他恼火的是那根手杖。史迪威一生中每当见到不论哪个国籍的军官用一根散步时带着的短杖拍打靴子时，就产生极大的厌恶情绪。他得出结论，认为在香港，所有的士兵都比他见到的任何一名军官更象个军人。

他在香港期间，报纸上满版是报道广州陷入一片混乱的

消息：那里发生了巷战，武装强盗抢劫店铺，旁观者被打死，革命政权完全软弱无力，广州市实际上落到强盗手里，海盗涌入了西江。据说这些海盗切断了梧州与外界的联系，杀了一艘英国江轮的大副。史迪威断定“所有这些事端都是残忍的英国人挑起的，因为他们试图把事情弄到糟糕透顶的地步，以证明他们出面干涉是应该的”，因而他当即出发去广州，准备从那里沿江而上去梧州亲眼看一看。

在广州，中国人生活的格调和活力、各种气味、音响和人的浪潮、古式古风和无限的聪明才智、迷人之处与令人毛骨耸然的事物使他应接不暇。他看到了一个猫狗市场；猫肉经过烹调，切割开挂着出售；燉烂的狗肉从锅里取出，盛到盘子里。一座水钟是公元 1325 年制造的，靠滴入一串水盆的水推动钟盘上的指针报时，报得“也很准确”。一座寺庙上装饰着雕刻华美、光彩夺目的龙；两只样子凶猛的巨大的红色石头狮子守在门口。他到迷宫般的狭窄的石头铺成的大街小巷漫步，看到熙来攘往的中国人互相挤撞着，“互相咒骂和训诫，高声叫卖”，或喊或唱，或摇铃或敲打着一段木头。各色货物的买主和卖主使大街上生意兴隆，有的过秤，有的讨价还价，妇女们在篮子里挑拣着鸡头鸡爪，一个裁缝在做衣服，一个男人在往罐子里填稻草，另一个在称鱼，还有一个在卖头发（“中国人剪下头发，放到报纸上出售”）。他注意到吸鸦片的人、舢板上养着的鸭子、卖唱的姑娘、坟丘、一些人家门口在烧香，一些闲人边聊天边在衣服缝里捉虱子，找到的虱子便用嘴嚼，还看到放在稻草里孵小鸡的鸡蛋、当铺、笼子里养着的可爱的云雀，听到猪的尖叫声、母鸡的咯咯声，嗅到尿和公共厕所发出的气

味，公共厕所“只是一排围墙，里面有一条可蹲的木头，有些地方孩子们就在街上大小便”。中国的两极分化很严重，一方面是做装饰品，剪翠鸟羽毛拼成浅蓝色和紫红色的仿制珐琅品，另一方面是“混乱、尘土、污垢、垃圾、破烂衣服，反映出了内在的玄妙”。

他同“义军——一伙杂牌军”谈了话。他们中间有些人“看上去是很不错的人，但是大多数是地道的盗贼”。他们有一种军装——配有红条装饰、卡叽布肩带和绑腿的浅蓝色军上衣和军裤，还有强盗外套。“许多人背着新的子弹袋，里面有充足的弹药，有些人站在周围，握着手枪，食指放在枪机上……我指着自己的红领带和蓝衬衣表示我也是义军，逗得他们笑起来。所有的人都鞠了躬，说声再见。”他记载广州爆炸队是由三百个立场坚定的人组成的，都宣誓不成功则成仁。他们的武器是自己造的小炸弹，装着用水银、炸药和凡士林制成的引信。他到了外国租界厦门岛，参观了俱乐部，外国人正在那里“开怀痛饮”。他听说，富有的中国人在厦门储藏了价值两百到六百万美元的金银珠宝。他收集了中国的传奇和迷信以及各种各样暴露传教士丑闻的传说。他在一位赞助传教士活动的美国人陪同下旅行了一天。这个人向他大谈基督教徒在为人民做什么事情，还对他说：“当我们来到这个国家时，我们就进入了第二个一千二百年的历史。”

游历了广州之后，史迪威便搭上一艘轮船，由英国的一艘八十五吨的炮艇“矶鹞”号护航，沿西江逆流而上，经过二百英里行程前去梧州。事实证明，关于海盗的传说并不是虚构的。在一次停泊时他们遇到了刚刚同江上盗匪交手后返回的一批

“义军”，他们拥有两艘炮艇、三艘汽艇和五六条舢板。他们看到尸体在水中漂过去，听到了两周以前发生的一次大规模交战的详细情况。梧州驻军袭击了一伙江盗，抓住了六十六个人，第二天砍了他们的头，然后挖出心肝炒了吃。史迪威听说，吃被处决的海盗的心肝是常有的事。有一次他还听说要吃掉整个的人。“他们吃掉他，这样他来世就不会投胎做海盗了。”由于想得多了，当轮船在三水市抛锚时他才突然惊醒。“我以为我们一定是遭到了袭击。从鼾睡中惊起拔出了手枪。”

后来他回到广州，在江上逗留了一个星期，观看了两岸和水上的生活和死亡，领会了他所见所闻的一切，记录了风俗习惯、生活规律和一切东西的价格，听说外国人走近时鸭子就会呱呱叫。他得出结论，认为普通中国人动辄勃然大怒，但是只动嘴不动手。他看到过无数次冲突，但是没有一次打起来。

他还在香港时在日记本中写道：“在南京，一天之内有四百颗人头落地。”这就是 11 月 27 日这座南方古都落入义军之手的结果。这次事件成了催化剂。摄政王由于指望保住清王朝的统治宣布辞职，让位给故帝的遗孀，但是南方的革命者宣称，在朝者不彻底让位绝不罢休。于是满族人沿着他们很久以前进关的道路退回满洲。蒙古宣告独立。尽管通商口岸里的人象患了中风似的，很想插手对付义军，但是列强仍然没有介入。一种普遍的看法是，革命势力由于是以西方为榜样的，排外情绪可能比旧政权要小一些。对刚刚过去的义和拳时期还记忆犹新的列强不大愿意维护旧政权。还有一种看法是，中国即将陷入政治大动乱，介入这场动乱将引起灾难性的后

果。前途十分重要，因而促使一个冷静的人① 说了话："亚洲与世界其余部分的关系是二十世纪最棘手的问题，对于仔细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来说，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

被革命势力许下的实行开放、西方化和实行代议制的诺言鼓舞起来的另一类人更为乐观。一位美国商人写道："我们十分崇敬和珍视中国和它即将进入的新时代。"总的来说，这是美国公众的态度。他们相信传教士们总是会带来希望的，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国即将变成他们感到称心和熟悉的国家，一个民主制国家。这四亿人中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文盲，他们的饮食中没有牛奶，也几乎没有肉类，没有卫生设备，没有自来水，没有不容侵犯的私生活，没有电，没有选举权，他们的工业有百分之九十仍然是手工业，他们的运输基本上还是依靠人力。他们没有考虑到（假如考虑过的话）处于这种状况的中国同民主制度是格格不入的。武汉的一位义军领袖以东方人认为应该讲别人爱听的话的那种礼貌对记者说："我们起事的目标是要使中国政府能象美国政府那样。"这种话美国读者看到时是再顺眼不过了。

史迪威于12月9日离开中国回马尼拉。中国革命继续颠簸着前进。谈判代替了军事解决，其结果是袁世凯正式向他的主子们建议必须同意建立民国。与此同时，孙中山最后于12月25日回到了中国，正式当选为建都南京的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对满洲人来说，不再有人支持他们了，末日到来了。1912年2月12日摄政的隆裕太后代表清王朝宣布逊位。

① "一个冷静的人"，指美国——亚洲协会秘书长约翰·福特。

中国现在是民国了。因此美国国会两院发表了联合决议表示欢迎:“鉴于中华民族已成功地宣告主权属于人民”,鉴于美国人民“历来同情实行代议制政府的一切努力”,因此美国“为中国人民获得了自理的权力、义务和责任向他们表示祝贺”,希望在民国政府领导下“……中国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国家能取得进步”。

事情并不这么简单。袁世凯仍然控制着华北,不受民国政权的管理。他在施展计谋,等待时机。由于缺乏一致的支持和权威,缺乏一支可靠的军事力量,孙中山不能占据支配地位。又举行了谈判,带来了无法避免的结局。1912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博士辞去总统职务,让位给袁世凯。袁在北京建立了政府。中国在求得了这种不稳固也不彻底的解决之后进入了现时代。

第三章　世界大战

——圣米耶尔和山东

1912 到 1917 年，即史迪威二十九岁到三十四岁的那几年，对这位美国陆军军官来说，太平淡了，没有机会运用这样年龄的人的旺盛精力。虽然欧洲军人从这个时期的中期就遇到了最大的挑战，美国军界却依然象一潭死水，几乎没有被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战争之风吹起涟漪。

史迪威于 1912 年 1 月从菲律宾回到美国。他继续留在团队里干了一年，仍然是个中尉，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里市的普勒西迪奥地区执行极其平静的任务。他的长子小乔是那年 3 月在锡拉丘兹出生的，但是六个星期之后母子二人到加利福尼亚避暑时他才见到这孩子。就是这个夏天史迪威一家第一次到了蒙特里南面一点的西海岸小村子卡梅尔。当时这个小村子还是未开发的、原始的穷乡僻壤。他们到海滨野餐，在大西洋海水拍打着的岩石上迎风漫步，当时决定这是他们日后要居住的地方，退休以后便在这里安家。

仍然好动的史迪威曾争取出任驻圣多明各武官，但是没有成功。然而西点军校要求他回去在英语和历史系任教官，他便于 1913 年 8 月在这所陆军军官学校重操旧业。虽然在军校的工作比在步兵部队的单调工作好一些，但是并没能使他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工作上。他的上司说，他是“一名很能干

的军官”，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他对历史系的工作并不热心”。他担任篮球和橄榄球的教练，次年6月又生了一个女儿，叫南希①。但是他还没有象后来孩子们长大并又添丁增口时不得不作的那样把做父亲的义务放到首位。据他夫人记得，乔在这所军校工作还不满一年就“拚命要离开西点”。

1914年夏季，他的机会来到了。由于被调到现代语言系教西班牙文，在经过争取后，他被派往马德里深造外文。在西班牙时，6月29日他用打了引号的注脚总结了对一天乡村旅行的记述：“(波斯尼亚的暗杀)”。其后的几周里，他也象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没有再想到萨拉热窝(萨拉也夫)发生的这次事件，直到7月30日他读到奥地利轰炸塞尔维亚的消息。“非常严重的战争新闻。似乎是一场梦，欧洲即将跳进深渊。”

回到在军校讲课的日常工作是不惬意的，以后的两年里也没有发生能够改变这种常规工作的事情。史迪威曾努力争取以观察员身份出国随同法国军队行动，他的努力白费了。陆军部1915年12月答复他的申请时说，他们已经派了五名军官出国观察欧洲战争（现在从英伦海峡沿岸到米索不达米亚已经有十个国家的军队参加了这场战争)，因而“不打算再派人去”。

但是备战的运动取得了进展。1916年6月通过了陆军法案，授权将常规部队的兵力扩充一倍，在五年时间里达到二十八万八千人的极限。史迪威的第一项战时任务是1916年夏季在纽约的普拉茨堡任教官。那里建立了训练后备役军官的第一个训练营地。当年9月，史迪威在当了十二年中尉之

① 南希后来取的中文名字是史文思。——译注

后终于晋升为上尉。

1917 年 4 月，拥有十三万三千人的军队的美国参战了。当时仅在西部战线，交战双方就投入了二百多万人。欧洲各国的国民军都编成了集团军，每个集团军下辖三到五个军，每个军通常下辖两个师。美国军队最高一级有组织的建制是团。虽然在名义上也有师一级的建制，但是自从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军人从来没有以师为单位，在步兵、炮兵、参谋机构和战场指挥人员、情报部门和作战部队进行必要的协调的情况下打过仗。这一切都必须重新学习和实践。必须把现有的团级基干部队扩充十倍，建立一支国民军。这意味着要先募兵、配备军官、训练、装备、运到国外、编组、补给、使各兵种协调，然后再经过进一步训练才能作战。参谋本部对这项任务并没有作出安排，也没有进行动员的总计划。

这个问题获得了有力的推进，1917 年 5 月制订了选募兵役法，授权招募一百万新兵。在欧洲作了调查之后人们认识到，要实行未来的计划，必须把这个人数扩大两倍。这支新建立的大军拟需要的军官人数吓坏了正规军，大约每二十个人中要有一名军官，或者说一百万人的军队要有五万名军官。在参战的第一年里，训练营地通过三个月的多种科目训练，培训出五万七千名军官，等于西点军校历年来的毕业生的十倍。

训练任务极其繁重，使别的一切工作都黯然失色了。通过训练造就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这是二十五年以后史迪威在中国工作的中心目的，就象现在是美国的中心目的一样。打仗的第一要素是有一支不会临阵脱逃的军队，而要保证这一点只能靠训练。未经训练的士兵就没有当兵的资格，未经

训练的军官是没有用处的军官，未经训练的军队就是一群乌合之众。陆军军事学院院长、不久以后去指挥第一师、最后指挥美国第一集团军的亨特·莱格特将军毫不留情地估计，一名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外国军人可以打败十名虽然优秀但未经训练的美国军人。他指出，在 1812 年的战争中，一支五千四百人的未经训练的美国军队被一支一千五百人的英国正规军打跑了，一直跑到华盛顿另一侧离城十五英里远的地方才停下来。在这支军队花三天时间重新集结时，英国人把这个首都焚烧了。要建立一支能够使美国在战争中独立作战而不是充当给联军补缺的角色（联军正是希望这样）的美国军队，那就需要把美军训练成为由美国军官指挥的美国部队。职业军官立即变成了宝贵财富。不久他们就离开了自己所在部队去执行训练任务，而且由于十分分散，有一半人从来也没有到国外去过。

虽然最初要史迪威到训练营地任教官，但是选派他到弗吉尼亚李营的八十师一个旅任副官的命令先下达了，使他逃避了前一个工作。晋升到少校临时军阶以后，他于 1917 年 8 月 25 日到了李营。在这期间，他差一点由于另一个建议而改变生涯。他多年来坚持去讲西班牙语的国家的要求现在有了结果，他得到了去西班牙当武官的任命。他在陆军部的联系人给他写信说，这“可不是个轻松的工作”，恰恰相反，“西班牙到处是间谍和德国特务”，需要一个能干的人“经营一个侦察系统”。他们要求史迪威立即用电报作出答复，但是当这封信发出时他已经到了李营。

四个月以后，1917 年 12 月，他接到命令要他去法国向美

国远征军总司令报到，从事情报工作。他将担任参谋。象他这样一个精力旺盛和富于进取心的人竟然被分配去作参谋工作而不是上战场，是因为他的事业的发展道路引出的虽然荒唐但又合乎逻辑的结果。虽然他不是利文沃思指挥参谋学校和陆军军事学院（现在美国远征军的高级职务完全是这两所军事院校的毕业生担任的）学习指挥参谋课的毕业生，但是现在特别需要他这样精通法文的人。

从美国参战之日起，协约国联军就一直在给上至威尔逊总统，下至营级甚至更小单位的美国军官的每一个人都施加压力，让美国军队去补充联军那些减了员的、打得疲惫不堪的师团。联军坚持美国军队缺乏训练的这一弱点可以通过与久经战斗的部队在一起作战来弥补，在这个过程中不会浪费时间。

那个刚毅的骑兵、美国远征军司令约翰·潘兴将军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在政治上，他是在执行政府的命令，因为要允许美国兵合入联军部队就等于把美国的命运与协约国的命运完全联系在一起，使美国不能决定自己的政策，不能在和谈时起重要作用。在军事上，他有自己的理由。他认为，只有恢复运动战，也就是说只有放弃已经成为西线格式的那种发动目标有限的攻势随后巩固阵地的战术，而采取以纵深突破、不是以巩固阵地为目的的野战，才能打破堑壕战的僵局并获得胜利。他打算设法达到这个目的，办法是靠美国的力量灌输进攻精神，宣传美国的战争思想，即要求部队和下级军官在战场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主动精神，当然首先要训练他们学会利用一切时机。潘兴要求下达命令要简明扼要，重点是说明作

战目标，而不是象联军那样制定详细的、逐阶段的计划，把所有的军事行动都控制得很死。由于英国和法国军队的训练是适应于他们的作战方式和堑壕战武器的，因而他只能靠美军受到的训练来证实他的计划，靠在美国防御地段内独立作战的一支美国军队来实行这一计划。这个计划的精神和方式正是另一位潘兴式将领史迪威在其后的一次战争中试图灌输到中国军队中去的东西。

1917 年 7 月，潘兴同他的司令部人员抵达法国之后就开始寻找能够取得决定性的军事结果的地段。他选定了凡尔登和梅斯南面的一个三角地带。在那里，德占圣米耶尔突出地带自从 1914 年就存在了。这个突出地带既扼守了富饶的布里埃铁矿盆地，又控制了为法国境内的德军运送补给品所使用的两条极为重要的铁路中的一条。潘兴认为这个地方是敌人的太阳穴。梅斯是德军防御系统的关键，突入任何一侧都会打开通往德国的道路。潘兴认为，在这个地方发动攻势非有一支生力军不可。由于意识到圣米耶尔容易遭到进攻，德军已筑起坚固的防御工事，使协约国无能为力，而协约国确实也从来没有足够的力量进攻这个突出地带。

与此同时，潘兴将军必须创建一个集团军。在兴高彩烈地迎接了匆匆拼凑起来后于 7 月份赶派到法国的第一师以后，三个月过去了，没有再派来部队。造成拖延的原因除了缺少受过训练的军人以外，还缺少轮船，陆军部的工作也毫无章法。美军三个师于 10 月份抵达了，但是据潘兴的计划，所有这些部队还需要三个半月才能训练完毕。到 1918 年 4 月，即宣战一年以后，只有七个师抵达法国。

1918 年 1 月 21 日史迪威到达法国时，协约国联军阵营气氛沉闷，士气普遍低落，失败主义情绪开始滋长。俄国退出战争之举是个极大的灾难，预示德国部队可能转到西线来。联军 1917 年的攻势，由于一味蛮干，不仅没有取得战略上的优势，反而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大大减少了后备力量，以致使司令官们担心一旦德军发动大攻势，他们是没有力量把德军打退的。联军本来认为可以坚持打消耗战，一直等到美国的力量来打破势均力敌的局面，但是由于美国不把军队交给他们，又没有作好独立出战的准备，他们的这种想法也动摇了。要想以攻势取胜，据认为百分之二十的优势是必不可少的。这个优势没有美国人加入是不能获得的，但是他们在夏天以前无法准备就绪。德国人没有忽略这种情势，他们决不会静候到夏季。

另一个参战国也准备利用这个时机。这个国家就是身为协约国之一的日本。它从战争打响那一天就看到可以借白种人混战的机会在中国和太平洋扩大自己的势力。1914 年担任首相的大隈重信说过，日本决意要成为世界的“支配国”之一。看上去已经老态龙钟不可救药的中国被选定充当其第一个殖民地的角色。达到这一目的的障碍并不是中国本身，而是其他列强。当这些国家于 1914 年互相厮杀起来的时候，日本加入了协约国阵营，夺去了德国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山东半岛的租界和铺设铁路等特许权，以此作为参战的贡献。日本还从德国手里攫取了太平洋上的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加罗林群岛，从而横挡在美国通往菲律宾的道路上。

日本的下一个行动，即签订二十一条，是为了从行政和经

济上控制中国。于 1915 年呈交袁世凯的这二十一项条件，要求中国确认日本接过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利；将日本从俄国手里夺得的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期延至九十九年；允诺给日本以特许权，可以在满洲、内蒙古和长江流域经商，拥有土地，兴修铁路和经营工业；未经日本同意中国不得与他国签订特许权或借贷协定；最后，在等于要中国出让主权的第五条中，要求中国接受日本的军事、政治和财政"顾问"，与日本共同控制兵工厂、警察和学校。

准备恢复帝制、由自己当皇帝的袁世凯，正需要得到支持，以实现其使人厌恶的野心。这正是日本的良机，于是日本便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作为它提供支持的代价。袁的抗拒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又得不到协约国的援助，因为它们不愿意出面阻挠日本，怕它反转过去与德国结成更自然的同盟。美国也不愿意干涉，对此采取了不承认主义，意思是说美国将不承认强加给中国的任何违背门户开放政策的条约。这种作法对事情的影响并不比原则性声明的影响大。袁想方设法挡开了二十一条中最为苛刻的第五条，屈辱地接受了其余诸项要求。当条约内容为世人所知时，中国人的愤怒酿成了一种民族情绪。从那一天起，中国总的来说一直是反日的，虽然坚持与日和解的一些派系依然存在。

签订了二十一条三个月以后，袁世凯称帝。虽然他想建立中央权力的用心可能不错，但是他采取的形式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从这一点上说，革命确实是地道的。于是舆论大哗，各省纷纷宣布脱离他。袁被迫于 1916 年取消了勅令，两个月以后死于"疾病和懊恼"，由从床下拖出并被推上高位的那位

标统黎元洪接替他出任大总统。

黎氏哪里能控制局势？骚乱又开始了。中国便任凭那些各怀野心、握有重兵的督军(英文中只笼统地译为"军阀")宰割了。这些督军中有一部分人既是能干的地方长官又是掠夺者；其余的人则是土匪出身的无知之辈和被大动乱的浪潮推到高位的冒险家。北京的名义政府任命一个省的军事长官，不是等于承认既成事实的控制权就是为了争取支持。因而虽说是任命的，各省督军都是自己装备自己的军队和自己筹措军饷的。中国军人已不再是为国家而是为那些封建霸王服役。这些人朝三暮四，今天与某人结盟，明天则又改成与另一个人为友，他们是为争权夺利而打仗，就象老鼠一样撕咬着已所剩无几的民国。列强所承认的中国"政府"仍然是在北京，控制在安福系(来自安徽和福建的)北洋军阀手里。安福系军阀是靠日本人的支持和贷款当政的。他们还打着民国政府的牌子，有总统、总理、各部部长和一个傀儡议会。

孙中山在广州重新成立的国民党政府宣布北京政府是非法的。他已于 1917 年回国，把最初的国民党议会的残余人员召到广州，并自称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虽然他的党起源于西方思想，而且即使没有在中国实现新政治秩序的能力，至少也是实现这种秩序的唯一的希望，但是它并没有赢得外国的支持。列强出于政治惯性和生来的偏爱，仍然同在北京当政的人打交道，不管他们属于哪个督军集团，因为这样做不需要打破传统联系。立足已经很稳的各国政府都不会轻易作出改变，即使这种改变是符合自己利益的。孙中山几乎是依靠着同南方军阀结成不稳固的联盟来维持一个独立国的。在以

后的十年——中国历史上破坏最大的十年里，中国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傀儡和军阀主宰了国家，天意不见了。

至于山东，日本知道为了自己能牢固地进行控制，重要的是要得到列强的认可。1917 年 3 月，日本利用了（且不说是鼓励了）别的国家担心它在战争中改变营垒的心理，使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秘密允诺在和谈时支持它接手德国在山东和太平洋诸岛的权利的要求。美国参战以后，日本又想再得到美国的认可，结果它于 1917 年 11 月真的得到了。日美两国签订了兰辛—石井协定，这成了美国外交史上一次最奇特的背离原则的行动。这项协定改变了门户开放原则，虽然名义上是尊重这个原则的。协定还承认，由于“领土邻近”，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尤其是在与日本领土接近的地方”。这个文件中只有为了使美国官员良心过得去而表示承认中国主权的议定书是秘密的，其余部分都公开发表了，因而表明或者似乎表明（这在缔造历史方面同样重要）美国默许了日本在中国攫取的特殊地位。石井从美国凯旋回国，中国人却很沮丧。中国政府签署二十一条时当然就已经默认了这种地位，但是美国要这样干似乎就是一种出卖行为。原因是，在 1917 年的阴暗时代，美国和协约国的其他成员国一样不敢把日本推到敌人方面去。

在这一切继续发展的同时，中国，也就是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于 1917 年 8 月也站到协约国方面参战了。这一决定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中国、日本和其他协约国都各怀鬼胎。但是主要原因是和会。中国人又一次把形式同实质等同起来，以为不论军事上的现实情况如何，只要在形式上成为协约

国或同盟国的一员，在和谈桌边就能获得平等地位。他们还设想在那里可以作为一种报酬和权利要求最终结束不平等条约，甚至有可能收回山东。协约国由于需要从中国得到大批劳工，尤其是需要借机消除德国的全部租界和商业竞争力，没有打击中国的希望。

作为第四军的首席情报官，史迪威在战争中的主要任务是为美国进攻圣米耶尔作准备。战斗准备工作由参谋部的情报部和作战部担任。师级以上的大单位，包括军、集团军直到总司令部，都有参谋长和主管各方面工作的助理参谋长。情报部负责搜集一切可能搜集到的有关敌军部署、意图和弱点的情报。它必须组织前线部队提供源源不绝的情报，逐级上报，通过各级司令部一直报到总司令部；同时还要向友邻部队通报。营、团两级的作战情报是通过参加所有的巡逻和偷袭行动的侦察员和跟踪敌军运动的观察所搜集的。师一级则有监听站、缴获的文件和俘虏口供提供进一步的情报。到了军一级有气球和飞机通过侦察和连续拍照搜集材料，这是新采用的办法，需要通过新技术和研究工作才能分析出结果。所有的零散材料都要拼凑起来加以分析，并画在地图上，然后分发给有关人员。战前，美国陆军只有参谋本部陆军军事学院处有两名军官和两名工作人员搞情报工作。

为了集结一支能够独立作战的军队，潘兴的训练计划必须在法国继续实行。除了组建总司令部的参谋班子以外，必须为将来的各个军组织参谋班子。每个军将有四个师，外加一个后备师和一个新兵训练站。一个军满员时有六千名军官

和十七万士兵，比战前和平时期陆军总兵力还多。眼下需要的是师、军两级的参谋人员。由于还没有这类人员，必须从头培训。于是在巴黎东南美军总司令部所在地肖蒙附近的朗格勒建立了一所参谋学校和几所训练其他各军兵种人员的学校。

联军看到美军在开始准备投入战争时连一个现成的参谋部都没有，就感到更有理由敦促美国战斗部队合并到他们的部队里面去。要组建一个欧洲人心目中的总参谋部，加上制订动员和作战计划，“需要三十年”的时间。这是一位法国将军对潘兴说的。潘兴向他怒喝道：“美国做任何事从来没有花过三十年的时间。”

史迪威在去朗格勒学习情报工作之前，先被临时派到英国第五十八师去熟悉前线情况。他于 1918 年 2 月 10 日到了五十八师师部。师部设在兴登堡战线最前沿努瓦荣。他的周围是一片荒凉景象：村庄变成了废墟，有些只剩下墙基和瓦砾；地面上旧战壕纵横交错，弹坑累累。他发现他见到的第一批友军、五十八师的参谋人员既令人讨厌又容易相处。“我对这些英国人无法理解——大多数人十分爽快，有些人真他妈的傲慢……极端冷漠，趾高气扬，不屑于理会一个美国军官。”他认为他们不如法国人。他发现法国人热心，有礼貌，乐于助人。“我对他们也一样。”他同英国人一起工作五天，熟悉了那一段前线的每一项工作——战壕、防空洞、观察所、夜间巡逻、公路伪装、研究地图和空中拍照侦察。因为忙于观察、学习、谈话和作笔记，竟然忘记了对主人的反感，以致打电话要求批准他延长一天。他高兴地记载道：“他们回答说可以！”

他在朗格勒学习的时间不长，凑巧当时亨利·史汀生上

校也在那里。史汀生曾在塔夫特总统手下任陆军部长，现在五十岁了，是一位炮兵军官，以后再次出任陆军部长时是对史迪威的前途起过重大影响的人物。由于肖蒙方面急需，一周以后史迪威被抽调去协助组织参谋部的情报部。三个星期以后，他再次被派到驻扎在凡尔登的法国第十七军实习。在过去的两年半里，攻守双方总共有五十万人死在这个地方。法军的口号"决不让敌人过去"就是在这里提出来的。他们一直使运送补给和援军的"神圣之路"畅通无阻。德军无法突破他们的防线。然而，好象不满足于世界历史上迄今规模最大的屠杀，大炮还在射击。

在3月20日，即史迪威到达凡尔登那天发生的一次小规模战斗中，法军伤亡二十人，在一小段阵地前面德国丘八就留下了四十二具死尸。法军上校使他感到他们是欢迎他的，晚饭后请他一起打牌，而且他们与英国人不同，不避讳个人间的谈话。上校问他："你结婚了吗？""有孩子吗？他们是你生的吗？"

史迪威在凡尔登期间，凡尔登以西的战线突然遭到大规模的攻击。这就是德国1918年大举进攻的开始。这次攻势是鲁登道夫企图在美国军队投入战斗之前胜利结束战争而进行的最后一次疯狂的努力。他的军队现在得到了从俄国战线上脱身出来的四十二个师的增援，而美国人这时只给联军增添了八个师的兵力，其中的四个师还在训练营里。鲁登道夫的目标是把英法两军劈开，而且为这一目标投入了全部后备兵力。他一反过去的单一正面交锋的打法，发动了一系列的多点进攻，耗尽了联军的已经枯竭的后备兵力，终于突破了他

们的防线。

鲁登道夫的攻势除了略有间歇以外，从3月一直打到7月，几乎获得成功。德军突破了联军的数道防线，夺取了堑壕战开始以来最大的地盘，俘虏和打死打伤几十万敌军，再次攻占了拒巴黎六十英里的努瓦荣，使巴黎处于远程炮火射程之内，把英国人打退到海峡岸边，5月份打到了四年前他们没能取胜的马恩省。这一危机迫使联军终于采取了最后手段：统一指挥。联军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尽管经历了这么多次徒劳的厮杀，一直避免采取这种做法。3月27日，福煦在战斗中被任命为联军总司令。甚至潘兴也作了让步，允许美国部队暂时听联军指挥。于是，美国部队在夏托捷里、贝洛林和康蒂尼投入了战斗，以阻止德军的挺进。

史迪威在凡尔登停留了六个星期，可是没有机会参加这出戏的第一场演出。他被派到十七军情报处长阿尔芒·贝洛姆少校的办公室，但是大部分时间是到每天仍然遭到炮击的各个要塞和指挥所去巡视。从炸成一堆瓦砾、充满死亡气息的端蒙堡下面一个掩体望出去，可以看到“一个半月形的景色……整个地带一片混乱，到处是铁丝、工具、鞋子、弹壳、骨头、军装、弹药箱、手榴弹、钢盔、车轮、木桩、碎铁皮……紧靠火线的地方撒了大量石灰，足以把德国兵八的死尸盖住以防腐烂。”端蒙的地下坑道里潮湿、泥宁、臭气熏人，在里面就别想身上干净。在沃堡，他借着雾气的掩护能够靠近火线，在那里看到“东一个西一个仍然留在钢盔里的人头、大段的躯体、大腿骨、残颚、断手，一块块的破布还粘在这些碎尸上”。在一个掩体里有一条露出半截的人腿，有个士兵还在那上面挂过

背包。

在一次外出侦察时，他走到距德军阵地只有六十码的地方，从上午九点钟一直步行到第二天早晨两点钟才回到营地。“几次掉进泥坑，德国兵的引信不断地爆炸，弹药兵在工作，过了一整夜的前线生活”。整整一天他被炮火压制在一个只能蹲下两个人的掩体里。据他判断，打过来有一百五十发到二百发“77炮”炮弹，幸好打得太低而且偏左。他事后谈到这一天时写道：“很有趣的一天”。这不是充好汉，因为他果真感到害怕时就在日记里毫不迟疑地写上“吓死了”。“吓坏了”通常意味着担心遭到袭击，被俘或预感要出什么事。至于遭到炮火的打击，看来他是不在乎的。贝洛姆少校很久以后写道，在他们在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的时候共同执行侦察任务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很器重他的教养、笛卡儿哲学和镇静态度”。

他的法国主人帮助他熟悉了十七军参谋工作各部门的情况、前线的步兵作业和每一梯队的情报工作。他是同十七军共同作战的第一个美国人，他的一口流利的法语又为建立融洽的关系提供了便利。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他们待我象久别重逢的兄弟一样，什么都给我看，什么地方都带我去。”他的感受和记者海伍德·布龙一样。布龙当时写道：“法国人是理想的军人。他们不仅能打仗，还能说出打仗的道理。”他们安排史迪威乘观测机作一次飞行。虽然在飞机盘旋时感到头晕眼花，他还是断定飞行员的生活比较轻松，“干净的衣服，没有风，时间短，痛苦很快就过去了，可以赶回来吃午饭”。

史迪威和以往一样，对吃很感兴趣；他一生有个习惯，在日记上记录每餐饭菜情况。十七军军官们的伙食看来是值得

记载下来的。一天晚上，康托上校请他一起用饭。康托，六十六岁，是一位秃顶的肥胖军官，戴一顶士兵帽，佩戴着一排排的勋章，拚命地使唤用人，胃口很好，“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那是一个无肉的星期五①，这一餐有两种煎蛋卷、鱼、米饭、蔬菜色拉、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香槟酒、两种甜酒和奶酪。勤务兵按照要求先敬个礼，然后说：“夫人请用餐（Madame est servie）。”史迪威问，为什么勤务兵用夫人这个词？上校反问道：“你结婚了吗？”“结婚了。”“你妻子在哪里？”“在美国。”“不对，她在你心里；她就在这里。因此我要他说：‘夫人请用餐’。”毫无疑问，史迪威感到法国人富于同情心。史迪威总是把自己的妻子挂在心上的，每接到一封信都要登记。

当他要回肖蒙那一天，十七军参谋人员为他举行了盛大的送别宴会，由三位处长主持了正式的会餐，所有的桌子上都放了花。一大块精美的、上面装饰了法国公鸡和美国鹰徽的奶油杏仁糖放在他的餐桌中心；一晚上香槟酒不断；赞扬的话使他脸红。每个人都坚持要他在他们的菜单上签名留念。他们送给他一个用德国弹壳做的墨水池和他与全体参谋人员在一起的照片，每个人在照片背后签了名。一位军官激动之下写了一首诗留在史迪威的办公桌上。由于感到为别人所喜爱和器重，史迪威心情激动，以运用许多俚语的流畅法语致了答词，为他所学到的一切向他们表示感谢，并向他们保证，回到在肖蒙等待他的所有可恶的家伙当中后，他将“以无限愉快的心情”怀念他在十七军的好朋友。

---

① “无肉的星期五”，复活节前的星期五，耶稣受难日，所以不吃肉。——译注

他于4月29日回到了美军总司令部，一想到等待他的是官样文章、乏味的伙食和神气十足的小人物，他就感到烦恼。他讨厌荒废时间，“在该死的办公室里作一个只会空谈的职员……苦苦地干那些我根本不懂的事，只能同办公桌、打字机和资料打交道”。在来来往往的战斗兵种军官们中间，许多人在西点军校时都在他之下，可是现在已经是中校和上校了，而他本人还是少校。这使他感到难堪和烦躁，常常使他想到在前线带兵提升得快。由于后方更迫切需要能干的参谋官，他争取去战斗兵种任职的努力未获成功。某些文职出身的军官频步高级军阶是另一个刺激因素，其中包括一位被称为来自“‘花生米①俱乐部’的诡计多端的笑面虎”的人物。“花生米俱乐部”是史迪威对“获得少校以上军衔和干轻松工作的富翁、政客和社会宠儿”的称呼。在争夺马恩河桥头堡的激烈战斗期间，史迪威因为陷入笔墨工作而感到沮丧的情绪更大了。“看来形势不妙……已经在谈论放弃兰斯……法国人和英国人嚎叫着要我们增援……在办公室里，还是死气沉沉。”

工作终于调动了。这一调动使他成为美国为夺取圣米耶尔突出地带而计划发动的攻势的中心环节。其后的八个星期里，史迪威的任务是为即将采取的行动组织情报活动，筹建师一级的情报处和训练其参谋人员的学校。这项工作使他不停地在各师师部之间来来往往，奔波于肖蒙、朗格勒和设在纳夫夏托的第四军军部之间。

必须搜集有关敌军战线和突出地带内防御情况的情报，根据各种迹象估计出敌军兵力，分发有关敌军炮火每天和每

① “花生米”意为“小人物”，“无聊人物”。——译注

周发射情况的综合材料，发布地形考察报告，绘制和提供各种比例和坐标的地图。最后为圣米耶尔战斗准备了十五吨地图。

与此同时，在殊死抵抗鲁登道夫攻势的过程中，战局已经发生了变化。主动权转移到联军手里；他们已经开始全线反攻，不断夺回原有的阵地。德国人自3月以来所作的巨大努力曾经打破了僵局，攻占了大片的领土，造成了几乎一百万人的伤亡，但是现在已经耗尽了兵力，成了强弩之末，从而已经走上了失败的道路。正当鲁登道夫于8月8日向德皇如实承认情况的时候，福煦正在计划一系列的进攻，并预期1919年结束战争。其中的第一个行动是由美国于9月7日向圣米耶尔突出地带发起攻击。

为了发动这次进攻，潘兴于8月10日建成了第一集团军，实现了他的全部计划工作的宏伟目标。史迪威所在的第四军就是第一集团军的组成部分。这个集团军的总兵力是五十万人(包括法国的一个军)，是迄今集结在美国国旗下的人数最多的一支部队，它将要采取的行动也是美国参谋人员计划的第一次重大战斗。一大部分计划工作是第一集团军主管作战部的助理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中校完成的，这个人在史迪威以后的生涯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将要攻占的这个突出地带是底线三十五英里，边线各二十五英里的一个等腰三角形。这个突出地带自1914年以来就加强了防御，设有数道防线，其中有铁丝网、混凝土地堡、地下掩体、山腰坑道、窄轨铁路和精心选择的野战炮和机枪的交叉火力点。为了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美国人企图在夜间把十四个师连同军需品秘密地集

中起来，但是保密措施很不严密，巴黎街头很快就在议论这次调动了。史迪威记录道："为防止泄露这个重大情况而不断努力工作。在这里是重大机密，而在纳夫夏托连理发师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在德国兵的飞机上只有瞎子才看不到我军的奔忙和战备工作。卡车往来飞驰，行军队伍、火车、汽车、摩托车等等。"他日夜不停地忙碌，到各个观察所看地形或者乘气球登高远望。

到各个师去办事使他犯了"想当兵的思乡病"。他在"狗娘养的骑兵俱乐部管事"的军部里找不到情投意合的同伴，这种思乡病就更加严重。与法国军队一个食堂里的愉快气氛和在朗格勒同朋友相处的乐趣和欢闹相反，他在第四军的食堂里感到厌倦和烦恼。"与老B一起吃饭真是受罪。讨厌得要死，可是又一顿接一顿没完没了。"每逢他请来客吃饭之后，他的蔑视言论就特别激烈，好象由于缺乏有趣味的交谈而感到羞愧一样。这时他就在日记中大发牢骚，提到"气氛沉闷"、"无聊之辈"、"G-D言谈庸俗讨厌，话不投机，吃饭的是一群王八蛋"。史迪威从来不宽恕令人讨厌的家伙，见到笨蛋、势利小人、摆架子的小人物或者他认为是这种货的人就会立即发火。

开战前一天，9月11日，他晋升为中校。连绵的秋雨加剧了对美军的这场考验前夕的紧张气氛。史迪威通宵未眠，完成了最后的零碎工作。第四军以前从来没有以一个军的建制打过仗，但是这个军有两个师在美国远征军中是建立最早和最英勇善战的，即第一师和第四十二师（"彩虹"师）。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第四十二师参谋长。部署在其右翼的是

亨特·莱格特将军指挥的第一军。

炮兵在夜色的掩护下拉开了战幕。“凌晨一点钟开炮，圣米耶尔第一次遭到这样猛烈的炮火的轰击。从一点钟直到五点钟，天空中闪光不断……我军冒着烟尘和雨水进入了出击战壕。他们在五点钟发起冲锋以后便连续不断地传来电话和电报。全线都在稳步而迅速地推进……一切都很顺利。指挥人员干得不错……第一师和四十二师不出所料，打得很漂亮。八十九师打得实在不好，也许是上了当。”他下到八十九师指挥所去看看出了什么事，结果发现“情况一团糟——无报告”。而在第一师指挥所，看到的是“一伙显得很能干的人……伤员躺在指挥所外面，榴弹炮在猛烈地射击，坦克和步兵冒着榴霰弹有条不紊地攻了上去，德国丘八撤退了，炮火延伸了……一名法国军士热烈欢呼：‘打得好！打得好！’”史迪威从一群俘虏中押解几名军官回到战俘营审问，然后又出去调查据报告正在轰击图尔的炮弹的直径。“我们的飞机今天夺得了制空权，沃埃夫勒的城镇都着了火。第一天的目标都达到了，正在攻向第二天的目标……发了火，训斥了地形科，事后又感到惭愧了……第一军和第四军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了不起的一天。”第四军事实上遇到了比第一军更顽强的抵抗，但是在第一天的中午就达到了所有的目的。

史迪威紧随进攻部队之后穿过烧毁的坦克和卡车、翻倒的炮架、难民队伍、死掉的马匹等战争痕迹去检查敌人的炮兵阵地，然后连续两夜未眠赶写战斗总结报告。当军官们聚会听取对战斗的意见时，热情普遍很高。由于铲除了德军最早占据的、防御最坚固的最后一个突出地带，联军的士气大大提

高了，即使圣米耶尔的敌人(如莱格特将军所说)并不是“处于最佳或较佳状态的”。德军的主要部队是第二流的换防兵，在人数上不及美军，士气低落。虽然美军在计划和执行方面未达到原先的期望，这次战斗却取得了决定性的效果，这就是向德国人显示一个美国集团军投入了战场，这表明德军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德军原希望顶住疲惫不堪的英国军队和法国军队，使战斗陷入僵持局面，以便至少实现他们满意的和平。现在这种希望在这支生力军面前已化为泡影。从这时开始，气急败坏的德国人的目的便是力争撤退到可赖以进行谈判而避免投降的阵地。

除了情报处的工作以外，史迪威在这次战斗中还由于被称为施梅尔凯斯事件的一时灵感而出了名。在战斗初期阶段战报较少，第一军情报处长谢尔曼·迈尔斯上校每小时给史迪威打一次电话，向他了解任何特别情况的新闻。有一天史迪威被激怒了，突然回答说：“对，德国氯气专家、大名鼎鼎的奥托·施米尔克泽(Otto Schmierkäse)被我们抓住了。”电话线另一端传来了十分激动的声音：“把他名字的字母拼给我听听。把氯气这个字的字母拼给我听。”史迪威没有料到信口用德文软干酪这个词编造的一个德国人名字竟然这样成功，因而被自己的这个发明难住了。他只得煞有介事地加了一些细节。迈尔斯上校居然信以为真，宣布他即将派防毒军官去见这个俘虏，并在这个骗局真相大白之前一直傻等结果。当这位防毒军官抵达时，有关人员向他说明，施米尔克泽博士已被押送到第一集团军情报部去审问。此后不得不在任何可能的讯问人到来之前推托说这个俘虏干什么去了，因此很难找他

面谈。有关史迪威这个骗局的消息传遍了各军部和师部，使迈尔斯上校变成了人们的笑料，迈尔斯当然十分恼怒。路透社记者在巴黎、伦敦和纽约的报纸上报道了有关施梅尔凯斯(现在是用这个写法)的消息，使之成了历史。报道说:“据圣米耶尔前线消息，德国一位著名毒气专家被美国军队俘虏。他是在准备毒气投射器时被抓住的。”史迪威给他妻子写信说:“关于奥托的事是我编造出来的，我越来越为此感到自豪……现在美国远征军每个人都知道奥托了。”

9月底，联军以美军进攻默兹—阿尔贡地段为开端，发起了全线反攻。尽管不断发生战术上的失误，以致有七位将军被撤职，但是美军的猛烈攻势仍然使鲁登道夫企图有条不紊地撤退到德国边境并在那里站稳脚跟的希望破灭了。据史迪威记载，10月5日传来了“特大新闻”，德国人向威尔逊总统要求停战了。威尔逊拒绝了这一要求，理由是只有联军总司令有权准许停战。在其后的一个月里，德军继续战斗，不断加强炮火，同时千方百计地夺取有利阵地，直到无计可施才罢休。于是他们派出特使向福煦要求停战。在战争进入第五年11月的一个冬天的早晨，西部战线终于平静下来。

第四军被派到德国科布伦茨地区执行占领任务，军部设在摩泽尔河畔的科赫姆市。对许多事物感到厌恶的史迪威对敌人也不例外。部队开进德国时，他形容农韦勒的布格迈斯特是“典型凶恶、残忍、野蛮、暴躁、阴沉的德国军狗崽子。我们起程时他站起来鞠了躬”。

当政治家们云集巴黎开会的时候，史迪威却在科赫姆发怒。一月里他给妻子写信说:“闲坐着，一天到晚闲坐着没事

干，希望那位昏愦的蠢才总统不久将对那些赞扬、敬意和其他废话感到厌烦，从而真正开始和谈，使美国军队可以回国。”显赫人物络绎不绝地来访，其中包括威尔士亲王，而且单单把史迪威选派去照料他。幸好他认为这位皇太子举止“文静，不摆架子，有教养，彬彬有礼，讨人喜欢”。乔治·马歇尔也来了一次，“谈到了施梅尔凯斯事件，点了发明人的名”，显然并不欣赏这花招。

布赖恩特·韦尔斯将军 10 月份到第四军任参谋长。经他推荐，史迪威晋升到上校临时军阶，并荣获了优异服务勋章。这是为奖赏非战斗人员新创设的勋章。韦尔斯十分喜欢和钦佩史迪威，说他有“非凡的才干”，是“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最能干的情报官之一”。他写道：“曾编入这个军的每一个师都异口同声地赞扬了你们的情报处。”

1919 年 5 月 7 日，历史上比较容易出差错的文件之一凡尔赛条约草拟完毕。在即将签订和约的时候，第四军被遣散了，史迪威的占领任务也随之结束。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在 1919 年令人幻灭的几个月里，他并没有因为和会的壮观场面而感到鼓舞。他对协约国内部的合作情况感到不快。“他们都在设法贬低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成就……争吵和讨价还价……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在停战三天之后就在卢森堡问题上做交易的事件……协约国关系中毫无豁达和自然的态度……总是互相注视着，随时企图抓住可乘之机。”他怀着他将发现在美国已经日益浓厚的那种情绪准备回国。正在美国蔓延的这种情绪“完全相信我们想要做的事是留在国内干自己的事，并准备打击妨碍我们的任何人。搞什么国联！”

在和会上最失意的是中国。问题并非和约各项条款本身不公正，而是这些条款与威尔逊总统激起的期望之间存在着差距。威尔逊曾许诺能实现公正的和平、民族自决和十四点原则中的其他诸条。这些诺言大大地振奋了世界人民的精神，激起了热心的中国青年和对前途抱有希望的其他国家人民的爱国心，但是一触及严酷的现实，这些诺言就象花儿一样地凋谢了。一个现实是日本同协约国就山东问题达成的秘密协议。此外，虽然日本对作战毫无贡献，但是它是一个不能轻视的、拥有强大的海军的军事强国。中国的唯一现实是它所提出的要求。它提出的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提案根本无人理睬；这反而使它更热情地集中注意山东问题。在法律上，中国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它自己曾重申愿意把德国的权利转让给日本，以换取日本的贷款。但是在舆论上，它处于有利地位。舆论的依据是自然主权和十四点原则的精神。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爱国心很强的代表（都是美国一些大学的毕业生）充分利用了这种舆论。

由于会议拒绝发表民族平等宣言而恼怒的日本人也把压力全部施加在山东问题上。山东问题成了会议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成了使威尔逊总统非常为难的原因。他自己的原则、他的代表团的建议、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热烈的请求和传教士们在山东问题上煽动起来的美国舆论的力量，都是极力为中国说话的。而拒绝日本的要求定会使和会破裂，因为协约国已经陷入了日本的圈套，与之利害相连了。由于其他方面的种种争吵而四分五裂的和会已经濒于瓦解。威尔逊把他的政治生命，其实是把他个人的一切，都押在一个宝上：争取同意

把国际联盟盟约作为和约的部分内容。他认为国联盟约是治愈一切国际弊病的灵丹妙药。在日本扬言不满足它的要求就要退出从而也会给别的国家的叛离提供借口的情况下，威尔逊看到拯救世界并使他成为不朽人物的整个丰功伟绩即将毁于一旦的前景。因此，他不顾认为日本扬言退出只是恫吓的兰辛国务卿和其他美国代表的建议而作了让步。五强会议在1919年4月30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确认，日本可以取得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作为安抚的姿态，日本口头上答应“最后将主权归还”中国。威尔逊也得到了安慰，因为他的理论是，国联一旦成立就可以补偿在创建它的过程中使一些国家蒙受的不幸牺牲。

这一事件在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有关巴黎争端的报道在这之前已经激起了中国公众的义愤。中国年轻一代中的进步分子和知识分子的中心国立北京大学的学生正准备在“国耻日”5月7日组织一次示威游行，以抗议二十一条的签订。当关于山东问题的裁决和安福系政府的亲日派代表接受裁决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学生们于5月4日举行了有三千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他们高喊着“打倒卖国贼！”、“还我山东！”、“抵制日货！”的口号上街游行，并袭击了几名傀儡部长的住宅。抗议活动一夜之间就蔓延到上海、南京、汉口和广州。学生们涌上街头，号召抵制日货，各处的商店纷纷关闭。中国人历来是尊敬学生的，所以学生们的举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开创的抵制日货运动被商界和新成立的工会接手继续下去。五四运动发展成了破坏日本在中国的市场的自觉行动，后来持续了一年之久。这个运动是重新振作新中国的民族精神的起

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比辛亥革命以后的任何运动的影响都要深远。由于无法将之镇压下去，中国政府最后被迫解除了最有关的几位部长的职务，同意巴黎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在美国，那个突出在黄海的遥远的半岛的命运成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尽管这场政治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地煽动起来的。由于威尔逊总统把国际联盟变成了和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在参议院中的对手不得不设法挫败和约。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揪住山东问题不放，把它作为和约的一条“突出的罪恶”。这派议论闹得满城风雨。参议院和报纸上响彻“阴谋掠夺”、“丑闻”、“无耻”、“可恶”、“不可饶恕”的呼喊声。尤其是西部的参议员顺应他们各个州的反日情绪，利用了这一争端。在西部各州，排斥东洋联盟正在鼓动提出反对外国拥有土地的议案。人们利用山东问题一箭双雕，既打了日本又打了威尔逊。

日本成长为海军强国的事实、它在墨西哥的实际的和人们设想中的活动、它对巴拿马运河可能构成的威胁、对太平洋岛屿的占领、过份迫切涉足西伯利亚的行动，这些构成了一幅到处伸手的贪婪图景，引起了美国的敌对情绪。如果以称霸世界为目的的日本强盛起来，据认为就会直接威胁到美国在太平洋和远东的利益。这就是参议院十分重视，赫斯特报系拼命大作文章的问题。赫斯特报系宣称，“奸诈狡猾、好战成性的日本”“野蛮地掠夺了”中国，认为美日关系中“含有爆发实际战争的因素”。排斥东洋联盟的发源地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以“美国荣誉的污点”为题每周发表一

次演说。但是任何人的义愤也没有达到参议员博拉那样强烈的程度。他谴责山东条款“十分不道德、不公正……我们一想到它就感到厌恶。我们讨厌强迫我们为之辩护”。他在一篇夸张了的激烈演说中对威尔逊和国联发泄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他说:“丢脸和堕落……战争将不可避免地接踵而来……令人厌恶的不公正行为……不是有身份的人应该干的事……震惊了道德心……赤裸裸的 可憎的、令人厌恶的……大怪物……真是绝无仅有。”

既然报界和知名人物都这样慷慨激昂地谈论山东问题，甚至谈到了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难怪公众认为这个问题是美国的重大利害所在。有几个人——当然他们的声音比不上博拉和其他“势不两立者”那样响亮——认为中国问题完全不值得这样大动感情。《当代舆论报》的主编问道:“在中国还没有自卫的愿望而且对我国利益的影响也没有使得美国必须流血牺牲去保护中国的时候，美国难道应当这样干吗?”这个根本性问题引起的回声将轰鸣数十年之久。

山东问题在美国和中国身上都留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标记。这个问题既帮助了美国人反对国联，也使美国人感到对中国犯了罪;使中国人再次焕发了民族主义精神,正是这种民族主义精神使日益衰败和萎靡的国民党重新振作起来，最终夺得了政权。

在这场纷乱的斗争期间，史迪威于 1919 年 7 月回到美国。当年 9 月,临时军阶普遍撤销,他也再次降到战前的上尉军阶。

第四章　派驻北京

——军阀年代，1920—23 年

从法国回国十天之后，史迪威的生涯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使他从此同中国有了联系。他一回到国内就能够看出，由于陆军十分庞大，加之美国存在着厌战情绪，在军界发迹是没有多大指望的。他生性急躁，没有耐心等待命运的安排，7 月 25 日便前往华盛顿就下一步对他的任用问题进行活动。他拜访了在陆军部人事局工作的一位老同学昌西·芬顿，直截了当地问："把我派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怎么样？"

"这倒很有意思，"芬顿说，"今天上午我们刚刚谈论过派人去日本和中国的事。"他把军事情报处要派一些军官去这两个国家学习语言的计划告诉了史迪威。由于精通几种语言，又干过情报工作，史迪威自然是合格的人选。他要求去日本。芬顿说："去日本的人员都已经任命完毕。去中国怎么样？"

"好吧，那就去中国。"史迪威同意了。事情就这样说定了。1919 年 8 月 6 日，他被任命为代表陆军的驻华首任语言教官。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军事情报处大大扩充了，因而参谋本部决定把武官们搜集情报的工作——迄今很混乱——整顿得井井有条。军事情报处计划建立一支精选的、训练有素的武官队伍，要求他们"通晓驻在国语言、军事情况、政治情况和风

俗习惯”，“真正了解……这些国家在和平与战争时期可能作出什么反应”。现实情况证明，令人垂涎的武官职位(至少在几个较大的武官处)有一笔薪俸以外的收入，这种职务继续在形成“武官集团”的一小部分人中间交替担任。但是除了武官本人以外还需要外语毕业生为情报处扩大工作范围，尤其是在远东科里。

选拔武官的条件是要有全面的“军事才能”——指的是军官成绩报告书上的评语——精通外语，工作效率高和本人自愿。年龄限制是三十五岁以下。只能从步兵、骑兵和炮兵等战斗兵种选拔。史迪威三十六岁，已经超龄，但是他符合条件，好象其他方面他是专门当武官的材料，因而对他的任命毫无拖延地很快通过了。

这时候，中国正成为重要新闻。报纸上的一些醒目的大标题有《强夺山东》、《山东问题上的罪恶》、《山东问题上的耻辱》等各种激烈的轻蔑言词。山东问题甚至在促成了国联的失败和搞垮威尔逊之后，还影响到1920年的总统竞选运动。共和党人利用了对中国的这次不义行为，喜欢用它作为一根棍子抽打政府。哈丁在门廊演说① 中把中国描绘成美国的保护国，而现在中国被出卖了。他说，由于归还了义和拳事件的赔款，中国十分信赖“美国的榜样、民主和正义”，结果却发现它的数百万人民在巴黎被送给一个敌国。哈丁接着说，但是在参议院里，一些坚定的美国人是表示反对的；他们“信守二

① 门廊演说，门廊竞选运动(Front Porch Campaign)中发表的演说。门廊竞选运动是美国总统竞选的一种方式。候选人在居住地区发表所有的政治演说，而不到各地去竞选。1920年沃伦·哈丁采取的就是这种竞选方式。——译注

十年前我们开导中国时许下的诺言”。

在中国人眼里以及正如“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不知疲倦地宣讲的那样，美国在 1919 年(即使不算上 1900 年)使中国人得到的教训是协约国不可信赖，依靠外国朋友是愚蠢的。可是在美国人眼里，在史迪威进入他的生涯中的中国时期时，哈丁的说法是他们对华关系的主导思想。

1919 年 8 月，史迪威带着妻子和孩子前往加利福尼亚，他将在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一年汉语。在那里学习了不到一个月他就得出结论认为，那里的课程分量不够，学习进度迟缓，因为放学以后找不到人用汉语对话。他向军事情报处报告说，他和被派去学习的另一位军官劳埃德·霍斯福尔如果立即转到中国去学习就会学得更好，因为他们在中国有锻练听力和口语的条件。虽然他的建议得到了其他语言教官的肯定，但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在各种语言当中，汉语的发音规则是独特的，因而需要到可以运用、有听说机会的地方去学习。汉语字意取决于声调；官话是四声，广东话是八声。学习书面语言的困难与其说在于汉语中有几千个单字，还不如说在于这些字的搭配和理解是千变万化的。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可能掌握六千单字，一位学者掌握八千到九千单字，而日常有三千字就足够使用了。掌握一千个基本单字就可以认识这些单字。汉字是由许多笔划组合而成的，从一划，例如“一”(一个、统一、一切、一律的一)到二十几划，例如“灣”(海灣、河灣的灣)，二十二划。汉字在西方人眼里是一个神秘的森林，还没有揭开这个谜的线索，但是确有明确的规则。这些单字在字典上按照二百一十

四个意符分类，例如“男”、“女”、“口”、“山”、“工”、“⺌”、“车”。意符本来都是象形文字，后来逐步成为习惯用法。汉语的另一部分是给意符加上“声符”。例如，“论”这个字的意思是“讨论、论述”，由“言语”之意的意符“言”加上声符“仑”组合而成。“仑”字读音为“lun”，意思是“条理、伦次”。声音与意思加起来就等于“把言语条理化”，这就叫做“讨论”。然而并非所有的声符都起作用或合乎逻辑。有些声符既不表示读音也不表示意思。

汉语中有大约八百八十个声符，加上意符（其中有些意符与声符重复）就构成了一千个基本单字。一个学生做到能读能写所有的汉字，必须掌握这一千个基本单字。学好这些单字需要坚持不懈，花大量时间练习，还要常常复习。这个要求显然不仅使愿意学习和能够学好的外国人为数有限，而且使得中国在推广“白话”文体以前识字的人数也受到了限制。

“官话”或者叫正统汉话，是长江以北各省（和南方部分省份）的通用语言，也是全国的行政语言。所有的官员都必须会讲“官话”。虽然“官话”、“广东话”和其他各种方言都很难掌握，中国所有识字的人却能靠书面语言互相联系。

在加利福尼亚期间，史迪威到卡梅尔度过了 1920 年的暑假，购买了门多西诺岬上俯瞰大西洋的有五块平地的一片地皮，以便将来在此安家。7 月晋升为少校以后，史迪威携带家眷同霍斯福尔一家于 1920 年 8 月 5 日乘船前往中国。

9 月 18 日，他们乘坐的陆军运输船绕过山东半岛时已是黄昏时分。曲折的海岸线和中国舢板褐色的、蝙蝠翅状的风帆在玫瑰色的霞光中清晰可见。两天以后，运输船驶进了

中国北部边境的通商口岸秦皇岛。长城就起自这附近的海滨；渔民们每天两次起网时唱起号子。这批旅客乘坐火车向南经天津西进，行程二百五十英里到达了目的的——座落在平原上的著名城市北京。

史迪威首先花了十天时间找房子和探索这座举世闻名的伟大都城的奥秘。在这里，既有达官显贵也有贪财的冒险家；新中国急欲实现其改革的愿望与计划；外国人在优越的环境中尽情享乐；寂静的天坛在永不剥落的汉白玉雕刻中仰望长天。护城河环绕着紫禁城；琉璃瓦宫顶闪耀着金光；周围的三个人工湖中有小岛作点缀。岛上有宝塔、雕梁画栋的楼阁和最后一个皇帝被他的姑母软禁时居住的宫殿。沿岸有多姿的垂柳和松柏。有岩石和洞穴的小山勾画出中国画家喜爱的山景。据说在其中一座湖里捉到过一条经年大鲤鱼，其腮边还带着铸有十六世纪①明代永乐皇帝名字的金牌。

上层社会的宅邸都在高墙深院之中。每一户都有自己的庭院花园。园内有荷花池和茶室、盆植芍药、数百年滴水凿成的蜂窝状岩石、一面墙壁上开着月洞窗。车轴上没有弹簧的北京带篷马车在石子路面上颠簸前进；来自西北的骆驼带着大沙漠的威严傲然缓慢行走；佛教的和尚身穿郁金色的袈裟站在喇嘛寺的红色圆柱之间；西北草原吹来的大风沙周期性地折磨着这座都城和它的居民。在城外，北京平原一直延伸到颐和园和西山。西山古老的松树遮蔽着碧云寺和其他寺庙。泉水从玉泉山汩汩而下，一直流进紫禁城的湖泊和护城河。

① 十六世纪，应为十五世纪。——译注

交民巷一带引人注目的是外国人宅邸、饭店、马球场、街西头堂皇壮观的美国公使馆、威严的银行和企业办公楼，但是却丝毫没有上海那种兴隆的商业活动。北京不同于那些通商口岸；这里的外国人甚至与有教养的中国人时常往来。北京不仅是政治生活中心，也是文化生活中心。它是国立北京大学、洛克菲勒家族出资兴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和另一些教会院校所在地；它也是决心通过“白话”文改造中国的复兴运动的发源地。提倡“白话”的人认为它是在中国实现维新的唯一最重要的工具。推行“白话”文就有可能扩大识字范围，使人民大众能阅读近代报纸。近代报纸是最近从西方引进的新东西，保守派对它极端反感。

除了外交使团、报人、教育工作者和传教士以外，这座首都还诱来了艺术品搜集家、汉学家、进来就不再离去的旅行家，此外还有退休的外国人，他们是自己选中这里定居的，因为这里生活优雅平静，钱也很顶用。这里仆役成群，在西山有避暑别墅，在交民巷还有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和一个赛马俱乐部；夏天可以举办野餐旅行，秋天则可以外出打野鸡，因而对于外国人来说，住在北京（就象一位怀旧的居民所说的那样）是“美不胜收的年头”。

史迪威一家同霍斯福尔一家在交民巷外面、东城根的北总布胡同三号找了一座中国式宅院。这座住宅象所有的中国式房屋一样，是几套互相连接的四合院平房，窗户上糊着纸而不是玻璃。一座宅院有卧室四间，餐室、起居室、书房、办公室各一间，还有佣人宿舍，此时每月总共需要十五美元，外加相应的佣人工钱。通常一个军官家里雇用五到六个佣人，需要

大约三十五美元。此外每办一件事要付回扣，即佣钱，这在中国人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史迪威夫妇于1921年2月生了第四个孩子，是个女孩，叫艾莉森①，于是他们雇用了一名兼当账房、茶房头和管家的头号男仆、一个二号杂役、两个厨师、一个洗衣女仆、一个保姆和一个力夫。

语言教官都在华北协和语言学校学习。这所学校成立于1910年，原先是教传教士学汉语，后来扩大到接收在中国任职的许多外国顾问以及实业家和其他想学习的人。这所学校聘请了一百名教师，招收了三百名学生，为了见效快，采用了靠听觉的直接教学法。第一学年的课程（每天上课五小时）前六个月完全是听、说和掌握单字的发音与字意的练习。后半年则是阅读、翻译和与教师对话。学年完了时，学生要掌握七百个单字并能不费力地用这些单字对话。史迪威还参加有关中国历史、宗教、经济和时事的讨论会和讲座。这位语言教官从第二学年开始又增加了技术和军事词汇的学习。旅行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既是为了进一步熟悉中国，也是为了有助于执行武官的调查任务。他每年都要考试，在三、四年的学习结束时必须掌握三千单字和讲一口流利的汉语。

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的创史人和校长威廉·佩图斯博士埋怨说，史迪威和霍斯福尔在加利福尼亚学到的发音很糟糕；发音不准会造成误解，因为汉语讲得最流利的外国人也会遇到困难。汉语讲得极好的老手爱德华·休姆博士对史迪威说，有一次他在乡下向两个农民打听去长沙怎么走。他们呆呆地看着他，他在重复问了几次之后终于不想再问了。当他继续向

① 艾利森，她的中文名字是史文森。——译注

前走去时听到一个农民对另一个说:“好象这个外国人刚才问‘这是去长沙的路吗?’”

史迪威也象所有的外国人一样，按照他名字的声音取了个中文名字，“SHIH TI-WEI”，写作“史迪威”。前面的姓氏含意是“历史”，后面的名字含意是“指导”或者说是“引向正确的方向”，走向“威仪”或“威望”——真是一个挑衅意味的名字。课余时间他喜欢逛集市、市场和商业区。他第一次购买的是一些牙雕，然后开始收集镶嵌扇柄，积累中国家具为将来在卡梅尔安家作准备。

他看到了并存的中国的魅力与残忍。放风筝是人们喜爱的运动之一。风筝的种类繁多，有龙形的、楼阁形的和蝴蝶状的，以轻纱或薄纸做成五颜六色的翅膀。这些风筝带着哨子、响铃和木风笛在空中悠然舞动，色彩缤纷，正象一位观察家所描绘的那样，“加上那柔和的、不可思议的乐曲……犹如一群东方的小天使”。处决犯人的事也是同样盛行的。在拥挤着看热闹的人群围观下，刽子手将捆绑着双手的受刑者踢跪在地，然后挥起沉重的砍刀一刀砍下他的头，引起一阵喝采声，“好!”当死者的鲜血喷出时，妇女和儿童们跑上前去，把一串串的铜钱浸在血泊里。以后把这种铜钱挂在小孩子的脖子上驱灾避邪。相去不远，就会看到在一个大凉棚下有一个身穿长衫头戴瓜皮帽的说书人吸引住了大概有一百个苦力和工人，他们是全神贯注的听众;他们蹲在地上鸦雀无声地倾听着古代侠义故事。说书人一边说唱，一边有节奏地轻轻敲打着竹板，说到富于哲理的段落则转为咏唱，说到描绘武艺的部分则敲起鼓来。

中国的魅力起了作用。史迪威到北京还不足一个月就在陆军部发来的工作意见征求书上填写了唯一理想的职务:“驻华武官”。他在包括“西点军校”在内的所有其他职位下面填写了“不愿意”。

在史迪威抵达中国三周以前，三个军阀(都是著名人物)结成了联盟,但是刚刚携手推翻了安福系军阀政府,他们便互相残杀起来,争夺支配权,也就是控制首都。现在控制了北京的获胜者是吴佩孚元帅;他是科举出身,是一位绅士派头的官吏。失败者是土匪出身的满洲之王张作霖元帅。在他们之间举足轻重的人则是农民出身的“基督将军”冯玉祥。

吴佩孚确实自认为是公仆,关心公共秩序,希望在中国恢复一统天下的局面，他把这种理想置于个人野心之上。他身材细长、匀称，长方脸上有一双琥珀色的眼睛和一副鹰钩鼻子,显示出他出身名门。他言谈文雅,被外交使团视为中国迫切需要的铁腕人物的得天独厚的人选。有一次，为了接待一位美国报人，他在他的衙门的墙上悬挂了乔治·华盛顿的照片;他对客人说,他的愿望是为国家作出象华盛顿统一十三块殖民地时的那种贡献。他的军队纪律严明，甚至能按期如数发饷,因而引起别的首领们的不快,但是这确使他有了一支不会轻易叛离的军队,并得到了乡村百姓的信赖,因为他使他们免于军人掠夺之灾了。为了重建代议制政府，吴元帅恢复了1913年成立的议会，请回了召之即来的黎元洪。但是，吴在战场上虽然是一头雄狮，在政治斗争中却是软弱的。他的安排是不稳固的;“奉天虎”张作霖正在一边等待时机。

这位体格瘦小但是大名鼎鼎的满洲元帅是1895年中日战争期间从普通士兵开始其生涯的，后来当了土匪，但在当局愿意赦免时他就投诚了。由于他是带了他的人马归顺的，所以获得了奉天城外一镇统之职。他凭借这个根基在日俄战争中靠先后向俄国人和日本人供应补给而发了财。他现在戴的黑缎子瓜皮帽上佩带着一颗著名的珍珠。据说这颗珍珠是世界上最大的。他在满洲的住宅的厅堂里摆满了黑麻栗木雕刻的家具、豪华的地毯、青铜器、玉器、字画和名贵的瓷器。他在保持着微妙关系的情况下，同日本人共同支配着他的管区。日本人将他们在满洲日益加强的工业开发工作的总部设在奉天。

其他派系和督军都围绕着这两位元帅为控制华北进行的斗争时而结成联盟，时而拆伙另结联盟。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冯玉祥。这倒不是因为他个儿很大。而是因为他象吴佩孚一样注意建立一支忠诚的、有战斗力的军队。他还在袁世凯的军队里当小兵时就开始改信基督教，而且信仰孙中山宣传的革命道理。他认为，要建立一支好的队伍，除了粮食、服装和军饷以外，还必须进行精神教育。在多变和混乱的民国年间，他同吴佩孚结成了联盟，并于1920年被委任为西北的陕西省的督军。他在北京同基督教青年会的中国会长结了婚。他用水龙给他的士兵洗礼，教他们唱福音圣歌和进行曲。其中部分歌词是“决不喝酒决不吸烟，决不赌博决不逛妓院”。他不赞成吴佩孚喝酒。作为一种暗示，他有一次在宴会上送给吴一个珍贵的瓷瓶。吴当即打开瓶子斟了一杯以谢厚意，结果他饮了一口便泼掉了，因为他发现瓶子里装的是水而不是酒。冯虽不完全赞同吴，却相信吴是在与自己一道为同一个最终目

标——建立一个不受外国控制的统一的中国——而努力，因此较愿意与他联合反对张作霖，而不愿联合张作霖反对吴。

从 1920 到 1923 年，即史迪威在北京的几年里，冯与吴结成联盟，先是对付几个督军的联军，然后于 1922 年对付张作霖，因为这只奉天虎又想独占华北。双方交战常常打到距首都不到十英里的地方，有时使城门一连一个星期都不敢开。入夜，外国侨民站在北京饭店楼顶上就可以观看炮火的闪光。大炮猛轰时，饭店大楼就象遇到了小地震一样颤动。有一次，史迪威不在家，街上突然子弹横飞，有几颗打进了他们的房子。史迪威夫人把孩子们都安顿在桌子下面，自己冒险跑到一个传教士邻居家里打电话给公使馆报告遭到了射击。但是这种危险没有受到重视。她得到的建议是：回家去，过一会就没有事了。

武官和下属人员研究的问题是驻在国的军事。史迪威是在督军们互相争战的情况下开始接近他有朝一日终将指挥的中国军人的。他看到了吴佩孚的军队开赴战场的情况。那是一个长长的灰色纵队，用牲畜拉的两轮大车运送弹药、被褥和给养。这还算是优良的装备；一般的军阀部队只以叽叽嘎嘎乱响的独轮手推车组成运送给养的辎重队。在吴的军队里，象在别的军队里一样，很多士兵刚刚十四五岁，但是配备样样齐全，有背包、十字镐、铁锹、马灯、茶壶、油纸雨伞、闹钟和热水瓶。队伍后面跟着抬着棺材的苦力，这是为了让士兵们放心，他们一旦阵亡不会曝尸于荒野。吴的队伍都在灰色军装（冬季加进棉花则改为棉衣；中国军队都是这样）上佩带红臂章，以示派系区分。作为一条通则，这些臂章不得缝在衣服

上，而是要用别针别上，以便改换阵营时很容易取下来。

普通的军队作战都不激烈。部队开到战场时先站立片刻，向四周看看，从肩上取下步枪，不瞄准，胡乱打上一两枪便坐下来。炮弹也是随便发射的，经常偏离目标一华里左右，或者还要多。如果下起雨来，那些纸雨伞就统统撑开，好象一下子长出一大片蘑菇；这时战斗也就停止了。吴的部队优于大多数军阀的部队。这支部队在1922年同冯玉祥的队伍联合起来，把张作霖赶回了满洲。

为了建立一个国民政府，吴佩孚曾邀请孙中山支持，但是享有中国大总统头衔的孙在同国民党的已无代表性的残存议会磋商后拒绝了。他要用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来统一中国。但是他的全部计划和联盟都失败了，各类合伙人也背叛了。他曾再三向美国公使推荐他的宏伟计划——由西方民主国出钱帮助在中国建立一个新政府的计划，但是没有人采纳。这个计划同孙中山的顽固的民族主义思想几乎是不相符合的，但是经过革命以来令他伤心的十年之后，他得出了结论，认为中国靠自己的力量是站不起来的。由于指望获得北方，他甚至一度同张作霖结成牵强的联盟，最后不出所料，联盟毫无实际结果。

西方和本国同胞使孙中山失望之后，他便转向了愿意帮助的俄国，并于1923年同共产国际携手，1919年苏俄曾宣布放弃沙皇时代的全部条约和特权。这件事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这是第一个西方强国自愿放弃利益。但是到了付诸实践时，苏联人又有了新的想法。事实证明，他们既不愿意放弃在满洲的中东铁路，也不愿意放弃在蒙古的权益。

尽管如此，在对自己的革命进程感到幻灭的中国人眼里，莫斯科的吸引力仍然是很大的，于是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开始了。苏联也正在周围寻找朋友，寻找最终推进世界革命的新基地。苏联虽然承认在中国搞共产主义现在条件尚未成熟，还是同意帮助国民党实现国家统一和独立。依据与孙中山联合的条件，1921 年建党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振兴中国的合作者身份获准加入了国民党，并暂时同意由国民党来领导民族革命。

孙中山也和军阀们一样无法确立统治全国的地位。他有政治哲理，但是没有力量；军阀们则是有力量而无纲领。他开创了革命并制定了革命方略，但是缺乏统帅之才和组织能力。一位同时代的人说，孙中山是半个圣保罗半个威廉·詹宁斯·布赖恩①，但是，即使他是半个乔治·华盛顿半个列宁也不大容易驾驭他的古老而执拗的国家。由于缺少一位君主，地方利益占了上风，地方割据削弱了国家的权力。

史迪威到北京只半年时间就找到了摆脱公使馆生活的机会，并初步熟悉中国能展开活动了。在前一年（1920 年）发生严重饥荒之后，国际赈济委员会要求把他从陆军借出来担任山西省修建公路计划的总工程师。从 1921 年 4 月到 7 月，他在工地工作了四个月，每天同中国官员、村长、承包人、工头和劳工一道工作，按照中国方式睡觉和吃饭，徒步或骑马巡视工作情况，指挥，哄骗，讨价还价，耍“面孔”把戏，了解中国人的习惯、特性和相互关系。除了在西点军校当学生时学到的一

①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860—1925 年）是美国政治家和演说家。——译注

些知识以外，他并没有接受过有关工程建设的训练，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他有自信心，而且象尤利西斯① 一样，从来不肯在一个地方久留。他渴望有机会外出，在实际环境中使用新学到的汉语，因而他一听到筑路工程的消息就要求担负这项工作。由于在山西修筑公路的工作，史迪威在第二年又承担了一项更重要的使命。这次筑路工作在使他在他的生涯中更深地涉入中国事务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修筑山西公路的部分目的是使逃荒的饥民有工作可干，但是主要还是为了控制饥荒而采取的一个长远措施，因为改善运输条件以后，从未发生过饥荒的西北各省的余粮就可以运进灾区。除了铁路和河流以外，中国几乎没有运输车辆行驶的公路。中国政府没有习以为常地进行救济工作。即使偶尔发放储备粮应急，从来也没有及时发下去防止大规模饿死人。由于已经习惯于西方那种"有所作为"的冲动，中国允许外国活动家去做他们能够做的事，但是东方人的态度是不强求人去征服环境。千百年来的灾害已经使中国人习以为常了；大量地死人，但又大量地生人。1920 年发生了一次据说是四十年来最严重的灾荒，"一群群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眼神呆滞、骨瘦如柴的人们摇摇晃晃"络绎不绝地走向城镇，挤满了各个小车站。农村里一片荒凉，看不到一点春季作物，只有一座座坟丘隆起在褐色的地面上，大风卷起一阵阵黄土在荒芜的宅院上空飞扬。

在北京举行的国际赈济委员会会议听取了关于紊乱的运

① 尤利西斯(Ulysses)——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奥德修斯（Odysseus）在特洛伊战争中献木马计，使希腊军队获胜。——译注

粮工作、官员们不称职和贪污受贿以及粮食投机活动的报告。然而各个委员会是持"乐观看法"的，认为中国官方已终于清醒过来，"愿意把这件工作交给外国的一些委员会和美国红十字会，而不再信任县级和省级官员了"。这就是西方从事活动和中国接受这种活动的模式。在呼吁美国公众捐助中国赈济基金时，威尔逊总统在一篇反映出典型的美国观点的谈话中说："中国人民切望得到我们的咨询意见和有效的领导。"中国人自己却从未把物质援助同咨询意见和领导混淆起来。他们指望从美国得到的是物质援助。在传教士们的鼓动下，基金募集运动在美国极为成功，捐款十分踊跃，以至钱有了剩余，故而使筑路计划得以实施。

史迪威个人认为，传教士们故意渲染了灾情，他们的理由是他们在危难之际弄来钱和粮，促进了基督教的事业，因而是对的。他写道，由于不得不"顶住官员们的消极抵抗"，他们才有可能"为人民做一点政府不能或不肯做的事"。

到了工地（在那里地方利益高于一切）以后，他发现山西省的官员愿意帮助而不是阻碍筑路工作。这是因为山西督军阎锡山的影响。他是一位进步的、讲究实际的强调物质的人，他享有"模范督军"的称号。他明智地看到，他只有靠改善省里的条件而不是靠榨干油水来壮大力量和积累财富。他向公路穿过其田地的地主们说明修公路的好处时，他们没有抵制，并允许筑路工平掉老坟地，甚至自动将一些新坟墓移走。

计划中的这条公路全长八十二英里，起点是汾州①，终点是黄河畔的军渡。史迪威得到的指示是修一条二十二英尺宽

① 汾州——即今汾阳，1912年改称为汾阳。——译注

的石子路，坡度不得超过六度，8月1日完工。他手下有十二名外国助手，一名美孚油公司土木工程师、一名瑞典采矿工程师、两名挪威传教士和一名英印军队预备队军官。修筑公路的地区到处是岩石，山峦起伏，间有一些盛产农作物的旱涝保收的河谷。史迪威写道，到处可以看到中国农民"赶着慢吞吞的老牛，拉着纪元前的犁"在山坡上耕地。那些山坡十分陡峭，"单单每天爬到田里的艰难路程就会使一个白种人望而生畏"。

这条路线沿着一条河谷，穿过一个山口又进入另一条河谷，"下余的一段尚未确定"。史迪威每天骑马或步行数英里，每个晚上睡在不同的地方（为了逃避臭虫和虱子常常睡在户外），指挥六千人的工作。他要指导中国测量人员，帮助工段工程师，指定修路队的位置，决定公路坡度、什么地方留交叉路口、什么地方劈山填沟，还要设法掌握当地方言。幸好有许多人会讲官话。

这个地区的住宅大多是就山凿的窑洞，正面筑起石墙，留一个石砌的拱门。石匠多得很。史迪威同小承包人打交道，要他们承包破石工作，提供石灰、界桩、骡子、水桶和筑路劳工，而避开城镇里来的油嘴滑舌、穿着绸缎长衫的商人，虽然他们表示愿意全部承包下来。他喜欢同穿着补钉裤子和肮脏衬衫的李茂林打交道而不愿意同那些"过分文雅，走不上六七步就喘不过气来"的胖绅士们打交道。

使用镐头和铁锹的铺路工大多是为了挣点钱来打短工的小农。他们编成三十人左右的小队，每个小队有一名监工和一两个厨师。段长（监工）提着一根手杖，戴着草帽，穿着干净

的衣服，总是躲在树阴下打盹儿，他们派出人放哨，一看到史迪威来就报信。当工作干得不好时，“面孔战”就开始了。史迪威申斥监工，监工便吆喝铺路工快干，铺路工倒“觉得这样做戏很有趣。他们知道这都是做样子给人看的。如果这个外国人从监工背后给他们使个眼色，他们就会会心地抿嘴微笑”。当“这位总工程师接连遇到一些人明白他开的玩笑(即使是拿他们取笑)并同旁边的人们一道尽情大笑时，他对整个民族产生了好感”。

在永宁州①，史迪威受到了当地驻军团长和市长的欢迎。他们设盛宴款待他，各种知名和不知名的菜肴五十七道，宾主用小酒盅畅饮浓酒。他应邀检阅了当地军校学员。学员们随着军号声列队前进。“那号声忽高忽低，不顾效果。”第二天早晨他们一直送他到城门口。“当这个穿着旧衣服，骑着一匹瘦马的洋鬼子告辞时”，身穿崭新军装的团长和身着锦缎长衫的健壮的市长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接着“空着想吃早点的肚子，却饱享了荣誉”的史迪威扬鞭上路了。

史迪威在山西可以撇开北京的舒适生活，直接看到中国的基本需要；他看清了它所缺乏的种种东西和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以及地方铁腕人物是如何解决面临的问题的。阎锡山依靠典型的、卓有成效的机会主义手段凿通了权力之路。1912年他在被袁世凯任命为山西军事长官之后，不失时机地同安福系军阀达成协议，因此又于1917年获得了行政长官的职位。在通常情况下，一个省的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相互起着监督作用，但是正象史迪威后来给《步兵日报》写的阎锡山小

① 永宁州，1912年改为离石。——译注

传中所说："一个人身兼两职就控制了全部统治机器，可以为所欲为了。"阎锡山在其后十年中使他本人和他这个省置身于国家权力斗争之外，并竭尽全力从他的地盘里取得大笔收入。

他修建了公路和桥梁，开凿了大量的灌渠，鼓励植树造林，鼓励种植棉花和养蚕造丝，引进了在加利福尼亚试验过的改造贫瘠土地的方法，从各个国家进口了美利奴绵羊、谷类和牧草，促进了文化学习和公共卫生事业，建立了小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开展了反对留长辫子、缠足和吸鸦片的运动，还出版了规定山西一千万人口都要学习的公民守则。重视物质福利是新中国的一种主张。中国传统的维新运动关心的是品行和道德。阎也没有忽视这个方面，他办了一个"净心院"，自任院长。他的增进人民福利的计划并不彻底，不包括减租减息。

人们普遍渴望中国出一位领袖，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引起了很大的注意。一家美国报纸写道："中国发现了一位摩西①吗？他会领导他的人民走出荒野②吗？"许多外宾前来参观并受到"模范督军"的款待。他身材高大，面部虚胖，有一双严厉的眼睛，但是显然很有文化修养。他坐在洋式摆设的餐桌旁主持宴会，身边坐着在牛津大学受过教育的中国秘书。桌子上铺着织花台布，摆着银器、石榴红水晶酒杯和巧妙地折叠成玫瑰花、鸟和宝塔形状的餐巾。饭后由男仆举着用长长的杆子挑着的彩色罗纱灯笼陪送客人们穿过月下的花园。阎长官对客人说，他希望使山西成为他的国家改革的发酵剂，但

① 摩西(Moses)——基督教《圣经》中传说领导犹太人（希伯来人）摆脱外族奴役的领袖。这个词后来发展成为领袖的意思。——译注

② 走出荒野——《圣经》中传说摩西于公元前1200年率领犹太人从埃及迁移到上帝赐地迦南。这个词后来转意为摆脱苦难。——译注

是又很现实地补充说:“中国是个很大的面包。”

史迪威冒着酷暑奔走在尘土飞扬的筑路工地上。他的野战背包里装着筷子、汗衫、罐头食品和备用袜子。他享受不到这些殷勤招待。然而,在那些传教士家庭所喜爱的避暑胜地、春光明媚的北川河谷地,他发现了一个可以把全家人接来度夏的好地方。在那里,花上大约四十美元就能租到一座寺庙或旧磨房住上一个夏天。

他于6月份返回北京把家属接来。这一家人乘火车到了晋中以后改乘一辆只剩下空车架子的破旧福特牌汽车继续赶路。史迪威驾车躲避着路上的辙窝和坑塘,他的妻子、几个大孩子、保姆和婴儿坐在几块厚木板上,一直处于精神高度集中的状态。马车拉着仆人和行李跟在后面。农民们穿过作物已经成熟的田地跑过来看这辆“火车”,由于激动甚至踏倒了小麦。史迪威夫人写道,每次在路上停车时,“我们四周就围了大群目光凝视、带有敬畏神情的人。当我为了不让孩子哭闹而给她喂奶时,老百姓就围上来,看看这个洋人是不是也用同样办法喂奶。”当这辆卡车陷住开不动时,村民们就帮助推上陡坡或拖出小沟,他们因车子竟然乱跑而发笑。“每次他们帮忙后,乔总是拿些铜钱给他们,他们总是不愿意要。”到处可见的是笑脸、污垢和疾病;有一位快活的老太太脖子上竟然长着一个柑桔袋子那么大的甲状腺肿瘤。

史迪威一家住进了一所磨坊。那里有经过粉刷、通风而宽敞的房间、粗糙的房梁和爬上墙壁的牵牛花。院子外面有树木和鸣鸟、一眼可饮的清泉、间有金凤花的草地、一群群的绵羊和山羊。7月底,史迪威将剩余的筑路工作交给了一位

助手，自己休息，在租下的磨坊里度过夏季剩余的时光。他除了同其他外国人家一起郊游和打网球以外，把余下的时间用于写作。他继续按自己的习惯，写一些描述耳闻目睹的外国生活的短篇小说和小品文。他给《亚洲》杂志写了一篇有关筑路工作的文章，获得了一百美元。但是他的第二篇文章《中国生活散记》未被采用，这可能打消了他进一步发表作品的念头。尽管如此，他还是继续写下去了。在他所写的有关中国生活情况的小品文中，他自己旅行的见闻跃然纸上。例如在一个火车站，来往两股人流相遇时，有"尖声喊叫的奋力搏斗"者，有呼唤力夫者，有的从车窗扔出箱子、篮子和包裹，另一些人则把自己的东西扔进车箱然后拼命挤上车去。这场混战最后总算平静下来，乘客们"把自己和行李安顿好以后便开始有礼貌地互相问起姓名、故里和职业"。

一家小客店，"院子里挤满了骡子、驮子和驮鞍、小鸡和猪……在一个大房间里，主顾们都躬腰坐在一张张木桌旁边，端着一碗面条，一边用筷子一边用嘴吸，把面条胡噜到嘴里……厨师拿起前一个顾客刚刚用过的碗，用一块象汽车库里的废棉纱头一样的黑抹布擦一下，然后从一口直径一米的大铁锅里舀汤面盛入碗中。接着他拿一双筷子，在裤腿上擦一下放进碗里，把碗递给一名堂官，堂官叫唱一声，把这碗面送给顾客。"这位洋人则喜欢用开水净碗，并"假装要把这碗开水浇在厨师头上。这样开了一个玩笑之后，所有在场的人都觉得他是很诙谐的大人物。以后他就可以随便行动了，甚至可以用小刀刮了筷子再用……为了避开必然有臭虫的土炕，他在一群看热闹的人围观下在院子里架起了吊铺，在猪的尖叫

声、骡子的嚎叫声、苦力们的吆喝声和偶尔响起的夜间过路骆驼的铃声中昏然入梦了。”

他对中国人民的描写不是依照社会学，也不是靠分析，而是直接依靠亲身经历；他笔下的对话十分精练真切，使人感到谈话人就在眼前，象契诃夫笔下的农民一样有声有色，神态逼真。碛口市市长希望这条新公路经过他这座城镇而不要经过毗邻的那个城镇，因为如果经过别人那里，碛口这个黄河港口的名声就会受到影响。有一位在高昌开客店的老奶奶把这位洋人拉进一个满屋苍蝇和好奇的旁观者的房间，她确信他知道该对一个病孩子怎么办。他还描写了一些乡下人：山西温和而有礼貌的农民在他问路时和蔼地回答他，还请他停下来喝口热水再赶路。提着筐子在路上拾粪的孩子们，等到驮子队一过去就蜂拥跑到路上“准确地向牲畜的粪便冲过去，用手将粪蛋拾起，轻轻地弄掉上面的泥土放到筐子里。他们仔细察看了路面之后便将获得的宝物提回去交给母亲，她们再把这些粪便铺开晒干。”

除了史迪威的脾气所无法容忍的情况外，北京的社会生活还是惬意的。武官和助理武官从西点军校时起一直是他的朋友。后来助理武官由约翰·马格鲁德少校接替时情况就变了。马格鲁德在中国的事业常常与史迪威的事业相冲突。新来的语言教官、他们的妻子、包括美国公使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的女儿在内的其他美国人及他们的朋友和追求者构成了一个互相请客和串门的小圈子。但是温妮不打桥牌，史迪威不打马球，公使馆那帮人觉得他们有点“与众不同”。史迪威

喜欢在交民巷的两家饭店里同他的妻子跳舞，有一天晚上他甚至在一家饭店有意弄到被薄荷酒醉倒的地步。有一次他们打了一晚上麻将，发现“并不象预料的那样讨厌”。在舒尔曼家举行的二十五个人的晚宴实际上还是“很有趣的”。和往常一样，他很快就厌恶那些无聊的、装模作样的人。他在日记中说一对夫妇“男的是个自大的蠢驴，女的是个自鸣得意的笨蛋”。

他更愿意同家里人在一起。孩子们长大了，他做父亲的义务和乐趣也增加了。他在家里教两个大孩子乔和文思学习，孩子们生了病他要发愁，他带他们到城墙上漫步，到十三陵远足，编写带有图示的动物寓言诗，指导孩子们玩自己想出来的游戏。

11 月，史迪威带着一批记者和赈济委员会成员参加了他们修筑的汾州——军渡公路首次通车仪式。十一年以后，他的朋友、参加过通车仪式的国际新闻社记者约翰·戈特寄给他一张剪报，是《字林西报》登载的有关中国人历来不会保养公路的消息。这家报纸报道说，史迪威修筑的从汾州到黄河畔的公路，由于从来无人保养，“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

1922 年，这条公路的总工程师被邻省的军阀、陕西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看中了。中国文明的发源地陕西省是个到处有梯田和岩洞的丘陵地区，三十年代共产党人经过长征后在延安一带驻扎下来。陕西盛产棉花、羊毛和小麦，又有丰富的矿藏，本应是个繁荣的地方。但是它没有发展起来，原因是那里的人吸鸦片，土匪猖獗，但是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交通不便。陕西省没有铁路，只有一条从黄河河畔的潼关通往省会西安的全长大约九十英里的“所谓公路”。这条公路不过是一条没

有经过任何测量，用铁锹铲出来的小道。冯玉祥同赈济委员会举行了谈判。赈济委员会答应从潼关修一条到西安的名副其实的公路，仍然由史迪威担任总工程师。

他乘火车到了河南，距陕西边界还有大约一百英里，但是再往前就没有铁路了。这段路程靠的是一个有五十辆骡车的车队。除了这些大车，他们的队伍里还有骆驼、其他驮畜、独轮手推车、徒步走的人和护送他们穿过土匪区的二十名军人。“我们在满天尘土的情况下，在各种吆喝声配合成的大合唱和劈劈啪啪的鞭子声中出发了……我们这些人看起来活象一队迁移的卡尔马克人①或前往加利福尼亚的一批四九佬②。”这个车队在十分糟糕的大路上缓慢前进，常常同对面来的独轮手推车队伍阻滞在一起。那些独轮手推车上装着一包包的棉花，婴儿被置于车子的一侧，母亲坐在另一侧，父亲推车，还有一两个小男孩在前面拉着。乞丐躺在路旁，农家孩子提着四齿粪叉和粪筐拣拾拉车牲口和人的粪便，这些人使得交通更加拥挤。每前进一步都是“费尽气力、满头大汗的中国人同他们那些笨重的车子和不听使唤的牲口不断斗争的结果”。每当两辆手推车在尖叫和谩骂声中互相顶牛时，其余的行人和车辆“只能停下来，等待他们了结纷争。在这样一条道路上人们还能前进，真是奇迹。你亲眼看到之后就会恍然大悟。原来是每个人都情愿等一会，或者让一让路，让别人先过去。”

这样旅行四天后到了陕西边界。又花了四天时间才到达

① 卡尔马克人(Kalmucks)为蒙古族之一部，居于蒙古西南及苏联窝瓦河下游，以游牧为主，经常集体迁移。——译注

② 四九佬(49ers)，指在美国淘金热时期，于1849年前往加利福尼亚淘金的人，转意为参加前往有新发现的地区去的行列的人们。——译注

省会。为了逃避大车的可怕的颠簸，史迪威每天要步行八到十二英里，艰难地走过辙窝和泥坑，还要吃不少的尘土。夜晚住在一座"肮脏的、跳蚤成灾的城镇"或者住在一座"污秽的客店"。有一次甚至在一家鸦片馆过夜。干重活的苦力"不断走进烟馆买十个、十五个或者二十个铜钱的鸦片。他们把钱和小烟锅一放，便得到一份鸦片"。史迪威注意到，十个铜钱占他们每天工资的百分之三十，"可怕地消耗掉了他们的钱财，且不说他们的健康要有多大损失了"。中国的穷人嗜好鸦片是因为这东西可以减轻饥饿的痛苦。一个人先是偶尔吸一点，后来就成瘾，这样他便被鸦片冲决了防线，精力耗尽，日益消沉。史迪威气愤地写道："冯为什么不禁毒呢？将鸦片查获焚烧，把大烟贩子拉出去枪毙。"他自问自答说：冯如果这样干就会引起暴乱；此外他靠鸦片税得到大笔收入，一部分送给吴佩孚，余下的钱充作自己部队的军饷。

一进入陕西境内，史迪威立即看到了这位基督将军统治的种种迹象。军队在街上行进时唱着圣歌。以"节省弹药"为主题时唱"听阿天使在高唱"，呼吁人民使国家免于衰颓时唱上帝赞美诗。粉刷过的墙上用蓝色颜料写的说教，劝告公民"不要吸烟，不要饮酒"，"公平交易"，"孝敬父母"，"耕地、织布、读书"。店铺挂出的招贴板上写着各种醒世箴言。史迪威感到纳闷："要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是这么简单的事吗？且不说那些顽固的人了。"

冯并不是仅仅采取规劝的办法。他发动了一场旨在使军人成为现代国家公民的学文化运动，要求他们每餐饭前学习两个生字。军官们，甚至连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也参加读书班。

冯的计划中还包括教育高级文官、地方官、警官和公共卫生负责人，以及象阎锡山在山西那样兴办水利和改良土壤。史迪威在冒着风尘前往西安的途中，没有看到多少情况表明展开了这方面的工作。但是他注意到士兵们"个个精神饱满，他们的枪擦得很干净"。

使人恼火的事很多：坎坷不平的公路和一窝一拐的骡子、"仍然在打瞌睡而不肯动身的懒惰的马车夫"、有露天粪便池的客店院子、烦人的叫化子、一次刮两三天的大风沙，然后是一连数日的大雨并转为下雪。公路两侧还可以看到紫罗兰和明代的纪念碑。在黄河的一个隘口，登高眺望，灿烂的阳光照耀在对岸长满嫩绿色禾苗的低地上，构成了一幅悦目的景色。再往西面，天气晴朗，白雪覆盖的重山峻岭闪烁银光。

进入土匪出没的地区以后，他们看到路旁一棵树上挂着一颗人头。当天夜里，土匪伪装成军人杀死一名中尉和一名士兵。再往前，在一个小城镇外面他们又看到一具土匪尸体。这个人是被枪毙以后放在那里示众的。死人的事就象中国的风沙一样平常，比比皆是的坟丘便是标记（这些坟丘年长日久就会逐渐消失，坟地又变成了耕地），可以见到死人是一具女婴尸体，她是溺婴做法的受害者，被丢在坟地里无人掩埋，任凭野狗吞噬。

到了距省会还有一天路程的一个温泉，史迪威得知冯督军已传令请他使用冯的专用浴池。这是他离开北京以后第一次洗澡。

4月3日他进入了汉唐两代的古都西安。西安市的城墙是中国最高最厚的城墙，但是现在城内荒废着大片的空地。

满族人居民区也是这样，那里只有类似芥子大的油菜地。几条主要的商业大街是多年前铺设的石板路面，但是仅有的几座用砖新建的校舍和政府机关建筑物简直是一群会吓坏建筑师的怪物。这些建筑物的“正面看上去象西班牙的教会式建筑、乡村汽车库和豪斯公司二号式样的一个大杂烩”。这座城市的燃料是煤，在一个街角市场按英镑计价出售，是用独轮手推车从九十公里以外的潼关运来的。屋外架子上晒着兽皮，主要大街繁忙拥挤，携带着雨伞的士兵络绎不绝。史迪威感到很难想象这座城市昔日的威严堂皇是什么样子，但是即使已经衰败，西安人还是想出了享乐的办法。他们在鸽子尾巴上系上各种音调的竹哨；数以百计的鸽子在上空盘旋时便发出象管风琴那样的声音。

史迪威被带到设在老皇城的司令部去见这位督军。他已经利用军人劳动用旧墙拆下的砖把这座皇城重建为兵营和练兵场。冯玉祥是一位四十一岁的彪形大汉。他决心舍弃一般军阀的豪华生活，住在一座“整洁的小砖房里。他说话慢吞吞的……是一位实实在在、没有架子、易于结识的人”。他们开始讨论筑路工程，但是看来冯并不很感兴趣。史迪威在进一步交谈中发现，这是因为“他并不关心我是否能修筑成这条公路；他想谈军事问题”。冯请史迪威次日再来参观他的武器库并当即陪他看了看兵营和工场。

在兵营里，每一个士兵宿舍内都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上面用鲜红的颜色划出近五十年内丧失的国土——印度支那、朝鲜、福摩萨、旅顺。每所房子的山墙上都画着陕西、中国和世界地图。士兵们（比一般中国兵要整洁得多）正在练习单杠大

轮转动作，而且他们的熟练程度令人有些吃惊。“请告诉我，世界上还有什么团体的人能一个个地到单杠上去作一个大轮转动作。”另一个令人吃惊的情况是看到休息的士兵正在读圣经。在教室里，他们正在读书写字。在工场里，他们学习一门手艺，例如纺织工、木匠、家具师、鞋匠、裁缝和铁匠。鞋匠车间由一名军官负责，他也同士兵们一起劳动。“这也是令人吃惊的。看到一个上尉粘鞋面觉得不符合一般军务观念。”史迪威发现有一些有前途的二等兵和军士未经考核就被任命为少尉和中尉。晋升到上尉以后要上半年的教练课，这就是他们受到的唯一的理论训练。

第二天，冯将军的参谋长来问了“有关飞机、坦克、枪榴弹等许多问题”。然后督军本人又来同史迪威就各种武器交谈了一个小时。“他们对这些新发明的用途一无所知，竟然谈到用坦克保卫桥梁”。史迪威向冯“解说了斯多克迫击炮”，“我尽最大努力说明飞机、坦克和枪榴弹的设计目的和用途；他把钱浪费在这些东西上又是多么无益。有他的步兵和机关枪，一个命令下去，省内还有什么不能很快收拾得干干净净呢？”这并不是冯想听的话，但是史迪威坚持己见，“希望说服这位确实令人钦佩的汉子不要把他的财力浪费在对他来说是战争装饰品的东西上。”

那天晚上他同冯一起吃了饭。出乎他的预料，那一餐饭相当不错。由于冯信奉基督教的事和他的农民英雄特色已为人们广泛宣传，外国报界特别推崇他，喜欢描绘他身穿朴素的棉大衣，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但是史迪威发现，“这餐饭根本不是‘普通一兵’的伙食，而是有肉丸子汤、鲜蔬菜、鸡肉、烤

羊肉、莲子、炒鸡蛋和馒头。

史迪威在西安停留了四天，同承包人、中外工程师和助手们商量了工作，然后把从冯的军队里调给他当筑路工程监工的四十名军士集中起来前往城北二十英里的工地。他让领班的工头们为这条从黄河支流渭河东去的公路修筑一段样板看看，结果使他感到比较满意。看来这些人特别能干；他相信稍加训练他们就会干得很好。在渭河河津一片混乱，七八条平底船上挤满了骡子、大车和人，由船夫们在船尾推动，不时有骡子落入水中，船夫们叫着、笑着、或者从船上走过时掉进破洞里。史迪威是被一个苦力背上岸的。

八百名劳工开始筑路，他们拿着"唐朝的镐头"、木锹和极少的几只土筐，连一个夯箕都没有。事实证明，在这种条件下筑路工作是很难上轨的。下面的工人水平太低使工头们感到失望。一周过去了，他们"仍然没有任何进展。无法使工人干活……讲过几十遍还是干不好……工作搞得一塌糊涂。"但是"慢慢地混乱局面变得井井有条了"，史迪威可以感觉到工程确实在不断进展。恰恰在这个时候北洋军阀重新开战了。

据说是张作霖在"发难"，冯的部队奉命前去帮助吴佩孚。冯的部队一队队地向东开去，史迪威手下的大车被征用了，工头们也不见了，显然筑路工程不得不作罢。冯的参谋长前来邀请他同军队一起走。4 月 21 日，他不顾陪同人员希望他拖延几天的这一令人难以理解的竭力请求，经原路东行。刚刚走了两英里，一名累得筋疲力竭的通信员骑着自行车赶上来，背上背着督军作为礼物送给史迪威的一块毛毯。这个骑车人把毯子交给他以后便坐在地上起不来了。史迪威继续前进，路

上遇到了冯的一批参谋，“个个垂头丧气，悲叹中国的命运”。他同他们一样也感到忧愁。史迪威想，冯如果有几年不受干扰，他可能已经控制了局势，消灭了土匪，已经动手解决鸦片交易并有获得成功的某种希望。可是现在，“唯一显得愿意为争取建立社会治安和建立象个样子的政府而奋斗的一个人”已被拉回到无休无止的派系战争中去；陕西也回到老路上去了。

在潼关（位于黄河河湾的一个古老的边境要塞，它有大门，几条石铺的斜路通向大门），史迪威在一座旧寺庙里出席了冯举行的送别宴会。督军叫来一个团让他的客人检阅；向部队介绍时称史迪威是欧洲的史营长。对地方上的中国人来说，知道是外国人就行了，很少区分他们的国籍。

史迪威这一行人花了十八天时间，沿着黄河的支流、东北西南流向的汾河的河谷走到了山西省会太原。他们穿过了不毛之地和生长庄稼的良田、树林和葡萄园，象去的时候一样，领受了风沙和雨水，闻到了臭味，经过了肮脏的地方。这次不同的是，多了炎热的天气。在一个客店里，史迪威被蝎子蜇了一下，“躺在床上汗流夹背，彻夜未眠，觉得混身都有蝎子似的”。他沿途注意到古老的拱形石桥极多，但是往往拱石已经塌掉了半边。“为什么不修复？老天爷，不能修。为什么要修呢？”他得出结论，认为当代中国人是“建造这些桥梁的人们的不肖子孙”。这个结论还不能全部说明问题。公益事业之所以没人干是因为下层官员没有薪俸，而是依靠收税和勒索人民为生，结果就造成维修公路桥梁和铺设下水道的事无人问津的状况。

然而中国人的耐性和好脾气是令人钦佩的。当某个马车

夫常常把车陷进沟里时，其他人“每一次都高高兴兴地帮助他拖上来”。为了拖出陷住的车，“他们把三头骡子套成一个纵列，由一个人驾辕”，拼命地向前拉，“尖声叫着，吆喝着，笑着，滑倒在泥水里”。需要临时架个桥时，他们就“把车轮子卸掉，把车身翻过去横放在河沟上，桥就算搭好了”。虽然在发怒时挖苦地谈到“大车、骡子、车夫，这样地排列智力顺序”，但是他却逐渐喜欢起他那“一对爱开玩笑的马车夫、老郭和老邝；两人都不到四十岁，都为自己的职业而自豪”。他为他们每人买了一双鞋，还有一次请六个车夫吃了早饭。

史迪威有时坐车忍受颠簸，有时下车艰难地步行；忍受着肮脏的环境、炎热的天气和通宵的不自在；有一次在下过大雨之后，甚至在漆黑的夜里蹚过一英尺深的水走完了最后两小时路程，但是到达时却发现城门紧闭。经过这样许多天的长途跋涉，他终于到了太原，从那里乘上开往北京的火车。这一次他未能建成公路，但是同中国的军人和老百姓一起生活和工作了一段时间，还同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交了朋友。史迪威在返回北京的旅途中，看到张作霖的运兵列车从满洲南下去同冯和吴的军队作战，结果以失败而告终。两年以后，冯又转身与吴打了起来，一跃而成为北方的领袖。他后来在二十年代末期的决定性年头成了一位关键人物。当时史迪威再次到了中国，他们又见面了，以后史迪威每次到中国，他们都要见面。多年以后，史迪威去世几天，史迪威夫人正在她的卡梅尔的家里的楼上，突然听说有一位叫做“基督”的客人来了。她感到莫明其妙，下楼后发现在客厅里等候的是身材高大，长着炮弹形脑袋的冯玉祥。冯说：“我是来同你一起悼念我的朋友

史迪威的。”①

1921 年冬季，也就是史迪威两次筑路之行之间那段时间，远东继义和拳围攻各国公使馆事件后再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那年冬天举行的华盛顿会议为以后的许多事创造了条件。从时间上来说，这次会议恰恰在义和拳叛乱和珍珠港事件之间。这次会议是美国倡议并同英国商议后举行的，最初是英美两国的事，它们的目的是既要在太平洋确立可靠的均势，又不必花费海军军备竞赛开支。由于美国公众显然未准备拿出钱来实行一项赛过日本海军的庞大的建设海军计划，因而要取得并保持有利的海军比例和保卫菲律宾群岛，唯一的办法是商定一个限度。同时，召开这次会议也是为了缔结一项国际条约，在此基础上通盘解决各国在一些地区的利益。这种做法取代了已经到期而有待延长的英日同盟，因此还有一个额外的价值，使英国可以体面地摆脱一个讨厌的同盟——美国和加拿大也象英国一样渴望达到这个目的。

美国的利益还要求鼓励解决中日冲突，因为这样做有可能加强中国的地位。其主要鼓吹者——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和前国务卿伊莱休·鲁特——的进一步动机是想通过在国际努力中起带头作用的办法，来显示美国对世界事务的责任心并为抛弃国联的事赎罪。

山东问题使美国问心有愧。共和党人在选举哈丁总统的竞选运动中充分地利用了山东问题，以致共和党的一位负责

① 那是冯玉祥第一次到美国。他在前往苏联访问的途中，因所乘的轮船失火而死于黑海。

人说，它是“共和党人用以捞选票的最有效的问题”。这一点可能使共和党人感到有义务做点事来纠正他们曾大喊大叫地谴责过的不公正做法，但是国际会议的召开常常不是只出于良心。休斯国务卿之所以要求将中国问题列入议程，是因为日本的扩张有可能把那个地区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最终排除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他希望国际上支持中国“独立”和重新肯定门户开放政策，从而限制日本的扩张。

关心中国的“独立”与“完整”主要是美国的政策。英国虽然不热心，但是由于指望在会议上捞到别的好处，也采取了这种政策。英国在中国的利益比美国大得多，它是被建立通商口岸时期的观点所左右的，认为中国永远没有自己治理的能力。许多美国人也是这么看的，但是美国的舆论总的来说反应了传教士和教育工作者的信念，认为西方教育和西方的办法是有感染力的。只要让他们的学生，诸如孙中山博士和他的门徒这类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有机会实行这些办法，就能够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政府，这也将证实传教士们的一片苦心并非白费了。

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大声疾呼地提出要独立。中国要求的这种独立的确实证据是废除不平等条约。虽然美国的舆论倾向于支持这一目的，但是休斯国务卿等决策人当时还没有准备走到这一步。他们最后是要对此负责的。因此中国至少应该收复山东，这是更加合乎情理的事。休斯坚持了这一点。据报道，他（当时六十岁）说：“我老了，希望看到山东问题在我去世以前得到解决。”

尽管不断遭到美国的抨击，日本仍然未履行将租借地区

的主权归还中国的诺言，但是它既非一味地扩张，也非(1921年)一味地与西方敌对。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日本，一个是好战的日本，另一个是开明的日本。正象一个瘦人在一个胖人体内闹着要出来一样，日本那个开明派的可变身躯在二十年代里曾挣扎出来在受围困的情况下有过短暂的全盛时期，后来再次被吞了下去。各民主国家在大战中获胜给日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提高了日本议会党团和稳健派领导人的声誉。他们没有开展海军实力竞赛或推行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的巨大胃口，而是主张与中国建立睦邻关系。他们担忧与英国的联盟不能长久，希望美国承认日本在太平洋一些岛屿的托管权。由于这些原因，日本出席了华盛顿会议。

这次会议从1921年11月到1922年2月，开了不到三个月，相当于巴黎和会一半的时间。包括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葡萄牙在内，一共有九个国家参加会议。这些国家出席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出于民族自豪感，有的是为了海军力量或在远东的利益。俄国在这方面有直接的、长久的切身利益，但是它的政府没有得到承认，因而尽管它愤怒地提出了抗议，仍然没有被邀请与会。中国代表这一次与以往一样，一心要修改条约，争取关税自主权和收复山东。休斯国务卿竭尽了最大的努力说服他们就山东涉及的含糊的权利、贷款和租借问题直接同日本人谈判，而不要公开拿到大会上去。他们最后同意这样做，条件是休斯和英国首席代表白尔福要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中国代表未能出席预定的首次会议；经过了解发现他们被一批反对直接同日本谈判的愤怒的中国学生围困在中国公使馆的浴室里。其后双方举行了三十六次会议

才达成了一项协定。根据这项协定，日本再次表示(第一次以条约形式而不是口头许诺)同意归还租借领土，只保留某些经济权利。

华盛顿会议的各项结果大体上已体现在下述公约和协定中：确定美、英、日在太平洋的海军比例为五比五比三的四国公约、关于禁止在太平洋领地设防的五国公约、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此外还有一些单独的协定：山东问题协定、日军撤出西伯利亚协定、多事的雅浦岛问题协定和最后取消一直刺痛美国良心的兰辛—石井协定的协定。最引人注目的是限制海军军备问题。这个问题是从休斯在会议之初提出的很有气魄的建议开始的；他建议三个海军强国放弃计划好的造船方案，总共有六十六艘主力舰和其他船只。但是，禁止设防协定更重要，依据这项协定，日本允诺不在托管岛屿设防，美国答应不在菲律宾、关岛和阿留申群岛设防，英国保证不再加强香港防务。

最大的成就是九国公约。公约中娓娓动听的四项原则规定了为实现一直是普遍——或者说几乎是普遍——希望的但又难以达到的目标所必要的一切措施。这个目标就是：一个强大、独立、统一的中国。公约中规定缔约各方保证做到"(一)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与行政的完整。(二)给中国以最充分的不受干扰的机会，让它建立和保持一个有效力的和稳固的政府。"(三)维护"各国……商界和实业界机会均等"的原则。(四)不得利用中国现状"谋取"会削弱友邦公民权益的"特别权利或特惠"。

这就等于各缔约国保证尊重中国的完整，而又没有保证

在中国的完整遭到破坏时要给予保护。由于给美国的门户开放主张增添了条约的约束力，这种保证再次使美国人感到自己是中国的道义上的保护者。这样一来，无需采取任何行动就勾销了美国在山东问题上的罪过。这个公约既然是原则性的，完全没有害处，显然又是非常偏向中国的，参议院也就以六十六比零票予以批准。参议院对待条约并不总是这么温良的。由于中国还没有一个可靠的政府，各缔约国没有主动表示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是都作出了愿意修改这些条约的姿态。他们答应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治外法权，还成立一个委员会"审议"关税问题，并同意如果不能归还中国要求归还的关税自主权，也应当增加它的海关收入。这两个委员会终于在 1925 和 1926 年举行了会议并作出了决定，但是那时由于国内动乱和中外冲突复起，这些决定未能实施。英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答应归还威海卫的诺言最后于 1930 年兑现了。

华盛顿条约总的来说似乎是一个杰出的克己的法规、一个尊重国际秩序的奇迹。每一个欲信仰和平和集体力量的人都会认为，这些条约确实达到了裁减军备，实现国际平等和保护中国的目的。条约的缔结是普遍抛弃侵略意图的结果，但是由于没有制裁和保证措施，各国利益不再一致时就会告吹。虽然日本当时执政的稳健派对会议的结果也同其他缔约国一样感到满意，但是陆军和海军中的民族主义分子却憎恨华盛顿条约。他们愤懑的是日本由于其在中国的行动自由受到了他们所谓的限制而处于劣势地位。他们的敌对情绪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又受到了新的刺激。1922 年 11 月，美国最高法院确认了过去的一项国会法案；这项法案限定公民权只给与

“自由白种人”，实际上等于规定已经归化了的日本人也不能成为美国公民。1924 年，西部几个州大吵大闹了一番以后，国会制订了一项法案，规定日本人不受那项公民权利法的约束。这一姿态几乎未导致日本的友善，因而对华盛顿条约并非吉兆。

史迪威以武官代理人的身份被派去了解华盛顿条约的一个条款的执行情况，即预定日本于 1922 年 9 月撤离西伯利亚的那个条款。在这一个月中他北上到了满洲、西伯利亚、朝鲜和日本。

满洲是中国在长城以北的一个广阔的边境地区，是当前野心活动的中心和未来冲突的焦点。这个地区比德法两国的总面积还要大，有肥沃的草原和丰富的水力资源，盛产煤、铁和粮食。它是两个敌对的殖民主义者俄国和日本角逐的心脏地区。俄国的领土环绕着满洲构成了一个马掌形，东至日本海沿岸的滨海省。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从西向东横跨满洲；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从南到北纵贯满洲。日本在满洲的利益掌握在象英印军队一样的几乎是独立的部队关东军的手里。满洲的首府、关东军和南满铁路的总部奉天① 便是史迪威的目的地。

他一到奉天就不喜欢这座城市。“这个鬼地方没有中国邮政同外界联系，只有日本邮政。上帝作证，我一直走到发现一个中国邮筒为止。”这座城市是南满铁路的煤炭和钢铁工业区的中心，“人们忙忙碌碌……到处都有开办大企业的机会。

① 奉天即沈阳。——译注

每个人都有发家致富的计划，但是总有某种障碍。”他继续前进，到了十万白俄居民的中心哈尔滨；然后从那里乘火车向东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他在沿途的城镇注意到，日本人似乎并不忙于撤离。事实上，日本军队好象正在“从东向西撤。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两架飞机在空中嗡嗡地兜圈子。没有开船来接他们。”这个地区仍然处于战争和革命的余波之中。史迪威通过考察、谈话和漫步，发现“日本人在城西俯瞰阿穆尔湾的一座小山上使劲地挖掘什么。今天上午全城到处都有这些傲慢的小杂种乘着美国汽车跑来跑去，部置宪兵岗哨，一派狂妄劲头……非对着他们的肋骨狠狠地踢上两脚不行……他们故意在护照上找美国人的麻烦，故意使美国人恼火……好象是特意要使人们藐视和憎恶美国人似的。”

他的这种印象在访问日本一个星期和回来的途中在日本统治的朝鲜停留了一个星期之后更加深刻了。他在日本看到了在中国少有的咄咄逼人的沙文主义。作为在自己国土上享有完全独立自主和即使按现代标准来衡量也是高效率的唯一的东方民族，日本人的高等民族优越感十分明显。除了要找一个隶属民族来加以证实以外，这种优越感还表现在不放过每一个官场接触来打扰和凌辱长期以来一直以优等人身份到东方来的那些外国人。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让你在船上等着开饭，可是日本人已经吃起来了。”“首先为日本人服务，而不管先后次序，例如在售票窗口等等就是如此。严格地检查文件。硬是进行长时间的询问。到处可以遇到公开的嘲弄。”他承认这些都是“小小的烦恼”，并没有影响他在日本旧地重

游的乐趣。在宫岛的小山里漫游，享受着松林的幽静和芳香，俯瞰着海峡风光，他感到“我可以在这里一连躺上几个月”。他喜欢这个国家，但是不喜欢这个国家的人，因为他们使他联想到德国人。他在结束访问时断言，他们是“肤色苍白的冒牌德国人，然而他们没有德国人的才智和能力。他们爱国，组织得很好，勇敢，爱好艺术，妄自尊大和愚蠢。”

1923 年，史迪威在他的语言教官任期行将结束之前，谈及又到中国的彼此相隔很远的一些地区旅行了两次。那年 4 月，他没带翻译也没有旅伴，独自一人靠小船和步行漫游了一个月，先后到了长江南岸的三个省：沿海的浙江省和内陆的江西、湖南两省。这些地方是不需要他来修建公路的。当地人除了独轮手推车以外没有任何车辆。货物是经水路运输或用扁担挑的。人们走的是稻田间的堤堰小路或攀登陡峭的山坡。群山透过雾气出人意外地突然出现在眼前，就象一幅幅中国图画变成了现实。南方的农村比北方的农村更迷人。栗子树花苞初绽，小船扬帆在河道里缓缓行驶，一片片的竹林装点着南国大地，一座座宝塔上的风铃玎玲作响，春季的蚕豆花飘溢阵阵清香。孩子们懒洋洋地躺在水牛背上，赶着它们转圈拉水车，戽斗不停地车水浇灌田地。

史迪威谈到了在当地督军部队的保护下大量贩卖鸦片的情况。这种情况同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日本毒品从未构成问题。在湖南，一百家烟铺每家每天要向负责镇压鸦片生意的官方稽察员交纳四十枚铜钱，以求得保护。史迪威的船夫就是一个烟鬼，因而不得不给他买些大烟“使他不至哭哭啼啼。每天要花五十枚铜钱，让他吸上两三次，要不然他就没

精打采了”。

他在江轮上结识了各种类型的中国人，与他们混得很熟。其中有与他邻船的巨商，“他们从奴仆到四层的饭盒应有尽有”；也有“快活的船工，他们不论身上干湿，天气冷热，肚内饥饱，总是兴致勃勃，互相开玩笑”。上岸之后，他花了几天时间徒步在乡村旅行，每天走二三十英里。老百姓遭受着地方军队的迫害，“大都是强奸和抢劫”。道路仅仅是独轮手推车走的极差的小路。唯有中国人才有推着装得满满的独轮车慢慢地在这种小路上前进的耐心和精力。看来人民对外国人是友好的。史迪威说：“人民普遍认为美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他们一点也不关心自己国家的政治，只是要求不要打扰他们，使他们能尽量好好过日子。”

史迪威沿江东下，到达马可·波罗说是美丽无比的杭州时不禁大失所望。他认为以寺庙和宝塔之美而著称于世的西湖确实秀丽可爱，但是被夸张了。那里“有许多半土半洋的奇形怪状的房屋……看上去象是美国第二流的海滨避暑胜地”。他这次旅行的最后一站是若干年后阿诺德·托因比① 给与下述评价的城市：

忙碌而可恶的上海啊，
你是受士麦拿恐惧折磨的伦敦，②
你是洒遍伦敦泪的士麦拿。
谢天谢地，我们已经起锚开跋。
再见。

① 阿诺德·托因比，英国历史学家(1899——)。——译注

② 士麦拿，即伊兹米尔，土耳其西部一海港城市。——译注

史迪威与托因比的看法相似，纵然原因不同。“这座城市可以在顷刻之间毁灭任何人。被抛弃在旅馆周围的婴儿抽搐着，他们十分迫切地需要照料，以致你想不去照料是很困难的。”

一个月以后，1923 年 6 月，他到了外蒙古。这个地方同奢华享乐之地上海在路程上的距离和性质上的差异都是很大的。从长城脚下的铁路终点站张家口到外蒙首府库伦有六百五十英里，乘汽车要走三天。途中休息时，史迪威睡在蒙古包里，实在受不了时，就在露天过夜。这个地区的主权掌握在中国和俄国手里；“独立的”蒙古只是一句空话。看来没人知道谁是国家元首；政府不过是笑料。史迪威报告说，蒙古人决心不让中国人再度控制他们，但是史迪威认为，这个国家将长期依附于人。在库伦处处可见俄国人插手的迹象。备有一些机关枪的包括步兵和骑兵在内的五百名红军支配着局势。他们的弹药极少。由于没有铁路，又缺乏其他运输工具，在这个地区作战将是十分困难的。他观看了喇嘛（在库伦有一万五千名）拜佛，觉得他们“肮脏，堕落和颓废”。梅毒很流行，妇女不能生育；他还相当概括地说：“几乎完全没有儿童的状况可能使蒙古人五十几年以后就要绝种。”

史迪威从 1919 年被派到中国工作以来已经整整四年；他的语言教官任期结束了。在山西和陕西的路基上、在他独自旅行时住过的村庄和污秽的小客店里，他逐步了解了远离外国人通常接触的小天地——通商口岸、交民巷和传教士大院——的人和地方。他曾经同中国人一道在中国人的条件下工作过。

1923 年 7 月 9 日，在他的四十岁生日过了四个月之后，史迪威一家乘船回国。那一天他在日记上写道：“光阴似箭，转眼间已经是中年人了。”

第五章　“胜任团”与蒋介石之发迹

1926—29年

返回美国以后，年过四十的史迪威又回到了学校。1923年，即打胜第一次世界大战四年以后，在美国军队里没有多少别的事情可做。战败可以振兴军事建设，大获全胜又会导致军务的废弃。此时地平线上已经看不到明显的威胁，日本似乎已经被华盛顿条约管束起来，于是退缩到大洋屏障背后的美国开始享受柯立芝的恩惠了①。股票市场兴旺起来，摩登女郎和酒贩子异常活跃，军队腐败了。1922年的裁军使晋升的速度缓慢到无法察觉的程度。任何地方都没有美国军队参战。晋升的唯一出路是参加进修学习。

史迪威还在中国时就要求将他分配到佐治亚州的本宁堡去进修步兵课程。本宁堡步校接纳了二百五十名步兵军官，分为普通班和高级班。史迪威申请进高级班并如愿以偿了。这个班的优秀毕业生要进入堪萨斯州利文沃思堡的指挥参谋学校继续学习。如果不是利文沃思毕业的军官，那是不大可能升任高级指挥官的。史迪威于1923至24年在本宁学习步兵课程，其后留校一年成了辅助该校校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朋友和钦佩者韦尔斯将军的助理执行官。

---

① 柯立芝，美国第三十任总统（1923—1929）加尔文·柯立芝。——译注

他进入了利文沃思军校，在那里度过了 1925 至 26 学年。利文沃思军校教授的是如何“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依据是对任务的说明，分析敌情，选择行动，下决心，作决定和制定计划。在讲解、制图问题和野外演习方面，学习的课程有动员、部队调动、行军、救援、供应、侦察、防卫措施、阻滞作战、撤退、转变方向、追击和人们为从战斗中提炼出一门科学而不倦地研究出的种种战略战术。课程要求严格，造成的压力极大，以致二十年代里引起多次自杀事件，后来终于使这所军校关了门。

军官们夜里一直学习到清晨两点钟。妻子们逐渐烦躁甚至恼火了。但是史迪威并没有陷入这种疯狂的奋斗之中，尽管他称这一年为“极其讨厌的一年”。他在西点军校时小于平均年龄，在这里却比一般人年纪大，而且已经离开军校二十多年，因而觉得不值得拚命取得好成绩。他自知能够毕业，觉得这就够了，此外都是“瞎胡闹”。他只是学习必要的课程，十点钟就睡觉，这对他的同事们几乎是一种污辱他。班那上最用功的学生之一、西点军校 1915 年级学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毕业时名列第一。史迪威毕业时，校长在他的成绩簿上的批语是：“有常识和幽默感。”

由于想离开美国的周期性欲望再度发作，他提出了去法国的参谋学院工作的申请。这个差事获准之后，他又得知有重返中国的机会。现在在陆军部工作的一位西点军校时期的同班同学威利·惠普尔给他捎信说，美军根据义和拳协定派驻天津的一个团，第十五步兵团，有一个营长的空缺；惠普尔问他愿意不愿意干。史迪威立即抛弃了去法国的机会而力争去

天津。回国以来，他第一次压抑不住急切的心情，在利文沃思军校整个学习时期，他三番五次地追问惠普尔。他的朋友告诉他这件事不成问题。他在2月份的信中说："你简直是一个杰出的中国人，因而被认为是承担此职的最合格的战斗部队军官。"但是史迪威还是不放心。惠普尔3月写信告慰说："别担心，别人得不到这个职位。……不要担心那些得到参议员支持的家伙……有我在支持你。事情万无一失。"当4月份调令仍然没有下来时，史迪威甚至发出电报。惠普尔答复说，"随时作好准备"，调令会下来的。调令果然在学期结束之前下来了。史迪威一家到卡梅尔度了暑假之后，于1926年8月20日再次乘坐陆军运输船前往中国。史迪威夫人写道："我们都有一种即将回家的心情。"

天津使他们幻灭。在义和拳反叛之后已经拆除了城墙的天津市驻扎着外国军队，成了外国在华北的立足点。租界地区被夷为平地，重新修建起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后期那种沉闷而丑陋的西方式建筑物。那里没有北京的那种优雅生活；中国也不是史迪威一家三年前离开时的中国了。南方正在发生巨变，即将产生一位领袖，使斗争达到高潮和最终建立一个国民政府。

事变是以1925年5月30日英国巡捕头下令向参加上海纱厂罢工游行的学生和工人"射击！"开始的。当即有十二名中国人遭枪杀，十七人受伤。上海事件只不过是一连串历史事件中的一次事件，① 但是正象在称为波士顿大屠杀的事件中英国步枪队开枪射击一样，这一事件也助长了动乱，最终导

① 上海事件即五卅惨案。——译注

致获得了主权。

这时由于与共产国际联合而获得了新的力量的国民党开始兴旺起来。孙中山从俄国人那里得到的最大的帮助是两名外国顾问，民事顾问鲍罗廷和军事顾问加仑。加仑就是后来指挥苏联远东方面军的瓦西里·布留赫尔元帅。鲍罗廷是一位镇静、慎重、深谋远虑的人。他对中国主人的影响日益加强，直到后来被称为广州皇帝。俄国的顾问、武器和其他物质援助使国民党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们对孙博士说，革命只是靠随机应变地结成没有共同目标的联盟是不会成功的。首先要建立自己的经过思想教育的武装部队。因此，1923 年建立了黄埔军校，在加仑指导下的三十名俄国教官在这所学校工作。孙博士为了既受到思想教育又受到军事训练，派了一个以三十七岁的才干出众的门徒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团赴莫斯科。

1924 年，孙博士宣布了他的三民主义纲领——民族、民主、民生。这在全中国产生了鼓舞人心的影响。但是由于象以往一样受到了通过协议获得权力的前景的引诱，他接受了张作霖和冯玉祥从北京发出的请他参加实现民族团结的“改组”会议的邀请。在北京期间，他于 1925 年 3 月 12 日死于癌症，留下了三民主义、一个运动和一个已经沉浸在中国强权政治的现实中的继承人。

蒋介石不是受过西方教育的那批人中的一员，在旅居莫斯科期间也没转而倾向苏联，而是恰恰相反。他于 1887 年生于浙江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一直未改掉其粗俗的口音。他在保定军校和东京振武学校受过教育。他在日本时加入了孙

的党，后来参加了革命。在其后的十年里，他时隐时现；有时参加孙的未遂行动，有时在上海“黑手党”青帮里活动。青帮是控制着各种非法生意以及中国式职业政治活动的原型的党。他同浙江的大商人、后来成为孙博士主要资助人的陈其美建立了联系，一度还在时而成为孙的盟友时而成为孙的敌人的闽系军阀中干过事。

蒋介石1924年从莫斯科回国以后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享受到了导师的荣誉，而中国人是最崇敬导师的。他凭借对革命军（一个人在革命军里的地位同黄埔军校的职位有关）的控制，一跃而为国民党内左右事态的人物。经加仑建议，他率领黄埔第一期学生接受了对新建陆军的首次考验，获得了战胜南方地方军阀部队的胜利。在这些年里，黄埔集团形成了联盟，使蒋介石有了一批门徒。他并不是象孙中山博士那样通过政治启发使人们效忠与尊敬他，而是靠使人印象深刻的个性魅力。他身材修长，言谈简洁，脸上毫无表情，但一双黑眼睛很机敏，好象一个人带着假面具以其犀利的目光洞察一切。他的卓越才干不在军事上而在政治方面。他这种才干是在各个派系和各种阴谋之间玩弄奥妙平衡的过程中锻炼出来的，因此人们把他称为“不倒翁”，“不倒翁”是下部重的玩偶，推倒后会自动立起。

一俟孙的逝世使国民党失去了约束力，党内左右两派之间的分裂立即表面化了。蒋是右派的领袖。他与他的同僚主张争取国家主权；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则把注意力集中于社会革命。争夺党权的内部斗争开始了。发生了阴谋诡计、逮捕和暗杀事件。

在中国纺织厂里和码头上，工人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中国无产阶级队伍中间的革命活动为1925年的上海事件提供了火种。在鼓动家们的煽动下，仇外情绪蔓延到大江南北，发展到义和拳暴乱以来的最高峰。6月11日汉口发生的一次暴乱中又有一些人遭枪杀。在广州，以黄埔军校学员为首的工人、学生和军人顺着沿江马路举行示威游行。在对岸摆好阵势的英法两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挑衅之后向示威群众开了枪，打死五十人，伤一百人。

在这一事件后，香港发生了一场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的抵制英国人运动，使一切陷于瘫痪，英国人损失了千百万英镑，而且由于仆役们的离去、货物的运输和各项服务工作陷于停顿，在中国的每一个外国人认识到，到头来自己的地位是虚弱的。内地的传教士象在义和拳暴乱时期一样遭到了骚扰和袭击，迫使一些人停止活动或逃走。在中国人看来，居住在高墙大院内西式洋房里的传教士与外国领事以及美孚油公司和怡和公司的代理人一样，统统是不平等条约的拥护者。传教士呆在中国对中国人是一种污辱，尽管他们提供了医药和教育，因为他们呆在这里是依据一种设想，这就是中国人的那种信仰是低劣的，应当以西方的信仰取而代之。

国民党认为排外狂热是大好时机，于1925年7月宣布自己是中国国民政府。围绕着由谁继承孙中山地位的问题展开的角逐尚未得到解决。蒋介石是军事首脑，在法国受过教育的能说会道的美男子汪精卫任政治主席，这两人结成脆弱的伙伴，共同掌握领导权。汪就是1910年因试图暗杀摄政王而被投进牢狱的那位年轻的革命党人。蒋不久就赶走了他的这

位伙伴，随后在 1926 年 3 月又企图清洗共产党人，结果形成了相持不下的平局。这个运动仍然是革命的。共产党员在香港的抵制活动中，在组织农民和工会的活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黄埔军校教职员中设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政委式的政治顾问班子。他们贴在墙上的口号有："打倒帝国主义！起来吧中国的劳工！世界革命会使你们得救！打倒外国文化侵略！铲除不平等条约！"黄埔军校礼堂的墙上装饰着三张显示外国侵略的巨幅油画：1842 年焚烧鸦片的场面；1900 年联军进入北京时枪杀和用刺刀挑杀义和拳人员的场面，背景是燃烧着的北京城门；第三幅是 1925 年的上海事件，外国人用机关枪（而当时用的是步枪）扫倒学生、妇女和儿童的情景。这几幅油画虽然是宣传，却集中反映出西方很少重视也很少承认的然而根深蒂固的反白人情绪。

1926 年春，由于广东和广西的两位进步领袖李宗仁和白崇禧归顺，国民党得到了挥师北上夺取全国所需要的根据地和力量。在其后的二十年里，李和白与蒋携起手来，然而他们也时而敌对时而联合，这是中国所特有的政治起伏。孙中山多次企图发动而未能成功的北伐时机成熟了。北伐战争始于 1926 年 7 月，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夺取长江流域的三大城市汉口、南京和上海。国民党的国民军总兵力不足十万人，由统治地位很不牢固的蒋介石任总司令。与他们对阵的督军们的各类部队则有一百多万人。由于大敌当前，这些杂牌军以往曾是互相交战的老敌手，现在结成了矛盾重重的联盟。这个联盟中有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和上海周围五省的军阀孙传芳。张宗昌是大名鼎鼎的山东军阀，据说他有"大象的体格，

猪的头脑和老虎性子，甚至看他一眼都是危险的。”在西北，曾聘请过史迪威办事的两个人、模范督军阎锡山和基督将军冯玉祥，在那里观望和等待时机。当时阎是其他督军们很不可靠的盟友，冯则有意成为国民党人的盟友。

奉行不欺负不掠夺人民的革命原则的国民党军队，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所向无敌，节节胜利。北方军队的许多部队或投奔过来或不战而退。他们于9月，即史迪威抵达中国那个月里，攻克了汉口，10月击溃了吴佩孚的部队。蒋介石的第一军在江西受挫，其他各条战线都象潮水一般向北推进，直指南京和上海。由于厌恶压迫的人民抱着希望和给与热情赞助，北伐的道路便畅通无阻了。国民党之所以能轻易取胜，并非由于武功，而是因为许下了让人民过“好日子”的诺言。北伐军进入距上海一百英里的汉口时，成千上万的观众站在街上，一张张笑脸目送着这支装备精良的部队。在以前军人从来没有受到过人民群众的欢迎。后来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当时就在人群之中，“我的心脏在狂跳……因中国的一支现代军队的好名声已再次确立。”他的心情证实了蒋介石的断言：“我预期获战争之胜利三分靠作战，七分靠宣传。”

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迁至国民党左派控制下的汉口。当蒋集中力量进攻南方的都城南京和经济中心上海时，汉口沉浸在一片有外国插手的强烈反叛气氛中。鲍罗廷是后台老板和实际领导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是主持人。人称国民党智囊的陈友仁出任了新的外交部长。陈身材矮小，聪明.刻薄，是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半黑人混血儿。他受过西方教育，戴一副金丝眼镜，穿着白色鞋罩，不会写汉字，也很少

讲汉语，他的闻名之处是讲一口词藻华丽的英语和极端憎恨外国人，这一点外国人不久就感受到了。

国民党的兴起在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中间促成了一场激烈争吵，争吵的一方是视中国为殖民地的通商口岸得益者，另一方面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维护中国权利的传教士。传教士的人数此时达到了一个高峰，在一千一百四十九个布道所，共有八千名新教传教士，另有一千二百名天主教徒。传教士们如想消除中国人的敌意，就必须与外国条约体系绝裂，尽管正是条约体系保护了他们在中国的地位。在外国开明派报刊的支持下，他们极力主张给中国以自决权，把中国的事业比作同“从前我们为了从英国独立出来而进行的斗争”的事业一样。他们确信，由基督教徒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是诚心求进步的势力，它终将在中国结束内乱，建立起良好的政体。他们斥责商人与外交官们对中国持怀疑态度，在致各种机构和教会的信件中、在杂志和报纸的文章里、外出演讲时和公众会议上，都为中国的权利大声疾呼。

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在美国自然得到了支持他们的广大民众的响应。当基督教会联邦理事会代表两千万会员请求美国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时，它确实是代表一个相当大的院外援华集团说话的。1925 年，在华拥有利益的一些组织在约翰斯·霍普金斯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集会。未来的驻华大使、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以大会发言人的身份要求美国带头以“敢作敢为的善良行动”来为结束条约体系作出贡献。他说，只有通过美国的行动，各国同中国的关系才能改变。

这类宣传激怒了靠着不平等条约为生的通商口岸得益者。他们认为这些宣传是传教士们存心不良地施展了“强大影响”的结果。通商口岸的报界气得发疯，指责教会在中国的权利与愿望问题上“强词夺理”，“爱管闲事”，说的全是“难以想象的梦话”。

代表商业界的那位“俱乐部里的人”无疑确认西方有权利为居住在任何地方的西方人的福利与商务创造有利条件。中国人为取消西方的特权所作的努力被认为是“侵犯外国权利的行为”；传教促进的西方教育遭到了指责，因为它打破了儒家伦理，使人们产生了不适合于中国的理想。

通商口岸的维护者 J. O. P. 布兰德写道：“选举议会制和各种民主制度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这是亚洲人所理解不了的。”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是它使得布兰德这类认为民主政体是治国的恰当方式的人得出结论，认为既然中国人感到民主制不适合中国国情，因此中国人“显然没有能力自理。”

这种见解没有引起美国公众的共鸣。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民正在为争取自由而进行正当的斗争，而且认为他们既然在为主权而斗争，自然也是在为民主而奋斗。这是西方的错觉。中国确在进行着许多的斗争——为了权力，为了国家地位，有些甚至是为了人民的福利——但是培育西方人的这些神圣权利即选举权和代表权并不是他们的目标。

美国政府同其人民一样，至少在理论上是希望中国获得自己的权利的。但是它并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因为它奉行的政策是要等到有迹象表明中国将出现一个稳固的、负责任的政府时才能废除治外法权。1926 年，当华盛顿会议答应

要成立的两个委员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开会研究关税自主和治外法权问题时，中国几乎还没有一个政府。国民党仍然在想建立政府，北京的督军傀儡政府在北洋军阀的年度四人舞中最后一次更换伙伴之后，实际上已经解体了。张作霖和吴佩孚建立的摄政内阁没有得到缔约国的承认，因此这些国家可以宣称，放弃条约权利的时机尚未成熟。

1926 年将是采取“敢作敢为的行动”，即自动废除特权的行动的最后时机。各缔约国并不迟钝，立即作出了某种姿态。上海市议会增补了中国议员。关税会议同意从 1929 年开始恢复关税自主。然而治外法权委员会得出了预料之中的结论，要等到中国在确立合理的司法与行政程序方面取得进步之后才能放弃治外法权。该委员会的报告是 1926 年 9 月发表的，时值国民党人攻进汉口。在这以后，抉择就再也不会是自愿的了；中国开始事先未提出要求就动手夺回主权了。

当陈友仁 10 月间宣布打算向外国人征税时，各国公使馆惊恐万状，一致认为，如若不强烈反对，这就意味着在中国的条约权利开始完蛋了。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他们这些国家的政府无法达成采取联合行动的协议。英美两国都不想使用武力来对付一个正在为争取主权而努力的民族。过去他们不曾准备放弃特权，现在他们也不准备用武力保住这些特权。

这一次英国人取代美国人在称为圣诞节备忘录的政策声明中首先作出了这种结论。英国在圣诞节备忘录中呼吁列强承认修改条约要求“实质上是正义的”，应当满足“中国人民正当的愿望”。在美国，众议院立即响应了这一呼吁，作出决议敦促美国结束不平等条约，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同中国人

重新谈判条约。美国人对中国革命同他们自己的革命是等量齐观的。《巴尔的摩太阳报》说，国民党人代表了“绝不亚于鼓舞过乔治·华盛顿的革命军的一种高尚精神”。整个报界拒不理会“赤色”恫吓(必然只有《芝加哥论坛报》是例外)。《纽约世界报》说:“蒋军的‘赤色’象华盛顿的军队在瓦利福奇时一样。”由于考虑到美国也有共产党人，这家报纸采用了这种克制的说法。由于对中国怀着固有的好感，美国的舆论有史以来第一次尽量缩小而不是夸大赤色的威胁。

驻天津的第十五步兵团感觉到了这些事件的震动，但是没有怎样干预，因为美国的政策使它不可能去发挥任何有可能卷入中国内政的作用。十五步兵团的兵营座落在租界的中心，是些砖瓦结构的三层楼房，前面有一个练兵场。军官们除了团队工作以外还参加茶会和晚餐舞会，到赛马俱乐部打马球;士兵们的性病比率比美国陆军的一般比率高两倍;该团的周报《哨兵报》在《国内》的标题下刊登美国国内新闻。这个报纸可以在美国任何一个团的驻地发行而无需改动。

天津是华北的主要港口和商业中心，位于距渤海六十英里的河畔。天津的租界也和上海一样由英国派出的印度锡克人当警察，并为中国人提供便利。军阀时期，先后有两位总统、一位总理和二十六位省长到那里避难。租界的主要大街分段命名为凯萨·威廉大街（后改为伍德罗·威尔逊大街）、维多利亚路、法兰西大街和意大利街。美国原来没有瓜分到租界，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获得了前德国租界的一部分，相当于一个街区的面积，现在称为美国大院。大院内除了营房外还有军

人医院、军人俱乐部和娱乐厅。在娱乐厅里每周变换三到四部美国影片，使人们感觉到美国的潮流和时尚。史迪威(他上一次到中国故意没有去了解天津)指定要找套中国式住房，结果发现只能找到洋房，这使他很反感。他只好住进英国租界赛马路 242 号院内一座备有笨重家具的“讨厌的三层楼房”。

第十五步兵团的一个营在 1900 年曾经与义和拳作战，但是整个团队是 1911 年革命以后才派驻中国的。该团的常备编制是三个营，其中一个营仍然留在菲律宾。在中国的两个营总共约有五十名军官和八百名士兵，比英法两国驻天津部队少一些，与日本当时在那里的驻军人数相仿。第十五步兵团的代号是“胜任”，其出处是中国人用以表达“执行任务的能力”(载于该团手册)的一句洋泾浜英语。为时一年的训练结束时，举行了“胜任”比武周，安排了田径赛、射击比赛、马术和运输技术表演，颁发了奖品和奖章。勤务日是由军士主持的，往往只是步枪和机枪操练，时间较短，一般到中午就结束了，也没有野外演习，因为活动场地有限。该团在天津东北八十五英里的唐山有一个警备分队，负责保卫京奉铁路线上的修理所；在海滨的山海关有一个夏季训练营地；还有一支由当过骑兵的军人组成的骑兵巡逻队，骑的是满洲矮种马。全团都雇用苦力干活。每个连的仆役头都穿着蓝色的长衫，头戴黑色瓜皮帽。在野外演习时苦力为军官搭帐篷，进餐时等在旁边侍候，担负一切体力活，有时甚至为士兵们擦枪。据脾气暴躁的驻华美军司令卡斯特纳将军说，士兵延长服役的人很多，已经多到引起陆军反感的地步，因为这种情况证实了“同社会地位低下的妇女同居”的说法。他愤怒地报告说：“女人、

酒和毒品便宜得很，只要花上几分钱就可以弄到了。”为了压低花柳病率，军队在酒巴间关门时就雇用黄包车免费把士兵们接回来。

第十五步兵团的团长是前驻北京武官艾萨克·纽厄尔上校。他身材高大，头发灰白，威风凛凛，是一位很典型的武官式人物，深受全团官兵的敬佩。他有一位与十五步兵团的传统相适应的富裕而有派头的妻子。其中有些传统史迪威并不喜欢。根据一种规定的习惯，军官们穿着军装而不带武器时，“要携带十五步兵团特制的马鞭或轻便手杖”。所有的军官和上士值勤时要佩带军刀。鼓励人们“经常”进行礼节性拜访，以促进“团队精神和团结”。每逢纪念日要为与义和拳作战时阵亡的将士扫墓。每个军官任职期间有一个月的队外勤务，以便在华北旅行。

为了帮助军官和士兵学习，1924 年开始执行一项计划，向军官和士兵讲授汉语口语基础知识。汉语课每周四次，每次一小时，对军官是强制性的，士兵则是自愿参加。所有的考试及格者有资格佩带蓝底上写着一个红色的“中”字的袖章。“中”字是“中国”的第一个字，仅仅这一个字只能起到装饰美国军服和表示“中间”的作用，因而常常使中国人感到莫明其妙。教士兵学习语言的计划显然效果不很显著，因为史迪威过一段时间发现还有必要说服汉语已经讲得比较流利的青年军官廷伯曼少尉教军士们学到足以问路的地步。

出于级别和威望的考虑而建立的司令部是由派任驻华美军司令的一位少将主持工作的。担任这个职务的是卡斯特纳将军。他已年过六旬，但是仍然是一位神经质的不够稳重的

人。他对穿着很不讲究，与十五步兵团服装漂亮的声誉很不协调。他也没有进过西点军校。1926 年 12 月，第十五步兵团指挥部与驻华美军司令部合并，因而该团处于他的直接指挥之下。卡斯特纳为自己有健壮的体格和善于走路的本领而自豪，他特别喜欢体育运动。也许正是这个缘故史迪威是理解他的人，也是卡斯特纳与之没有吵过架的少数几个军官之一。他是从比较荒凉的阿拉斯加地区的一个部队调来的，打算教这群养尊处优的家伙学一点真正的军人之道，并“使步兵团的胖子们体重减少到能干事的程度”。在面临他和另外许多人认为类似义和拳时代曾充斥北京的那种红色排外运动的情况下，他为了应付最糟糕的情况，决心把步兵团训练得能够作三天急行军以赶到北京解救公使馆。他向陆军部解释说，这种训练将来可能证明是“极为必要的”。他本人也在为应付这种情况进行训练，每天围着天津赛马场步行。

在十五步兵团服役与在美国国内服役有一些显著的不同之处。按照美国陆军的传统，野外演习以后清扫营地，连一个马粪蛋、一块土豆皮、一把稻草、一个罐头盒、一段绳头都不能丢下，厕所也要填平。后来有一次，附近一个村子的几位长者以代表的身份求见司令官，客气地问道是否营地可以不清扫，因为他们可以利用丢下的废物。从那以后，厕所不再填平，垃圾不再清扫了。部队开走之后几分钟之内，这个地方就弄得一干二净了。

在这里没有多少机会运用利文沃思指挥参谋学校教授的军人服役原则。由于步兵团最初的任务是保护北京的使馆人员，因而被认为是公使馆的下属单位，1922 年又归国务院管

辖。步兵团得到的是避免发生冲突这样一个相当奇异的命令，因为美国的政策不仅要求不介入事端，而且要避免妨碍中国内政。结果是遇到危机时步兵团也没有能力完成军事任务了。遇到挑衅时也只能虚张声势恫吓一下，这是不久前在北方的督军们混战期间步兵团成功地施展过的策略。1924年，吴佩孚的一批缺粮少饷、秩序混乱的部队接近天津，大有抢掠之势。市民要求保护，十五步兵团侦察了敌情，发现只有一个营的残兵败将，士兵们大多数是十四到十八岁，辎重队是一辆装载着水壶和毯子的驴车，有一名骑着一匹矮种马的军官。十五步兵团设立了五个前哨，将大米、白菜和茶叶分发给这些可怜的士兵换取他们的武器，以这种办法牵制了他们，并部分地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市民们给步兵团竖了一座大理石牌坊以示谢意。此后这座牌坊便作为"胜任团"的功绩的见证矗立在美国大院内。

1925年冬季，一名军官接到了把第十五步兵团获准的行动范围进一步缩小的命令，可是据报告，张作霖的部队当时正在开往市郊一个禁区。后来成为四星上将的马修·B. 李奇微上尉奉命带上他认为必要的兵力，出城"牵制"张作霖的一万二千人的军队。他只可利用"虚张声势、劝告或恳求"的办法，绝对不许开枪。鉴于有这些限制，他只带了两个人骑着满洲的矮种马尾随行进中的这支中国军队一整天，完成了任务，胜利归来。

由于步兵团处于这样一种固有的矛盾的地位，卡斯特纳的前任威廉·D. 康纳将军1926年初回国出任西点军校校长时就曾建议将部队撤回。康纳是工兵部队杰出的谋士之一，

前西点军校的高才生。他在中国期间作过一番考察，注意到“民族主义精神”正在增长。最近同军阀部队发生了几次摩擦之后，他指出：“我认为我们好不容易才避免了冲突。”他要求同时撤出所有的外国驻军；如果这样做行不通，美国就单独撤军，“因为我认为，一切被看作是我们继续呆在那里的事都是有害于美国利益的。”陆军部同意他提出的“最终撤离天津是明智的”看法，并且按时同国务院和公使馆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未能作出决定，因此第十五步兵团又在那里驻扎了十二年，后来发生了新的情况，美军的无能为力境地已十分明显，于是美国才撤回了这支部队。

史迪威 1926 年到天津任营长时遇到了一个人并与他建立了联系，后来这一联系对史迪威的前途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个人就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相识、现在的第十五步兵团执行长乔治·马歇尔中校。他们两位在中国任职的交叉时间只有八个月，但是这段时间足以使一种仅仅是相识的关系发展成一种互相尊重的纽带了。要是在另外两个人之间，这种关系可能被称为友谊，但是这两位关系密切的人物在这个阶段却没有留下多少互相谈及对方的话，况且马歇尔也不是一位容易称为朋友的人。马歇尔是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待人谦恭而冷淡，他在任何谈话结束时都冷冰冰地说声“非常感谢”。他几乎从来没有称呼过任何人的名字，连姓氏也常常搞错。由于他只适合作潘兴的门徒，按照第十五步兵团一个士兵的话说，他是“整个陆军中军人气派最足的人”。

史迪威一家抵达两天之后便到马歇尔家吃了茶，一周之内又前去接受“专门宴请”。史迪威借穿主人的大衣时毫无

拘束之感。马歇尔夫妇又一次举行宴会时，被邀请的一对夫妇迟到了。等候片刻之后，主人宣布进餐厅吃饭。刚刚端上汤后门铃响了。马歇尔制止了准备去开门的仆役头，亲自向门口走去，客人们只听到他说“对不起，宴会快结束了”，然后大门紧紧关上了。马歇尔没有孩子，渐渐喜欢起史迪威的孩子而且对他们很友好，但是他对大多数成年人却仍旧持冷淡的态度，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是“高高在上”的人物。

在马歇尔看来（史迪威这时的日记不知什么缘故仅限于简单地提到手球而已），正象他给潘兴的信中所说的，国民党的北伐看来很可能“不久就会迅猛进展，拿下华北”，公使馆“处境很不利”。甚至在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激进的鼓动者煽动起来的暴民刚好攻占并抢劫了英国在汉口和汉口以东一点的九江的租界。英国没有让汉口问题成为争端，而是撤走了英国国民并决定把增援部队集中在上海。英国人同陈友仁就放弃汉口和九江租界问题举行了谈判。这是他们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交出租界。可是那些顽固派却为此在他们的俱乐部里大发雷霆，整个大英帝国十分震惊。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传教士们，尽管对他们的活动有所区别，也再次同别的外国人一样遭到了袭击，被迫撤走了许多边远的布道所。

当蒋介石的军队向关键的城市上海推进时，共产党组织十万工人参加了罢工和示威，这就替他们打了仗，为他们开辟了道路，尽管军阀孙传芳的上海守军采取野蛮行动，砍掉了上百个人的头，他们仍然无法将罢工和示威镇压下去。各国租界看到了革命的幽灵。同中国有条约的列强之间开始进行疯狂的磋商。英国宣布要求派遣三个旅的兵力。美国害怕可能

遭到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的指责，谨慎地将二百五十名海军陆战队从关岛仅仅调到马尼拉，经过三个星期的犹豫之后才进而调到上海。当蒋的军队抵达城郊，上海宣布处于紧急状态时，又有一千五百名美国兵和一千五百名日本兵登陆补充有九千人的英军和上海义勇队。外国居民作了遭到围攻的准备，雇用了数百名中国劳工挖掘堑壕，筑起铁丝网障碍物和混凝土碉堡。

在这场危机的高潮时刻，荣获过国会勋章的英雄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率领五千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抵达中国。巴特勒是参加过从西班牙——美国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包括同围攻公使馆的义和拳的战斗在内）的每一次海军陆战队战斗的老兵。他到达以后向报界发表的一篇胆怯的声明立即触怒了他的同僚。他宣布，他的任务只限于保护美国人的人身安全而不是保护条约权利。这是柯立芝总统的国务卿、自学出身的律师和前明尼苏达州参议员凯洛格在1925至28年的中国动乱时期始终坚持的原则。他坚持认为，美军到中国来不是为了求得国际解决或维护条约中其他任何条款，仅仅是为了保护遭到直接威胁的美国国民。巴特勒将军拒不给上海以更多的指望。当记者问到需要多少军队才可以向中国发动一次足以将国民党的运动镇压下去的武装进攻，他清醒而现实地回答说："需要五十万。在进攻的第一年结束之前大概还需要增派一百万。"

3月24日，海军陆战队登陆的前一天，国民党军队进入了南京并且肆无忌惮地对外国人采取了一天可怕的恐怖行动，这一天后来作为中国同西方关系中的报复日而载入史册。

在这场暗中蓄意煽动起来的运动中，军队在城内横冲直撞，胡乱叫喊和开枪，袭击外国人，抢劫和焚烧外国人的私宅，打死六名外国人，其中包括金陵大学副校长约翰·E. 威廉斯。别的人都跑到美孚油公司的地产索科尼山避难，然后从那里越墙逃往江边的炮艇，但是只是在英国和美国的指挥官们苦恼地犹豫了一阵之后下令开炮阻止了进攻者时，这些人才逃上了炮艇。一位传教士的妻子赛珍珠同她的一家人躲藏在她帮助过的一名贫穷的中国妇女的一间棚屋里，听着外面残忍的声音，她想："旋风就要刮起来了……我没有作恶，但遭到了恶报……我们之所以躲起来逃命只是因为我们是白人。"

南京事件之后，传教士们再也无法装聋作哑了。他们象所有的外国人一样正在得到因为没有平等对待中国人而招致的恶报。随着南京"大屠杀"的新闻通过电报传遍中国和其他事件的相继爆发，他们逃到炮艇和通商口岸寻求保护。最后有二千五百人在上海和其他租界避难，五千人离开了中国。中学、大学、医院和基督教青年会有的关闭，有的被国民党人接管。后来在三十年代初期，传教士们又开始重返中国，但是人数从来没有达到南京事件以前那个时期的水平。

与此同时，各通商口岸拼命抨击南京暴行，大声疾呼要求实行"强硬"政策。各国公使馆极力要求惩办罪犯，赔偿损失，发出最后通牒，实行制裁，如果不顺从就计划采取惩罚性行动。难题在于无论当时还是以后，没有人确知应当由谁来负责：是据悉与蒋介石不和的地方司令官呢，是国民党的司令部呢，还是汉口的共产党人和激进分子呢？据推测这场袭击是共产党人和激进分子煽动起来的，目的是使蒋介石同外国人发

生纠纷。这是日本人的看法，日本人担心俄国会通过激进分子再次向中国渗透，认为蒋介石代表了日本人可以与之和好的一派人。美国公使约翰·V. A. 麦克默里报告说："日本人已经同蒋介石采取了措施，这看来肯定了他们之间的某种关系。"

一贯主张实行强硬路线的麦克默里坚持认为，对于这种形势如果不"采取坚决的对策，西方在东方的影响和利益就会完蛋。"凯洛格拒绝仓惶逃遁，尤其在令人震惊的上海事件现在显示出蒋介石是一位应当给与鼓励而不是与之作对的领导人时，他就更不肯走了。蒋看来不仅是中国终于出现的"秩序"的先驱者，而且是导致同合适的人才结成联盟的这样一种新做法的先驱。

在国民党人进入上海以前，各通商口岸普遍认为他们的进攻是"扬子江畔的红色浪潮"。外国人当时还不知道国民党右派和左派之间有深刻的分歧。鲍罗廷和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居于支配地位的汉口政府似乎控制了局面。但是，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如果要凭自己的力量取得权力，就必须获得只有与资本主义联合才能获得的收入和贷款。工潮、农民起义和排外暴乱使他们队伍内部的财主们和他们需要其支持的财主们感到惊恐。同国民党协作的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正忙于在湖南的二百万农民中组织抗租活动和反对地主的示威，而且毛保证，不久全中国将有"几万万农民……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蒋需要得到地主的支持。共产党组织者在上海的无产阶级和工会中也同样活跃。蒋决心不让这个商业、银行业和对外贸易的大都市象汉口一样落入左翼之手。上海成了不得不进行公开分裂的地方。

大约有三千人的国民党军队于3月22日开进这座城市，主要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而是靠市内的罢工行动和孙传芳军队士气低落望风溃逃。蒋介石乘炮艇抵达上海，通过他的老关系同商人和银行家取得了联系，并且由他作保获得了一笔贷款。他作为总司令，将北方军队的叛离军官吸收到他的军队里来并授与指挥权。其中很多人都是保定军校的校友，这些人参加进来加强了他对付左派的力量。他通过特务了解到革命派的计划。革命派夜里搜集武器，准备发动政变以取得控制权。在此关头，6月6日，张作霖的警察查抄了远在北京的苏联使馆，发现了说明苏联在鲍罗廷指导下插手中国内政的程度的文件证据。除了这些文件，有十九名中国共产党人，包括党的领袖李大钊，在那里被逮捕，后来以叛国罪被绞死。

蒋介石发动了规模更大的袭击。4月12日夜间，他在青帮特务和法国租界警察的协助下，对左派进行了血腥的清洗，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追捕一切可以找到的人，杀害了三百多人。革命原来是赤色的，现在转变为右倾了。蒋的突然行动是无法挽回的转折点。他现在走上通向统一的道路，但是他为将会成为对他的报应的潜在分裂创造了条件。汉口把他当作叛徒开除了，但是他在武装部队中占据着优势，并在南京建立了他自己的政府。

外国观察家现在认为，蒋毕竟不是赤色的，而是象凯洛格国务卿诧异而愉快地发现的那样，“显然是温和派的领袖。”因此，美国的政策便向后缩，不再追究南京暴行的责任，以免使他为难。凯洛格顶住了麦克默里坚持要采取惩罚行动的主

张，他还提出了“领导从根本上说，就是稳健加有力的行动”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原则。柯立芝总统也同样冷静。在合众社举行的宴会上，他对新闻记者发表讲话说，在革命时期不可能总是保护好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他“深信”，当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政府时，将“适当弥补我们蒙受的损失”。

美国之所以能够说这么多悦耳的合乎情理的话是因为舆论没有要求采取别的态度。副国务卿约瑟夫·格鲁对法国大使说：“我们确信，美国人普遍会完全反对实行任何制裁”。没有哪个蛊惑家出来把保卫西方在中国的条约权利的事弄成政治问题。情况恰恰相反。鲍拉参议员极力宣扬说：“富有争取独立与国家完整精神的四亿人民最终是不能征服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控制他们或使他们永远顺从。”

史迪威和住在中国的其他外国人不可能这么客观。当时，国民党军队过了扬子江以后继续向北推进，华北的外国居民设想济南、天津和北京会重演南京“大屠杀”。史迪威生性好从不幸的角度进行预测，他记下了关于仆人们是否可靠的推测，随时逃入天津租界的计划和“为妻子和孩子们在这样的时刻在这样一个国家会经受的风险而担忧的懊丧心情”。

北军的信心极差。吴佩孚没有同已经被任命为北方大元帅的张作霖合作。联合起来的军阀们也同以往一样互相争吵或者互不支持。第十五步兵团和其他外国驻军举行了紧急会议，研究如何确保他们各国在北京的国民的安全，并建议各国都把驻军的兵力扩充一倍。卡斯特纳将军通知陆军部说，为保证铁路畅通，总兵力最好能达到两万五千人。他建议陆军运输舰下一次（原定 5 月）把马尼拉的部队运来，然后把美国

妇女和儿童从华北接运回国。日本人把一个旅从大连调到山东的青岛。巴特勒将军断定北方的形势现在比上海的形势更危急，于是给天津调来了拥有四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的一个整旅。

这个旅的海军陆战队有二十架飞机和一些轻型坦克，这是其他各国的派遣队无法相比的，因而成了天津的奇观，这使第十五步兵团很恼火。当他们轻快而出色地从舰艇上卸下野战炮、迫击炮、榴弹炮、机关枪、筑垒沙袋、卡车、坦克、飞机和成堆的补给品时，步兵们却站在那里袖手旁观，故意装作满不介意的样子，其实怒火中烧。巴特勒警告说，他绝不容忍同中国人发生冲突，“如果哪个海军陆战队员对一个黄包车夫动武，就要受到军法制裁”。尽管如此，他还是不遗余力地准备随时解救北京。装载着机关枪、弹药和十天给养的卡车都加满了油，处于待发状态。加固了公路桥，以承受住坦克的压力。在白河河口修建了飞机场。巴特勒乘飞机往返于天津和大沽之间，注视事态。冬季来临时，他下令日夜生火，确保车辆用油可以随时使用。由于有这些安排，一营兵力可以在接到警报十四分钟之内乘汽车开往北京，飞机五分钟之内可以起飞。同各公使馆商定的计划是，一旦爆发排外运动，立即占领天坛，以那里作为外国居民集结点，然后用卡车和飞机将他们撤运到海滨。

5月间，由于国民党军队接近徐州，外国人的忧虑加剧了。徐州位于山东省界南面一点，是南北和东西铁路线的枢纽。在过去的传奇时代，人们习惯于把争夺徐州之战看作历次朝代更迭时的决定性时刻。中国有一句老话说：“得徐州者

得天下。”“天下”意即“普天之下”，也就是全中国。这个地方现在被山东的巨魔张宗昌的部队所占据。张宗昌就是那个“看一眼都危险”的人，但是他在这场战争中还没有站稳脚跟。如果徐州陷落，山东也难保；而山东一旦被攻占，南军就打到天津的大门口了。外国妇女和儿童现在要不要撤退呢？要制订什么样的计划呢？南军的进攻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史迪威事后写道，如果“攻势这样发展下去，我们把美国国民集中起来向海上逃跑就不适宜了。如果不是那样，甚至我们在北方的通商口岸里也遭到侵犯，那时又怎么办呢？如果南京事件重演由谁负责任呢？”

美国公使馆需要获得关于南军真实兵力的第一手可靠的估计材料，更不必说需要关于北军的材料了。来自新闻记者、领事馆人员和传教士的消息都太不可靠，无法据以判断局势。虽然鉴于排外狂热日益剧烈这项调查任务是危险的，但还是必须派一名美国军人亲自出马。这项任务没有落到武官约翰·马格鲁德少校或武官处其他人员身上，却落到了第十五步兵团的史迪威少校的身上。史迪威了解中国，精通汉语，以前作过惊险旅行，有公认的坚韧精神。此外他还具备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愿意去，虽然这样就要丢下四个孩子和不久即将生第五个孩子的妻子。

一到徐州他就要亲自去见那位大名鼎鼎的可怕的张宗昌，亲自向他递交身份证件。张青年时期当过搬运工，身高二米一多一点，绰号叫“三不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多少兵，多少姨太太。据说他有四十二个姨太太，包括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二十一个白俄和一个邋遢的美国人。他每次出

发作战都要用两节专用火车厢拉着她们同去。……他维持着一个养着许多军官的奢华"衙门",吃饭也十分铺张,用的是比利时雕花玻璃餐具,每餐必备白兰地、香槟酒和四十道菜。他自吹每顿饭要花五万美元。出战时他的专列火车单有一节平板车为他拉着一具雕刻华丽的油漆麻栗木大棺材。他夸口说,如果他不能征服敌人就躺在这具棺材里回来。但是他从上海回来时是坐在棺材上面的,还带着几分醉意,吸着烟。在他的统治下,1927年山东发生了饥荒,不是因为水灾或旱灾,而是因为这位督军的掠夺。

5月26日晚上,史迪威登上了开往徐州的火车。与他同去的是一个姓赵的中国仆人。史迪威事后写道,没有赵他可能回不来了。"当他的同胞都喊着'杀掉他们'的时候赵为什么要自找麻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效忠一个'老毛子'(对外国人的通称)呢?"史迪威也无法作答,但是他承认他对"一个勇敢而忠实的人"怀有敬意。在形势变得险恶时赵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安全地逃走,但是他没有逃。

当火车隆隆地驶过边界进入山东境内时,史迪威看到了显示局势动荡的迹象。插着安全通行旗的马车在火车站等待雇用,这个迹象表明当地的安全是没有保证的。这些马车事实上是敲诈车主的匪股搞的赚大钱的行业。满面忧虑的村民在修补他们的土墙。"原会为小事情而吵吵嚷嚷的时候,现在却是一片不祥的寂静。"火车继续行进,不久就看到了北军的军人,"漫不经心的样子、冷漠的神情……队伍杂乱……没有建立过任何阵地的迹象。"铁路停车场里的车辆"破烂不堪……每个机车库都有一两个机车残骸。"

翌日天黑以后，他们到达了徐州，看到城内拥挤着携带各种武器和有各种军阶的军人。那位军阀的骑兵队中的醉醺醺的大兵和脸色阴沉的白俄在大街上摇摇晃晃地走着。这两位旅客受到了粗鲁的回答，旅馆没有空房。赵建议找当地的基督教青年会，结果他们睡在会长汤先生家里了。正如他们第二天上午所见，徐州由于屡遭战争的洗劫，已是“一片废墟”。被饥荒和兵荒赶出家园的流浪者露宿街头，食物是由人施舍的，街上躺着的死尸无人过问。“我们同别的过路人一样从尸体上跨过，依旧走我们的路。”史迪威看到十五个瞎女人互相牵着手走路；此外只看到几个老太婆，没有再看到别的女人，因为所有的人都惧怕军人，闭门不出。除了身上穿的破衣服和几只煮饭的瓦罐子以外一无所有的难民“不去行乞；他们只是坐在那里，以绝望的目光看着这个难以理解的世界。”他们靠配给的一点点豆饼糊口。史迪威写道，在满洲豆饼是被敲碎当作肥料和猪饲料用的。这些难民过去都是辛勤劳苦的农民，但是他们眼看着“自己的大车和牲口被夺去供军队使用，儿子被征去当兵，粮食被蝗虫一样的军人吃光，住宅被拆去当柴烧，妻女遭污辱，孩子失散。这是中国战争的最悲惨的情景。”由于目睹了中国长时期的无穷苦难，史迪威描写这些情况时真实而富有同情心，与他就美国社会问题所表述的平庸之见迥然不同。

由于求见张宗昌不得，他便在市区四处游逛起来。北洋军阀的军队中为人惧怕也深受赏识的助手“俄国佬骑兵队”在大街上奔驰而过。他们身穿深绿色（几乎是黑色的）军装，脚登没过膝盖的黄皮高筒马靴，携带着各式兵器：马镫插套上插

着三角尖头的长矛，挎着有木制枪套的长筒毛瑟手枪，背后的刀鞘中插着大刀。这些无国家的凶狠残忍的人是“我见到过的最凶恶的家伙”。除了这支大约一百人的骑兵队以外，为这位督军效劳的还有一个由涅柴耶夫将军率领的步兵旅。这个旅约有三千人，备有四列装甲火车。

在徐州火车站的停车场里，史迪威发现有二百节车厢、二十辆机车和三列由俄国人担任机车组人员的装甲列车。他在设法辨认部队番号和估计兵力时推测，每一百个士兵中只有三十人有枪。在教练部队里半数人有枪，另一半人赤手空拳。在一个有二百到二百五十人的“稻草人”连队，百分之二十的人身高在一米四以下，许多人不到十四岁，都很肮脏，有些人赤着脚，总共才有五十支步枪。“不管怎样想象，你也无法设想这群乌合之众到作战时除了逃跑还有他途”。有人对他说，这些北洋兵又不肯打仗；他们都惧怕“红枪会”。红枪会是从乡下人中选拔出来的抵抗战士团体。他们是被到处烧杀抢劫的军人逼得走投无路才组织了红枪会的，专门袭击他们对付得了的小股散兵。他们杀起人来毫不留情，给受害者造成重伤，使他活上四、五个小时后死去。

食物日益缺少。赵到处搜寻，弄来一些罐头食品。军队正在为大调动作准备工作，这一点越来越明显。史迪威不断在两个火车站和停车场观察动向，计算各类枪炮的数量和口径，记录运兵列车的数目，设法从混乱中“推测出”张宗昌打算干什么。他从“大兵们”嘴里得知，有些部队已经五个月没有发饷，有些甚至一年没有发饷了。他们的给养是馒头、米饭和白开水。他还获悉冯玉祥已经占领了控制东西走向大铁路西

端的郑州。这个消息既是确实的又是重要的。

冯玉祥在去莫斯科呆了一年之后回来再次统帅国民军。这支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军队有二十万人，是他原先在陕西建立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总战略中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力量的北翼。同这支力量汇合是国民党的重要目标，但是现在还弄不清楚冯将选择汉口的那个共产党——国民党左翼联盟还是会选择蒋介石。史迪威试图跟上冯变换盟友的速度，连中国人对此也难以捉摸。史迪威判断："他欺骗每一个人完全是为了他自己。"但是史迪威也承认，冯是"真正的军人"，"绝不允许他的部队欺压人民"；中国如果有十个这样的指挥官，动乱就会结束。正当汉口和蒋介石都在同他谈判争取与他联合时，由于北军的各种违约行为，冯攻占了郑州，迫使该地区的北洋军队撤退到黄河以北，从而使徐州失去了屏障。这种局势迫使张宗昌不得不退却。

史迪威赶到电报局去给公使馆报信，但是他已经迟了。电报局已经关闭，电报员都逃跑了。第二天，也就是他到徐州的第四天，事情已经完全清楚，北军开始撤离。他计算半小时之内有六列火车开走。他们一走，南军将蜂拥而至，一个外国人很可能被处以私刑。他现在想的是同赵尽快溜之大吉。督军的火车都在停车场里，但是不允许他们上去。他们试图硬挤上一辆拥挤的运兵车，但是被赶了下来。他们想用钱活动，结果也不灵，因为士兵们自己都急于离开，不肯让出自己的位置。督军的列车刚开出车站，史迪威可以感觉到他周围的一群士兵更加惊慌失措。"他们的长官们何时才能使他们离开此地？……要控制住军人现在是难以办到的……每个人都很

暴躁。”军队把“拼命赶来上车的迟到者”塞在余下的几节车厢里；“车梯上、车厢之间，到处扒满了人。车子开动后会有许多人被甩下去的……”他正在观看时有一个人掉在已经滚动的车轮下，躺在那里等死，因为“没有医生，得不到任何急救，只有一伙好奇的苦力拥挤在他周围”。

现在已经太迟了，无法同这些北方人一起离开了。他怎么办呢？徒步走？能走到西面大约五十英里的冯玉祥那里吗？但是要穿过红枪会的活动区域。“他们是不会优待我们的。”往东去呢，红枪会的人更多，“还有俄国人，我害怕这些俄国人”。唯一的办法是坐等南军到来。“这个前景同俄国人一样使我非常恐惧。”基督教育年会会长汤先生承认他是南军的同情者；他说留下来比走要安全。

那些火车离开以后一连两天“全城人都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下一个浪潮翻滚过来……一场瘟疫过去，难道只是为了让另一场瘟疫再来折磨人吗？”北军的后卫队过来了，他们开枪、掠夺、大喊大叫，夜里闹得更凶。在他们之后过来的是“一支正在退却的中国军队的可怜的残余——伤病人员。这些人挣扎着往前走，可是唯一的前景是死于等待他们的红枪会之手。”店铺关闭了，骡子卖三百美元一匹，根本无粮食出售。入夜，“全城陷入一片混乱。警报器发出了刺耳的叫声，大兵们喊着，野战炮、步枪和手枪齐鸣。只有很少几颗子弹经我们这个方向呼啸而过。”一架飞机飞来投下几颗炸弹。留下来躲在装甲火车里面的俄国人最恶劣。他们开着火车（车上有机枪，最后一节车厢里架着一门舰用火炮）在铁路线上往来奔驰，“开枪开炮吓唬人，然后偷走一切拿得动的东西。”当村民用拆

除铁轨的办法阻止火车时，这些俄国人把离被破坏的轨道最近的“一个村子的人几乎全部屠杀了”。由于每天都去停车场观察，史迪威又看到一个孩儿兵被火车轧伤，躺在一张席子上等死。他的心里对中国人的冷漠态度充满了愤怒和怜悯之情，而且猛烈地爆发出来：“在这里过上一个月左右，你就想用毛衣针戳他们的眼珠子了。”

6月2日上午，汤先生进来说，国民党军队到了。他们行为规矩，不打人，也不抢劫，但是赵坚持史迪威不要露面。左邻右舍谁都知道汤先生家里有个外国人；史迪威也想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把他在这里的情况报告给那些军人。他设想一批人会闯进来搜寻这个外国人，因而他常常设法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事上。他躲藏了四天，除了绘画外无事可做。他烦躁了。“必须想个办法，徒步南下看来是唯一可行的计划。”又过了一天（在这一天里，他依靠跳半小时木马的办法“避免发疯”）以后，他决定“无论如何要离开这里”。汤先生也越来越冷淡了；也许后悔不该留这个外国人住宿。他藏到第六天时，赵终于同意试一试。他们走出去同南方兵相识。那是“一群快活的人，大部分是几乎不满十六岁的少年，小个子，窄肩膀，体重很轻……所有的兵都接受了许多亲美的宣传。他们认为美国会积极帮助他们。”市内挂着国民党旗和表示欢迎的标记，店铺已重新开业，妇女重新出现在大街上，木匠忙着修复毁坏的建筑物，但是死尸和垂死者仍旧躺在胡同里，难民的临时棚屋里到处是饥饿、肮脏和疾病。“这座城市里的景象是不可怕的。”

事实证明，国民党军队不象他想象的那样残忍，所以史迪

威决心南下去上海。北京军队带走了他们搜集到的全部铁路车辆，但是有消息说，次日将有一辆南去的火车。经过同等待上车的疯狂的人们拼命拥挤，拼命争着上车，又遭受了大蒜臭气的熏呛之后，他和赵终于挤上了车。他们在车站停留了三个小时等待开车，沿途又熬过了一些恼人的停顿与拖延，他们于早晨三点钟到达蚌埠站，距离扬子江和可能发现的外国军舰还有很长的路程。乘客统统被赶了下去；这列车显然不再前进了。天还没亮，他们都被丢在站台上。

在此后的三十六个小时里，使人难受的恐惧心理将一直使史迪威无法摆脱。他同赵又饥又渴，被困在人地生疏的地方，不知道会不会再来一辆南去的火车，也不敢向别人打听，因为怕引起注意。他们也不敢冒险去寻找吃喝的东西，担心会误了车。他们担心等到天亮时会有更多的人来，而且会使史迪威更显眼，容易被人看到，但是却没有别的办法。早晨六点钟，几节货车被推上南去的轨道。他们在尽量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夹在新的人群中挤上了车，在一节旧煤车里找到个可坐下的地方。史迪威感觉其他乘客都在盯着他，预感随时会有人突然喊出“老毛子！”或者出现一名乘警或官员把他揪下车去检查。气温高得烤人，车厢里也开始“脏起来，到处是鸡蛋皮、鼻涕、籽粒、茶叶、水、痰、果皮和中国佬会丢弃的一切垃圾”。此外还要忍受“吐痰、咳嗽、打嗝、擤鼻涕、吸食和哼哼的声音”。这些已经够受的了，但是更糟糕的是人们的窃窃私语和向他投来的冷眼。他们又饿又渴，可是每一站都不敢下去，恐怕无法再上车。

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名检查员——“一个佩戴一小

块表示赋予暂时权力的标志的粗野苦力”搜查了史迪威，得意扬扬地发现并拿走了他的手枪，并在乘客们面前挥动着，好象在说他查获了一名罪犯、一个间谍、一个来谋杀蒋介石的刺客。人们低声议论起来。“怎么处置他？拉下去枪毙。”已经被解除了武装，而且除了赵以外只是孤身一人的史迪威感觉到敌意在向他逼近。那个检查员在下一站下车报告去了；周围的敌意也表现出来。雨伞戳到他身上，茶水泼到他的腿上，还有个人在他的背上吐了一口痰。他突然意识到：“他们想使我对他们有所行动。他们希望我反抗，”以找到攻击的借口。结局可能是杀害。“赵的警告眼色证明了这一点。他慢慢地摇着头，暗示我‘不能反击’。他吓得要死，不是为他自己想，而是为我担心。”戳刺、偷偷地捉弄和污辱还是一直不停。史迪威压制住一腔愤怒。在一次停车时，那群人争论着是“现在把我们拉下去枪毙呢，还是到浦口（最后一站）时把我们交给当局处理”。赵抓住这个时机说：“对了，逮捕我们。到浦口把我们交给当局。我们要求这样。这位外国人是个权威很大的人物，谁要是伤害了他就会惹起很大的事。”人们咒骂他是外国人的走狗，但是这群人还没有来得及采取行动火车就开动了。赵想出了他该讲的话。他要求把他们带去见蒋介石本人。“我们将要告状；我们要报告发生的一切。”污辱和戳弄停止了，但是还是扬言到浦口就逮捕他们。

史迪威决定使这群人来不及为所欲为。火车一进入与南京隔江相望的浦口，他和赵不等停车便跳了下去，穿过惊异的人群向扬子江边跑去，他们感到有人在背后追赶，可是又不敢向后看。他们跌跌撞撞地匆忙上了一条渡船，到了对岸便放

慢脚步，在一双双猜疑的眼睛的注视下，寻找住处。金钱说服了一个心里害怕的店老板租给他们一间屋子。由于过度疲乏和干渴，他们一进屋就一壶接一壶地喝起茶来。史迪威很难为情地发现，当他拿着茶杯伸手接水时，他的手还在颤抖。紧张心情并未消失，因为洋鬼子到来的消息使一群人聚集在街上；史迪威再一次想象可能被抓去或受私刑。忧虑、臭虫和跳蚤使他几乎彻夜未眠。第二天早晨再次经受了在街上行走的艰难和危险，但是他们顺利地到了火车站并乘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这段行程燥热而紧张。抵达上海时，他们看到墙上有一幅巨大的招贴画，画着一个肥胖的、面目可憎的外国人，伏在地上，中国士兵把刺刀刺进他的后背，鲜血四溅。画上的解说词鼓动所有的爱国者起来杀死这些外国猪猡。

穿过车站出口，走过站岗的哨兵，史迪威可以看到广场对面公共租界的铁丝网围墙和安全之地了。这段距离只有一百英尺，不过三十秒钟的路程。“我们穿过广场时两只脚上好象绑着五十磅重的东西；然后走进了铁丝围墙……终于到了我们自己人这边了。”一条小舢板送他们登上“匹茨堡号”巡洋舰。在军舰舷梯的顶端，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在站岗；“我，一名美国陆军军官，真想扑上去拥抱他！”

史迪威返回后呈上的报告给了这些南方军队很好的评价，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他在军事上是很客观的。他说，他们的士气高涨，军纪严明，信心十足。他们都是高高兴兴地服从命令，不掠夺，受到人民的欢迎，妇女敢于出来就是凭证。他们的连级军官是十八到二十二岁的学生，坚定不移，与张督军部队中那些“废物”截然不同。那位督军部队的连营两级军官

大多是没受过教育的苦力。这支南方军队与那些北方军队相比虽然武器装备不足，然而他们在任何战斗中都能打败督军的"乌合之众"，但是他预言他们由于缺少运输车辆，只能打到徐州。他们没有把任何车辆运过扬子江，而是靠马车和驮畜运送补给品。他们一旦能使用铁路，就会向北挺进，不大可能遇到坚决的抵抗。张宗昌的军队除了那批俄国人以外，根本没有战斗力。"依我看，南军只要毅然进攻，张的军队就会瓦解。"

在美国公使馆，麦克默里欢迎了关于当前形势的第一份可靠的情报。他听取了史迪威的叙述，看了他写的报告，"十分钦佩"他的"钢毅品格"。卡斯特纳将军因他具有"最高的办事效率、杰出的军事知识和英勇善断"等长处给他以正式的表彰。这个思想不平静的人是懂得史迪威的英勇行为的真正可贵之处的。他说："同战友们一道作战时表现英勇是常见的，但是任何一个人要想象史迪威少校那样在孤独无援的情况下，深入两支敌对军队中同数百名无知且怀有敌对的排外情绪的中国军人进行密切接触，则需要大得多的勇气。"史迪威大概是唯一兼备军事知识、对中国的了解和那种"更大的勇气"的人，因而才能到徐州去执行这项任务并且平安归来。

史迪威的第二个儿子，即他的第五个孩子、后来他所溺爱的本杰明，于7月即他返回北京一个月以后出生了。9月，他动身去朝鲜和日本度过三周的假期。在朝鲜，他爬山，经过一个又一个清水塘，"跳水潜泳一次……坐在一块石头上，光着身子吃午饭"。在日本，他在京都四处周游，吃喝，谈话，观看，采购，搜集自己爱好的东西。他回来时发现不出自己所料，北

伐在徐州停顿下来。北伐军不仅缺少车辆，还遇到了别的问题，因而在1927年没能继续前进，而且在年底前几乎完全陷入了派别斗争。冯玉祥的归顺使蒋介石于6月份占了上风。由于理论上的争论而矛盾重重的汉口政府进而被共产国际拙劣的命令分裂了，致使国民党左派同共产党人分道扬镳。当汉口的军队、张发奎将军的著名的"铁军"第四军采取独自行事的态度并开回故乡广东时，设在到处是废墟和一片惊恐气氛的汉口的这个政权瓦解了，革命统一战线就此告终。不肯屈服的共产党人在江西首府南昌建立了一个短暂的政权，发动了一次军事行动，失败后继续向南退却，在建立广州公社时进行了三天流血斗争，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疯狂努力。在遭到蒋介石军队追击和被打死很多人的情况下，剩下来的残部退到江西和湖南的农村去夺取立足之地，以求生存。

此时蒋介石已开始丧失公众最初对他的热情欢迎。他同资本家的联合使他落入了圈套，不得不发动完完全全是白色恐怖的镇压共产党运动。搜查、没收、出版检查、野蛮的逮捕和处决使原来相信国民党许下的改善生活的诺言的许多人感到惶恐和失望。捐税仍然繁重，武装部队仍然遍布各地。这场民族主义运动已经被妥协和掌权之后的腐败行为搞垮，看来同袁世凯当权时期以来的任何势力没有什么区别了。

由于面临着汪精卫和左派势力重新出来争夺领导权的挑战，而且8月份在军事上又遭到了挫折，蒋介石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辞去职务并到日本去，以等待人们把他当作不可缺少的人物再请回来。在这段空白时期，很快就发生了分裂和混乱。汪精卫和孙夫人的哥哥宋子文又在广州单独建立了一个政

权。但是由于无可奈何，他们在 11 月间便向蒋介石发出了邀请。当各党派在 12 月份忙着讨论实现统一的交易和条件时，这位领导人物与宋子文和孙夫人的妹妹、非凡人物宋美龄女士结了婚，从而改善了自己的地位。

宋家是上海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富有家庭，这家人受过西方教育，与孙中山博士有极受崇敬的关系。母方信奉基督教已有三百年的历史，始于耶稣会会员最早展开劝教活动的时候。这一家的父亲、孙中山的朋友和支持者宋耀如或叫查理宋，是在美国长大的，也是在美国受的教育。他回到中国是为教会工作，可是却积累了家产，在法国租界建造了一栋修有整洁花园和一个网球场的洋房，养育了六个孩子。这些孩子全是在教会学校和美国的大学受的教育。长女霭龄嫁给了奥伯林学院毕业生、银行所有人孔祥熙；孔出身于山西一个自称是孔夫子嫡系后代的豪门。次女庆龄成了孙博士的第二位夫人和遗孀。小女儿美龄毕业于韦尔斯利大学，她有追求慈禧太后那样的权势的习性。这三姐妹都很聪明、漂亮，而且象许多中国妇女（与日本人截然不同）一样意志坚强。

蒋介石对这些财产垂涎三尺，因而孙中山死后据说他曾通过中间人向孙夫人求婚。遭到拒绝以后，他又打美龄的主意。为了博得她的欢心，他抛弃了一个早先的妻子以及他儿子的日本母亲，而且在宋老夫人坚持下，改信了基督教，这就获得了很大的顺带好处——教会的长期支持。1927 年 12 月 1 日，他们先在宋家举行了不公开的基督教仪式，接着在大华饭店舞厅里举行了盛大的世俗婚礼；宾客达一千三百人之多，其中包括美国的亚洲舰队司令布里斯托尔上将和一些外国领

事。大厅里悬挂着孙博士的巨幅画像，两侧有国民党党旗。大厅内外布置了数十名侦探和卫兵；用玫瑰花组成的钟形天棚笼罩着南京政府教育总长主持的婚礼仪式会场。新娘在四名身穿有小珠子的桃色缎子衣服的女宾相和身穿黑色天鹅绒衣服与白缎子V形装饰的两名童男童女(孔夫人的儿子和女儿)陪同下，离开她哥哥宋子文。这时一位男高音歌手唱起了《阿，答应我》，电影摄影机拍摄下婚礼的场面。蒋的地位现在稳固了。1928年1月，他被重新指定为国民党军队总指挥、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因而也就成了改组后和重新统一起来的南京国民党政府首脑。在宋子文通过他的财界关系弄到的收入的支持下，于4月份恢复了北伐。

在北方，吴佩孚已经退出联盟，现在张作霖是聚集在安国军旗帜下的各督军军队的大元帅。张作霖12月自称执政官以后又染上了袁世凯的弊病，滋长了称帝的野心。他主持朝政时坐的是帝王宝座一般的椅子，两侧各有一只用虎皮填制成的逼真的老虎。他任命了负责宫廷礼仪事务的礼部；请一些艺术家重新设计了一套皇家瓷器；仿效传统的帝王习惯，外出时街上行人要回避，店铺要关闭门窗，路上要撒"金沙"。在一个短时间内，苟延残喘的清朝贵族和遗老们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但是张的命运，尽管对中国是重要的，却是注定登不上王位的。

1928年1月，由于第十五步兵团团部内部的纠纷，史迪威在卡斯特纳将军的要求下被调到了参谋部，任总指挥的代理执行参谋长。这一代理职务于7月份成为正式职务。卡斯特纳同纽厄尔上校以及包括他的参谋长在内的另一些人之间

的争吵变得激烈起来。据史迪威日记记载，这位将军一度患了“神经衰弱”，时常产生幻觉。史迪威充当了抚慰人的奇异角色，成了这位心神不定的固执的司令官唯一信赖的军官。他的偏执的专横态度不断加剧别人的反感。这种情绪由于他坚持训练士兵行军要超过条例规定的每小时两英里半的速度而终于爆发出来了。他每年两次亲自严酷地规定速度，带领全团(军官也要下马步行)练习急行军。这种急行军虽然从未达到过他确定的三天走一百英里的目标，但是却达到了十小时走三十五英里的速度——当然损耗是相当大的。精疲力竭的士兵们摇摇晃晃地坚持到最后，有些人拉着或背着战友走，决心不让卡斯特纳满意地看到终于有一个士兵走不到底了。团内许多人认为，卡斯特纳搞急行军目的在于使文质彬彬的纽厄尔上校掉队，但是纽厄尔从来没有掉队。史迪威走起来自然毫不吃力。

当纽厄尔等人试图以精神有毛病的指责搞掉将军的职务时，卡斯特纳要求史迪威替他作证。在史迪威任期的后一段时间里，驻华美军司令部内一直没有中断堪与中国政局动乱媲美的乱子。马歇尔已经走了。他于 1927 年 5 月回国任本宁堡步兵学校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并着手实行了一项旨在改革课程和改善教官队伍的计划。他希望史迪威担任战术科主任(仅次于他本人的重要职位)，他把这个职位一直空留着以待他回国担任。

1928 年 5 月，史迪威晋升为中校，并受到《哨兵报》的祝贺，说他是“驻华美军中最著名的军官之一”。他被认为是第十五步兵团的中国问题专家，起了教师的作用。除了担任语

言学校校长以外，他每个月还要在娱乐厅介绍一次中国形势。一位听讲者称他是“才华横溢、眼光敏锐”的演说人，对中国的纷争了如指掌。更重要的是他对《哨兵报》的影响。中国正在民族痛苦中挣扎，处在这样一个国家之中的这家报纸终于开始认识周围的环境，每周请史迪威写一篇头板文章，介绍“中国风云人物”。他的连载文章反映了一位住在中国的美国人当时所了解的而且他得去对付的事件。即使他的文章有时因为观察距离太近而曲解了历史，但却没有事后歪曲的事。

史迪威的连载文章是 1928 年 1 月开始的，第一篇写的是张作霖。他的结论是，张的前途不光明。在 1928 年 1 月到 6 月形势动荡的致为重要的半年里，史迪威一周接一周地写下去，他赞同公使馆对国民党人所持的怀疑看法，而不赞成美国国内的人“感情色彩很浓”的见解。他认为，这些人对中国一无所知，误解了中国革命。

他怀着关注“老百姓”的心情写了这样一些情况：人民要缴纳沉重的苛捐杂税，生命财产没有保障，铁路被毁坏，商业凋蔽，土匪遍地，饥荒不断，“没有一省……人权得到尊重”。历来被认为总是在民族危难之际应运而出的伟人“还没有出现”。两个月以后，1928 年 4 月，史迪威在专门谈蒋介石的一篇文章中说他只是一个派别的首领，而不是一个党的首脑。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个能把中国整顿好的人物。他赞扬蒋“果断，有干劲”，断定如果他获胜“那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自己的智谋”。他的北伐“简直是一次游行而不是一次出征”，他们向前推进，而得不到军饷的北洋军队在他们到来之前就已经“偷偷弃城而逃”。

史迪威经过观察归纳出中国人作战的基本原则。他写道，山东督军张宗昌这位中国最伟大的“战略撤退”大师确实名不虚传。战略撤退问题是史迪威本人后来沮丧的主要原因。战略撤退与他在马罕建立的西点军校和在潘兴统帅的美国远征军中被灌输的进攻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战略撤退和进攻精神反映了两国文化上的根本性抵触。

1928年5月，突然发生了一次激烈的外国干涉；史迪威立即看出了这一行动对未来的重要意义。当时国民党军队已再次北上。当他们沿铁路从徐州开往济南时，日本人指责他们袭击了日本国民，从早已在青岛登陆的五千人的军队中派出两千人前去“营救”。在双方各有伤亡的几次冲突过程中，日军屠杀了国民党派驻山东的外事专员和他的妻子及十四名军官，企图借此激起报复行动，或者说引起足以提供公开发动战争的口实的“事件”。冲突发生之后，日本人向国民党军队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他们撤出济南。

中国可能统一的前景已使日本人开始担忧了，因为中国一旦统一，其民族主义情绪可能蔓延到满洲。田中男爵这时充任内阁总理兼外交大臣。此人即使不是1927年制订的称为“田中备忘录”的著名征服计划的作者，至少也是赞同这个计划的先驱。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计划阐明了日本前程的军事构想，即相继侵入满洲、蒙古、华北、全中国、东南亚，最后主宰整个亚洲。蒋介石并不想试验一下这个计划。当时日本的六艘军舰、八条运兵船和满载弹药和补给品的货轮就停泊在青岛沿海。不论蒋多么想登上伟大统帅的宝座，他也不能自欺地认为他的军队是拥有现代装备的日本军队的对手。他

坚持了打到北京和统一中国的目标，慎重地保存了他的军队，调头离开山东，渡过黄河，从西线向北京进发。但是中国人民没有甘心忍受这一事件。日本污辱中华民族自尊心的这根“无法忍受的刺”再次激发了以前在山东问题上的反日情绪，再经标语口号的煽动，反日情绪发展成了长达一年之久的抵制日货运动。

在5月11日的《哨兵报》上，史迪威谈到了济南，认为那里的局势“大概是多年来最危急的局势”。他对反日鼓动没有给予多少同情，认为这样做使最终解决问题更为困难，因为即使中国各派团结一致“他们也敌不过日本这样一个组织严密的强国”。他写道，中国人“可以无动于衷地注视中国人对中国人采取的极不公平和残酷的行动”，但是一同外国人发生纠纷，“街头巷尾就到处可以看到爱国的雄辩家们在激昂慷慨、大声疾呼地进行反对外国压迫和争取本国人权利的宣传”。他指出，日本人如果被激怒，可以轻而易举地攻占从天津到上海的所有要地，控制铁路和扬子江——十年之后他们果真实行了这个计划。史迪威认为，在济南事件之后将发生“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事件”。

不出一个月，第一个事件便发生了。随着北军抵抗的瓦解，张作霖看到他的称帝美梦破灭，意识到必须回去守卫自己的势力范围，即使他在北京并未等待过久。他退回了满洲，乘坐的是自己的私人列车，有二十节车厢满载财物，后面跟着京奉线拥有的绝大部分车辆。一连三天，机车、客车、守车、豪华的卧车和货车拉着他的军队从天津站隆隆驶过。他离去后天津站成了权力真空；第十五步兵团和其他驻军便承担起守卫

任务。6月4日，首车在接近奉天时被一颗炸弹炸毁，张作霖被炸死。谁都确信是日本人把他干掉的，这可能是由于日本人担心他会与蒋介石言和，也可能是因为他会拒绝依他们提出的条件给予合作。无论是哪一种原因，他们眼下做得太过份了，以致张的儿子、少帅张学良几个月以后设法暗杀了两名亲日派部长，在满洲举起了国民党的国旗。

北伐军终于到达了北京，北伐的目标实现了。国民党人同地方督军们达成了协议以后，于7月3日正式接管这座前京城，部队在面无表情的旁观者(一位目击者写道)"可怕的沉默"中走过交民巷。与高大的北方军人相比，蒋的军队"显得瘦小和疲于战斗"。在此同时，他们冒着使阴凉处的气温都升高到摄氏四十三度半的烈日接管了天津。正如美国领事报告的那样，其后的几天里人们到处交谈、呼喊，各种奇怪而复杂的政治委员会和政府机关到处干预，"我们又陷入了新的混乱之中"。蒋介石到西山上的孙中山陵墓作了礼仪性的拜谒，向他报告他要统一中国的梦想——至少在名义上——已经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实现了。

废除不平等条约仍然是首要的目标，列强也愿意作一些让步，理由是这样做会使新政府获得威望并有助于稳定局势。美国首先朝着修改条约的方向迈出了一步，经过谈判，于7月25日签订了一项条约，规定——就美国而言——将关税自主权归还中国。10月10日，即革命十八周年纪念之际，国民党政府有了国民政府的权利和称号。这个政府实行的是一党制，并将根据孙博士的计划在以军事手段实现统一之后进入"训政"时期。最高统治权掌握在党的手里，执行权掌握在拥

有三十六位委员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手里，实权掌握在常务委员会手里，该委员会主席是武装部队总司令蒋介石。要说这并不完全是中国的西方朋友心目中的那种民主，可是他们还是佯称这就是西方的民主。中国在西方传统的影响下也采用了西方的这个词儿。可是民主的观念本身却始终没有进入中国的理论范畴。

北京改名为北平，即“北方的和平”而不是“北方的京都”，因为新政权不准备在这里建都。政府仍然设在南方的都城南京，部分原因是感到离开自己的军队所在地是不安全的，在北方维持一支吃大米的南方军队是负担不起的；另一部分原因是北京使馆区的状况是一个“使人丢脸的”因素。

蒋介石为保卫自己的胜利成果立即采取行动，着手控制一个极大的危险——私人军队。这些私人军队中的军人在这个国家到处掠夺，存在这些军队使任何中央政府都无法确立自己的权威。7月，他召集冯玉祥、阎锡山和白崇禧（他们各自控制着约有二十三万人的军队）到北京举行遣散会议。他们达成协议，国民军不超过六十个师（每个师一万五千人），共九十万人，而现有的武装部队总人数是二百二十二万五千人。划定了六个遣散区，但是事实证明，到真正行动时，这些将军没有一个愿意裁减兵力。第二次遣散会议于1929年1月在南京举行，也没有取得结果。这些首领回到各自的地盘以后依然是独立行事的靠不住的盟友，有时还成了敌手，而不是臣下。在以后的几年里，联盟、宗派和叛乱活动仍然象以往一样继续存在着。南方两广地区的李宗仁、白崇禧和张发奎的军队，北方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军队，时而结盟时而对立，时而联

合甲反对乙，时而联合乙反对甲，时而拥蒋时而反蒋，从来不曾为共同事业而奋斗。1931 年，广州又极其不可思议地支持了顽固的汪精卫领导的分裂政权。蒋介石的政府将永远无法摆脱这群人中的敌对成员的挑战，永远也不会完全安然居于权威地位。他要统治下去就得讨价还价和施展计谋，使挑战者穷于应付，而自己则稳坐钓鱼台。

1928 年年底，史迪威认识到遣散是个“真正的问题”。他在《哨兵报》上指出，宣布了的协议不过是一纸空文，私人军队实际上在召兵而不是在遣散。史迪威在根据他本人的看法总结新政权上台以来的情况时写道，现在人们总是期望国民党政府取得最出色的成果，认为中国现在统一了，政府是称职的和负责任的，已经进入了建设时期。然而，应当看看“冷酷的现实”。边远省份仍然在进行个人之间的战争，并未归顺南京。国民党内激进派与保守派的冲突尚未解决。在军队隶属于文官政权以前，遣散是做不到的。本来应当用于工业化建设的百分之八十的税收却用来供养武装部队了。虽然现在国外的宣传在为国民党说好话，史迪威仍然怀疑能否取得真正的进展。

史迪威特别注意两个因素——济南事件和遣散（或者说无法遣散）问题。这两个因素的发展对中国关系重大，最终将影响中国以及他本人的历史。要能看出这一点，并不需要有先见之明，只要在中国现代历史大转折的两年半时间里有兴趣、有意识并乐于亲自观察中国的现实情况就够了。

史迪威于 1929 年 4 月带着东方手球锦标赛冠军奖作为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收获回美国了。

第六章　“醋性子乔”

1929—35 年

史迪威于 1929 年 7 月来到本宁堡步兵学校任战术科主任，当时“本宁改革”在马歇尔的推动下正在进行。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把依靠作战教范和教室内的纸上谈兵的教学法改变为依靠实战经验的教学法。战术是主要科目，因为这是兵法的核心，也是军人必须当机立断的一个领域。

本宁堡步校是陆军的基础战术学校。按照旧教学制度，该校主要训练军官们根据比实际战场上会遇到的要完整得多的有关敌军的情报来解决教科书中提出的一种情况。在驻华美军第十五步兵团训练时，马歇尔亲眼看到一名军官在奉命包抄敌人侧翼时束手无策，因为他不能依据他得到的不充分的地形资料为一支有七十人的部队下达书面命令。马歇尔得知这名军官是本宁堡步校名列第一的毕业生时产生了“要插手本宁堡步校的强烈愿望”。他主管这所学校之后，立即采用了注重实战演习的教科书。这种实战演习会培养军人的主动精神和判断力，而不是训练军人正确地处理情况。

马歇尔需要一批同他思想相近的人组成教学班子。这些人必须愿意进行实验，愿意接受新方法，欢迎打破陈规，让学员们在战场上独立思考。他知道史迪威适合这些要求，因而一直给他留着第一科或叫战术科的科主任这个主要职位。史

迪威和马歇尔一样相信从潘兴那里继承过来的办法：发布简单明了的命令，集中说明要达到的目标，而不详细交待每一步骤。在实际战场上，敌人是不等待你的，因而连营两级需要当机立断。马歇尔进行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持这种能力，并培训一批能实地带兵打仗的战斗部队军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使史迪威懂得，指挥军队的方法与原则必须适应于将非军事人员迅速训练成为军官的需要。这些人在以后再发生战争时可以随时应征入伍。他说，有必要发明"某种便于训练出一支庞大的应急力量的方法"。简明扼要是他的诀窍。在战争中取胜不是靠"空想出来的战术……只有简单明了的办法才有获胜的希望"。他把战术战场一级的军事力量概括为"运动、射击和通讯联络"。

马歇尔在本宁堡步校主持工作的几年中鼓励对军事建设发表新的主张，开展辩论和积极思考问题，这些年头是令人振奋的。在一个未来的战时参谋长主持工作的情况下，这几年是培养最高司令人才的绝好时期。用他自己的话说，马歇尔的"记忆力很坏"。虽然普通人除了使他"一时的恼怒以外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印象，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过某个人的突出成绩，也没有忘记某个可悲的笨蛋。这个时期在他的教员班子里工作过或在那里进修过的军官有未来的将军奥马尔·布雷德利（兵器科主任）、马修·邦克·李奇微、考特尼·霍奇斯、小劳顿·柯林斯、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以及许多将要成为集团军和军级司令官的人。

史迪威把教室内讲课的事基本上都留给下属人员，但是每一次战术演习时他都要亲自督导。他的习惯作法是提出

“怪点子”，要求学员们想出对策并予以考验。军官学员们发现，他提出的战术问题总是需要想出新颖办法来对付的棘手形势。他教学的办法是把原则运用于战斗之中，他会“抛出任何反常的情况”。在实际演习中他指出了在教室中不能教的方面——战场电话机坏了，通信员失踪了，命令被弄错了，地图常常画错，复杂的运动“总是出差错”。

本宁堡步校培训的是连级和营级而不是司令部一级的军官。史迪威写道，营级指挥所看问题的角度与师级或军级司令部看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高级司令部地图上的一条线到了战斗军官那里便是一个地段，而且还有具体的地形特点决定他应如何行动。一支部队在地面上同在地图上不一样，它常常迷失方向，尤其在本宁堡地区，那里的大部分地形类似一个丛林。史迪威始终强调要在估量地形的基础上决定如何行动。本宁堡周围的松树林使人无法观察炮火支援情况，因而不能使用野战炮，步兵必须依靠迫击炮“在密林中展开短兵相接的迅速行动”——这恰恰是他后来在缅甸遇到的情况。

机械化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战术上的巨大变化支配着军事思想。史迪威研究了机动性、袭入和突击相结合的理论，这种理论后来在实战中便成为闪电战。他偶尔还为《步兵日报》写一些有关文章。但是他的军事思想基本上仍然是注重实际，而不是立足于空洞的推论。“不要假设任何情况——要弄明白！”这句话概括了他的信念。他就是本着这种信念，以公断人身份批评 1932 年的行动的。

一年以后，马歇尔说他是“教练天才”。他在史迪威的鉴定报告上填写他认为史迪威最高可以担任哪一级指挥职务的

例行问题时写道："能胜任平时和战时的任何指挥工作。"由于感觉到史迪威不善于也不愿意谈论自己，他评论说："这位军官谦逊，不自以为了不起，因而很少有人知道他是陆军中才华出众和有教养的人之一。"他对史迪威的评语是"有远见，才智过人……是个领袖……"，甚至过早地断言他"老练"。这最后一点在其后史迪威在本宁堡步校任职的四年里证明并不是他最持久的品格。

史迪威遇到办事无能或行为愚蠢时会十分暴躁。他在本宁堡步校期间有一次发了脾气，由此而获得了他那著名的外号。在野外演习时，他特别刻薄地批评了执行任务的情况。回到营房以后，一名军官学员画了一张史迪威的漫画，描绘他绷着很不善良的面孔从一个醋瓶子里钻出来，醋瓶子的商标上有三个X字母①。这张漫画用图钉钉在布告板上，受到了广泛的称赞，连史迪威本人也很欣赏。他要求保留这张漫画，并拍了照片送给所有的朋友。

史迪威的好友威尔斯将军最了解他性格中的醋性子一面，对此还作了说明。威尔斯在许多年以后就报纸上刊登的一张史迪威"苦脸"照片写信给他说："你每次露出这种表情都是因为某件事或某个人造成了一种实属荒诞的情况——有时甚至是讨厌的。"威尔斯接着写道，在史迪威的另一些独特表情中还有"全然绝望和厌恶的表情……那是在作出的决定和采取的行动显然很不切实际但是又不得不忍受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你脸上会呈现出你心中的一些苦恼……这不是醋性子，乔，这只是看上去象是醋性子的某种别的东西。"威尔斯的

① X表示酒或醋的浓度，三个X表示浓度很大。——译注

结论也许太仁慈了，因为正象史迪威自己承认的那样，在他的性格中不可否认确有暴躁的一面，虽然被幽默和善良的品质中和了。他喜欢谈起自己的一个经历。有一次，他正在中国的一座城镇中独自行走，情绪极坏，碰上一位中国商人同他搭话。那人鞠了一躬说："你好，教士。"

史迪威绷着脸说："你为什么称呼我'教士'？"

那个中国人说："因为你的样子象一名教士。"

"为什么说我象教士呢？"

"因为你有平静而慈善的表情。"

史迪威每讲完这件事总是加上一句："别以为中国人缺少幽默感。"

在写给家人的一篇谈及他本人和他对家人所寄的期望的小品文中，他承认自己有时"不近情理，没有耐心，很顽固，闷闷不乐，狂暴，冷酷，好咒骂，粗俗……"。一个人承认这些罪名确实太多了，然而他承认的又都是事实。虽然他愿意时可以彬彬有礼，比如他在凡尔登同法国人愉快相处的时期；而且他也是习惯于谈吐文雅的，但是，对某些人他又不在乎给人留下粗鲁的印象。这是他表示厌恶也许还有不自觉地表示不适意的特有方式。他使用咒骂字眼时也只是口头上嘲弄那种自命不凡之辈。在适当的场合，他的语言可能很粗野；在他的日记上那个恶毒骂人的脏字比比皆是。他是用一些污秽的词，但无性的色彩，这些词给人的印象是他感到深恶痛绝。

看来史迪威很爱产生厌恶的感觉，在日记中他常常是渐渐地激发出这种感情。他开始时总是用词相当尖刻，随后好象在欣赏其中的味道，便更尖刻更恶毒地骂起来。起因往往

是遇到了他认为摆架子的人。例如装出英国人口音的“令人作呕的”美国人。

他对富人和谄上欺下的势利小人责骂得特别狠毒，常常似乎花的精力过多。出于他性格中一种内在的素质或者由于过去的经历，他对富人特别容易发怒。他自己是在舒适的环境里长大的，由于他父亲的某种严厉态度，他到成年时还没有自己的一份收入。1933 年，他父亲去世时他的情况并没有显著的改善，因为父亲史迪威博士除了给儿子留下一些债券股票以外，把大部分财产都留给了他的遗孀，而她一直活到 1942 年。史迪威靠他当陆军军官的薪水维持生活，又有五个孩子，在繁荣的二十年代毫无疑问仍会感到处境艰窘；但是到了萧条时期，由于一个军官至少有个牢靠的工作，和一笔固定的收入，军人又感到比其他许多人日子好过了。

史迪威一家无开销大的爱好。他不同别的军官一道去打猎或打马球，他的妻子也不骑马；他们不打桥牌，在中国期间也不参加外国殖民地的俱乐部活动。他们在家里待客时，使比较能喝酒的朋友们大为吃惊的是，摆上来的是法国布尔戈尼葡萄汽酒。史迪威仍然对马极端反感，也许因为这种牲畜一向是富人和摆架子的小人的附属物。有一次一位同事谈到马时的无休无止的议论把他弄烦了，他便在给妻子的信中发了一通牢骚：“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使我恼怒，这就要算呆傻的爱马者了……请告诉我，世界上还有什么动物比一匹该死的蠢马更愚蠢和缺乏理性呢。这畜牲只会腾跃和放屁，没有一点理智。”他发泄了一通情绪之后又立即为写了一封“粗俗的”信表示歉意。

他还很随便地使用一些不那么脏的词，看来他使用时并不含轻蔑的意思，如称英国人为英国佬，称法国人为馋蛙鬼（“在船上遇到了一个馋蛙鬼和他的妻子”），称德国人为德国蛮子或四方头，称意大利人为南欧佬，称中国人为中国佬，称菲律宾人为菲律宾崽子，称黑人为黑鬼或黑家伙。这类词汇不是史迪威所属的阶级和受过他这样的教育的人常用的。这类词汇象他的骂人话一样给人的印象是：总的来说，他的同胞是不喜欢他的。按照军队中的一位同事的话说，事实上他“很象一个厌世主义者”。但是他的厌世心理是藏而不露的。相识日久之后，这位同事承认，史迪威总是有些令人难以捉摸；他从来也没有看透他。

史迪威的乐趣是自己找来的或者说是自己促成的。他是业余演出和业余赛会的不倦的组织者。为了随便运动一下他就打网球；为保持体格匀称，他坚持越野跑步和打手球——这两种运动都是各种锻炼形式中消耗体力最大的体育项目。每周可以看见他两三次，穿着卡叽布短裤和短袖衫，穿过本宁堡的松林，轻松自如地跑步。在一次五英里长跑比赛中，他最后落到别人后面五英里之遥，但是他回去对孩子们说，他认为没有几个人在四十八岁时还能象他这么跑的。

他的家庭是他的城堡。只有在家里他才感到安全，觉得不怕似乎与他敌对的世界了，只有在家里他爱别人也为别人所爱，因而可以不再提防他人。他的家里充满了逗趣、欢笑、友谊、互相体贴和轻松自在的气氛。离开他的家庭时他从来没有真正感到舒适，然而在家里停留时间长了（其实所谓时间长也不过几个月）他必然坐卧不宁，急欲离开。他与温妮结为

夫妻组成了真正的一对。由于嫁给了一位出众的人物，她不仅接受了而且常常反应出他的许多态度，加剧而不是削弱了他对一些人的敌意。

他的笔记本上充满了表明他始终特别关心五个孩子的证据：他们的身高和体重每年有时甚至是每个月的增长数字、他们的津贴和账目、学校和旅行、他们刚会说话时的语言和精彩的词句，并且注明了年岁和当时的情况。“你们是老的，我们是新的”就是小乔五岁时说的一句话。他不在家的时候，也总是在日记本上记着他们的生日。甚至在徐州的动乱中，6月1日那天他还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文思的生日”。当学校办得不能令人满意时，或者有一次当他在中国期间他最小的儿子和女儿受到老师训斥、哭着回家时，他誓言不许任何人这样对待他的孩子。他把他们接出学校一年，在家里教他们。他用漂亮的大字为大女儿史文思写的书法字帖显出了马歇尔看到他所具有的作教师的“天才”。他特别善于以幽默和不敬的语言来吸引小学生的兴趣：

从猫(Cat)之类的短字开始。
你很快就能写河马(Hippopotamus)，
它把我们大家坐在屁股下……①
靠近桌边挺直端坐，
把食物抛向高处，
落下时用嘴接住。
你的朋友都会欢喜，

① 这句话的英文是 Hip up on top of the whole lot of us，与河马的英文读音和字形相近。——译注

他们以为在马戏场里看马戏……

用刀子把土豆插起，然后——

把它一口吞下，就是别把刀子吞进去。

他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同最小的孩子本呆在一起，画出稀奇古怪的动物，把一套剪纸中的一条鲨鱼变成飞机，把一条三头龙巧妙地变成各式各样的动物。史迪威在家里的外号“老爸爸”是在本宁堡时获得的。当时孩子们在模仿佐治亚州当地的“穷苦白人”，“想象老爸爸怎么能出去抓一条响尾蛇并活剥它的皮”。他们觉得这个形象很有趣，便开始用这个新的称呼叫他们的父亲，并一直延用下去。

史迪威总是在写东西。除了日记、信件、小评论和随笔以外，他还在单页纸和破纸头上写他称为“杂记”或“琐事”的东西，其中记载着他的想法、理想、零乱的念头、玩笑、趣闻、言论、引语等等曾经出现在他那不停地思考的脑海中的一切。下面是他的一个典型的便条，作者未加变动：

亨利·法布利对昆虫的研究

鳗鱼的历史

常理帽的来历

对滑铁卢怎么办

高大的人高大的房子，在楼上设备极简单——培根威尔斯的“艺术概论”

“上刺刀”

另一张纸头上的记录表明他思想中对于一个根本的民主问题的苦苦思索，但尚未解决。

＝又≠参政权

因为———一人一票。但是“有些人”不止——

无知者的力量理应小于受过教育者

智慧应当能抵消人多势众的优势

另一方面——很难找到对给予额外选票的标准

财产？（常常发生事故。对民主精神生疏）

（上议院中的议员）

教育，（不一定。未受教育者，有时看问题更深）。

另一张题目是《回忆、首创与备忘录》的纸片表明，除了昆虫、鳗鱼和艺术以外，他还在研究宪法程序。他整段整段地抄录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可以预见其中必然包括霍茨波① 的怒言。“因为他使我发疯……非常象一个侍女一样谈及枪支、战鼓和创伤……”

史迪威明慧但不渊博，他思想敏捷，在任何谈话中常常比对方来得快，总是不停地用断续而不耐烦的“对对……对对”来打断对方的话。除了间歇地提出一些问题以外，他的社会见解和政治见解是平平常常的。虽然他反对他父亲虔诚信教，但是他保持了他们家的共和党观点，自然地投入了厌恶罗斯福的开心玩耍。尽管陆军有不介入党派的传统，但是正如一名军官所说，当它“咕噜几句”时也是怀有普通的政治热情的。史迪威也不例外，而且正因为是史迪威，他的情绪是强烈的。

他把自己做过的梦也记了下来，而且写得清楚流畅，常常

① 霍茨波——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中的人物（意为“急性子”），是英国诺森伯兰郡第十一位伯爵的儿子哈理·伯西（1364—1403年）的外号。——译注

很直率而自信地将梦中的情景写给梦中出现过的人。结婚前他给温妮的信中写到了与她亲热的梦境。这封信尽管很优雅和温和，可是在1910年这样写信给未婚妻仍然是令人吃惊的，因为那时的规矩是谨慎节制。他在向父亲报告他做的一次梦时说，他同弟弟吵了架之后受到父亲的追赶，而且要"把我打瘫……当你抓住我时……没有打我，却掏出一个硬币给我。我站在那儿呆呆地看着它，然后问这是什么。你悲伤地说：'一块国币。'这个'国币'使我非常慌乱，就惊醒了，好长时间没能入睡。"他做梦常常是斗争和花费体力的事："为了到一个地方去而攀登一座大山。这是唯一的通道。山坡不住地崩塌，越往上山势越陡峭。"另外梦见同他母亲一起看着一个男孩在克罗顿水坝顶上使劲推顶一门石炮，他被滚动的炮逼得不断接近边缘，直到掉了下来。"我说：'别看。'攀着石头慢慢下去。发现他被击中再也没动。他的身下有一片鲜红的血。我说：'他一下子就被砸死了。'"还有一些梦是梦见顺着飞船的梯子下去，或在水下搏斗，或者在中国遇到野兽混战，"互相搏斗的这一群野兽突然变成乱糟糟的一团残肢断颈和碎尸滚下岩石山坡。呸！我被惊醒，十分恐惧。"

在本宁堡，在熟人和同级中间，没有类似外交官和英国人那样的使他感到不自在或愤怒的人物。但即使如此，他仍然会采取执拗和敌对的态度。马歇尔后来承认，该校校长坎贝尔·金将军三次要求他解除史迪威的职务。他引起一些军官怨恨的一个原因是他的标准极端严格。除非他认为完全够格，否则他是不会在学员们的考绩报告中记上"优"的。结果，他所管教的军官们很少有人能进入军事学院，而在比较平淡

的武器科，“优”打得很宽，从而使得到优等评语的人在其军人生涯中便于晋升。史迪威对晋升和奖励所采取的严格态度在他后来出任指挥官和战区司令官时继续积下了一些怨恨。在本宁堡的第二年，马歇尔对史迪威为人处事的老练程度的评价降了一等，这是不足为奇的。从他对史迪威的进一步评语可以发现他有一点已长时间感到苦恼的迹象：“原则性很强。工作极刻苦。脾气不好……”然而马歇尔继续留住这位带刺的同事，说他“在战术和技术方面已越出了他那个时代”。

史迪威讲课时常常引用他在中国的经验为例加以说明，这样做也是为了使军官们了解他所强调的“有朝一日我们大家可能与之有些关系”的一个国家。1929年，他在向该校学员们作题为《东方人的心理》的讲演时，着重论述了西方与东方之间的一个根本性的障碍。这个问题由于十分显而易见故往往无人研究。他说，西方人有个老调，总是说中国人“不可思议”，这是因为西方人发现他们“与我们不同”。他们为什么与我们不同呢？按照史迪威的说法是因为他们同我们的文明的联系被“切断了”许多个世纪；他们在不同的条件下发展了自己的文明。“那么能指望一个中国人表现得同一个西方人一样吗？……答案是，不能。”这是一个比表面上看起来更为重要的原则问题。他还着重说明，中国人由于隶属于一个十分古老的社会，被固定在那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之中，因而他们有“一种保守的变态心理……他们的惯性极大。”他在谈及东方对“面子”的概念时说：“尊严对他们是最宝贵的。谁剥夺了他们的尊严就结成了仇敌……同中国人打交道时不要使他们丢面子，除非你就是要让他们丢脸或者你不怕树敌。”这段话足

以说明，他后来对蒋介石不好并非由于无知。

他在与同事们谈到中国时强调那个国家非常贫乏，尤其是缺少从公路到无线电台等各种交通和通讯设施。一位朋友说，史迪威关注的“是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他认为，目前的社会改革会“除掉她身上的治外法权这根刺”；他还时常让自己坚信，新政府或许真能成功地使中国现代化，运用她的潜力。他常常说：“若有正确指导，有劳动和制造才能的四亿人将会居于支配地位，我们最好是支持他们。”

在本宁堡期间，他的笔记表明他看过标志着中国新苦难的开端的历史性文件，虽然令人失望的是未加评论。这个文件就是国联的李顿委员会关于满洲危机的报告。后来，这次危机的一系列后果把整个世界卷入其中。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关东军利用南满铁路的一段轨道被一颗炸弹炸毁的这个预谋事件为借口，发动“自卫”性进攻，占领了奉天。这是继 1928 年暗杀张作霖之后采取的规模更大的行动，并达到了目的。蒋介石在 1929 年同爱国的张学良少帅携手努力在满洲重新行使中国主权，正是这种情况促使日本人采取了行动。起先中国的挑战是针对俄国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的，这一挑战立即激起了苏联军队的反击，结果中国人遭到了失败和蒙受了耻辱——日本人也大为惊慌。中国和俄国的抱负使日本国内的扩张主义势力、日本军界下定决心要巩固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军方以直接接近天皇的办法摆脱文官政府的管束独自行事，通过关东军策划了奉天事件，在国内，在中国，都引起了极大争议。鉴于存在着华盛顿条约和国联盟约，在西方也引起了极大争议。

日军发动进攻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都陷入了第三次围剿共产党人的战役。此外，中国由于扬子江泛滥而遭受了严重的水灾，数千平方英里的土地被淹没，两百万人死亡，不计其数的人倾家荡产。在满洲，没有人组织军事抵抗。相反，蒋介石却命令在长城内外共有四十万大军的张学良"坚决"执行"不抵抗"政策。虽然他的部队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但是他知道在训练与装备方面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因而他选择了战略撤退，不肯在军事上与日本决战。他的指导方针是不让任何事情阻碍他消灭内部敌对力量这一主要目的。

蒋已下定决心将"戡乱"置于一切之上，先于社会和政治的改革，也先于抗击侵略者的斗争。如果说有一个特点可以说明蒋的伟大的话，那就是一旦他形成了一种信念，就决不改变，坚定不移。对日本人，他可以利用中国永远拥有的有利条件，即无限的退却余地，同时集中力量去实现把中国团结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的目的。达到这个目的之后，中国可以再去对付日本人；同时他认为满洲大概会使日本人心满意足。

历史上打错算盘的事是屡见不鲜的；蒋就打错了几次算盘。侵略要是得手，就很少会自动停止，一个国家的人民要打退入侵者的愿望也是很难压制的。然而蒋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他在长城以内的任务也是够繁重的。他执政的第一年就由于曾经帮助他上台然后又抵制遣散的那些领导人的反叛而处境艰难。1929 至 30 年间，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和张发奎各位将军以及北方的冯玉祥将军，都曾先后向政府挑战，发生了武装冲突，因而蒋不得不击败他们或把他们收买过来。边远省份云南、四川和新疆，由于政府鞭长莫及，仍然是可能出

现反政府行动的地方。仍然有生命力的左派领导人汪精卫、陈友仁和孙中山博士的儿子孙科维持了一个准政府，广州仍不时成为这个政府的所在地。北平一度落到了汪、冯和阎锡山领导下的一个分裂主义政权的手里，但是在张学良的帮助下，中央政府又重新控制了北平。这种种斗争使国民党无暇顾及社会改革。当这些动乱似乎解决或平定之后，蒋又立即动手镇压另一个国内敌人、潜入江西农村的共产党人。在日本人发动进攻之前的一年里，连续三次所谓"剿匪"战役使政府的军事力量完全陷了进去，在共产党人的游击战术打击下，政府还吃了一些不顺心的败仗。

在一个迫切需要改革的国家里，八年内革命浪潮三次遭到挫折。蒋关心的是拼凑政治力量而不是使这种力量扎根于新的社会基础之中。倒退到官僚和地主的联盟中去的一个政府是不可能奉行减租政策的。在浙江，有人曾真正设法实行减租计划，但是在其推动者和发起人被暗杀后，这一计划也就放弃了。依据"训政"的信条，政府仍然实行一党专制，变得越来越独裁，越来越多地依靠镇压手段，这样就播下了反叛的种子。共产党人已不可能在政府范围之内进行改革，他们被当作非法分子而遭到追捕。据美国驻汉口副领事埃德蒙·克拉布说，共产党人"已被迫……进行激烈的反叛；极端仇恨中国现政权的被压迫者——开明的学生等等——都参加了这场反叛运动"。这个政权始终抱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放，把它当作一种取代实际行动的妖术。为了填补帝王垮台以后留下的真空，孙被捧为崇拜对象。到处都悬挂着他的画像；每周的纪念仪式上、所有的公众会议上、政治会议和爱国节日集会上，人

们都背诵他的包括三民主义在内的遗嘱；中小学生每星期一上午首先也是背诵他的遗嘱。他的遗体从北平运到了南京，安葬在用六百万美元修建的紫金山陵墓。

中国的现代化（即使称不上社会革命）采取了下述方式：修建公路，开辟航线，发展电力，增修铁路，改善农业，编纂法典，兴办教授现代课程的新学校和着手解决所有现代组织的基本需要——为实行文官档案制度而整顿语言的合乎逻辑的方法。中国没有字母大概和没有公路一样碍事。有些计划在各省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有些计划则没有取得进展。中国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而这个时代所给予的时间又太少了。

日军攻占奉天之后，不顾国内的分歧，继续进攻张学良的省会，长城以北还远的锦州。他们于 1932 年 1 月占领了这座城市，把少帅赶出了满洲。同年 2 月，“满洲国”宣告“独立”，清室最后一个残余人物溥仪于 3 月被扶植为执政者。日本政府由于不得不屈从于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的压制，只能被既成事实和激烈的爱国主义讹诈牵着鼻子走。东京由于切望不使国联和九国公约签字国有理由宣布日本同中国处于战争状态，所以设法使在大陆的每一步进展合法化，说这是满洲人民的“自卫”和“自决”。在这种表面情况的背后，激烈的斗争震撼了东京。政府于 1931 年 12 月辞职。天皇任命稳健派人物犬养毅为新的总理大臣，目的是设法煞住卤莽行动。犬养得知天皇希望他能制止军队“插手国内外政治活动”的行为——这个任务是很危险的，后来事实证明这成了这位总理大臣的致死原因。犬养背着西方在他执政的第一个月里派一位密使

去见蒋介石，目的是通过谈判解决满洲问题。但是日本的政策大权已不再真正操在文官之手了。

从奉天事件到通过李顿报告书之间的一年零五个月中，西方列强为对付这一局势所作的努力对二十世纪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这一努力酿成了姑息之风，从内部破坏了国联、鼓励了进一步的侵略，使以后的十年渐渐滑向战争。政治家们并不是先知；他们的行动是在当时的背景下采取的，不能高瞻远瞩。一场危机是分阶段造成的，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人们无法看到事件的整体及其余殃。如果当初有所作为，满洲危机中的任何一个阶段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吗？不大可能，因为在事情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用来作出其他抉择，没有什么原来可以做到但却忽略过去的事。有些历史时期会培养壮举，有些历史时期又会滋长懦弱。满洲危机是形成历史的那类事件之一，不是悲剧性的"偶然事件"而是人们和国家所固有的局限性的表现之一。

中国赖以保卫自己的是世界为防止发生这种局势而制定的保障措施。这些保障措施是九国公约、国际联盟盟约和1928年刚刚在巴黎签订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根据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包括日本在内的十五个国家保证不使用战争手段推行国家政策，并同意"绝不使用和平手段以外的任何手段"解决各种争端——当然"自卫"和维护"国家切身利益"除外。中国在日本发起进攻五天以后正式向国联提出了控诉。当时，侵略还不曾试过这种集体意志的分量；这将是第一次大试验。虽然在日内瓦有过渴望为世界和平采取"惊人之举"的热情，但是没有人急于采取具体行动。1931年，世界在

经济方面遭到了巨大的打击。涉足远东的西方主要强国英国正处在政治与金融危机之中，即将放弃金本位；欧洲的证券交易所在恐慌的边缘颤抖；魏玛共和国行将灭亡；美国陷进了经济萧条的泥坑。鉴于已经有了那么多防止侵略的机构和措施，日本的行动确实令人难堪。但是正如法国总理安德烈·塔迪厄所说，这一行动"还远着呢"。

事情对于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却似乎是迫在眉睫的。他是裁军的突出鼓吹者，也是大力主张为禁绝战争而作出集体努力的鼓吹者。史汀生在 1927 至 29 年任菲律宾总督和 1930 年任出席伦敦海军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期间，同太平洋问题关系密切。他看到了自己的工作成果、伦敦海军会议条约在日本引起极大的反感情绪，因为这项条约把停止扩建海军的时间以及华盛顿条约中规定的那个为日本人所厌恶的五比五比三比例又延长了五年。日本的超级爱国者们的愤怒终于发展到了暗杀滨口首相的地步，因为滨口强烈支持伦敦海军条约并曾建议天皇批准。

日本进攻满洲的行动使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活跃起来，发挥作用的是史汀生。可是令人失望的最终结果是使美国再次陷于孤立。史汀生在这次危机中原想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是防止日本在大陆进一步扩张，这是美国自 1917 年以来一直努力实现的目标。第二是维护集体安全体系。但是，当国联想让美国分担义务或把义务完全推给美国，准备特别请美国忠于国联理事会时，他避开了，因为他不希望看到这桩麻烦事被推到他的国家身上。他希望靠世界舆论的"有力评判"而不是靠美国单枪匹马来约束日本。

日本的行动有什么含意——是暂时的占领还是不仅如此？这一行动是代表了日本政府的一致政策呢，还是那些军国主义者通过关东军干下的又一胡作非为？西方对此并不清楚。在 1931 年最后的几个月里，史汀生指望“动员起反日舆论”，加上进行经济制裁的威胁，会加强日本议会党团的地位，从而决定性地约束住军人。在二十世纪的前四十年里，一直引诱美国政策的是日本国内那个开明的瘦子的吸引力和期待他能崭露头角的思想。在 1931 年时谁能断定国际上对日本在满洲的冒险行为的谴责（加上制裁的威胁）会加强稳健派的力量呢，还是反而会把日本人团结在那些超级爱国者的周围呢？

由于英国人一点也不坚定，史汀生所指望的“有力评判”总是纠合不起来。英国的对外政策当时是由绥靖主义的始祖约翰·西蒙爵士指导的。他是英国的头号律师，是一个心里冷淡但嘴上善于逢迎的人。他生性多疑却总是装出一副笑脸。他的头与身躯相比显得太小。作为外交大臣，他干的事比南非战争以来的任何事都更使他的国家不得人心。自那以后人们一直认为情况表明，他也希望约束日本，但是在日内瓦会议上他给人一个相反的印象，使史汀生得出结论，认为英国将满足于看到日本忙着满洲的事，而不去与英国争夺长江流域的支配地位，也不向大洋洲和印度伸展其势力。

史汀生本人所代表的国家也不是准备以大棒作为言词的后盾的。胡佛总统对实行经济制裁的主张很担心。他认为，采取这种措施等于“刺激老虎”，除非最终实行武力制裁。史汀生提出反对意见说，衡量这种风险时必须看到日本的行动（如果不加约束）会给和平事业造成的“极大危害”，还必须看

到这样一种危险："日本正在迈开可能同中国开战的步伐，而这样一场战争将会蔓延到全世界。"随着日步步深入满洲内地，他越来越担心世界和平和美国在远东利益受到威胁。他认为，如果美国在长期的协作之后，现在"冷酷地抛弃中国不管它死活"，就会给美国在中国的信誉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

由于九国公约、国联和凯洛格—白里安公约都没有发出共同的呼声，他决心采取某种形式的单方面行动，但是充其量也只能从文件档案中翻出白里安外长在1915年中日签订二十一条时发表的声明。1932年1月7日重新发表了这项声明，后来它被称为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向日本和中国宣告，美国"不能承认，也不打算承认"中日两国间签订的有损于门户开放政策、或者有损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领土或行政完整"的任何协定和可能以违反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中、日、美三国都是该公约参加国)的手段达成的任何协定。这项声明是强烈的，明明确确的，但是作为一种遏制手段，它是没有实际效用的。由于这一点显而易见，两个月以后国际联盟接受了约翰·西蒙爵士提出的赞成不承认主义的一项决议。

在中国，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成效极大，以致使日本人意欲在抵制运动的中心上海采取惩罚性行动。他们故伎重演，以"事件"为借口——这次是一名日本和尚被杀——动用飞机和从军舰上登陆的军队向上海华人区闸北发动了进攻。1932年1月29日对闸北的这次袭击是对平民的第一次恐怖轰炸；在其后的一个历史时期中，这类事件就屡见不鲜了。在上海的外国人目睹日本人投下了无数炸弹，炸死了成千上万

的人，造成了大量的破坏、伤员和难民。这一切使西方感到吃惊和产生反感。日本人的行为使史汀生想起了德国在1914年入侵比利时的事。史汀生决心不作第二个威尔逊。“威尔逊没有以任何方式表明我们在比利时问题上感到的羞愧。”闸北事件再加上日本人发表的关于九国公约中有关维护中国完整的各项条款已经过时的声明，使他相信再用姑息手段约束日本已无济于事了。然而，由于他没有权力采取惩罚性措施，世界各国也不希望那样做，他只能在不够有力的行动和无所作为之间作出选择，结果他选择了前一种办法。

他作了进一步的努力，试图争取英国人合作（这一次是援用九国公约），但是发现约翰·西蒙爵士“软弱无力”，“很缺乏勇气”。史汀生再次采取了单独发出警告的办法。他于2月份发表了公开声明，宣布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前途怀有“永久的信念”，重申了九国公约的原则——必须使中国有机会发展成为“现代的和开化的国家”。他向日本表示，华盛顿条约是互相依存的，废弃了涉及中国的条款就等于取消了海军条款和不设防条款。但是这是一个空洞的威胁，因为他的国家对于进行军备竞赛这个严酷抉择是没有准备的。后来，在史汀生忙于裁军会议时，胡佛总统通知日本，美国不会诉诸经济制裁。

这一危机开始暴露出美国的承诺没有坚强的后盾：美国保证维护中国的完整，但却又采取了一种并不是十分符合美国切身利益因而不值得为之战斗的政策。门户开放是个绝妙的措词。这个词不仅音节极其简单悦耳，而且给人留下一种英勇和自由的印象，有着广泛的机会的印象，而这种机会符

合美国的两种基本主张——开拓新地和自由营业。正如约翰海的另一句典型的话一样，门户开放有“一个额外的成就”。从长远来说，这个政策使美国陷入了最麻烦的联盟——不是同一个国家，而是同一个主义的联盟。它使人感到有义务介入一个问题——维护中国的完整。而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安全并无风险。

由于中国的控诉仍有待审理，国联面临着需要信守盟约的难题。如何约束日本？如果约束不了，对它谴责到什么程度而又不把它赶出这个国际组织呢？这些问题使列强感到烦恼和为难。日本提出的种种借口和法律依据总是留下一个有待论证的问题。李顿委员会奉命前往满洲调查事实真相。其时，战斗已经蔓延开来。满洲的一位领导人马占山将军起来与日本人作对。在上海，中国第十九路军无视蒋介石的指令，进行了英勇的和出人意料地出色的抵抗，使日军陷入了一场没有料到的战斗之中。在满洲获得了能够弄到手的一切之后，日本人便乐意找一个借口，依据当地外国势力提出的条件撤离闸北。

奉天事件此时已造成了自然的后果。从2月到5月期间，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成功地暗杀了首相兼大藏省大臣、三井工业集团首脑犬养毅。暗杀他的凶手是穿军装的陆军军官。犬养之死标志着政党制的结束，为一系列国民政府上台扫清了道路。在日本人看来，史汀生是种种事件背后的邪恶势力，世界对日本的误解和美国人对日本的恶感全是他造成的。日本的政论家开始谈论“亚洲门罗主义”，认为美国要干涉日本在亚洲的“命运”的任何企图都会成为战争的起

因。日本预计李顿委员会必然提出对日本不利的报告，因而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于9月从法律上承认了满洲国。

李顿报告书是10月呈交国联的。这个报告措词尽量温和，以期为日本保全一些面子，使它能够接受。但是，报告不可避免地证明，日本的行动违背了条约的规定，日本提出的理由的两大支柱、"自卫"和"自决"得不到事实的证实。报告承认，恢复原状是行不通的，因而建议恢复中国的主权，实行自治，并对日本的经济利益给予特殊照顾。在为通过这个报告书而进行的长期辩论中，国联竭力摆脱将要陷进的进退维谷处境：是谴责侵略行动呢，还是用某种使其合法化的方案把这一事件掩饰过去呢？前一种办法很可能迫使日本同西方决裂并奉行回到亚洲的政策；后一种办法纵然不能保住国联的宗旨也会保全它的结构。

李顿报告书已提交讨论，想回避是不可能的。这个报告于1932年2月获得通过。第二天，在日本代表发表了激昂的自我辩解和警告性的讲话之后，日本便退出了国联。为了突出表明日本的蔑视和没有后盾的国际空谈分文不值，日本军队攻占了长城以北的又一个省份热河，然后又进入河北省，在北平与天津之间建立了一个三十到四十英里宽的非军事区，规定不经日本人许可中国军队不得入内。至此，日本命中注定的行动暂时告一段落，并通过同中国政府谈判达成的或者说强加给中国政府的唐沽停战协定使这一行动合法化。蒋介石接受了这个协定。他在日军入侵河北的同一个月里，调集二十五万精兵向南方的共产党发动了第四次剿匪战役。他作出了与他的前辈、太平军叛乱时期的摄政王恭亲王相同的选

择。恭亲王说过，内乱乃是中国命门之疾，外夷不过肢体之痛。

从此以后，满洲危机就使中国的领土完整视日本的胃口而定了。满洲危机使军人在日本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这是日本内部的进程，即使日本的盟国不曾谴责它的行动，这一进程也不会改变。满洲危机使华盛顿条约的精心设计的结构成了一个空架子，暴露出集体意志的虚弱性。国联、九国公约和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无论是分别发挥作用还是集合在一起都不足以影响事态。集体安全的愿望与这一愿望的贯彻之间的距离现在已经十分明显了。人们开始怀疑除了使用武力以外是否还有任何行动能够阻止一个国家发动它决心要发动的侵略。满洲危机之后，正如史汀生所承认的那样，世界各国感到"遭到了挫败和悲观失望"。

1933 年 5 月，即签订唐沽停战协定的那个月里，史迪威在本宁堡步校的任期结束了，伴随而来的插曲是一个令人气愤的官僚主义行为，正如威尔斯将军写到这些行动时所说的那样，这种事加剧了"你内心的痛苦"。再过两个月小乔就要从西点军校毕业了，但是由于罗斯福总统为应付紧急情况而建立的平民卫护队缺少军官，两次调动工作岗位之间的例行假期取消了。每个军官必须直接到新的岗位报到，不准以任何理由离开职位。史迪威要求延期报到的多次申请，包括他作为最后手段向当时任陆军参谋长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提出的申请，都遭到了拒绝。由于不能参加长子从自己的母校毕业的仪式，这位父亲在启程时极为愤怒。他自然又把这件事归罪于白宫的那个人了。史迪威夫人和他们的二女儿

“多特”① 代表全家到西点军校参加了小乔的毕业典礼，史迪威则带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和文思以及他们那条狗乘汽车出发，前往加利福尼亚赴任。他经过一个星期的行程到了那里，却发现他的前任仍然在职，他没有接到进一步的命令，无事可做。在小乔毕业那天温妮发来的一封电报使他未能参加孩子毕业典礼一事更显得突出了。他在回信时写到：“这件事使我再也忍耐不住对这个机器的厌恶了。”

在本宁堡工作了将近四年之后（马歇尔于 1932 年离开），史迪威已经厌烦了，以致把自己的调离形容成“摆脱了束缚”。他没有打算申请进陆军军事学院进修高级参谋课。当他的同事、步兵军官奥马尔·布雷德利提出申请时，乔说：“布雷，你到底为什么要进陆军军事学院去学干那种你不想干的事？”史迪威曾要求下一次派他任务时让他做外交工作，但未能如愿。然而陆军部满足了他的第二志愿——“西海岸的任何任务”，派他去圣迭戈训练第九军驻防区的后备队。这项任务虽然令他失望，却有个好处，就是使史迪威一家靠近了他们为在卡梅尔安家而在那里买下的房产了。

在圣迭戈的两年期间，史迪威尽力再次做好教学工作，向预备队传授实战演习原则。在孤立主义盛行的这个时代，人们对军训的热情不高。参加两星期训练的职员和店员并没有使史迪威发现什么职业军人材料，但是他知道在发生战争时这些人将是国家兵源。因而正如参加训练的一个人所说，“他认真地对待我们。他大概是我们历来遇到的最好的军人”。他

① “多特”——与英文 daughter（女儿）发音相似，是史迪威夫妇对女儿的称呼。——译注

把陆军在那个地区的各种部队集合起来统一训练，教授执行实际指挥任务应有的常识，从而引起了这些人的兴趣。有一个分队在赞扬他的决议中说："我们从来没有受到过比现在所接受的还要出色的指导。"

私下里，史迪威却感到厌烦和失意。他觉得如果陆军部认为他不会有多大作为，只能干这种工作，那么他在已经五十一岁而且还没有达到上校军阶的情况下，就不能指望在军事生涯中有多大的前程了。他在自我总结时写道："任何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都绝不会有我的份儿了。"由于多次感到"厌恶这个机器"，他已经到了要退休的边缘，现在已开始同家里人认真讨论这种可能性了。在卡梅尔的住房已经准备好了，这房子是 1934 年花了两万七千美元建造的，用的是他父亲留给他的股份中的钱和温妮的母亲留给她的钱。史迪威打算靠储蓄金、退休金和能找到的可以发挥他的教师才干的任何工作来维持生活。然而在阴沉的经济萧条时期，前景是暗淡的，这使他不能轻率地贸然退休。在伊利诺斯国民警卫队中任职的马歇尔上校此时也同样感到烦恼。马歇尔对晋升制度的停滞状态感到愤怒，他在 1934 年给一位朋友写的信中说，他对"平庸之辈被置于高位，杰出而有才华的人物却由于级别不够而湮没无闻的现象已经厌烦了"。

当史迪威情绪极其低落的时候，出头之日到了。他以前从未想过自己适合做武官，因为这个职位一向需要本人有一笔私人收入。但是在 1934 年时，为了扩大选择合格军官的范围，陆军部给这个职位增添了开支补贴。在陆军部的朋友立即询问他是否希望被派往北平（各国公使馆仍然在那里）任

职，而且由于他够条件，很容易就为他弄到了这个职位。虽然武官是由军事情报处委任的，却是作为外交使团的成员进行工作。1935 年 1 月史迪威接到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对他的任命时，感到自己首先是外交官了，但由于这使他能再去中国，这个不幸还是可以忍受的。一位军官在祝贺信中写道："此刻东方的国际局势多么有意思。谁也说不上我们可能多么快地置身其中。"

东方的种种迹象当然是刺激人的。1934 年，日本发表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声明，宣布了其控制中国的意图，把开着的门户砰的一下子关上了。通过外务省发言人天羽英二发表的这项声明宣称，日本的意图是作"东亚和平与秩序的监护人"。因此，日本自称有权反对其他国家向中国提供贷款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支持，不许中国"利用其他任何国家的影响来抵抗日本"。天羽主义使世人大为震惊，然而美国的反应是温和的。罗斯福政府的精力已经陷入国内改革的巨大努力之中，不想再同外国发生争吵。赫尔国务卿的政策是消除史汀生留下的恶感。赫尔在作答时，虽然必须正式表示美国反对天羽主义，但是如他所说，是本着"尊重和友好精神"说话的。

在实际行动中，日本人通过与傀儡行政长官达成的政治协议，通过有组织地走私鸦片和日本货的做法形成的经济洪流，继续向内蒙古和华北渗透。虽然北方已被侵吞，蒋介石继续对日本人采取消极态度。同时他却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组织和训练他的军队，准备对付共产党人。1934 年，他动员七十万大军，向只有大约十六万人的共产党军队发动了第五次剿匪战役。这一次，靠着飞机大炮和德国人的指导，他终于战

胜了敌人的游击战术。他们设立了碉堡封锁线，然后逐步收缩，目的是迫使共产党人进行阵地战，或者以围困和饥饿的办法把他们消灭光。国民党军队实行的政策是除掉与共产党人混在一起的当地农民，把那个地区变成一片荒原，不能养活开展游击战的部队。房屋被烧毁，牲畜和人被赶走，田地无人耕种，村子里留下了一堆堆腐烂的尸体。国民党人用处决和饥饿的手段消灭了无数的中国同胞。1934 年 10 月，约计九万到十万人的共军残部突围西进，分散躲避蒋介石的飞机，开始了穿越中国内地的长征。他们经过一年的时间，行程五千英里到达了陕北的新的革命根据地。他们被赶走了，但是没有被消灭，问题依然存在。

1934 年 12 月，当华盛顿海军条约到期需要续定两年时，日本发出通知表示打算不再遵守该条约。军国主义者要求海军平等和终止五比五比三比例的制约。在他们的持续压力下，日本同西方的最后一个条约关系这时断绝了。

1935 年 6 月，史迪威在乘船前往中国的途中以《中国未来的局势》为题写下了他对形势的估计。这是一篇在战略上和政治上具有真知灼见的分析，反应出他一直在密切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他意识到日本的目标是控制西伯利亚东部、满洲、朝鲜、中国、福摩萨、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群岛，成为“远东的大国”。由于空军力量有了发展，日本就竭力使其本土不易遭到俄国的攻击，其做法是“把它的前线推进到戈壁沙漠，使俄国从另一侧作战”。日本这样做就需要逐渐侵吞和控制内蒙和华北。日本这一意图在它设法使平津地区“非军事化”，

也就是以日军取代中国军队时已经显而易见了。这一计划将扩大到华北各省，直至日本完全控制扬子江以北的广大地域，把华北的商业统统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而把上海留给“所谓的国民党人”。

史迪威写道：“有可能制止这种侵占吗？办不到。中国人是办不到的。”现在是必须进行抵抗的关键时刻，否则就为时太迟了。但是蒋介石没有表现出任何迹象说明他愿意冒与日本公开决裂的风险。“他知道自己会吃败仗，而失败就意味着后方会爆发叛乱。因此他情愿坐视不动，控制住他能够控制的一切，指望外国的影响帮助他保住外国企业十分集中的上海。”

史迪威认为，日本在中国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建立起对付俄国的“坚固的西部边防”。他认为中国人丢失华北，列强只会“大喊大叫一番”，美国“只会撰写照会而已”，然后大家“将再次接受既成事实”。日本不会遭到中国也不会遭到整个世界的认真反对。

史迪威的最后评语表明，他具有那种不寻常的才干——在一个历史进程刚刚开始时就能了解这一进程。他写道：“说来似乎奇怪，每一次成功的侵蚀会越来越被视为不可避免的事而加以接受，列强越来越不愿意呼吁停止侵略。”这番话是在历史正式把这个时代称为姑息时代以前史迪威对姑息时代下的精辟定义。

第七章　出任武官：中国最后的机会

1935—37年

史迪威晋升为上校以后，于1935年7月7日重返北平。这时中国的前途、日本的扩张和这些事对美国的影响都摆在他面前，等待他以军事观察家的身份去加以研究。武官要研究的主题是驻在国的能力和意图。作为一个情报官员，他的任务是随时向陆军部报告具有军事意义的各种因素和事态发展。他的消息来源有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参观部队，参加观看野外演习，接触需要接触的人和培养出外国的同行来，私人的代理人的报告，自己观察和听到的日常情况。在通常情况下，武官在其任务中下功夫最大的一个方面是社交活动；有一种说法是，参加舞会酒会等聚会就是工作。但是社交不是史迪威的长处；他避而不去北京俱乐部，那里的常客也不认为他是“我们自己人”。可是他与丹夫人(Mm.Dan)这样一位中国贵族相处甚得。丹夫人是作过慈禧太后宫女的一位满族皇亲，也是那个贵族中最杰出、最有教养的女人之一。史迪威一家常常招待她。史迪威还结识了另一些中国人，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到经营玉器的商人“翡翠乔”等各色人物。身为武官，他住的是为一位广州总督建造的、已有一百年历史的宅院，其中有许多小庭院和红漆柱子。他请人在客厅的一面墙

上画了一幅中国画，扩大了象牙扇柄的收藏量，购买了一些蒙古鞍毯、慈禧太后穿过的一件华丽的罩袍和其他珍宝。

中国人民的优良品质是中国的生活中的魅力，对许多西方人来说，这种魅力抵消了污秽、残忍、对别人的苦难漠然处之和轻视人的生命等等缺点。外国人，包括传教士之所以喜欢中国是因为在这里比在本国生活好，地位高，仆人多，安逸舒适。但是对史迪威这样的人来说，还有另一种吸引力，那就是能同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阶层接触。中国人有内在的尊严和自尊心，富于幽默感和耐力，思想敏捷，还有可爱的、优雅的女人。史迪威的助理武官、美国军界最有造诣的语言学家戴维·包瑞德上尉认为，中国人"最机敏、在很多方面最文明、总的来说最富有魅力(尤其是在他们想这样表现时)，当然一般来说也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人"。

如果说他们似乎在西方人所谓的忠诚中还有瑕疵，沉醉于官场的腐败是理所当然，在道德中不强调诚实，有时骄傲自大，有时过份敏感；那么，他们就以自己是古老而深奥的文化的继承者这一点来填补缺陷，遂使人们不得不表钦佩了。史迪威和他的同事们可以阅读孙子兵法而得益。孙子是公元前五世纪研究军事理论和实践的作家。克劳塞维兹① 相当多的著述和拿破仑的更多的著述，孙子早已论证过了。

在日本的压力下，完整的华北，犹如海滨遭到波涛冲刷的沙土峭壁，不断塌陷。自从两年前签订塘沽协定时日本军队停止军事进攻以来，他们一直在进行恫吓战，目标是割取华

① 克劳塞维兹(Karl Von Clausewitz)——普鲁士名将和军事战略作家(1780—1831)。——译注

北，使之成为满洲国那样的“自治”国。史迪威抵达中国的前一天，在历史上称为何梅协定的事件中，中国又丧失了一部分主权。日本关东军以中国对镇压抗日活动“缺乏诚意”因而违反了塘沽停战协定为理由，要求将抗日官员统统革职，以傀儡官员取而代之，并将留在河北的中央军撤走。委员长在北平的副手何应钦将军签字答应了这些条件。人民反蒋情绪加剧了。山东那位激烈主张独立的统治者、对日本和蒋介石同样反感的韩复榘将军拒绝让撤离河北的中央军穿过他的边界。在河北，为此感到不快的地方长官宋哲元将军（他忠于他的国家却奉命得同侵略者合作）被留下维持有名无实的中国主权，每天遭到日本人的侮辱。

近两年来，日本一直在施加各种形式的政治和军事压力，迫使南京“和解”，实际上是要它接受日本的渗透和控制。日本要中国退出国际联盟，中国为从西方获得贷款或其他形式的帮助所作的努力受到了挫折。中国即将失去外部援助。蒋介石深信中国的军事和工业力量敌不过日本，他认为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奉行屈从与和解的政策，同时指望时来运转。但是时运十分不佳。在法西斯主义在欧洲泛起、孤立主义在美国抬头的情况下，无论英国还是美国都不想因公开帮助中国而惹起与日本的纠纷。1935 年 3 月，希特勒因早已使德国退出国联，拒绝接受凡尔赛条约，并宣布德国打算重新进行武装。同年 5 月，意大利进攻了埃塞俄比亚。在美国，奈委员会① 透露的有关出售武器与美国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两件

① 奈委员会（Nye Committee）——以美国参议员杰拉尔德·普伦蒂斯·奈为首的委员会，1934—36 年调查了美国商人在促使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事的联系问题的情况使公众大为震惊；接着国会草拟了反对向交战国提供援助的中立法。

日本军人遍布华北，他们在大街上昂首阔步，用枪托驱赶挡路的中国人，向傀儡行政长官和官员发号施令，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气势汹汹的声明，大谈其领导亚洲各国人民的“神圣使命”，因而在北平表明中国被征服的日常情况比在南京还明显。虽然外国使团已在南京设立了由领事和代办主持的办事处，外交团不想完全离开北平迁到扬子江畔那座泥泞的城市中去。那里一年到头阴雨不断，很难找到新的房子，政府能否长期维持下去也是可疑的。由于在北平的交民巷里拥有房产，在俱乐部和西山避暑别墅里可过舒适生活，外国使团更愿意留在这座京都，因为这里的生活依然是快活的，尽管这种生活显然即将结束了。

南京已有数百年没有用作国都了，而且用史迪威的话来说，那里居住的是“令人讨厌的扬子江流域的人”。这些人不如北方人随和。北平的居民有一个信条，就是越往南的人越坏。然而国民党极力迫使各国公使馆迁移，以显示外国承认这个政权是稳定的。经过八年交道之后，这一点面子不能无限期地拖着不给。公使馆的人心里是不情愿的。正式的迁移工作定于 1936 年完成。美国在北平的使馆所在地变成了总领事馆，留下了一批外交官，使史迪威高兴的是其中包括这位武官。鉴于当时的时局，美国认为从军事角度继续注视华北的情况是可取的。

方面起的作用。杰拉尔德·普伦蒂斯·奈是个孤立主义者，曾主持制订中立法。——译注

1935 年，英美两国唯一能给南京的鼓励是把公使馆升级为大使馆，以便不让已经作了这一变动的日本在外交级别上高出一头。9 月间，史迪威到中国不久，美国公使纳尔逊·T.约翰逊在他的馆员们陪同下，在首都举行的一次正式仪式上以大使身份递交了国书。在显示那个场合的一张集体照片上，史迪威身穿雪白的服装，佩戴着各种奖章，从外表看上去是一位文质彬彬的武官的完美形象。

在其后的一个月里，他尽情地享受了访问暹罗的乐趣。他当时是被委任为驻中国兼驻暹罗武官的。他的几届前任都不曾费神到这个奇异的小王国去走一趟。暹罗是东南亚唯一的独立国。它之所以能独立原因是面对面地向前挺进的英法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那里相遇了，它们在侵占了边界地区对各自合适的几个府之后，准许这个王国作为一个权宜缓冲地继续存在下去。史迪威乘的是前去进行正式访问的美国大西洋舰队旗舰“奥古斯塔号”。他感到意外的是，这次同海军的接触使他很愉快。他在给温妮的信中写道：“每个人都待我若出访的王侯，而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陆军旅客。”曼谷这个在外交活动中几乎是一潭死水的地方，尽力款待了从“奥古斯塔号”上下来的这一行人。在宴会、社交聚会和王室人物接见之余，史迪威还参观了步兵、骑兵和防空部队，编写了一份关于暹罗陆军训练、编制和防御能力的详尽的报告。

到他于 11 月返回北平时，日本人采取的一次新的行动使华北局势再度陷入了危机。日本人决心完成割取北方五省（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和山东）的计划，在非军事区以北集结了重兵，在那里耀武扬威，竭力压宋哲元将军宣布华北地区

脱离南京的控制。宋是农民出身的山东大汉，有一副给人印象深刻的、如来佛一般的安祥面孔，嘴里常常衔着一支大雪茄烟。日本人同意了让他任冀察政务委员会主席，因为他们认为可以操纵他。其实他是有主见的人。如果日本人纠缠不休地贿赂、引诱或威胁他，他就会退职还乡，去履行为先辈扫墓的传统职责。他名义上统帅着拥有四个师、六万多人的第二十九军，但是按日本人提出的条件，他只能在冀北驻扎一万人。在 11 月这次新的压力下，他依从了，但是没有屈服，指望南京能作出抵抗的决定。由于有理由认为日本政府在对军队的行动支持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上再次发生了分裂，蒋介石按兵不动。

人们对委员长的意图越来越忧虑。一些人认为他不会冒险与日本人直接对抗，另一些人认为到时候他会掉头抵抗不再撤退，即使仅仅由于民众的坚决抗日态度使他不得不如此。宋子文对《时报》记者哈利特·阿本德说："是抗战的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即使战败也算有所作为。战败也胜过不战而放弃一切。"这是西方式的浪漫主义见解，对蒋介石是没有吸引力的。虽然据约翰逊大使说，蒋宋二人是政府内"仅有的栋梁"，他们却是意见相左的。美国的政策要视哪一种意见取胜而定。

华盛顿从驻华使馆和许多领事馆的观察家们那里得到的对中国的看法是悲观的。1934 年以来，他们的报告显示对于国民党能否成为一支统一和改革中国的力量已日益丧失信心。一位热情的中国人也有同样的失望情绪。胡适对一位美国朋友说，国民党"已经死了，但是尚未埋葬，而一切没有埋葬

的东西都会给活着的人们造成麻烦”。国民党从来没有成功地发挥帝王的那种中央集权作用。不仅君主政体消失了，它的统治机器王朝衙门也消失了，新机构却没有充分取而代之。与此同时，国民党的领导情况已经恶化，这个政权僵硬地停留在独裁和依靠军事力量的阶段，没有向自己许诺的人民福利和民主的第二和第三阶段迈进。中国仍然有一半人活不到三十岁。其中百分之七十五的人死于因肮脏而引起的可以预防的疾病。农民要缴纳的苛捐杂税多达四十四种，而且这些捐税常常提前几年甚至几十年征收。从土地到被褥和铁锅，从十一种军援项目到九种公共事业开支都要收捐税。当这些捐税还不能满足需要时，又会增添“临时经费税”或者“非常税”。和以往一样，“老百姓”要为政府——无论是帝王政府、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出钱。蒋介石把这笔收入的百分之八十用在军队身上了。

大学教职员、合作团体和改革家为进行社会改良和革新，为废除非法税收和帮助农民买回失去的土地所作的种种努力是勇敢的，但是因由来已久的社会冷漠而失败了。政府还是腐败无能。自从 1927 年以来湖北省五次更换省长，安徽六次更换省长。每一次更换后下属的局长、地方行政长官和基层官吏也被更换，因为他们要安置亲信，中央政府也要用这些职位作为支持和忠诚它的报酬。有关上层腐败的小道消息常常是外交人员向华盛顿写报告的主题。虽然孔祥熙是财政部长，但孔祥熙夫人“据说还利用购买军用飞机的所有交易提取一笔为数不很多但是收入稳定的佣金”。据传，她同她的妹妹蒋介石夫人曾操纵政府债券，并趁孔博士推行货币措施的机

会搞白银投机生意牟取暴利。约翰逊大使认为，孔博士和他的姻弟宋子文由于个人的种种金融利益，在考虑中国问题时不可能"无私心杂念"。

约翰逊大使(作为使团团长他是史迪威的当然上级)虽然对国民党失去了原有的信心，仍然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使中国不四分五裂的统治者。约翰逊是一位四十八岁的健壮的中产阶级人士，有一张丰满的大脸、日益稀疏的头发、一副日尔曼人的模样，然而他性格和蔼。他是从 1907 年到中国学习语言开始他的生涯的，并在从汉口到重庆等各个城市出任过领事。他从领事晋升为国务院远东司司长(1925—29 年)，曾经反对麦克默里公使 1927 年敦促美国插手反对国民党人的要求。约翰逊于 1929 年再次到中国出任公使。他在远东司的职务由斯坦利·亨培克接替，这个人在其后的十五年里一直是远东司中独断独行的人。约翰逊是多年来第一位会讲汉语的驻华大使。他对中国有广博的了解，虽然了解得不够精深。他不是那种自命不凡之辈，不举行盛大的宴会，也不经常举行北平那种侈奢的社交活动。约翰逊的座右铭是道教的一句格言"无为而无不为"，意思是"什么事也不要做，就会一切都做成了"。这句格言很适合他的气质，无论走到哪里，他总是用漂亮的书法写好这几个字挂在办公室的墙上。

约翰逊报告说，由于关东军已经把中国领导人弄得"胆战心惊"，"公开敌视日本的领导人都被赶离华北"。据种种消息说："南京政府已经十分软弱无能。"日本为摧毁中国的经济，切断它的海关收入而发动的走私运动日益猖獗。一包包一船船的棉花、人造丝、食糖、煤油、香烟和其他制成品源源不断地

从满洲和各海港用军用卡车偷运进来。地方官员有的被收买有的因遭到恫吓而默许这类活动。日本人通过他们的天津租界贩卖了大量的海洛因和吗啡。约翰逊在 1936 年写道，对中国海关的这种打击，“就我所知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采取的最残忍的行动，而且我相信这种行动会获得成功。”大使馆法律顾问威利斯·佩克（他从 1907 年就在中国）从南京发出的也是同样悲观的报告。他在关于中国建设的困难的一份例行报告中突然写进了这样的话：“船长喊道，太迟了，太迟了！”华盛顿听不到什么鼓励实行积极支持中国的政策的报告。

1935 年 11 月，日本为割取华北而发出最后通牒时，约翰逊预言他们能达到目的，除非中国组织抵抗力量“迫使他们使用武力”，这样就会使世界，尤其是国联和美国面临一种“尴尬”局势。

罗斯福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避免陷入这种尴尬境地。总统在其第一个任期中精力都陷入了国内的斗争中，无心去改变他的国民对插手别国纠纷的强烈反感。剩下的一点可以用在对外事务上的精力都集中在同拉丁美洲的睦邻政策上了。史汀生的努力反而造成了消极的结果，不仅没有帮助中国，还激怒了日本，因而他的继任者不想重蹈覆辙。美国新政府的政策重点是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而不是约束它。英国人也赞成慎重行事。由于在欧洲遇到的麻烦事已经够多的了，他们不希望在远东再发生一场冲突。

然而，他们在远东是有抵押品的：菲律宾、香港、商业利益。从对中国的传统支持和对付侵略的集体安全这两方面来说，还有个道义问题。西方列强不愿意被赶出远东，也没有决

心放弃中国。以往的一项原则是，中国的独立是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列强以借款、信贷和其他集体援助方式支持中国独立的各种努力激起了日本人十分强烈的反应，不得不放弃这方面的努力。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为安排财政上的帮助所作的不懈努力也毫无结果。参议院制订的购买白银政策破坏了中国的银本位货币制，摩根索感到美国有负于中国。但是他出于这种心情而发动的这一努力却因中国财政混乱不堪十分难办而归于失败。

要保持中国独立(且不用说强大)已经越来越困难了，而且鉴于激起了日本的敌对情绪，这样做也是危险的。在对中国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日益悲观的情绪的影响下，一些政策制订人也开始怀疑这种努力是否值得。外国在大陆经商是否一定需要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为什么不能同日本做生意？如果中国不能自救也没有自救的愿望，为什么要帮助中国从而激起日本的恶感呢？既然否定的证据更合意，因而人们发现门户开放最初的理论基础——以为可以给美商提供巨大机会——已经证明是个幻想。无论是整个远东还是中国，都没有实现1900年时帝国主义者们夸夸其谈的预言。在1935年美国的全部对外投资中，远东为百分之六，中国为百分之一。在从1931到35年期间美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同中国的贸易额不到百分之四。号称有四亿顾客的中国同美国的贸易额和美国的投资额相当于有七千万人的日本享有的数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在远东有大量实际利害关系的英国已开始感到中国的虚弱对英国利益的威胁大概会比日本的扩张所造成的威胁要

大。如果中国不强大，不足以维护自己的主权，那么，为了远东的和平，必须由某种权威来填补真空。考虑到目前形势中的危险因素，英国大使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向约翰逊大使建议说："也许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允许日本在亚洲自由行动。"但是他承认，"在这方面的推进开始之前做好撤退准备"是有困难的。

在华盛顿，决定政策的主导因素是担心会把日本激怒，促使它发动战争。正象约瑟夫·格鲁大使一再警告的那样，在日本民族主义处于狂热状态的时候，发动战争是完全可能的。无所作为成了指导原则。当日本不断向华北渗透但又未公然采取军事行动时，美国一直保持静默，期望如果不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敌，他们就会逐步退缩。美国的这种期望是日本的温和派不断培植起来的。赫尔国务卿写道，在整个三十年代期间，"日本外交官总是一有机会就向我们表示，日本有两种因素：一种是开明的、和平的文官势力；另一种是军方的扩张主义势力……如果我们不去剥夺日本军人在远东扩张的权利从而惹怒他们，和平的因素最终就会控制政府并确保和平。因此现在要由我们来防止在日本出现最糟糕的局面了。"

对美国的沉默感到吃惊的中国焦急地提出了询问，甚至表示它可能被迫与日本结盟。中国的暗示没有引起反应。赫尔国务卿决心悄悄减少美国与日本的关系中的危险。他在1935年12月就远东政策向报界发表声明时，以极其不愿触怒他人的态度小心翼翼地绕过了问题，几乎是在向日本保证美国不会出面干涉。

扭转局势的行动是中国人民采取的，也可以说是当时北平的那些敢于讲话的中国人采取的。日本人在华北的骄横行为促成了能够挫败日本的计划的一个因素——激昂的民族主义——的出现。南京为约制和镇压民族主义的公开表现所作的努力反而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当日本要求在 12 月 10 日以前宣布华北"自治"的这个最后通牒被奋不顾身的中国官员公布于众时，抗日要求爆发出来了。12 月 7 日在北平举行的大规模学生抗议活动就表达了这种要求。旁观的人群为他们鼓掌，然后不顾警察的阻拦也加入了游行队伍；甚至黄包车夫也呼喊起当时受到禁止的爱国口号。示威行动扩大到了其他城市；北平和天津举行了第二次、第三次示威游行，参加的群众数以万计。请愿书象雪片一样纷纷送到南京。学生们征用了京沪线上的火车，沿途劝说人民迫使政府坚决抵抗日本。组成了全国救亡联盟，其后的几个月里，又组织了三十个爱国抗日团体、协会和一个抗日"人民阵线"或称"统一战线"。

共产党的秘密人员和宣传促进了这一运动的发展。这时成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已成为共产国际的正式政策。这项政策是在共产国际于 1935 年 7至8 月举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在俄国看来，在它的西线好战的德国的复活，加上好战的日本在它背后在亚洲大陆上的出现，已成为最显著的现实情况。人们普遍预料俄日两国会发生冲突。

在关东军自满洲危机开始在大陆北部从事冒险活动的整个过程中，观察家们一直无法断定日本是打算沿着终将导致与俄国发生冲突的道路走下去呢还是继续设法并吞中国。由于关东军同东京的军国主义分子之间意见不一致，上述的任

何一种情况一直都是可能发生的。把日本人向南引是符合俄国人利益的，因为日本人在那里将陷入同中国人无休无止地搏斗的泥沼之中。因此，唤起抗日热情，激发中国奋起抵抗的意志便成了共产党关注的事。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主张抵抗不仅是充当了共产国际的工具，而且是由于这样做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因为如果能迫使蒋介石拿起武器来打日本，他就只好放弃无情地征讨共产党人的战役。此外，他们认识到(作为一个历史通则，即使不是马克思的原理)民族战争比阶级战争的号召力大，而且这种爱国事业能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北方的人民。

约翰逊曾预料，民族抵抗运动的发展将是迫使日本使用武力并使世界各国再次"陷入尴尬境地"的因素。在 12 月的示威游行之后，民众的呼声不能再忽视了，华北在日本鼓动下发表的"独立"宣言简直不象什么自决行动。于是这个宣言撤销了，日本人不得不暂时满足于建立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他们进行控制的基础。此后，所有的抗日活动都被谴责为共产党活动；日本成了亚洲的反共旗手并尽力压蒋介石与他们结成反共联盟。这种做法对许多中国人的吸引力绝不亚于同希特勒达成协议对英法两国的右翼所具有的吸引力。但是蒋介石深知，同日本人谈和必将危及他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地位。这样做就会授人以柄，使共产党人和他的其他许多敌手能鼓动国民反对他。南方的李一白集团已经在利用采取抗日行动的要求作为借口，再次企图赶他下台。

蒋继续在私下里谈论武装抵抗，而实际上除了对共产党人以外却不采取任何行动，他以这种手法稳住他的地位。他

一心要消灭共产党人，逮捕和关押了抗日运动领导人，镇压了全国救亡联盟。对于侵略者，他的政策是尽可能长期拖延问题。虽然害怕日本人，但他和他的同胞一直认为日本人是暂时的灾祸，中国人不用说人数上的优势，单凭卓越的智慧就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蒋并没有想向日本人屈服，相反他已经在促进四川的建设，目的是在日本压力过大时把他的政府迁到四川的偏僻城市重庆。

蒋指望能促使美国提早而不是为时过晚地给与援助；他给美国大使约翰逊带去口信说，他的政策是“继续”对日本进行武装抵抗。对美国来说，重要的是弄明白他这种意图是否现实，中国的积极抵抗使美国处于“尴尬境地”的可能性如何。因为战备情况会提供一些线索，寻找答案就是武官的任务了。

同过去一样，史迪威决定亲自出马调查，于是便开始了从华南到满洲的一系列旅行。1936 年 4 月，他首先到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两位将军在酝酿反叛活动的广州和两广地区。他这一次旅行不能说明问题。他不是乘坐可以直接抵达的火车，而是经过内地，靠公共汽车、小汽车、江轮、渡船和步行前去的。在前往桂林的途中，他曾经从一座偏僻的县城步行三十英里走到下一座县城。事后一位相识写道：“美国大使馆里大概只有你一个人到过那一带。”有一次他乘坐了一个车厢内有一百二十五人的三等车，因而得出结论说：“华南人真了不得，而且人太多了。”他在广州视察了军官学校，然后乘坐江轮去梧州，接着乘坐当地的公共汽车前往南宁，并在那里访晤了分裂派两领袖之一的李宗仁。在返回北方的途中，他在汉口认识了美国领事罗伯特·贾维斯。这个人“看来是有头脑的，因

此被派到了汉口”。

他从汉口乘上了返回北平的火车。在餐车中吃早点时的咖啡味道(象普鲁斯特的蛋糕)使他想起了 1920 年第一次到北京的情景——“正值秋高气爽的时候，微风拨动树叶，阳光仍然很热，空气新鲜宜人，一切都是新鲜的。当时孩子们还小，我们来日方长。现在不行了……那时的心情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因为一切都很新鲜吗？……没有忧虑，有希望出现新鲜有趣的事。孩子们还小。前头的日月长着呢……”史迪威写这段话时使用“现在不行了”这种低沉的用语，他还有一种时间太少了的奇异预感。当时史迪威是五十三岁，仅仅活过十年就去世了。

他在 6 月份的第二次旅行中才找到证据，可以回答中国政府是否在准备进行认真的军事抵抗的问题。回答是否定的。为了通过扬子江以北的军队部署情况来估计蒋介石的计划，史迪威动身去徐州，从那里乘东西走向的陇海线火车作了一番旅行。他发现徐州与 1927 年相比“欣欣向荣”。他向西穿过豫北地区——“平坦，肮脏，到处是尘土和砂子”——到了开封和洛阳；在返回徐州之后，又乘大运河的货船北上。在观察了部队的位置，辨明部队的番号之后，他报告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计划地作了抗击日军的进一步蚕食的防御部署。没有增加兵力，甚至没有想到过要增加兵力。没有训练和调动。”要么是中国人作了军事准备但“比任何别的国家的军事力量都更巧妙地隐蔽了这些战备活动，要么是他们根本没有作任何准备。”除了照常发给军事情报处以外，约翰逊还把史迪威的报告的抄件送给了国务卿。

史迪威依据军队的部署情况形成了对蒋介石带兵才干的藐视（表现在他自己的日记中）。“他可能就没打算采取什么行动，要不然就是他对准备用第一流的部队打仗的含意全然无知……如果他真的打算沿着陇海铁路作战，那他要么是个大笨蛋，因为到现在尚未作好准备；要么是个傻瓜，因为自以为打响以后可以立即投入战斗并能阻止住敌军。”根据这种毫无行动的状况来看，“好象日本人已经告诉他，他们目前不会再向前推进”。但是考虑到将来，如果蒋希望坚守陇海线，他应当改善交通线：“加固铁路。在南边铺设支线。在铁路以南地区修建公路网。但是现在未采取任何行动。”

他以厌恶的口气指出，然而，“蒋到处组织这种和那种新俱乐部。要求人们‘不要随地吐痰，不要拥挤’”。同大多数西方人一样，史迪威对蒋介石 1934 年为转移人民对日本的注意力而发动的新生活运动的种种口号十分反感。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端正品行、举止，改进社会服务，提高清洁水平，培养诚实作风，消除吸鸦片的恶习和贪污、贿赂行为，这是在实行孔夫子的“礼教”，因而对一些中国人来说是有意义的。在不熟悉当地现象的西方人看来，反对吐痰和吃饭时喧哗的训诫和要人们“不要拖拉”，“端正姿势”，“消灭老鼠和打苍蝇”的劝告，在一个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来对付国家的危难的时刻似乎都是毫无意义的儿戏。

史迪威对中国军事力量作了估计。他的办法是逐省登记，然后具体列出军和师，并附有指挥官的名字、司令部所在地和各部队的不同人数。根据他所作的估计，不算非正规军，1936 年 8 月中央政府的军队总共有一百三十万人，另有地方

军队三十六万人。在冯·法尔肯豪斯将军(他接替了汉斯·冯·塞克特将军任蒋的顾问)的指导下,蒋正在努力训练和装备一支有战斗力的陆军。现在有三十六名德国教官在黄埔军校任教,取代了过去的俄国人,并且通过他们的关系办妥了购买德国武器的交易。然而由于政治制度没有真正改变,仍然无法把中国军队统一整编为国民军。蒋介石的权威象欧洲中世纪的国王一样,是依靠地方权贵的多少有点自愿性质的效忠来维持的。至于基层的改革,即在普通士兵家庭生活情况和要求他们为之战斗的生活条件方面,却没有设法做什么事。蒋不是具有使人钦佩的精力来摧毁旧事物的一位活动家。他没有改变任何东西。他是一个毫无目标,只是要保持一切的保守者。

正象史迪威前一年给情报部的报告中所写的:"对中国来说不幸的是,眼前没有其他有影响的领导人……能取代他并具有与他获得的相仿的威望。"他指出,缺少能出来接替的领导人是"所有独裁统治的共同"弱点。

史迪威分别于7月和9月两次去南京,继续调查研究。他在那里视察了步校和炮校,结识了各类中国官员,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他的祸根的何应钦将军。他开始搜集关于共产党第四军的情报和关于现在以西安为基地的张学良的东北军部队的情报。据提供情报的人士说,这位少帅已经戒了鸦片,但是"却没有管他的部队,只是乘他的私人飞机到处游荡。"

南京对史迪威没有吸引力。"如果命令我到南京工作,我怎么办呢?"史迪威自问自答说:"退休回家。"在冀东政务委员会成立之后,在日本深入蚕食的情况下,甚至北平的吸引力也

在逐渐消失。在交民巷的北大场，日军步兵和骑兵每天在刺耳的军号声中进行军事操练。日本官员乘坐着插了太阳旗的小汽车在大街上飞驰。日本军官骑着高头大马到处乱跑。对他们来说，这些马太高大了，没有人帮助就骑不上去；必要时，他们的勤务兵徒步跟在后面。日本企业家和其他非军事人员住满了旅馆，开设了他们自己的酒吧间和妓院，到高尔夫球场去打球。在人带领下周游满洲国和华北的一批批日本中学生游览了天坛和颐和园。不用说，史迪威也和其他所有关心中国的人们一样憎恶这些日本人，而且由于他天生就易产生敌意，表现出的情绪就更为强烈。他在河南旅行时，碰到一些日本人遭到当地警察戏弄的情况。他写道："我感觉很痛快并鼓动他们整这些人。"

带着这种情绪去满洲国旅行则需要克制一点。他约见了这个"自治"国的外交部长。这个人竟然是大桥先生，一个日本人；这毫不使他感到意外。这位官员宣称："我们都在阻止俄国实现其把亚洲苏维埃化的目标。"大桥先生在回答史迪威的问题时说，"当然俄国人打算"在亚洲"进一步扩张"，因而"对日本来说"形势是"极其严重的"。如果满洲国和日本战败，中国就唾手可得了。因此日本面临着一场"极大的危机"，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后的五年内作出决断。当时是 1936 年 9 月。史迪威就这次采访写给军事情报处的报告在美国政府内部广泛地分发传阅。

当年 10 月，蒋介石又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对共产党人发动第六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围剿。他希望在这期间，通过英美两国的斡旋，能使日本不要采取什么行动。中国人要求美国

劝说日本奉行温和政策，但是美国不想插手。当中国大使求见并问及在万一发生冲突时美国采取什么态度时，赫尔国务卿只能回答说，“我国当然非常希望和平”，“我们真诚希望不会发生冲突”。

也有人试探了史迪威。一位中国上校带着上司的建议来找他，要求美中两国达成制止日本的“谅解”，然后在华盛顿建立一个中美联合总参谋部负责制订军事计划。来人对史迪威说，“如果美国采取行动是能够制止日本的”，但是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日本终将控制中国的资源，那将有损于美国。史迪威在他的报告中评论说：“看来这再次表明中国总想让别人来干他们自己不敢干的事。”他还精明地补充说：“这番话可能是暗示说，他们不打算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抵抗日本。”

他也被道家那个主张无所动作的箴言感染了。这个箴言是他从紫禁城的太和殿抄来的。那里只有前两个字“无为”（也就是说“什么也不要做”），让看到这两个字的中国人自己在心里加上“而无不为”。史迪威断定“无为”代表了中国人的特性，他得出结论说：“他们天生讨厌影响正常生活的事件。”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例外否定这种看法，他的发现却说明了东方人生活中对西方人极不耐心的性格大有裨益的事实。正象吉卜林在为一个人写墓志铭时指出的：“这里躺着一个曾经试图推动东方的傻子。”形成对照的是，欧洲人和他们的后裔美国人容易冲动的性格驱使他们去改变不理想的东西，采取行动，避离压迫，开辟新边疆，远渡重洋。他们是乐观主义者，相信行动的效果。另一方面，中国人则长期生活在一个地方，住在层层围墙之内，住宅有院墙，村庄有围墙，城市有城墙。他

们不离开自己的乡土，在家族权威之下生活，在祖先的坟墓之间的空地上种粮食，永远维护一种重和睦轻斗争的制度。

1936 年，国际上乌云密布，法西斯主义胆子大起来了，各民主国家虚弱了。3 月间，一批极端主义的日本军官试图暗杀几位老政治家，发动一场政变。这次政变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使反对军国主义的人畏惧了。3 月，希特勒占领莱茵兰，竟然没有遭到反对。5 月，墨索里尼吞并埃塞俄比亚；国联撤销了制裁意大利的空洞的决定；英国舰队为了不刺激他们也撤离了东地中海。蒋介石并不是唯一没有进行抵抗的人。在日内瓦，那个身披斗篷的瘦小孤独的人物、流亡在外的海尔·塞拉西在最后向列强发出要求支持的呼吁时警告说："……如果不来支持我，西方就会灭亡。"7 月，在几个独裁者支持下发生的右翼叛乱使西班牙陷入了内战。这时，在共产党人的鼓动下，抵抗运动开始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激情集中到西班牙身上，"联合战线"变成了一支活跃的力量；虽然各民主国躲在"不干涉"的屏幕后不想过问，但是迎接即将来临的斗争的阵容已经逐渐形成。这一点日本是明察的，它在当年 11 月同德国携手，达成了反共产国际条约。

在中国，共产党人似乎高举起抗战的火炬。1936 年，他们在山西发动了一次进攻，使人印象非常深刻。他们表面上是在抗日，实际上是在寻找根据地，招募农民，筹集粮款。他们主要是同阎锡山的地方军队打仗，但是他们号召爱国抗日的宣传，加上枪毙一些地主和税吏，在那个地区激起了广泛的热情。

史迪威于 3 月初到晋北的太原和汾州去调查了这次军事

行动并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口号是“打倒阎锡山”和“打倒日本”，共产党人之所以打这一仗是因为陕西缺少粮食，他们“除了寻找维持生存的新地盘外并没有固定的目标”。他在给陆军情报部写的报告中指出，由于阎锡山的军队作战不力，这次突破没费多大气力。有一个旅没有参战以阻止“赤匪”进入山西，“因为地点不在他们的防区之内”。还有一个旅遭到了“赤匪”的伏击，“因为电话通讯弄错了，汾州驻军司令还以为在同自己的部队通话”。“如果根据战斗表现来判断中国的武装部队，就是谈论要抵抗日本也是没有意义的。”

尽管如此，共产党人仍然加强了抗日宣传运动。他们在8月份发表了给国民党的公开信，表示愿意为抵抗侵略者而联合起来，成立“中华民主共和国”。由于两个不共戴天之敌还没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联合，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促使蒋介石同日本发生公开冲突。

史迪威在一篇没有日期的日记中自问“共产党人靠的是什么力量呢？”“他们那里有某种精神上的支持。这种精神上的支持又是什么呢？”随后他提出了一个很逗趣的想法：“给贺龙写封信问问他怎么样？”贺龙是共产党红二军军长，从1928年到1935年11月一直在鄂豫两省边界上活动，在主力部队走了一年之后才于1935年11月带着他的队伍开始长征。史迪威的文件中没有提到他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认识贺龙的，也没有提到他打算怎么把信送达贺龙。

他在笔记中继续写道：“他们的情报工作搞得很好。组织健全，战术高明。他们不要大城市，甘愿在农村过艰苦的生活。他们的武器和装备很差，然而却把政府吓得要死。”这些

是与国民党的没落形成明显对照的因素，给外国观察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史迪威花了一段时间尽量了解关于共产党人的情况，他显然也会让别的武官使用他获得的情报。英国大使馆在 1936 年 2 月发的一项照会中就曾表示感谢他给了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情况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册子”。

史迪威熟悉中国农民的苦难而不熟悉马克思主义，他把共产党人的出现视为一种地方现象和遭受压迫的自然结果。他在写到农民时说:“由于身受饥荒、旱灾和沉重的租税和利息的压力、中间人和地主的压榨，他们自然要奋起改变所有制，这就使他们成了共产党人——至少这是对他们的称呼。他们的领袖采纳了共产党的方法和口号，但是真正追求的是在合理的条件下拥有土地。做共产党人并不是中国人的天性。”

这种分析在当时是一种标准的看法。有些外国人在国内时本来会认为共产党人是一种十分邪恶的威胁，可是到了中国就认为他们是中国由来已久的灾难的产物，是想有所作为的改革者；就象贾维斯领事对史迪威说的那样:“他们根本不是共产党人。”美国商业界的喉舌《大美晚报》在国内就会采纳商会的观点，现在却宣称，中国共产党人有些“很卓越的见解……根本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愿意考虑任何人的意见的”。总之，他们在实行明显的改革措施。他们的军事组织和对待士兵的态度是与中国的旧习全然不同的。这一点给乔治·林奇上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林奇上校是史迪威任武官期间的第十五步兵团团长，也是西点军校的校友。他在 1932 年从菲律宾来中国休假时在江西看到共产党军队，发现他们

不抓壮丁，却给士兵发饷，不允许他们欺负老百姓。他向军事情报局报告说："这种做法与南京政府控制下的地区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因此，国民党军队中开小差到共军方面去的人不计其数。

两年以后，美国驻云南府副领事阿瑟·林沃尔特在描绘他看到的经过西南的长征队伍时写到了共产党人表现出来的高昂士气和"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目标一致"。虽然装备简陋，吃不饱饭，经过多年的战斗而疲惫不堪，但是他们是由经历过艰难困苦磨练的人领导的，他们作为一个组织，表现出了"太平天国以来中国大的力量集体中所不曾有过的献身精神和无私品德"。

外国公众几乎完全不了解共产党人。因此，当《密勒氏评论报》于1936年11月发表访问共产党人的第一个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文章时，引起了一场轰动，在南京引起的则是一场不愉快的轰动。这些文章是他对共产党领导人的一系列富于同情心的采访记和对他们在陕西的延安建立的准国家的一篇亲身见闻。斯诺的报道后来在中国和外国被广泛转载，又以《红星照耀中国》① 为书名汇编发表，从而使世界第一次看到了关于英勇的长征的新闻和关于共产党的人物、生活方式、信仰和意图的描绘。他尽量突出他们拥护抗日事业，而这一点在三十年代的气氛中，当人们迫切希望展开反法西斯战斗的时候，是极有吸引力的，他们的劲头甚至超越了马克思主义。

---

① 《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 在1938年发表中译本时定名为《西行漫记》。

正如毛泽东接见斯诺时阐明的那样，打败日本比社会革命重要，因为首先需要战胜外国帝国主义并赢得独立；只有到那时，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才能取得成功。因此，他愿意同国民党联合抗击这个帝国主义敌人。毛的话很有说服力。“对于一个被剥夺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的任务不是立即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争取独立。如果我们被剥夺了一个实践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就无从谈起。”① 他坦率地说，在中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摧毁了帝国主义最强大的一个根据地，从而会加速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如果中国赢得了独立，世界革命就会非常迅速地发展。”②

继斯诺之后还有一些美国记者到了延安，发现他们的生活简朴的主人是吸引人的。他们参加田间劳动，言谈诚挚，有英勇的经历，看起来与日暮途穷的国民党形成了令人振奋的对照。由于他们似乎把革命放在第二位，外国记者没有怎么注意到这个问题。正象史迪威认为的那样，“共产主义”好象只是个名义。

1936 年 12 月，蒋介石到西安去发动第六次反共进攻，他在那里经历了一个现代国家元首从未经历过的十分奇特的事件。他被本来打算任命为这次进攻的总司令的张学良绑架了。这次绑架目的是说服他放弃内战和同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少帅的部队不想打共产党。他们是离开了满洲家乡的流亡者。蒋动员了坦克、轰炸机和十个师的军队后，前去坚持要

---

① 见埃德加·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中文本 1979 年 12 月版第 374 页。——译注

② 同上。

他们开战。随即发生了果断的绑架行动，此举使中国人目瞪口呆，使全世界大为震惊。

人们预料蒋的性命危在旦夕，他自己也完全感觉到了，少帅的一些同事也确实主张杀了他。使他活命的因素是还需要用他。西安、延安、惊恐的南京、特别是莫斯科的人们立刻都看出同一可能性——如果把蒋干掉，中国将陷入混乱，内战将扩大，谁也不会得到好处，只有日本会从中渔利。在遭到绑架之前，蒋在民间是不得人心的，他的支持者也并不满腔热情地崇敬他，但是由于人们有服从家长的习惯，也由于人们感到生活在一种权威（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这种权威是归国家元首所享有的）之下是安全的，所以人们还是指靠他。没有人有足够的威望来接替他，也没有哪个党在台上能维持三个月以上。只有蒋介石能够制止内战，把全国团结起来对付日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参加绑架后的谈判的共产党人却救了他一命，当然这主要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愿，而是莫斯科坚持必须这样做。俄国人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宁愿保住蒋介石而不希望中国陷入混乱，因为那样最终有利于日本。

在蒋的命运未卜时，外国武官们奉命赶到了洛阳。当时西安已落入叛军之手，洛阳是距西安最近的一个国民党地盘。西方列强虽然不象俄国那样与此事关系极大，也担心中国陷入混乱，希望武官们的到达能起到施加某种压力的作用，迫使释放蒋介石。事实证明他们此行是多余的。史迪威在圣诞节赶到了洛阳，正好这位委员长乘飞机抵达洛阳。使全世界大吃一惊的是，原先扣押他的人也随同来到了洛阳。蒋获释的新闻使大众转忧为喜，普遍松了一口气。蒋介石的声望提高

了，张学良被软禁起来，从那天起一直软禁到现在，他受到的监视有时严一些，有时松一些。①

虽然尽了一切努力保全面子，避免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好象蒋是在答应了条件之后才获释的，但是，事实上他同意停止第六次清剿战役，并筹措同共产党人搞某种有名无实的抗日联合。共产党人也同意停止对地主的斗争并将他们的武装力量置于国民党的指挥之下。在其后的几个月里，进行了讲条件的错综复杂的谈判，双方都没有理由信赖对方，都没有放弃最终消灭对方的目标。国民党深知共产党要利用对日作战作为自己取得胜利的跳板，因此决心不在抗日战争中陷得太深而使国民党得利。蒋介石的目的仍然是避免和推迟同日军直接冲突，除非外国来帮助并给他足够的援助，使他既能打败日本人又能打败共产党人，最后使他成为独自大获全胜的人。

西方对西安事变之后出现的民族团结与合作的迹象印象很好。共产党的部队编成了隶属于南京的第八路军，在首都设立了办事处，甚至出版了报纸。华盛顿认为，从约翰逊大使等人的报告来看，真正的变化、为实现政权民主化所作的真正努力、真正的团结，可能已终于开始。

日本人也从西安事变的结局中看到了一个苗头。他们认识到，中国人正在产生民族团结感，而这种团结，用他们的陆军大臣杉山将军 1937 年 5 月的话说，会“从根本上阻碍日本的和平挺进”。关东军和东京的军国主义者开始逼迫政府采取直接行动。

---

① 张学良现在居住台湾。人们常常在星期日在委员长去的同一个教堂里看到他。

史迪威对西安事变之后出现的和解的表面现象并没有过份乐观。他在1937年初写的一份估计中日形势的材料中说："目前中国关于民主的议论是毫无意义的空谈。"他预料政府将"推行拖延政策，硬说政府正在准备战斗，其实并不想真打。他们希望由别人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中国十分软弱无力，看来外部给予帮助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他写道，对付日本，中国仅有的本钱是"地广人多和仇视。中国既没有领袖、士气、团结、弹药，又没有统一筹划的军训"。此外，一旦发生战争，日本可以封锁中国的港口。

但是史迪威也知道中国人的天资，这使他相信中国人是有潜力的。史迪威在研究了太平军在1853至1855年的北进和大清帝国将领左宗棠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为镇压突厥的穆斯林叛乱而发动的征战，发现了"对那些认为中国人已经衰颓无望的人们的一个教训"。对于怀疑中国人的军事能力的任何人来说，左宗棠的西征——"历史上最杰出的战役之一"——就是说明中国人有军事能力的证据。左做到了"既谨慎又大胆"，"既发挥了主动性又始终不屈不挠"；他"对局势了如指掌"，采取了有周密计划的行动，进行了"迅猛的追击"，并且找到了更著名的将领也会却步的解决办法。史迪威不仅赞扬了将官也赞扬了他们的士兵（军事历史学家的习惯并非如此），认为"就这一卓越战绩而言"，对中国军队和他们的将领作多么高的评价也不过份。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显然有助于他形成后来在中国任职时具有的信心。

他感到中国的前景是阴暗的，因而那年6月欣然离开北平，同他的朋友、法国武官萨巴蒂埃上校动身去绥远和蒙古。

他给温妮写信说，他想去五台山并从那里步行大约一百五十英里到达铁路线。

他的专家声誉日益提高了。林奇上校从第十五步兵团回华盛顿时报告说："在我看来，史迪威十分熟悉中国和远东，美军中的军官无出其右者。"他在中国的探索"使他掌握了其他任何人都不具备的背景知识"。

第八章　驻华武官：中日战争

1937—39 年

1937 年 7 月 7 日晚，皓月当空。紫禁城北海的湖面上，船夫用篙撑着一艘挂着灯笼的游船游弋。美国大使馆的几个人坐在船上，悠闲地欣赏着周围静谧宜人的夜景。他们是史迪威上校夫妇和女儿史文思、约翰逊大使夫妇、大使馆海军陆战队卫队长约翰·马斯顿上校夫妇以及史迪威的好友约翰·戈特。船夫有节奏地沿船舷来回走动，用竹篙撑船。约翰逊大使用吉他弹起他喜爱的歌曲《走在令人厌倦的道路上》。灯笼微弱的烛光闪耀在水面上。岸上，高大的白大理石舍利子塔披着柔和的月光，矗立在夜色之中，仿佛是一尊巨大的佛杯。他们沉浸在古代北京的情景之中，后来有一艘载着一群日本军官的游船从旁边划过，他们才猛然醒悟过来。

马斯顿上校告诉大家，他作为外国派遣军的高级军官，今天接到日军的通知，说有一批日军今晚要开赴北平以西十二英里、位于京汉线上的铁路桥芦沟桥举行军事演习。日军在那个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已达两周，引起了当地报纸的不安猜测。京汉线是通往北平的仅有的一条不受日军控制的通道。芦沟桥是连接通往天津的铁路线的重要枢纽。在那里，有座石桥同铁路桥平行，它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桥上有三十个优雅的拱形桥洞，两旁的桥栏上雕着大理石狮子。在公元十三

世纪的时候，西方第一位从桥上经过的旅行家称赞它是中国最美丽的名胜古迹之一。后来，为了纪念那位旅行家，人们把它称为马可·波罗桥。

翌日上午八时，史迪威的武官处获悉芦沟桥发生一场小冲突。日军声称驻守在附近宛平县的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的部队向他们开枪射击，他们遂用迫击炮和大炮轰击宛平，逼迫中国守军交出他们归罪的中国军官。武官助理包瑞德少校奉史迪威的命令，同戈特一道驱车前往出事地点了解情况。他们赶到现场时，战斗已经停息。夏季的早晨，阳光明媚，周围静谧，只偶尔传来一、两声枪响。但是，他们看见一排日本兵守着一具日本军人的尸体，这引起了他们的不安。他们认为日军可能会借此向中国提出过份要求，意识到一场事变已迫在眉睫。后来事实证明这就是中日战争的开始。

宛平县的中国守军指挥官拒绝了日军提出的条件，双方正在举行谈判。包瑞德返回武官处的时候，史迪威已获悉大批关东军正穿过长城。虽然日方还在宛平县上演谈判剧，但是，史迪威和包瑞德一致认为，日军显然是开始采取行动占领华北了。北平城里气氛紧张，谁也搞不清这场冲突背后的真正意图和蒋介石会采取什么对策。事变后的第三天，史迪威乘车前往宛平，当他的汽车距宛平城还有五百码的时候，双方突然猛烈开火。他的司机立即调转车头，“车子两轮离地，飞也似地跑开了”。

史迪威的武官处收到的报告表明，一万日军正从关外调进河北，运送兵员的列车每隔半小时一趟，源源不断地开进山海关。为了及时报告局势发展情况，史迪威挑选五名高级语

言教官，组成一个情报网。这五个人都在他手下担任过武官助理，并被他派驻各城市。其中四个人已调到第十五步兵团任职，有两人，即弗兰克·罗伯茨上尉和弗兰克·多恩上尉，在以后的年代里又调到远东在史迪威手下工作。史迪威的儿子小乔当时正在驻天津的第十五步兵团服役，跟新闻记者、领事、美孚石油公司人员以及其他所有能从谣言的迷雾中发现蛛丝马迹的人一样，他也被聘为情报员。当时，只有通过把一些确凿的细节综合在一起，才能对局势作出基本估计。这些细节包括从天津上空飞过的日本飞机的架次、运送兵员和物资的日军列车和卡车数目、中国军队驻扎的方位和中国军队集结的迹象——这一点是最难发现的——以及表明中国政府意图的其他线索。

史迪威采取了一种对武官来说是非正统的做法：他把自己发给参谋部军事情报部的电文底稿汇集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上，供记者翻阅。他对包瑞德说，他这样做是想向记者提供尽可能确切的情况，“以便让全世界及时了解日军侵略关内的真相”。史迪威支持中国，他对中国陷入危机深为关注。

南京的沉默使人感到没有指望。谁都知道，蒋介石根本就不在首都。日军提出最后通牒，限 7 月 18 日前答复。蒋介石终于在庐山发表了讲话。庐山是个避暑胜地，外国人和中国上层人物为了躲避长江流域讨厌的酷热，往往乘轿上山避暑。蒋介石在讲话中没有号召军民采取行动进行抵抗，也没有排除同日方达成解决办法的可能性。他宣布在华北不能再放弃阵地，并说同日方达成的任何解决办法都不得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他的讲话表明中国已经忍无可忍，认为

必须进行武装抵抗。蒋介石的讲话在北平广播后，激动的人群敲锣打鼓，吹奏喇叭，纷纷涌上大街。

人民的热情几天后便烟消云散了，因为政府没有打算，也没有准备动员全国人民抗战。而且，日军在一周内就控制了北平。使史迪威感到愤怒的是，日军指责中国军队向他们挑衅，声称自己是在进行“自卫”，以及日军犯下种种罪行，而美国却迟迟不表态。后来，美国国务卿赫尔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但没有明确表明美国的立场。史迪威评论说：“赫尔先生再次说我们反对打仗，反对打仗，就应该迅速制止战争。”

史迪威的妻子到秦皇岛去送大女儿和二女儿回美国，要在海滨呆到8月中旬才回北平。他孤独一人，情绪非常低落。他在写给温妮的信中说：“气氛悲惨、阴郁。一切都是暗淡的。天呀，我一想到确实已蒙受打击，就感到不舒服……这可能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也可能只是狂风暴雨来临前的短暂沉寂——现在还说不准。但是，不管怎么说，华北算是完了。”

虽然宋哲元将军的意图让人捉摸不透而且盛传他已经“倒戈”，但是，北平郊区仍继续有零星战斗。7月29日，日本飞机轰炸了天津，重点目标是南开大学。日本几个中队的轰炸机从郊外三英里远的一个机场轮番起飞，“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地”朝南开大学的建筑物投掷大批燃烧弹，轰炸共持续了四小时之久。日本军部对报界说，南开大学校园里隐藏着“抗日分子”，必须予以彻底摧毁。“抗日分子”指的就是学生，因为学生是鼓舞民族情绪的主力军。轰炸南开大学的目的是摧毁学生的活动基地，让他们无法再鼓动游行示威和印发传单。日军在华作战期间同他们过去在朝鲜打仗时一样，自始至终

有计划地破坏民族觉悟的源泉——学校。

日军在通往天坛的路上伏击了一支中国部队，打死五、六百人，其中大部份是没有携带武器的士兵。许多人被炸得血肉横飞，有的炸掉了脑袋，有的炸掉了胳膊和腿。史迪威同包瑞德一道到现场观察，看到三十卡车士兵全被打死，无一人幸免。车身上血迹斑斑，司机的尸体躺在车轮旁边。附近的村民说，日军起初许诺，中国部队若放下武器，就允许他们投降。但是，当他们从村子里走出来后，日军突然用机枪和手榴弹朝他们猛烈扫射袭击，象刈草似地把他们全部扫倒和炸死。在7月的烈日曝晒下，死马的肚子膨胀得鼓鼓的，士兵的尸体躺在沟渠里。“有一具尸体的眼睛还大大地睁着，成群的苍蝇在上面爬动。”

在冀察傀儡政府所在地通县，保安队听到中国军队在北平附近打了“胜仗”的谣传信以为真，于是举行哗变。他们杀死了大批日本官员和傀儡官员，并打算控制驻地。但是，他们没有成功。日本人调去增援部队，把他们消灭了。整座县城变成了一片废墟。

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在四天内全部撤走了，该地区遂被日军控制。史迪威对中国缺乏统一的防御政策和计划以及芦沟桥和通县的无谓牺牲感到十分愤怒。中国人丧失了许多良机，“人们无法不极为憎恶他们”。史迪威写道，诚然，他们不可能打败日军，但是，如果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并下令发动攻击，他们是可以重创日军的。

尽管为时已晚，但中央政府还是开始调集兵力进行防御了。政府释放了在押的全国救亡同盟领导人，而且取消了对

抗日歌曲和抗日口号的禁令。现在，人们在大街上公开高唱抗日歌曲，广播电台也开始正式播送抗日歌曲。反蒋八年的白崇禧也从华南飞抵南京，向蒋介石保证两广军队愿意效力。为了巩固他们之间的联合，蒋介石任命白崇禧担任参谋总长。滇川的军阀也团结到政府周围。截止8月底，全国所有的军队，包括共产党的军队，合编在一起，据称归中央统一指挥。共产党的军队改编为八路军。

共产党指挥的八路军的一个师在山西北部平型关打了第一场胜仗。这场胜仗规模很小，但振奋人心，也引起了史迪威的注意。该师采取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机动游击战术，在友好的老百姓的支援下，在长城脚下的一个山口伏击并歼灭了日军一个旅，占领了旅部，缴获了辎重。那场战斗虽然只起了暂时牵制日军的作用，但它说明共产党掌握了值得研究的战术。几个月后，史迪威同史沫特莱一道花了整整半天的时间分析了平型关战役。史沫特莱是自由撰稿记者，曾到北方共军地区住过几个月。

9月24日，日军占领了保定。保定位于京汉线上，是宋哲元的总部所在地。三万日军随着他们自己东征西讨，产生了一种疯狂的野蛮特性，他们兽性大发，在保定恣意烧杀奸淫掠夺长达一周之久。士兵们象被征服土地上的鬣狗似地凶残，越是得手就越发贪婪嗜血，但这种凶残本身必将招致失败。日本知道，一个敌对的中国总有一天会使日本成为亚洲领袖的企图失败。在他们占领中国大陆的岁月里，最使他们恼怒的是中国不断出现抗日情绪。他们年年都坚持必须迫使中国“诚心实意地”同他们合作。他们想控制中国，但发觉非

征服中国不可。他们每向前推进一步都会引起中国的更大仇恨，他们从而又不得不对中国更加残暴。在保定，除了肉体上的恐怖行动外，日军还把学校的教科书统统烧毁，焚书的熊熊大火足足燃烧了一周。此外，他们还把河北医学院的图书馆和实验室付之一炬。农学院积累十余年的农业资料也遭到蓄意破坏，那些资料都是该校制订改进耕作方法计划的依据。

8月月中，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蔓延到了长江流域，但这并不是日军的意图。在马可·波罗桥爆发战争的时候，日军原以为也许只要三个月就能割据华北。他们认为，南京政府会象以往那样无可奈何地予以默认，或者随着日军占领越来越多的城镇、工业区和交通线，最后被迫屈服，象傀儡政权那样同日本合作。但是，蒋介石故意把战火引向上海。他以为把日军拖到中国心脏地区能使全国以更大的决心抗战，而且他自己也更有可能推行他始终没有放弃的策略——设法促使外国进行干预。蒋介石自始至终死抱着一个宗旨：消灭共产党，等待外国来帮助中国击败日本。他认为，上海是个有大量外国投资的国际城市，一旦在上海打起来，英美等列强势必会出面调解，甚至会出兵干涉。

蒋介石把他的德国顾问训练的几个最精锐的师从南京调到上海边缘的闸北地区。他也许是认为，只要在那里打起来，就可能造成涉及到外国侨民或财产的事件。日本在公共租界里驻扎着一支海军陆战队，黄浦江里停泊着许多日本军舰，舰上吓人的大炮原没打算开火，只想吓唬一下中国。同时，关东军在华北加强了控制。但是，随着中国军队向上海进发，日军突然意识到必须掌握优势。他们用船只向上海调遣了增援部

队，随后扩大了防线，企图击溃中国军队。但是，在中国军队的奋力打击下，日军一下子就被击退了。此后，一场胜负难决的悲壮战争就在外国人的眼皮底下爆发了。在第一周里，中国军队攻势凌厉，几乎将日军赶到江边。后来，日军凭借军舰的炮火和空中优势，设法调来增援部队进行反攻。日本援军最后终于登陆，从两翼包围了中国军队的阵地。从福摩萨空军基地起飞的日本轰炸机和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不停地轰炸和炮击。中国军队在这种极其险恶的情况下奋战，坚守了三个月。上海战役是1918年兴登堡防线崩溃以来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报道得最广泛的一场重要战役。

吞没上海的炮火硝烟虽然未能促使任何国家提供援助，但毕竟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在1927年曾经统率过闻名的"铁军"的张发奎将军的指挥下，中国军队向本国同胞和世界人民显示了自己的战斗意志。蒋介石不听白崇禧等人的紧急劝告，在阵地已毫无希望据守时仍下令坚守，结果使中国军队遭受了惊人的伤亡，付出的代价比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战役以来的任何一场战役还要大。蒋介石在上海没有别的作战计划，唯死守而已，但他是想打动世界舆论。由于他拖长了上海保卫战的时间，许多中国人强烈谴责他，永远不会原谅他。固执己见是他施政的特性。他很可能是以为，中国守军的巨大苦难最后一定会感动列强。

在日军俯冲式飞机的轰炸和野战炮在六十码的近距离内的轰击下，中国军队最后弹尽粮绝，伤亡惨重，防线终于崩溃。最后几天的抵抗纯系徒劳，使军队白白蒙受了损失。到接到撤退命令时，日军援军已登陆，从西侧包抄了中国军队的退

路。中国军队的一位指挥官描绘说：在敌军的炮火下，“撤退中伤亡之惨重简直难以用笔墨形容”。部队损失了百分之六十，受过训练的全部军官团损失了百分之十。

上海保卫战使全世界想到了中国。有张照片显示大轰炸后一个婴儿坐在轨道之间啼哭，周围一片废墟，街上空无一人。这是有史以来发表的最令人难忘的战争景象之一。这张照片使美国人对这场战祸产生了恻隐之心，大批记者涌到中国采访这场引人注目的战争，中国政府每天举行两次记者招待会，介绍中国军队英勇奋战、流血牺牲的事迹和他们的艰难困苦，为记者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中国被看成是在为民主国家而战，坚定不移的委员长和他的夫人（她长得非常漂亮，在美国留过学，是个毫不畏惧的人）被视为中国的化身。美国人从他俩的形象看到了一个毅力坚强的、团结一致的中国。这种印象一旦牢牢树立，就不会因撤离上海时的严重军事失策和空军的惨败而受到影响。中国空军接连几周试图轰炸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非但没成功，反而误炸了自己人，造成九百人死亡，一千一百余人负伤，而且还击中了美国“胡佛号”客轮。

从上海沿长江逆流西行二百英里就是南京。日本军队被拖到了比他们原计划的要远的内地，他们意识到战线拉得过长的危险越来越大，因此决定在中国首都结束这场冒险。他们疯狂地叫嚷必须“彻底摧毁中国的斗志”。广田首相在国会说，南京政府“掀起一场最恶毒的反日运动”，必须“迫使它改邪归正”，以“实现日中真诚提携，协力维护东亚持久和平”。随后，日军开始对南京、广州等二十个城市进行空袭，据日方

声称，目的是“尽快结束战争”。蒋介石仍坚定不移，决定保卫南京。但是，这个决定从军事上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本来可以争取到同样多的时间，避免巨大牺牲，在南京以西的后方建立比南京更加牢固的战线。蒋介石的目的是想引起全世界的注意，而且认为可能会把外国牵涉进来，因为南京有外国大使馆。

在北平，日本人用大气球吊起几条巨大的竖幅，上面写着皇军维护东亚和平和欢呼日军占领中国某某城市一类的标语。由于职业上的需要，史迪威不得不同华北的新主人打交道。到前线去必须事先得到日方的同意，按他的脾气，这几乎是难以忍受的。他的朋友戈特叹息说：“他同他们在一起办事时，安排好的事情似乎总要出毛病”。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史迪威要求给他派一名会讲日语的助手。后来，他从东京借调了一名语言教官——马克斯韦尔·泰勒上尉。泰勒上尉是利文沃思学院的毕业生，当时三十六岁，二十年后成了美国的参谋长。泰勒去北平前，有人告诉他说，他会发现他的新上司是个性情怪癖的人，很能干，但脾气急躁，难以相处。但是，当泰勒抵达北平火车站时，出乎预料地看到史迪威上校亲自来接他。泰勒非常感谢他的盛情，觉得同预料的不一样。他发现史迪威是个自己所喜欢的人。他认为史迪威感情丰富，重行动胜于思考，是个一看见有什么事不对头就想予以纠正的实干家。他认为，史迪威在发脾气时往往容易判断错误，但具有军人勇敢刚毅的气质。

泰勒尽管无法左右事情的结局，但还是可以起到一定的

缓冲作用，作好一些安排。在日军占领张家口后，他俩在一名日军大佐的陪同下前往张家口参观。史迪威承认他因提出一些令人难堪的问题而被哄出了铃木将军的办公室。据温妮记载，在那之后，史迪威还是坚持干他的职务要求他必须干的事情。但是，在访晤田头将军后，乔"真想当天就退役回卡梅尔去"。北平在这帮"傲慢自大的小杂种"的控制下，简直让人无法再呆下去了。日本飞机在美国大使馆上空一百五十英尺的低空盘旋，"向我们显示他们是怎样看待我们的"。他们强迫学生上街游行，"庆祝"攻克保定，好让他们拍摄照片，宣传他们得到民众的热烈支持。"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使人难以忍受，我们却不得不同他们打交道，而且还得面带笑容。"在泰勒的劝说下，出于工作上的需要，他甚至硬着头皮邀请五位日本军官共进午餐。其中两人接受了邀请但没有来，一人未置可否，但也没有来，至于另外两个人，史迪威的评论只有一句话："见鬼去吧！"

因华盛顿一心想避免麻烦而感到耻辱的不光是史迪威一个人。第十五步兵团的亚历山大·麦克安德鲁斯上校向史迪威引述了陆军部发给自己的"切勿采取任何会使我们卷入争执的行动"的指示，抱歉地说，他认为有必要撤销监视日军调动情况的军事情报部观察站，因为日本的一位副领事隐晦地向他提出了威胁。

由于中国喜欢让外界通过他们发表的正式公报了解他们作战的情况，史迪威无法同中国人一道到前线去，也无法同日本人一起去前线，所以他一再向华盛顿发"牢骚"，要华盛顿施加压力，但毫无结果。他不得不将就着在日本人的引导下

到保定参观。据日本人说，他们在攻克保定时打死了两万五千八百名中国军人。史迪威没有看到残垣断壁，也没有看到表明中国军队进行过猛烈抵抗或任何其他抵抗的痕迹。五十英里外就是战火纷飞的前线。他对不让他到那里去感到恼火，认为自己"自始至终几乎象遭拘捕一样，而且告诉他们说我不是不清楚的"。三天后，日方又为外国武官安排了一次参观，但不出所料，日方通知史迪威说，邀请的人员名单中没有他。"因此，我猜想，对这场战争，我是干不出什么名堂了。""我被视为中国的朋友，被视为精神上的麻疯病人了。"他感到失望，而且觉得情报处"华盛顿的那帮笨蛋"在无缘无故地找他的岔子，他同他们的关系在后来的几个月里逐渐恶化了。他在写给当时在美国的大女儿和二女儿的信中说："我自7月8日以来发泄的怨恨"加在一起"足以浮起一艘战列舰"。

8月底，史迪威看见在四周前的上次小冲突中被打死的三十余名中国军人的坟地上长出了"一片绿油油的小萝卜"。这是中国悲惨命运的缩影！每天都有成批的外国人员家属离开中国回国，女仆啜泣，丈夫擦着眼眶里的泪水，乐队奏着《美好的往日》曲子，使得人们在临别时更是依依不舍。美国国务院唯恐美国侨民发生意外事件而使美国卷进冲突，所以鼓励侨民回国。许多人离开了中国，其中包括大使约翰逊的夫人和孩子。结果，温妮竟成了在北平的美国高级夫人。9月7日，总统颁布命令，要全体美国侨民离开中国。同时，国务院和海军部也命令所属人员的家属全部回国。但是，陆军部"却没给我们下达任何指示"。史迪威的家属——他的两个女儿后来从美国来到中国同他们生活在一起——一直呆在中国，

直到他离任回国为止。

中国领导人虽然使史迪威感到恼火，但是史迪威也知道，“他们的道德标准跟我们的迥然不同，因此，他们的精神力量不会被在我们看来也许是十足的民族懦弱所削弱……如果有人侵犯我国的领土，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而他们关心的却是种族的延续。为了使中国跻身于世界，他们愿意不得不暂时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而他们就在这政府的统治之下使自己的种族源流延续不断。”即使这样，史迪威还是对中国“老奸巨猾的政客……背信弃义的懦夫和自私自利、没有良心和毫无原则性的恶棍”深恶痛绝，常常激烈地抨击他们。保定失守后，军事情报处问他中国人何时才会坚决抵抗，他复电说：“要等到他们改变厌恶进攻战的本性之后。”

他认为，中国在军事上软弱无力是因为它相信能依靠坚持到底取胜。从上海战线传来的消息说，有支中国军队遭到进攻，但侧翼部队却不前去支援。从这种极其严重的军事错误可以看到中国把局部利益置于整体利益之上的传统仍在起作用。同样严重的是，中国的整个职业军官队伍的素质很差。史迪威写道：“中国的知识分子听说中国军官很糟糕都大吃一惊。”史迪威向他们解说主动性、选择攻击点和集中使用兵力的价值，这些他们都很容易理解。然后，他们的问题就来了，“我们在五年内能造就出一批军官吗？我告诉他们可能需要两代人的时间”。

但是，史迪威相信中国士兵能打仗，认为只要领导得当，他们完全能同世界上的任何军队媲美。中国士兵吃苦耐劳，长时间任劳任怨，对粗劣的食物、艰巨的任务、负伤生病和缺

乏乐趣的生活习以为常，但又能“以一些琐碎小事说笑逗乐，在最令人失望的情况下也能高高兴兴”。如果有信得过的军官，中国士兵“跟他们到任何地方去都乐意”。史迪威认为日本的文化不是自然形成的，完全是剽窃来的。所以，他对中国人，特别是对中国北方人更加充满信心。为了搞清日军的番号，他同泰勒经常到郊外远游。他俩在路上讨论过这些看法。在走过村子时，史迪威常常会从树上摘下一个果子，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擦，然后吃下去。这使他的伙伴非常吃惊，然而有时也不得不跟他学。有一次，他俩奔波了一整天，一点线索也未得到，后来疲惫地坐在一尊大佛像下面，想歇一会儿。他们抬头看时，发现佛像背后刻着三个日本军人的姓名和部队番号。

他们不停地注意军用列车。有一天，他俩坐在一座小山丘的顶上，发现远处的铁路上有个长长的东西在缓慢地移动，那个东西两边有脚，象只大蜈蚣。后来，他们看清楚原来是列货车，车厢的两侧各有一队中国士兵弓着身体用力推动货车前进。史迪威默默地凝视着慢得象蜗牛似的货车。过了一会儿，他说：“这种精神最后一定能够打垮日本。”但是，在委员长向记者发表谈话，呼吁九国公约签字国援助中国时，他却采取挖苦的态度。他说：“蒋介石扯着嗓子高喊：‘我们是在为全世界战斗，看在基督的份上，进行干预吧！’”

对于那些看到法西斯的蹶起给西方民主构成威胁的人来说，当时的核心问题是出面干预，以使侵略者住手。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前国务卿史汀生。他大声疾呼，反对“不讲道德，听

之任之”，极力说服总统同意必须更加直言不讳地引导舆论。

罗斯福总统起初是支持史汀生的远东政策的，但是，后来他虽然没有积极主张但却默许了美国避而不卷入中国争端的方针。到 1936 年，对海军的限制结束之后，罗斯福集中力量加强驻远东的海军力量。1936 年 3 月在伦敦召开海军会议，讨论延长华盛顿条约问题。由于美国和英国拒绝让日本拥有同等力量的海军，日本中途退席，结果本来就已经奄奄一息的华盛顿条约期满失效了。鉴于日本的狂热情绪，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建议美国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以使任何国家如想进攻我国得三思而后行”。罗斯福和赫尔都赞同格鲁的建议。但是，真正做到这一点还是很遥远的事情，大规模扩建海军的拨款到 1938 年才经表决获得通过。在马可·波罗桥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月里，美国政策的基本宗旨是避免同日本发生冲突。

官方表面上采取了这种态度。但是，历史的召唤使总统不能平静，促使他提出了在其后八年中影响美国政策的一些主张。罗斯福更关注的是日本的威胁，而不是中国本身的领土完整。虽然他喜欢跟别人滔滔不绝地叙述德拉诺家族同中国的通商关系以及他们同中国商人和达官显贵交往的情况。罗斯福的外祖父沃伦·德拉诺是美国大洋行拉塞尔公司的股东之一。拉塞尔公司成立于 1842 年，很快就变得同东印度公司一样财力雄厚，影响巨大。该公司在中国各个通商口岸都设立了分公司，股东们兼任美国领事。该公司使用的是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帆船，有时甚至能赶在英国人前面把新收的茶叶运到伦敦。它架设了中国第一条电报线，在长江上开辟了

第一条班轮航线，除了买卖茶叶和丝绸外，它还经营鸦片买卖。罗斯福的母亲萨拉·德拉诺童年时代有几个时期是在香港玫瑰岗渡过的。她的两个姐姐都是在那里出生的，俩人后来都嫁给了拉塞尔公司的股东，其中一个姐姐福布斯夫人在玫瑰岗定居了三十五年。

在海德公园，罗斯福是在中国式的陈设摆饰间慢慢长大的。书房里摆着个浇花用的蓝花纹白瓷壶。在玫瑰岗的时候，家里人常常用它给孩子们洗澡。此外，还有一只进餐时用的中国铜铃，它是罗斯福的祖父从两个苦力手里买来的。那两个苦力是在 1863 年苏州遭到大掠劫时抢得那只铃的。罗斯福的集邮册里最初全是中国和香港邮票，是他母亲在他十岁的时候送给他的礼物。罗斯福 1933 年为自己支持史汀生的主张进行过辩护，他对雷蒙德·莫利说，由于他的祖辈同中国做过买卖，他始终对中国人民抱有最深切的同情心，任何人都不能指望他不支持中国抗日。这是真心话。罗斯福之所以支持史汀生是因为他俩志趣相投，而不是因为他祖辈的缘故。罗斯福 1932 年当选后同史汀生讨论了远东政策，他一就职便宣布打算继续奉行不承认政策。

他在私下对史汀生说，日本人占领满洲使他十分震惊，因为他回想起 1902 年在哈佛大学念书时，曾有位日本同学对他说，日本早在 1889 年就制订了一项分十二步走的百年扩张计划。第一步是在中国挑起战争和并吞朝鲜，然后同俄国开战，并吞满洲和热河，继而在长城与长江之间的华北地区建立保护地，然后占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包括夏威夷在内的太平洋诸岛，最后把所有黄种民族统统置于它的保护之下。总统从

日本已经走完的几步中看到了不祥之兆。

据罗斯福最亲密的外交政策顾问萨姆纳·韦尔斯说，在日本占领满洲后的几年里，罗斯福被日本的行为“进一步触怒”，到1937年，他为筹划对付日本威胁所用的心思比对付德国多得多。他一直在想方设法制止日本向前推进。在日军袭击马可·波罗桥后，他要海军绘制了几幅太平洋地区大地图，他把它们挂在办公室的架子上。他还同韦尔斯讨论了由美英舰队实行对日禁运的可能性。罗斯福认为，日本现在已深深陷在中国，如果切断它的原料供应线，它会被迫退缩而不会同美英开战。但是，由于舆论带有孤立主义色彩，总统知道国会是不会批准一项带有卷入战争风险的措施的。

罗斯福喜欢自己私下找人为他提供情况。驻华海军武官助理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斯·卡尔森向他提供过一些关于中国的情况。卡尔森是从中国国内报告中国情况的最富有浪漫色彩的美国观察家之一。后来，他用从中国共产党那里学来的办法和共同努力的箴言，组织了“卡尔森突击营”，并亲自率领，竟名声大噪。卡尔森是个诚挚的人，具有强烈的信念，勇敢而富有进取心。他是美国的坎戴德①，相信“委员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能够互相信任”，因为“双方心里想的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他用自己幼年时期接受并据以成长的理想解释遇到的一切，认为蒋介石和共产党都是“想建立代议制政府”。他每开口必有过份的修饰或形容，例如他说过蒋介石夫

① 坎戴德(Candide)，法国作家伏尔泰1759年所著《乐观主义者坎戴德》一书中的英雄人物。坎戴德接连遇到了种种不幸，但他采取了乐观态度。小说写于里斯本地震时，讽刺了乐观主义。——译注

人不仅显得“顺天命、知定数”，而且“内心安祥、雍容大度”。

卡尔森的父亲是位公理会牧师。他的戎马生涯之初是当一名普通士兵，1927 至 1929 年在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指挥的驻华海军陆战队服役，1933 至 1935 年又到上海和北平攻读中文。1935 年初，卡尔森担任守卫总统幽静的温泉别墅的海军陆战队卫队长时，罗斯福同他相识，并对他产生了很大好感。他被友好亲切地引进了温泉宾客的圈子里。他1937年动身前往中国的时候，总统要他经常给白宫写信。他于 8 月月中抵达上海。在上海战役期间，美国在上海的利益由亚洲舰队司令哈里·亚内尔海军上将、总领事高思和海军陆战队的普林斯上校三人共同负责照管。他们每天上午在高思的办公室会晤。卡尔森每周都给总统写信，报告那段引人注目的悲惨日子里发生的事情，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他在前线亲眼目睹的中国士兵作战情况。他认为“中国的知名人物——甚至所谓的共产党人——从来没有像今日这样为共同事业协力奋斗过”。总统对他的来信非常感兴趣，当 10 月份整整一个月没有收到他的信时，还专门询问过他的去向。米西·利汉德给他写信说：“总统很喜欢读你的来信，他要我转告你，请你以后不断给他写信。”

1937 年 11 月底，为了弄清关于共产党开展抗日游击战的传说是否真实，卡尔森到陕西延安去了一趟。作为证据，他给总统寄去了共产党缴获的一些日军文件、一本日记和一件皮军衣。后来，他著书的时候，延安之行那一章使用的小标题是“中国自由之源泉”。这个标题体现了他的观点。他的观点在那部书里比在给总统的信里表达得更加鲜明，典型地代表

了美国一种类型的对华态度。卡尔森对陕西省省主席说:“说心里话……”他是“以自由的名义”进行这次旅行的。在美国,人们把自由平等看成“不可剥夺的权利”,他看到在中国“人民也同样地热爱自由平等”。他在中国也看到了那种曾“在列克星敦、特伦顿和瓦利福奇激励我们祖先的同样的精神”。这是美国梦寐以求的中国,但不一定是美国制订亚洲政策时最适当的依据。

罗斯福虽然对西班牙内战运用了中立法,禁止同交战双方贸易,但是,他决定不对日本和中国运用中立法,因为他认为那样做有利于侵略者,而不利于被侵略者。他禁止用挂着美国国旗的船只向中国或日本运送武器,但不禁止向这两个国家出售武器。罗斯福在行使中立法赋予他的相机行事权方面,开始走到国内盛行的孤立主义情绪的前头。1937 年 9 月,白宫和国务院一周内收到两千封来信,绝大部份是和平社团鼓动人写的,其中百分之九十五是要求美国继续保持和平状态,百分之八十是主张为了保持和平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百分之七十是敦促政府立即对中国和日本运用中立法,只有百分之十五是反对实行中立法,理由是那样做有利于日本而有损于中国。

总统对这种趋势感到忧虑,决定发表一次讲话,强调国际合作。10 月 5 日,罗斯福在芝加哥提议集体“隔离”那些助长“国际无政府主义”的势力。他把这些势力比作传染“瘟疫”的带菌体。但是,总统的讲话反而使自己尝到了历史性恶果。六大和平组织宣布总统企图把人民“指引上”战争道路。它们联合发起了一场征集两千五百万人签名的运动,以要求“避免使

美国卷入战争”。美国劳工联合会也不同意总统的这次讲话。众议员菲什提议弹劾总统。国会就是否参加国联在远东的集体行动举行表决，反对票和赞成票的比例是二比一。总统对他的一位朋友说:“你一心想领着人们朝前走，可是回过头来朝身后一看,没有一个人跟你走,这真可怕啊!”

结果，10 月 6 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九国会议以设法解决中日冲突时,美国退缩,不愿担任领导者角色。由于日本会前就表示拒绝接受第三国调停，由于实行经济制裁取决于九国是否共同采取行动和作出保证，而美国还有另几个国家又不愿参加进来,会议不欢而散,毫无结果。那些深切感到必须抵抗侵略的人认为，这段岁月似乎是惨淡的。史汀生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禁止同日本通商。他写道，尽管有中立法，美国也不一定要“消极从而可耻地默许别人干下的罪恶”。反对罪恶何时才成为美国所关注的事情呢？这个当代的重大问题又摆在人们面前了。

在中国,政府从南京撤到了逆长江西上四百公里的汉口，外交团随后也跟着西迁。史迪威在 1937 年 12 月份也到了汉口。由于战争，从北平通往汉口的铁路线不通车了。他在路上共花了八天的时间,先是乘船从海上绕过山东半岛,然后经由陇海线到郑州，最后再向南到汉口。温妮在写给他女儿的信中说:史迪威对一切都感到厌烦了,他在难民满街的徐州搭上火车,八个人的座位挤坐着十三个人,人们连离开座位上厕所都不敢。天气严寒……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水喝。列车走了两天两夜后,史迪威实在渴得受不住了,他乘一位旅客睡着

的时候，拿过他的茶壶喝了几口凉茶。这是他在四十四小时里第一次沾水。

在后来的八个月里，汉口成了中国非日占区的首都。委员长把他的总部设在长江南岸的武昌。在汉口，外交使团挤在江畔租界区的几幢洋楼里。美国海军长江巡逻队的旗舰"吕宋号"停泊在江边。市区一片混乱，成千上万的人"象热锅上的蚂蚁似地"奔走。用史迪威的话说，他们是官员、随从、记者、奸商、难民、福利委员会人员以及为躲避战争而蜂拥逃来的各种各样的人。既可以看到献身精神和充沛精力，也可以看到松松垮垮和无动于衷的表现。跟往常一样，史迪威对普通士兵无人照管的现象十分气愤。"在北站和各处都弃下伤员，谁也不管他们。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预料到会这样。他们处在濒于死亡时的痛苦之中，这就是他们为生存付出的代价……蒋介石为什么不组织医疗队呢？为什么甚至连担架队都不组织呢？"

史迪威到达汉口一周后，即 1937 年 12 月 13 日，南京陷入即使对中国来说也是十分可怕的境地。中国政府在上海掘壕坚守所争取到的那段时间里，既没有为保卫南京作准备，也没有为疏散人口作准备。结果，首都陷落时在人员和物资方面都蒙受了巨大损失。日军占领南京时，完好的列车停在火车站，他们缴获了各种车辆和补给品，还缴获了完整的武器库和红十字医院——连同医院里的全部贵重仪器设备，甚至伤员还躺在病床上。由于没有建立防线掩护军队和老百姓撤退，人员伤亡同样非常惨重。

日本人决定拿首都作为儆戒，以胁迫中国结束战争。他

们在长江三角洲实行的残酷杀戮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传教士和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外国人亲眼目睹和收集的证据表明，五万日军在南京恣意奸淫烧杀、刀砍枪挑，共屠杀了四万二千平民。他们逼着一批批男女排成行，用机枪朝他们扫射；有的拿活人当靶子练习刺杀；有的把人手脚捆起来浇上煤油活活烧死，军官们则在一旁观看取乐。美国国内的教会刊物上充斥了传教士以及其他一些因恐怖和无能为力而惶恐无措的人写的报道。外国报纸后来收到的现场照片许多是日本人自己拍的。日本人把胶卷送到上海普通照相馆冲洗，有的转弄到了外国记者手里。

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整座整座的城镇遭到浩劫，房屋被炸成冒着余烟的残垣断壁，有的完全变成一堆瓦砾。街上空荡荡，看不见一个人影，唯一的活物是给死尸喂得很肥的狗。偶尔也可以看见几个饥肠辘辘的人象幽灵似地在废墟里徘徊。侥幸活命的人大批外逃。水稻腐烂在田里。公路上，日本军队赶着抢来的毛驴和水牛，炮车上拴着猪和鸡。他们逼着农民拉车，车上堆满抢来的什物。沿途尽是烧焦的废墟和焚毁的农舍。

在中国，认为与其毁灭不如同日本言和的大有人在，其中有的还是政府官员。但是，不容许投降或同日本达成和解的占多数。史迪威写道："蒋介石无法罢手。他向全国发出过号召，全国人民作出了响应。他现在不得不继续打下去。"日本人也不得不继续打下去，尽管他们由于战线拉长而十分危险，而且眼下没有达到明确目标的希望。南京失守后，蒋介石12月17日公开重申决心采用一种基本上是中国式的战略，全力

以赴继续抗战。他解释说："日本的军事力量终有枯竭之日，到那时，中国就能取得最后胜利。"

日本的对策是断绝了两国还一直保持的外交关系。他们恼羞成怒，陷入了战争无限制打下去的致命困境，但又不得不继续打下去，这样就被迫把成师成师的兵力往中国大陆增调。最后，大陆上的日军竟超过一百万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一再向蒋介石示意媾和，最初是通过德国驻华大使，后来是通过燕京大学校长、美国人司徒雷登博士，但日本的条件是得让它主宰中国。蒋介石没有屈服，也许是因为不愿意，也许是因为办不到。正如约翰逊大使在报告中所说："中国现政府既不能同日本媾和，也不能同日本决战"。

12 月 12 日，发生了一起美国政府最担心的事件——造成美国人员流血死亡的事件。就在南京陷落的时候，气焰嚣张的日本人粗暴地炸沉了停泊在距首都几英里远的江面上的美国"帕奈号"炮艇，造成两人死亡，四十八人负伤。在日本飞机的第一次袭击中，"帕奈号"舰长受伤，大炮被炸毁。接着，低空盘旋的飞机又兜回来，再次向已开始下沉的炮艇投弹，并炸坏了停泊在旁边的两艘索科尼级油船和一艘小艇。这些船同"帕奈号"一样，甲板和遮篷上都漆有美国国旗。英国长江巡逻队的"瓢虫号"和"蜜蜂号"炮艇也被炸伤。日本飞机飞走后，岸上的日军大炮又朝这些船射击，日本摩托艇追赶泅江逃命的水兵，用机枪扫射他们。华盛顿切望置身事外，所以，在南京遭日军空袭期间，美国使馆人员全部躲到长江巡逻队的舰艇上。美方向日本陆军和海军提供了标明这些舰只确切位置和航线的地图。因此，这场袭击是蓄谋的，看来是一场道道

地地的直接挑战。

从记载看，史迪威对“帕奈号”事件的反应只有寥寥数语：“‘帕奈号’昨天被炸沉。吵吵嚷嚷。”作这么简单的反应是他在重大时刻的特点。“帕奈号”事件发生后，包括战争在内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当时，史迪威坐立不安，深为他的助理武官罗伯茨上尉担心。罗伯茨在事件发生时正好在“帕奈号”上，在舰长负伤后，他担负起指挥任务，领着水兵们逃上岸。史迪威下午得知罗伯茨平安无恙，他对大使大发雷霆，因为大使上午就得知罗伯茨健在的消息，但是没有及时告知他。

次日，紧张局势稍有缓和，正如史迪威所说，“日本人表示歉意，说他们‘非常对不起你们’，没有看清标志。狗杂种！”他以后再也没有提起过“帕奈号”事件。但是，毫无疑问，由于美国得对“帕奈号”事件忍气吞声，他那段时间的心境更加抑郁了。

“帕奈号”事件没有引起任何事件，因为在人们不想打仗的时候，仗是打不起来的。日本和美国当时都还没有作好对抗准备。东京政府因这次卤莽行动吓了一大跳，赶忙表示道歉，并在事件发生不到十天就全盘接受了美方提出的赔偿要求。在东京，日本人纷纷到美国大使馆表示歉意。罗斯福本考虑没收日本人的资产，作为一种预防性制裁措施，以制止日本今后再进行挑衅。但是，由于日本人抢先正式向他表示道歉，他也只好作罢了。在其他方面，美国官方的反应是有节制的。武装部队知道美国海军力量还不足以迫使日本规规矩矩。因此，军队中占上风的意见是暂缓采取一切可能引起摊牌的行动。国会所体现的公众反应是不愿大喊大叫，而是想

缩小事态。勒德洛在国会提出一项提案，要求规定宣战只有在举行全国公民投票后才能生效，国会立即进行了讨论。在这之前，提案人征集的签名一直达不到规定的数目，因而无法向全体委员会提出提案。但是，在“帕奈号”沉没两天后，他征集到的签名数目竟超过了规定。后来，那项提案完全是在美国政府施加巨大压力后仅以二十一票之差被否决掉的。

“帕奈号”事件引人注目的结果之一是，两个月后，为了消除以后再同日军发生摩擦的可能性，美国将第十五步兵团撤出了中国。由于该团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华盛顿早就考虑将它撤走，陆军部也主张撤走。据美国一家报纸说，这是“在错误时间里办正确事情的一个事例”。这个胜任团列队出城时，当地妇女潸然落泪。其他外国团队的军乐队奏起乐曲，在天津的街道上游行，以示欢送，甚至连日本军乐队也用喇叭吹奏起小夜曲。

在汉口的那个冬天里，史迪威的醋性子发作得很利害。天气“阴雨绵绵、寒冷而潮湿”，中国的战局不佳，史迪威在执行任务时不断遇到挫折而华盛顿那边又完全不了解实际情况，这一切都使他的情绪非常低落。由于中国军政部不让他到前线去，他呆在汉口，得不到关于战局的任何可靠情报，他派到战场上去的助手也搞不到任何东西。按罗伯茨上尉的说法，这大概是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前线。史迪威认为，中国“完全搞不清楚日本下一步会采取什么军事行动”，他们之所以不愿让外国观察员到前线去，是怕外国人看到和报道他们拙劣的指挥和一败涂地的战绩。由于史迪威曾正式请求中国外交部允许他到前线去看看，因此不便不通过官方就擅自“溜到”前

线去。而多恩上尉已发现最好的办法就是“溜到”前线去，他在执行任务时曾在中日两军之间偷偷来往过六、七趟，带回了关于中国军队调动情况的首批确切情报。他的上司却只能怒气冲冲地呆在汉口。“结果，我坐在这里焦急地咬自己的指甲”，再把汉口的居住环境同北平一比，“不禁火冒三丈”。

尤其使史迪威感到恼火的是军事情报处没完没了地找他的岔子。军事情报处负责人E.R.W.麦凯布上校是个专横迂腐的小官僚。他纠缠着史迪威，要他报告每天的战况，询问每笔开支的原委，不同史迪威商量就直接向他的部下发号施令，而且常常提出一些同战局甚至同中国一般地理情况毫无关系的要求，有一次竟说史迪威提供的“情报少得简直令人作难”。史迪威最后断定“华盛顿那帮杂种不喜欢我”。他这一结论确有些道理，因为麦凯布这样对待他肯定是对他有仇恨，虽然他同样也刁难驻其他国家的武官。史迪威有个黑封皮的小本子，他把它叫作“伤感簿”，专门记载令他不快的事情。①

史迪威在领事贾维斯的寓所找到了住处。在那里，他感到自由自在——“他和我有共同语言。”他和贾维斯合用一个办公室。在办公室里，“我们常常在一起‘骂娘’”。但是，当他同“大使馆班子”中的其他人在一起时，“总有一种拘束的感觉……我觉得同他们格格不入”。他原谅了大使。大使始终待人厚道，性情欢乐，乐于同人交谈。每当有重要人物来拜访他

---

① 麦凯布的前任——1935年担任军事情报处处长的奈特准将和1936年担任军事情报处处长的林肯上校都发现史迪威“特别适宜”担任驻华武官，认为他“智力敏捷，热爱和胜任武官工作”。

时，他总是愿意把史迪威叫来一块谈话。中国政府现在准备撤往重庆，约翰逊根据美国政府的指示到时候也要随着西撤，他让史迪威自己决定去留。因此，史迪威把他同贾维斯一道视为“好人”。约翰逊现在改名为内尔斯，他说他在同中国人打交道时遇到了同史迪威一样的困难。约翰逊写了一篇“杰作”，向陆军部说明了这些困难，这使史迪威感到非常懊悔，因为他在这之前写了一首不恭敬的诗寄给他的夫人，在诗中将约翰逊称为“王八大使”。史迪威总是喜欢给人起一语双关的绰号，“王八大使”是他有一次“在火车上想起来的，我现在的麻烦是说惯了，一张口就冒出这个词”。当温妮回信说她没有收到他的诗时，他大吃一惊，唯恐信误投到别人手里。他马上又重写了一封给温妮寄去，想再碰碰运气。

史迪威也有朋友，生活中也有开心的时刻。一些中国人，特别是汉口市市长，很讨他喜欢。能与冯玉祥重逢，使他感到“很高兴”。冯玉祥十五年前曾委托他修筑公路。冯玉祥到汉口来是为了参加一场“小交易”，商讨改组当时的政府，以让赤色分子入阁。“这个老家伙看上去身体挺好，满怀希望，说他还能继续打半年仗。”史迪威的偏见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在报告中令人吃惊地说：“城里最快活的人是英国海军人员。”英国海军将领克拉比邀请他吃午饭，他吃得很高兴，说他的主人是“好人……法国人也不错”。甚至连英国领事也成了好人。史迪威在记者中找到了同自己最情投意合的伙伴，他们通常都是对中国革命抱同情态度的、比较富于冒险精神的自由撰稿人，都象卡尔森那样“从中国的心脏地区”到全国各地周游过。史沫特莱和贝尔登是其中的两个人。尤其是贝尔登，后来竟成

了史迪威的密友和向他提供情报的重要来源。贝尔登二十八岁，是位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理想主义者。他喜怒无常，易于感情冲动，但情绪忽高忽低。他的一位朋友是这样描绘他的："表情阴郁、衣着褴褛、面容憔悴、令人不可思议"。贝尔登大学毕业那年正值经济萧条，因而没能找到工作。后来，他到一条船上当海员，1933 年在上海弃职离船。从那以后，他开始探究中国问题和学习汉语，同时为报界写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以维持生活。日本侵入中国后，他被合众社聘用。贝尔登经常潜心深入研究中国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常常向史迪威提供一些关于中国军队动向和意图的情报，以及关于指挥官声誉及其内部关系的材料。

史迪威经常找史沫特莱等讨论共产党人的情况。史沫特莱发现他"性情固执、脾气暴躁、经受过战斗的锤炼……谈吐直爽，为人诚实"，他对伤员的同情心使她感动。史沫特莱当时在为援华委员会工作。有一天，她正在往一辆卡车上装东西，史迪威走过来问道：

"你在干什么？"

"往车上装药品。你呢？"

"我在这里看你们干活，"他皱着眉头说，"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国际红十字会的仓库里堆满了新运来的药品，其中还有新磺胺药品。"他要史沫特莱到仓库去要一些来供军队用。

1938 年 1 月，史迪威经过反复竭力要求，终于冲破阻挠，第一次获准到外地去。在以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多次离开汉口，到过许多战火纷飞的地区。在一个严寒的冬天，他到江西和湖南，发现硝烟弥漫的战线已经沉寂下来，但没有一处

在进行和谈。江西省和湖南省的主席在谈话中都谈到还要抗战三年，并已开始执行游击战训练计划。史迪威注意到，中国人热衷于游击战，但弹药和装备会成为严重问题。有位中国军官曾问他中国应采取何种战术，他回答说："利用数量上的优势，发动进攻。"他的回答没有受到欢迎。

史迪威利用他同驻河南的第二十军军长商震的友谊，又一次离开了汉口。他这次到了开封和徐州。开封和徐州位于陇海线东西两端。能离开乌烟瘴气的汉口，他感到非常高兴，以至他在动身前一分钟收到陆军部发来的电报要他从开封"返回途中顺路"到兰州去一趟时，没有大发雷霆，只轻蔑地耸耸肩膀说："我怀疑他们是不是知道兰州在什么地方。"兰州是俄国从中亚细亚将物资运进中国的必经之处，离内蒙古不远，位于开封西北六百英里。

到河南后，史迪威恢复了对中国军队的信心。中国军队取得了作战经验，组织并且改进了部队的补充工作。史迪威开始认为，中国军队如果能主动发动进攻，"战局就可能出现转折"，而他们在当年内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他在河南期间，天气极其寒冷，他一个星期没敢脱衣服鞋袜，怕脱下来就再也穿不上了。冻僵的双脚使他痛苦了好几天。但是后来，"我又可以一气走三、四十英里路了"。他在商震(他认为商震是中国可信赖的指挥官之一)的陪同下前往徐州，终于看到了中国的前线部队，结果马上又产生了悲观情绪。他断定"他们没有进攻的打算"。如果他们趁夜间发动进攻，"他们就可以在白天接近日军阵地，使日军的优势炮火失去作用"。但是，他们不愿这样做。"蒋介石根本不是个军人。商震很不错。

白崇禧——不过如此而已！”

史迪威通过同一位姓刘的国民党将军的谈话，看清了统治阶层的态度。这次谈话也表明史迪威具有在交谈中抓住对方特征的非凡天赋。刘将军承认中国军队确实损失惨重，说大约损失了六十万人，但是这“其实是件好事……因为中国当兵的全是盗匪窃贼和地痞流氓，我们把他们弄到前线去送死，用这种办法消灭我们当中的坏分子”。当问到士兵的军饷数目时，他回答说每月八块大洋，“如果多发给他们，他们就不愿打仗了”。至于战争会持续多久，刘将军认为至少还要再打一、两年。到那时，日本的经济会崩溃，日本士兵会思乡厌战，列强也会参战。实际上，日军占领的地盘越多，对中国越有利，因为那样他们就更容易被同化掉。“从长远来说，日本人终会被消灭掉，会象蒙古人和满族人那样被汉人同化掉。”当问到中国如果被封锁，将如何得到食盐和发动机燃料时，他回答说，日军占领的地盘越多，中国剩下的地盘就越少，“因此，到那时，我们就不必跑来跑去”，就不需要多少汽油了。

当问到为什么不多让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担任军官时，刘将军回答说：“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都贪生怕死。他们会逃跑。我了解他们，因为我就是大学生。”此外，“中国人早就学会用下层人打仗。起初，贵族们自己打仗，但他们很快就不打了，改用别人替他们打仗”。他指出，英国人用印度人替他们打仗。法国人用摩洛哥人和安南人打仗。现在，日本人也是用蒙古人和满洲人替他们打仗。

史迪威由于认识刘将军的中国并同它打过交道，所以他不易象卡尔森等思想家所喜欢说的那样说中国是在为捍卫民

主而战斗。史迪威是在到汉口后才认识卡尔森的，他对卡尔森的评价是很高的，说他是个“优秀的侦察员，受教育程度不高……但是个真正的公民和军人”，尽管有时举止有点不够得体，但无论如何是个“正人君子”。史迪威私下称呼他“勇敢的上尉”。卡尔森撰写的关于八路军军事训练措施的热情洋溢的报告没有给史迪威留下深刻印象。史迪威对他说，他十五年前就见过冯玉祥用那些办法训练军队了。

虽然赞扬“八路军真了不起”成了一种风气，但史迪威却抱怀疑态度。尽管如此，出于职业上的考虑，他还是对八路军很感兴趣。他通过史沫特莱，结识了共产党领导层中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中共驻汉口代表周恩来和共军参谋长叶剑英。他认为中共提出的“军事上独立自主”和“动员群众”的要求含糊不清，是老一套口号。但是，在拜访并同周恩来及其随员一道进餐后，他发现他们始终“谈吐坦率，举止彬彬有礼，态度友好，同国民党的身着毛领大衣、脚穿踢马刺靴的新式拿破仑们形成对照——那帮家伙一个个装腔作势、盛气凌人”。周恩来仪表英俊、很有涵养、文质彬彬，深讨外国人喜爱。叶剑英“同大多数赤色分子一样”，被列入“好人”范围。在同这些正在为实现中国的革命宿愿而奋斗和还没有被权力腐蚀的热诚、精力充沛的人交谈后，史迪威认识到他们同刘将军那类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裂隙”。他确信，中国即使摆脱了同日本的战争，“国内也会再次产生麻烦”。

怀疑这一点的人不多，因为那年冬天，在汉口处处都可以感觉到政府和统治阶层的萎靡不振。南京失陷后，史迪威写道：“这场惨败的主要原因是行政腐败。”这句话表明了他的观

点。在南京失守后，卡尔森也以同样的心情写信给总统说，他对“知识阶层，甚至中产阶级的态度感到厌恶。汉口到处都是对这场战争显然漠不关心的男男女女，他们对祖国的前途毫无责任感”。在汉口，在中国举办的一次宴会上，卡尔森提议为承担战争重担的“老百姓”干杯。据当时在场的大使约翰逊说居然没有一个人响应。约翰逊认为，普遍的态度是“我们要战斗到苦力们流尽最后一滴血，宋氏家族却在这过程中继续施展阴谋诡计，他们玩弄的计谋常常使我感到极其厌恶”。

国民党青年时代的热情已经转移到了共产党人身上，这使重庆的人们产生了一种对历史的最伤感的说法：任何一场革命成功后都会继承它所推翻的暴君的衣钵。蒋介石夫人偶尔有一次在一瞬间道出了自己的这种心理。有几位记者从延安返回汉口后写了一些热情洋溢的报道。蒋夫人邀请他们喝茶，她尽管不相信，但还是想亲自听他们谈谈延安的情况。记者们热情地赞扬共产党人廉洁奉公、富于理想和具有为事业献身的精神。她听后说她不信他们的话。她踱到窗口，默默地凝视着长江彼岸。几分钟后，她转身回到屋里，说出了她一生中最悲伤的一句话：“如果你们讲的有关他们的话是真的，那么，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

就在史迪威打算动身去安徽前线参观汤恩伯将军指挥的第十三军的时候，他突然受到陆军部的阻挠。陆军部电令他到兰州去了解俄国向中国提供援助物资的情况，以提出报告。取消安徽之行使他勃然大怒，因为，他为了争取到这个机会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而且，一位外国军官获准到战场上去参观

作战部队，这自战争爆发八个月以来还是第一次。为了躲避到兰州去，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借口，甚至几乎到了违抗命令的地步。陆军部电令他执行命令。很巧，这次陆军部是遵照总统的指示作出这一决定的，因为总统要求向他报告从各种渠道，包括从香港、印度之那、缅甸以及从俄国经由陆路运往中国的武器的种类和数量。陆军部没有把这个背景告诉史迪威。其实，这次同他与军事情报处的其他龃龉一样，如果存在私人间的沟通的话，这个使他怒不可遏的兰州事件本来是可以缓和下来的。他对“华盛顿那帮爱管闲事的狗杂种厌恶得要命”。他在写给温妮的信中说，“不管家里人怎么决定”，他反正是打定主意退役了——不是马上就是明年。他的五十五岁生日是在前往兰州的途中度过的。鉴于他同陆军部的关系，他感到自己今后是没多大前途了。

史迪威是到兰州俄国空军基地参观并带回说明俄国切望帮助中国抗战证据的第一个外国人。他先是乘火车到达西安，在西安拜访了八路军办事处。然后，他改乘公共汽车和卡车到兰州。他搜寻各种线索，贿赂俄国宾馆的雇员以获悉到达的人数，他询问了哨兵、警察、公共汽车司机、旅馆老板、侍者、甘肃省省主席及其秘书、西安城里的传教士、藏语翻译、汽车销售商、中国军官、飞行学员以及当地的蒙古族人。蒙古族人“体格健壮、肮脏、强悍，饱经风霜，面孔看上去象印地安武士”。史迪威请几个蒙古族人在一家小旅店里喝茶。后来，他们每逢在街上遇到他时，都“满面笑容地点头问好”。虽然史迪威的活动受到限制，谈话受到偷听，但他还是观察了飞机场，弄清楚俄国共提供了三百架飞机，其中三十架停在基地里

供训练中国飞行员用。俄国飞行员个子大，胃口好，每天要吃四顿饭，他们"脾气古怪、粗暴……我从未看见他们之中有谁露出过笑容"。他搜集了运送弹药和燃料的车辆的数目，然后根据行车距离和往返时间估计出一个月的运输量。他尽管没有看清弹药箱上的标志，也没有见过破裂的弹药箱，但还是弄清了里边装的是什么弹药。总的运输量同经海路从香港运到中国的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史迪威断定，开辟这条线路主要是为了运输飞机燃料和以备在广州陷落时作为一条应急补给线。

到史迪威4月15日返回汉口的时候，中国由于4月6日至7日在山东台儿庄第一次打了胜仗，全国的气氛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全国人民"高兴得发狂"。日军毕竟不是不可战胜的，新的抗战希望将过去的悲观情绪一扫而光。这场胜仗使人们自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感到欢欣鼓舞。

台儿庄是敌军向徐州推进必经的一个小镇。徐州如失守，陇海线就会被日军控制，日军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捣内地。在桂系李宗仁将军的指挥下，徐州守军按德国顾问制订的计划发起反攻，同时，一个军的增援部队切断了敌军的后路。增援部队就是汤恩伯将军指挥的那个军，史迪威如果不是奉命到兰州去的话，正好是跟他们在一起。增援部队的到来使徐州守军士气大振，他们冲上去，同增援部队一道扑向敌军，"喊杀声震天动地"。他们切断了日军弹药和坦克燃料的补给，把步兵歼灭掉。事实证明，日军步兵如果失去机械化部队的支援，是抵挡不住坚决进攻的。这场战斗共打了十七天，日军伤亡一万六千人，损失四十辆坦克、七十辆装甲车和一百辆汽

车，此外还损失了许多大炮和其他武器。这是日本建立现代化军队以来遭受的第一场引人注目的大惨败。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同日军不相上下。

同所有支持中国的人一样，史迪威极想找到乐观的根由。台儿庄战斗后，他感动地写道：朋友们现在都说他们认为中国会胜利，“我也这样认为”。同时，他也知道，中国由于没有乘胜追击，已经丧失了良好战机。德国首席军事顾问法尔肯豪森将军因中国军队没按他的计划行动，气得“狠命地揪自己的头发”。“我告诉委员长要向前推进，要发动进攻，要乘胜前进，可是，他们什么行动也没采取。日军很快就会把八到十个师的部队调到徐州前沿，到那时就来不及了。”白崇禧同史迪威和德国顾问们一道分析了这场战斗，白崇禧对进攻的经验不感兴趣，仍念念不忘靠拖垮日军取胜的理论。他说：“我们可以用四人拼掉日军一人。”他还说，中国损失的人数只要不超过五千万人，“就算不得什么”。史迪威评论说：“中国人永远听不进发动进攻的主张。”

史迪威到台儿庄现场参观时，同司令官李宗仁谈了话。史迪威记载的中国人对他本人的看法不多，其中有一处便是李宗仁的话。李宗仁说他态度“坦率”，同情中国的事业，但对“中国抗战的前途非常悲观”。李宗仁把这位美军上校的悲观情绪归因于他接受的“物质文明”教育。他要史迪威建议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供大笔贷款，以让中国购买作战物资。他提出的论点是，帮助中国能使美国为自身取得最可靠的保障。

说来具有讽刺意味，台儿庄的战果竟促使蒋介石更加相信他自己的整个防御方针了，因为那场胜仗似乎说明日军的

势头已经丧失殆尽。几周后，日军重新发起进攻，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向徐州进逼。徐州终于在5月底失守。日军另外一路部队从华北南下，企图在开封以北强渡黄河。黄河到长江之间的整个地区，包括汉口本身，面临危险。蒋介石这时采取了孤注一掷的办法，他不是号召军队进行抵抗，而是不顾后果地求助于中国的害河黄河。他命令商震将军在日军先头部队过河后立即炸毁郑州大堤。据传他三番五次地给商震打电话，催问是不是执行了他的命令。商震一直拖到他的部队撤到安全地带后才炸堤。后来，炸药爆炸了。当时在场的杰克·贝尔登报道说，目击者们都惊骇万分，混浊的河水涌过黄河故道，卷起巨大旋涡，翻腾着冲击着堤坝上炸开的缺口。突然，随着一阵"天崩地裂的巨响"，河水冲开缺口，汹涌地冲向地势低洼的地区，咆哮着向东流向大海。十一座城镇和四千座村庄被淹没，三个省的庄稼和农田被毁坏，两百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在这片幅员辽阔的灾区里，又积蓄起对政府的新仇恨。日军被阻挡住了，中国在这过程中可能争取到了三个月的时间。

中国的战斗使美国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记者、传教士和其他观察家出于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对中国事务的关注，只集中宣传中国值得赞扬的方面，只字不提中国的缺点和弊病。中国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了一种被理想化了的形象。蒋介石委员长夫妇被《时代》杂志选为"1937年夫妇"，他俩的照片刊登在该杂志的封面上。照片上的他俩阴郁而清高地凝视着前方，表情严肃而从容、勇敢而真诚。《时代》杂志发行人亨利·

鲁斯出生于中国，父母都是传教士。因此，他崇拜蒋介石夫妇不是偶然的。传教士以及支持他们的北美国外布道团大会、美国基督教联邦委员会、基督教青年会和救济中国饥荒委员会等组织都热情洋溢和精力充沛地用它们的全部巨大影响，支持他们救助对象的事业。在传教士们一百余年的努力下，美国人感到对中国有一种与对其他国家不同的责任感。一位欧洲观察家说，不管传教士们是不是影响了中国，“他们无疑是影响了美国”。他们支持蒋介石夫妇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因为蒋介石夫妇信奉的基督教在中国居于支配地位，这令人满意地证明他们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他们过份赞扬蒋介石，一度把他说成是个完美无缺的人，不许任何人说他有缺点。《世界教会评论》说：“中国现在有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开明、最富有爱国热忱和最有能力的统治者。”

《世界教会评论》也用中意的语调谈到共产党，说它是个努力实现“符合全体进步人类愿望的社会改革”的集团。这幅表现中国“目标坚定一致”的图景不仅是这些正在为救济中国大力筹措资金的教会组织所需要的，而且也是国民党政府的使节和宣传家们所需要的，因为他们正在压美国提供贷款和进行干预。认识中国社会中的深刻裂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共产党人未被视为政敌，而被视为自己人，被视为值得尊敬的社会改革家。国民党要记者们在提到共产党人时不要称他们共产党人。蒋介石 1939 年对一位德国记者说：“中国现在已经没有共产党人了。”所有的人，包括共产党人自己在内，都促进了这种假象，因为这是符合他们的统一战线方针的。共产党人虽然不否认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但是，他们谈论"新民主主义"，把新民主主义视为实现自己最终目标必经的一个阶段。

国际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促使美国对中国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的核心是这样一种有力的演绎推理：民主国家受到了侵略国的威胁；中国遭到一个侵略国的进攻；因此，中国是个民主国家，中国的战斗是世界民主国家的战斗。所有认为国际斗争不可分割的善良的人都认为，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帮助中国显然符合美国本身的利益。这从战略上说是正确的，即使从意识形态上说并非如此。但是，战略在用意识形态装饰起来的时候，会更加具有吸引力，站在"我们一边"的人，不论其政治经历如何，都会被看成是民主主义者。美国人感到自己很难把托马斯·杰佛逊① 未在亚洲打过仗这一点牢记在心。

民主成了支持中国的人谈论的主题。民间救济中国联合委员会把美国承认中华民国二十五周年那一天——美国是在1913年予以承认的——定为"民主日"，举行了庆祝活动。该联合委员会是由几个委员会组成的，负责人都是知名人士。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其他各种援助中国、反对继续向日本出售作战物资的委员会也一再强调民主。各个教会组织（它们已经联合起来，由美国前商会主席哈珀·西布利领导）以及诸如美国反对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一类的非教会组织和美国中国之友协会一类的左翼统一战线组织，也持同样的立场。它们有象周以德博士和卡尔森上尉那样的各种各样的热心的发言

① 托马斯·杰佛逊(1743—1826)，于1801—1809年任美国第三任总统。——译注

人。周以德博士原是山西省的传教士兼医生，回国后成了蒋介石的极其热诚的支持者。卡尔森上尉返回美国也是为了到国内宣传自己的观点。

1938 年，卡尔森在向记者发表谈话时赞扬了八路军的作战素质，稿件遭到海军新闻检查官的扣压，他利用这件事为借口，辞去军职，回国说服公众相信，只要美国停止向日本出售作战物资，中国就能打败日本。他坚持认为，中日战争的结局将决定“东亚是被军人独裁政府统治”，还是“中国的民主花蕾绽开”。这种看法很流行，但不符合实际。因为不论是在国民党内部，还是在延安，都还没有出现民主的萌芽。国民党实行一党执政，实行新闻检查，组织蓝衣社和秘密警察；延安则是依据教条办事，一心追求的目标是革命的社会主义。

尽管中国的美国友人尽了巨大努力，但是，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仍超过同情情绪。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公开支持日本的只有百分之二，支持中国的有百分之七十四。但是，谁也不希望美国卷入战争。在政府这一层，官员们越来越感到事态紧急。总统切望使中国顶住侵略，他一方面受到财政部长摩根索的鼓动，另一方面又受到国务卿赫尔的制约。摩根索迫切感到必须反对法西斯侵略，认为支持中国极其重要。赫尔则一直毫不动摇地反对采取任何“非中立”态度，包括反对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他认为那样做可能会使美国卷入中日冲突。赫尔非常谨慎，甚至因为宋子文是出名的抗日派而拒不接受他为赴美经济密使。

1938 年 8 月 30 日，财政部驻华代表洛辛·巴克拜访武官，听取军事形势介绍。史迪威陈述了李宗仁的观点，这就是

美国应使中国有钱购买武器，这样对美国自己有好处。巴克在写给财政部长摩根索的报告中说："……史迪威上校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我国政府应该奉行更加积极的政策。我国以提供贷款和军事装备的形式帮助中国对我们本国也是一种很好的防御措施，这比我们仅仅生产本国需要的国防装备要好得多。即使把生产本国防务装备费用中的极小的一部分提供给中国，起的作用也会大得多。"

摩根索同意史迪威的观点。他对更大的事业抱有强烈信念，但对中国的了解有限。他认为："我们在太平洋地区保住民主政府的可能性只有一点点了。"他力促总统向中国提供贷款。1938 年 12 月，美国政府通过进出口银行安排了两千五百万美元贷款。

日军尽管打了胜仗，但没能结束战争。1938 年 8 月，日军决定向新目标汉口推进。史迪威 8 月份从北平回到汉口，他是擅自决定到北平同家属一道避暑的。他的这一决定使军事情报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恼火。在这之前史迪威已经因军事情报处不通过他就直接向他的五名助手分派任务而同他们争吵起来了。麦凯布上校在给他的电报中说他 6 月份回北平是个"严重的判断错误……因为当时战局正在发生重大发展"。他以适于军校学员而不适于一位上校的口气命令他以后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到外地去，并要他在外出旅行前将"原因、路线、目的地和估计要花的钱数"呈报情报处批准。他告诉史迪威，由军事情报处负责指导他和他的助手活动，因为"他过去发回的情报的范围、质量和数量都不能令人满意"。

麦凯布在遥遥七千英里之外宣称军事情报处有权“指派你和在中国的任何军官去执行它认为应该执行的任务”。在后来的电报中，史迪威被告知，他的报告比不上卡尔森给海军的报告，他发回的情报并不值得他花掉那么多秘密经费，他应当说明花这么多钱搞来的这些情报“到底有什么内容和价值”。麦凯布显然是想激史迪威辞职，以便好让“武官集团”里的某位同他关系密切的伙伴取而代之。如果麦凯布的确抱有这种打算，那他差点如愿以偿。史迪威一度下定决心要求免职，甚至在盛怒之下拿起笔写信要求派人来“调查我在1937年6月以来出现的形势下履行职责的态度”。但是，中国的形势留住了他。

驻北平武官处的秘书蒂莉·霍夫曼回国度假时，军事情报处向她大发牢骚，对史迪威的一些做法和决定提出了很多怨言。史迪威认为不屑为这些事向军事情报处作解释。军事情报处的人员虽然认为史迪威是该处最优秀的观察家和情报员，而且事实上就军事行动而言他是个“完美无缺的观察家”，但是，他们都抱怨他自行其是。当蒂莉问为什么没有人费点笔墨直接给史迪威写信，把这些意见告诉他时，他们回答说，“军事情报处严禁任何军官通过非官方渠道同任何人通信”。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史迪威任期届满。

当时汉口同北平间的陆路交通已被切断，只能从北方乘船经过上海到香港，然后改乘飞机到汉口。史迪威8月26日到达汉口时，政府已经撤走，汉口出现兵临城下之感。共产党人铭记着1925至1926年武汉大革命的岁月，他们想仿效马德里保卫战，进行一场大汉口“人民保卫战”。马德里在被包

围后仍然坚守了两年之久。共产党人要求政府动员十五万工人、学生和市民组织一支大军，由一批“革命觉悟最高的优秀青年担任先锋”。蒋介石对这项计划不怎么感兴趣，因为他本来就不希望看到出现一支共产党控制的工人骨干队伍，也根本不相信在日军的进攻下武汉三镇能守住。由于阻挡敌军逆江而上的两个据认为是固若金汤的阵地，一个不战而弃，另一个被诡计多端的日军从背后攻占，蒋介石持这样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中国的防御战节节失利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很有涵养地决定宁愿拖垮敌人，不愿同日军交锋。总司令本人就完全如此。

史迪威同英法武官以及新闻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一道开始前往前线。卡帕曾在西班牙采访过一年，是个“挺不错的家伙”。后来，英国武官“大动肝火，中途告辞了”。法国武官染上痢疾，也返回汉口了。史迪威和卡帕继续朝前走。他的日记里是这样记载的：“我们在夜间行走，行路艰难，向导迷了路。行李由苦力挑着，大家精疲力尽，累得要死……日本飞机在头顶上两百英尺高的低空盘旋，用机枪扫射公路。可能有几个人中弹负伤。野鹰式飞机！……钟派人来接我们。继续朝前走，好。离前线越近，受到的欢迎越热烈。同一些人交谈，一道吃饭。他们给我安排个地方睡了一觉。吃早餐时，卡帕找来了面包和奶酪，有点发霉，但还可以吃。我们一直坐到九点，然后又继续朝前走。天热得要命，路很难走。爬上一座高山，沿长江朝瑞安方向眺望，山峦起伏，丛林如海。这片地区能永远守住……从湖的北边拖出各种各样的大炮。为什么？邝和张说在那里不能使用，拖到现在的阵地的后边就可

以使用了。”

回到汉口后，史迪威看见“到处都布设了路障和铁丝网”。法国武官罗塞勒上校已因痢疾病亡。这一天正好是沈阳失守七周年。在欧洲，列强正惴惴不安地度过慕尼黑危机。“天呀，这个世界成了什么样子！欧洲要是再爆发战争，我们大家会落得个什么样的结局呢……家乡卡梅尔好象突然一下子变得非常遥远了。”日本轰炸机天天都轰炸汉口，从来没有遇到抵抗。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空军身上，但中国空军一直不中用，而且留下来保卫汉口的飞机和飞行员又廖廖无几。中国有一种流行的哲理，认为应该把装备留起来以备应付将来的危机。结果使得本来就短缺的燃料更加供应不足了。史迪威在参观一个七十五毫米口径的火炮群后写道：“中国人不敢把东西拿出来用，因为拿出来就可能失掉，那样等到战争结束后就什么都没有了，那时怎么办呢？”那支炮兵部队参加过上海战役和徐州战役，但没开过一炮。

空军人员是个更大的难题。中国的机械师缺乏美国机械师的那种对内燃机的酷爱，对自己的飞机不怎么关心和爱护。飞机缺乏专门保养，很快就不能飞了。驾驶员和领航员是从知识阶层挑选来的。中国的知识阶层总的说来缺乏尚武精神，不愿在同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日军进行的力量悬殊的战斗中牺牲。当了飞行员的人倒很勇敢，但行动鲁莽，作风浮华，而且接受的是意大利教官的蹩脚训练。那批意大利教官是墨索里尼三十年代派来帮助蒋介石训练空军的。后来，因有碍意日两国日益友好，意大利把他们撤走了。他们回国时把为中国人绘制的飞行图全部带走了。中国人毫无办法，只

得另请别人。

1937 年，蒋介石聘请美国著名战斗机驾驶员陈纳德上尉负责为他筹建空军。陈纳德因耳聋和有意见分歧而从美国空军退役。1938 年，陈纳德晋升为中国空军上校，他开始实施一项建设机场的庞大计划，并组织了一个有效的无线电警报网，但是，他培训驾驶员的工作却不怎么成功。不久，他回美国招募雇佣兵，组织了一支志愿军保卫中国领空。目前，每当日本飞机不受阻截地飞来袭击汉口时，警报器凄厉地尖啸，成千上万的人在大街上奔跑，想到外国租界去躲避。

一队队衣衫褴褛、浑身血污的伤兵涌进汉口，而市内的老百姓却开始向外地疏散。在过去几周里，有四万余人乘船从水路或乘卡车或板车从陆路撤往湖南省省会长沙。蒋夫人组织的一个妇女委员会从各战区收容了一火车一火车饿得半死、破衣烂衫的孤儿，让他们吃得饱饱，洗得干干净净，换上整洁的蓝衣服，排着队登上船，撤向后方。企业合作组织正在拆卸工厂和设备，准备长途跋涉运往内地。伤员们到汉口来寻找指定的医院，结果医院已经拆迁，他们呆在人行道上，有的坐着，有的躺着，一个个精疲力竭，再也走不动了。

蒋夫人是在汉口坚持到“最后一刻”的人之一。史迪威 9 月份拜访过她，发现她“非常有魅力，聪明，待人诚挚”。虽然他承认她说了许多宣传性的话，说政府如何如何努力照料老百姓，但是，“她很好，而且工作干得很出色”。蒋夫人在施展计谋、运用魅力时从来没有失败过，这位美国武官也确实值得她下番功夫。在那次会见后，史迪威给她送去了一束鲜花。

10 月份，史迪威又前往华南前线。他从一位营长的指挥

所里观看了德安争夺战。那场战斗共打了五天，德安是日军从长江向南边的江西省省会南昌推进的必经之地。“我步行了十五里，来到王亮峙的指挥所。桥梁全部被烧毁，公路每隔二百码就有一截路面被掘坏。我见到王，受到热烈欢迎。他正在受训斥——他的部队已损失了一半……没有重机枪。有一些小炮弹箱。没有炮。每人约有二百发子弹。共有四挺轻机枪。桥梁已炸毁。没有汽车，也没有电话等设备。大家都睡在稻草堆里。”起初，王上校控制着一个高地，但后来被迫撤进城里，战斗继续逐屋进行。在最后几小时，王上校在夜间亲自带领一批人，穿过狭窄的街道，袭击日军。史迪威后来是这样描写的：“他们碰到了日军的一个机枪掩体……他们卧倒在街道右边。日本人开枪了，但没出来搜索，子弹接连射到对面的墙壁上，没有打中一个人。这时需要动作敏捷，中国人能做到。一个班悄悄绕过一座房屋，从背后摸到机枪掩体跟前，用手榴弹把机枪手炸死了……四处是枪声、喊杀声。王上校在黑夜里同他们失去了联系……”战斗一直打到后半夜和第二天。双方只隔几米远。后来，日军向人员减少的守军大举进攻，阵地没有希望再守下去了。下午六点钟，师长派来的传令兵送来了撤退的命令。师长共派了六名传令兵，但只有一人穿过了日军阵地。在夜幕的掩护下，王上校带领身边的六十五人同营里的其他人会合。他的营原先有一千五百人，但是，他们撤离战场时只剩下不到四百人。他们连续打了五天仗，几乎没怎么睡觉，也没怎么吃东西和喝水。他的部队共伤亡一千一百人，其中阵亡六百人。

史迪威通过观察这一类的战斗，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四

年后，他就是带着这种见解回中国战区任职的。他认为王上校作战勇敢，但判断能力差，应该呆在城外，因为城里已变成一片废墟，没有任何东西提供掩护，而且，只要占领城外的小山头，就完全控制住了这座城池。史迪威在写给参谋部军事情报部的报告中根据自己亲眼目睹的情况分析了这场战争，他谈到中国的防御战术肯定会造成不必要的失败。中国军队缺少飞机、坦克和大炮，在开阔地带遇到日军的这些武器时，只敷衍了事地抵抗一下就轻易放弃了阵地。但是，在隐蔽条件较好的山区里，他们能较好地守住自己的阵地，而且只凭步枪、手榴弹和机枪就能迫使日军放慢前进速度。敌军接着向侧翼发动进攻，常常是突入一个地带就遭到反击。但是，中国军队的对策不是抓住时机发动进攻，而总是只保卫自己的后方。中国军队在能取得胜利的时候却积蓄兵力，不愿把全部兵员投入战斗，结果，双方人数上的悬殊实际上不应有地缩小了，日军的主动性和装备上的优势改变了战局。史迪威在个人笔记中还写道："中国的替换制是荒诞的，中国最大的失策是没有利用自己最大的财富——人力。"

史迪威的那份报告是以他最喜欢的论点作结束语的："中国士兵的素质极好，但他们遭到愚蠢的领导人的贻误和背弃。"他推论说："假如让中国士兵吃饱饭，供给他们精良的武器和装备，好好关心他们……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在 10 月 21 日至 25 日这五天里，中日战争进入了高潮，日军不久占领了汉口，而且占领了中国最后一个出海口广州。华南的这个重要城市象秋天熟透的梨落地一样陷落了。中国

原想依赖海湾对面香港的英国驻军，在广州没作任何防御准备，因为他们认为日军不敢贸然开到离英帝国殖民地那么近的地方去，而且认为英国不会坐视日军占领广州而不采取任何报复行动。日本人比较机灵，他们从慕尼黑事件得到启示。12 月 12 日，即在丘吉尔所说的“不战而败”之日两周后，日军从广东沿海距香港三十英里的大亚湾登陆。由于中国守军玩忽职守、腐败无能和部分部队投敌叛变，日军长驱直入，没有遇到任何认真抵抗就占领了广州。

英国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因为它没有得到美国的保证，答应在英国因对日军采取行动而卷入战争的时候予以支持。据约翰逊大使说，中国人感到“完全被抛弃了”。在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后，蒋介石致函罗斯福总统，要求他向英国提供必要的鼓励，以便英美两国在远东进行“共同干预”。他毫不隐晦地谈了他的论点。他对总统说，只有国际上采取集体行动，亚洲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而这种集体行动“必须由美国来领导”。这正是美国感到左右为难之处。美国既不愿意领这个头，也不愿意默认日本控制中国，而美国若不带这个头，中国势必会被日本控制。

日本期望占领汉口和广州后能确保自己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它现在已在大陆投入了一百万兵力，极想寻找某种办法结束战争，于是，它再一次设法迫使中国达成某种解决办法。日本宣布打算建立一个由日本、中国和满洲国组成的反共集团，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东亚新秩序。日本邀请中国政府加入，条件是摒弃过去的抗日方针和“调整人员”。日本由于已经控制了中国的港口、铁路和大城市，控制了华北、山东

半岛、长江流域和华南沿海地区，所以它认为国民党会不得不向它投降。他们争取到了象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这样的大人物担任密使来同他们谈判了结办法。汪精卫及其他一些人现在都认为国民党的事业已经完蛋。汪精卫之所以愿意接受日本为中国新统治者，其部分原因是他同蒋介石有宿仇，再就是他有野心，为了取代蒋介石，他甚至不惜甘当通敌分子。

对蒋介石来说，如果他屈服，那是不可能有任何满意的前途的。他一如既往，丝毫不受事态冲击的影响。任何事情都不能使他改变态度。他坚信，中国一定能把日本拖垮，历史一定会给他招来外国盟友。中国是个组织松散的农业国，即使切断了它同外界的联系，也能在西部穷乡僻壤继续生存下去——至于是在什么样的低水平上生存下去和要付出多大代价，那是无关紧要的。完全靠人力在崇山峻岭中开辟出来的一条通往缅甸的公路刚刚通行。蒋介石要在敌军达不到的重庆坚持下去，直到日军最后同俄国或西方列强发生冲突为止。他拒绝了日方提出的一切条件。

1938 年 12 月，汪精卫的谈判使命失败后，局势陷入停滞状态。日本重申新秩序的范围包括中国的日占区，重申决心“消灭”国民党政府，说国民党政府“已不复存在，存在的只不过是个地方政权而已”。蒋介石 12 月 26 日公开重申决心维护中国的独立。日本已停止发动进攻，只在局部地区进行惩罚性讨伐，无意继续朝前推进。战争并没有收场，仍有一百万日军留在中国。1940 年，日本在南京扶植起汪精卫傀儡政府，但是，只要独立的中国继续存在和继续进行抵抗，占领军就无法撤走。

由于日本推行新秩序，美国遇到的局面是，中国的领土完整受到破坏，在华机会均等原则遭到违反，而这两点是美国四十年来的对华政策的两项基本原则。美国又一次遇到了讨厌的问题，面临到一种在良心上不愿认可但又不愿用武力反对的局面。华盛顿选择了中间道路：提出抗议，宣布新秩序违反门户开放原则和九国公约。日本则对美国“居然对日军在中国取得辉煌战绩后远东出现的新现实毫无察觉”表示惊讶。据一位经验丰富的记者报道，在美国国内又有人鼓动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后，日本“开始认为，在日本同中国达成解决办法的时机到来时，美国可能会变成日本的主要敌人”。

史迪威没有留在汉口目睹日军入城。他离开汉口，到湖南长沙商震的司令部去了。长沙是新防线的中枢。在以后的两个月里，战局经常变化，史迪威一直呆在南部前线，同军队、医务人员、掉队的官员、外国同僚、记者以及大溃败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流离失所的人一道到处转移。

中国的另外一项工作是把自由区的人力物力西迁。这项工作规模宏大，进展速度缓慢。一批一批的人把沦陷区的货物和设备经过长途艰难跋涉，送往独立区。船舶、火车、板车、牲口和苦力载运着货物，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从广州、南京、徐州等城市向内地迁徙。工厂的机器、政府的档案文件、大学的图书以及医院、兵工厂和机关的设备，都打包装箱，有的由苦力用扁担挑着，有的装在船上由纤夫沿着满是岩石的荒芜无路的江岸，一步步地拉着逆江而上。健壮的纤夫弓着腰，背着沉重的纤绳，用这种原始的办法顶着湍急的江水，拖着船穿

过一座又一座峡谷，走向自由地区。一条船往往由几百名纤夫拉。一座纺织厂的设备要装三百八十只船，其中三分之一要在急流中沉没，然后再打捞起来，重新装上船继续西运。有些工厂成套设备要在路上运一年多时间以后才能重新安装投产。大学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同粮秣队、警察和牲口一道编成队，徒步走向西部和西南的新校址。史迪威看到过这样的队伍经过汉口和长沙。“苦力扛着一节长管子，一辆板车吱吱嘎嘎地载着一车零件，一个锅炉放在滚木上拖着走。有些机器放在滚木上由人拖着走五百英里。他们走到足够远的地方后，就在江畔的岩石上开凿石洞，仿照半年前在广州时的样子修建兵工厂。”这场大迁徙同共产党人的长征一样令人惊叹，它证实了史迪威从那条推动货车前进的“大蜈蚣”身上看到的中国劳工的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史迪威同中国的几个师保持着联系，经常同那几个师的指挥官们一道研究战局发展，设法搞好运输工作，尽量透过当时的混乱状况和谣言的迷雾弄清真实情况。同时，他逐渐朝南走，经过衡阳到达广西桂林。他发现要等到明年2月份才能乘飞机到重庆，于是设法在一辆小汽车上弄了个座位，沿着唯一的一条汽车公路，经过贵州，穿过崇山峻岭，驶向重庆。途中，汽车在一座只有一条街的小镇停下过夜。在一家小客栈里，史迪威主动凑过去同“苏、田、朱和唐等几个人”一道吃晚饭，“他们几个都是好人”。夜里，史迪威住的房间里跑进一只小耗子，他觉得很好玩，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精明鬼”，因为它非常机灵。

史迪威定于12月28日在中国今后七年的战争时期的首

都重庆会见蒋介石。这时他已获准回北平，以便为他明年5月结束任职作准备。因此，他只能在12月19到31日这几天在重庆短暂停留一下。这个有五百年历史的省城的街道陡斜，从江边上来有一级级的石阶，阴沟不封盖，冬天阴湿多雾。史迪威呆了这么几天就足能断言它简直象个“肮脏的垃圾堆”。他只同蒋介石夫妇会晤了十五分钟，但会晤显然是愉快的。史迪威记载说：“非常融洽。俩人看上去都非常健康。他们都相当坦率。给了我一张照片，并向我表示赞许。”后来，史迪威回北平后把那张签名的照片挂在他卧室的显眼位置，他这样做与其说是出于对委员长的钦佩，也许不如说是为了表示对日本人的蔑视。

在会晤蒋介石夫妇后不到一个月，史迪威在写给参谋部军事情报部的报告中概述了他自己对这位中国领导人的看法。他写道：“在蒋介石的指挥系统中通常存在的混乱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蒋介石本人直接造成的。”史迪威认为，原因在于蒋介石总是怀疑有人反对他。蒋介石不敢让部下掌握权力，不敢信赖自己的部下，总想尽可能多地把指挥权揽在自己手里。他“首先考虑的是由他本人控制最精锐的部队和物资，以使自己的地位不致受到威胁”。

史迪威在私人笔记中还写道：“蒋介石总想让自己的部下耳目闭塞，因为他不信赖他们……因为他们如果全都什么也不知道，就绝对不会凑到一起谋反。”他在描绘这些后来也使他自己感到灰心丧气的因素时写道：委员长“从来不肯把好大炮分配给各师使用，因为他不希望自己手里的任何东西被别人拿走，他只让各个师有机枪和迫击炮。同样，由于他存在着

这种由来已久的不信任心理，他不愿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他总是盘算如何把军备省下来，留待将来他的地位一旦受到威胁时使用”。此外，他从来没有建立一个出色的情报系统。“他周围有一帮人，但他只了解一鳞半爪的情况。他们向他提供的看法都歪曲了实际情况。他从来不亲自去视察……始终缺少真正的监督。”

不管史迪威对总司令看法如何，他在考虑问题时还是始终把中国视为将来的盟友。他认为美日之间爆发战争势不可免。他早就开始收集材料，以判断哪些师和哪些指挥官在中美一旦联合作战时能发挥非常大的作用。他虽然不怎么瞧得起中国军队的整个领导层，但对某些个人的能力的评价是很高的。他要他的助手多恩上尉密切注意能干、坚强的指挥官。史迪威认为，中国军队如果能在组织、训练、装备补给、制订计划以及指导和指挥等方面得到美国的充分帮助，就能卓有成效地抗击日军。他的头脑里已经构思出了未来的蓝图。关于他非常推崇的顾祝同将军，他写道：如果美国有朝一日站在中国一边抗击日军，顾祝同可以成为中国军队的优秀总司令，“在美国军官和参谋人员的指导下指挥作战”。他说他的挚友商震将军“完全可以以顾问身份在美国参谋机构工作”。

1938 年的最后一天，史迪威乘飞机离开重庆前往云南昆明。昆明已成了自由中国的重要空军基地，是滇缅公路的起点。他下榻于湖滨饭店，晚上同陈纳德共进晚餐，并长谈到深夜。当时没有任何迹象预示他们两人后来会发生冲突。

他在日本人占领的北平的最后几个月的日子是很难熬的。史迪威懂日语的新助手弗雷德里克·芒森费了很大气力

才说服他相信正式拜会一次冈村将军是武官处的必要礼节。他勉强同意了，但说访晤时他不穿军装。在被说服后，他又提出不佩短剑。在被说服应遵守这个礼节后，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表示保留的了，但又断然拒绝穿马裤皮靴，因为马裤皮靴是日本军官的一贯装束。他穿着宽松的军裤，表情冷漠地同征服中国的人一道喝茶，设法扯到奈良寺庙里的鹿，就这个无关痛痒的问题同他们展开争论。

史迪威为了宽慰自己，私下列了一张日军素质优劣对照表。他认为日军有六个长处，即勤奋、勇敢、不屈不挠、组织得好、有纪律和有爱国精神。但是，他列出的缺点有二十六个：傲慢自大、玩世不恭、残忍、冷酷、野蛮、愚蠢、背信弃义、虚伪、无耻、没有道德观念、思想错乱和歇斯底里等等。近几年在中国不得不迁就日本人的外国人几乎人人都有同感，虽然他们不能象史迪威这样熟练自如地表述出来。在这种挑衅性的傲慢无礼和狂妄自大的态度面前，尤其是在不断淡而无味地完全颠倒事实的情况下，要保持恰如其份的关系简直是对心灵的折磨。就连英国驻东京大使罗伯特·克雷吉爵士在来上海参观时也说，他“对迁就日本的方针感到极其厌烦，对温和地对待这帮小鬼子感到十分憎恶”，以致感到耻辱，“从情绪上甚至从内心里感到不舒服”。他多次梦见自己身穿镶金边的将军制服，指挥部队在东京附近登陆，满怀巨大喜悦地“命令军队全力以赴，对这些肮脏的小杂种进行报复”。

使克雷吉、史迪威以及其他许多人真正受折磨的是他们本国政府在日本侵略面前的消极被动状态。专制势力步步前进，民主国家为了获得虚假的安全感而一再迁就。这种情况

使人们感到极度沮丧。此外，史迪威个人宦途的前景也使他感到忧郁。他看来是当不上对军人生涯具有重大影响的一星准将了。他再过一年就连续五年没有晋级，而且他的军龄也要超过三十年，这说明必须退役了。他的老朋友霍尼卡特和另外九个同班同学已经擢升为将军，而且其中有两人的年龄比他还小。虽然他的一些朋友和支持者在为他出力，为他给陆军部写过信，虽然在他们的努力下他的名字已列入合格人选名单，但是，麦凯布的毁谤性考核报告书几乎是个难以逾越的障碍。麦凯布发来命令，调他去承担一项没有多大前途的工作，他认为"他们是想把我搞到牧场去"，认为自己会象其他退役上校一样平平庸庸地了结自己的一生。

1939 年 5 月 1 日，离开中国的日子来到了。周围是一片沮丧气氛。在遥远的重庆，暮冬的浓雾已经消散，日本飞机又可以开始对那座没有防空设施的城市进行恐怖轰炸了。美国仍在向日本出售废铁，看不到任何援助中国的迹象。在马可·波罗桥事件发生后的最近这两年里，史迪威所希望的那种情况有改进的、行动协调一致的军事抵抗始终没有出现。

在中国的最后一天，史迪威一家乘船从天津前往塘沽，同行的还有使馆官员的妻子埃德蒙·克拉布夫人。她也是回国。当他们在甲板上打开午餐篮子，准备聚餐的时候，突然看见一具溺死的男尸从船旁漂过，那具男尸的双手还紧紧地抱着一个淹死的孩子，孩子的身上系着一块船民用作救生物具的木板。这太令人扫兴了。这是中国一切都很悲惨、事事都不顺心的象征。在这种时候看见河里漂泊的死尸是非常不吉利的，是难以忍受的。大家默然无语，收拾起午餐，回到船舱

里去了。

在美国国内，三天前发生的一件预想不到的事情完全改变了史迪威的命运：乔治·马歇尔越过比他军阶高的三十四名高级军官，被任命为代理参谋长，而且将从9月1日起继任正式参谋长。由于冲突日益逼近，马歇尔眼下关注的是挑选一些实干家和具有首创精神的人取代军队中的无用之辈。他提议晋升为准将的头两个人之一就是史迪威。

史迪威在船上颠簸了三个月，经过暹罗、印度支那、马来亚和爪哇，于8月3日到达檀香山，他从收音机广播中听到自己晋级的消息。他对温妮说："这不可能是真的。你先不要跟别人谈这件事。我到甲板上去散会儿步，捉摸一下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个消息在这艘陆军运输船上传开了，人们纷纷围过来向他表示祝贺。船上所有的人都非常高兴，只有一家例外，因为那个人的军阶比史迪威高，先占了船上最好的房舱。史迪威现在也有同样的权利了，但他无意硬要实现这种权利。但是，在檀香山停留期间，他对温妮说："我们要让他们感到有点不自在，要让他们觉得我们会提出这种要求。"

在如雪片般飞来的贺信贺电中，史迪威取得的一切成绩和具有的一切优秀品质突然一下子全得到了人们的承认。谢尔曼·迈尔斯在贺信中说："自二十年前听你说过关于斯密卡塞的精彩笑话后，我就认为你应该晋升为准将了。"许多贺信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象一个步兵少校在贺信中说的那样，对象史迪威这样一位显然能够"独立思考"和"执行任务有干劲"的军官终于克服不利因素取得胜利感到喜出望外。一些

贺信说，这个消息使人们对政府又有了信心，总部尽管过去干了种种错事，但最终还是晋升了一位应该晋升的人材。“我们知道马歇尔会为军队办好事，他确实已这样做了。”贺信中充满了由衷的高兴情绪。一位朋友在贺信中写道：“这个消息让人感到就好象是把旧帽子从屋顶扔出去那样痛快。”威利·惠普尔在贺信中写道：“真是太好啦！你早就该升为准将了。”一位炮兵上校在贺信中说：“从昨天起，将官一级的平均素质大大提高了。”

埃文斯·卡尔森在贺信中说：“我从中国回国时的想法之一就是军队需要有象你这样的一个人担任将官……勿须多说，如果能在你的麾下作战，我会感到自豪。”其他一些在中国任职多年的人也为“该死的中国帮”终于得到应有的承认感到高兴。军事情报处很长时间感到不悦，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后来从海军情报部的一位军官那里获悉，海军情报部一直是依据史迪威的报告了解“中国战争的真相的”。这位赞赏史迪威的军官写道：“这几年晋升为将军的人中，最当之无愧的莫过于史迪威。”他相信，如果战争真象现在看上去那样在近期爆发的话，史迪威一定会在沙场上证明自己不愧为一名将军。

一个月后，欧洲爆发战争了。

第九章　匆忙备战

1939—41年

史迪威1939年9月重新回到军队任职时，美国军队加上预备役人员，总人数在世界各国武装部队中居第十九位，列在葡萄牙之后，比利时之前。按军人占人口的百分比计算，在世界上居第四十五位。军队现役人员十七万四千人，不到1920年国会法批准的和平时期总兵力的三分之二。美军只有三个编制齐全的师，但兵员都不足百分之五十，所属部队分驻在不同地点，由于缺乏车辆，从来没有机会进行师一级的训练。此外还有六个编制不全的师和两个骑兵师，但没有一个装甲师。没有军、集团军和统帅部直属部队编制。作为野战部队，美军的训练是不充分的，它的装备在1919年还算是现代化的，但现在已经过时了。由于缺乏经费，只能每隔四年进行一次为期两周的军事演习，仅进行五天的“非常有限的军事活动”。军队新任首脑马歇尔将军说，由于国会不断削减拨款，美军已经降为“三流国家的军队”，战备程度甚至不到百分之二十五。

容许这种状况存在的一种理论是：军队是只用于保卫美国的最后的和未必可靠的手段，不管怎样，美国周围的海洋毕竟起着很好的保护作用。美国的军事政策未考虑再派遣远征军到北美洲以外的任何地方作战。在上次派遣军队到海外作战后，举国一致认为“绝对不能再这样干了”。马歇尔眼前的

目标是使军队满员和在训练与装备方面做好应付现代战争的准备。西点军校之父西尔韦纳斯·塞耶将军训示说:“为了用好材料造就出优秀军人，必须任用能胜任的人来从事训练工作。要想把最优秀的人训练成精锐部队，得要三年的时间。”且不谈说服国会提供经费这个主要困难，光这项任务本身就够艰巨的了。

史迪威准将被委任指挥驻扎在得克萨斯州萨姆豪斯顿堡的第二师第三旅。在上任前，他得到一个月的假期。在假期中，他到西点军校作了关于中日战争的专题演讲。那次演讲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有位骑兵军官问到马匹在中国战斗中的作用。史迪威沉思了片刻,然后回答说:“如果你饿的话,你就会猛吃一气。”他随后前往华盛顿,一则是为了汇报中国的情况，二则是想顺便“找麦凯布论个输赢”,好出一口气。现在他的军阶比麦凯布高了。那是个令人得意的时刻：当这位新将军大步从走廊走过时,每个门口都有人探出头来看他。史迪威在同麦凯布谈话时故意敞着房门，好让别人听见他们说什么。不幸的是他没有把他们谈话的内容记录下来。

作为将军，史迪威现在有资格用一名副官。这多少反而引起了一个问题,因为副官同拐杖一样,给人的印象是一种摆阔气的浪费，史迪威对这种做法是十分恼火的。副官的差使是替人“开门和挂衣帽”,但是,他解决了自己的问题——自己选择了志趣相投的弗兰克·多恩上尉。多恩在中国曾在他手下工作过四年，是西点军校 1923 年的毕业生。他有“粉红色人物”的绰号，这倒不是因为他的政治倾向,而是因为他的肤色。多恩那年三十八岁,是位英俊、幽默的单身汉。他富有教

养、多才多艺，有艺术家的天赋，天性高傲和好学。他作为一个伴侣会起激励作用。史迪威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感到有些为难。他对多恩说："我知道你对当副官是怎么想的，也知道你对将军有什么看法。我是向你提出建议。我会是名新型将军，你也会成为新型副官。你现在不要答复我。好好想一想，然后给我拍份电报。"多恩接受了他的建议。

虽然晋升为将军消除了史迪威个人的不满，但是，他仍对美国的政策感到愤怒和不耐烦。他认为，看来华盛顿不了解远东局势对美国有多大影响，因而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欧洲。同其他所有办事认真的外事官员一样，他认为自己的报告没有送到决策班子手里，甚至看都没人看过①。他认为，美国主要关注的对象将转向亚洲，美国在日本出兵前处在一种相对平静的局面中，因而忽视了一种从长远说比欧洲更重要的局势。他相信美日不久会爆发战争，认为由于把注意力集中于欧洲，美国没有认识到这种危险性。凡是刚从中国日占区回国的人，凡是目睹过日军逮捕、枪戳和故意侮辱外国人的人，都感到失望，不想再把日本危险的现实性告诉华盛顿坐在办公室里的官员了。

史迪威向马歇尔诉说了自己的意见。马歇尔要他放心，说他写的报告全看过了，当局了解局势，尽管还远没有采取对策。马歇尔对他说："乔，你现在的任务是到萨姆豪斯顿堡去，帮助我们解决困难。"

① 1936年曾在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任参赞的威利·佩克写道："（我们有时感到）我们寄到华盛顿的报告如石沉大海。"美国驻云南领事林沃尔特也发过同样的怨言："特别是在象这样的偏远边境地区，大家的感觉是，写报告不过是为了消遣，报告收到后就会归档，谁也不会看其内容。"

史威迪于9月24日到达得克萨斯州。作为旅长，他是该师协助师长沃尔特·克鲁格将军的副指挥官。陆军为了提高速度和机动性，选择第二师进行试点，试行精减人员，改成三三制，即把原来的有两万两千人的四四制的师改成共有一万一千人、下辖三个团的三三制师。在德军对波兰发动闪电战的刺激下，第二师和第三集团军的其他部队进入了紧张的冬季训练。他们风餐露宿，长途行军，常常是风雨无阻。在1月份举行的野外演习中，克鲁格将军命令史迪威指挥来犯的"敌"军。由于史迪威干劲十足，他在演习中经常担任这一角色。美军的训练宗旨是击退入侵军。据一位同事说，由于让史迪威率领"入侵军"，在整个演习过程中"没有一刻是不紧张的"。马歇尔1月份到该地视察，他亲眼看到，由于史迪威想出了主意和采取了惊人的行动和出人预料的战术，成规老套全被打乱了。照多恩的话说就是："他想的是打赢一场战斗，而不仅仅是演习。"

虽然华盛顿的决策机构不打算派遣军队到海外作战，但是，陆军部制订了一项保护性动员计划，打算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动员五十万军队，而且打算最后要使军队兵力达到一百二十万人。但是，没有采取行动动员全国各行业为这样一支军队提供武器补给。罗斯福避而不谈这种必要性，生怕又激起公众指责他搞经济"独裁"。他也不愿要求国会满足马歇尔提出的拨款要求，怕激起国会的反对，因为当时他正极力说服国会同意修改中立法案。罗斯福认为，由于欧洲危机的温度日益升高，美国的当务之急是争取取消禁运武器规定，以便及时

援助盟国迅速打赢战争，避免使自己被拖进冲突。美国政府看得很清楚，美国的安全显然最终要仰赖于英国舰队，虽然孤立主义者们并不很明白这一点。英国是否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下去，关系到美国的切身利益，而中国则没有这么重要。

美国恪守中立，一心梦想尽可能避开东半球的争吵。后来，到了 1939 年 9 月，德军令人胆寒地出动五十六个师和一千四百架飞机，一举击垮了波兰，这使美国国会大为震惊。于是，国会经过一个月的辩论，在 11 月份取消了禁运武器条例，虽然孤立主义分子们设法保留了现购自运条款。

美国人民的情绪比较乐于偏向远东，而不怎么偏向欧洲，这一则是因为美国人对中国有一种问心有愧的感觉，二则是因为国内存在着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即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孤立主义者又是抗日主义者。那些老式的大喊大叫的人物，如参议员博拉和海勒姆·约翰逊等人，一方面大吵大闹地反对打仗，另一方面又激烈地反对日本，而他们居然在国内没遇到任何留难。1939 年 7 月，罗斯福轻而易举地使国会同意按规定提前半年通知日本打算中止现行的贸易条约，从而为可能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扫清了道路。这一姿态是对日本过份刁难美国特别是英国驻华人员的一种回敬，目的是表明美国不会撤出中国，是为了让日本收敛一点。

孤立主义派领导人范登堡参议员已经向国会提出一项要求废除贸易条约的提案，另两名参议员也提出议案，主张对日本实行某种形式的武器禁运（美国没有对远东运用中立法）。格鲁大使从东京回华盛顿述职时对国内的情绪感到吃惊，认

为“要求对日本实行武器禁运的压力将增大……国会有可能提出这种要求”。到 1940 年 1 月，新国会共收到五项要求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禁止同日本进行贸易的议案或提案，有待议决。这表明，自两年前“帕奈号”事件一发生勒德洛就匆匆忙忙地向国会提出提案以来，舆论有了很大变化。日军对中国城镇狂轰滥炸，特别是人们意识到美国向日本出售废钢铁助长了日本的气焰，这些因素都起了作用。兼行医的传教士周以德博士谈及他在山西行医时如何从中国伤员身上取出“这些东西”，生动地说明了事情间的联系。他的听众可以想象到日本人在用美国提供的烂汽车制造炸弹。虽然教会组织从整体来说反对对日本实行禁运，因为这样做就有可能引起战争，但是，许多传教士却积极鼓动实行禁运，主张“必要时派海军坚决支持”禁运。从公民投票的结果看，百分之七十的公众支持实行禁运。美国大使格鲁在东京发表了一次不寻常的公开演讲，他说：“美国人民”反对日本试图在亚洲建立“封闭的经济”，反对“轰炸、侮辱和以种种方式妨碍美国的权利”。他的这番话是对日本的再次警告。

在远东问题上，由于一些迫不得已的战略原因，罗斯福落在舆论后边了。由于陆军部和国务院强烈提出意见，他不敢实行禁运，唯恐促使靠从美国进口石油的日本向南扩张，夺取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东南亚地区拥有日本所需要的资源：东印度群岛盛产石油，马来亚盛产橡胶，印度支那盛产大米。欧洲战争使东南亚出现力量真空，为日本提供了良机。日本军阀依仗帝国之威，力主出兵冒险。日本若那样干，就会促使除俄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对日宣战，因为那样会给西方国家

在从香港到新加坡(包括菲律宾)甚至印度的所有地区的地位构成威胁。那意味着要爆发一场两大洋之战。但是，英国舰队无力应付这样一场大战，美国也还没做好准备。因此必须尽可能避免爆发这种战争，无论如何也得推迟战争的爆发。

美国仍然不打算派军队到海外作战。弗兰克·诺克斯上校 1940 年 4 月3日在讲话中说:“简直难以想象我们会再派一支庞大的武装部队到海外远征。”诺克斯并不是孤立主义者，而是关心国际事务的《芝加哥日报》的发行人。他虽然警告说盟国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打胜并敦促加强美国海军力量，但是，他对“使举国参战、把数百万军队投入战场的庞大计划”不以为然“……认为那对我国的国防来说是不必要的”。六天之后，德军向挪威和丹麦发动进攻，“虚假战争”的平静时期就此结束了。

这时，美国军队已达到二十四万一千人，但其中只有五个师的编制适于作战，虽然装备不齐全。计划筹建的五十万应急军队所需要的武器装备，特别是飞机，还连影子都没有，更不用说一百二十万军队所需要的装备了。陆军部告诉总统，生产供更大数量的军队使用的装备得要整整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现在，德军已经席卷低地国家①，直指法国。罗斯福要求国会再拨给十亿美元国防经费，要求每年生产五万架飞机。这个惊人的数字比过去提出的任何数目都要高许多倍，使全国目瞪口呆。

5 月 10 日，即德军入侵荷兰和比利时的那一天，美国在

① 低地国家是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总称。——译注

路易斯安那开始举行历史上首次真正军一级的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是第三集团军的七万部队。指挥进犯的“红”军的史迪威在演习中一举成名，成了美国步兵作战部队指挥官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使他在获得第一颗星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又获得了第二颗星。由于即将决定是否将各师改成三三制和借机会看看第三集团军的闪电战术表演，陆军的所有重要人物都到场观看了这场演习。演习计划的设想是：“红色”国家出动三万军队进攻美国，从得克萨斯州向东越过界河萨拜因河，进入路易斯安那，朝“蓝色”国家首都亚历山德里亚进逼。“蓝”方的四万军队（守方的兵力按规定比攻方多）驻扎在七百英里以外的本宁堡。担任“红”军的第六军（包括第二师）出乎预料地打破规则提前开始行动。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史迪威出的主意。这反映了他的理论：进攻制胜的办法就是“打乱计划好的东西”。

“红”方空军发起有力进攻，掌握了制空权，地面部队从而击退“蓝”军，占据了几个关键据点，然后迅速朝前推进。史迪威擅长在夜间远距离调动部队，完成对敌军的包围，然后从侧翼和后方予以打击。据报上刊登的一则热情洋溢的报道说，他的部队先“发动了堪称美军历史上最惊人的包围战”，然后朝纳齐托齐斯发起进攻。凌晨三点钟，史迪威的侦察车从萨拜因河起点出发，两辆一排地从桥上迅猛冲过，然后派遣爆破队将所有的桥梁和交叉路口统统炸毁，以使“蓝”军无法占领侧翼阵地。到天亮时，他的先头部队已经一鼓作气地推进了七十英里，“这次进军犹如一场闹剧中的一连串危机事件……史迪威的进攻是其高潮时的闪电战。”夜幕降临后，部队的行

踪消失在"战雾"中，到处都在问："第二师在什么地方？"

随着战斗的扩大，史迪威继续表现出了一些令人吃惊的特点。早晨，他会出现在不该去的地方，即人们估计不到的地方。他占领了当时由乔纳森·韦恩赖特指挥的第一骑兵师的师部，而且很快又在巴丹使韦恩赖特遭到更加惨重的失败。这使克鲁格将军感到恼怒。演习裁判们裁决这一行动是许可的。观看演习的人都感到印象深刻，因为史迪威在向前挺进，而且总的来说是打赢了，虽然大多数军官看来内心还想最后再较量一番。

正当美军在举行这场军事演习的时候，传来了不幸的消息：潘策尔的部队打垮了荷兰和比利时。德军的进攻突出了路易斯安那演习中的许多缺陷。除侦察环节薄弱、部队之间缺少联络和"极其"缺乏炮火支援外，演习裁判长还指出"部队极不愿意离开卡车"，而卡车又极不愿意离开公路开到田野里去。卡车在公路上就象等着挨揍的死靶子一样，极易被打中，步兵坐在卡车上"完全无能为力"。史迪威也远未感到满意。他指出，"欧洲已经出现了有根本改革的进攻形式。侦察飞行、侦察车、俯冲式轰炸机、重型坦克、摩托化步兵、轰炸飞行和伞兵等等，配合使用，发动进攻，展开扇形攻势。设法使敌军后方瘫痪。我们注意这些方面了吗？没有。"

存在的困难是，许多军官同大多数公众一样，仍没有产生史迪威在中国抗战两年后所产生的那种急迫感。当德军挺进到法国北部，把盟军逼到英吉利海峡岸边的时候，一位美军师长竟然还象谈论明天的天气似地漫不经心地同人打赌说，如果法国陷落，大不列颠连六个星期都支持不住。

到6月中，法国的陷落已经成了可怕的现实。德军已经确实打进了巴黎。他们在六个星期里得到了他们在1914至1918年经过四年的大搏斗所没有得到的东西。相比之下，民主国家突然间显得软弱得惊人。英国决定从敦刻尔克撤退之举拯救了自己的军队，但所有的重型武器统统抛弃了。他们缺少步枪和弹药，飞机几乎损失殆尽，他们只能依靠英吉利海峡和温斯顿·丘吉尔了。丘吉尔当时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我们要在海滩上战斗……要展开巷战……我们决不投降……"

法国的陷落使美国大为震惊，突然间似乎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人们不再满有把握地以为美国不会遭到进攻了。总统私下承认，如果英国被打败，美国就会生活在"纳粹的枪口下"。军方的看法也不乐观。作战计划处处长乔治·斯特朗将军6月17日预言"盟军将在近期内被打败"。斯特朗是麦凯布主管军事情报处时期史迪威最讨厌的人物之一。在"虚假战争"时期，公众自在地设想盟军一定会胜利，他们现在截然相反，开始对美国虚弱的防务感到惊恐不安。罗斯福总统和前总统胡佛都在电台向全国发表讲话，想使罗斯福所说的悲观论者们镇定下来，想对人们的担心情绪加以引导，以达到有益的目的。胡佛说："没有必要惊慌失措。需要的是加速干。"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全国鼎沸，围绕防务计划展开了激烈辩论。陆军部拟定出计划，打算到1941年10月把陆军扩大到一百万人，一年后再扩大到二百万人。这项计划能否实现，取决于是否能通过法案（特别是在大选之年），在和平时期实行不合美国人心意的、令人厌恶的义务兵役制。总统采取了

一项惊人措施，即任命前部长，现已七十三岁高龄的史汀生和诺克斯上校分别担任他内阁的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史汀生和诺克斯都是共和党人，都直言不讳地主张实行征兵制。同时，国会也急急忙忙地表决批准扩大陆军编制和增加海军舰只吨位，增拨了十五亿美元款项。但这些都是杯水车薪。7月份，总统向国会提出一项"总体防御"计划，要求拨给近五十亿美元经费，以生产军需品，装备一百二十万陆军、一支力量同这支陆军相适应的空军和一支足以对付任何联合势力的两洋海军。国会愿意批准任何国防要求，唯独不同意用实行义务兵役制手段来增强国防。美国还不愿意领会这样一个含义：历史已再次要它到国外作战。全国整个夏季一直围绕着征兵问题激烈地辩论不休。

为了制止日本利用欧洲危机，美国决定让太平洋舰队留驻在夏威夷。太平洋舰队是4月份从旧金山开到夏威夷的。现在，制止日本已经成了美国仅次于本国战备工作的当务之急。这项任务本身包含着这样一个固有的、无法解决的难题：任何可能有效地制止日本扩张的行动都势必会促使日本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简单地说，就是势必会激起本来打算制止的侵略行动。在以后的局势发展中，美国始终无法摆脱这个难题。

日本政府尚不愿卤莽行事，因此到目前为止一直顶住军方要求加入轴心国的压力。军国主义分子们认为，如果同耀武扬威的德意志帝国结成联盟，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德国会使俄国继续保持中立，日本从而可以向南扩张，而在北方无后顾之忧。他们认为，德日联盟还可以制止美国积极支持中

国，从而使日本能够最后结束“事变”。放肆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将军对他的同僚解释说：“我们越能有效地约束美国，就越能尽快结束中日冲突。”日军封锁天津的英法租界，在上海国际租界进行挑衅和施加压力，袭击美国的财产，对长江上的另一艘美国炮艇进行“低空”轰炸，这些举动都是为了证明民主国家软弱无力，从而打消政府对加入轴心国联盟的疑虑。

德军战胜法国对日本来说也是个转折点，它证明这好象的确是未来的趋势。日本开始同德国举行秘密谈判。日本外务省现在公开宣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是它同军国主义分子共同制订的，并同意“这些地区的联合”是民族定数的说法。日本想趁同盟国在欧洲陷于困境的机会，封锁中国从西方得到补给的最后一条通道，压中国达成和解。

三年过去了，日本人还没有办法结束这场“事变”。他们进一步向纵深推进，进行轰炸，推行恐怖政策，作出各种表示，收买通日分子，但始终没有获得成功。他们曾想用强行合作的办法控制中国，但是，只要国民政府坚持抗战，他们就不得不继续实行军事占领。现在，在法国濒临崩溃的最后时刻，日本向法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法国关闭河内通往中国境内的铁路和同意让日本在印度支那设立一个军事基地进行监视。同时，日本一面以战争相威胁，一面几乎用命令的口吻要英国关闭香港边界和滇缅公路。滇缅公路并不通畅，而且管理不当，中国经由这条公路运进的补给不很多。但是，这条二十万男女劳工和童工用双手在崇山峻岭中开凿出来的公路现在是中国通往西方的最后一条通道。如果一个友好国家关闭这条公路，肯定会使中国对民主国家产生反感，而且会给那些主张同

日本达成和解的人提供新的论据。

大英帝国和美国顶不住日本的这一要求。英国现在正在单独抵抗轴心国，它要求美国在它一旦拒绝日本的这一要求而同日本爆发战争时能同它采取联合行动。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后，美国已把武器库收刮一空，把武器全部运往英国应急了。美国目前的状况远不能参战，无论如何还不能投入战争，虽然日本袭击欧洲帝国的财产提供了宣战的理由。因此，它无法答应采取联合行动。英国向日本屈服了，7月12日关闭了滇缅公路，虽然也提出了一项条件，说该公路关闭时间为三个月，以便让日本和中国进一步努力媾和。

确实有一股悲观的浪潮冲击着整个重庆，但还不足以使重庆接受同日本媾和的条件。大东亚共荣圈的泛亚和反西方的主调投合许多中国人的心意，但是，由于发起者是日本人，结果还是遭到了爱国主义情绪高涨的中国人民的拒绝。南京的汪精卫傀儡政府没能赢得人民的支持，因为日本的幕后操纵太明显了，而且，日军用武力"抚慰"农民的举动丝毫没有使大东亚共荣圈具有吸引力。

蒋介石没有屈从于各种各样的密使传递的建议。他行事时始终相信，西方列强投入对日战争势不可免，到那时他就能摆脱困境。而且，他是个从不改变主意的人，即使是在民主国家的事业看上去前景险恶的时候也不改变自己的主意。此外，正如他的一位同胞所说的那样，如果他同日本来往，"他一定会身败名裂"。但是，在这以后，他向美国提出越来越多的紧急要求，要美国向中国提供援助，同时向美国暗示：由于中国的斗志已降到完全丧失的边缘和可能无法继续坚持抗战，

他可能不得不同日本妥协。中国毫不掩饰它对列强没有帮助中国和没有更积极地约束日本耿耿于怀。中国不断地要求美国提供贷款、武器、飞机，要求对日本实行制裁或对日宣战，委员长也不断地向华盛顿提出其他劝告，这些听起来仿佛是在绝望地质问美国为什么还没认识到现在该是制止日本的时候了。史迪威也抱有同样的疑问。

总统担心对日本实行禁运会促使日本象纷传的那样加入轴心国联盟，从而加剧英国的危机。但是，美国必须作出某种姿态鼓励中国，警告日本。7月26日，美国宣布有限地禁止向日本出口废钢铁和某几类航空燃料，但没敢禁运石油，生怕促使日本向东印度群岛推进。

1940年7月1日，史迪威实现了每个军官梦寐以求的目标——指挥一个师。他被任命为第七师及其基地的将级司令官。第七师的基地设在蒙特雷的奥德营，离他的家乡卡梅尔不远。该师是个新成立的三三制师，各个方面都需要进行训练。奥德营不久改名为奥德堡，正在积极准备迎接大批新兵——如果征兵法案获得通过成为法律，估计新兵10月份就能到来。士兵们都住在帐篷里，兵营、食堂、行政管理楼和一万五千名士兵的营房将在几周内建成。

史迪威每天忙碌十六个小时，他制订计划、监督、视察以及训练士兵、训练军官和教会军官训练士兵。他立即建立了一所学校，派托马斯·阿姆斯上校负责，专门训练从后备队和国民警卫队调来的连级军官。他对阿姆斯说："从今天算起，准备在一周后开课"，每天上下午各上一节课，时间不长，讲授

战术、示范和实习并讲解战场问题。史迪威每周抽出三、四天的时间观看学校的班排操练，常常亲自用进攻问题指导缺乏经验的年轻军官。他常常认真、耐心地解释五条野战命令和按固定顺序排列的原因，以便让大家到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连一条也忘不掉。他常常喜欢从后面的一堆树丛里突然钻出来，当场提出批评。谁也摸不准他会从什么地方出现。他不断催促手下的高级军官们工作。他给他们很大的行动自由，但期望他们具有自己那样的献身精神和象自己那样工作。阿姆斯说："如果你不卖力气干，你就呆不长。他铁面无情，丝毫不讲情面。"史迪威的领导作风是令人振奋的，因为他从不"死搬书本"。但是，他对军官们非常严厉。有些人对他很反感，但大多数军官赞赏他，有的甚至崇拜他。据第七师的一位上校说："他具备的，你也得具备。"

国会9月份通过义务兵役制法案（规定年满21周岁到35周岁的男子必须服役，年满35周岁的人不需要到西半球以外地区服役，而且服役时间不超过一年），在这之后，第七师补充了百分之八十五的新兵。坦克、卡车、迫击炮、枪支、车辆、弹药……凡是军人需要的东西都不足。士兵们用木制步枪操练，把TNT炸药充作炮弹练习开炮。真正的作战训练根本无法进行，因为公众和士兵们都还没有认识到战争迫在眉睫这一事实。报界和家长们都反对让新兵经受艰苦锻炼。"十月越山"运动① 反映了这种情绪，影响了入伍一年的士兵。史迪威制订出计划，很快消除了这种情绪。他举行战斗演习

① "越山"是军队中的暗语，意思是开小差。"十月越山"的意思是等到10月份征兵满期，大家便可恢复自由。——译注

和阅兵，以树立第七师的自豪感，而且，他常常亲自走在队列的最前头，以提高士气。在他的培训和战术指导下，他指挥的第七师在 1941 年的大演习中表现得最为出色。

史迪威把培训士兵视为最大乐趣。他常常随便地坐在士兵中间，同大家讨论战术问题，不时迅速地扭动着头（这是他特有的习惯动作），嘴角掠过微笑。这位将军头戴一顶旧帽子，脚穿旅行靴，身穿伐木工人的厚运动衫，几乎同驻地周围的普通工人没什么区别。人们很快就称呼他“乔大叔”或“飞毛腿乔”，以称誉他走路的本领。他徒步走遍了奥德堡政府保留地的大大小小的山岗。从他的住宅到师部有十二英里，他常常徒步走一半路程。1940 年 9 月，史迪威晋升为少将的消息公布后，多恩布置大炮在驻地排列成行以便鸣礼炮十三响，此外还组织了一支配有乐队的骑兵仪仗队，并召集了大批参谋准备向史迪威表示祝贺，结果闯了祸。史迪威从汽车里钻出来看到这种场面非常窘困，不禁大发雷霆，咆哮道：“这到底是哪个家伙搞的？”

他在向集合的部队讲话时，故意讲得很简短。他说：“猴子爬竿爬得越高，屁股暴露得越清楚”，因此他不主张在晋升的时候发表长篇大论的讲话。

在这期间，史迪威在旧金山记者俱乐部发表非正式谈话时说：美国同日本开战是肯定无疑的；如果再发生“帕奈号”那样的事件，美国应该狠狠地打击他们；拖延下去只会使日本有机会选择开战的时间和地点。他说，如果让他率领装备齐全的中国军队并以两师美军作为先头部队，他能在半年内把日军赶出中国，因为日军虽然有战斗力，但缺乏想象力，作风死

板，墨守成规，非正规的战术会使他们不知所措。

在中国亲眼目睹过日军作战情况的外国军事观察家对日军的评价也都很低。法尔肯豪森和其他德国顾问经常到前线去，史迪威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许多关于日军战术的情况。他们常常对史迪威说，日军军官很容易辨认出来，因为他们总是举着望远镜瞭望，或观看地图，或佩着指挥刀。要是碰到神枪手，许多日本军官准会遭殃。卡尔森上尉 1937 年目睹上海战役后写道：日本的战争机器“显得象支三流军队”。他说日军缺乏主动性和智谋，训练机械死板，事事墨守成规，行不通时也不知道另外选择办法。由于依赖重型装备和飞机大炮支援，日军“行军不便，而且要花很多经费维持”。卡尔森在 1938 年进一步观察后报告说：“日军的攻击力差，运输系统不协调，空军和地面部队配合不好，武器质量低劣，炮火射向不准，指挥官缺乏想象力和主动性。”意味深长的是，他承认，“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犯过的许多错误，他们今后不会再重犯了”。

史迪威和卡尔森等人对日军抱有反感，他们的评价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是，就在中国的情况而言，他们的评价并非站不住脚，而且后来确实造成了不幸影响。这种评价反映了西方人的普遍倾向，就是认为，由于日本人完全是模仿他人，因而没什么好怕的。美国首席武官本特利·莫特上校 1937 年说：“在兵器或军事发明方面，日本没多少长处可学。在战略战术方面可供学习的就更少了。”他自鸣得意地评价日本说，在这些方面，日本只不过是抄袭西方，而且“今后要继续仿效西方的进步”。不醒悟甚至会更难办。

1940 年 9 月，即在史迪威晋升为少将的那个月里，日本

加入了轴心国，用格鲁大使的话说是正式加入了“掠夺国”的行列。按史汀生部长的记录，在这之后，总统和他的顾问们认为美国“总有一天要被拖进战争”，因而更加相信必须向英国提供援助和设法援助中国。9月间，美国向中国提供了两千五百万美元贷款，不到两个月，即11月份又很快批准向中国提供五千万美元贷款。此外，英美两国商定好11月中总统选举一结束就马上举行联合参谋长会议。

这时，也就是在美国成为交战国一年多以前，美国作出了一项带动其他一切的根本决定。总统在同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海军参谋长哈罗德·斯塔克将军举行的会议中商定了这样一种基本战略：一旦美国被拖进战争，它将主要是在欧洲战场作战，在太平洋地区则保持守势。这种“欧洲第一”的战略反映出美国认识到谁控制欧洲谁就控制全世界，而且相信永远会是如此。这种战略后来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打法，其中包括史迪威的作用，对美中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依据美军在准备好之前不能采取进攻行动的谅解，英美两国1941年1月开始举行联合参谋长会议。4月间，美国、英国、荷兰和澳大利亚的参谋长在新加坡就远东合作问题举行会谈。由于美国不能答应参加联合行动，会谈没有取得本应取得的结果。

英国一再询问如果日本进攻新加坡或荷属东印度群岛，美国会采取什么措施。美国人无法作出答复。美国同英国一样，也认为如果日本攻打某个对象，那一定是一个已在同德国作战的欧洲国家。马歇尔和斯塔克12月份同陆海军部长举

行会议，“四人一致认为”，如果美国不参战，战争就打不赢。但是，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会促使美国参战。日本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所说，日本海军断定，“除非摧毁夏威夷海域的美国舰队，否则我们就毫无打赢的希望”。因此，日本从那年冬天起就开始制订袭击珍珠港的行动计划了。

1940 年 10 月，中国向美国提出了一项新要求，这项要求后来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们要求向中国派遣由美国飞行员驾驶的有五百架飞机的空军部队，美国飞行员作为中国空军驾驶这些飞机，同时还要提供一笔巨额贷款，以作为这个计划的经费。蒋介石是把这项要求作为燃眉之急提出来的，他还采取引诱的办法，许诺将来重重酬谢。他在谈到他的空军顾问陈纳德上校的想法时说，美国飞行员驾驶的美国飞机能把日本海军摧毁在其基地里，从而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远程轰炸机能“把战争扩大到日本本土”，中程轰炸机和战斗机能袭扰日本的海上航道，从而制止日本进攻新加坡，使日军无法控制中国沿海地区和无法轰炸英国不久前刚刚重新开放的滇缅公路。蒋介石说，中国的经济和士气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如果这些飞机不赶快运来，等到日本开始轰炸滇缅公路和占领新加坡从而封锁海上航道之后再派飞机来，“那就迟了，到那时，中国的处境即使不是毫无希望，也会是危如累卵”。

蒋介石认为，虽然他一再坚持要求美国提供援助，但美国却把东西提供给了英国。他坚决认为，中国在英国还在推行姑息方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抗战，因此，美国在开始慷慨恩赐

的时候，应该首先考虑中国。陈纳德做的是炸沉日本海军的美梦，而蒋介石希望的却是有一支空军及其全部作战物资以使他个人的地位得到加强。他向约翰逊大使承认，他对共产党人的担心大于对日本的担心，他说共产党人正在“利用”时局。

实际上，近几个月来，共产党人确实又开始采取行动打击侵略军。抗日战争既为他们提供了保护自己和对付国民党的手段，也为他们提供了投合民众心意的途径。他们需要这场战争。由于怕法国沦陷引起失败主义情绪和怕蒋介石同日本达成一项肯定会包含剿共内容的解决办法，他们出动八路军，在河北和山西发动了“百团大战”，目的是使战争继续打下去。游击队的袭击活动促使日本发明了“三光”政策，即杀光、烧光和抢光的政策，采取了骇人听闻的报复行动，使一些省份变成一片焦土，平民遭到集体大屠杀。①

同日本一样，蒋介石也不欢迎共产党恢复活动，而且很快就对共产党采取了行动。他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呆在长江以南尤其感到不悦。1941 年 1 月，他命令新四军撤回江北。在新四军北撤的途中，他向他们发动了突然袭击。这使人回想起了他 1927 年在上海发动的政变。在这之后，统一战线完全变成了一种掩饰根本对立的门面。

陈纳德上校亲自回华盛顿同特使宋子文一起积极要求美国派遣一支空军部队赴华作战。宋子文的任务是敦请美国满

---

① “三光政策”就是包围某个地区，摧毁那里的一切，使之变成无人区。根据日本的记载，日本曾在河北省某县“扫荡”两个月，屠杀了四千五百人，焚烧了一万五千座房屋，把一万七千人押解到满洲。

足中国的要求。第一个主张向美国提出这种要求的陈纳德是根据自己的性情，自己选择当战斗机飞行员的，他热衷航空事业，透彻地研究了自己的科目，运用想象力和勇敢精神，创造出了新的飞行技术、飞行机动性和飞行能力。1940 年他整五十岁。他初踏入生活征途是在得克萨斯州一所中学任教。1917年美国参战后，他接受了军官训练，后调到步兵预备队服役，不久又调到信号部队航空兵服役。在那场战争期间，他从没有到过国外。1920 年以后，他加入陆军航空兵。他在飞行学校和空军战术学校试验了自己创造的战术并向学员传授。他撰写了一本题为《防御性追击的作用》的教科书。他向空军炫耀他自己的关于追击飞行的价值和重要性以及战斗机护航的必要性的理论。但是，由于空军采纳的是相反的杜赫特理论（该理论认为对付追击的自卫措施是连续轮番出动轰炸机），陈纳德不受欢迎。他由于耳聋不能再飞行，而且他感到一个人在负有使命而别人又不听他的话的时候简直等于是遭受迫害，于是，他 1936 年便退役了。他的一些为中国开飞机的学生向中国推荐他，蒋介石次年急不可待地把他聘请到了中国。

陈纳德跟史迪威一样，也是个严厉无情、性格坚强和饱经风霜的人，他和史迪威个子差不多高，脸上有激战中落下的伤疤。陈纳德具有高深的专业技术，但有点狂妄自大。他在中国受到过高的待遇。他 1937 年同蒋介石夫人的会晤“就象是一场使他从此一蹶不振的遭遇战”。当她精力充沛、热情洋溢地轻盈地走进屋子里来的时候，他“完全给迷住了”。那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道：“对我来说，她将永远是个女王。”在他还

是个十五岁的孩子的时候，他曾对他的继母产生过类似的迷恋。后来，他从来没有遇到过“另外任何一个如此值得我赞叹、尊敬和热爱的同伴”。陈纳德关心的不是中国本身，而是空军力量。他经常驾驶着飞机去汉口、重庆和昆明，但他对大地上的河流、独轮车小道、垒着围墙的村庄、散布着坟头的农村以及老百姓的生活了解甚少。他同委员长的随从人员一道工作，他不受意识形态的约束，因而并不因背弃了自己原来的信仰和同这个专制政权搞在一起而感到不自在，即使他知道这一点。

尽管陈纳德和兰州的俄国人尽了努力，他还是未能从
(44) 1937 年起的短时期内为中国训练出一批在数量上和战斗力方面足以象英国皇家空军那样同敌人争夺天空的战斗机飞行员。他的重大贡献是派遣一批侦探潜入敌占区建立了一个无线电防空预报系统。这个系统的工作很有成效，常常是在日军轰炸机刚在基地上发动、准备起飞的时候，中国总部就收到空袭的警报，从而使一些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护，但没有做到给敌人以还击。由于中国未准备在地面发动攻势（史迪威常常抱怨中国人脑子里想不到这一点），陈纳德提出的美国派遣一支配有驾驶员的空军部队赴华作战的建议提供了可以弥补这一不足的神奇手段。空军力量是点金石，是可以使愿望变成现实的阿拉廷神灯①。按陈纳德的设想，这样就能使蒋介石奇迹般地找到一条捷径，不费气力就掌握到一支力量，他手里的作战物资会增多，同时可以掌握一柄打击日军的

① 阿拉廷是神话《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阿拉廷神灯比喻能满足人的一切愿望的东西。——译注

利剑。作为干这件事的阿拉廷，陈纳德成了深受赏识的宠儿。

宋子文带到华盛顿的清单上包括要美国派遣地勤人员，提供教练机、零件和地勤设备以及提供贷款，购买武器与飞机，互派军事代表团等各种各样的要求。中国要求的经济援助现在已经扩大到要英美两国共同提供二到三亿美元贷款。陈纳德制订的计划除了要求美国派遣B-17重型轰炸机轰沉日本的整个海军外，还以蒋介石的名义要求提供适当数量的中程轰炸机和战斗机，以组建一支空军，“支持我正在准备发动的旨在收复广州和汉口的反攻”。陈纳德的建议从一开始起就是想入非非。

财政部长摩根索对宋子文说，要五百架飞机就“象是要五百颗星星”。摩根索在这段时期主管向美国的盟国提供资金和武器事宜。美国现在手头的飞机还不足以满足本国的最低需要。据陆军部9月份的调查报告说，各种物资都非常短缺，以致陆军最多只能让做好战斗准备的五万五千部队投入战场和维持作战，而且还得动用余下的教练装备。从目前的生产速度来看，只有到1942年4月份之后才有希望在满足英国需要的同时为本国扩大的陆海空军提供装备。即使这一目标也得靠提高生产率和延长劳动时间才能达到。

但是，所有的人，包括总统、摩根索、史汀生、赫尔和武装部队联席委员会，都赞成向中国提供飞机，这主要倒不是为了中国，而是为了使美国能够赢得时间武装自己。美国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使日本至少在1942年4月以前不要向南扩张从而挑起冲突。陈纳德提出的用美国人员和物资冒充中国空军发动进攻的计划可能有这种效用。据信，如果空军飞机飞临

日本海上航线上空，就能阻止日本向南发动决定性进攻。

战略目标是第一位的，但是，人们出于本能的同情和良心，也是愿意帮助中国的。亨培克写道，在白宫、国务院、财政部、陆军、海军和其他机构里，都有一批同情中国的人“提建议，立誓言，力陈自己的主张，又推又拉又敲打，使尽浑身解数”，千方百计地促使美国援助中国。正如史汀生部长后来有次所说的那样，“这些可怜的人已经艰苦地奋战了四年，我愿意把我们所能给的一切全都给他们”。但罗斯福的心肠却很硬。在中美两国就提供飞机问题举行谈判过程中，罗斯福收到蒋介石的一份电报，罗斯福问道：“他还愿意打仗吗？”当他得知这正是电报的主要内容时，他惊叫道：“好极啦！对此我已经谈论四年了！”中国崩溃的危险也引起了罗斯福的深刻关注。他对萨默·韦尔斯说：“我确实很担心，如果我们不迅速采取行动，自由中国国内的局势怕会恶化。”

但是，美国飞行员驾驶的B-17型轰炸机确实能轰炸日本的前景比战略和同情更具有吸引力。委员长提出建议，主张对日军进行空袭，他的理论根据是，让日本人民尝尝挨炸的滋味能促使他们“要求结束侵略”。他本人实际上可能也不相信这种荒诞的理论，他可能是认为它投合美国人的心意，实际上也确实是投合了美国人民的心意。这为人们要给敌手当头一棒的本能提供了理论根据，而美国的内阁成员们也是不可能没有这种本能的。由于在“帕奈号”被日军炸沉之后还必须文质彬彬地忍受日军的挑衅，人们的愤怒情绪日益高涨。日本人肆意蹂躏中国，肆无忌惮地轰炸中国的城市，而中国却不能对日本进行报复，这使美国人无法感到宽慰。令人感到惊讶

的是，国务卿赫尔对轰炸日本的计划表现出了“相当大的热情和气魄”。他周身的田纳西山区人的血液沸腾了。他对摩根索说：“亨利，我们要做的是搞到五百架飞机，让它们从阿留申群岛起飞，只要飞越日本上空一次……就会给他们一个教训……要是我们能设法让它们在东京丢几颗炸弹，那就好了……”。他的这番话使摩根索哑口无言。这位财政部长也给这项建议迷住了。他认为，“这样做能一下子改变远东的整个局势”。宋子文说服他相信了委员长的理论：“这样做会对日本人民产生非常决定性的影响。”

宋子文本人很积极。摩根索问轰炸日本是不是会给中国带来遭到报复轰炸的危险，他回答说：“他们反正已经在轰炸中国了……这样做能使我们有可能进行回击。”甚至连英国驻美大使洛西恩勋爵对这项建议也很热心。摩根索告诉洛西恩，他正设法向中国派遣一批四引擎的轰炸机和飞行员，“条件是必须用这批轰炸机轰炸东京和日本其他大城市”。洛西恩表示赞同，他说：“这样做能使局势全然改观。”

中美两国立即开始讨论实施这项计划的办法和方式，但是，在谨慎的史汀生那里却遇到了障碍。史汀生认为，这个建议“相当不周全”，与其说体现了美国的战略，不如说是体现了中国的战略。当这项计划正式提交给马歇尔将军时，马歇尔说，这项向中国派遣包括重型轰炸机在内的五百架飞机的整个计划是“行不通的”，因为根本就没有飞机，也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员。美国为中国搜罗飞机的办法是从原定供给英国的飞机中抽出一百架P-40型战斗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能制止日本进攻新加坡。在这些人以及总统和武装部队的支持

下，陈纳德的计划的核心部分取得了进展。

宋子文和从美国政府聘用的一批伙伴筹组了中国国防物资公司，负责为中国借用的空军部队采购物资和筹措资金。总统认为该公司是向一个被围困的民主国家提供帮助的手段，因此，他对该公司提供帮助并表示赞许。总统让他的两位最亲密的助手之一汤姆·科科伦开业当律师，宋子文马上聘请他担任该公司的法律顾问和同白宫的联系人。在总统的建议下，该采购公司聘请政府的另一位律师、卸去联邦电力委员会职务的威廉·扬曼担任负责人。从陆军和海军航空部队招募一百名飞行员的工作，由于答应给以优厚待遇而取得了进展——每月发给军饷七百五十美元，而且每击落一架日本飞机还发给五百美元奖金。美国总统 1941 年 4 月颁布法令，允许飞行员离职去中国当雇佣兵。尽管官方予以支持，但是由于存在种种困难，由于工作拖拉和人员不足，这一工作还是进展缓慢。美国志愿团一直拖到 1941 年 11 月才到达缅甸开始实施陈纳德的严格训练计划，这已经为时太晚，对日军起不到威慑作用了，尽管从作战角度来说还不算晚。

美国 1941 年 3 月通过了租借法案，这标志着美国开始真正向中国提供援助了。在这之后，美国向中国提供的援助成了一种投资，由于需要加以保护，美国又增加了援助，最后它成了一根将美国同国民党政府拴在一起的银索。最使人困扰的关系莫过于向穷朋友提供援助。

为了补偿耗用掉的援英贷款，罗斯福要求国会批准一项计划，允许政府“向总统认为其防务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的政府”租借武器和物资。这项计划提供了这样一种希望，就是

美国向其他国家提供资金和补给品，让它们继续作战，从而使美国本身保持非交战状态，使战争不致蔓延到美国本土，因此，这项计划对孤立主义者们产生了吸引力。国会以三百一十七票对七十一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这项提案，而且第一次就提供了价值七亿美元的军用物资。美国立即宣布中国有资格享受租借法案的待遇。从此，租借法案成了核心和基础，而且，从中国的观点来说，它成了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方面。中国再也用不着乞求，现在向中国提供物资以满足中国需要已成了美国的义务。中国的胃口变得大极了。他们不断要求得到军队所需用的一切，如步枪、榴弹炮、迫击炮、机枪、野战炮、反坦克炮、坦克、弹药、车辆以及购买这些东西的贷款等等。于是，出现了史迪威同冯玉祥打交道时所遇到的类似问题：他们要的武器的数量和种类不符合实际需要。如他们要十三吨重的坦克，而中国的桥梁根本经不住。他们提出的清单中还包括其他一些根本无法使用的武器。

通过中国国防物资公司用租借的办法做的生意比其他大多数军火采购活动都更有油水。参加该公司的美国人大发横财，宋子文也更富了。宋子文过去在担任财政部长和中国银行总裁时就已经弄到了大量财富。他同他的妹夫孔祥熙勾心斗角，争相取得蒋介石的宠爱，他时而得宠，时而失宠。孔祥熙由于得到了联合起来的宋霭龄和宋美龄的支持，现在夺得了财政部长的美差。宋子文虽然暂时失宠，但他从没有失去权势。他有爱国热忱，同样也精通生意经和具有政治敏感，他为中国国防物资公司组织了一帮人马，他们都很有能力，而且有熟人和门路，特别是能接近哈里·霍普金斯和主管援华租

借物资事务的官员劳克林·柯里。

美国的目标是帮助“中国在军事上实现自立”，依据的设想是，如果美国提供武器和装备并派顾问帮助改编和训练中国军队，中国军队能逐步采取攻势，牵制住日军，从而使日军无法进行新的冒险。这个目标本身也包含着不切实际的成份。宋子文提出一项计划，要求美国帮助中国武装三十个师（中国共约有三百个师），一切装备全部由美国提供。一旦委员长和全国军事委员会商定好选择哪些师，一旦美国提供大炮和其他武器并派军官帮助训练使用这些武器，被选中的三十个师就会成为特种攻击师。由于师和更高的部队都是司令官的财产，由于中国政治的整个结构取决于掌握兵权的人之间的关系和取决于委员长能否在他们之间保持复杂的平衡，选择问题后来成了一个非常棘手而且一直没解决的问题。为了组织和监督整个租借工作，为了实施装备三十个师和组织美国志愿团的计划，美国任命了一个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是约翰·马格鲁德将军。马格鲁德曾是史迪威的前任驻华武官，后来又曾接替史迪威再次担任驻华武官。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些人过去在中国担任过语言教官。一旦发生战争，该军事代表团还将起联络处作用，沟通两国间的战略计划和协调合作，一般说来，它还有提高中国政府斗志的任务。

这项计划并不是一项慈善事业，其宗旨是为了能使中国拖住日军。后来虽然情况和局势变化不定，但这始终是美国援助中国的目的，而且始终保留着一开始就有的缺陷：美国的目标同中国的目标不一致。中国的主要意图不是积极地拖住

日军，让日军在中国烧杀抢掠而不去从背后骚扰美国。国民党政府想从美国得到资金和武器主要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重庆同只有外敌的英国不一样，它可能始终觉得内敌正迅速地从背后逼近自己。地道的贪得无厌也是个因素。拥有武器即使不用，也会使人感到有力量，使人心里感到踏实。

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的军官们1941年10月到中国工作，他们很快对这一点就看得一清二楚。该代表团的炮兵专家乔治·斯利奈伊上校到一些地方视察后证实了史迪威任武官期间在报告中提出的论点，这就是"中国军队现在还无意"打进攻战。他们要求提供作战物资并不是"为了推进抗日战争，而是为了使中央政府"等别国把日军赶出中国后"能万无一失地对付叛乱活动"。他发现，美国国内普遍存在的认为中国打得日军不能前进和取得许多辉煌胜利的看法"是一种错觉"。

美国政策的核心思想从本质上说就是使中国有力量打击日本人，但它是以上述错觉为依据的，尽管并不是没有人提出过告诫。佛蒙特州参议员奥斯汀发表讲话，敦促美国加倍努力向中国运送武器，说这是打击轴心国的最快手段。驻重庆海军武官舒伊尔海军上校读了他的讲话后很有感触，他写道：知名人士最近发表的这类讲话表明，人们普遍相信中国可能成为打垮日军的一个积极的军事因素。他警告说："如果制订最高战略的人也当真抱有这种想法，那将会犯致命的错误。"

但是，这种错觉一旦牢固地形成，再加上中国的朋友和宣传家们的鼓吹，就很难消除。报界也在帮助促进这种错觉，它们在刊登有关中国的消息时往往倾向于刊登一些自己认为公

众想听的内容。有位自由撰稿记者想说明关闭通往河内的铁路给中国造成多大损害，结果只是白费力气。她多次撰写报道，指出不论修筑滇缅公路的人工多么浩大惊人，失去那条铁路仍然是极其严重的。但是，她的报道经过编辑的处理，却变成了对滇缅公路的颂扬。

运输专家、出租汽车公司老板丹尼尔·阿恩斯坦的报告打消了某些错觉。总统全权代表哈里·霍普金斯派阿恩斯坦去调查为什么"滇缅公路连他妈的一件东西也运不了"。根据租借法运去的物资堆积在仰光的码头和同滇缅公路相接的铁路终点站腊戍。按目前的运输速度，把积压的物资全部运走得要八个月的时间。阿恩斯坦发现管理人员腐败无能，工作效率极低，简直造成了一种令人完全无法想象的局面。他认为，除非是从政府手里接过管理权，让一些有能力并"有权力"改变这种状况的人来管理，否则，这种局面是无法改善的。

滇缅公路从昆明通往腊戍，路面宽九英尺，全长七百一十五公里，是一条单行公路。公路的情况骇人听闻。在中国境内的起点站昆明，卡车司机得办理八道海关手续才获准通行，有时光是办理这些手续就得花一整天的时间。此外，公路上还设有十来个检查站，省里的官员对卡车收税后才放行。在中缅边界的畹町，有二百五十辆卡车等着办理海关手续，有的要等上二十四小时，有的甚至要等上两周。有几百辆卡车因汽油耗尽而躺在公路上，司机们显然不懂如何上润滑油，要么就是润滑油太贵。黑市上经常可以看到有人在卖偷来的汽车零件。有十五个官方机构、交通公司和管制机构在公路上活动，它们代表政府各部，并把敲榨到的钱交给这些部门。滇缅

公路一个月的运输量为三万吨，但实际上只能勉勉强强地运输六千吨货物。

阿恩斯坦写了一份报告，建议采取明显措施，以便一次能让八千辆卡车运行。他的报告译成中文转呈给委员长并编入索引。这给阿恩斯坦带来了乐趣，中国很快就邀请他及他的两名助手接管公路的管理权，让他们把这条公路作为私人租借地，经过的卡车每辆可以收很高的通行费。阿恩斯坦谢绝了。中国又增设了一些委员会和管理局，重新分配了管理权。虽然最上层没多大改变，但是，由于美国根据租借法派去了一个由四十六名技工组成的技术组，公路的交通畅通了。技术组在公路沿线设立了车库和维修站，并向中国人传授润滑技术。

1941 年 6 月，德国突然进军俄国，世界局势和整个战局一下子全被打乱了。同那个令人吃惊的怪物——纳粹和苏联 1939 年签订的条约——一样，这个新逆转也使一切都改观了。德国甘愿陷入两线作战境地，上次它就因陷入这种处境而战败的。俄国则同民主国家结成了联盟。现在的俄国是共产党取代了沙皇，但它仍然是个捣乱的国家。人们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种战略上的有利条件。相反，马歇尔、史汀生和陆军部的智囊们一致认为不可一世的德军估计“最少一个月、最多三个月”就能打垮俄国。在别的地方前景同样也很暗淡。德军粉碎了希腊和南斯拉夫的抵抗，德国“狼群”潜艇在大西洋袭击英国船舶，隆美尔在北非发动反攻。这种趋势促使日本最后作出致命决定，即南下夺取印度支那南部。7 月 24 日，日本在同

维希政权达成协议的合法借口下，获得了金兰湾和西贡的八个机场和一个海军基地的使用权，从而使它能出击马来亚、东印度群岛和菲律宾。维希政权当时无力拒绝日本的要求。该协议的内容包括日本可以无限制地把军队开到那里去，美国从破译的电报中获悉，开去的军队将用于攻打暹罗。

现在到该实行石油禁运的时候了，这是可采取的最后一种威慑手段。史汀生认为这样做能遏制日本而又不致挑起战争。他的论点是，日本不管怎么恶劣，毕竟还是有理智的，不会同美国开战，自取灭亡。7月26日，美国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理由是日本进兵印度支那说明日本想"奉行武力征服政策"，以后"还会占领别的领土"。美国的行动实际上等于是实行石油禁运。

同时，美国的战略又多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近五年来一直在菲律宾任职的麦克阿瑟将军7月份建议调足够的兵力去保卫和坚守迄今一直认为无法坚守的菲律宾。B-17型飞机改变了事态。"空中堡垒式"飞机可以从菲律宾的基地起飞，袭击在海上活动的日本舰队。为了争取时间装备基地和制造并运去足够的巨型轰炸机，现在的关键是尽可能推迟爆发冲突的时间。陆军和海军都极力主张拖延时间。国务卿赫尔同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几个月前就开始谈判，商讨达成基本解决办法的条件，谈判一直在进行。用赫尔的话说，谈判与其说是真的想达成解决办法，不如说是一场"外交殿后战"。同以往一样，障碍还是中国问题。日本不接受不承认它对中国实行殖民控制的解决办法，而美国则不同意承认日本控制中国的解决办法。双方实际上是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

随着 10 月份的临近和一年制兵役期即将届满，陆军将失去接受过一年训练的士兵和后备役军官。靠每年新训练出来的士兵建立一支有作战准备的部队是不可能的。虽然总统极不愿意考验一下国会的脾气，但马歇尔和史汀生还是坚持要延长兵役期。国会山再次爆发大辩论。马歇尔顶着“军国主义”和“战争贩子”的指责，谨慎、策略但不屈不挠地施加压力，最后才连哄带劝地使国会以二百零三票比二百零二票的一票多数通过了提案。这个如此微弱的胜利说明，反对认为这场战争也是美国的事的力量非常强大。

1941 年夏季，正当国会举行辩论的时候，陆军举行了全国性大演习。参加演习的共有来自四个集团军的五十余万部队，演习连续进行了四个月。最先开始举行演习的是史迪威的第七师所属的驻扎在西海岸的第四集团军。史迪威的第七师现在称为“加利福尼亚师”。史迪威跟往常一样，这次仍然担任敌军“红”军角色。在第三军的其他部队的支援下，第七师从洛杉矶的基地出发，向北推进，进攻担任“蓝”军的守卫旧金山的第六军的两个师。“加利福尼亚战役”从 5 月底开始在赫尔斯特牧场区（位于蒙特里以南一百二十英里）的亨特利吉特驻军地区打响，到 6 月份才结束，共持续了五个星期。

史迪威打算派几个机械化营沿圣安东尼奥河谷发动闪电进攻，那样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突破“蓝”军防线，攻占其总部，打开通往旧金山的道路。史迪威在夜间突然开始行动，但是，就在这时，人数多一倍的“蓝”军对“红”军的两翼发动了进攻，击退了“红”军的攻势。尽管如此，随着演习的继续进行，

史迪威还是证明自己不负盛名。他到前线各地视察，亲自弄清楚是不是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职责，逐个检查炮位，每天晚上在地上睡三个小时，而且在走路时往往把参谋人员抛在后面。有位参谋抱怨说："我的上帝，这位长官象个牧羊人似的到处转。"第七师斗志高昂，有的部队甚至丢掉了装着空弹壳的步枪，徒手肉搏。演习结束时，第三十二步兵团仍然精力充沛，为了第一个到达营地，他们竟临时决定进行十七英里的急行军。到最后八英里的时候，史迪威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军行列。

6 月 30 日演习结束，"蓝"军获得胜利。但是，鉴于"红"军第七师的表现，史迪威晋升为第三军军长。史迪威的这次晋升是军队大改组的组成部分之一。马歇尔这次改组军队共涉及到了二十名将军，目的是使高级指挥系统恢复生气和让较年轻的将军代替年迈的将军。即将卸职的第三军军长沃尔特·威尔逊少将认为，史迪威现在是美国陆军四十七名少将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

史迪威没有满足于这种荣誉。他在评判这场军事演习时说："我们的军官们的那副不急不忙和过于自信的神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谁也不担心这意味着大家坐着不动。"他说，采取这种作风"要么是因为无知，要么是由于有长期的经验，到底是哪种情况，由你们自己去判断"。他命令军队再到野外去操练四天，以纠正不足之处。8 月份，史迪威在华盛顿的刘易斯堡指挥第三军再次同第六军举行对抗演习，目的是考查指挥大部队的能力和高级指挥部解决演习裁判规定的战术问题的能力。参谋长和陆军部长都前往观看了这场演习。史迪威那次同史汀生相会，虽然史迪威没有记录下自

己的看法。

现在政府不得不正视美国将无法逃避战争这一现实了。以马歇尔和海军上将斯塔克为首的联合委员会9月份正式提出意见，认为如果美国不参战，目前的抗德联盟就无法取胜；如果美国不积极提供军事援助，英国和荷兰"大概抵挡不住日本对马来亚或东印度群岛的进攻"。因此，美国将同时既要对德国作战又要对日本作战，因而必须制订出相应的生产计划。该联合委员会重申了先打垮德国，同时对日本保持强有力的防务安排的战略决策。对日防务安排的主要内容是向中国提供物质支持，以便"让中国军队对日本占领军发动进攻"。

这种战略方案得到英国的赞同，但中国则不同意。由于中国泄漏机密是出名的，它没有被邀请参加军事会谈，甚至没有被邀请参加罗斯福和丘吉尔8月份举行的大西洋高级会议，这件事使蒋介石十分恼火。蒋介石早就指望外国列强，结果却发现交战国——不论是英国、荷兰还是俄国——都没有把他当作盟友，没有邀请他参加英国、美国、荷兰和澳大利亚在新加坡举行的参谋长会议，而且，正如他从对事情的感触所能意识到的那样，他在美国的战略中没有占据第一位。为了加强同华盛顿联系，蒋介石从美国实行租借法起就要求美国象以往那样派遣政治"顾问"。罗斯福至少在这一方面是非常愿意对中国尽力而为的。他给蒋介石派去了一位非常受推崇的人物——欧文·拉铁摩尔。拉铁摩尔从1920年起曾以商人、记者、旅行家和学者的身份多次到中国活动，著有几部关于蒙古、满洲和中国其他边远省份的书。海军将军亚内尔说他是美国的中国和满洲问题最高权威。从推崇者的观点看，

派他这样一个人到中国去是非常合适的，虽然从接受者的观点看并不如此，因为中国要求派一名顾问为的是向他请教美国事宜，而不是为了请教中国问题。拉铁摩尔在大西洋会议期间报告说，中国感到自己在政治上很孤立，越来越担心自己在战争结束后得不到"平等地位和公平对待"。他呼吁美国同中国正式结盟，予以鼓励。但是，不论是拉铁摩尔还是其他任何人，谁都解决不了一个根本难题，就是只有发挥同等的影响才能获得同等的地位。

拉铁摩尔的报告说明了中国的不满情绪，他的看法很说明问题。中国人注意到，英国和美国警告日本不得染指从印度支那、东印度群岛到暹罗甚至西伯利亚的任何地方，但只字不提云南，而日本正大有进攻昆明之势。昆明一旦失守，滇缅公路就不能通行了。中国越来越怀疑西方国家为了争取时间，可能暗中鼓励日本"跟我们打一场小规模战争，因为我们经得起这一着"。他们认为，美国努力改善滇缅公路的运输状况的本意并不是为了帮助中国本身，而是为了使中国能同日本继续打下去，这样英美就可以避免同日本开战。"他们认为他们已经为我们打了四年仗，现在该我们参战，开始为他们打仗了。"他们憎恨各方面同除他们之外的任何人签定的条约和承担的义务，并根据这些条约和义务推断出美英在推行"欧洲第一"战略。他们认为这种战略对中国是不吉利的，认为它表明民主国家认为战争能在欧洲打赢，这会使中国在和谈桌上得不到席位，会使大英帝国恢复元气，从而能向外扩张，重建疆域。中国希望先在亚洲打赢战争，因为那样中国就能在盟国还在欧洲争取胜利的时候有时间加强自己参加和谈的

地位。

这是 1919 年的老问题，也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整整一世纪的老问题——这个中央王国在西方居于主宰地位的纪元里软弱无能。恼人的事实是，文化优越感没有变成力量，中国不知为什么总是没能运用自己的力量来证明自己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

拉铁摩尔的报告说，如果中国加强自信心，他们就会开始用自己的力量争取他们要在东方取得的胜利，就会摒弃现在坚持的方法，集中力量打游击战。“但是，他们没有这种自信心。”政治和军事最高指挥部都不相信人民，他们担心的是自己失去对力量的垄断。他们建立政治机器是为了准备等日占区解放后把那些地方控制在自己手里。但是，拉铁摩尔预言，如果中国最后主要是靠大国的力量而不是靠自己在东方取得胜利，他们势必会处于不利地位。

蒋介石不是这样看的。他极力想说服别人，大喊大叫日本大有进攻昆明之势。他现在坚持认为昆明是通往太平洋地区的关键地点，没有空军就守不住。美国志愿团的一百名飞行员和一批 P-40 型飞机这时刚刚飞抵缅甸境内的一个美国训练基地，还没作好战斗准备。蒋介石紧急要求“驻扎在新加坡的英国空军提供支援，并要求美国从菲律宾增调一批飞机。他的论点和要求得到马格鲁德将军的支持。蒋介石 11 月 2 日致电丘吉尔和罗斯福，大声疾呼地说：如果昆明失守，中国同外界的联系被切断，中国军队的士气和民心就会“根本动摇，这场漫长的抗战就有可能第一次真的垮台”。

赫尔同野村的谈判使蒋介石感到忧虑，他由预言危难进

而向人们灌输一种担心：中国若崩溃，就会导致亚洲其他国家投降日本。他警告说，如果美国同日本达成协议，如果美国放宽对日禁运，就会使中国人民认为自己“完全被美国牺牲掉了”，结果会招致中国举国民心涣散，会招致“所有亚洲国家丧失信心，实际上会沉重打击它们对民主制度的信仰，致使全世界开始进入一个非常悲惨的时代”。因此，中国的抗战如果垮台，那对全世界将是一场“无与伦比的大灾难，我确实不知道未来的历史会如何记载这段插曲”。

这种可能性正是总统最担心不过的。尽管华盛顿从来没弄清应如何认真看待蒋介石的疯狂叫喊。接替约翰逊的高思大使认为“一定不能认为中国继续无限期抵抗下去是毫无问题的。”

对于日本政府的受折磨的顾问班子来说，11月份是要作出决定的最后时刻。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没有出现突破的任何希望，双方不可能就中国问题达成可接受的解决办法，日本甚至不可能同美国达成妥协性权宜方案。如果找不到新的石油来源，日本储存的石油最多只够用两年。德国已经在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方面取得很大进展，如果日本现在还不采取行动控制亚洲，未来时局的发展就会把它抛在后头。如果推迟到明年春天再行动，美国的准备就会比现在充分得多。10月5日，枢密院举行了五小时御前会议，一致同意一方面继续在华盛顿举行谈判，一方面完成军事准备工作。如果到11月底谈判还毫无结果，就准备采取军事行动。

日美双方不断地提出建议和反建议；美国尽力避免不可避免的局面，日本也作出了一些努力；有人向美国提出告诫，

美国自己也破译了“神奇”密码电报，彻底了解了日本的意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1 月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历史上预兆最明显的一场突然袭击一天天地临近。

第十章　“派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1941年12月—1942年2月

在卡梅尔，一个星期日上午，阳光明媚。已经是12月份了，天气倒还很暖和。史迪威将军夫妇在家里招待从奥德堡来的一些新下级军官。朝着花园的门敞开着，从楼上卧室的窗户望去，浩瀚的太平洋波涛起伏，雄伟地拍打着海岸。客人们都身穿便服，因为不是值勤的时候是不能穿军装的。屋子里洋溢着星期日的欢乐气氛。突然电话铃响了。史迪威夫人走过去拿起话机，听筒里传来了一位朋友激动的喊声：“温妮，快打开收音机，珍珠港遭到袭击！”史迪威夫人慌乱地寻找收音机，找到后马上接通电源，大家围在收音机周围，一下都愣住了。他们马上意识到，在那边，在窗外深蓝色的浩瀚的太平洋上，战争爆发了。

人们原估计日本会袭击东南亚。谁也没料到日军会采取这样一种不寻常的大胆行动，倾力袭击远在三千三百海里外的太平洋上的美国作战舰队。这场攻击非常大胆，而且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功，令人又惊又怕。一直被人低估的日本在人们的眼里突然一下子变得具有可畏力量了，而且估计它随时都可能袭击美国本土。在几小时内，各种各样的恐慌谣言通过电话传到了奥德堡，有的说日本舰队离蒙特里只有十海里，

有的说旧金山可能遭到空袭，还有的说分别在克利夫休斯沿海和洛沃斯角沿海发现潜水艇的潜望镜。

史迪威在第四集团军司令约翰·德韦特中将的领导下负责保卫西部防区南段，其中包括加利福尼亚沿海地区，一直延伸到墨西哥边界。日军很可能会从该地区进攻美国。由于珍珠港的海军损失殆尽，现在只能靠还没有做好准备的陆军了。这块地区居住着五百万人口，集中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航空工业，厂房都在海上军舰炮火的射程之内。史迪威本人认为日本不能来到加利福尼亚，但是，鉴于自己肩负责任重大，他每天至少有一次"下沉之感"。他始终处在惊恐慌乱之中。设在旧金山的第四集团军总部常常给电话搞得非常"紧张"。史迪威知道自己的兵力不足，特别是弹药不足。

在南段总部所在地圣贝纳迪诺，史迪威坐在办公桌边打电话给陆军部说，他的小型武器的弹药只够打几小时，大炮实际上连一发炮弹都没有。他说话时激动得几乎要把烟嘴咬成两截。当华盛顿那一头接电话的军官保证"我们尽力而为"时，他咆哮起来："尽力而为！我的上帝，我究竟该怎么办？难道用桔子把他们击退吗？"日本在袭击珍珠港的同一天也袭击了关岛、威克岛、香港、菲律宾和马来亚，次日袭击了中途岛，得知这一消息后，加利福尼亚更加惊慌了。飞机厂、电台、铁路桥梁和隧道、堤坝、发电厂、水道、水库、油井、医院、造船厂和港口防务设施纷纷慌张地要求派兵守卫，每个机构都提出种种理由，强调自己的需要非常重要。结果，许多部队被派去担任警卫，训练工作不得不中断。

史迪威在这段日子里不断地在这片沿海地区来回巡视，

同各市市长、海军陆战队和海军磋商，调查谣言，保护机场，组织警报系统，回答询问，为从东部增调来的部队安排驻地，设法找地方存放补充的弹药。在这期间，人们一直惊恐不安，谣言一直不断。据报告，12 月 9 日在旧金山和洛杉矶之间的某海域发现了一支有三十四艘舰只的日本舰队。史迪威在焦虑中度过了几小时之后记载道："不可靠（下沉之感越来越大了）。"后来查明那批"敌舰"是蒙特里渔船队的十四艘返回本国的拖网渔船。12 月 10 日传来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英国 11 月间为了制止日本进攻新加坡而派到远东去的最新式"威尔斯亲王号"战舰和"却敌号"巡洋舰在马来亚沿海被日本飞机炸沉，从而使英国丧失了在那一海域的制海权。（"我的上帝，情况越来越糟了。"）12 月 11 日，德国和意大利履行轴心国条约规定的义务，应日本的要求，对美国宣战了。这一天又有警报说："在距旧金山一百六十四海里的洋面上发现日本主力舰队。所有部队一律进入全面戒备状态"。这次警报是第四集团军总部自己发出的。过了令人讨厌的几小时之后，查清这一消息也未经核实。（"天哪，他们简直想要我的命！"）

12 月 13 日，西部防御指挥部报告说，洛杉矶即将遭到空袭，打算向人民全面报警。史迪威认为"全面报警"造成的伤亡和惊慌不亚于空袭，因此决定不相信这项报告。"弹药情况有点好转……二十四小时里运来的第一百二十五批……有两个营已作好在一百七十五英里长的海岸线作战的准备，还有两个营作预备队。（过去的下沉之感。）从奥德堡调来了六辆坦克（其余的坦克开不动）……一个师将从基地开来，要十天。

……派出一架侦察机……高射炮要到了……日军在林加延的登陆被击退…… 12 月 14 日。战争爆发已经一个星期。威克岛和中途岛在坚守……菲律宾部队在林加延朝他们射击……打得漂亮。实际上，大多数被人瞧不起的民族(中国人、俄国人、希腊人和菲律宾人)都在出色地维护人类文明。”

人们神经紧张，甚至有点支持不住了。“想辞职——完全经受不住了。”加利福尼亚南部沙漠地区空军一轰炸机靶场的指挥官担心日军从航空母舰上或从下加利福尼亚地区某秘密基地派伞兵进行袭击，那样他手下的人会全部被打死。关于破坏活动、携带电台的间谍、潜艇和秘密机场的可怕传闻四处扩散，对这些不得不进行调查。有关部门要求史迪威在活动时一刻也不得离开警卫，以防日本特务刺杀。

突然，史迪威应召摆脱了这种狂乱状态。12 月 22 日早晨六点三十分，他接到第四集团军打来的电话，命令他立即到华盛顿去“制订一项远征军作战计划，打电话的人暗示那支远征军将由我指挥”，并告诉他可以享受几天假。他的参谋人员兴奋得奔走相告。“他们认为这是件大好事。”匆匆忙忙地交结工作后，史迪威回家同家人告别，并一道提前过了圣诞节。“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大家心里都平静下来了。感谢上帝。”第二天早晨，他带着多恩登上飞机，于次日即 12 月 24 日下午到达华盛顿。两天后，丘吉尔偕同三军参谋长到达华盛顿，以举行一系列参谋长会谈。这次会谈被称为“阿卡迪亚”会议。

史迪威径直前往作战计划处。在那里，他吃惊地听说给了自己一项新任务：已选定他负责指挥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代号为“黑色计划”的第一场攻势——在法属西非登陆。告诉

他这个消息的是他利文沃思学院的旧同窗、作战计划处副处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前不久刚晋升为少将。史迪威这次意识到他本应感到非常适当，但是，“不知怎地，这并没有使我感到跟过去有任何不同”。正如马歇尔后来所说，他之所以挑选史迪威指挥第一场战斗，是因为史迪威训练和指挥第七师参加演习的才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及因为他认为史迪威是位想象力丰富、足智多谋和有自信心的高明战术家，对军史有研究和擅长训练军队。马歇尔命令马克·克拉克对将官进行调查，结果证实了他的看法。克拉克对陆军九名军长调查后按才能大小开列了一张名单，史迪威名列前茅。

史迪威在军事学院得知他的出击目标是达喀尔。达喀尔早就在美国的计划中居显著地位，因为德军有可能把它作为跳板，渡过不太宽的南大西洋，进攻南美洲。第二天证明这项计划还远没有最后确定。“谁也不知道要派我到哪去。上午说是到达喀尔，下午又变成卡萨布兰卡。”阿卡迪亚会议的第一项决定是确认“欧洲第一”战略，打算在摩洛哥大西洋畔的卡萨布兰卡登陆是为了取得一个基地，以防止敌军控制地中海和最后夺取欧洲战场的主动权。卡萨布兰卡登陆行动的代号定为“体育家”。史迪威发现“整个事情还没确定下来”，这种状况在为期三周的阿卡迪亚会议期间一直没有改善。英美双方在白宫就重大政策问题举行了八次会晤，新成立的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举行了十二次会晤，双方代表努力设法制订双方一致同意的作战目标，组织一个指挥部，制订行动计划，尤其是确定行动途径。对于“体育家”行动计划，时而有人表示

赞成，时而有人表示反对，一直无法确定下来。

据克里姆林宫的一位观察家说，当半年前战争打到莫斯科附近时，“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华盛顿也陷入同样境况。史迪威在他第三军的参谋长们的协助下制订行动计划，出击的目标几乎每小时都在改变。目标是卡萨布兰卡呢，还是达喀尔？是冰岛呢，还是加那利群岛？投用多大兵力？前景如何？调配多大支援力量？使用哪些武器？估计敌人会采取什么行动？所有这些都拿不准，大家争来争去。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和办法，然而讨论后又都否定了。正如史迪威在写给他妻子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他简直给办事员包围起来了，“他们从自动旋转的大门匆匆忙忙地跑出跑进。手里拿着文件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地跑来。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角落里交头接耳。当你开始讲话时，大家都站起来。电话的表轨声和铃声都响个不停。屋子里挤满人，秘书在紧张地打字。‘请立刻把这个给我打十份。’‘从保险箱里取出那个秘密卷宗。’‘黄色计划(蓝色计划、绿色计划、桔色计划等等)到底搁在什么地方？’大家都在猛抽香烟。大家都把你推给别人。应该有个高嗓门、满脸凶相、手持大棒的人出来大吼一声：‘停止！你们这群疯狂的杂种，不许说话！你们甭装出一副勤快样子！现在你们一半人他妈的在天黑前给我滚出城，其余一半人在这里坐一小时，谁也不许动！’这样，他们就会把文件全部烧掉，重新开始。”

史迪威在制订“体育家”行动计划的时候，心里也挂念着远东，想知道海军什么时候才能投入战斗。他现在得知了珍珠港大浩劫的严重性：八艘即美国近半数的主力舰被炸沉或

炸毁，一百七十七架飞机被摧毁，近四千人伤亡，其中一半人死亡。美军在菲律宾克拉克基地也遭到同样大的浩劫，在获悉日军袭击珍珠港的消息几小时后，麦克阿瑟将军的三十五架重型轰炸机的一半和战斗机的三分之一竟然未来得及起飞就在机场上被日本飞机炸毁了。西方参加对日战争是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所期望的，但它没给人们带来鼓舞，却带来了大灾难。

日军发动这场战争时，海军力量约相当于美国、英国和荷兰驻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力量的总和。现在，日本仍有十艘战列舰和十艘航空母舰，海军第一线约有五百架飞机，而盟国的主力舰只剩下美国的一艘完整无损的战列舰、两艘受轻伤的战列舰和三艘航空母舰了。在驱逐舰、巡洋舰和潜艇方面，交战双方基本上势均力敌。在陆地上，日本有五十一个陆军师，其中二十一个师在中国，十三个师驻扎在满洲以对付俄国，这样，除去保卫本国的部队外，陆军还可以派十一个现役师和大约七百架陆军飞机到东南亚和太平洋西南地区作战。

日军接二连三地取得惊人胜利。12月23日，关岛和威克岛失守。在圣诞节那一天，英国据为据点已整整一百年的香港投降了。在菲律宾，日军根本不象起初的消息所说的那样，而是出色地登上了海岸，登上岸的二十万日军把美菲联军赶进了巴丹半岛狭窄地带。第二年的1月2日，日军占领了马尼拉。日本伞兵部队打进荷属东印度群岛，泰国被占领，默从的维希政权为日军打开了印度支那的大门，这样，日军一直打到了缅甸东部边界。此外，日军还在马来亚半岛腰部登陆，

占领了那里的英军机场，然后向南穿过丛林，朝新加坡挺进。在陆上和海上，日本的俯冲式轰炸机和鱼雷机控制了空中优势。按丘吉尔的话说，在日本战争机器的这种“可怕效力”的打击下，白种人在亚洲的威严被一扫而光。

在中国，珍珠港事件的消息被认为预示着中国即将得救。韩素音写道：“国民党官员奔走相告，弹冠相庆，就好象是赢得一场伟大胜利似的。”人们欢欣鼓舞地涌上重庆的街头。在内地其他城市里，神父觉得似乎东京正在燃烧。要发动大规模远距离空袭的消息误传为美国派五百架飞机轰炸了东京，但是这种误传是无关紧要的。中国庆贺的原因是它终于有了盟国，美国参加了对日战争，从而可以依靠美国打垮日本。中国不必进一步承担义务，只要坚持下去，最后就能跻身于胜利者一方。一位在重庆目睹欢庆场面的美国人说：“在美国发生珍珠港事件那一天，在这里就好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休战庆祝日似的。”

蒋介石一得知珍珠港事件的消息，马上采取了行动，以图在大联盟中扮演大国角色和证实中国在全球战略中的影响。在日军袭击珍珠港的当天，他召见英国和美国驻重庆的代表，建议在亚洲反对轴心国的所有国家，即美国、英国、中国、荷兰和俄国（他当时指望俄国能参加对日战争）缔结军事互助条约，并建议在重庆建立一个军事委员会，以美国为首，负责协调各国军事行动。蒋介石虽然嘴上说让美国提出一项“全面战略计划”，但是，他自己的脑子里已经有了明确的设想。他建议包括俄国在内的各盟国把主要力量用在亚洲，从南太平洋、阿拉斯加、西伯利亚滨海边疆区和中国沿海出动空军袭击

日军，争取在1942年打败日本。先用空袭切断日军的补给线，断绝亚洲大陆上的日军同外界的联系，然后，中国军队就能把他们消灭掉。

蒋介石没有忘记作一句补充，他说他建议在重庆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应该"掌握轻重缓急和补给"。他对这同样感到关心，即使不及对战略那么关心，因为他一下子就准确地察觉到英国人会设法抢先弄走根据租借法案运到缅甸准备转运给中国的武器。他希望美国人领导军事委员会就是为了防止英国拿走他的物资。

蒋介石的战略从获得空军力量来说纯属想入非非，且不说也根本不符合美国和英国已经决定奉行的欧洲第一战略。蒋介石没有被邀请参加阿卡迪亚会议，虽然中国是1942年元旦发表的联合国联合宣言的四大签字国之一。（罗斯福亲笔写的名单最初是把中国排在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位，再下面是苏联和联合王国，后来，他又把英国改排在第二，把中国排在第四，再后面则是其余二十二个国家，依字母顺序排列。）但是，蒋介石在同阿奇·博尔德·韦维尔爵士会晤后，被要求提供一份初步作战计划，这仅仅是一种礼节上的客套而已。当时韦维尔爵士已被任命为美英荷澳远东战线最高司令官。蒋介石是在12月23日在重庆同韦维尔会晤的，这是中国同盼望已久的西方盟国的首次会晤，然而这次会晤几乎跟珍珠港一样不幸，因为它使三大盟国中的两个盟国间的对立表面化和扩大化了。

中国认为英国是个称霸的帝国，是最先侵犯中国主权的国家，是不平等条约的创始者，因此，中国害怕和讨厌英国。

中国对英国暂时关闭滇缅公路仍耿耿于怀。反过来，英国也不怎么尊重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军事力量。奥托·尼迈耶爵士率领的英国经济代表团在珍珠港事件前一个月访问了中国。该代表团报告说，中国政府解决不了面临的多方面问题，采取的措施是笨拙和乱糟糟的，提供贷款也帮不了忙，因为中国存在物资奇缺的实际困难，贷款不可能得到有效利用。尼迈耶对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说，蒋介石"对局势缺乏理智的了解"。英国冷静地接受了这种结论。英国作为一个帝国，不象美国那样希望战争结束后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在12月间重要地方一个接一个丢失的绝望时刻，英国眼下关心的是守住缅甸，如果可能的话，用它作为保卫印度的最后一道屏障。但是，如果缅甸丢失，那就没有其他任何别的考虑，只有等到取得最后胜利后重新在亚洲收复帝国领地了。

中国也希望守住缅甸，但目的是使租借物资能继续通过仰光畅通无阻地运往中国，更不必说是保住堆积在那里的千万吨物资了。双方在重庆会议上争夺的主要是堆积在缅甸的租借物资和新开到缅甸的陈纳德的美国志愿团。中国有权得到这两者，但是，英国也迫切需要，而且自认为能更好地利用它们。

韦维尔将军命中注定在不利的情况下担任指挥官。他是一位身体结实的独眼军人，常常令人生畏地一言不发。他使中英矛盾明朗化了。韦维尔与史迪威同年出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比利时的伊普雷被打瞎了一只眼睛的。在这场大战中，他在中东先是打了胜仗，但后来遭到挫折，随后同奥金莱克将军调换职务，到印度担任总司令。现在，由于马歇

尔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坚持主张每个战区都要实行统一指挥，他被任命负责指挥从爪哇到缅甸的长达两千英里的毫无把握的防线。英军首脑疑心这是美国要的阴谋，目的是自己避免指挥这个注定要失败的战区。他们申言，"让一位英国指挥官去承担就要落到我们身上和美国人身上的灾难的责任，将是很不幸的。"丘吉尔愤然拒绝了这种责难，同意让韦维尔担任东南亚战区司令官。韦维尔得在该战区据守一系列薄弱据点，顶住日军对那些目标的计划极为周密的进攻。

在整个战争期间，围绕指挥权问题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它引起的注意不亚于作战计划。自十九世纪创立参谋部以后，纸上布阵便具有重要意义了——幸而凯撒、成吉思汗和拿破仑不知道这一点。现在，专职参谋人员不再认为战争是名将帅才的事情，而把它看成是个如何"指挥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指挥者们都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一心想使每个战区都有统一的指挥，以致把战场上发生的情况几乎放到了第二位。

韦维尔赴重庆同蒋介石会晤，他虽然不欢迎中国军队参加保卫缅甸，但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在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蒋介石问英国驻华武官丹尼斯将军需要多少中国军队。丹尼斯说要一个团，可能以后又说要一个师。显而易见，他没怎么重视蒋介石的表示。委员长却回答说，他打算派遣两个军①，再外加八万部队，条件是双方制订一项全面的联合战略计划。丹尼斯没有再继续深谈这件事（大概提出了某种借口），因为

① 中国的一个军相当于美国一个陆军军，但人数不及美国多。中国一个军由三个师组成，每个师名义上有九千人，但实际上平均只有六、七千人。

蒋介石几周前还显然是认为这些部队无力保卫昆明。

当韦维尔到达重庆的时候，缅甸危机更加明显了。英国的地位突然显得虚弱是符合这个帝国的本质的，因为它在这之前所需要的最多不过是显示一下力量以便统治罢了。派一艘炮艇四处游弋；士兵在街道上操练，做漂亮的举枪放枪动作；身穿猩红军服的士兵举行阅兵；让蓄着大胡子的锡克人充当警察等等，这些就足以统治亚洲而不至引起严重挑战了。地道的自满情绪——在欧洲危急后有所收敛——是对付不了日军可能要发动的进攻的。尽管如此，英国还是不想看到中国军队开进缅甸。中国隐晦地宣称自己对缅甸拥有主权，而且从来没有放弃过这种要求。中国军队一旦越过边界，他们不但会同对中国人完全没有好感的缅甸人发生纠纷，而且可能会赖着不走。韦维尔期望印度派遣增援部队，他自然认为，“大英帝国的一个属国与其让外国来保卫，不如让帝国部队保卫”。此外，有人劝他说，缅甸无法为开去的大批中国军队提供粮食和交通工具。因此，他只接受了中国一师部队，条件是补给由中国自己提供①。他的美国伙伴乔治·布雷特将军同意他的观点。布雷特是位空军军官，是被派往中国考察建立重型轰炸机基地的可能性的，他对他所目睹的中国军队的表现颇感吃惊。马格鲁德将军在写给华盛顿的谨慎地留有余地的报告中说，韦维尔的拒绝使委员长“有点感到不悦”。实际上委员长是怒不可遏。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干下了许多侮辱人的事情，现在又多了一件。

除此之外，中英两国围绕着堆积在仰光的租借武器的使

① 韦维尔后来宣称接受了两个师，但是与会者了解的情况并非如此。

用问题也发生了争执。码头上物资堆积如山，仓库里堆满弹药，数百辆卡车死气沉沉地排列着。同时，预计日军要轰炸码头，搬运工全部逃散了。中国运送这些积压物资的能力有限。按理说，马上把这些物资用于保卫仰光对盟军的战略目标最有利，这既对盟国有利，对中国也同样至关重要。但是，要让以俞飞鹏将军为首的中国驻缅甸的管理物资的军官们把这么大一批物资(以及可能有的好处)统统交给英国人，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中国无论如何不相信英国能守住仰光。中国想得到物资，但又无力使用，这使西方人非常恼火。随着时间的迫近，英国越来越紧张，总督暗示可以没收物资，结果，一百五十辆卡车和一船弹药被没收，其余物资被美国管理租借物资的军官扣留，以待决定归属。当这场争执传到重庆时，委员长机敏地深思熟虑后对韦维尔的藐视进行了报复，表示愿意提供二十挺机枪保卫缅甸。他后来又拒绝召见英国大使，并扬言要停止中英两国间的一切合作。

韦维尔制造的这一事件严重地影响了阿卡迪亚会议，使美英对华政策的分歧突出起来了。正在为生存而斗争的英国实际上并不想为中国操心。中国对美国来说则是无法摆脱的负担，山东问题、没有履行的九国保证、史汀生主义不起作用、向日本出售废钢铁、"特殊的"中美关系、归还庚子赔款以及战后应有个强大的中国的主张等等，都是这种负担的组成部份，这里既包含着感到内疚和想履行监护人职责的成份 也包含着错觉成份。蒋介石可能是故意发脾气的举动，立即又促使美国担心他可能退出联盟。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害怕中国同日本单独媾和，这种担心带有不符合实际的成份，因为中国一心

想跻身于胜利者一方，而且它从日本那里也得不到任何好处。但是，由于蒋介石老是叫喊中国即将崩溃，由于美国害怕中国的崩溃会使日本军队全部从中国摆脱出来，所以，这种担心仍然一直存在。

日军的节节胜利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担心。马歇尔将军在写给韦维尔的一封忧心忡忡的信中指出，日本正在发动一场大规模宣传攻势，想利用西方因香港和马尼拉陷落而丧失威信的机会搞垮中国的抗战。他认为有必要促使中国加强对"英美在远东的共同目标的信任和信心"。除了打垮日本外，他可能很难说出还有什么别的共同目标。

盟国之所以没有制订出一致的抵抗计划，之所以在早些时候在新加坡召开的参谋长会议中没有就如何使用现有兵力和首先保卫什么地方的问题作出决定，主要是因为各国的利益不一致。在重庆会议上，各方一致认为"首要的"任务是保卫仰光和缅甸，因为"这对中国能否继续坚持抗战是至关重要的"。但是，马歇尔所希望的那种信任和信心却几乎同时开始削弱了。高思报告说，盟国的变化使中国人感到"非常震惊"，公开宣传首先打败希特勒的方针使他们感到"愤慨"。史汀生部长对这种趋势尤其感到担心。他认为韦维尔"相当独断专行和笨拙，只会按英国对待中国的老一套办法行事"。史汀生比任何人都更强烈地认为美国有义务对中国履行监护人职责。他愿意在远东尽到比"欧洲第一"战略所允许的更大的努力，因为他认为必须防止日本巩固其控制地位并使中国不致因失望而垮掉。

罗斯福也对韦维尔事件深感不安，他认为如果中国政府

放弃抗战，整个亚洲恐怕就会向日本屈服。扰乱委员长情绪——据认为它是华盛顿最灵敏的晴雨表——的任何事情都是危险的。罗斯福对他的儿子埃利奥特说："你想想看，如果中国屈服，会有多少日本军队脱身出来？那些部队会干什么呢？会占领澳大利亚，占领印度，会象摘熟梅子一样轻而易举地占领那些地方。然后长驱直入，直捣中东……那将是日本和纳粹的大规模钳形攻势，在近东某处会合，完全切断俄国同外界的联系，瓜分埃及，切断经过地中海的所有交通线，难道不会这样吗？"他在阿卡迪亚会议期间对丘吉尔说，让委员长的心情重新愉快起来尤其重要。他要丘吉尔命令韦维尔设法抚慰委员长。

为了让蒋介石具有正式地位，盟国单独辟出中国战区，请他担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司令。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不打算派盟军到中国作战，这等于是告诉蒋介石他指挥的范围仅限于他本国的军队。这项决定可能会使蒋介石感到高兴，但是，事实已清楚地表明，出于保密考虑，没有请中国参加联合参谋长会议。作为补偿，罗斯福更加切望在重庆设立某种盟军军事委员会了。

罗斯福的主要想法是，中国战后应成为一个大国，以填补日本留下的真空。他并不是不知道中国的缺陷，因为他曾向他的儿子承认中国"仍处在十八世纪"。尽管如此，这个拥有五亿吃苦耐劳的人民的古老大国是个地理政治事实，虽然它因长期治理失当而蒙受了挫折。罗斯福希望中国将来站到美国一边。在阿卡迪亚会议期间，丘吉尔对罗斯福说，他认为美国舆论对中国能对这场战争作出的贡献估计过高了，罗斯福

“强烈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罗斯福反问道：如果“人口众多的中国走上日本近一个世纪来所走的道路，而且握有现代化武器，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丘吉尔回答说，他讲的是目前这场“已经拖得够长的”战争。丘吉尔着眼当前情况的毫不妥协的态度碰上了罗斯福着眼于未来的考虑，两人是针锋相对的。

罗斯福认为，如果中国将来起大国作用，就必须以大国待之。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不久，他在同《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不能在说到蒋介石时把他称为“野蛮的头子”。接着，他提出一个表明内心想法的问题：他问斯诺中国人是不是“喜欢我们”，“他们是不是认为我们是好人？”他接着谈起他的家族同中国的关系，谈起他 1933 年想废除治外法权，虽然得到赫尔的赞同，但却遭到国务院的顾问们（罗斯福不喜欢也不信任这类人）的反对。尽管德拉诺家族的钱是从中国赚来的，但是，罗斯福却不赞成外国向中国渗透。他在 1934 年写的一封信中表示相信，加速中国的危机，“迫使中国人日益自力更生”比把这种不健全的状况继续保持二、三十年更好。这是罗斯福拟就的最明智、最稳妥的政策讲话之一，但从来没被采纳。

在中国问题上，除了受到祖父德拉诺和快帆船贸易的影响外，总统的想法的整个演变过程是隐秘的。据总统的亲密助手之一罗森曼法官说：“在白宫，罗斯福的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几乎是跟原子弹一样大的秘密。”战争结束后，有几位陆军历史学家曾问马歇尔将军：“总统的对华政策是什么？他是否向您阐述过？”马歇尔只能回答说是“对中国以大国相待”。

马歇尔这样回答并不仅仅是想用个口号对付过去。这种政策虽然是虚假的，但它确实是出自真实的信念。罗斯福认为，殖民帝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为了本身的安全，西方世界必须抛弃那种把亚洲人视为劣等民族的做法。他对前国务卿韦尔斯说，平等地对待中国是防止"东西方今后发生根本裂隙"的最好办法。

丘吉尔在这个问题上同罗斯福意见不一致。用丘吉尔自己的话说，他出任首相并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丧礼。英国在远东参战的目的是维持原状，而这不是罗斯福的目标。罗斯福认为大英帝国已经完蛋了。从长远来说，印度支那、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争取独立的浪潮会把白种民族赶走。在丘吉尔访问华盛顿期间，他也就印度发表了类似看法，结果第一次引起严重分歧。丘吉尔写道："我强烈表示反对，并详细地阐明了自己的看法，结果他再也没提这一点。"

由于最终目标不一致，战略势必受到影响。美国注意的中心是中国，英国注意的中心是新加坡，从根本上说则是印度。位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缅甸从两个不同角度看都具有战略意义。双方的这一分歧后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同总统一样，美国总参谋部也认为需要支持中国，因而认为守住缅甸则至关重要。英国人认为支持中国徒劳无益，认为美国这样做是不可思议的反常行动。但是，双方达成一项联合战略仍然是十分必要的。丘吉尔同意罗斯福承担"在各种情况下同中国交往"的主要责任。在美方的坚决要求下，为了强调同中国的战略关系，缅甸被从印度统辖区划出来，划归韦维尔指挥的东南亚战区管辖。英国参谋部极为不满，因

为这样做打乱了正常的后勤渠道。伦敦的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将军怒气冲冲地说："这整个方案是轻率的、缺乏见识的。"

丘吉尔写信给韦维尔，向他说明了作出这项安排的原因。他在信中说："我必须使你明白美国的看法。在许多美国人的心目中，中国同大英帝国一样重要。"美国的参谋长们之所以要把缅甸划入韦维尔的辖区，唯一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同中国保持联系和使滇缅公路畅通是"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千万不要忘记亚洲大团结的阴影正越来越大"。丘吉尔最后说："如果我可以用一个词概括我这次在美国所学到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中国'一词。"

1942年1月1日，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乔治派人来叫我——我去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谈的全是在东方遇到的麻烦。"马歇尔介绍了英中争吵的情况，说他想物色一名美国高级军官，把他派到重庆去，以保持美中间的和睦关系。讨论的人选是陆军高级军官、第一集团军现任司令休·德鲁姆将军。大概是史迪威推荐的。马歇尔以前可能曾经要史迪威推荐一个人，因为史迪威同多恩谈过这件事，多恩推荐了德鲁姆。多恩说："委员长是个自命不凡的人，我们把我们这里最自命不凡的人派给他吧！"

德鲁姆是个自命不凡、狂妄自大的人。他担任过美国驻欧洲的第一集团军参谋长，后调任潘兴的参谋长。战争爆发时，他期望让他指挥美国下一支远征军。在上次夏季军事演习期间，德鲁姆的神气活现的举动和某些刻薄的讲话使马

歇尔非常生气。马歇尔自己物色了担任实际指挥职务的对象，他表示欢迎以某种办法安排德鲁姆担任他所要求的高级职务。派德鲁姆这样级别的军官到中国去会成为对中国的一种恭维，尽管他从没到过中国。已经在中国担任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的马格鲁德将军不具备足够的威望，此外，他对中国人已经感到厌烦和失望。唯一可选择的对象显然是史迪威。“我？不行，谢谢你。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不过是个不被他们放在眼里的小小的上校。他们见过我赤着脚在泥里走路，见过我同苦力在一起，见过我乘坐士兵的火车。德鲁姆会长篇大论地讲话，然后要经过译员翻译，这样他就有时间考虑，慢慢作出决定，就能保持住自己的尊严。无论如何还是应该派德鲁姆去。”

这时，“体育家”行动计划越来越混乱，人们对自己的力量产生了担心，对西班牙、对空中掩护、潜艇、船运以及跑到“耗子洞”去是否可取产生了疑问，因为那个“耗子洞有武力防范，去了肯定会遭到惩罚，而且很难提供补给”。史迪威得知，选上他是因为他“具有主动精神、思想敏捷和意志坚强”，而且得知美国的第一场进攻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很对。但是，谁愿成为见证人呢？”史迪威写道，在同马歇尔及其他人长时间开会讨论后，“大家都反对……大家一致认为物力不足，运输无保障，会出现很多复杂情况，一些重要情况还没有摸清楚，后果可能是严重的”。尽管如此，计划工作还在继续进行，因为，正如史迪威所认为的那样，“英国佬希望我们投入战斗”，他们“完全迷惑了”罗斯福。罗斯福“双手发痒，很想干一干……‘嗨，废话，我们可以干。’我们的人对船只不能更迅速

地卸货感到非常奇怪。他说，'对于着急办事的人来说，两周似乎很长。'"史迪威认为罗斯福"在所有军事问题上都是个十足的业余爱好者"，"富有好奇心，喜欢幻想，常常突然产生一些幼稚的想法"。并认为罗斯福"被英国人欺骗了"。此外，"他爱海军若掌上明珠，而视陆军如后娘生的"。

到1月10日，对"体育家"行动计划"争论得越来越激烈……大家都认定这是一场愚蠢的冒险……整个该死的计划荒唐透顶。我们应该扫除太平洋第一的思想，然后面对东方"。1月14日，即白白浪费了三周时间"制订一项我们可以证明行不通的计划"之后，双方在最后一次阿卡迪亚会议全体会议上作了最后一次说明。到这时，由于可能会在利比亚遭到挫折，英国人也冷下来了。双方一致同意取消"体育家"行动计划。

同一天晚上，史迪威应邀到陆军部长家作客。史迪威获悉——用史汀生的话说——"命运之手在指向你"，指出的方向是中国。在史迪威还在全神贯注地考虑"体育家"行动计划的时候，德鲁姆将军被召到华盛顿，他自认为这下成了个了不起的人物了，因而带去了四、五十名随行参谋人员。他得悉竟没有被任命接替潘兴，而是被派到中国去，而且没有拨任何军队给他指挥，目的和方针比使人烦恼的"体育家"行动计划还要混乱。

在有关方面同德鲁姆讨论的过程中，美国战时的对华政策开始显露出来。据史汀生对德鲁姆说，他到中国去的目的是使中国早日成为发动进攻的基地，保证最后中国或从中国大陆向日本发动有效的决定性反攻。其次是让中国继续打下去。

史汀生说中国目前在战争中的境况不佳，可能会单独媾和。他具体指出了三项主要任务："全面处理"租借物资；全面指挥美国驻华空军的行动；大概还要根据蒋介石的建议指挥中国部队。蒋介石已经表示愿意把"一、两个军交给"美方指挥。

马歇尔的侧重点跟史汀生不一样。除了使中国继续成为空军基地和加强美国志愿团之外，主要任务是"在中国武装和训练中国军队"，以便使他们能更有效地打击日军和牵制日军在太平洋的行动。陆军部认为，这正是租借法案的目的。马歇尔因亲身到中国去过，因而接受了史迪威对中国士兵潜力的看法。他知道中国士兵吃苦耐劳、敢于牺牲。他有一次到冯玉祥的辖区参观，冯玉祥部队的严明纪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相信，如果有胜任的指挥官，中国军队可以成为一支"打不败的"军队。他认为，中国军队下从连长起，各级指挥员都不能胜任，都需要撤换和重新接受训练。

这项使命并不合德鲁姆将军的心意。他认为这项使命"模糊不清"，同主要任务有相当大的距离，而且，由于马歇尔否认打算派遣美国地面部队到中国战区作战，他认为派象他这样级别和象他这样有作战经验的军官到中国去简直是一种浪费。在德鲁姆表示反对和进行抗辩的同时，蒋介石尽量摆出威严的架势，装模作样地接受了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头衔，并要求美国派一名高级军官担任他的参谋长。这位参谋长"不需要是远东问题专家。相反，如果他了解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军队的情况，就会用看待军阀军队的老眼光看待现在的军队，因而会不利于指挥作战"。这个有趣的条件大概是指马格鲁德将军而言的。

蒋介石的电报的含义是很明显的。他希望给他派一位顺从但在国内有很高地位和很大影响的人，不希望给他派一位卓有见识以致会对中国的要求提出批评的人，简单地说，就是想要象德鲁姆将军这样的人。但是，由于德鲁姆不喜欢这项使命，史汀生灰心了，最后将他排除。由于"体育家"行动计划推迟，命运之手象指南针一样指向了史迪威。史迪威想担任战地指挥官，马歇尔也想让他担任战地指挥官，因而千方百计地让他避免这一牺牲。"乔，我给你二十四小时考虑一个更好的人选，否则就是你啦。"史迪威马上就要得到指挥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第一场战斗的指挥权，这也是他一生中指挥第一场战斗的权力。不管什么行动计划取代"体育家"行动计划，他都完全可以指望让他指挥。他催促多恩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快点想想办法，否则我们就要被钩住了。"但是，他知道钩子已经下好了。

史汀生的十八世纪建造的宅邸方圆二十英亩，俯瞰罗克·克雷克公园。史迪威到那里后才知道自己是唯一的客人。他俩在书斋里坐在壁炉前谈了一个半小时。陆军部长问他对这项使命有什么感想。"我告诉他派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史汀生也写日记，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他(史迪威)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对中国有透彻地了解，他在一个半小时里向我介绍的关于中国军队英勇作战的第一手情况比我以往了解的全部情况还要丰富。他对中国军队作战英勇评价极高。"史迪威对他说，这项使命的成败完全取决于蒋介石是否愿意把部分军队交给美方指挥。蒋介石到目前为止一直拒绝这样做。陆军部长让他放心，说蒋介石本人已作过表示，宋子

文也表示答应。史迪威表示怀疑，但是，正如史汀生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史迪威说，如果能指挥部分中国军队，那么，这项使命成功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他对这项使命非常热心”。史汀生本人无疑也很热心，因为他认为，执行这项使命就是“实践了我多年来信奉的政策和原则”。他寻找的正是热情，史迪威对中国的感情鼓舞了他。他在上床睡觉时觉得“我发现了一位非常有助于我们解决今后问题的人物”。从那天起一直到最后，他始终是史迪威最热情、最坚决的支持者。

两天后，史迪威又同马歇尔长谈过一次话，讨论了这项使命。他得知史汀生一开始并不想考虑他，因为在讨论“体育家”行动计划的一次会议上，他一直坐在那里低着脑袋一言不发。“乔治对他说，我正在准备冲锋。”马歇尔问史迪威是否认为到中国去任职确有把握取得显著成效。“是的，如果给我指挥权的话。”马歇尔问他认为如何安排为宜。“我回答说‘问问蒋介石是否愿意’。乔治说他把这个问题记下了。我也记下了。他要把这个问题转告宋子文。”马歇尔告诉史迪威要提升他为中将，但是情况进展很快，“等你到达那里的时候，你可能已成为驻澳大利亚军队的司令官了”。

从印度洋到西南太平洋一线，看来没有一处能硬顶住。日军现在已经在婆罗洲和西里伯斯登陆。在马来半岛，英军两个师守不住阵地，开始向保护着新加坡的海峡撤退。直布罗陀以东最大的海军基地看来可能守不住了，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该海军基地是马来亚屏障的环节之一，这条屏障从缅甸经过马来亚、苏门答腊和爪哇，一直延伸到澳大利亚，由陆地和若干岛屿组成，保卫着印度洋。1月15日，日军先头部队

从泰国越过山口打进马来亚屏障北端的缅甸南部。在帝王时代，那些山口只能走步兵和大象，人们原以为使用现代化运输工具和大炮的军队无法穿过。日军在缅甸反政府的民族主义分子的引导下，继续朝毛淡棉推进。

英国原先反对中国军队到缅甸，现在突然好象需要他们了。英国现在要中国军队接防缅甸东部边境上的掸邦，以便把缅甸第一师腾出来保卫仰光。英国是把仅有的增援部队派往缅甸，还是派往新加坡，丘吉尔得二者择一。他在阿卡迪亚会议结束后返回伦敦时对参谋长们发表了相当惊人的讲话，说“作为一个战略目标，我认为使滇缅公路畅通比守住新加坡更为重要”。如果滇缅公路失守，那将是“令人非常痛心的，将会切断我们同中国的联系”。同中国保持接触第一次似乎变得重要起来了。但是，增援部队最后还是派到新加坡去了，因为澳大利亚警告说放弃新加坡将是一种“不可宽恕的背叛行为”。澳大利亚已把它最精锐的几个师派到中东去为英国作战。

1月19日，史汀生同宋子文讨论了使委员长答应把“中国部分部队，特别是打算派到缅甸作战的部队”交给迄今尚未任命的一个美国人指挥的问题。蒋介石的答复虽然不明确，但语气是肯定的。他同意让美方“统管”派往缅甸的中国军队（宋子文在转述这个问题时用的就是“统管”一词），并具体要美国另派一名中将到中国，而不希望让马格鲁德担任。宋子文在去年12月23日已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在他认为适合打圆场时，他就为他的主子向美国人说点好话，反过来也是一

样。宋子文个性极强、野心勃勃、作风粗暴然而很有能力，他的思想和语言完全西方化了，但同时又具有中国人的那种狂妄自大的特点。他对自己所代表的现政权不怎么尊重，同领袖即他的妹夫缺乏互相信任，一直想取而代之。史汀生从宋子文嘴里得知"在缅甸问题上还有件事必须解决"，但是，宋子文对这句含义隐晦的话一直没有加以澄清。宋子文说，不需要再发电报了，因为只要他同意就足够了。他已经知道人选，并调查了史迪威过去的情况，对史迪威非常满意，而且知道蒋介石也同样会感到非常满意。他认为美国"挑选了陆军中最胜任这一职务的人"。后来，委员长发来电报表示同意任命史迪威，说"非常欢迎史迪威将军到中国任职"。

由于事情已经如此，马歇尔1月23日告诉史迪威说，看来只得让他担任那项职务了。他问道："你愿意去吗？"史迪威与回答史汀生的问题时说的一样："派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他没说二话，畅快地接受了任务，虽然他在日记中写道"打击终于来到了"，而且还提到自己被当作祭品牺牲掉了。他的参谋人员听到这个消息后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在陆军部里，有位同事说，马歇尔是想"以一种聪明的方式甩掉德鲁姆，但他这样做只不过是使自己失去了最优秀的军长"。

在后来的若干天里，史迪威一直研究有关中国的文件档案，组织参谋班子，准备提出需要的东西，同宋子文("不光明正大，而且很滑头")和中国国防物资公司的代表(一般都是空洞地谈论运输机、重炮和俯冲式轰炸机)进行详细交谈。他会晤了负责援华租借物资的官员劳克林·柯里，而且会晤了海军负责人。海军这时也要把曾长驻中国的经验丰富的米尔顿·

迈尔斯将军派往中国，给他的指示是“以你所能采取的任何办法在三、四年内使中国沿海宜于美国海军登陆”，同时“弄清楚中国的时局”。

在史迪威准备就任的时候，敌军向前推进了。就在他被任命担任该职的那一天，日军在俾斯麦群岛的拉包尔岛登陆，三天后又在不远的所罗门群岛登陆，这是他们旨在切断美国同澳大利亚之间的联系的第一步。在缅甸，日军步步逼近毛淡棉。用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的话说，日军“不是沿公路直下”，而是分成小股部队，从丛林穿过。在缅甸同在马来亚一样，他们的机动能力和进展速度是惊人的。他们轻装前进，用自行车或牲口作运输工具，自己携带小口径武器使用的弹药，这样就不一定非走公路不可。他们脚穿帆布胶底轻便鞋，身穿短裤和运动衫，他们受过训练，可以靠背包里够吃四天的有限食品充饥。英军虽然利用当地的部队，但是，他们调动时靠卡车，使用的是全副重型武器装备，吃的是罐头食品，头戴钢盔，身背防毒面具，脚上穿着沉重的皮靴，因而就象布雷多克率领的英国兵在北美的森林里那样，行动非常不便。

马歇尔并不让人感到鼓舞，他认为英军未必能守住新加坡或仰光，承认这项中国使命是桩赌博，再次警告说最后可能要把史迪威调往澳大利亚任职。史迪威几乎同马歇尔一样不感到乐观。“中国愿意干吗？还是袖手旁观，让我们干呢？英国佬会合作吗？我们到达时仰光会不会已经丢了呢？”

史迪威给马歇尔写了一项关于战略问题的备忘录，认为太平洋西南区域是防御区，美国至少应在中国投入一个军的兵力，在那里创建“最大进攻力量”，以把战争打到日本本土

去。他最后接到的命令中没包括这种设想。那项命令第一次给他冠以中将头衔("这一点也没让人感到激动"),任命他担任中缅印战区美军① 司令官、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参谋长、援华租借物资督导人和任何联合军事委员会的美方代表。他的职能和任务是保障滇缅公路畅通,"指挥分派给他的中国军队","帮助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和"提高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援助的效用,以把战争打下去"。这段话是为了具体说明援助的目的而仔细推敲后酌定的。史迪威极力想减少任务,但结果发现自己共担任了八项职务和工作。

可以预见,仰光有可能失守。作为对策,两项规模十分宏大的任务,即开辟喜马拉雅山航线和修筑利多公路的计划已经确定。1 月 30 日,日军攻占毛淡棉,仰光面临的威胁更大了。中国人失去了对西方力量的信任,他们预计仰光这个港口城市有可能失守,从而会使中国再次与世隔绝,除非另开辟一条补给线。罗斯福也同样焦虑不安。1 月 30 日,他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开辟一条空中运输线和另辟一条陆上补给线的可能性。据史汀生日记中记载,"他说(那条陆上交通线)位于滇缅公路以北,穿过一座海拔不超过六千英尺的山口。"应总统的要求,艾夫里尔·哈里曼找宋子文商谈了这件事,宋子文拿出了一张地图,上面用红颜色标出了一条交通线,那条线路从波斯湾起,由铁路通往里海,然后乘船到俄国的土耳其斯坦,再经铁路通往中国边界,最后通过约两千英里的汽车公路到达重庆,全程共长五千英里。

宋子文认为如果开辟航空线会更起作用。他这样认为是

① 当时只有参谋人员、技术人员和空军。

可以理解的。他1月31日写给罗斯福的信对人们的议论置之不理，说“真奇妙”，有一条航线“十分方便”。那条航线是从印度东北阿萨姆邦地势最高的萨地亚到中国昆明，全程仅有七百英里，“整个航程的高度变化不大”。他没有提到这两个地点之间高耸着喜马拉雅山，他提出的这条航线大概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航线。他估计一百架DC-3型运输机一个月可以把一万二千吨物资运到中国。物资的登陆口岸将定在加尔各答，然后经铁路北运阿萨姆邦。哈里曼在说明书中表示赞成宋子文的建议，但他也持谨慎态度，特地提到了喜马拉雅山。总统确信任何纯后勤问题都能迅速“解决”，因而在要求提出后的九天内就信心十足地向蒋介石“明确保证……经印度通往中国的补给线可以采取空运的办法保持畅通”。为了开辟这条飞越世界屋脊的空中运输线，必须要有飞机场、飞机、地勤人员、燃料和服务设施。这项任务在史迪威离开美国之前也划给他了。他认为这很必要。“局势在逼着一切有关的人士认识到缅甸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必须立即让航线通航，还必须开辟一条边远公路。”

开辟这条从印度通往中国的“边远公路”的建议最先是中方1942年1月1日提出的，美国在那两周之后才考虑让史迪威到中国任职，三周后才正式任命他。但是，那条公路后来却同史迪威结下了不解之缘——有的人把它称为“史迪威公路”以纪念他，另外一些人则用它来责备他干了蠢事。那时，甚至早在日军打进缅甸境内之前，中国就预计到下缅地区有可能丢失，因而要求用租借物资修筑一条公路，从印度阿萨姆邦的利多起，穿过缅甸北部的崇山峻岭、森林、河流，同中国境内的

滇缅公路城镇龙陵连接起来。它要经过一条车辆从未走过的路线，是一项甚至比开辟空中航线还要艰难得多的工程。委员长说可以在五个月内筑成，但是，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的军官们经过一个月的勘查后估计要两年半的时间才行。作战计划处把它列为"紧急军事需要"。因此，在史迪威到达中国或缅甸之前，这条公路已经得到愿意向中国提供援助的所有人的赞同，其中包括陆军部和总统、宋子文和中国国防物资公司以及主管租借物资的劳克林·柯里，自然还包括委员长。委员长2月份要到印度访问，答应亲自争取印度政府的同意。

史迪威启程前回卡梅尔同家人团聚了四天，他没有因丢掉作战指挥官职务而表示失望。看来，他对能有机会同日军作战和帮助那个他知道正处在他可以理解的境地中的国家感到高兴。这项使命现在合乎他自己的愿望：使中国军队能卓有成效地作战。除了随史迪威一道乘飞机到中国的三十五名军官和五名士兵之外，陆军部还派四百名技术人员和教官乘船前往中国，以帮助训练中国军队使用美国装备和掌握美国战术。

史迪威的参谋班子由"中国帮"和第三军的军官组成。多恩上校继续担任史迪威的副官，他曾在中国呆过，是史迪威的主要助手。军事情报处中国站站长弗兰克·罗伯茨上校又以参谋部军事情报部代表身份同史迪威一道工作了。他过去担任过语言教官，在"帕奈号"事件发生时他在船上，史迪威曾为他的命运十分焦虑。另外两位当过语言教官的军官威拉德·怀曼上校和海登·博特纳上校也被调来了。他俩也曾在第十五步兵团服过役。被调来的还有一名年轻的副官迪克·杨上

尉，他是在夏威夷出生的华人。马克斯韦尔·泰勒极想让自己掌握的日本知识有用武之地，因而渴望到中国去，史迪威也极想要他。但是，泰勒后来发现自己的名字被马歇尔从名单中勾掉了。马歇尔想派他到欧洲去。史迪威借调戴维斯担任政治军官。史迪威是1938年在汉口的大使馆里认识戴维斯的。戴维斯出生在四川省，父母都是传教士，他知识渊博，目光敏锐，会讲汉语，写的报告很能启发人。蒋介石遇到的将不是一伙和蔼无知的人。参谋班子中的其他人主要是从驻扎在奥德堡的第三军抽调的。第三军由主要步兵军官富兰克林·赛伯特准将指挥，由绰号叫"大个子汤姆"的赫恩担任参谋长。赫恩是个迟钝的高个子南方人，他很稳重但没有什么灵感。

史迪威在离开美国的前一天，同两个人发生了冲突，而这两个人后来又都对这项使命具有决定性影响。第一个是卓越的战士、中国战区的鼓动者、千里之外的陈纳德。马歇尔在同蒋介石就把美国志愿团并入美国陆军问题举行谈判时，曾向蒋介石保证让陈纳德担任驻中国的高级空军指挥官。但是，在制订中缅印战区的空军战略计划时，由于指挥结构的需要，陈纳德率领的驱逐机队得并入计划成立的以中国为基地的空军部队。宋子文同意这一更改，但是，正象他过去处理可能会引起麻烦的问题一样，他没把这件事告知蒋介石。陈纳德现在强烈表示反对，理由是违背了诺言，虽然他真正的原因是不愿在指定担任他上级的克莱顿·比斯尔上校手下任职，因为他同比斯尔结有宿怨。所有的人都加入了这场争执：史汀生"相当关注"，请来了史迪威；柯里代表陈纳德参加争吵；空军首脑哈普·阿诺德将军"大发雷霆"，他跟循规蹈矩的军官们

一样不喜欢陈纳德，说陈纳德是害群之马。阿诺德将军虽然有“笑哈哈”的浑号，以逗笑和宽厚闻名，但也会发脾气，有时甚至暴跳如雷。作为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史迪威坚持让比斯尔当陈纳德的上司。阿诺德也颁布了这样的命令。由于这一插曲，史迪威对陈纳德的纪律性的评价“大大降低了”。

第二场冲突是同罗斯福发生的。史迪威在向陆军部长辞行时提出，为了提高他在委员长眼里的威望，是否可以携带总统的一封亲笔信给蒋介石。史汀生为他安排了同总统的会晤，并向总统说明了会见的目的。2月9日中午，史迪威前往白宫，这是他第一次同总司令谈话。会见持续了二十分钟，气氛并不象跟史汀生坐在壁炉边平静地谈话那样融洽。考虑到史迪威的先入之见和罗斯福一个人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的习惯，会见不大可能非常融洽。史迪威在国内是个平凡的共和派。共和党人有一致的感情，都很憎恨罗斯福。史迪威在这一方面是受了他的哥哥约翰的影响，约翰是极端派。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如果史迪威在用烟嘴抽烟时烟嘴“翘起的角度跟罗斯福一样”，那肯定是偶然的巧合。但是，由于他俩都对中国抱有希望，如果一方能给另一方机会的话，他们本是会取得一致看法的。总统本来可以了解到更多有关中国的真实情况，史迪威本来也可以了解到一些总统的真正意图。

罗斯福有个痼癖，就是跟别人谈起话来总喜欢自己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不给对方说话的机会。因此，他的一些老朋友想出了一些向他陈述意见的特殊办法，譬如说趁他吃饭的时候找他谈话，因为那时他嘴里嚼着东西，无法多说话，或者给他严格规定五分钟时间，一到时间就坚决打断他的

话。据了解，史汀生跟他在电话中交谈时会把电话挂上，不听他多说。罗斯福脾气好、富于直觉力、敢于试验、长于谋算、多变、狡猾和愿意作出让步，他的思想跳跃得很快，没有明显的连贯性。他通常是同时有几个思路，他的动机常常是混杂的。用他女儿的话说，他的连贯性是"他对未来的意识"。一位英国观察家说："他对民主政体的前程充满坚定信心。"他突出的性格是充满信心，有些人倒认为他过份自信，这也许是因为他本人战胜瘫痪的原因，他可能因此认为天下没有任何问题解决不了。

罗斯福的讲话让人听起来常常觉得不很稳重，虽然实际上还不到那个地步。此外，由于他讲起话来喋喋不休，人们很难弄清他的思想，就象史迪威常常一言不发使人很难弄清他的思想一样。尽管罗斯福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祖先如何同中国做生意，他还是设法谈到了西方国家元首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必须了解的最重要的事情，这就是如他 1935 年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中国存在着你我都不理解的力量，但是，我至少知道那些力量是我们西方人所无法理解的。你千万别由于那些所谓的事实和数字而相信西方文明的任何行动能非常深刻地影响中华民族。"

史迪威发现罗斯福"热诚、愉快，但有点浅薄。给人印象不深刻。他的举止就好象我是个求见国会议员的选民似的。他东扯西拉地谈了他对战争的看法——'我的看法是有一条两万九千英里的战线'，等等，等等。他讲了许多空话"。总统尤其谈到，他估计战争到 1943 年能够结束；"今后一年内"会出现转折；将派两千架飞机到澳大利亚；蒋介石将不会再以为希特

勒是我们唯一的敌人;所有敌人都不相上下;所有盟国同舟共济;以及他不希望蒋介石夫人来美国访问等等。“在我听够了之后,我打断他,问他是否有口信带给蒋介石。他显然没有。他又讲了五分钟,想找惊天动地的事谈谈。他终于找到了:‘告诉他,我们一定继续干下去,我们打算坚持干到底,直到中国收复它所有的失地’。”

这个非凡的目的事实上成了美国的政策,虽然这个目标也许不应象史迪威认为的那样随便脱口而出。一年后在卡萨布兰卡无条件投降时,罗斯福几次宣布了一些似乎是临时作出的特别决定,这些决定反映出了他的基本信念(如果说不是事先磋商好的话)。虽然官方从来没有宣布,但是,罗斯福同史迪威说的这番话是一种政策变化,在史迪威正式向蒋介石转述后,这番话便成了美国承担的义务。一个国家通常是不允诺为另一国家——即便是盟国——夺回失地的。后来,罗斯福1944年说:“我不希望美国战后担负帮助法国、意大利和巴尔干国家复兴的重担。”但是,他不知怎地却感到对中国负有义务。

在公众的心目里,中国是个最为人喜爱的盟国。罗斯福1月6日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列举了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携手作战的盟国,当他说到“英勇的中国人民”时,会场上响起了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暴风雨般的掌声。总统接着说:“那几亿人民四年半以来,冒着枪林弹雨,忍受着饥饿,一再打击侵略者,尽管日军的装备和武器都占优势。”他把中国人民的持久勇气同“打击”日军的神话联系在一起,重庆发的战报千方百计地详尽充实了这种神话。例如,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宣

布要派两个军打击进攻香港的日军的后方。虽然中国根本没有调动军队，但中国12月15日发表的公报却声称两个军同敌军交战，打死打伤敌军一万五千人。蒋介石1月份又本着这种说谎精神通知美国政府，他打算发动一场攻势，把日军赶出印度支那。

马格鲁德将军这时才在写给陆军部的报告中说，中国人是“世界上迷信虚假的人”。他们闭眼不看不愉快的现实，喜欢“讨人喜欢的但虚假的象征，认为它们比冷酷的事实更加实在”。他引证了一些战报。由于记者们或者是出于善意或者是由于懒惰，未加分析地报道了这些神话，结果宣传了中国的“胜仗”，使人们产生了错觉。

还有其他一些虚假现象。由于中国是美国的盟国，美国只能承认它是个民主国家，不可能认为蒋介石的政府象后来担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历史学家惠德尼·格里斯沃尔德1938年所说的那样是个“法西斯独裁政权”，纵使它是个懒散而无能的法西斯政权。新闻记者们，即使离开了中国从而不受新闻检查的限制，也不愿报道国民党的劣迹，他们的道理是，如果他们那样做，会有助于日本，而且他们肯定再也不能到中国去了。他们出于对中国的友谊，夸大了中国抗战的战绩。正如一位记者所写的那样，长期以来，凡是“希望中国交好运的”新闻工作者到重庆去后，“对蒋夫人的美貌、委员长的英勇果断、中国军队的武功和全体人民的崇高精神无不钦佩神往”。

中国于1月间要求美国不附任何条件地提供五亿美元贷款，高思大使提出了虽不令人愉快但颇有见识的看法。他告诫不要提供不附条件的贷款，因为那样的话，贷款会被中国统

治集团中的那帮"蜕化堕落、利己主义以及我认为朝三暮四的人"胡乱用掉。重庆宣称，为了支持中国政府打击失败主义势力，美国必需提供这笔贷款。俄国大使利特维诺夫私下对摩根索部长说，"这完全是讹诈。"但是，陆军部和国务院认为，为了鼓励蒋介石政权和让中国继续打下去，美国必需提供贷款。这是一种政治和军事赌注，而不是经济赌注。摩根索对提供贷款而不附带保障和管束条件极为不悦，他建议按月用特殊货币直接提供给中国军队，"这样，士兵们打仗就能得到饷银，不打仗就得不到"。在这项建议遭到中国的坚决拒绝之后，摩根索继续为美国争取某种形式的管束和监督权，至少想争取到使用资金的磋商权。委员长拒绝了他提出的所有建议，对华盛顿说，应该把这笔贷款视为向一个正在同共同敌人作战的盟国提供的贷款，"因而，对贷款的使用和偿还办法，不需要规定任何保障条件，也无需事先规定其他任何条件"。

美国对这种异常的主张之所以忍气吞声，是因为它提供贷款的真正目的是取悦于蒋介石和让他继续关注盟国的事业。正如摩根索本人所说，美国提供贷款，是因为它一直忧心忡忡，担心如不大量提供援助，中国就会靠拢日本和其他"黄种民族"。参众两院的一些委员会要摩根索为提供这笔没有担保的贷款进行答辩，摩根索承认提供这笔贷款不是银行生意，美国很有可能索不回这笔钱。有位质询者责难说，提供这笔贷款是为了说明美国提供的钱比日本多，从而向蒋介石证明他怎样做对自己有好处。摩根索没有否认这种看法。

史汀生部长把提供这笔贷款说成是加强中国军事努力的手段。他2月3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为这笔贷款作证时引

述了史迪威跟他讲的有关中国士兵潜力的情况。据一位听证人说，史汀生的那次发言是一个听证者听到过的“最雄辩、最动人和最令人信服的”讲话。史汀生向外交委员会的成员们说明了中国的战略地位、“同我国的独特关系以及对我国政府的独特态度和信任”，说明了日本如何在千方百计地搞垮蒋介石，而“中国的国防又如何仰赖于蒋介石的声望和影响”，并告诉他们蒋介石已答应让一名美国人担任他的参谋长，还说史迪威相信自己能够动员起一支战斗力。史汀生说，提供这笔贷款是个“在远东下最大赌注进行赌博的机会……如果美国不抓住这个机会，它就打不赢这场战争”。史汀生的证词深深地打动了外交委员会成员，他们没有提一个问题。次日，众议院没进行辩论就以唱票的方式批准了这笔贷款。参议院在史汀生在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的当天也全体一致批准了这笔贷款。国会没有附加任何条件。国务院有些敬畏地说，美国提供这么大一笔贷款，而“不要任何担保和利息，也不对其使用保留管束权”，这还是第一次。罗斯福在通知蒋介石时说，这证明“我国政府和人民是从内心里热忱尊敬和钦佩中国的”。

同在这前后提供的其他贷款一样，美国之所以答应提供这笔贷款，是因为不管蒋介石有什么样的缺点，都必需让他继续执政，以便维持中国的抗日阵线。美国担心，如果蒋介石垮台，抗战就会崩溃，继而会爆发内部纷争。关于这一点，不管是蒋介石的支持者还是诋毁者，大家的看法几乎完全一致。马格鲁德就是基于这种考虑为租借法案辩护的。就在陆军部长在国会发表雄辩讲话的那一天，马格鲁德在电报中说：中国无

意发动任何攻势，它“永远不会成为巨大军事财富，但是，如果中国崩溃，如果我们不能再利用中国领土，那将是一种不利因素”。

史迪威既不象摩根索那样冷静而注重实效，也不象罗斯福那样乐观；既不象卡尔森那样富于浪漫色彩，也不象史汀生那样富于幻想。他了解中国的实情，愿意再次到中国去。

史迪威最后会见的人物之一是哈里·霍普金斯。他在会见总统后在白宫见了霍普金斯。从他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他对霍普金斯的看法的变化。他在袖珍日记本上写道，霍普金斯是个“古怪的侏儒”。后来，他在作详细笔记时写道，霍普金斯是个“古怪的侏儒般的家伙（患有胃溃疡）……他穿一件红色旧运动衫和一双从十字路口杂货铺买来的鞋子，没有系吊袜带，头发长得好象八周没有理发一样”。次日，在他写给温妮的信中，霍普金斯又变成了一个“非常快活的老农”。

霍普金斯非常愿意帮助探究全球性问题和新近显露出来的中国问题，虽然他没有说得非常明确。他说：“我相信，你将来会指挥军队。”他补充说，如果蒋介石把“所有中国军队”统统交给史迪威指挥，他不会感到吃惊。他把蒋介石的“蒋”念得很重。他说，罗斯福“非常关心”，必要时准备从航空公司抽调一百架客机。霍普金斯为了对史迪威表示热心，建议把“诺曼底号”巨轮作为中缅印战区的运输船。史迪威写道：“大家伙！”但他担心航运会遇到大问题。就在他离开白宫后不久，传来消息说“诺曼底号”在纽约造船厂起火了。它成了破坏活动的牺牲品。这太凑巧了，象是个兆头。史迪威惊叹道：“这

难道是天命吗？”

等待史迪威的是个日益崩溃的局面。就在2月9日那一天，日军在毛淡棉短期停留、集结两个师共一万八千部队之后，渡过了萨尔温江。他们现在距离保护仰光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锡当江约只有一百英里了。英军在下缅驻有由两旅印军和缅军组成的一个师，那两个旅都遭到进攻毛淡棉的日军的沉重打击。由那两个旅共七千人组成的第十七师以及从印度新增调来的另一个旅，放弃了萨尔温江防线，撤到锡当江前面的阵地。他们撤过萨尔温江后本来是有可能打一场阻击战的，但是，这支力量悬殊而且又背水的部队所处的是一种典型的不宜作战的境地。

他们的后面是平川，行五十英里便是仰光。虽然从印度又调来一旅印度增援部队，但仰光仍人心惶惶，居民纷纷外逃，几乎变成了一座空城。仰光有一半是印度人，他们担任低级公务员或经商，是城市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纷纷离开仰光，不顾一切地长途跋涉，逃往自己的国家，虽然没有足够的食品和交通工具。在缅甸总共有一百万印度人，由于缅甸人几乎全是农民，英国让印度人到缅甸来在英国人手下听差，因而缅甸人憎恨它们。商店和公共服务场所关闭，食品匮乏，政府机关撤到上缅的避暑首府眉苗，据报道难民中霍乱流行。由于行政当局已经解体，缅甸各集团爆发冲突，情况错综复杂，有的反对印度人，有的反对英国人，有的则互相倾轧。

英国急切地等待中国两个军的到来，但它们到现在还没有开始调动。2月2日，英军司令、中将托马斯·赫顿爵士飞往腊戍，同赴印途中经过那里的蒋介石会晤，敦促他加快派遣

军队。委员长答应满足他的要求。2月5日，韦维尔从爪哇总部乘飞机飞越两千英里来仰光视察，看看可以采取什么措施保住这又一个快要失陷的据点。从中东增援新加坡的第七装甲旅在半路上改道去设法援救仰光，因为再调部队去也帮不了新加坡的忙了。英军已撤出马来半岛，现在集结在新加坡岛上，他们在那里总共有四个师的兵力。英军士气低落，安排混乱。韦维尔说，由于"日军战术大胆巧妙而且掌握了制空权"，英军"产生了自卑感"。他本人从新加坡返回时，因天黑不慎在码头上跌倒，背部摔伤。

敌军在各条战线都掌握了主动权。正如史迪威在离开美国前得知的那样，在西方历史上这个最耻辱的时刻，美国唯一可采取的报复措施是大胆地轰炸东京，以显示作战意图和力量。总统表示，如果不涉及俄国人的话，可以从外蒙古对日本发动空袭。但是，阿诺德将军正在制订另一项计划。

史迪威及其随行人员2月11日飞往迈阿密，飞机两次起飞都未成功，他们第三次终于在13日那一天离开了美国。史迪威发现机舱里有位为《生活》杂志撰稿的名叫克莱尔·布思·卢斯的女记者，感到有点吃惊。在这次不舒服的航程中，布思是个颇讨人喜欢的很有风趣的人。在那之后不久，美国报刊上发表了使史迪威成为国内知名人物的首批重要报道，其中有一篇就是她写的。乔在飞机第三次起飞前写给他妻子的信中说："1942年将是个乱糟糟的年头，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干上一年的话，我们就能使情况开始好转。"

史迪威先是乘泛美航空公司的水上飞机，然后改乘DC-3型运输机，飞不多远就得停一停，全程共用了十二天时间。

他们从美国经过加勒比海到南美洲，越过大西洋到非洲，北上抵开罗（简直跟北京一样，呸!），然后向东经过巴勒斯坦、伊拉克和波斯湾，到达印度中部的新德里。他们3月13日离开美国，25日到达新德里，在这期间，远东前线骇人的灾难不断发生。2月15日，新加坡供水中断，使一场丧失勇气、安排失当的战役达到最高潮，盟军最后终于无条件投降了。八万部队被押解到日军战俘营，其中一半是英军和澳大利亚部队，其余的是印度部队。丘吉尔忧郁地承认，这是“英国历史上最惨重的灾难和人数最多的一次投降”。史迪威在非洲中部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气愤，但也感到大惑不解，他问道：“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看来，如果德军突破中东，日军突破印度，德日军队会师的可怕景象不是不可能出现的。缅甸成了至关重要的地方。2月20日，丘吉尔想让从中东调回去保卫本国的澳大利亚两个师改赴仰光。他在打给澳大利亚总理柯廷的电报中说：“现在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填补这个空当了。”柯廷认为他本国的外围防线“已垮掉或正在垮掉”，澳大利亚已经在新加坡损失一个师，而且还有一个师同英军一道在希腊遭难，他没有多少理由再信任英国人指挥作战的本领，因而拒绝把那两个师调到仰光去。

2月23日，驻缅甸的英属印度旅在锡当江前面一败涂地。印军为了能撤退，把桥梁炸毁了，而他们的一个旅的部队还没有过江。现在，抵挡日军保卫仰光的就剩下这支被打垮的部队了。（史迪威在开罗写道：“世界正在崩溃。”）由于日军海空力量控制了东印度群岛，设在爪哇的美英荷澳联军司令

部在锡当江失守那一天解散了。韦维尔返回印度，他是同史迪威在同一天里到达印度的。2月26日，爪哇大海战爆发，28日以美英荷澳联合海军部队的失败而告终。现在，爪哇的失守已不可避免，澳大利亚海岸暴露在敌人面前了。

史迪威在印度写给家人的信中说："这里的人们心惊肉跳，可能要发生不幸。"为了应付检查，他没有实话实说。

第十一章 “一顿狠揍”

1942年3月—5月

现在，关键问题是能守住缅甸以让通往中国的大门敞开着，还是让缅甸重蹈新加坡的复辙。局势的发展使史迪威第二次得到了指挥作战的机会。他极想抓住这个机会，虽然指挥作战并不是他担负的使命的根本或主要目的，虽然蒋介石打算让他指挥中国派往缅甸的两个军，不过是对他表示恭维的一种姿态。史迪威知道，如果让中国人自己指挥那两个军，他们是不会在缅甸发动必要攻势的。他还不知道自己的指挥本领是否能得到证实。

印度首都新德里地域宽广，到处绿树成荫。它是二十年代新建的都市，是显示英国统治者威严堂皇的象征。史迪威到新德里后，到总司令部参加过一次会议。司令部“非常大，简直足以容纳下我们的陆军部”。会议室里中将、少将和准将济济一堂，而前线只有三旅部队，显得似乎很不相称。史迪威怀疑英军召开这次会议为的是让他出洋相，他产生这种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英国人对美国派象他这样一位高级将官承担这项使命而他手下又无兵卒感到非常可笑。史迪威询问缅甸的战况，发现“除军需官外其他人都一无所知”。看来，参谋人员没有制订自己的作战计划，也没有制订同中国军队配合作战的战略，对敌军的兵力和意图全然不知。“英军连一

名敌军俘虏都没抓到。”

接着，史迪威继续朝东飞往加尔各答。加尔各答是印度昔日的首都，是个熙熙攘攘的、肮脏的城市。它位于印度东部沿海地区，是通往缅甸的起点站。史迪威在加尔各答等待韦维尔。韦维尔2月28日从后来陷落的爪哇飞抵加尔各答，他“疲惫不堪，神情沮丧，一副吃了大败仗模样”。他们在旧政府大厦幽暗的餐厅里一道进餐，韦维尔向他叙述了三个月来连吃败仗的经过。随韦维尔来的是在爪哇任职的美国空军少将刘易斯·布里尔顿。布里尔顿现在已被任命指挥驻扎在印度的美国第十航空队，该航空队属史迪威统辖。布里尔顿摆出一副了不起的架式，手里摆弄着一柄马鞭。史迪威对多恩嘀咕说：“空军军官拿着马鞭干什么？难道想用它打鸟不成？”几个月后，史迪威跨进布里尔顿的飞机时，发现机舱里铺着一块剪裁得很合适的高级波斯地毯，不禁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在位于孟加拉湾彼岸的缅甸，就在韦维尔同史迪威会晤的那一天，政府开始撤离仰光。日军正从锡当江朝仰光推进，政府务必赶在他们打来之前北迁，因为如果他们打近仰光，切断铁路线，封锁仰光同外界的联系，政府就来不及撤离了。英国军队从来就没准备认真地保卫他们驻守的这个国家，因而使人感到没多大希望阻挡住日军。在新加坡陷落三天后，艾伦·布鲁克在伦敦沮丧地承认：“缅甸的消息非常糟糕。如果军队不能比现在打得好一些，我们帝国肯定是要完啦！”五天后，英军在锡当江大桥又遭到大惨败，进一步加速了帝国的崩溃。印度第十七师蹒跚地掉在后面，有一个旅几乎遭全歼，其

余幸存者泅水过江，武器损失殆尽。

英国建立大英帝国是为英国本土效劳，而不是相反。英属印度军队同匆匆忙忙从中东调回缅甸的两个旅一样，所受的训练只是为了在沙漠地区同德国军队作战，而不是为了在本国执行任务，因为呆在本国就有可能受到亚洲危险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英属军队没有受过丛林战训练，因为英国在制订军事计划时没有估计到马来亚和缅甸会遭到地面进攻。这些部队同美军在路易斯安那演习时离不开卡车一样，也寸步离不开交通工具和公路。公路一被日军封锁，他们便束手无策。英国无法从陆路向缅甸增派援军或提供补给，因为印度和缅甸之间根本没有汽车公路。不修筑公路是符合颇有势力的缅印航运公司和驻印英军的心意的，因为缅印航运公司想继续垄断加尔各答和仰光之间的货运生意，而驻印英军则想使缅甸成为缓冲区。军方认为，“缅甸疾病流行、森林密布的崇山峻岭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要想越过这道屏障进攻印度，从军事上说是不可能的。”

在仰光，盟军开始销毁囤积的租借物资，包括焚烧了九百七十二辆没装配起来的汽车和五千只轮胎，浓烈气味冲天。锡当江战斗后，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的人员尽可能地转移了一部分物资，但是，他们把九百多辆卡车和吉普车、一千多挺机枪和其他武器移交给了英军，这使中国人大为恼火。缅甸政府部门开始往上缅地区转移，警察和公务人员中的印度籍人纷纷逃走，缅甸雇员也大批逃散。纵火抢劫事件不断发生，第五纵队和强盗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政府留下的唯一的一个组织是一支爆破队，他们在等候总督最后下令炸毁码头。

总督雷金纳德·多尔曼-史密斯爵士在仰光的最后一个晚上同剩下的几名属僚一起在政府大厦凄凉地最后一次进餐。总督原来共有一百一十名仆人，可是现在只剩下一名厨师和一名管事了。大厦里空荡荡，平日那些身穿白长衫、外罩金边猩红坎肩的高大的印度侍者一个也不见了。昔日的侍者们唯一的责任就是象表明帝国统治的无声雕像似地伫立着恭候吩咐。晚餐结束后，总督同他的副官以及另外一、两个人一道打弹子球。弹子室四周的墙壁上悬挂着历届缅甸总督的画像，他们那平静、冷漠的目光似乎激怒了副官。他顺手拿起一个弹子球，说："爵士，您是否觉得不应该把它们留给日本鬼子？"说罢用力把弹子球朝画像砸过去，其他人也纷纷拿起弹子球乱砸，顿时在画像上砸出一个个窟窿。他们的这种举动也许是由于感到灰心丧气，也许是由于悲观地认识到自己的统治完蛋了。总督后来说："简直象一场大屠杀！"他指的是一下子毁掉了那么多幅油画。但是，靠威望进行统治的大英帝国确实是分崩离析了。

在缅甸，英国不能指望得到人民的普遍支持。虽然积极活动的亲日分子占人口不到百分之十，但是，人们私下都钦佩日本人，认为他们是亚洲的一个终于起来反抗西方的民族。正如缅甸总理吴苏所说，"自伽马① 绕过好望角以来，我们亚洲人就不曾有过一天好日子。"山区的钦族、克钦族和克伦族等部族人都友好和善战，但是，下缅地区的缅甸人却不一样，他们总的来说对世界漠不关心，只希望自己免遭战祸。民族主义运动迫使英国作了一些让步，同意让缅甸人参加政府，但

① 伽马(Vasco Da Gama)，1469？—1524，葡萄牙航海家。——译注

是，他们拒绝答应让缅甸战后实现独立，甚至拒绝答应让缅甸享有自治领地位。他们认为，如果要打垮日本就得丢弃大英帝国，那同日本打仗就毫无意义了。

在印度，争取独立的风潮趁着日本给英国构成威胁的机会，正在达到又一个高峰。罗斯福对认为民众会为日本打开大门的看法十分关注，尽管丘吉尔去年12月份表示过愤怒，他还是又一次敦促英国对印度的一些要求作出让步。同时，蒋介石一心想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他在2月份史迪威到达印度的前几天赴印度访问，想联合印度共同抗击日本，但没有完全取得预期的结果。印度国大党非旦没有被蒋介石说服，反而想利用他对英国施加压力。甘地一针见血地指出，盟国对蒋介石本人的态度就否定了蒋介石的论点。甘地说："他们永远不会自动平等对待我们印度人。他们甚至都不让贵国一道参加会谈。"蒋介石被刺痛了，因为他当时正为美国不让中国参加主管武器和物资分配的华盛顿军火分配委员会而感到特别忧虑。他当即写信给宋子文，在信中援引了甘地的这番话，目的是让宋子文转告美国总统。他在信中还说："如果我们在艰难困苦的战争时期都受到此般对待，那么，到举行和会那天，我们会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呢？"这个问题对总统并没有多大说服力，因为总统从思想上说是愿意对蒋介石平等相待的，军火分配委员会只是个例外罢了。

关于印度，蒋介石指示中国驻英国大使告诉丘吉尔，"我本人对印度的军事和政治局势感到震惊"，如果不"马上赶紧采取解决办法"，日军进攻印度的危险将与日俱增。他劝告说，如果英国自动把实权交给印度人，就能避免这种危险。但

是，他的劝告没受到丘吉尔的欢迎。

3月3日，史迪威一行离开加尔各答，以完成赴重庆的最后一阶段飞行。史迪威将到重庆建立自己的总部，向蒋介石报到，并希望澄清让他指挥中国派往缅甸的第五和第六军的问题。第六军是支二流部队，下辖各师均不满员。它按计划是去接防驻守在掸邦的缅军第一师，但是由于行军速度缓慢，3月1日缅军第一师撤走后，它还没完全进入阵地。第五军的兵力比第六军强得多，下辖一个满员的机械化师和一支炮兵部队。蒋介石虽然非常希望守住缅甸，但却不愿把第五军派往缅甸。他2月份整整一个月一直拖着不调动第五军，直到3月1日才命令该军的一个师出动，其余两个师仍扣着不让动。

史迪威先是乘飞机越过河流纵横、幅员辽阔、暗褐色的布拉马普特拉河三角洲和阿萨姆邦郁郁葱葱的山岭，然后朝北越过缅甸黝黑的、重重叠叠的山峦，四个半小时后到达腊戍。他在宽敞的波特酒家拜会了蒋介石夫妇。波特酒家是专供外国人聚会的地方。蒋介石到腊戍来是为了下达作战命令。委员长诚挚地对史迪威表示欢迎，但只简单地聊了几句。他看上去同史迪威上次见到他时没有什么变化，外表显得还是那样严肃而圆滑，活象一尊光滑的石像，丝毫看不到经受患难或怀有忧虑的痕迹。他总是象过去那样似笑非笑，一看他的眼神就看出是强作笑脸。他身穿一直扣到领子的笔挺的黄军装（他只有在家里时才穿中式普通长袍），为了不让人看到他的灰白头发，他剃了光头。蒋介石出于独裁者喜爱阳台的本能，

站在波特酒家门廊上对第五和第六军的指挥官和参谋长们讲话，他讲话时结结巴巴，声音又尖又快，军官们肃立在下面，紧张地、聚精会神地恭听他们的元首训话。史迪威站在一边观看。

史迪威在委员长的随行人员中发现了他的老朋友商震将军。商震将军现任总参谋部对外联络局局长，主管同盟军联络。这是很难得的，因为商震为人直率，是个讨人喜欢的人，史迪威可以同他坦率交谈。但是，商震不是委员长的亲信，实际上，他跟委员长出身不一样，他俩谁也不喜欢谁。商震出身于旧官吏家庭，1927 年北伐战争后才加入现政权，他一直同蒋介石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甚至对史迪威说过委员长“太自私”。作为高级将军中唯一的一个能讲流利英语的人，他具有一定的影响。其他高级军官都得用翻译。随行人员中的另外一位老熟人是新闻局副局长董显光。董显光是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毕业生，负责同报界打交道，中国言过其实的公报都是他一手撰写的。史迪威很不喜欢他。史迪威在笔记中是这样描绘他的：“圆滑、虚伪，在我到达时做作地说他感到高兴。”

在腊戍停留一个小时之后，史迪威改乘中华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中国。中华航空公司是一家公认的商业航空公司，使用的是 DC-3 型运输机，驾驶人员中除一名合格的中国驾驶员外，其余的全是美国人。史迪威一行沿滇缅公路飞行两小时，到达昆明，这是第一段行程。他在陈纳德的总部过了一夜。陈纳德于次日上午飞回昆明。他俩第一次商谈了指挥权问题。“我同他谈了很长时间，终于使他冷静下来。他同意把美国志愿团并入美国空军，并说乐意在我的领导下供职。这

非常令人感到欣慰……他还不错。”但后来证明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因为飞行员们还是反对合并，闹事的主要是飞行员，而不是他们的指挥官。

史迪威一行接着又在飞机上颠簸了两小时才到达重庆，机舱里的“中国乘客全呕吐不止”。他们从飞机上走下，踏上长江边上的一条长两千英尺的混凝土跑道。史迪威“又象昔日使劲爬坡那样”，攀登了三百六十五级台阶才到达为他安排的宅邸。那所房子是宋子文修建的一幢西式楼房，过去拉铁摩尔住在里边，现在他已经回美国了。重庆座落在长江和嘉陵江汇合处的岩砾上，史迪威的住宅位于嘉陵江畔，第一层与马路同高，另三层俯瞰江面，跟旧金山的住房差不多。屋顶的阳台上种着花，叶上落满灰尘，另外还有一个小水池。站在阳台上，江面船只如梭的壮观景象尽收眼底。戴笠给他派来了服务人员。戴笠是中国的集希姆莱和埃德加·胡佛于一身的人物。

重庆一年有三季遭到敌机轰炸，没有象皇家空军那样的空军部队保卫人民和惩罚敌机，这样的轰炸使重庆有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经历。老百姓所能得到的只是岩石上凿出的防空洞以及派驻在自由中国边缘地区的防空监视员组成的传递敌情的警报系统。他们这些年来一直坚持抵抗，一直在自豪地单独抗战，但是，苦难越来越深重，人们也越来越疲惫。由于战争时期大批人涌入，本来条件就很差的重庆挤满了人，比以往更加使人感到不舒服，变得更加肮脏，供应也更加紧张。天气则还跟过去一样，夏天潮湿闷热，其余三季阴雨绵绵，道路泥泞难行。许多房屋被炸坏，屋顶漏雨，东倒西歪。由于人口

拥挤，显得更加肮脏，臭味更大。夜间耗子乱窜。职员和工人领不到全薪，很多人营养不良。有记者发出消息，说有些美国记者认为，“在中国，在财政部长以下的人中找不到一个胖子”。通货不断急剧膨胀（史迪威在日记中记载，“苦力手里拿着相当于五十美元的钞票到处逛”。），官吏们则终日山珍海味，一个个大发横财。政府靠银行发行钞票过日子，根本不控制发行量，也没有任何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早就无法实现其最初的目标了，它跟清朝末代朝廷一样，没有力量也没有能力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只求满足于一点，这就是保住自己的权力。

由于大城市和工业基地落到日本人手里，工商界许多人破产，其中包括最近代的、最倾向西方的集团。他们是现政权最强有力的支持者。随着这帮人的势力的削弱，国民党内部极右派的势力增大了。资本和生产资料的丧失导致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又导致薪金阶层破产，为了维持生计，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被迫从事黑市投机活动和贪污受贿。接二连三的失败和撤退使军队损失了大批武器装备，士气日益低落，指挥力量遭到削弱，民众对政府的支持也减弱了。残酷无情的租税和拉壮丁促使农村进一步贫困化，反抗地主和官吏的武装暴动越来越频繁。河南省第一个出现要发生饥荒的迹象。不满引起镇压，镇压又加剧不满，激起反抗，促使许多人向往共产党。这个政权终日惶惶不安。在重庆和昆明，大街角落里修筑了混凝土机枪掩体，显然不是准备对付日军的。1937 年至 1938 年出现的那场挫败日本的伟大爱国高潮因人们感到厌倦、遭到压制和有人趁机渔利而烟消云散了。蒋介

石凭自己的灵气和高超的政治手腕把国民党拢合在一起（史迪威说过这样一句名言：蒋介石是“二十世纪最诡计多端的政客，他不得不这样干，否则就活不下去”），国民党逃避现实，我行我素，对越来越严重的脓疮视而不见。

在重庆，有些美国人，特别是那些原先对蒋介石抱有希望的美国人，用他们当中一个人的话说就是现在都“十分厌恶甚至憎恨”蒋介石及其政府。另外一些美国人，如大使高思，也对蒋介石“感到厌烦了”。史迪威在拜会高思时发现了这一点。高思过去担任过驻上海总领事，因敢于反对日本而名声大噪。他在中国先后从事过三十年领事工作，但对中国没有强烈感情，不喜欢研究中国问题。大使馆里有很多人懂汉语，能说能看，经常到各地旅行，社会接触广泛。高思靠这些人使他的大使馆成了驻中国的消息最灵通的使馆。但是，华盛顿的决策人和特使常常绕过他。他缺乏外交官的文雅和愉快的职业作风，由于他过去一直担任领事，而且为人不随和，所以没能象威廉·布利特和约瑟夫·格鲁那样挤进白宫。他办事认真，外表不扬，常常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雪茄烟。他对东方人转弯抹角地阿谀奉承作风感到无法忍受，他“不易受骗，好思考，谈吐坦率”。他喜欢说的一句口头禅是：中国“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笔小小的资产”，但可以变成“一大笔债”。中国人觉得这位西方人奥秘莫测，正如一位同事所说，他们称他为“铁面如来佛”，不怎么喜欢他，“因为他常常冷冰冰地说‘不行’”。

史迪威在重庆遇见一些老熟人，其中包括杰克·贝尔登和军政部长兼总参谋长何应钦将军。贝尔登曾作为《时代》杂

志记者随史迪威再次到缅甸。史迪威正式拜会了何应钦。何应钦辛亥革命前在东京讲武堂与蒋介石同学，后来一直追随蒋介石。他在黄埔军校时在蒋介石手下任职，在北伐战争中一直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在北伐战争期间，北伐军给他起了个"老奶奶"的绰号)。他身材矮小粗壮，为人圆滑，总是堆满笑容的圆脸上长着一张小圆嘴巴，戴着一副圆眼镜。他只效忠于蒋介石，认为自己当参谋长的职责就是操纵各个派系，控制补给和资金，以使军队不产生贰心。他集中精力从事这项工作已有十五年之久，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在西方看来，他并没掌握多少现代军事知识，以供他的上司运用。史迪威必须同他多次会晤。正如多恩所说，同他的会晤是"不着边际的无稽对白和喝茶社交"，无法摆脱客套、礼仪和拖延。史迪威3月5日发现他"很风趣"。他们会晤时用中文交谈。

3月6日，史迪威带着指挥权问题上的"巨大精神负担"去向蒋介石报到。他认为，发动攻势能够拯救缅甸。他知道在缅甸作战不仅是个实现重要军事目标的机会，而且能使中国人恢复自信心，也可以弥补自己失去"体育家"行动指挥权的损失。史迪威发现，蒋介石确实打算让他指挥派往缅甸的军队，而且看来他也愿意作战，这使史迪威松了一口气。蒋介石"非常怀疑"英国的动机和意图，"对英军的后退和惰性非常厌恶"。史迪威对他说，"我们跟他一伙，愿意按他说的办。"史迪威同样向蒋介石夫人保证不会把陈纳德撇到一边。蒋夫人对陈纳德的地位感到担忧，告诉史迪威陈纳德已按规定辞职了。会见结束时，蒋介石答应第二天为缅甸战区建立一个联合参谋部。史迪威告别时相信自己能返回缅甸作战了。"我现在

用不着每天早上一醒来就垂头丧气，不晓得能干些什么来证明自己不是虚度光阴了……我仍不能确定自己是个什么角色，但商震说我是中国的二号人物。”

但是，第二天和第三天都白白过去了，一言以蔽之就是“再等一等”。每次同中国人会晤结束时，他们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恼人的方式道出这几个字。在等待期间，史迪威自己制订了在缅甸的战略计划和在中国的行动计划。如果仰光失守（在他制订计划那一天，即3月7日，日军进攻了仰光），他打算用中国第五军和英军一道发动强大反攻，夺回仰光。如果反攻没有奏效，盟军就退到曼德勒以东的高地上，那样，如果日军向北进攻，就能给其侧翼构成威胁，而且能控制住上缅地区。重要的问题是“制订出英国能够接受的计划”，但是，困难在于制订计划时对情况全然不清楚。谁也不知道日军在缅甸投入了多少部队，也不知道他们是在集结兵力准备发动进攻呢，还是兵力虚弱，无力再发动攻势。各种估计纯系猜测而已。

在中国，主要是应该努力开始实施训练三十个师的计划，而训练哪些师到现在还没确定下来。史迪威打算在缅甸有了保障之后在中国发动攻势，把日军从汉口地区赶走，“使日本本土处于我们的打击距离之内”。他打算用美国空军支援中国地面部队，构成双重包围，以夺取汉口。他的长远战略计划是打算“首先迅速加强空中支援力量”。他在离开美国前把这项计划呈交给了马歇尔。建立一支有效的地面军事力量也同样受到优先考虑。

中国军队是一支散乱而薄弱的队伍，要把它造就成一支

能作战的军队，是一项只有坚韧、刚毅的人才能完成的任务。中国军事系统中的其他所有因素都不利于实现这项任务。中国划分为十二个战区，控制权分散，为的是不让日本一下子胜利结束战争。但结果扩大了地方上的势力，长期使军队变成政治筹码，而且几乎变成了战区司令官的私人财产。此外，这样做还使精锐部队分散到各地，纵然有作战愿望，也没有一支强大的部队来同日军作战。中国人之所以不愿作战，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自己跟日本作战的时间够长了，现在该让别人去打了，另一个原因是想把军队积蓄起来争夺地方权势，中央政府只想用部队对付共产党，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缺乏自信心。史迪威写道："中国人不相信中国军队能跟日本人作战。"

中国军队名义上有近三百万人，约有三百个师或其他建制。军队实行三三制，三个团为一个师，三个师为一个军，三个军为一个集团军，每个战区有三个集团军。各个师的质量相差很大，得宠于委员长的师武器装备和服装都是最好的，士兵们有绑腿和皮靴。但是，中央政府的供应系统并不向所有部队提供这些物资，中国普通士兵穿的是草鞋，五个人合用一条毯子睡觉。他们每人腰带上系着两颗手榴弹，脖子上挎着一条蓝色粮袋，里边装着大米，那是他们在战场上的唯一口粮。由于征兵队强拉壮丁，农村的劳动力几乎被抽光。定期缴纳一百元法币或一定数量的粮食，则可以避免当兵。新兵被用绳子拴成一串，押往兵营，他们只接受三周基本训练。各个师一般都不满员，因为军饷是一次全部发给指挥官，他手下领饷的人数越少(以某个自己限定数字为度)，自己得到的饷

银就越多。各个师的人数并不全都是武装力量，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扛运东西的苦力。

营养不良和疾病造成的减员数字很高，有时一年高达百分之四十，甚至超过百分之四十。因此，约七千人的一个师每年要补充三千新兵。由于饷钱少而且不按时发，军官开小差也屡见不鲜。口粮定量是每人每天二十五盎司大米，外加一些盐水或红辣椒腌的咸菜，其营养价值甚至比想象的还要低，因为咸菜的腌制把维生素全部破坏掉了。发的粮食一般都是两、三年前的陈粮，维生素和蛋白质已丧失。士兵的月饷平均为十六到十八块钱，而伙食费要扣掉八到十块钱。由于通货不断膨胀，剩下的钱根本没什么价值，士兵们不能象过去那样买点豆腐、脂肪、青菜或偶尔买点鱼肉改善自己的伙食了。就连一个月挣一百四十五到一百七十五块钱的上尉和少校也买不起足够的营养品。士兵们每天吃两顿饭，大伙用一个锅，吃饭的时间往往只有三分钟。食物不经咀嚼就囫囵吞下，很难消化，结果身强力壮的人吃去大部份，身体较弱的人则体质更弱。军队医院里有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病人是患饥饿浮肿病及其他疾病。部队里，特别是运输连里经常有人饿死。士兵们经常抱怨说："我不疼不痛，就是浑身没有气力。"最糟糕的情况一般在有人来视察之前就掩盖起来了。部队调动时，沿途的公路上往往抛下一具具尸体。

痢疾和天花等流行病以及虱子传播的回归热和斑疹伤寒不断发生。虽然上级命令为新兵建立灭虱站，但指挥官们常常不愿搞，因为搞就得多花钱买燃料，花额外时间要费额外粮食。由于同样的原因，指挥官们也无视要他们种菜的命令，因

为他们不愿意自己花钱种的菜在一旦调防后让别的部队享用。中国的伟人之一罗伯特·林博士领导的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医疗队只能勉强解决表面问题。林博士1943年因受到政治压力而被迫去职。大多数士兵从来不讲究清洁卫生，许多军士甚至军官都不知道卫生同疾病的关系。他们不懂为什么要挖厕所，认为买燃料烧开水喝纯属浪费。

军队医院医务人员不足，设备很差。由于缺乏公路和救护车，担架员尽力把伤员从战场上抬下来，能抬多远就抬多远。有的伤员只能自己给自己包扎伤口，有的则死在倒下的地方。随各个师到战场上去的红十字会医疗队常常得同指挥官的愚昧无知和阻挠作斗争。指挥官们认为抢救伤员并不是什么急迫的事情，因为正如一位指挥官所说，“我们中国有的就是人”。这是一种使人感到自在的神话，其实，这么“多”的人既满足不了军队贪得无厌的需要，也满足不了农业的需要。指挥官中有的也真心实意地想为自己的部队谋福利。驻扎在宜昌前线的第十八师的一位姓罗的将军看到，他的部队四年中的非阵亡死亡人数相当于整整一个师。他下定决心不让那些没遇到日军就丧命的士兵的父母们“咒骂我是敌人”。他请医疗队帮忙，渐渐地把部队死亡和患病的比例降低了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当他开始这样做时，他并不知道他驻防的地区流行的回归热病是虱子传播的。史迪威希望中国当局能为打算训练的三十个师作出的正是这种努力，另外再增加口粮、按时发饷以及提供武器和训练。

史迪威在重庆一直等到第三天晚上才收到让他指挥部队

的计划，但该计划表明他“不过是个配角，没有任何实权”，把他同中国指挥官列为平级。从此，一场斗争便开始了，而且一直未得到解决，最后终于酿成危机。参谋部的计划看来表明了蒋介石的真正意图，但是，蒋介石在谈话时又好象是把史迪威当作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官。史迪威按他说的行事，虽然内心里也暗自对他的话的可靠性抱有怀疑。

委员长在其黄山宅邸举行宴会招待史迪威，双方继续举行了讨论。黄山树木葱茏，位于重庆以南约十英里，在黄山顶上可以俯瞰全市和两条江川。陪客中除了商震和何应钦外，还有军械署长俞大维以及桂系将军李宗仁和白崇禧。俞大维是哈佛大学和海德尔堡大学的毕业生，有涵养，善于思考。李宗仁和白崇禧多年来对蒋介石的态度一直变化无常。他们两人“一言不发，各人在想各人的心思”。白崇禧现在担任副参谋总长，主管训练工作。作为一个没掌握军队的将军，他不得不越来越投靠蒋介石。但是，蒋介石同李宗仁一直很对立。客人们正襟危坐，焦急不安，偶尔避开红色屏风后面的特工人员的监视，互相耳语几句。在委员长夫妇正式入席后，中方致祝酒词，史迪威用中文致答词，他再次转达了罗斯福的口信。

宴会结束后，史迪威同蒋介石讨论了两小时作战问题。他虽然心里很蔑视蒋介石，但还是耐心地听他阐述他“外行的战术”，其要点就是要“小心谨慎”。显然，蒋介石认为第五军和第六军是他最精锐的部队，他犹犹豫豫，不敢拿它们去冒险，因为英国人可能会“逃跑”。此外，蒋介石说，中国军队要有三倍于日军的兵力才能打防御战，要有五倍的兵力才能打进攻战，因此，他希望先弄清日军是否在调集增援部队，然后

再发动进攻。史迪威建议说:“让我们赶在他们增调部队之前发动进攻吧。”但是,这项建议被否决了。先让敌人采取行动,“如果日军不动,我们可以行动”。必须避免把部队集结在一起,因为那样可能导致几个师一下子全被击败,而如果一个师被消灭,其余的师还能保存下来。要保持纵深配备,就是说要把几个师以相隔五十英里的距离拉开。以上是蒋介石的原则,同史迪威的原则是截然相反的。

蒋介石坚持说他不能接受英国人的命令,并说他要打电报给罗斯福,要罗斯福转告丘吉尔,必须让史迪威指挥盟军部队。史迪威提醒他说,收复仰光符合“我们的”利益,“英国也需要印度前面有一堵墙”。但是,蒋介石拒绝马上行动。他希望史迪威先返回缅甸弄清英国的意图、研究地形和采取纵深配备战术。

史迪威写道:“什么指示!乱七八糟。他们多么憎恨英国佬。我是多么幼稚。”他还颇有几分远见地写道:“也许日本人会打到我们头上来,给我们解决这个难题。”次日,史迪威又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谈话,他承认蒋介石对中国人的气质和军队的局限性讲出了“很多道理”。史迪威尽量地施展外交手腕,“我重申了训令,仔细听取了他的各个论点”。尽管中国作了些限制,但是,他认为中国人“把这些军队交给一个他们还不是非常了解的老毛子,从他们的观点说已经是干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在那次宴会后的第二天,蒋介石确实给罗斯福发了电报,提议让史迪威担任驻缅盟军司令官。罗斯福在中国和英国之间感到左右为难,他复电说这个问题“非常微妙”,建议把指挥权一分为二,缅甸北部由史迪威指挥,南部由英军

驻防。

3 月 11 日，即在史迪威离开中国的那一天，蒋介石向他口头保证说:“我今天上午已经颁布命令，要第五军和第六军听你指挥。”他还说已经通知那两个军的军长杜聿明将军和甘丽初将军以及代理参谋长林蔚将军“绝对听从你的命令”。史迪威知道自己的指挥权“是有限的，当然，这些限制我也许能够摆脱掉，也许摆脱不掉。十之八九摆脱不掉”。他习惯于把最悲观的可能写下来，但是，跟大多数人一样，他实际上并不相信会是那样。

史迪威返回缅甸的时候，溃不成军的印度第十七师已从仰光退到伊洛瓦底江畔的卑谬。同时，中国第五军的主力师二〇〇摩托化师开到锡当江畔的东吁，同英军处于了同一线。

盟军的想法是在下缅的卑谬和东吁（位于仰光以北约一百五十英里）一线坚守。这种想法还没确定，因此还很难称为计划。在水平线上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有一定的困难，因为缅甸所有的交通线都是沿三大河川走向的，西部是伊洛瓦底江和钦敦江，当中是锡当江和伊洛瓦底江上游，东部是宽阔的萨尔温江。萨尔温江跟长江一样，发源于偏远的西藏内地高原。古都曼德勒几乎位于缅甸的正中央，座落在伊洛瓦底江畔，是个铁路枢纽，向西去的铁路通往密支那，向东去的通往眉苗和腊戍，在腊戍同滇缅公路接通。蒋介石还没派出第五军的另两个师，即二十二师和九十六师，虽然他已向史迪威许诺一旦粮食给养安排妥当就把它们派往曼德勒。

史迪威把总部设在眉苗。眉苗位于一片丘陵上，是个避暑胜地和夏都。市区街道尘土飞扬，有许多英国式的草坪和

花园，这时该市的英国政府已经撤走。史迪威及其参谋人员住的是浸礼会传教士的一座红砖楼，墙上爬着紫蔷，院里种着玫瑰花、桉树和冬青树。

战争史往往都是从指挥官的角度撰写的，但是，指挥官没有参谋人员的辅佐是不能指挥作战的。史迪威的参谋班子里收罗了具有各种能力的人物，因为指挥任何一场战斗都是一些人胜任而另一些人不胜任。有人在谈到赫恩将军时说，如果你想干什么事，最好别找他干。但是赫恩将军忠实可靠，这种优点弥补了他的不足之处。赫恩将军直到最后一直担任史迪威的参谋长。在担任前线顾问和负责同第五和第六军联络的前线军官中，有个名叫乔治·斯利尼的上校，有位英国同僚称他是"陆军造就的最优秀的炮兵军官之一"。汉语培训班培养出的几名毕业生非常宝贵，后来又调来一位名叫曾士奎的中国上校担任主要翻译。曾士奎是美国弗吉尼亚州军事学院的毕业生，1937 年曾在上海英勇作战，表现非常出色。他具有中国人的特点，这就是既善于处世，又具有很强的个性。在史迪威在中缅印战区任职期间，曾士奎始终是他亲密和宝贵的助手。史迪威的班子中没有一个人过去来过缅甸，对于缅甸的食物、公路、货币、交通、政治以及他们要在其中游泳的这个汪洋大海的其他一切，他们都非常陌生。总的来说，鉴于这种实际情况，史迪威的参谋班子是不行的，是应付不了他们面临的任务的。有位观察家认为，许多人"反映出军队二十年来在驻地消遥自在惯了，反映出过惯了野外体育俱乐部的安乐生活"。英国人负责为中国军队提供补给和交通工具，他们认为美国的参谋人员完全干不了向中国的六个师(后来是九个

师)提供补给的工作。他们的这种看法有几分道理。史迪威则认为英国人无法同中国人合作,"因为他们瞧不起中国人"。

英军总部设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弗拉格斯塔夫大厦,座落在一座小山丘上,那里银杯始终斟满啤酒,随时准备招待宾客。英军总部有一名陆军上将、一名中将、五名少将、十八名准将和二百五十名参谋。他们指挥的是一支兵力已经削弱的陆军部队,总人数不足一万五千人,是两个师和一个装甲旅剩下的全部人马。英国将军们穿着短裤,即使天塌下来也一定要写史迪威称为"利文沃思式命令"的东西。

史迪威前往弗拉格斯塔夫大厦礼节性拜会了总督(据史迪威日记记载是多尔曼-史密斯)。总督见一位美国人自称是中国驻缅军队指挥官,颇为吃惊。在这之后不久,第五军的杜聿明将军也以同样身份拜会了他,他更加迷惑不解了。多尔曼-史密斯问杜聿明怎么他们两个人担任同一职务,杜聿明诡秘地笑着回答说:"噢,阁下,那位美国将军只当是让他指挥军队,其实并非如此。您知道,我们中国认为,让美国人继续参战的唯一办法是给他们一些名义上的指挥权。只要我们这样干,他们就不会造成多大危害。"

杜聿明的这番解释提出了东西方之间不断出现的一个问题,这就是,这种相互关系到底哪一面符合实际呢?到底是谁想让谁继续参战?史迪威的职务到底有多大实际意义?这些问题使史迪威在缅甸的指挥权变得象皮兰德娄① 的戏剧一样错综复杂。

---

① 皮兰德娄,意大利剧作家及小说家,1867—1936,曾获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剧本情节十分离奇荒诞。——译注

就在史迪威同中国将军们建立关系的时候，眉苗又来了一位新指挥官——敦刻尔克的英雄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亚历山大将军完全是一副威武的皇家禁卫军军官模样。他是一位伯爵的幼子，英国原先打算任命他指挥参加"体育家"行动的英国军队。他来到眉苗是为了接替韦维尔指挥驻缅英军，韦维尔调任印度总司令。丘吉尔写道："即使我们不能派遣军队，我们至少也能派一个人"，虽然"我从来没有承担如此孤注一掷地派遣一位将军的责任"。韦维尔已经写报告说，他"严重怀疑"能否守住缅甸。亚历山大以在危险和紧急关头镇定乐观闻名，这种名声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中尉时在敌人的炮火下博得的，后来在敦刻尔克的极端危急时刻他又以自己的表现证实自己名不虚传——他率领英国军队平安地从那里撤出来。据说，当时人心惶惶，滩头炮声隆隆，而他却"穿着擦得锃亮的皮靴和笔挺的马裤"吃早餐，对果酱赞不绝口。据丘吉尔说，"他信心十足"。但是，要使人们对保卫缅甸产生信心，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如果不控制住公路和不收复仰光，武器和增援部队即使可以弄到也调运不进来。在仰光失守的第二天，即3月8日，爪哇投降了，盟军又有一万三千余人被关进战俘营或被迫服苦役。日本广播宣称即将进攻印度。珍珠港事件爆发已经整整三个月了，这是东西方关系史上最耻辱的三个月。言过其实的公告和自吹自擂的报纸宣传蒙住了美国公众的眼睛，使他们看不清真相，但没能骗住军人。他们在战场上挨炸，遭受伤亡，节节败退。他们对领导人失去了信心，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对事业也失去了信心。他们大多数人认为这并不是自己的事

业。士兵们若在自己国土上就会决心战斗，决不会产生放弃战斗的念头，但是，在缅甸作战就缺乏动力了。只有缅甸人才会在缅甸拼死作战，因为把交战者打跑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派遣亚历山大到缅甸来只不过是一种空洞姿态而已。

史迪威在会见亚历山大将军时，由于内心厌恶英国佬，因而是非常警惕的。他看到一个身材瘦高的人，鼻子又高又尖，眼球突出，蓄着禁卫军式的胡子。史迪威觉得他的目光里流露着优越感。亚历山大"让我在外面一直等到商震到来……听说是我——就是我这样一个该死的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他颇为吃惊。'太奇怪啦！'他上下打量着我，就好象我是从石头缝里钻出来似的"。当谈到指挥渠道时，亚历山大"完全茫然地看着我"。史迪威没有给英国人的那种毫无表情的目光吓住，而是"回瞪了他一眼"。同时，史迪威打电报给蒋介石，要他把二十二师和九十六师派到曼德勒以南一百三十英里的彬马那，以支援在东吁遭到进攻的二〇〇师。在等待复电的时候，他决定采取行动，命令林蔚开始调动部队。英军参谋部得知这项行动后"很满意，尽量显得友好一些了"。亚历山大"是刚来就职的，他满面笑容地同我开玩笑，说我从他手里夺走了中国军队"。除了亚历山大的参谋长T. J. W. 温特顿少将外，史迪威跟其他英国军官的关系均得到了改善。温特顿是个目中无人的家伙，史迪威从报刊连环漫画《穆林斯月亮》上给他找了个"布拉什博托姆"的绰号。史迪威打电报告诉马歇尔，合作问题业已谈妥，"指挥权问题不一定会影响作战"。史迪威认为，潘兴坚持主张本国部队保持原样是正确的，但是，他也认为要实行统一指挥。他宁愿自己受亚历山大

领导，虽然他并不感到高兴。

由于采取了军事行动，大家的情绪都好一些了。杜聿明“不错，在战术方面很扎实，愿意打仗”。林、肖和商震也一致认为应在东吁打击日军。史迪威“对中国人赞同我的方式感到惊愕”（事实证明这种结论是肤浅的），因而断定“麻烦完全出自最上层”。

缺陷逐渐地暴露出来了。电台寥寥无几，通讯联络系统极差，医疗设施缺乏，出现疟疾和黑水热病，参谋班子不完全适应需要，日本飞机逐个轰炸缅甸城镇。敌军每天平均出动二百六十架飞机，而盟军只能由英国皇家空军一个中队和顽强的美国志愿团出动大约四十五架飞机。美国志愿团虽然长期缺乏燃料、飞机、零件和飞行员，但是，击落的敌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他们打下的。

在凉爽宜人的眉苗郊外，机构臃肿的英军参谋部处于混乱和无计划状态。史迪威还在华盛顿的时候就曾经提出个医治这种状态的药方：“应该让这帮家伙坐下来，两个小时不要说一句话，好好地思考一下。”但是，让他们思考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明确指示，不知道在仰光失守后自己的任务是什么，不知道是应该在缅甸尽可能地坚守阵地呢，还是在为印度的防务作准备的同时慢慢撤出缅甸。唯一的一项明确并被视为燃眉之急的任务就是要沿着经过钦邦山区达武山口通往印度英帕尔的长期不用的公路开辟一条逃生路线。大家心里知道，5月中旬雨季就要来临，到那时，小道会变得泥泞滑溜，缅甸会成为一个陷阱，除非有一条外逃的公路。曼德勒难民营里霍乱流行，那里的印度人成群结队地涌往达武山口。

为了使修筑公路的工作不受影响，英军规定每天沿公路逃亡的印度人不得超过五百人。

弗兰克·梅里尔少校向史迪威叙述了缅甸战场到目前为止的情况:“没有任何计划，不进行侦察，不采取任何保密措施,不搜集情报,从没抓到过任何俘虏”，日军却截然相反,他们有很好的联络系统,积极主动,而且机动性很大。梅里尔少校过去担任过日语教官,珍珠港事件后从菲律宾调到缅甸,负责同英军联络。史迪威发现梅里尔是个可贵的战友,后来他在缅甸发挥了重要作用。梅里尔是个精明和蔼的军人，身材高大肥胖,近视眼,晒得脱皮的红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他十八岁参加陆军,后来,由于他六次投考，西点军校才同意放宽条件,破例接收他这个眼睛散光的人入校。

另一个著名人物戈登·西格雷夫博士就是在这个时候来眉苗供职的。西格雷夫是美国浸礼教会的外科医生，长期侨居缅甸。他不是正统派,性格坚强不屈,谈吐坦率，有献身精神,有点象史迪威那样为人刻薄和厌恶虚荣。他过去在掸邦建立了一所医院,训练了一批缅甸护士。现在,他表示愿意带着这批人到东吁去为中国第五军服务。他愿意在美军领导下工作,而不愿受英国人领导。西格雷夫估计自己会被撵走,因为他认为史迪威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而且很可能会对传教士和缅甸护士抱有偏见。但是,完全出乎他的意外,史迪威将军及其军医官罗伯特·威廉斯上校同意他的建议，甚至就中国军队的补给问题征询了他的意见。随着战争步伐的加快，西格雷夫和史迪威几次交谈后便取得了相互谅解和尊敬。他马上就明显地看出，这位将军在跟那些喜欢阿谀奉承的人见面时

“甚至连‘早安’都不屑一说”，但是，“当你跟他谈正经事时，他显得非常友善，往往是你把事情刚讲了一半，他就明白了，而且很快就作出决定”。

为了说服蒋介石派遣中国部队，史迪威3月17日飞往重庆，同商震一道跟委员长斗争了两天。“他提出的所有论点都被我驳回了。我不停地驳斥他，丝毫不松劲……搞得我筋疲力竭。”商震同何应钦、白崇禧以及总参谋部的另两名成员进行磋商后说，他们四人一致认为需要采取行动，并答应敦促委员长同意。这使史迪威颇感意外。三番五次的争论甚至惊动了蒋夫人。“事实上她叫我坚持下去。”史迪威受到鼓舞，心里感到宽慰。他相信中国人正在接受他的立场，“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至少我现在知道，有些中国军官如果有胆量的话，是会同意我的意见的”。由于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自离开加尔各答以来头一次晚上睡了个好觉，因为他已对委员长的军事思想越来越感到幻灭。第二天是他五十九岁生日，他醒来时不再有那种“一切都完了”的感觉了。他心情这么好，近几个月来这还是第一次。他在自从宣布他的使命以来第一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他信赖“我的部队”，即中国部队。他还说，“中美军队一道进入东京那一天将是我们一生最幸福的日子。”

史迪威收到了马歇尔发来的生日贺电。贺电说：“有你在中国，总统、史汀生和我都感到非常放心。”马歇尔知道他使他的这位最优秀的军长落入了可悲处境，因而不断地发电报赞扬他，但却不给他派遣增援人员。他在收到史迪威的报告，得知蒋介石拒绝接受英国人的命令后，不再坚持实行统一指挥。

他告诉英国，如果他们确保中国参战，就得让亚历山大和史迪威各自独立地进行指挥。亚历山大意识到这一点，欣然表示同意。罗斯福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丘吉尔，丘吉尔采取了默许态度。

在重庆，蒋介石在使用中国军队问题上作出了小小的让步，他答应史迪威将二十二师派到彬马那一线支援二〇〇师，而且，一旦卑谬出现危险，可以援助英军，但条件是必须由史迪威指挥，而且“必须是出现紧急情况才行”。蒋介石坚持要九十六师呆在曼德勒。现在还不清楚日军是否有力量朝北进攻。蒋介石说，如果日军一个月内不发动进攻，中国军队也许可以发动进攻。（“他希望进攻能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他重申一定不能让第五和第六军吃败仗，“因此，我要他派遣一个能保证做到这一点的人，因为我不能保证不吃败仗。”次日，蒋介石又犹豫起来，他说，如果英国放弃卑谬，他就完全撒手不干。“他下不了决心，老是改变主意。”史迪威唯恐蒋介石过几天又变卦，于是立即乘飞机返回缅甸，一到腊戍立即签署了调动中国军队的命令。他乘轿车赶到第五军驻地漂贝。日军已开始发动攻势，东吁遭到进攻。杜聿明忧心忡忡。他同意赶快调二十二师去支援二〇〇师和调第六军的一个师去支援二十二师。史迪威匆匆忙忙地赶回眉苗安排调动部队。“在二十二师行动之前有一段悬而不决的时间，这是很糟糕的。”

那天，伊洛瓦底江畔的马圭机场（位于卑谬以北一百英里）大祸降临。停在机坪上的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志愿团的飞机出乎意料地遭到二百架敌机袭击。美国志愿团把没炸坏的飞机撤到腊戍以北中国境内离中缅边界不远的垒允基地。

英国皇家空军飞行中队敷衍地打了两、三次仗，结果损失惨重，随后没有通知亚历山大将军就擅自撤到印度，以后就再也没有参加过作战或侦察。美国志愿团拼拼凑凑地修好炸坏的飞机，在一段时间里保持了一支规模不大的空战力量。但是，飞行员们由于不得不一直在不利条件下起飞迎敌，不满情绪越来越大，甚至越来越不愿服从军令。他们对不给他们派遣小批增援力量感到愤慨，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再增派一小批飞机来，他们就能压倒敌人。实际上，美国已计划让执行轰炸东京绝密任务的飞机在完成任务后去增援陈纳德。但是，还要过四个月才轰炸东京。史迪威3月23日在日记中扼要写道："现在再也没有空中支援了。"

史迪威那天晚上写信给史汀生说，这正是当前形势的问题所在。"可以进行有效抗战的机会显然已经丧失了。"为了说服委员长调遣军队，用掉了很多时间，结果，"我们在缅甸本来可以得到的机会丧失殆尽"。第五军和第六军派到了缅甸，但后勤根本没跟上，口粮、铁路运输和汽车燃料全靠英国解决。"据我观察，中国军队的参谋人员对这场远征丝毫不感兴趣，根本没有为此操过心。"史迪威甚至不得不亲自寻找军医。军队的纪律和精神状态很好，但是，委员长的"战术思想非常离奇"。他给曼德勒迷住了心窍，一心认为"守住曼德勒的唯一办法是在那里安营扎寨"。

史迪威习惯性地从最坏的地步设想问题并继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3月24日至31日这一个星期里，为了让二十二师向东吁发动反攻，以使驻东吁的第二〇〇师免遭包围和巩固驻卑谬的英军的侧翼，史迪威尽了巨大的努力。二十二

师在火车上令人不可思议地拖了四天之后才开进阵地，史迪威有点怀疑这是重庆故意搞的把戏。史迪威两次命令发动进攻，每次杜聿明及其部属经过辩论、分析、提出借口和作出许诺之后都答应执行命令，但第二十二师每次都按兵不动。

战线逐渐北移，日本飞机空袭更加频繁，村庄烈焰腾腾。公路上拥满难民，牛车一辆接着一辆，天气炎热，尘土飞扬，人们又饥又渴。“大家都大骂铁路。机务人员逃跑了。彬马那以南就不通火车了。也没有卡车。”史迪威要求供给他一百五十辆卡车，但是肥胖的俞飞鹏将军只拨给他五十辆。俞飞鹏是物资供应部门负责人，在腊戍掌握着七百辆卡车。他在用那些车辆把军用物资运往中国境内的秘密仓库。史迪威下达的所有命令一律得通过杜聿明将军传给林蔚，然后再转给另一位联络官，即一位姓胡的将军，由他报请最高领导批准。胡将军掌握着一部秘密电台，可以直接同蒋介石联系。同时，蒋夫人也写信向史迪威转达委员长的意愿。她的信是作为特别邮件通过重庆和腊戍之间的飞机递送的。采取这种做法是因为据信日本能破译无线电密码。蒋夫人的信件满篇是警告和劝诫，不断重申蒋介石喜欢的战术：“他想再次向你强调，务必遵循‘纵深配备’原则。”史迪威有一次在一天里竟收到三封信，封封改变主意，最后又同意调动二十二师，实际上史迪威那时已经下达调动命令了。“天呀，指挥官若受制于人，精神负担太大了！”

史迪威带领为数不多的参谋人员在驻扎在漂贝的第五军建立了自己的总部。他每天要么是驱车在眉苗和彬马那之间崎岖不平、尘土飞扬的公路上来回奔波，而且常常还要冒着敌

机空袭的危险;要么是把地图铺在桌上，无休无止地讨论;要么就是同杜聿明和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将军争论发动攻势的有利条件。有一次，有四架敌机飞到史迪威住的平房上空，低空盘旋扫射，梅里尔少校在用布朗式轻机枪朝飞机扫射时听见史迪威将军在厕所里喊道:“这帮狗杂种在我解裤子的时候打上门来。等它们再飞回来的时候，我会去帮助你!”

在卑谬，英军编成了缅甸第一军，新任军长是威廉·斯利姆中将。他是从中东调来的，是跟亚历山大同时被最高当局调到缅甸来的。斯利姆斗志旺盛，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入伍时是名列兵。负责同英军联络的梅里尔去见他，问他是否愿意一道参加反攻，斯利姆问道:“史迪威的目标是什么地方?”

梅里尔一本正经地回答:“仰光。”

斯利姆说:“去告诉史迪威，他可以把我算在内。”

后来，在大家都遇到不幸的时候，斯利姆结识了史迪威。他发现史迪威“有时象拉车的骡子一样倔强”，有时故意显得很粗卤，但具有军人的优秀品质，即“始终想积极主动地发动进攻”。斯利姆也认为在东吁发动反攻是可行的，但他没有多少可用之兵。缅甸籍士兵为家属担忧，不少人开小差，而且招募不到新兵补充兵员。空中掩护没有了。印度军队的野战炮和重型武器在锡当江畔损失殆尽。军队士气低落，士兵对军官的信任降到了最低点，阵地不战而弃。农村的情况越来越险恶。韦维尔的一位副官前来视察，发现“到处是无政府状态和危险”。土匪和民族主义领袖昂山领导的游击队肆无忌惮地四处活动。缅甸农民象“穿着长裤、头戴白帽的凶悍女仆”，他

们个个腰间佩着锋利的长刀，实际上那是普通的农具，但看上去让人觉得凶狠可怕。英国士兵开着撤掉挡风玻璃的吉普车在公路上奔驰，结果有的人的脑袋被横在公路上的齐脖子高的电线刮掉。

3月26日，史迪威得知驻扎在仁安羌的英军发生骚乱。仁安羌位于卑谬以北一百二十英里，是个石油供应地，打仗所用的汽车燃料和石油全靠那里供应。不久又传来了更加糟糕的消息。“英军破坏油田。啊呀，我们在为什么而打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实际上谁也没为缅甸操心。缅甸是最后一道战线。伦敦和华盛顿都把自己的主要力量用在了别的地方。由于没有增援部队，也得不到援助，中缅印战区存在着一种孤立感。西格雷夫博士也有这种感觉。他在彬马那第五军的后方建立了医疗站。他认为，使自己相信自己的任务很重要的唯一办法是相信“我们在这里努力干的任何事情都是为美国，甚至是为全世界干的”。

二十二师仍没有投入战斗。史迪威同铁路系统作了一番斗争。铁路上的印度籍工作人员因害怕抱有敌意的缅甸人，统统跑掉了。“告诉马丁用枪对着机务人员，强迫他们开车……运载二十二师的最后一辆列车七点钟经过漂贝。看来情况有些好转。”当时，杜聿明将军“郁郁不乐，十分烦恼——一切都不利于发动进攻。没有办法。天哪，他那副模样显得很可怕”。现在一切都取决于二十二师的到达。凌晨三点钟的时候，还有两辆列车停在彬马那，到九点钟的时候，五辆列车全部开出了。（有人让列车拖延了三个小时，那个狗杂种到底是谁呢？）次日上午传来了一些互相矛盾的消息。接着，到下

午四点钟的时候，所有三个团突然都进入了阵地，枪炮和坦克都做好了开始进攻的准备。

“后来，情况太妙了。”中国人又开始犹豫起来，提出了种种借口。“‘我们怎么能发动进攻呢？他们有105毫米口径的大炮，而我们只有75毫米口径的。’”“‘他们有四十九辆坦克。’”“‘九十六师无法按时赶到这里。’”（没能用卡车将该师运来。）或者是借口说缅甸人会破坏或切断铁路线。“‘也许明天可以发动进攻，得再好好想想。’”就在这个时候，传来消息说英军从卑谬撤走了，一下子使中国军队的侧翼失去了掩护。“这下子可糟糕了。怎么办？我对付不了杜聿明。”史迪威决心摊牌。他知道蒋介石在两千英里之外直接同杜聿明和林蔚联系，直接进行指挥，直至团一级的调动。林蔚在感到史迪威要强令二十二师发动进攻的时候离开了漂贝。为了揪住林蔚，史迪威回到眉苗，他吃惊地发现蒋介石承认亚历山大了。在这期间，亚历山大已经以缅甸战区总司令身份前往重庆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为什么发生这种引人注目的变化，原因从来没有人加以说明。然而，既然已经实现了统一指挥，史迪威就不再浪费时间去操那个心了。

史迪威找到林蔚，直到他同意签署进攻命令才放他走。随后，他又急急忙忙赶回漂贝同杜聿明研究进攻计划。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将军是个“毫无特色的家伙”。他高谈阔论，但不知所云。他希望等九十六师开到后再发动进攻。“他们拖着不干……如果我不设法逼他们干，他们会拖下去，什么也不干……好吧，我就再忍耐一段时间吧。天气热得要命。我们大家都口干舌苦、筋疲力竭。我的精神真受不住了。”他打电

话到眉苗，要求英军发动支援性进攻，得到英军肯定性许诺。“好心的斯利姆。他毕竟还不错。”但是，杜聿明又一次找到了不采取行动的理由。就在杜聿明拖延时间的时候，敌军从三面包围了东吁，从东吁和卑谬之间穿插进来，给中国和英国军队的内翼构成威胁。斯利姆的装甲旅实际上已朝前推进，占领了一些地盘，这下又不得不撤回来，以避免被敌军切断后路。二十二师摆出一副进攻姿态，朝敌军开火，但一直呆在原地没有动。到3月30日上午九点半，史迪威知道不会发动进攻了。他们“又拖着不动了。这帮胆小鬼”。

二〇〇师顽强地抵抗十二天，阵亡一千人之后，自己突围出来，跟在二十二师后面撤往以北六十英里的彬马那地区。缅军已经开始后撤，大概是想撤到彬马那一线的亚兰谬坚守。但是，部队不停地撤了八十英里，一直撤到离油田不远的马圭地区，途中甚至没有停下来破坏桥梁以阻拦日军。到这个时候，就连英军也有人开小差了。许多士兵逃往曼德勒，他们渺茫地希望能经中国逃出去。中国军队和英国军队互相责备，都怪罪对方暴露了自己的侧翼。中国指责英国让二〇〇师饿着肚子打仗，英国则反驳说，郤将军的联络官离后方太远，以致被日军包围圈切断了联系。取得全体盟军指挥权的亚历山大将军后来在正式报告中说中国军队是“寄生虫”，因为“他们指望我为他们提供粮食”。

史迪威自己陷入了困境——他在指挥一支拒绝服从他命令的军队作战。“我不能枪毙他们，也不能丢开他们。光责备他们又丝毫不起作用。”他过去多少还逼蒋介石采取了一些虽

然符合中国利益但蒋介石却不愿采取的行动。蒋介石现在又退缩了。史迪威认为自己有三种选择：一是“听之任之，不闻不问，”二是“直捷了当地提出辞职”，三是“偷偷溜走，要求派遣我们自己的军队来作战”。他动身前往重庆，想去同委员长辩个水落石出。他意识到自己日益“陷入困境”，因而要多恩把一切事情都记录下来。

使部队指挥官服从命令的问题并不是史迪威一个人遇到的问题。没有接到命令就擅自撤退和不占领或坚守某个阵地是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的习以为常和根深蒂固的东西，他们把战争看成一盘施展计谋的对弈，而不是铁血冲突。对一位指挥官来说，自己战死沙场或使兵卒阵亡并不是壮举，而是愚蠢行为。在中国，由于指挥官一向普遍不愿让自己的军队到真枪实弹的战斗中去冒险，结果十六世纪就产生了“连坐法”。连坐法是一种追究集体责任的军事制裁法，规定任何部队若没有接到命令就擅自撤退，有关的一系列指挥官统统要判处死刑。蒋介石对第一次作战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就采用了这种办法，以使部队上下之间和左右邻军之间互相负责。

为了激起已完全丧失的责任感，中国采取的另一项做法是向坚守某个阵地的部队指挥官颁发奖赏。但是，不论是死亡的恫吓，还是奖赏的诱惑，都不能在军事上促成精神文明所没有培育出来的品质。而且，中国军官都认为自己不应对战斗胜败负责。军事职业历来不受重视，中国的理论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史迪威本人在笔记中写道：中国军官“不担任国家的负责职务”，也没有为国家尽职的传统。中国的指挥官并不象西方军官那样是体制严格的军队的成员，因而，指

挥官们直接效忠于领袖本人，而不是服从上级指挥官的命令。结果是将军们分成派系，甚至团一级的校官们也常常是只接受蒋介石本人的命令，而不接受直接上级的命令。湖南虎将薛岳一度对委员长直接向他的部队发号施令非常讨厌，因为他的部队常常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调动或撤走。有一次，他实在忍受不住了，最后他本人违反命令，把军队调到了“电话打不到的地方”。

在卑谬—东吁大撤退后，眉苗的气氛开始恶化了。史迪威参谋班子中的美国人虽然没有亲身参加战斗，虽然美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取得什么辉煌战绩，但是，他们为中国和英国感到耻辱，而且，据一位美国人说，随着战局的发展，他们越来越相信“亚洲局势已无可挽回，除非专门派遣美国部队来作战”。史迪威的“偷偷溜走和要求派遣我们自己的部队来作战”的想法就反映了这种愿望。但是，这种愿望在中缅印战区是实现不了的。眉苗的英国人在受到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嘲笑后则公开讥笑“史迪威组织的中国军队大反攻”。随着大英帝国的地盘一块接一块丢失，英国人常常认为主要应归咎于美国，因为美国在别人一再提出警告后仍麻痹大意，结果在珍珠港损失了自己的太平洋舰队，以致最后搞得他们连印度都可能保不住了。

史迪威4月1日在重庆在日记中对自己的境遇进行估量时自问道：“我是四月愚人① 吗？”主要的麻烦是蒋介石插手。如果不是蒋介石阻止调动二十二师的话，在二十二师第一次绕过东吁的时候本来是可以把日军切断的，但是，“蒋介石一

① 四月愚人(April Fool)指在愚人节中被愚弄的人。

心想守住曼德勒，而且看不到守住曼德勒的办法是在东吁吃掉日军”。史迪威从商震那里得知，是蒋介石亲自命令军队退到彬马那一线的。

在同委员长会晤的时候，史迪威“表示强烈不满，讲话时故意措词强烈，说得解除我的职务。我提出另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单独拨出一支军队专归我指挥。我告诉他，我不能用第十航空队去支援这样的指挥官……简单明瞭地说就是，军长和师长们不服从命令，而我没有足够的权力迫使他们服从命令”。

实际上，史迪威还是故意未猛烈抨击蒋介石，因为正如他在日记中所承认，“我不得不板着面孔告诉蒋介石，当他的部下大概是按他说的行事时，他们并未执行他的命令。但是，公平地说，要让他们把几个军交给一位他们不了解、也不怎么信任的十足的外国人指挥，那是一种奢望”。跟许多美国人不一样，史迪威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排外思想能够理解。

蒋介石夫妇看来很发愁，急于想纠正这种状况。在以后的几十天里，他们答应尽力使史迪威具有明确的权力。在蒋夫人的提议下，蒋介石同意亲自到腊戍去一趟，“以便向大家讲清楚我是他们的上司”。他看来是真心实意，使人相信是真心。他改派罗卓英担任执行官。罗卓英可以比林蔚更好地对付杜聿明。罗卓英是广州人，性格坚强，精力充沛，在三十年代剿共的战斗中发迹，后来又在上海和长沙打过仗，给史迪威的印象是个办事认真的“强硬的家伙”。此外，蒋夫人懂得西方的看法和外国人内心里对中国人转弯抹角做法的想法。她“答应尽力予以帮助”。史迪威认为自己取得了重大胜利。“只

要考虑一下他们同外国人打交道的历史和经历，就会看出这确实是蒋介石作出的一个相当好的姿态。”

在重庆，记者老是跟着史迪威。他注意到，报上已开始“大吹大擂，提出种种理由说我得在一周内打进仰光。如果我被日本人赶出缅甸，那我会被视为一个什么样的大笨蛋啊！”这时，美国公众在报上看到的是诸如《中国机动部队击溃日本装甲部队》一类的大标题。史迪威创办的《奥德堡概论》对宣布史迪威到中国任职的消息大加渲染，甚至得意地夸口说要“注意裕仁的动向”。

4月5日，史迪威跟蒋介石夫妇一道返回缅甸。英国人用标准的礼仪欢迎委员长夫妇，缅甸步兵队吹奏起风笛。蒋介石在眉苗向亚历山大保证说“史迪威将军全权指挥中国军队”。次日，他召集中国指挥官，当着史迪威的面要他们必须绝对服从史迪威的命令，并说“我完全有权提升、任免和惩处中国远征军的任何军官（上帝！），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调门”。史迪威同委员长夫妇手挽着手，满面笑容地合影，以供报界发表。此外，委员长还答应发给他一枚用篆体字刻着他正式头衔的大图章，以确认他的权力。文件只有盖上这样的红章才生效，不盖图章，史迪威的命令只能算建议。一周后，史迪威收到图章，但跟蒋介石许诺的不一样，图章上刻的是“同盟军总参谋长”，而不是“赴缅远征军总司令”，而且也没有附寄来奖惩权证书。三十八师的军官们在战争结束后说，不论委员长在眉苗说过什么话，刻着参谋长字样的图章说明史迪威是“顾问”而不是司令官。他们就是这样看待他的。

但是，在史迪威看来，蒋介石终于同意要想守住阵地就必

须发动进攻的观点了。而且，罗卓英和杜聿明也“全力赞成这样做了”。因而他感到鼓舞，当然蒋夫人也起了促进作用。她在动身的时候给史迪威留下一罐果酱和一封信，她在信中甜言蜜语地说果酱的成份象征着生活的甘苦，并向史迪威保证说“我们是你的后盾……我在战线的另一端……你面前摆着大丈夫的任务，而你就是个大丈夫，而且我要补充说，你是个了不起的大丈夫。”蒋夫人认为跟外国人打交道不一定非得圆滑一点不可。

卢斯夫人也来到眉苗。她采访了史迪威。两个月后，她的报道在《生活》杂志上发表，史迪威的照片登在封面上。卢斯夫人问史迪威同蒋介石的会谈是否成功，据她报道，史迪威说：“是的，是的，委员长直率地向包括他自己的将军在内的所有人讲了自己的意见。亚历山大和我也直率地讲了自己的意见。蒋夫人直率地给我们作了翻译，一点也没有留情面。是的，大家都坦率地听取了意见。”史迪威说，记者可以向国内报道说局势完全控制住了。卢斯夫人问：“但这种局面能维持下去吗？”史迪威回答说：“不会，不会维持很久，维持不了多久。”但是，争取到了一段时间。“时间，时间，时间”——这正是他要争取的。“在缅甸多坚持一小时，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美国人就能多活一小时。”

醋性子乔变成了一个知名人物。他成了报道的好材料，报界也充分利用他进行报道。报纸发明了一些生动的语言，称史迪威是易发脾气、喜欢高谈阔论的真正军人，说他坚强不屈、坚韧不拔、瘦高而结实、脚踏实地、讲话妙语横生、会讲中国话，说他不摆架子，见人热情微笑，是个深受部队爱戴的严

守纪律的长官，有的把他称为美国的“中国戈登”，[1] 还有的把他称为“乔大叔”。

虽然日军从伊洛瓦底江朝曼德勒方向推进，而且先出动飞机有计划地逐城逐村轰炸，但是，在史迪威到重庆期间，缅甸战局没有发生任何明显的变化。“我们仍然有机会。”实际上，在这期间，日军又增调了两个师和两个坦克团，但是，盟军由于侦察系统薄弱，一点没有发现。日军的计划是赶在5月中旬雨季来临前分兵三路，穿过三条谷地，围歼腊戍和钦敦江之间的盟军。史迪威依照自己的为了守住阵地必须发动进攻的理论，认为仍然可以从彬马那一线发动反攻，这样足以打退敌军和巩固中缅地区的盟军阵地。为了守住曼德勒，蒋介石又增派了三十八师，师长是机警、精力充沛的孙立人将军。孙立人跟马歇尔一样，是弗吉尼亚州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后来事实证明他是个颇有才干的战术家，在战斗中头脑冷静而富有进取精神，在缅甸战役中成了中国杰出的指挥官。孙立人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不仅为他指挥作战提供了方便，而且大大提高了他的声誉。史迪威在同别的师打交道时遇到麻烦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足够胜任的译员。

日本飞机对村舍狂轰滥炸，中午的热风一吹，草屋竹舍烈火熊熊，黑烟冲天。4月3日，日本飞机轰炸了曼德勒，有四百人被炸死，火车站和医院被炸毁，大片街道变成废墟，电话线被埋在灰烬、废墟瓦砾和遍地的人畜尸体的下面，许多尸体被炸弹抛到十八世纪的宫殿四周高大石砌围墙下的壕沟里。当史迪威4月8日到曼德勒同孙立人磋商时，那座庙宇塔寺

① 戈登(1833—85)，英国名将，曾协助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译注

林立的城市里大火仍没有熄灭。警察、公务人员以及大部分居民都逃跑了，英国当局很难恢复公共服务事业，也很难收埋死尸。市区腐臭味扑鼻，令人感到窒息。死尸浸泡在泛起绿色泡沫的粉红色污浊血水里，胀得鼓鼓的。大街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腐尸，猪狗乱翻乱拱。乌鸦啄食死尸的眼珠。死尸上的蛆虫把鸟儿喂得肥胖，鸟儿象喝醉了似的摇晃着，从一具尸体跳到另一具尸体上。蒋介石夫妇跟史迪威同一天到达曼德勒，他们抓住这种骇人景象大骂英国人，发泄他们对西方的失望和愤怒情绪。自珍珠港事件以来，中国人中的这种愤怒情绪越来越大了。蒋介石在写给丘吉尔的信中说："在我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有哪个地方象缅甸战区这样悲惨，这样毫无准备，这样混乱和衰败。"

史迪威自认为获得了新的权力，他再次匆忙赶到各师视察，想把第五军调到彬马那地区作战，想把左边的第六军调去守卫萨尔温江一线的垒固地区的要道，但一切都不顺利。日军继续朝前推进，他们常常发动突然袭击，犹如从天而降，一下子就攻占了盟军的阵地。日军不断派飞机空袭，盟军的秩序和后勤工作越来越混乱。委员长不断写信来，他在是否、何时以及从哪里调哪些部队增援英军问题上三易决定，结果，本来就很紧张的运输系统几度重新调配。蒋介石还在一封信中命令将中国阵亡军人的尸体一律装入松木棺材运回中国，以便葬在他们的祖坟里。

史迪威前往彬马那视察二〇〇师的部队，看到"许多士兵精神焕发"。日军飞机的炸弹震得大地颤抖。燃烧的房屋劈啪作响，浓烟烈焰腾上天空，形成巨大的黑色蘑菇云。这种情

景好象突出地表明了他是在黑暗中战斗。由于缺少空中侦察，不可能弄清敌军的进攻路线。史迪威对多恩说："上帝，我简直象个瞎子。"美国志愿团的飞行员拒绝在他们认为有可能送命的低空飞行。史迪威紧急要求英国皇家空军派遣两架侦察机，但没有回音。驻印度的美国第十航空队当时有八架轰炸机，另外还有十七架飞机飞在飞往印度途中。尽管史迪威提出要求，但它也没有给予支援，因为据布里尔顿3月24日前来见史迪威时说，他的炮手们还没受过射击训练，航空队要到5月1日才能作好参战准备。布里尔顿虽然应受史迪威指挥，但是，他却喜欢认为自己是韦维尔的部下，而且，他在德里受了影响，也认为缅甸已经完蛋了。

史迪威求助于雨季，希望能坚持到雨季到来，因为到那时大雨能阻止日军前进。每次视察时，他总是停留一下去看看西格雷夫和他的护士们。他们不知疲倦地抢救伤兵，终日挥汗如雨、满身血迹。西格雷夫医生抬起头来，发现史迪威在默默地注视他工作，他们互相苦笑一下。西格雷夫写道："他总是有时间去看望努力干好工作的人。"在美国参谋人员中，有一部分人不再努力工作了，变得悲观失望起来。他们紧张不安，批评史迪威将军固执，说他硬要打一场英国和中国都毫无信心的战役，而英国人和中国人对自己毫无信心，也互相不信任。

突然，就象用隐现墨水写的字一下子显现出来一样，日军三路进攻最东边的一条进攻线路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参谋部军事情报部的罗伯茨上校把第六军同敌军分遣队交火的零散报告综合起来进行分析，意识到这是敌军进攻腊戍的试探。

敌军如果攻占腊戍，通往中国的公路就会被切断。他向正在第六军前线视察部署情况的史迪威作了紧急报告，史迪威认为这种动向非常令人沮丧。第六军的部队没有接到命令就撤进防御阵地，指挥所松松垮垮，军长甘丽初将军麻痹大意，对情况一无所知，根本管不住他手下各师的将军。其中五十五师师长陈将军遇到劣势敌军，但他却毫无必要地后撤，结果丢失了关键阵地。此外，陈将军也没有严格执行收复某个阵地的命令。在遍地松柏的美丽的高原地区，村庄很平静。史迪威对多恩说："噢，你知道，这些松木好给那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做棺材。""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一开始只是史迪威给委员长起的绰号，后来渐渐成了对委员长的固定称呼。史迪威回到总部后要罗卓英下令处罚甘丽初将军、解除五十五师师长陈将军的指挥权和收复丢失的阵地，但是，他无法保证这些命令得到执行。果然，除处罚甘丽初外，其他命令都没执行。

三天后，日军突破伊洛瓦底江一线，绕过缅军第一师，朝仁安羌油田挺进。斯利姆将军无法指挥士气低落的部队卓有成效地作战，于是在4月15日下令炸毁油田。亚历山大急急忙忙地把史迪威叫到眉苗。史迪威感觉到"不幸和忧伤"。亚历山大向他承认，他手下的人"对日本人谈虎色变"。他本人很担忧，他"现在称呼我乔了"。

就在这个时候，史迪威突然收到蒋介石一封信，命令他给每四个士兵发一个西瓜。在史迪威在缅甸战区任指挥官期间，这件事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比其他任何事情都大。委员长在盟军最不幸的时刻，即在缅甸一败涂地的时候（史迪威认为这主要是委员长插手造成的），竟然还命令发西瓜，这使史迪

威长期瞧不起他。委员长后来得知此事非常恼怒。这件事给他们两人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

按照过去同委员长作出的安排，孙立人的三十八师调到伊洛瓦底江一线加强同英军的联系，此刻又去拦截日军，以拯救缅军第一师。三十八师守住了阵地，并同英军装甲旅一道发动了反攻。这场战斗是缅甸战役中最激烈的一场战斗，显示了史迪威一贯说的中国军队只要有坚强刚毅的领导就能表现出的素质。中国军队虽然损失了大部分汽车、迫击炮、野战炮和高射炮，虽然伤亡人数达百分之二十，但是，他们的英勇作战不仅拯救了缅军第一师，而且也拯救了其东面的印度十七师。因为如果缅军第一师被击溃，印军第十七师也会遭歼灭。

在这场战斗之后，恐惧气氛蔓延开了，这是敌军犯下的与在中国一样的暴行所引起的。日军把印度俘虏关在竹屋里，然后点着火烧死，或者是往身上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更加让在缅甸的西方人感到恐怖的是，被俘的英国军官也受到同样虐待。他们有的竟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供日本士兵练习刺杀。在这之前，到亚洲来的所有西方人都还以为自己会受到同当地人不同的对待呢。

在那场战斗之前，史迪威 4 月 15 日给马歇尔发了一份电报，悲观地扼要汇报了缅甸战局。他说，他相信英国早在一段时间以来就把缅甸一笔勾消了。他相信，英国在印度的驻军足以拯救缅甸，“如果他们真想干，他们早就派军队开进缅甸了”。他内心里从亚历山大不愿让自己的部队投入战斗一事得出结论，认为亚历山大一定得到伦敦的命令，要他只象征性

地抵抗一下就撤出缅甸。美国人，不仅是史迪威参谋班子中的美国人，普遍相信这种说法。卢斯夫人在同亚历山大谈话后于4月10日给史迪威写了一封私信，说“蔡尔德·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不怎么想坚守他已抵达的黑塔，虽然事实证明这是件痛苦的事情”。（亚历山大还说过一句“极其荒谬”的话：我确实希望乔不要离开。如果没有他，我会觉得很难指挥中国军队。）路易斯·约翰逊上校也有同样的印象。约翰逊上校是个有相当战斗精神的人，担任过陆军部长助理，这次被罗斯福以总统特使身份派到印度。他报告说，英国人宁愿放弃缅甸，也不愿为了守住缅甸而欠中国的情或向缅甸民族主义分子让步。无论如何他们想在和谈桌上收复缅甸，想既收复缅甸又不对将来的政府形式承担任何义务。

缅甸在所有人的轻重缓急考虑中都被放在最末一位。4月份第一周，日本的六艘航空母舰驶进孟加拉湾，韦维尔担心加尔各答遭到袭击，布里尔顿于是派他的八架轰炸机对仰光和日军集结船舶的安达曼群岛进行了空袭，但收效不大。这件事离布里尔顿拒绝支援缅甸不到一周，因而使史迪威十分震怒，蒋介石更是大发雷霆，因为美国曾向他保证第十航空队属史迪威指挥。蒋介石认为，布里尔顿的行为证明美国必要时会为了英国而牺牲掉中国。蒋介石同盟国打交道的经验加剧了他对西方的反感，而不是相反。他公开宣布，如果再把中国战区的兵力用于别处，如果盟军再遭到失败，中国就有可能“一下子变得仇视一切外国”① 和退出战争。

① 这是美国海军武官詹姆斯·麦克休上校说的话。麦克休同蒋介石夫妇交往甚密，常常充当他们的喉舌。

尽管如此，当要在东西方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马歇尔还是没有动摇。4月9日，日本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袭击了锡兰，这证明韦维尔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时，马歇尔同意派第十航空队保卫印度。这是美国对英国同意开始在不列颠群岛集结军队付出的代价。英国集结军队是准备横渡英吉利海峡，攻入欧洲。以马歇尔为首的一批美国人一心想攻入欧洲，英国人则不大愿意，于是美国以保卫中东和印度作为条件。马歇尔的幕僚提醒他说，他的决定"会给中国局势和史迪威的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但是，中国的利益实际上是被放在第二位的。为了掩饰这一点，马歇尔对委员长和史迪威说，加尔各答和印度东部沿海地区遇到的威胁"不仅危及到了印度本身，而且给我们今后继续支持中国的能力构成了威胁"。

史迪威希望得到空中支援，但只能满足于精神支援。马歇尔对他说："我向你保证，你所尽的努力从世界范围来说起着明白无误的重要作用。"但是，这无助于阻止日军前进。由于飞机不够用，马歇尔只能作此表示而已。

史迪威4月16日写信给他的妻子说："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要挨揍了。"第一次实际指挥军队作战就吃败仗，这种前景使他感到痛苦，他一心想报仇雪恨。他已经在制订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不管英国把缅甸看成什么，缅甸在他的心目中仍然是通往中国的重要走廊。他认为最后要同日军在中国决战，而且，他希望美军同他指挥的中国军队一道同日军决战。

史迪威在这种大难之中制订了重新打回缅甸的计划。按他的计划是把中国军队运到印度，在美国人指导下训练和装

备成特遣部队，然后重新打回缅甸。他从来没有公开宣称“我要打回来”，但是，这是他钢铁般的决心。他立志要打败现在打败他的敌人，要证明中国军队只要领导得当，就能打胜仗，就能自己拯救自己。4 月 16 日，他派自己的一名参谋把计划送往重庆，征求委员长批准。

作为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指出，经缅甸北部通往中国的陆空供应线很可能被日本空军切断。因此，如果武器运不到中国军队手里，中国军队就必须去取武器。他建议在印度组建和训练两个军的中国部队，每个军下辖三个师，团长以下的军官由中国军官担任，团长以上的指挥官和参谋长先由美国军官担任，到中国军官有能力指挥时再换成中国军官。他极大胆地提出了如何把军队运到印度去这个关键问题的解决办法，提议“在美国空运公司尽可能的帮助下”，从密支那把军队经孟拱和信宾扬，越过缅甸北部，沿利多公路运到阿萨姆境内的火车起点站。美国通知史迪威，说已经调集了二十五架运输机，正飞往阿萨姆，准备开始行动。他希望中国军队 5 月 15 日开始调运，那时已经进入雨季。他知道那是最糟糕的时候，因此人们只能推测他选定这个尽可能早的日期是估计到蒋介石无论如何不会同意在那一天开始行动。

史迪威把“收复缅甸”定为这项计划的目标，主张从印度发动决定性主攻，让中国其他部队从云南采取辅助性行动。他从来没有改变这项计划。两周后，蒋介石“总的来说”是批准了这项训练计划，条件是如果印度人民举行起义，不得让中国军队帮助英国进行镇压。美国陆军部也批准了这项计划，因为它符合美国的让亚洲国家军队在亚洲大陆作战的原则。

史迪威对守住缅甸北部还抱一线希望，他想用卡车和火车把二〇〇师调去填补中国军队和英军阵地之间的缺口，但是，事实证明他的努力是枉费心机。这时，总部得知对东京发动杜利特尔空袭的消息。这项非常冒险的任务本会使陈纳德的航空队增加十六架 B-25 型飞机。但结果这十六架飞机统统报销掉了。由于飞机从停泊在比原定距离远的位置上的航空母舰上强行起飞，结果燃料耗尽，坠落在中国日占区或附近地区。飞行员被中国人营救，但日军却对飞行员降落的地区大举扫荡，残酷地进行讨伐，并出动五十三个营的部队，摧毁了中国境内的一些美国可能再出动飞机轰炸日本的机场。这次英勇的杜利特尔袭击虽然牵制了敌军部分兵力，但是，它的主要目的是扫除美国人民的沮丧情绪和打破生产停滞状况，是为了在盟国普遍情绪低落的情况下让大家看到最后胜利的希望。这次空袭达到了这些目的，但是，它也使许多中国人家破人亡，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更大不满。出于保密考虑，从中国国土上进行的这次行动直到执行前一周才告诉蒋介石。蒋介石坚决反对，担心敌人会进行报复，会摧毁浙江省的某些机场。但是，美方告诉他，这项计划已经准备妥当，无法取消。这件事无助于说服蒋介石相信中国受到了平等对待，更不用说让他相信中国被视为大国了。在缅甸，这项行动更使官兵们感到自己孤立无援。当天空出现飞机的时候，他们已不再仰首眺望，因为肯定是日本飞机。

4 月 20 日，决定性的打击来到了：绕道向腊戍挺进的日军突破了盟军东翼防线，击溃了五十五师。“垒固遭祸。五十五师溃不成军……甘丽初胆颤心惊……天哪，这会把我们彻

底压垮。”敌军从中线打开缺口，然后从两翼包围了九十六师。“看来好象这里也会垮掉。天哪，派赛伯特去了解情况……电话线全断了。英军会离开我们跑掉吗？是的。这种结局越来越明显了。”

史迪威在以后的几天里拼命努力堵塞漏洞，重新集合力量，商定计划和按计划部署混乱的部队，但仍然阻止不住崩溃趋势。没有几支中国部队开到要他们去的地方，也没有几支部队进入阵地，因为找不到卡车。史迪威顺便指出，“4月18日前后，腊戍有六万五千加仑汽油和八百五十辆卡车”，但是，卡车都忙于把物资运往中国，无暇运送部队。铁路线不是被封锁，就是开不了车，找不到指挥官，军纪越来越涣散。联络军官送来了“一些官兵不服从命令和开小差的消息”。（史迪威在日记里的题外话中记下了“士兵们在我陷入困境时看着我的那种样子，他们毫无表情，他们是要看我如何忍受。好象是在说‘我不知道这是否会使你垮掉？’”）

杜聿明将军和甘丽初将军唯恐自己的部队蒙受损失，因而不让部队前进，甚至下令撤退。有一次，有位师长请战，但他们还是下令撤退。日军一支先头部队占领了重要据点东枝，史迪威亲自冒着猛烈炮火，指挥一连中国部队发起进攻，想收复东枝。他命令坚持到增援部队到来。后来，在罗卓英的提议下，史迪威宣布，如果部队五点钟以前拿下东枝，就发给五万卢比奖金。结果，东枝很快就攻下了，比规定时间还提前了一个小时。但是，他提出的相反的办法却没被采纳。五十五师全部逃进了山地，史迪威要求将该师师长陈将军处决或送交军事法庭，结果没受到理睬。对于五十五师，他有些心

寒地对贝尔登说:“一点也搞不清它的行踪。这是我所看到的最该死的部队。昨天晚上还有一个师，今天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

史迪威在一份定期总结报告的结尾说:“这是最糟糕不过的局面,我必须尽可能弄个明白。蒋介石使我什么也干不了，我现在也可以承认这一点了。”委员长到腊戍来是一场闹剧，“我完全受骗了,我简直是个笨蛋……我当时还以为他是诚心诚意……”史迪威根本管不住高级指挥官,除了孙立人和另外几个人外,其余的人满脑子浸透了委员长的思想,都认为打防御战得有三比一的兵力，打进攻战得有五比一的优势。史迪威很羡慕八路军。正如他常常跟他的参谋人员所说的那样，他希望“那些共产党人到这里来作战”。

中国囤积物资,以备应付将来更加紧急的情况,这是阻碍作战的又一个障碍。中国人长期以来什么东西都短缺，因而囤积物资成了他们的一种痼癖。第五军有九辆坦克，委员长从重庆亲自一辆一辆地调动,结果,九辆坦克作为一支坦克部队所能起的作用给破坏掉了。亚历山大有次看到中国士兵熟练地挖好炮位，出色地架设起野战炮，并仔细地进行了伪装。次日，他在东吁问杜聿明那些大炮怎么样了，杜聿明说，他已经把它们撤到安全地区去了。

“那你的意思是说不用它们打仗啦?”

“正是这样。”

“那要它们有什么用呢?”

“将军，第五军之所以是我国最精锐的部队，就是因为它是唯一拥有野战炮的一个军。拿它们去冒险我担当不起。如

果我损失了这些大炮，第五军就不再是我们最精锐的军了。”

由于日军朝腊戍进攻，盟军的东翼发生了变化，使战斗打下去的希望化成了泡影。日军乘坐卡车，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越过东枝，推进到东枝以北很远的地方，正沿公路朝腊戍前进。史迪威集中第六军兵力的努力全失败了。他要求派来一百五十辆卡车，但是，设在腊戍的中国物资处只拨给了二十二辆。在中线，第五军遭到猛烈进攻，再往西，日军在向钦敦江推进，想插到盟军和印度之间。盟军面临到两面受围的危险。

4月25日晚上，史迪威和亚历山大在曼德勒以南二十五英里的皎施同罗卓英和杜聿明召开会议。史迪威戴着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斗帽，穿着美军卡其军装，没有佩戴勋章和绶带，一点也没有摆架子的样子。西格雷夫瞥了他一眼，发现他显得“非常疲惫”。罗卓英显得“肥胖，满脸不高兴神情”。杜聿明“让人捉摸不透，紧绷着脸”。大家一致认为，唯一的出路是全部撤退。一旦承认了这一点，这场战役就变成赶在被日军拖住之前从速撤退了。在东部，溃不成军的第六军、驻在东枝的二〇〇师以及中国刚沿滇缅公路调来的另外两个师可以撤往中国边境。亚历山大和史迪威的主要问题是让缅军和中国三十八师、二十二师和九十六师经过曼德勒，渡到伊洛瓦底江西岸，然后，英属部队往印度撤，中国部队取道密支那往北撤。伊洛瓦底江上唯一可以通过坦克和大部队的是阿瓦铁路桥和曼德勒公路桥。按计划，等部队全部撤过江后，要把桥梁炸毁。英国早在2月份就作好了炸桥的准备。

史迪威在看着亚历山大口授全面撤退命令的时候，想起了中国的一句“吃苦头”的说法。唯一令人感到安慰的是没有命令部队象在新加坡和爪哇那样投降。敌人的六架轰炸机在开会地点上空轰鸣，这进一步突出了盟军的失败。军官们争先恐后地寻找掩体，一颗五百磅的炸弹落在不到一百码的地方，爆炸声震耳欲聋。在敌机袭击过程中，亚历山大一直若无其事地直挺挺地站在院子里。史迪威也不示弱，他把身子倚在走廊的栏杆上，以罗斯福吸烟时的那种角度斜刁着琥珀色烟斗。

盟军总部撤到曼德勒以北五十英里的瑞冒，日军的飞机也追击到瑞冒。参谋人员不仅越来越意识到在军事上已陷入灾难，而且越来越感觉到个人生命的危险。据一些人自己说，他们“提心吊胆”，有些人意志消沉，不知所措。铁路问题最糟糕。史迪威决心搞到运兵列车，以便把二十二师撤走，但是，中国军队的组织工作松松垮垮，什么事也办不了。由于史迪威的幕僚按明文规定没有一个人有权对中国军队发号施令，他不得不亲自返回曼德勒，力促中国军队赶快开始行动。在返回曼德勒途中，他挤在源源不断的撤退队伍中走过伊洛瓦底江大桥。在桥的下面，部队在乘渡船过江。通往瑞冒的公路上挤满了卡车、弹药车和难民的堆满什物的板车，人们顶着烈日，沿着尘土飞扬的道路撤退，一片阴郁恐惧气氛。昔日趾高气扬的锡克人一个个蓬首垢面，戴着破烂头巾。中国士兵一个个眼睛里流露出恐惧神色，他们在这个异国的土地上不能脱掉军装溜到农村去。公路旁躺着几具身穿黄袈裟的和尚的尸首，他们是被中国士兵认为是化装的间谍开枪打死的。

日本的零式飞机不时飞到上空盘旋，用机枪朝公路扫射。坐在小汽车里的中国将军和自认为是“当地人”的英国军官希望不丢面子，但是，大家都意识到，在亚洲和全世界的眼里，“最糟糕的是在我们自己的眼里”，大家都声誉扫地了。

4月29日，日军收紧了包围圈：在东线，他们占领了腊戍，切断了滇缅公路。在西线，他们占领了钦敦江畔距瑞冒只有六十英里的望濑，使英军撤往印度的道路受到威胁。英军现在得从速赶在日军之前到达钦敦江的加列瓦渡口。在撤军路线储备食品和饮水的工作不得不在最后一分钟中断了。盟军决定在4月30日午夜炸毁阿瓦大桥。为了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同中国军队保持联系，史迪威原打算把自己的总部迁到密支那，但是，由于腊戍失守，日军可能越过山岭直捣密支那，结果没有迁成。他决定把自己的大部分参谋人员用飞机送到印度去，而他自己跟罗卓英一道到腊戍一线的莱温去。5月1日，史迪威打电报要求派一架飞机来把他接走。他的参谋人员一个个热得头昏脑涨，他们靠吃米饭度日，因为今后的形势艰难莫测，得把罐头留下来备用。他们不耐烦地大吼大叫，大骂中国人一再不履行协议和不执行命令，一致认为应该让自己的“上司撵中国人滚蛋，让他们在能滚开的时候赶快滚”。炎热、失败、恐惧、对友军的厌恶和遭到遗弃的失望感等一系列因素使他们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

4月29日，史迪威收到一份电报，说蒋介石原则上同意派军队到印度受训的计划。史迪威的心思此刻全部凝聚在这项计划上了，就象水手心里总是想着北极星一样。“哎呀，即使我们只能把十万中国军队运到印度训练，我们也算是有收

获了。”他立即给马歇尔打电报，要他保证予以支持并提供物资，因为否则就全得靠英国，“而那样将是很不幸的”。他周围所有的人这时一心考虑的是离开缅甸，而他却坐在破旧的电风扇下，对美联社记者达雷尔·贝里根讲述他打回缅甸、重新打开通往中国大门的战略。他认为盟军可以以中国为跳板进攻日本。马歇尔把史迪威的电报转呈给总统。由于缅甸即将丢失，总统又开始忧心忡忡，担心中国退出战争。罗斯福4月28日宣布“要另寻途径把飞机和弹药运给蒋介石委员长的军队”。他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将来，“一个不可征服的中国不仅会在维护东亚和平与繁荣方面充分发挥应有作用，而且会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方面充分发挥应有作用”。他说这话好象是为了使蒋介石放心，也好象是为了使自己放心。

5月1日，史迪威醒来时发现首席执行官罗卓英将军已经逃往密支那机场。罗卓英用枪硬逼着一列挂有十七节车厢的火车开车，那列没按点运行的火车开出二十五英里就同另一列火车相撞，结果使铁路两天无法通车。“不幸的是他没有被撞死。”罗卓英的逃跑甚至使赛伯特都感到伤心，赛伯特在这之前还一直主张坚持打到底，虽然他周围的人满腹牢骚。这时，他恳求说：“天哪，乔，让我回国吧。”莱温被封锁了，但是，史迪威仍觉得应该尽力保证在中国军队撤退道路沿线准备粮食。参谋人员说他应该到德里的总部去。但是，史迪威说：“不能。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不能去。”由于盟军连吃败仗，其中包括美军在菲律宾遭到失败，西方的威望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低过。照料他指挥的中国军队是他的责任，因为那些军队至少从名义上说是他指挥的。“如果我现在逃跑，就会

又造成一次失败，又造成一次投降。那我以后就再也无法指挥中国军队了。”

史迪威坐下来，按名单把他的参谋班子分成两组，一组人前往德里，另一组人跟他留在缅甸。亚历山大“满面愁容地”走了进来。这是他们在缅甸的最后一次会晤。次日，亚历山大向英军发布了最后撤退的命令，他自己乘小汽车前往一百零七英里以外的钦敦江，步行前往的人得走六天。他们赶在日军到达之前渡过了钦敦江，但被迫抛弃了坦克、大炮和许多车辆。江对面已经准备好了交通工具和粮食。在5月12日至20日期间，缅军共有一万二千人七零八落地撤到印度境内，他们在四个月的战斗中共伤亡和失踪了一万三千五百人。亚历山大在5月20日停止行使指挥权时发表了告别讲话，他说：“我们当然要收复缅甸，因为它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在那之后不久，他返回伦敦，继续指挥“体育家”行动，想在突尼斯挽回声誉。他以后再也没有到缅甸来过。

亚历山大和罗卓英走了，史迪威留下了。有一次，他和几个人一块玩牌，突然敌机前来袭击，伙伴们四处躲避。敌机飞走后，他们回来时看到史迪威还坐在桌旁“专心致志地摆弄纸牌”。现在，日军已占领曼德勒并在朝前推进，连他们的炮声都可以听见了。史迪威对贝尔登说：“这真是个盛大的五一节。一切东西都丢光了，所有的人都走了。”

那天傍晚，飞来了一架美国运输机，驾驶飞机的是新成立的阿萨姆—缅甸—中国空运队队长卡拉布·海恩斯上校和执行军官罗伯特·斯科特上校。该空运队已在十天前开始活动，使用的是非武装的道格拉斯C-47型(DC-3型)飞机。飞

行员们不喜欢自己的任务和飞行路线，他们把 C-47 型运输机叫作“信天翁”，因为这种鸟常常习惯性地往回飞，以看看自己起飞的地方。海恩斯和斯科特接到哈普·阿诺德将军的电报，命令他们“立即飞往瑞冒附近，赶紧把史迪威及其参谋人员撤出来。”

海恩斯和斯科特被领进史迪威设在一家茶园主住宅中的总部里，发现史迪威将军正戴着他那顶旧帽子，伏在桌子上写东西。斯科特虽然不很得体，但颇带戏剧味道地对史迪威说：“先生，阿诺德将军派我们来搭救你。”斯科特是位英雄人物，他后来参加了陈纳德的歼击机队，击落相当多架日本飞机，取得显著战果。史迪威给最后这段日子的紧张战斗搞得削瘦憔悴，他透过无框眼镜注视着这两位“飞行小伙子”，拒绝接受这种特殊优待。这两位飞行员目瞪口呆。他们告诉史迪威，他们看见敌人的部队正朝瑞冒开来，距瑞冒已经不到二十英里了。史迪威没有动摇。从军队溃败时起，他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把中国军队撤出去。这是他作为指挥官的职责，他认为决不容许逃避履行这种职责。他欢迎飞机把参谋人员接走，但是，他本人打算乘火车、卡车、吉普车或可以搞到的其他任何交通工具到密支那去，他期望到那里后能同中国军队联系上。

史迪威没有说明他为什么决定这样做，这是他表示拒绝时的一贯做法。他就是这种脾气的人，就跟他不愿佩戴勋章绶带一样。身为三星将军，他觉得没有义务向两位空军上校解释自己的考虑，另外，他也不愿向粗率和缺乏领悟能力的陌生人吐露自己内心的想法。在这两位飞行员看来，一个头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破旧帽子的老家伙在距敌军不到二十英

里的地方坐在桌子后面拒绝空军营救，荒唐地表示宁愿在地上行走，简直是对他们的侮辱。后来，经过斯科特绘声绘色地描述，这件事竟成了陈纳德的崇拜者们证明“喜欢步行的乔”不理解空军力量的论据。

史迪威让他总部的部分人员乘那架飞机离开缅甸，命令罗伯茨“去给我找一个训练中国军队的地点，你是知道我的要求的”。他带领剩下的人员往北行六十英里至温托，希望能克服铁路线上的障碍。每个美国人现在都在考虑自己逃生的可能性。他们的车辆顶着酷暑，在干燥荒凉的乡间布满车辙的道路上艰难地向前行驶，常常因发动机过热而发生故障。他们在沿途超过中国军队的一些卡车，每辆卡车都挤得满满的，而且还有不少人象群蜜蜂似地扒在汽车边上。在温托，负责运输的军官保罗·琼斯在路上几次跳下车，亲自用撬棍推动陷到坑里的小汽车前进。琼斯从 1934 年在圣迭戈随后备役人员在史迪威领导下接受训练起就一直一心一意地跟随着史迪威。史迪威前去找第五军军长“谈供应问题”，但第五军军长没有任何计划，而且也不感兴趣。后来，蒋介石发表了三份因无线电受到干扰而电文有错漏的电报，但也无济于事。史迪威找到了罗卓英，但罗卓英要他晚上八点再来见他。史迪威到约定时间去找他，发现他住的屋子没有灯光，人全都跑掉了。史迪威意识到自己应该适可而止了。“显然，我们现在不会再有多大作为了。”他断定现在是走的时候了——如果可能的话，可以乘火车到密支那，如果不行，就往西向印度撤。他打电报给马歇尔说：“中国控制局势的力量非常弱，我相信很快就会垮掉。”他同时还向马歇尔报告了自己的打算。

史迪威现在掌握着几辆破汽车，手下大约有一百名人员，其中有十八名美国军官和六名美国士兵、西格雷夫的医疗队的两名医生、十九名缅甸护士和十六名中国卫兵、英国公谊会救护队的七名人员、九名印度、马来亚和缅甸籍厨师和勤杂工、七名失散的英国军官和英国难民，还有美国传教士凯斯先生、杰克·贝尔登和其他一些掉队的人。凯斯是彬马那农学院的院长，会讲山区部族人的方言。贝尔登在英国命令所有记者撤离缅甸时没有离去。十八名美国军官中有梅里尔、赛伯特、斯利奈伊、麦凯布、怀曼、费里斯、军医官威廉斯、副官多恩、副官扬以及预备役军官保罗·琼斯和弗雷德·埃尔德里奇。埃尔德里奇过去是专门采访警察系统的记者，后来在奥德堡担任新闻官，他在这个队伍里也是担任新闻官。

派到前面侦察的琼斯报告说，铁路阻塞，无计可施。史迪威决定沿着同铁路线平行的小路再继续朝北走一天，然后沿公路朝西走，不去达武山口，而是沿更北的一条路线走，以便尽可能赶在日军之前渡过钦敦江。这支队伍打算顺着公路一直走到尽头，然后走小路到钦敦江的支流乌尤江，乘木筏顺江而下，到两江汇合处。他们打算在霍马林渡过钦敦江，然后继续翻山越岭，前往印度的英帕尔。有人警告史迪威说，这条路线很少有人走过，路途艰难。他之所以选择这条路线，为的是避开源源不断的难民和中国逃亡军队。最令人担心的是，由于食品短缺，难民变得跟敌人一样危险。除了逃难的老百姓之外，中国三个师的军队也可能沿着伊洛瓦底江西岸的路线逃跑。一百万印度人已经离开或正在设法离开缅甸，其中许多人在逃亡途中精疲力竭，有的人因饥饿和疲惫而毙命。成

千上万的人还在朝山里走，后来他们返回时，在路旁看到那些累死的人的白骨。有两名英国准将领着十二名英国军人撤退，他们极力劝说史迪威跟他们一道沿一条比较直的路线走，但史迪威拒绝了。几个星期后，史迪威得知，那队英国人遭到日军伏击，有几人被打死。

5月4日至5日，他们一路上一直不得安宁，不是汽车发动机烧坏，就是轮胎漏气，而且不断听说附近发现敌人。每次耽搁史迪威都非常恼火。雨季马上就要到来，因而更需要加快行进速度。他们过去是希望雨季快点到来，而现在雨季成了对他们的威胁。大家的心绪越来越坏。西格雷夫无意中听到有几个人议论说“应该给护士们一点钱，把她们打发走，省得她们给大队造成累赘”。他把这话告诉了史迪威，那几个人“马上”受到史迪威“训斥，再也不敢作声了”。贝尔登记载说：“大家都失去了自信心。”“失败给大家造成了巨大影响。”罗卓英将军又来了，他没能逃到密支那，沮丧地跟一批中国难民一道逃到这里。在英都，大家想利用最后一个机会搞到一列火车，结果是枉费心机。英都市区秩序混乱不堪，士兵们恣意抢劫，许多老百姓奄奄一息。英国军官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大英帝国完蛋。一些中国士兵用手扒着卡车，车上的士兵用枪托猛砸他们的手。史迪威后来说，英都市的混乱状况是他在远东看到的最糟糕的情景之一。他警告他手下的人说，他们可能得作一番斗争。“继续前进，千万别停下来。”

他们在英都离开了铁路线，进入了一片遮天蔽日的陌生的树林。除用一台无线电报机联络外，他们断绝了同外界的一切联系，渐渐地与世隔绝了。史迪威一点也搞不清哪儿有

敌人，有一次，他把路上走的一队士兵当成日本人，把大家吓了一大跳。“上帝，我一生从来没有这样担惊受怕过。”队伍不断耽搁之后（哎呀，我能马上找到他们多好！），到晚上才集合在一起。西格雷夫领着护士们唱起《前进，基督教战士》。听到她们圆润、细弱的歌声，大家都停止了咒骂和抱怨，安静了下来。史迪威正想登上一辆吉普车，他也站着不动了。沉默了一阵后，队伍又在蔽天大树的阴影下，继续朝西前进。森林里不时地传来大象的吼声。在经过一片浅滩时，有几辆卡车陷入泥淖，这时，有一伙中国人“从我们当中穿过”。史迪威不顾一切地继续赶路，下令把陷在泥坑里的卡车丢掉。他到夜里十一点才让扎营休息，“我认为得赶在雨季前面”。

5月6日早晨，队伍集合的时候，史迪威发现多了十五名英国突击队员。他们一个个胡子拉茬，衣服肮脏，饿得半死，为首的是一个名叫戴维森·豪斯顿的上校。史迪威粗声喊道：“你们是从哪儿来的？有口粮吗？”他们摇了摇头。史迪威瞪了他们一会儿，同意让他们留下。这批人的到来，为大家增添了一个有用的人，他是巴顿少校。巴顿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丛林地区度过的，在缅甸呆了很多年。这支队伍现在共有一百一十四人了。那天经过一天的行程，走到了道路的尽头，除运载补给品的吉普车外，其余车辆都不得不抛弃，就连运载电台的卡车和二百磅重的电台也不得不扔掉。史迪威最后发了几份电报。担任报务员的军士专心致志地发报，他按动电键，焦急地收听，接着又发报。史迪威发给在印度的布里尔顿的电报是告诉他行军路线，并告诉他“我们的粮食越来越少了，眼下也找不到食物”。史迪威要布里尔顿把食品、担架

和药品空运到霍马林，等队伍到那里后取用。他还要布里尔顿通知印度政府，数以万计的难民和中国军队正沿着北至户拱山口的各条小路逃往印度，得赶紧在沿途准备粮食、派遣警察和医生，“否则会有成千上万人死亡……大批人在路上，毫无秩序，可能会发生灾祸”。史迪威率领的这批人大概能在三天内赶到乌尤江。“这是我们给你的最后一份电报。”史迪威在经重庆转给陆军部的电报中没有提他们极端糟糕的处境，因为陆军部反正也帮不了什么忙。“我们有武器，有粮食和地图。我们现在在英都以西五十英里的地方。不必为我们担心。中国军队也走这条路线前往印度……我想这大概是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给你们的最后一份电报。再见。史迪威。”发完电报后，他们用斧子砸碎收发报机，把密码和卷宗全部烧掉了。

那天晚上，他们第一次碰到好运气——遇上了一支中国马帮。那支马帮有二十只骡子，赶牲口的两个人一副无赖相，满脸凶气。他们在“北山”卸了货，现在正前往印度。史迪威怀疑他们是向中国贩运鸦片的走私贩。史迪威雇用了这支马帮，此外还在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同当地头人协商，雇用了六十名挑夫。（当地人都是“好人”。）

天亮后，史迪威站在一辆卡车上向大家讲话，他说明了行军计划，宣布了几项决定。他规定，所有的食品全部集中起来，每个人除武器和弹药外，凡是带不了的个人物品统统扔掉。前面大约还有一百四十英里的路程，途中要渡过一条河和翻越一座山岭，山口海拔七千英尺。他们一天得走十四英里，如果达不到这样的速度，食品就会不够吃，而且有遇上大

雨的危险。史迪威警告说，只有严格执行纪律，大家才能活命。凡是不愿服从他命令的人，现在可以离开队伍，发给一周的口粮，自走自的路。他扫视了大家一眼，谁也没有动。他最后说："在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你们当中有许多人会对我恨之入骨。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大家都能活着出去。"

史迪威走在队伍最前面，以正规军队的每分钟一百零五步的速度领着大家前进。卡斯纳将军的幽灵伴随着他前进，但是，他本人是这支队伍中唯一的一个曾在第十五步兵团进行过急行军的老兵。从第一天起，许多美国人热得筋疲力竭，一个接一个地掉队。缅甸的5月，正值雨季来临前夕，是一年中最闷热的季节。史迪威对这种软弱表现和"该死的差劲体格"非常恼火。他允许每走一小时休息五分钟，但是，除了那五分钟外，任何人不得放慢速度或停下来。当走到河边时，他毫不犹豫地跨进水里，一面执拗地看着自己的手表，计算每分钟走一百零五步，一面泰然地涉水前进，其余的人排成长长的一路纵队，跟在他后面。由于许多人感染上虐疾和痢疾，体质虚弱的人越来越多，队伍的行进速度减慢了。史迪威不得不把休息时间延长到十分钟，他知道时间延长一小时就会增加一些艰难困苦。有两名军官中暑昏倒，不得不让已经超载的骡子驮着。威廉斯上校的药箱在宿营的时候被人偷走，"这是个极大的损失"。他们在途中经受了千难万苦：蚂蚁水蛭叮咬、驮包破散、挑伕逃跑、路途荆棘丛生、烈日暴晒、许多人腿上生疮，有一次还遇上了一头凶猛的野象。艰难困苦使大家把残存的一点友情也抛掉了。史迪威发现有位军官把自己所有的衣物全卷在铺盖里放在挑伕的担子上。他没有点名批评他，而是

针对大家提出严厉批评，说他们把什物放在骡背上，使骡子少驮了一名病员。他气得说话时声音颤抖，眼眶里含着泪水。有一个人敬畏地低声说："天呀，连他头上戴的战斗帽看上去都好象是怒不可遏。"

梅里尔在过河时中暑昏倒，再加上他心肌衰弱，不得不把他放在气垫子上拖过河，然后让人用担架抬着走。他昏迷了两个小时才苏醒过来。另外一些人步履蹒跚，有的掉了队。威廉斯恳求史迪威停一会儿，让病员休息一下。史迪威回答说："队伍不能停下来。威廉斯，你和我能忍受，我们两人比他们任何人的年龄都大，他们为什么忍受不了？"他用喊骂和惩罚逼着大家继续前进。他一直为一百多人的口粮担心，命令大家把口粮定量减少一半，并指定多恩担任事务长，以防止有人多领。在大家排队领食品时，他每次都坚持最后一个领。他要求男人晚上轮流放哨，并在白天组织尖兵队，以防遭到日军伏击。

队伍在史迪威规定的三天时间里赶到了乌尤江。提前赶到的通讯兵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木筏。马帮由一名美国军官领一队中国卫兵护送，从陆路前进。西格雷夫手下的"始终乐意干事的"护士们用树叶在木筏上搭起顶篷，以遮住灼人的阳光。她们还把医院的草帘子铺在木筏上，让梅里尔和其他病弱者躺在上面。当大家撑着木筏，沿江而下，驶往钦敦江时，许多人心里对要前往的目的地产生了恐惧感，但谁也没说出来。保罗·琼斯问道："这会是萨马拉约会吗？"木筏的行进速度"慢得要命"，史迪威要大家昼夜兼程，一刻也不让停。第二天下起雨来，这是不吉之兆。突然，上游飞过一架轰炸机，它

在空中转个圈，又兜回来。大家都吓得浑身哆嗦，但后来看清了机身上的英国皇家空军的红蓝两色标志，大家欢腾雀跃，拼命朝飞机招手。飞机在低空兜了三个圈，然后打开投弹舱，把成包的食品投在江岸上。就在这个时候，有一群半裸体的、黧黑的山地人从树林里冲出来抢东西，木筏上的人狂怒地吆喝。当他们上岸时，第一批空投下来的物品已经被山地人抢跑了，他们只得到了剩下的东西。空投下的物品中有一包药品，威廉斯上校又可以给病人服用奎宁丸了。由于自己的困境突然为外界所发现，大家都产生了希望，相信一定会有人等在霍马林营救他们。史迪威坐在木筏上向贝尔登讲述了他收复缅甸的计划：如果美国提供飞机和物资……如果英国改编军队……如果中国予以合作……等等。贝尔登说："我们首先得设法从缅甸出去。"他们又通宵不歇地撑了一夜木筏。木筏在黑夜里触礁撞散了，史迪威"通宵搞得疲惫不堪"。

他们从乌尤江步行到达霍马林，但大失所望，因为那里没有人等他们，没有食品，也没有音信。这使史迪威的领导地位受到了削弱。有些人嘀嘀咕咕地发泄愤恨和进行指摘，有些人开始盘算如何自己逃命。史迪威准备第二天渡过钦敦江。由于估计可能会同敌人遭遇，他命令大家检查一下各自的武器。他们在钦敦江没有遇到日军，乘独木舟和货船平安地过了江。

过江后，掸族和克钦族挑伕换成了肤色黝黑、衣着邋遢的那加族人和唐库尔族人，他们象易洛魁人那样剃着光头，只在后脑勺留一小撮长头发。他们的耳垂上都有孔，他们常常把子弹、香烟或鲜花夹在耳朵上。他们脾气很好，待人友善，喜

欢饮米酒，能用木制驮架背五十磅重的东西。5月14日，当队伍正吃力地爬一座海拔三千英尺的山岭时，天突然下起倾盆大雨，大家几乎都绝望了。但是，就在那一天，他们遇到了在霍马林没有遇到的救助：一个名叫夏普的英国县级官员给了他们几头活猪，使他们吃上了一顿烤猪肉。而且，夏普还告诉他们，等一会儿有人要给他们送来马匹、食品、威士忌酒和香烟，还要来一名医生和四百名挑伕。史迪威在日记中只淡淡地写道："这下可松了一口气。"夏普后来担任向导，领他们前往英帕尔。原来，给史迪威的信装在英国皇家空军那架飞机空投的食品包里，而那个食品包被山地人抢走了。史迪威问夏普，那片山区里共有四条道路，他是怎么知道该从哪条路迎接他们的队伍的。夏普回答说："我先要德里查清你们是哪种类型的人。德里说你们非常精明。按常识一般都应该走这一条路，因此我相信你们会从这条路来。"他要史迪威放心，说已派人在其他道路沿线准备食物等物品。夏普也带来了一个糟糕的消息：菲律宾的科雷吉多尔投降了。

(44)

后来，他们又接着爬了五天山，为了在雨季前赶到目的地，每天的行军速度增加到十五、六英里，下山时的速度超过十七英里。已经开始下雨了，道路变得很滑溜，不时有人滑倒，大家跌跌爬爬地前进，大声地咒骂着，常常不得不走小路，慢慢向山里爬。西格雷夫腿部感染，有一天走完路后实在筋疲力竭，一动也不想动了，"裹着我的毯子躺在地上，只求一下子痛痛快快闭眼死掉"。但是，大家现在有食物吃了，伤病员也都有马骑了。有一个人得了严重疟疾，体质虚弱得骑不了马，只好由挑伕轮流用轿椅抬着走。那些"懦夫"和"胆小鬼"表现

得好些了。意志坚定的护士们唱起基督教圣歌和美国流行歌曲。“中国士兵、缅甸姑娘、美国人和英国佬们都在小溪里洗脸或刮胡子，大家把脚浸在溪水里……多么美好的景色啊！”当地一位身披鲜红毡子的头人送给史迪威一头羊，前来欢迎的那加人送来了米酒和鸡。

队伍 5 月 20 日到达了英帕尔。史迪威凭着细致周密的计划和不讲情面的纪律，把大家领出了缅甸，一个人也没减少。他们是到达印度的队伍——不管是军人还是老百姓的队伍——中唯一的一支不曾死亡一个人的队伍。他领着逃出缅甸的人中确实有很多人对他恨之入骨，但是，这一百一十四个人个个都知道，自己能活着出来多亏有史迪威。一位记者报道说，史迪威走来时，“看上去好象上帝发怒，象个恶魔似地嘴里骂个不停”。他的体重减少了二十磅，本来就很瘦小的身躯衰弱到了极点。他的双手不停地颤抖，由于黄疸病，皮肤呈浅黄色，眼窝深陷。多恩的体重减轻了三十二磅。霍尔库姆上校是从开始撤退后不久就一直患病的人之一，他“面容憔悴，外形有点象甘地”。人们没有听到中国军队的消息。

有一份马歇尔发来的“令人愉快的电报”在等着史迪威。马歇尔在电报中转达了“陆军部长、总统和陆军部全体成员”对他的赞扬。但是，史迪威只知道自己的目的全失败了，因此他只写了一个词的评论：“为什么？”作为一个军人，蒙受耻辱得要有正当理由。他在后来写给陆军部的缅甸战役情况报告中对英国人和中国人没有尽到责任大加挖苦，以致陆军部下令把报告副本统统销毁，但实际上没能完全销毁掉，因为这样的命令自然不可能被完全执行。史迪威报告中的言外之意

是，英国人的表现只能使他得出一种解释，这就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坚守缅甸，而是故意放弃缅甸，以削弱中国的力量。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往往不如人们信以为真的事情重要。

史迪威在别处把这场失败的原因归纳为技术上的劣势（包括空军、坦克、大炮、机枪、迫击炮、弹药和运输工具等方面的劣势）、老百姓的敌对情绪、日军的主动精神以及“愚蠢的毫无生气的指挥、蒋介石的插手、英国人的铁路管理工作混乱不堪、联络系统不中用、英国人的失败情绪和盟军在战术上处于挨打境地”等等因素。史迪威在这里对敌人的称赞太少。日军在缅甸作战所遇到的实际困难并不比盟军少，在战术上所遇到的困难则比盟军更大。关键的区别是双方的意图不一样，进攻者是根据自己的力量制订计划、进行准备和采取行动，而守卫者没有制订计划，没有进行准备，也没有坚强的毅力。

在史迪威撤离缅甸期间，日军沿着滇缅公路向中国发动了进攻。他们在大败新调到缅甸的二十九师之后，于5月8日攻占畹町，而且在撤退的中国军队炸桥后不久打到了萨尔温江峡谷深处。驻扎在云南的中国军队着实很惊慌，他们在美国志愿团的有力支援下同日军奋战，想挡住日军的进攻。日军在华南的那片山区里锐气受挫，而且已经达到了从南面封锁中国的主要目的，于是他们停止了进攻。

华盛顿对中国的态度极为担心，因为中国同外界的联系现在已完全被切断。马歇尔5月9日在史迪威不在的时候向

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发布了严格命令，要在中国的所有美国军官务必“继续对中国的前途持沉着和乐观态度”，无论是在制订计划时还是在谈话时，都不得让人觉得美国是认为“局势已毫无希望”，人员的行踪必须严加限制，避免可能被人误认为美国人要撤退。

中国派到缅甸的各支部队的命运不一样。孙立人率领的三十八师5月25日开始撤退，走的是史迪威一行稍南一点的一条路线。他们历尽艰辛，最后于5月30日秩序井然地撤到印度境内。第五军的二〇〇师同第六军的残余部队一道杀出一条血路，逃到了云南。第五军的二十二师和九十六师拼命朝北杀，但是，由于蒋介石对他们朝令夕改，他们不断改变行军路线，结果多跑了一倍路程，最后被滂沱大雨阻滞在西北的深山密林里，不得不靠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空投粮食维持生存。后来，二十二师的残存人马在7、8月份经利多撤到印度，九十六师的残余部队历尽千辛万苦，经过赫茨堡，翻过崇山峻岭，撤到中国。

中国的公报以其一贯的风格报道了缅甸战役最后几天的情况。驻重庆的美国记者及时充分地作了详细报道，美国国内的报人则又加以修改。中国的一项战报说，5月10日和11日，侵入云南的日军一个联队被“全歼”，另一个联队“也被消灭”，在缅甸境内，中国军队“收复了”眉苗，并从东西两翼朝曼德勒逼近，准备攻取，从而从背后“拖住了”日军进攻部队。美联社的一位记者转发了这项战报，说日本侵略者遭到一场“大惨败”。合众社记者甚至更起劲，他绘声绘色地报道说日军从中国潮水般地撤退，“遭到歼灭……狼狈逃窜”。美国国内各

报馆的编辑以为所有中国军队都属史迪威指挥，他们出于爱国热忱，向读者报道这些消息时使用了诸如“日本侵略军被史迪威击溃”等一类标题，5 月 11 日使用的标题是“史迪威指挥的中国部队围困日军；侵略军全线溃退。‘乔大叔’关上中国的后门，敌军后路被切断。陆军公报！！！”。实际上，“乔大叔”那一天正坐在木筏上在乌尤江上漂游呢！

史迪威一行从英帕尔山区驻地乘卡车前往阿萨姆的一个火车站，然后改乘火车到达丁詹和廷苏基亚，沿途是一望无际的翠绿的茶树。廷苏基亚设有美国空运队的机场。韦维尔和亚历山大、第十航空队的布里尔顿和比斯尔以及史迪威手下乘飞机撤到新德里的人员都来见他。5 月 24 日，史迪威乘坐布里尔顿的那架铺着波斯地毯的飞机飞抵德里，他那天一下子成了举世闻名的人物。一大群新闻记者跟着他从机场追到帝国饭店（史迪威注意到那家饭店的电报挂号是“舒适”），他同意举行记者招待会。史迪威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指出日军的空中优势是给盟军造成损失的最大因素。他在回答了一小时的提问后说：“我要说我们挨了一顿狠揍。我们从缅甸逃出来，这是个奇耻大辱。我认为我们应该找出原因，然后打回去，收复缅甸！”他的这段话是缅甸战役史上的一段名言。

他说的这段话的影响是明确和不容怀疑的。正如《旧金山纪事》杂志后来追述的那样，史迪威的诚实态度象“锐不可挡的海风一样”摧垮了陆军宣传部门的骗人宣传和溢美言论。《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说：丘吉尔和罗斯福虽然擅长使用堂皇词藻，但“他们每人都可以从史迪威将军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如果减少官场作风，人们就能注意到史迪威的“措词风格和方

针”。史迪威的这段话成了他名字的同义词，自那以后，记者每次报道他的消息时都要援引这段话。其实，他只不过是干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把真相告诉了公众。

第十二章　被保护者

1942年6月—10月

缅甸丢失后，中国完全被日军封锁，美国开始担心中国与世隔绝后是否还能继续抵抗下去。现在显然需要以有形的支援来鼓励中国，但问题是怎么把物资运到中国。由于日军占领了密支那，航线被迫北移，空中运输变得更加危险和困难了。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把欧洲放在首位，对亚洲战场的战略尚未确定，目前所能设想的就是必需让中国继续同日本作战，以便以中国为基地空袭日本的海上航线和最后以中国为跳板进攻日本本土。陆军部在这个时候制订了一项计划，题目是《使中国继续作战》。使中国继续作战实际上意味着得运去足够的军需品，实际上也意味着得收复缅甸。

史迪威脑子里已经构思好了一项收复缅甸的计划，准备一到德里就写出来。由于有在缅甸的亲身经历，史迪威在计划中要求美国派部队作战。他提出这一要求是必然的。他在5月25日发给陆军部的电报中说："我坚信中国在战略上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因此，我认为美国不向这一战区派遣作战部队是犯了个严重错误。"马歇尔一心想在欧洲开辟第二战线，史迪威没能说服他把任何兵力抽调到亚洲。马歇尔只答应把第十航空队重新划归史迪威指挥。中缅印战区的前景不令人鼓舞，史迪威更加决心实施他的在印度训练一支中国特

遣部队的计划了。

但是，史迪威没得到多大支持。在中缅印战区任职的美国人中，许多人受到失败造成的有害气氛的影响，也有许多人觉得自己是在一个不受重视的战区任职。驻德里的美国人员一个接一个地要求调职，有的称病请调，有的雄心勃勃地想得到更有前途的差事。“天哪，难道他们就没有一个人把战争放在第一位、把个人得失放在第二位吗？”史迪威本人因黄热病而出现黄疸，“浑身虚弱无力”，一连几个星期断断续续地卧床不起，但责任感使他很难同情任何要求调职的人。他对那些不把自己对当前使命应尽的义务放在首位的军人感到无法理解。记者埃里克·塞瓦赖德在赴中缅印战区采访后写道：史迪威“对当一名真正军人有一种高尚的构想，但是，他所理想的真正军人是不可能存在的”。

史迪威同韦维尔举行磋商，韦维尔“嗫嚅嚅地”保证“要打回缅甸”。随后，史迪威启程前往重庆，由于天气恶劣，他中途在昆明停了五天，于6月3日才到达重庆。在以后的七个月里，他七次往返于他在德里和重庆的两个总部之间。德里和重庆相距两千一百英里，他先要从德里飞越一千一百英里到阿萨姆机场，然后越过喜马拉雅山脉飞行五百五十英里到昆明，最后再飞四百五十英里到重庆。喜马拉雅山脉海拔一万五千多英尺，比飞机通常飞行高度高一倍，而且常常出现强大气流，狂暴的气流甚至能使飞机破裂。飞机飞到海拔一万七千到两万英尺的高度，人就得戴氧气罩。速度缓慢的旧式运输机不适宜在这种条件下飞行，因为飞机上没有导航辅助设备，也没有配备武器对付日本飞机追击。史迪威这次乘坐

的是时速二百五十英里的 B-25 型轰炸机，“不怎么舒服，但快得不得了。比运输机快多了”。

史迪威发现，委员长夫妇对他的接待非常热诚。考虑到他在缅甸吃了败仗，这种接待是令人惊异的。委员长邀请他到他们黄山的宅邸过周末，虽然他因病得太厉害而没有能去。蒋介石尽管表面上态度热诚，但他对盟国，特别是对英国已经完全幻灭了。为了得到史迪威主管的租借物资，他还不能对美国太失望。从中国的观点看，虽然蒋介石极力减少损失，但是，史迪威指挥的缅甸战役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不仅丢失了缅甸，而且损失了摩托化第五军及其炮兵部队。用中国一位军史学家的话说，这是“倒霉的进攻战略”造成的。结果证实委员长对发动攻势有怀疑是对的。中国有这样一种说法：“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① 在失败临头的时候不战而降也是上策。蒋介石在把他认为的两个精锐军交给一位外国人指挥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它们会被击溃。他那样做不过是想取悦于美国，从而能使中国得到更多的租借物资罢了，决不是真的把它们交给史迪威指挥。史迪威的指挥权不是“有实无名”，而是“有名无实”。

中国确实有充足的理由感到失望。它过去抱有巨大期望，希望能得到盟国援救，但现在的处境反而比以前更加糟糕了：滇缅公路丢失；云南遭到进攻；由于美国发动杜利特尔袭击，日军又在浙江大举讨伐。中国人担心日军会进而进攻长沙，甚至重庆。中国除了在军事上遭到失败外，也没有取得盟

① 这句话引自《孙子兵法》的《谋攻篇》。“善之善者”意思是高明者当中的最高明者。——译注

国的平等对待。盟国制订了大西洋宪章，但没有制订以反对殖民主义为原则的太平洋宪章，中国为此非常愤慨。此外，他们对盟国把重点放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方针也非常不满，因为那意味着不重视中国局势。这一点在6月份丘吉尔第二次访问华盛顿时就已经显得很明显了，因为当时盟国开会没让中国参加。更加损害中国感情的是继续不让中国参加军火分配委员会。联合参谋长会议的成员就是军火分配委员会的成员，中国曾直截了当地要求参加联合参谋长会议，但在6月13日遭到拒绝，理由是要保密。

结果，中国看透了这场战争，态度越来越消极了。缅甸陷落后，在重庆的茶馆里，“让盟国去干吧”的论点非常流行。以夷治夷是中国传统的治国原则，这项原则现在看来不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可取，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道理了。据一位外国侨民说，中国认为，中国已经抗战五年，现在不仅有理由采取消极态度，“而且有权利在盟国作战的时候尽量离盟国远一些”。争取行使这种权利成了中国政府在这场战争中要干的主要事情。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摆脱外国，摆脱依赖，但迄今没获得成功。中国的问题太大了。随着应付本国形势的能力越来越小，国民党竭力想使对外国的依赖合算一些。

蒋介石很快就告急。他5月25日警告美国说，如果中国人民看不到得到盟国帮助的明显证据，“他们对盟国的信心就会彻底动摇”，那可能预示着“中国的抗战会彻底崩溃”。日军攻打浙江进一步证实蒋介石的警告是有根据的。蒋夫人5月23日写信给租借物资管理局局长劳克林·柯里，说中国的士

气“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低过”。她还说，委员长也“第一次”感到悲观。随后，蒋介石写信给罗斯福，要罗斯福派哈里·霍普金斯代表他本人到中国来，因为局势发展到了“我过去从未经历的危急阶段”。中国在给美国的另外一些函件中警告说，准备推翻蒋介石并向日本屈服的失败主义分子会抬头。罗斯福本来就已经极为担心，他5月5日要求阿诺德将军“研究”将物资空运到中国的“一切可能途径”，因为“不管多么困难，我们都必须使航线保持畅通”。高思大使虽然并不认为中国同日本单独媾和的危险很大，但是，他认为，中国以一种“不宣布同日本媾和但实际上同日本停战”的方式长期采取消极方针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

这同派史迪威到中国去实现的目标截然相反。租借法案的理论根据实质上是利用盟国的兵力打击共同敌人，派史迪威到中国去的目的就是保障使租借物资达到这一目的。史迪威现在遇到的障碍是接受租借物资的人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采取了消极态度。委员长之所以还打仗，只不过是因为不这么干美国就可能停止提供物资。他光靠消极威胁不可能源源不断地得到军火，为了使美国决心提供必需物资，他得答应采取军事行动。史迪威在这方面拥有决定权。委员长认为，史迪威作为他的参谋长，其职责就是为他搞到他所需要的物资。

史迪威不认为自己是承办商，甚至不认为自己是用来达到中国目的的工具性“顾问”。他认为，自己是个军人，自己的职责和任务是打败敌人，因此需要有支军队。不管有没有一支美国部队打头阵，主体作战部队都得是中国部队。因此，为了提高战斗力，中国现有的部队或其中能投入作战的部队得

进行改革。要是让史迪威担任顾问，他就打算象在他之前的许多顾问那样进行根本性改革。中国过去聘请的许许多多的顾问有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坚决主张实行改革，认为不管是货币、司法、关税、政体，还是农业，都应实行改革。在1942年的情况下，派到中国任职的人员要求改革的愿望不会比他们的前任们小，除非是老中国通。那帮老中国通认为中国人就是"那个样子"，实行改革也无济于事。

史迪威跟怀疑派截然相反，他主张实行改革，而且是个实干家。正如马克斯韦尔·泰勒当年在北京所看到的那样，史迪威一看到有什么事情不对头，就想加以纠正。有位中国观察家说："每个美国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史迪威的办法就是改革军队，这既是为了中国，为了打赢这场战争，也是为了他自己。史迪威看到，中国的三百个师"铺在全国各地"，平均缺员百分之四十，而指挥官们却按满额领取军饷。"军官们发了财，许多士兵营养不良，染上疟疾、痢疾或霍乱，奄奄一息。得了病的全被撵走。军人偷卖弹药和武器。各条战线上都有人同敌人公开来往……车辆用于走私活动，没有一辆用于调运军队。"蒋介石从不视察他的部队。他老是一个劲地谈论卡车、飞机和大炮，这完全说明他对训练、补充兵员、领导、医疗和后勤供应等工作的必要性一无所知。史迪威知道，改革工作规模太大，很可能自行垮掉。但是，他认为，有租借物资作为交换条件，他可以要求实行改革，至少可以从计划训练的三十个师开始。

史迪威在德里就草拟了一项关于军队的弱点和需要补给的报告，他到达重庆当天去向委员长汇报缅甸战役后期的情

况时把报告随身带去了。他当时虽然正生病，但一想到要汇报的内容就非常激动，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按时去见蒋介石。正如他在写给史汀生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他希望把缅甸战役的真相告诉委员长，可能"会使他吓一跳，从而促使他真的改编自己的军队"。"很多中国高级指挥官应该枪毙。"他建议枪决第六军军长甘丽初以及两名师长和一名团长。

虽然蒋介石每天都从重庆向派驻缅甸的各军发号施令，但是，他对缅甸的形势、战况或其他问题缺乏直接了解。他的宫廷里充满拜占庭式尔虞我诈气氛，谁也不愿意把日益恶化的实情告诉他，因此，形势越糟糕，告诉他的情况就越少。这不仅是因为他的部属害怕和顺从他，而且因为中国有一种根本思想，就是爱面子。中国有这样一种观念：忘掉坏的只说好的有助于使社会保持团结，有助于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尊严。结果，用史迪威的话说就是使委员长陷入了"无知和虚幻的自鸣得意之中"，从而使说服他相信需要改革军队变得困难得多了。

这次，史迪威把缅甸战役的"全部真相"统统告诉了蒋介石夫妇，"指名道姓地提到一些人……仿佛是在一个老太太的肚子上踢了一脚"。但是，"除我之外，谁也不敢把这些情况告诉他，因此我更有责任这样做"。向一个人——尤其是中国人——谈在他的领导下发生的失误，并不是说服他同意作改进的最好办法。但是，史迪威决心说服他答应对敌军采取行动，而且，他认为自己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选择。接着，他提出了自己的改组军队的计划，其要点是缩编军队和将现有的武器装备集中使用。遣散军队是中国的一个老问题，蒋介石在 1928

至30年期间曾试图遣散部分军队，但结果没能成功。在那之后，他就千方百计地玩弄伎俩，采用不提供补给和不增补兵员的办法消灭非嫡系地方部队，但也没取得什么效果。史迪威现在建议“把一些师合并，使所有部队满额，然后把现有武器尽量拨给这些师使用……少量可靠的、装备精良的得到有力支援的师的价值比把现有普通师的数目增加一倍的价值大得多……而且战斗力会高得多，也较易于提供补给和进行管理”。中国甚至在目前力量不足的情况下也能形成一支有效打击力量，中国可以利用这支力量挡住日军的进攻，一直拖到盟军进攻力量扭转战局、反败为胜为止。

史迪威还建议按能力对军官进行全面筛选，提升有能力的军官，“把无能的高级指挥官坚决整肃掉”，否则，“不管得到多少物资，军队都会继续每况愈下”。他最后提出一个敏感的问题：要求委员长必须选出一个他所信赖的人担任前线总司令，“给他一个总的指示，然后放手让他指挥军队，其他任何人都不要再插手干涉”。史迪威把自己写的建议留给蒋夫人，她很快浏览了一遍，说：“哟，这不是同德国顾问跟他说的一样嘛！”①

委员长没有对史迪威的建议作出答复。十天后，他们第二次会晤，原定是讨论中国已经答应的派军队到印度训练事宜。但是，委员长又把话题扯到物资问题上。“他又搬出他的

① 二十年代曾担任德国国防军首脑的赛克特将军1934年担任中国军事顾问期间提出一项计划，强调应该重视军队的质量而不应该重视数量，建议训练和装备二十个师（后来扩大为六十个师）和整肃军官队伍。他指出，中国的一大缺点是选拔军官时是看其人有没有后台，而不是看本人素质的优劣、成绩的好坏、能力的大小和能否胜任指挥工作。

那套老想法，说什么有了飞机、坦克、大炮等东西就能打赢这场战争。我有点发火了，对他说打胜仗的唯一办法是彻底改编地面部队。”这时，蒋夫人插话说委员长得考虑“某些影响”。

史迪威在听委员长本人介绍1929年遣散军队的情况后，看清蒋介石完全是中国军界错综复杂的私利关系的俘虏。各战区司令官指挥的军队，他不能自由处置。他只对中央政府直辖的十个军拥有无可争议的控制权。史迪威在一份题为《一个微不足道的独裁者遇到的麻烦》的报告中分析了蒋介石的行动受到限制的各种因素。蒋介石让过多的部属把省主席的政治权力和司令官的军事权力集于一身。“他现在发现这样做使他们揽权过大，他一年来一直试图抛开他们，但没有成功……威胁手段起了作用。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想搞掉薛岳。但是，如果他抽调薛岳的部队，薛岳就会发牢骚，说‘我不能对我地区的安全负责了’，甚至可能会有意让日本人作出反应。他还会要部下去施加压力。中央政府的各位官员会接二连三地收到抗议。于是，他们会对那位小人物说，反对意见非常强烈，硬搞下去可能会吃力不讨好。这样，这位小人物就停下来等等看了。事实很清楚，他不敢采取有力行动。”

但是，建立一支组织严密、富有战斗力和“有用的”军队看来显然是符合现政权的利益的，因此，史迪威相信，“有美国站在他一边支持他”，蒋介石不会不“抓住他一生中的这个重大机会”。即使撇开军事方面不说，单从中国的福利考虑，也必须减少强拉壮丁，以避免使农村严重丧失劳动力。但是，蒋介石却表现出了一个被保护人身上的最使人恼火的缺陷——认识不到明显的自身利益，也就是说认识不到在一位美国人看

来是符合他个人利益的东西。史迪威感到沮丧，认为只有政府外部的某些势力能够帮助中国。他以其特有的明确用语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要么被敌人毁灭，要么是树立某种新思想，并马上付诸实践。"

蒋介石对史迪威的建议的抵制从来不是坚定不移或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他认为史迪威能为他从美国要到东西的多寡而变化不定的。他不得不作出足以使美国继续提供援助的让步。陆军部这时制订了一项作战计划，打算利用积压在印度无法运往中国的四万五千吨租借物资重新打通滇缅公路。(另外积压在美国纽波特纽斯码头上的十四万九千吨供给中国的租借物资已重新收归美国使用。)但是，重新发动地面攻势已经打动不了蒋介石。蒋介石希望美国集中力量提高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空运能力，以便达到他的两个主要目的：一是想使作战物资继续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供给他自己使用；二是让陈纳德的飞行队得到燃料，继续维持下去。因为陈纳德曾向他担保，他的飞行队能为对日作战出力。

空运队只有二十五架飞机，同罗斯福答应的一百架相差很远。中国一直要求增加运输机，但军火分配委员会没能予以满足，因为飞机和飞行员普遍供不应求。尽管交通已被完全切断，但中国还是象过去那样继续要求提供巨额军用物资，这种要求也没完全得到满足。毛病是出在美国把"波利洛"①行动计划和俄国人放在优先地位，但宋子文却归咎于史迪威。

① 波利洛(BOLERO)行动是在英国集结力量以开辟第二战线的行动的代号。

他在打给史迪威的电报中说："由于你没发电报帮中国说话，陆军部对中国的要求反应相当迟缓。"他要史迪威认识到自己在美国对上至总统、陆军部长和参谋长的所有人都具有"不可思议的影响"。宋子文的这最后一句话有点奉承味道，但这也确实是中国人的看法。中国人对欧洲战争漠不关心，因而以为美国的物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以为美国不向他们充分提供物资完全是史迪威没有提出要求的缘故。

在宋子文的推动下，委员长比较愿意听取史迪威的意见了，反映出这种变化的是他逐步同意了史迪威提出的派军队到印度训练的计划。6月24日会晤时，由于蒋夫人向委员长力陈了该计划的各个论点，史迪威提出的条件大部分被接受了。史迪威不同意让杜聿明担任训练营长官，双方最后商定，如果史迪威同意让罗卓英担任主管行政和军纪的副长官，就由史迪威本人指挥和管理训练工作。蒋介石甚至还同意空运五万部队到印度去。蒋介石在谈判中经常"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这是其中的一次"。诱饵是一幅"大美景"——这项武装中国以发动反攻的计划的基础是每月用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向中国空运五千吨军火，此外还要向中国提供五百架作战飞机。

喜马拉雅山航线运输吨位这个无休无止地折磨人的问题，成了中国战区的关键问题。自4月份以来，由于雨季无法飞行和部分飞机被调去向难民空投食品，运输机平均一个月只往返中国两趟，结果，一个月运到中国的物资平均还不到一百吨。尽管美国作出种种许诺，但是，驾驶员和设备供应不上，飞机缺乏维修，阿萨姆的机场简陋不堪而且不顶用，气候

也变化莫测。美国现在在国外有七个航空队，在国内有四个。阿拉斯加的一位指挥官写道："我什么都需要！"他的这句话概括了各个航空队的状况。喜马拉雅山航线的需要最大。他们收到的设备先得从美国经过一万二千公里运到印度西部沿海港口，然后装上火车经过一千五百英里运到加尔各答，最后经阿萨姆-孟加拉窄轨铁路线运到各个机场。

阿萨姆-孟加拉窄轨铁路初建时是为了把阿萨姆邦的茶叶运出去，这条铁路交通拥挤阻塞，令人绝望。在从加尔各答到利多的这段距离里铁轨变换三次，还要经过布拉马普特拉河，河上没有桥，全靠用驳船把一节节车箱运过江。英国人对铁路的管理墨守成规，就好象此刻还不怎么紧急，办事还是那么不紧不慢的。1942 年夏天，印度国大党号召举行罢工，在全国开展"不合作"运动，印度的工矿企业陷入混乱。阿萨姆-孟加拉铁路的运输量长期低于商定的数字，铁路管理官员工作作风刻板，甚至置中缅印战区后勤部门长官"胖将军"韦洛的权限和情面于不顾。这个问题阻碍了物资运输工作，一直持续了近两年之久。最后，美英双方于 1944 年 2 月达成协议，把那条铁路划归军队，由美国派几营铁道兵管理。

在喜马拉雅山脉彼侧的中国，供给陈纳德飞行队的燃料和零件运到昆明后，还得经陆路和水路运到数百英里以外的几个空军基地，路上往往要用八个星期时间。空运队每把一加仑汽油运到中国，自己也要消耗掉一加仑汽油，为了使陈纳德飞行队能向日军投掷一吨炸弹，得运十八吨物资到中国。一架运输机能运载四到五吨货物，在最适宜的条件下一天能飞一个来回。但是，每次起飞的飞机数量很少超过百分之六十

到七十。恶劣的天气和其他方面的故障减少了飞行次数。这条航线上的损失非常惨重。空运队在这条航线上飞行了三年，共损失了四百六十八架飞机，平均每月损失十三架。驾驶员有的能跳伞逃生，被美国战略情报局派到缅甸的特工人员组织的克钦族营救队营救出来。但是，有的驾驶员死在森林里，有的被日军俘虏，还有的落在树顶上下不来，尸体长期挂在树上，被蚂蚁吃掉。

凡是一支空军部队所需要的，陈纳德飞行队都长期短缺，空运队运去的每一吨物资他们可能都使用了。跟史迪威或中缅印战区的几乎其他所有人一样，陈纳德平常总是感到恼火。他写道，虽然他手下的人把破飞机修修补补，把旧零件擦洗后再用，甚至把用过的汽油过滤后重新使用，但是，美国参谋部的军官们“在印度和中国问题上却傲慢地挟着公文包逃避责任”。这种状况“使我们大家感到愤慨”。在喜马拉雅山航线上飞行的飞机常常挤进乘客，他们占的地方本来可以用来运载燃料、轮胎、电花插头、汽化器、工具、罩衣、香烟、肥皂和美国志愿团所缺少的其他一切东西。美国志愿团 1942 年 7 月 4 日正式编入美国空军的时候，是中缅印战区唯一的空军部队第十航空队的一部分，现在它被命名为驻华空军特遣队，陈纳德任队长，并晋升为空军准将。但是，他所讨厌的比斯尔在他之前一天擢升为准将，并被任命为中缅印战区空军司令。据麦克休说，蒋介石把美国没有任命他提名的人担任空军司令看成是对他的“一种直接冷落”，认为这表明美国不会向中国提供他想要的空军力量。实际上这反映出阿诺德将军不喜欢陈纳德。中国开始施加影响，要美国撤掉比斯尔和提升陈纳

德。最后，中国达到了其第一个目的，虽然第二个目的没有实现。

陈纳德虽然很得宠，但就连他也跟史迪威一样，跟蒋介石闹起纠纷来了。蒋夫人有一次对他说，他以后得直接与委员长联系，不要再通过她了。陈纳德回答说，如果没有她当中间人，那些有私心的人就能劝委员长“发布无法接受的命令”。他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惶恐不安，以致蒋夫人还是允许他象过去那样行事。陈纳德督导中国飞行员的训练工作。飞行员们暴露出来的问题跟史迪威在军官中发现的问题一样。他 1942 年 5 月向蒋夫人发牢骚说，情况“越来越糟糕，现在几乎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调去担任教官的全是最差劲的飞行员，他们根本教不了学生，也无法维持纪律。他们不理睬美国人的建议，“憎恶美国的影响”。陈纳德四年来发现无法纠正这种状况，他现在也不能出具证明担保这些飞行员到美国完成训练学业。他认为应该报告陆军部，“在中国，飞行训练办法存在严重缺陷。”如果打算继续搞下去，必须让他对学校和人员拥有“全权”。后来，陈纳德在坚持认为史迪威个人的缺点是引起他同委员长发生冲突的原因时，没有提到他自己同委员长的纠葛。

使陈纳德更加火冒三丈的是物资供应不足，他之所以恼火是因为他完全深信，如果能得到装备，光用他的航空队就能截断南海的日本军用物资运输线，使日本大吃苦头。这个办法的诱惑力是很大的。陈纳德写道：“我们始终应该研究如何做最为适宜，而应该忘掉这样做是否可行的问题，因为那样很快会给我们造成足够的危害。我们应该看看可能出现什么情

况，应该为之感到鼓舞。”他本人就受到了这种令人钦佩的原则的莫大鼓舞。他在那年夏天写信给史迪威说，太平洋战略的目标是切断日本的海上通道，鼓励中国出动地面部队进攻日占区，在缅甸和印度支那地区压制住日本空军，减轻日军对印度的威胁，保卫通往中国的喜马拉雅山航线和“提供军需品以成功地发动一场攻势，来激励所有盟国”。如果给他五百架战斗机和一百架运输机，再加上让他“全权指挥这个战区的空军”，他就能实现上述目标。

在蒋介石夫妇看来，陈纳德的论点是很难不予相信的。如果给陈纳德五百架战斗机、一百架运输机和“全部指挥权”就能打赢这场战争，那就没有必要改革军队，也没有必要打乱各集团、各派系和各战区司令官之间的极其微妙的关系了，因为蒋介石的很不牢靠的权力宝座就是靠这些关系支撑的。空军不需要中国花费力气，而且干起来看上去似乎不费吹灰之力。陈纳德每周给蒋夫人写一份战况报告，蒋夫人有一次收到报告后写信给陈纳德说：“如果我们每天击毁十五架日本飞机，那么，用不了多久，日本飞机就会所剩无几。”于是，诱导美国提供五百架飞机和从喜马拉雅山航线提供补给以使空军部队保持作战能力和进行维修，成了蒋介石的既定目标。

蒋介石对美国不履行诺言越来越不满。美国制订了一项代号为“哈普罗”的行动计划，打算从中国出动 B-24 型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蒋介石对这项计划颇感兴趣。但是，由于浙江的空军基地落入日军之手和空运队运输的物资供不应求，这项计划无法实施，最后被美国取消了。在史迪威的建议下，原准备飞往中国的 B-24 型轰炸机中途停在埃及没有飞

来。由于别的地方需要，美国把原答应向空运队提供的一百架运输机减少到七十五架，后来又减少到五十七架。史迪威不得不通知委员长，空运队原来估计每月能运送五千吨物资，但按目前的情况看连十分之一都无法达到。蒋介石同古代的帝王一样，一听到坏消息就归罪于送消息的人。他在听宋子文说史迪威没有卖劲地向美国政府力陈中国的要求之后，对史迪威更加恼火了。

委员长认为这说明史迪威没有尽到参谋长的职责。依委员长看，一个外国人从他自己的国家要不到需要的东西，完全说明他缺乏影响。物资得用轮船、火车和飞机转辗漫长里程后才能运到中国，这一点蒋介石根本不管。后勤方面的实际问题他也毫不在意，因为他对后勤不甚了解。如果史迪威搞不到东西，只能说明他不是没有足够的影响，就是没有全心全意地为中国出力。蒋夫人既有办法提高史迪威的影响，也能诱使史迪威真心实意地替中国服务。她对史迪威说："我们将设法使你晋升为四星上将。"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这帮混蛋！"他感到自己受了凌辱。他对他的下属说，他认为蒋夫人对他说这番话意在收买他，以便让他顺从地向美国政府提出中国的所有要求。蒋介石夫妇实际上确实是想收买他。

6月底，物资供应争端终于导致了"三项要求"的危机。导火线是隆美尔6月21日占领利比亚的托布鲁克，把英军赶出埃及，再次出现了德军突破防线打进中东的危险。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布里尔顿的第十航空队的重型轰炸机以及空运队的运输机和驾驶员奉命飞赴埃及，飞往中国的一队B-24型重型轰炸机中途停在喀土穆，改变航向飞往英国。把这些消

息通知委员长的任务又落到史迪威头上，可以预见到委员长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史迪威本人跟委员长一样，也十分恼火。“我们作出的许诺一个也没兑现，却还乐呵呵地对他说，老兄，继续干吧。”

蒋介石夫妇利用这个机会大发雷霆。蒋夫人气愤地说，英国每遭到一次失败，就拿走一批中国的装备，“既然如此，中国没有必要继续打下去了”。委员长声称中国受到“轻视”，要求美国和英国“明确回答是否认为中国是盟军战区之一”。他马上提出了他真正关心的问题——租借物资问题。他说，美国运到中国的物资还不到罗斯福许诺的十分之一，这实际上等于是“不服从”总统的命令。“作为我的参谋长，你的责任是保证使答应提供的物资很快运来。”蒋夫人最后以最后通牒的口吻说：“委员长希望盟国明确回答是不是还认为这个战区是必要的和需要给予支持。”

史迪威愿意表示同情，因为他与蒋介石夫妇一样，也希望美国加强对中缅印战区的支持。但是，由于他们指责他没有尽到职责，他非常恼火。他“把他们的指责驳了回去，告诉他们我提出过什么样的要求”。史迪威认为，蒋介石夫妇是故意发作，以为只要“激烈表示反对”就能占上风。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各种礼遇、会晤、招待、友谊和其他关系都是表面假象，从根本上说，中国人内心里是把西方人看成在任何交易中都得以智取胜的对手。在这种表面做法的背后，引起蒋介石对美国不满的深刻原因是美国没有让中国象英国那样控制援华租借物资的支配权。美国对中英两国区别对待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这就是，如果物资交给中国随便支配，有很大一

部分绝对不会用于抗日。但是，这样做看来是对中国人的明显歧视。蒋介石认为，美国这样做使他丢了面子，是不可原谅的。这也是他不喜欢史迪威的根本原因，因为史迪威身为援华租借物资经管人，是这种做法的明显代表人物。

蒋介石夫妇在口头提出最后通牒三天后，又正式提出了限期答复的三项要求。这三项要求是：

1．美国于8、9月间调陆军三师到印度，重新打通经缅甸到中国的交通线；

2．自8月起美国从中国出动作战的飞机要达五百架，而且以后需一直保持在这个数目上；

3．自8月起空运队每月保持五千吨之运输量。

蒋介石夫妇说，如果这几项"最低要求"得不到满足，中国只好"取消"中国战区，"重新调整"自己的立场，"另做安排"。

史迪威非常愿意转达这几项要求，因为除了飞机数目和时间期限外，其他内容都与他本人向马歇尔提出的要求相近。但是，当蒋夫人后来要求他把这三项要求同他本人的建议一道向美国政府提出时，他拒绝了。他对她说，他不愿支持任何人向他自己国家的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蒋夫人"非常生气……开始大声斥责我"，叫来了她自己的秘书，要秘书"把我说的话全记下来。她是气疯了。她劈拍一下抽了个响鞭，但是小丑没有应声跑出来"。史迪威利用这个机会指出了自己的双重身份，说他虽然是委员长的参谋长，但是，在涉及到美国政府的问题上，委员长不能把他叫来对他发号施令。他阐明了自己兼任的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美国政府驻盟军军事机构代表和援华租借物资统制人的职能，并说明自己"是个曾宣誓维

护美国利益的美国陆军军官……如果她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那她就比我想象的还笨”。

史迪威还向蒋夫人解释说，每月飞越喜马拉雅山空运五千吨物资从后勤上说意味着得有三百零四架飞机、二百七十五名机组人员和三千四百名地勤人员，而且每一头得各有五个飞机场，每个机场得能容纳五十架运输机才行。“她开始有些明白了。”他最后对她说，他认为委员长“需要的是位军人，而不是个橡皮图章”或虚伪的、口是心非的“话筒”。

为了让美国相信中国确有单独媾和的危险（单独媾和是中国能使三项要求成为最后通牒的唯一手段），重庆放出谣言，说日本特使和南京代表已到重庆来洽谈媾和的条件。史迪威没有把这些谣言放在心上，因为他确信，中国能从美国得到的太多了，而“同日本媾和有百害而无一利”。他同高思大使讨论了这个问题，高思同意他的看法，并告知华盛顿，中国是在“吓唬人”，虽然它的需要是真实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位代表拜访了周恩来，据周恩来说，根本不存在中日单独媾和的危险，相反，他们的“抗战已经变成了一桩好买卖，因为那便于捞取援助”。他说，国民党官员引以为得意的是自己会施展外交手腕，会利用美国人的神经质。他们在上海同日本保持接触“为的是引起美国人的担心”。

美国不敢冒丢掉中国这个作战基地的风险。如何答复三项要求取决于能拨出多少物资，因而又取决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是否会同英国发生矛盾以及讨价还价的结果如何。在作出决定之前，罗斯福总统先写了一封信安抚蒋介石，答应在近期内解决这个问题。

委员长在两架运输机的使用问题上同史迪威发生了争执。他非常恼火，企图剥夺史迪威对租借物资的控制权，结果引起了意外的严重后果。他写信给罗斯福说，史迪威既对美国政府负责，又对中国政府负责，这种双重责任看来在租借物资问题上发生了抵触，这个问题得解决。罗斯福在复信中断然拒绝把史迪威的两项责任对立起来，明确肯定史迪威主要是对美国负责。“让史迪威将军完全受命于您是行不通的。”罗斯福的复信是马歇尔起草的，马歇尔知道租借物资是史迪威施加影响的唯一手段。复信还说，不管换谁接替史迪威，都将握有同样的权力。

罗斯福的复信违反了中国人办交涉的主要原则——照顾对方的尊严，不直接拒绝对方的要求。由于白宫和陆军部看来缺少熟谙中国行文习惯的誊写员，宋子文补了空缺。为了能平静事态，他把总统复信的语调和措词都做了删改，然后才转呈委员长。在这同时，马歇尔给史迪威寄去一份原信副本，供他参考。因此，史迪威知道自己的立场得到确认，蒋介石的看法则不是这样。他们两人又纠缠了几个星期才把真相弄清楚，在这过程中，他们相互不满的情绪进一步增大了。蒋介石在看到总统的原信后，感到自己受了侮辱，再次提出要取消中国战区。蒋介石的这种反应是可以想见的。总统把宋子文召到白宫，亲自告诉他史迪威的身份仍然不变。宋子文跟蒋介石手下的其他部长和官员一样，也不愿意传递使蒋介石不悦的消息，他继续按自己的意愿删改信件。两年后，罗斯福总统又发现有些信件被删改，于是他命令，凡是他给委员长的信

件，一律由美国驻重庆的一位高级军官亲自交给委员长本人。

史迪威一面等待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三项要求作出答复，一面继续催促中国实施派三十个师到印度受训以收复缅甸的计划。他跟委员长保持着一种时而表面上客客气气、时而怠慢冷淡的关系。他跟军政部的会谈始终给他以合作的希望。中国人从来不说"不"字，因此，史迪威始终可能是以为自己即将办成某件事。他知道有人在散布流言蜚语，说他破坏了第五和第六军在缅甸的进攻，然后"溜之大吉"。他认为这些谣言是宋子文散布的。但是，始终有些中国朋友希望他的改革计划获得成功，对他的希望加以鼓励。缅甸战役时期的首席翻译官曾士奎继续担任联络官，他有一次来找史迪威聊天，"看来他确实是相信我能逐渐发挥足够的影响，产生很大作用"。

这几个月的生活并不令人感到愉快。史迪威黄疸病刚好就又得了"肚子疼"病，最后诊断为体内有寄生虫。他得在一天半的时间里服用八种不同的药，根据他本人后来的记载，他吃惊地"感觉舒服一些了"。他6月份收到母亲逝世的噩耗，非常悲痛。此外，他还给视力搞得心神不安。他的视力几年来一直不好，几乎只能用一只眼睛看东西。日本飞机空袭造成的麻烦，再加上重庆天气闷热，使人感到厌烦。因此，他非常思念家乡卡梅尔和亲属。马歇尔和史汀生联名给他发了一份电报，给他吃了颗定心丸。他们向他保证，如果事实证明争取委员长更加积极地提供合作的努力毫无成效，他们就把他调到另一个战区去，以让他发挥更大作用。

后来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情况。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

尽管印度政府非常不乐意，史迪威最后还是说服韦维尔答应把拉姆加尔拨给他作为训练中国部队的基地了。拉姆加尔位于加尔各答以西约二百英里，过去是关押两万名意大利俘虏的战俘营。英国人担心大批中国武装部队开到印度会对印度人的反叛活动产生影响，此外也不想用中国军队收复缅甸。但是，中国三十八师和二十二师的八千人已经在印度境内，而且，美国不打算派本国步兵部队到中缅印战区作战，因而力主实施史迪威的计划。最后，美国占了上风。英美两国达成一项协议，该协议规定，作为逆租借法，由英国为中国军队提供住房、粮食和军饷，美国则提供装备和进行训练。训练计划开始实施时只有八千人，拖了三个月后，即到了10月份，中国才开始象蒋介石6月24日许诺的那样用飞机增调部队到印度接受训练。

阻碍军队改革的障碍更大。军界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军人官僚派，另一派是黄埔派。军队的实际指挥权大部分控制在黄埔派手里。何应钦一派依赖现行的组织体制，正如史迪威所指出的那样，这就是象杜聿明这样的将军能够"如此独立不羁"的原因。何应钦坚决反对运用中央政府的军事力量，估计任何改革计划或作战行动计划都会遭到他的反对和阻挠。

黄埔派比较愿意实行改革。这一派的领导人是黄埔军校首期毕业的老军人陈诚将军和胡宗南将军。陈诚将军现任湖南省主席兼司令官。史迪威1938年曾认为他是中国诸将军中的一位"最强有力和最令人感兴趣的"人物，现在则认为他有可能成为总司令，或者有希望接替何应钦。陈诚是委员长的密友，据认为在蒋介石的儿子具备条件之前，他会被看成临

时继承人。他享有蒋介石的青睐是必然的。考虑其他任何不受宠的人是毫无意义的。据信陈诚想凭自己的本领继蒋介石之后当权。他长得跟委员长相似，也剃着光头和蓄着一撮小胡子，说话声音也很尖。由于这些缘故，人们传说他跟蒋介石是异父兄弟。尽管如此，陈诚在统一战线期间还是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一道在军队各师建立了政治部，并采用共产党的办法组织民众抗日。

黄埔派的另一位领导人胡宗南也是委员长的亲信。他的总部设在西安，指挥四十万大军封锁共产党人。他统辖的部队是中国兵力最多和装备最精良的一支部队。他同黄埔派的另一个人物戴笠是密友。

其他许多人物的态度和相互关系变化无常，但对这些人也得予以重视，其中之一是同南方集团结成联盟的张发奎。张发奎担任过"铁军"的军长，"现在发了财，过着安逸的日子"，但仍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此外至少还有七个战区司令官(包括陈诚)，他们军政大权独揽，其中之一是以悍勇好斗著称的省份湖南省的"长沙虎将"薛岳。薛岳是"军队中唯一的一个态度强硬的汉子"，在蒋介石打电报干预的时候，他居然敢"咆哮着要求解除他的职务"。这七人中的其他人都是偏远地区的战区司令官，如山西的阎锡山和云南的龙云，他们都是半封建的土皇帝。云南省主席龙云身材矮小，靠种植鸦片发了财。他自己发行货币，保留着自己的军队，实际上是在云南实行自治。他同蒋介石的关系非常紧张，有一次发生政治危机时，蒋介石要他到重庆去，但是，他直到蒋夫人到云南府留作人质后才前往重庆，而且直到他返回云南后才让蒋夫人离去。

这七人中还有一位战区司令官是浙江战区司令顾祝同。有一次国民党军队在同日军作战时，他的部队“就在后方五十多英里的地方，但他一直按兵不动”。史迪威在北平任职时的助手、现任武官巴雷特上校亲自前往前线调查，带回了一项关于在衢县发动的一场“倒霉的攻势”的报告。在衢县有个庞大的轰炸机基地，委员长反对发动杜利特尔空袭主要就是害怕丢失这个基地。在发动那场空袭之后，该基地果然丢掉了。根据巴雷特的调查，蒋介石又是从重庆指挥作战，而且“取得了象以往一样的辉煌战果……这个小人物命令两个军埋伏在深山里，等日军经过时从侧翼发动进攻。但日军完全封锁了退路，继续前进……这些军队的装备是最差的，士兵生病了没人管，也没有运输工具。病员很多。大部分是新征来的壮丁，是被捆绑着押送到部队来的。当兵是件丑事，只有没钱没势的不幸儿才会被抓来当兵……这个笨蛋为什么就认识不到训练三十个师的计划是他唯一的希望，为什么就想不到另建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呢？”

这个恼人的问题的答案是逐步清楚起来的。史迪威经过很长时间才认识到，蒋介石并不真心想有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作战部队，这样一支军队对他来说是害多利少，他生怕富有战斗力的三十个师会由一位新领袖或新集团控制，从而给他自己的统治地位造成损害或挑战。史迪威提出的撤销无能指挥官职务的建议会把那些效忠于他、对他感恩戴德的人撤掉。他不希望建立一支能同日军作战的军队，只希望有一支能保住他在国内的地位的部队。因此，他认为只要自己的军队、枪炮、飞机和坦克比共产党多就行了。

史迪威继续不懈地努力。推动他的是一个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的信念。他相信美国援助具有巨大讨价还价力量，能够迫使中国改革军队和克服政治上的障碍。他的设想是：中国军队最后缩编为大约一百个满员师，作为核心力量的头三十个师在昆明地区训练和装备后担任“Y部队”；也就是盟军两路夹攻缅甸的东线突击部队。（美国把进攻缅甸的计划称为X—Y计划，X代表从印度发动进攻的部队。）史迪威不打算整师整师地训练，只打算训练干部，然后让干部们去训练自己的部下。中国军政部对这项计划的“总的梗概”表示同意，但回避确定开始训练的日期。

为了激励委员长，史迪威又向他呈交了一份备忘录，有力地论述了自己的努力的理论根据。他敦促中国在考虑问题时不要从自己并不拥有的军事力量出发，即不要从庞大的空军和炮兵部队出发，而应该利用自己拥有的力量，这就是“用步枪、机枪和迫击炮武装得相当好的庞大兵力”。如果把现有的师减少一半，使缩编后的师满员，那么，每支部队的步枪、机枪和迫击炮就能达到标准定额，而且能增强炮兵的支援。史迪威最后说，“我知道也懂得，在我主张改革指挥系统时，会有人出来反对”，因此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改革建议。

委员长对这项备忘录与对史迪威在近一个月里提出的其他五项备忘录一样，也没有作出答复。史迪威要求见委员长，但等了一个星期也不见回复。史迪威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这是我历来进行的一种最枯燥乏味的活动，得竭力去引导和影响一个执拗、愚昧、抱有偏见和骄傲自大的暴君。除我之外，谁也不对他说真话，而他在听到真话时又不肯相信。”史迪

威向史汀生解释说，他认为，那种以为把“真相原原本本地”告诉蒋介石就能使他“逐步树立起信心”的想法，完全是一种天真幼稚的期望。他还对史汀生说，“在寻找这个人身上的长处时，必须考虑他的环境和经历……他没有受过正统教育……他没有一个朋友，他只有奴仆，他们在他面前唯唯诺诺，没有一个人例外。”他的夫人是他唯一的真正朋友。“实际上，她非常怕他，他一发怒，她就不敢作声了。她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为使中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而奋斗。”如果是她当委员长的话，中国的“进展速度会为现在的五倍”。

史迪威的总目标是促使发动一场战役以收复缅甸，但这场战役谁也不想打。他愿意让蒋介石发动缅甸战役，以作为一条出路，使蒋介石从致华盛顿的最后通牒中解脱出来。委员长只要“表明愿意合作”，就能得到美国的物资。一旦中国决心战斗，美国就得充分提供物资，支援这场战役。华盛顿也一定会施加压力，逼英国参加缅甸战役。史迪威仍然希望美国派遣一个或几个师参战。他相信，如果中美军队愿意采取行动，“英国几乎不会不采取行动收复自己的领地”。

依据这个想法，史迪威7月19日参照自己原先的两路夹攻缅甸的设想，向蒋介石提出了一项四点军事计划，要中国方面“挑选二十个师”参加作战。这项计划的诱人之处是重新打通经仰光的运输线。据史迪威估计，如果仰光收复，美国陆军部就能连续半年每月拨运给中国三万吨物资。史迪威的这项计划还主张，在盟军从陆路发动进攻的同时，英军重新在孟加拉湾确立制海权，收复安达曼群岛，派部队在仰光登陆。

次日，劳克林·柯里以总统特使身份代替哈里·霍普金斯来到重庆，史迪威得知美国不会派部队到中缅印战区作战，因为“运输量过大”。虽然这是中国提出的三项要求之一，但是，柯里在同委员长初步会谈后仍感到“十分鼓舞”，“认为他已经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柯里身材矮小，但却很自大。罗斯福第一次派他以总统私人代表身份到重庆来是 1940 年春季，在那以后，他一直在华盛顿主管援华租借物资。他很快就以“柯里梳子”和“机智的柯里”的绰号出现在史迪威的日记里。柯里不赞成用租借物资要挟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他对马歇尔说：“鉴于中国仰赖我们继续提供援助，估计不会出现不合作的麻烦。”这是一种典型的错误判断。他低估了中国利用想利用它的人达到自己目的的本领。

委员长在同柯里会晤时对史迪威表示不满，再次想让美国撤换史迪威，或至少是不让他再管租借物资。史迪威在中缅印战区任职期间，如果在物资问题上较通融一些，如果他建议华盛顿接受委员长的要求并不对物资的使用管得太严的话，他本来随时都能对蒋介石采取随和态度。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但是，蒋介石很快就发现史迪威不愿意在这层意义上持合作态度，因此，他后来从来没有长时间放弃撤换史迪威的念头。当柯里把蒋介石的不满意见的大意转告给史迪威时，史迪威反驳道，他告诉委员长的全是时局真相，因为他相信委员长想了解真实情况。“我只能据此继续工作。”

8 月 1 日，蒋介石采纳了史迪威向他建议的“出路”，接受了缅甸战役计划；但机灵地提出了两项条件，一是英军从陆路和海路参战，二是派遣充足的空军部队提供有效支援。蒋介

石指出，缅甸战役首先取决于弄清英国政府的意图。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前不久刚对英国的意图作过估计。戴维斯7月31日写的报告说，英国现在“无意在近期里收复缅甸”，其原因同他们当初不积极保卫缅甸的原因一样。蒋介石由于猜到了这一点，因此大胆地同意参加进攻缅甸，甚至把参加作战的二十个师中的十五个师都选定了。现在，缅甸战役完全取决于华盛顿的联合参谋长会议作出什么决定了。

美国向中国提供援助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军事目的，实际上支援的是一个政权，而不是一场战争。多恩上校8月4日写给陆军部的报告说：“在我们收复缅甸之前，援助中国的各种谈论和计划都毫无意义。但是，向中国提供的所有援助都必须附有条件，必须要求他们采取行动。”否则，“现政府会一味囤积物资，以备战后保住自己的地位”。他几乎是偶然地提了一下问题的核心：“他们估计会发生大动乱或革命。实际上，宋子文在华盛顿说过，他认为，在战争结束半年之后，现政权会干不下去。他应该知道……”

国内问题是首要问题，这一点处处都可以感觉到。史迪威除记得1938年同周恩来和叶剑英友好谈话的情况外，对共产党人再也没有任何直接了解。他知道，八路军据说拥有五十万人马，共产党的力量在北方不断扩大。据一些消息说，山东省只有一个县还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史迪威自重返中国以来，跟共产党人只有过一次间接接触，那就是戴维斯向他转达了仍在重庆的周恩来6月份同戴维斯的一次谈话。周恩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戴维斯说，如果委员长允许，他愿意率领

共军参加收复缅甸的战斗，“我愿服从史迪威将军的命令”。史迪威虽然把周恩来说的这些话记下来了，但他并没怎么注意共产党人。蒋介石问题把他缠住了，而蒋介石当时是居于突出地位的人物。

史迪威虽然在国内是个保守的共和党人，但是，同驻重庆的其他许多美国人一样，他也因为同他负责支持的这个盟国志趣不投而感到烦恼。在炎热的夏天的晚上，他在记日记时所写的尽是这方面的问题。他写道，美国“被迫同一帮法西斯分子结成伙伴，领导这伙法西斯分子的是一个在许多方面同我们的敌人德国相似的一党政府”。这多少是吹嘘中国人民在蒋介石的无畏领导下进行六年壮烈抗战的“愚蠢的、骗人的、虚假的宣传”所造成的结果。“这里存在着同情纳粹分子的情绪。政府属同一类型，观点雷同，匪徒行径如出一辙”，不同的是中国政府既无力量，又无能耐。蒋介石“一步也不朝前迈，不采取任何具体行动提高中国的地位”。蒋介石跟希特勒一样，认为自己“一贯正确”，完全凭“直觉行事”。“怎么打动这样一个家伙呢？怎能接受他的观点呢？”

史迪威预见到战争结束后会同“赤党”爆发内战，他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怎样帮助中国人民呢？停止愚蠢的宣传……壮烈的抗战在哪儿？伟大的游击战在哪儿？哪儿有什么改革，连对改革的基本认识都没有！”

史迪威认为，蒋介石是个“狂热的大中华主义分子”，就是说，他跟清朝皇帝一样，瞧不起别的任何国家的人，老是提心吊胆的，生怕别人说他亲美，生怕承认自己依靠美国。他的这种思想之所以比别人更加强烈，也许是因为他所处的地位。蒋

介石虽然聘用了许多外籍人，例如长期担任他的政治顾问的端纳、他的德国籍卫队长瓦尔特·斯登奈斯、财政顾问阿瑟·扬以及他的专机驾驶员罗亚尔·伦纳德，但是，他内心里是憎恨外国人的。他憎恨英国人和美国人，把他们视为帝国主义分子。他认为自己同史迪威的关系使自己丢了脸。

由于遇到的麻烦越来越多，蒋介石变得越来越专断和难以接近，变得更加孤僻、落落寡合。史迪威并不是难得见到他的唯一的人。官员们见他一面得等上好几个星期，常常只能通过蒋夫人转达自己的问题，他们对此颇为不满。用史迪威的话说，蒋介石兼用"吓唬和拉拢"两种手法，使对手穷于应付。他看上去似乎是个强有力的、不可缺少的人物，但是，他并不知道如何搞好一个政府。他虽然阅历丰富，但心胸狭窄，受的教育有限。他最大的障碍是缺乏有能力的行政官员。他从来不让真正有能力的人担任要职，唯恐他们力量太强。由于他规定的任职的标准是效忠于他，而不是有能力，所以，他周围全是一帮庸才。他的姻兄孔祥熙担任行政院副院长，主管政府民事工作，通常还兼任财政部长。但是，英格兰银行驻中国代表西里尔·罗杰斯说他的"智力只及十二岁的儿童。如果我把他跟我谈论银行业的讲话录下来放给大家听，那谁也不会再认真看待蒋介石政府了"。尽管如此，孔祥熙却精通生财之道。孔氏家族是重庆街谈巷议的话题。据说这类流言蜚语"有百分之九十不真实，但是有百分之十的情况甚至比传说的还要糟糕"。孔氏家族、宋氏家族以及他们的兄弟和侄男侄女形成了宫廷集团，为首的是孔夫人。孔夫人左右着她的妹妹蒋夫人，通过蒋夫人影响委员长。蒋夫人对委员长的影响

是有限的，她把这归因于自己没给他生儿育女。

政府形式上分为立法、司法和行政三院，但实权操纵在以蒋介石为总裁的国民党手里。在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中，势力最大的是以陈氏兄弟为首的右翼CC派。陈氏兄弟是国民革命的守旧派，是蒋介石的第一个恩师陈其美[①]的侄子，是1932年成立的蓝衣社的头子。蓝衣社是国民党的相当于德国纳粹冲锋队的组织。弟弟陈立夫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当过蒋介石的私人秘书，现在成了国民党的首领。国民党在每个村庄和每个部队都建立了基层组织。国民代表大会实行一党制，代表由国民党指定，隔三、四年才开一次会。国大自1935年以来没举行过一次选举，任何进步团体都没有表决权或发言权。在国大闭会期间，全国执政机构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决策机构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常委会每两周举行一次例会。蒋介石虽然对党内的压力很敏感，但实际上他是向常委会发号施令。

蒋介石的思想基本上是儒家思想。他1927年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后来又盘踞最高地位达十五年，使他取得的胜利进一步得到巩固。这也是天意和定数。为了显示这一点，除不时发脾气时外，他总是摆出一副从容和善的模样。他认为，他的所有部属，包括他的参谋长史迪威，理所当然地首先必须服从他的命令。共产党人不服从他，藐视他的权威，因此在他眼里比日本人还罪大恶极。心怀牢骚的知识分子和地方首领中反对他的人联合不起来。孙中山的儿子孙福[②]享有广泛支

① 陈其美即陈英士。——译注

② 孙福即孙科。——译注

持，是敢于向委员长坦率陈言的不多的几个人之一，但是，跟他的父亲一样，他没有力量根基。李宗仁很有可能成为南方联盟的领袖，仍然是对蒋介石的一个威胁。国民党从来没能真正把全国统一在一起。蒋介石知道，由于他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很多地区可能对他怀有贰心，因此，他对自己的军队不敢全部相信。他没有能抓住有利时机进行社会改革。由于失去了沿海大城市现代派实业界，他对右派势力的依赖程度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大过，如果采取改革措施，势必引起这帮势力的反对，这是他所吃不消的。他执政是求生存，他无视他不想看的东西。正如史迪威所写的那样，作为一种没有出路的制度的首领，蒋介石“完全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美国公众完全被中国的朋友和支持者以及教会组织的积极宣传所蒙蔽，对真实情况一无所知。国务院的官员，如远东司司长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及其前任、现已调任政治顾问的亨培克，仍然坚持他们过去形成的立场。汉密尔顿 1942 年写的一项政策声明说，当代中国出现的是“一个伟大领袖领导的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这正是美国所期望的”。蒋介石“坚定不移、顽强不屈，而且总的来说眼界开阔，这也许是使中国成为作战盟国的最重要因素”。大约就在这前后，高思大使在报告中提到有人说蒋介石是领导中国积极抗日的伟大领袖的看法时说，“人们在大胆正视严酷事实时，只能把这斥之为信口雌黄”。

罗斯福总统看不出除了支持委员长外，还有什么其他抉择。由于他担心打败日本后会出现真空，而且有人一再劝告他说只有蒋介石能把中国团结在一起，他对蒋介石有求必应，倾

全力予以支持。中国的朋友都希望美国援助中国，他们有的是出于真心实意，有的是为了谋取私利。他们不断告诫总统说，如果放松对中国的支持，重庆政府就会垮台。美国医药援华局局长、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唐纳德·范·斯莱克博士的告诫具有典型性。他告诉总统说，中国的士气"在迅速低落，失败主义分子趾高气昂，蒋介石丧失权力和中日妥协的危险性增大了"。他还转呈了"驻中国西部地区的八名美国负责官员"联名发的一份电报，他说他是从这份电报了解到这一情况的。高思在报告中没有排除如下可能性：中国某些省的将军（如云南省的龙云）有可能同日本媾和，从而让日军进入那些省份。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蒋介石政府"可能很快就会垮台"，也可能被迫撤到援助物资无法运到的陕西省或甘肃省去。高思接着预言说："不管发生任何情况，蒋介石肯定会欣然地把一切归咎于没有得到美国援助。"后来的事实果真证实了他的预言。

虽然陆军部在史迪威的强烈要求下赞成在向中国提供租借物资时提出交换条件，但是，从性格上说，罗斯福是反对这样做的。他不喜欢斤斤计较，认为硬逼着一个遭到围攻的盟国答应这样或那样的条件未免胸襟太狭窄了。他8月份收到陆军部的一项建议，内容是主张明年春天发动缅甸战役，主张向中国调拨租借物资，但条件是中国必须派部队参加缅甸战役和象史迪威建议的那样改革军队。同时，柯里8月初返回美国，他支持史迪威的方针，但不同意采取威逼手段。他对总统说："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规定任何条件，也没有必要在提供支持时附加任何条件。"他还汇报了史迪威与委员长"个人

间的”纠葛，认为他们不和的原因是史迪威对蒋介石插手缅甸战斗毫不掩饰地表示愤懑和蒋介石憎恨史迪威拒不服从他的命令。他建议采取大胆行动，把史迪威、高思和宋子文三人全部撤换掉(如果不撤换他们，他建议作为一项预防性措施，今后凡是总统给委员长的信件，都给史迪威一份副本)。

罗斯福采纳了柯里的建议，认为这是解决令人烦恼不已的中国问题的一种方便的或至少是可行的办法。他以他一贯的乐观口吻写信给柯里说：“我不得不认为，整个局势如何发展取决于任用什么人，而不取决于制订什么样的战略计划，甚至不取决于中英关系或印度局势如何演变。”他答应考虑更换若干人员，“直到我们找到合适的人”。史迪威个性突出、容易伤人，显然是第一个撤换对象。但是，罗斯福的试探遭到马歇尔和史汀生的反对。他们坚持认为，要想收复缅甸和促使中国采取行动，非得史迪威不可。

9月份，盟军计划人员一致同意只在缅甸北部发动一场规模有限的战役，目标是从印度阿萨姆邦的利多打出一条通道，同滇缅公路连接起来。史迪威提议的以收复仰光为目标和有海军支援的全面作战计划——盟军把它称为安纳吉姆方案——被搁置在一边了，这是因为据认为无法得到物资，物资得优先提供给北非战场、欧洲第二战线和俄国。英国人在整个战争期间花了很大气力制订安纳吉姆计划，但是，他们为了避免实施安纳吉姆计划而花的气力则更大。他们同意改为发动一场小规模攻势，收复缅甸沿海若开狭长地区的实兑，建立一个战斗机基地，以便将来发动进攻。他们同意参加北缅战役，但并不热情，因为他们不象美国人那样迫切感到需要把援

助物资运往中国。英国人“重新估计”形势后认为，中国即使不再得到援助，也能再坚持一年。

但是，美国虽然同意满足委员长修改后的三项要求，但不同意派遣美国部队作战。罗斯福 10 月份通知蒋介石，美国从1943年起将拨一百架运输机每月经喜马拉雅山航线空运五千吨物资给中国，此外还将拨二百六十五架作战飞机给中国。罗斯福没有向蒋介石提出任何交换条件，虽然他在电报中说改组军队“对于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至为重要”。

罗斯福在作出最后答复前再次向马歇尔建议“召回史迪威将军，留下惠勒将军担任代理负责人”。他派柯里去向马歇尔转达自己的意见。马歇尔后来回忆说，“有个小矮子”来到他的办公室，卷曲起一条腿，说总统希望撤换史迪威。马歇尔问：“他确实是想撤换史迪威吗？”柯里回答说，是的。

马歇尔问：“是他打发你来告诉我的吗？”

柯里点了点头。

“你在中国呆了多久？”

“三个星期，先生，”柯里回答。

参谋长脸色阴沉，默然不语。柯里只得告辞了。

罗斯福没有善罢甘休。他直接写信给马歇尔说：“史迪威在中国的处境如何？显而易见，这同他和委员长之间的麻烦事关系很大。我认为，如果把他调到别的战场去，他能发挥更大作用。”马歇尔和史汀生劝他说，不可能找到更好的人接替史迪威。马歇尔在写给总统的信中说，打通缅甸线路的人必须是位美国人，而且必须是位军队将领，不应当是谈判代表或物资供应官，这类人“只会起到促进同重庆建立和睦关系的

作用”。

马歇尔的这句话确定了史迪威在中国任职期间一直受到纠缠的问题，也确定了他后来的名誉。如果“同重庆建立了和睦关系”，所有问题都不致会象现在这样难办。如果换个比较谦和、不怎么严格的人，不硬是提出委员长害怕的问题，不硬把他不愿听的真相告诉他，不硬要他采取他不愿采取的作战行动，那么，和睦关系是能够建立的。史迪威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8月份陷入了僵局，该办的事情一再耽搁，他不得不同委员长耍弄手腕。他当时写信给他的妻子说：“从我的观点说，这样去打仗简直是糟糕透顶了，这使我觉得自己完全成了个敷衍塞责的家伙。如果我也是个圆滑的人，也许能取得一些进展。”一个圆滑的人也许确实能在重庆建立和睦关系，但是，建立和睦关系并不是史迪威的使命的目的。

第十三章 “我和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孤立无援”

1942年8月—1943年1月

史迪威能控制的、可以按自己意愿来训练中国军队为反攻缅甸之用的唯一地方是印度的拉姆加尔。他在这里开始筹建特遣部队，他在缅甸退却时就有了这个打算；他可以在这里把他的各种办法付诸实践，他一贯说他的办法能够使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不亚于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当终于克服了印度政府的无休无止的反对和阻挠后（“但是这些狗杂种仍会破坏这项计划的”），8月份在拉姆加尔正式开始了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首批受训部队大约有九千名军人，他们是在缅甸战役中幸存下来后徒步走到印度的。这批人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在住院治疗。第二十二师残部由于委员长犹豫不决的命令而耽误了时间，没有能够赶在雨季的前面到达，这些人历尽千辛万苦，七零八落地逃出了缅甸，他们衣衫褴褛，饿得要死，带着生了锈的破旧步枪，被疟疾和痢疾折磨得精疲力竭，身上生满了那加疮。那加疮是由水蛭咬伤或由水蛭的头留在皮下后腐烂而感染的疾患，常常能致人于死命。患那加疮的人都在拉姆加尔医院里治疗，这家医院初创办时由西格雷夫的部队人员担任医护工作，后来由美国的一所驻军医院作了人员补充。医务人员给中国士兵注射了预防霍乱、伤寒和天花的疫苗，每

天三餐(因而头几个月里每人的体重平均增加二十一磅)，发给新军服、头盔、靴子、背包、步枪、刺刀、卡车、火炮及各种大量的美式装备，中国兵的的确确迅速变了样。

史迪威 8 月份来到印度呆了三个星期，并且在又空运几师中国军队去印度训练的计划终于实施时，于 10 月份再次来到印度。尽管中国许诺派体格健壮的军人去受训，但是在其后两年中，美国派驻在中国的医务人员因体重不足和患病平均剔除了百分之四十的中国兵，未让他们去参加训练。有时在一个月内，一批特别差劲的部队被剔除的人就达百分之八十九。被剔除的人多于检查合格后空运去的人。中国人不赞成西方这种浪费习惯，他们把淘汰下来的人拨给 Y 部队。向印度空运部队的情况是，每架运输机都挤进三十五到四十个瘦骨嶙嶙的人；有些曾用作执行空投任务的飞机连舱门都没有。热情很高的罗卓英说，“把五十人光着身子塞进一架飞机，只挤三个小时嘛！”这位中国指挥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觉得，既然这些士兵定能领到新军服，让他们把旧军服穿走就是愚蠢，是浪费。部队分成小队从昆明乘飞机出发，都穿着短裤，唯一的行李就是防止呕吐用的纸袋。好几个人被冻死了。拉姆加尔的接应人员要求在飞机上放上棉衣，供每趟乘坐飞机的中国兵御寒，但是中国当局认为没有必要这么做。人们到印度下了飞机之后感到寒冷和晕机，但是坐在阳光下晒个把钟头，大都很快就恢复过来了。

史迪威规定最初每天运送四百人，10 月份就达到了这个数字，11 月份超过了这个数字，当时十六架飞机每天运送六百五十人，这使得平日乘客稀少的阿萨姆到孟加拉的铁路达

到了寻常的饱和状态。这条铁路无法按照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速度把部队运往加尔各答。到12月底，已有三万二千人在拉姆加尔受训。史迪威的目标是建立一支由两个整编师加上三个炮兵团及其他辅助部队组成的部队，使它做好准备，参加定于1943年2月开始的收复缅甸战役。他还想轮番训练一千五百名中国军事教官，以实施为中国建立三十个师的计划。在其后的两年中，总共有五万三千人在拉姆加尔接受了训练。

同英国任用白人军官指挥当地部队的制度不同，史迪威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顾问，制订了一项制度，在中国军队的各级指挥官身边派出美国联络组或单个军官以顾问身份行事。基于他在缅甸的经验，这种制度主要是保证部队驻扎在指定地方，并能奉命投入战斗或进入指定的阵地。他的做法是对小股部队进行深入的训练，这是因为他认为如果两个排都做到人人训练有素，把他们编在一起就会知道如何行动。在拉姆加尔训练营地拍摄的照片中，史迪威身穿短裤和敞着领口的短上衣，头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硬边帽，沿着一排卧在地上的中国士兵走动，耐心地在每个人的身边卧下，示范或纠正瞄准动作。他亲自同士兵在一起时心中不只有一个目的。对于这位将军在练习步枪瞄准时卧在尘土中感到迷惑不解的一位美军中士后来才意识到，史迪威努力做的不只是教中国兵，也给美国人树立一个如何进行教练的榜样。

由于语言障碍和缺乏翻译人员，训练大都是靠示范。中国人善于模仿的技巧使示范卓有成效。斯利尼将军说，“谢天谢地，我们不需要讲汉语，也没有足够的译员。我们做示范，

他们跟着学。他们是世界上模仿力最强的人，学得非常非常快。”从来没有见过机器的乡下农民一个星期就学会使用榴弹炮和机枪，并且兴致勃勃地学习操作战地电话和电台。后来在作战中，一些个人得到了嘉奖，这是中国士兵第一次受到嘉奖。“那些英国佬很感兴趣地望着我们，”史迪威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他们看到校级军官们确实在工作，这在他们看来是非常新鲜的事。”

曾在奥德堡军校任作战训练负责人的麦凯布上校在这个训练中心任总指挥。曾当过汉语教官并且在第十五步兵团干过的博特纳上校担任这支特遣部队的指挥部的参谋长。人们知道这个指挥部就代表在印度的中国军队。曾为奥德堡军校安排训练课程并且自那以后组织国民警卫队训练的阿姆斯上校从美国调到拉姆加尔训练中心任教官。

中国军官在拉姆加尔接受战术和作战技术的训练，士兵则接受使用步枪、机枪、摩托车、火箭发射器、反坦克炮及其他用于专门作战任务的装备的训练。在掌握各种武器的使用之后，对士兵进行为时八天的丛林战训练。六个星期的火炮课程是教如何操纵驮载炮以及在丛林中如何使用榴弹炮和迫击炮。战斗兵种的基层军官和军士都接受场地卫生和治疗训练，而为建立三十个师的计划准备的将校军官则由飞机送到拉姆加尔学习六个星期的参谋和指挥课程，这里的课程以利文沃思军校战时的课程为基础。人们的情绪，特别是新建的炮兵部队的情绪是很高的。史迪威主要关切的事情之一是增加炮兵对步兵的比率，使步兵连与炮兵连的比例由九比一变为三比一。中国人了解到他们现在将具有与日本人同等的火

力，这激励着他们为完成四个月内把步兵改造成炮兵的任务而勤奋地工作。

拉姆加尔并不是一个家长式统治下的和睦大家庭；文化冲突是尖锐的，争吵时常发生，尤其是同中国军官之间的争吵。中国军官对从来没有上过火线的美国人批评他们表示不满，他们认为，既然在战场上由他们指挥作战，那就不能使他们的权威在训练当中受到损害。美国人则认为，由于吃败仗而精神不振的中国军官想阻止为进攻缅甸所作的训练，因而就往往绕过他们行事。对双方关系影响更大的是美国人力图避开中国军队中私下克扣军饷的做法，美国人公开点名，把军饷发给各人，而不是把军饷统统交给中国指挥官去分发。史迪威同罗卓英将军的长期争吵在军饷和人员任命问题上达到了最剧烈的程度。罗卓英没有料想到他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事实上成了低于史迪威的第二号人物。“他还想要那套越级的老把戏——由我再做他的参谋长。”为了不再次跌入过去的错误，史迪威这一次注意明白无误地表明他自己的权威地位。史迪威在同中国军政部谈判时坚持要求至少有权处决少校级以下不服从命令的军官，解除少校级以上军官的职务。最后，由于罗卓英将军拒绝接受美国人对他的行政权威（据信他的职位使他在拉姆加尔每个月能得到十万卢比）的干预，他就离开了指挥部。

当事情证明史迪威严禁任何美国人打中国士兵的命令并没有促使中国人采取同样的态度时，美国人相当恼火。在突然发生的争执中，中国士兵曾不止一次拔出枪来。美国人还奉命不得干预中国军队的纪律，他们有时看到中国士兵因为

用手榴弹炸鱼而被随意枪决，或看到一个士兵因为丢了毯子被用扁担打一百二十五下，直打得皮开肉绽，骨头外露为止，他们对此感到厌恶和愤怒。在参谋人员会议上，博特纳向中国指挥官递交说明在去拉姆加尔途中死亡的中国士兵人数的报告，使他震惊的是，他看到报告被扔到废纸篓里，而详细的供应统计名单仍然不变。

清瘦而俊秀、说话慢慢吞吞并且有点口吃的孙立人将军和身材矮小而粗壮、戴着眼镜并且健谈的廖耀湘将军仍然负责他们各自的部队第三十八师和第二十二师。廖耀湘显得比他在缅甸时强一些，虽然他缺少孙立人的那种特性和干劲，孙立人顽强而又自信，敢于同任何人，包括同史迪威顶撞。史迪威在视察摩托学校、医院和射击场时同这两个人一道工作，一道订计划，史迪威对于他能培训军人再次感到满意。

8 月 23 日和 10 月 25 日纪念孙中山的仪式上，史迪威站在中国国旗下用汉语向中国军人发表讲话。他用汉语演讲并叙述中国历史上的事，这给士兵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讲话由于引用了适当的成语而很生动，比如他在谈到为国尽忠时，列举了宋朝大将岳飞抵抗蒙古人入侵的典故，或是引证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鞭策自己记住失败的耻辱。他对士兵们说他代表委员长，他们必须打胜仗，否则他就会在任命他从而给他以荣誉的委员长面前丢脸。他提醒士兵们应当如何为国效劳，并许诺说他们无需担心武器和装备，他亲自保证使他们得到同日本人一样好的武器装备。

“我太忙，没有时间闲逛，”史迪威在家信中写道，他还说他感到健康情况好了一些，体重也有所增加。“假如我能长出

一些新牙齿和一双好眼睛，把头发染一下，我就不会象是年过七十的人了。”尽管加尔各答的一位医生诊断史迪威的一只眼睛患有不很严重的白内障，但是他的视力仍然很好，能够看清细微末节。他看了一部电影，刘易斯·斯通在影片中扮演一名陆军军官，“挺着肚皮，他们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这些呢？”

史迪威到新德里参加各种会议和“讨厌的文牍工作，”他对驻印美军和英军司令部的讲排场和夸张作风感到压抑和难受。德里建筑物上的黄铜顶的光亮据说能在雾天为飞机引航。史迪威不知不觉地纠缠在他所指挥的战区内美国军队行政事务和人事问题之中。嫉妒、辞职、“带有偏见的授勋、盛宴狂饮”、参与越过喜马拉雅山的走私，各种侵吞行为及其他丑闻都需要华盛顿派一位总监来调查。对于无所事事感到厌烦的参谋人员从上午九时办公到正午时分，对于牺牲他们的军事前程而牢骚满腹，并且在许多情况下批评史迪威分派毫无成效的使命，他们完全认为史迪威那样干是有个人野心，要扩大自己的指挥权。但是并非一切事情都是不顺心的。美军供应署署长惠勒就是“一个使人快乐的人”，战区报纸《中缅印战区简报》毫无阻碍，办得很顺利，起了作用。《简报》是在史迪威的战区内办的，史迪威对办报所作的指示是：“如果能证明是事实，就刊登”，该报由弗雷德·埃尔德里奇任编辑，是美国在国外办的第一家军报，由于能自由开展批评，也是办得最活泼的报纸之一。

史迪威在 8 月 30 日的家信中写道，“我现在登上了社交成就的顶峰，总督亲自设午宴招待我。对此我感到非常荣幸。”总督就是林利思戈勋爵，是一位严肃而庄重的苏格兰人，

身高六英尺六，住在豪华的总督府内，这座总督府是英帝国建筑设计的典范。总督府和印度政府大厦紧挨着耸立在一块突起的坚实地基上，是由红沙岩砌成的大型建筑，它们使人想起埃及的带有罗马风格的建筑。政府大道两旁树木成行，没有任何建筑物，像法国爱丽舍田园大街一样。远处有印度门，从那里可一直通到这条大道。在总督府内圆形屋顶的正式接见厅里，高耸着的深红色天鹅绒华盖下立着两只御座。宽敞的接待室有十八英尺高的窗户和色彩鲜艳的东方地毯。天花板上有历代莫卧儿和大君时代留下来的华丽的绘画，宴会厅只有一张宴会桌，周围有一百零八个座位，从台阶上可以俯视宽大的布置整齐的花园，园内有经过修剪的灌木和喷泉；整个宴会厅在使用时需要有三百名脚步轻盈、身穿白长袍的印度仆人。这个宴会厅像埃及的法老纪念碑或凡尔赛的太阳神一样，是统治者们用来描绘他们的永恒和伟大的那类大型建筑。它向人毫无疑问地说明它的建筑者们要在印度长期呆下去。

回到重庆以后，史迪威把在拉姆加尔训练营地拍的照片给蒋介石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经过若干星期的停顿，蒋介石又立即批准再空运一些师去训练。蒋介石可以真正从照片中看到训练情况和火炮，他显然感到满意。“小傻蛋，他为什么不满意呢？我们在拼命帮助他，而他批准一下倒显得好像作出了巨大让步似的。”史迪威苦笑地说，结果是，“人们在受到阻挠和无休止的欺骗之后，”一得到批准就感到大大松了一口气，“使你几乎要对你正不由自主地设法帮助的那个家伙十分感激了”。史迪威不能不认为，蒋介石“除非毫无权力，否则他就要继续耍这类把戏”。

1942 年 10 月 1 日，重庆准备欢迎一位叫做温德尔·威尔基的非常重要的美国客人，此人是自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以来失败最惨的总统候选人。威尔基鼓吹在国际关系中实行“天下一家”哲学，同罗斯福在对外政策上持相同的看法，即使在国内政策上看法并不一致。威尔基作为他的成功的竞选对手罗斯福的特使正在作一次四十九天的环球旅行。从委员长发表的一篇声明来看，中国人认为他是自美国前总统尤利塞斯·S. 格兰特 1879 年访问中国以来到中国访问的第一位“最高级”美国人士。中国人对威尔基感兴趣的一个比较实际的原因是预计他很可能当选下一任总统。威尔基是一位高个子，精力充沛，胸襟开阔，仍然保持着他在竞选中获得的名望和影响。中国人打算在他身上下一番大功夫，其总的目标是使美国增加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当前则是着眼于使美国投入更大的空军力量。蒋介石心里想的就是由陈纳德替换史迪威，这个问题需要审慎地运用影响，而运用影响正是中国人的特长。

在巧妙应付外国人问题上，每个中国人，从保姆和侍者直到蒋介石和他的夫人，都认为自己是能手。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的自信极高，他们的技巧比谁都高明。中国人熟练、坚定、圆滑，常常获得成功。中国人同打算用西方的技术来超过西方的日本人不同，他们从来不试图胜过西方，因为中国人自认为已经优于别人。中国人虽然有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经历，但始终深信他们得同野蛮人打交道，而他们是能对付野蛮人的。中国一个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将军抵达伦敦时对他的一位同事说，“让我来见见英国官员，我要叫他们随着我的小拇

指转。”

威尔基的访问过程绝好地表明了中国人影响美国公众舆论的手法。史迪威写道，“他被弄得喘不过气来。”接连不断地举行宴会、招待会、检阅、宴请、参观学校、工厂、察看女童子军、兵工厂。他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下榻在中国的宾馆，而不住在美国大使馆，这使高思大使大为恼火，很不赞同。这样的安排为的是确保威尔基只能看到和听到他的东道主想让他看到和听到的东西，并且正如史迪威所写，将使他“完全同美国人隔绝，以防美国人坏事。中国人的主意是使他精疲力尽，忙于吃喝，使他的视听等官能麻木呆滞，给他的头脑中塞进各种正面的说教。”

为了这次访问，中国人来了一次装璜门面的行动，重庆的警察拆毁了乞丐的棚屋，把穿得破破烂烂的乞丐赶到市区以外，下令最破陋的小店铺在威尔基访问期间闭门停业。大街上挂着旗帜，墙上贴着欢迎标语；从机场到市区的十一英里长的道路两旁排列着挥手欢呼的小学生；平民们奉命从警察那里购买用纸做的中美两国国旗。威尔基并不是没有注意到他所看到的场面是经过组织安排的，但是由于他是一位耿直爽快的人，这个场面仍然使他感动，因为这“令人印象深刻地表明人民的力量和感情，而中国的巨大力量就在这里”。威尔基就是在这种浮光掠影的亲善中继续进行访问的。

两名中国陪客在威尔基访问期间自始至终紧随着他，一位是在美国受教育的能言善辩的董显光，另一位是西北第八战区总司令朱绍良将军，此人是深得委员长信任的密友。虽然朱绍良将军不会讲英语，但是据威尔基说，朱绍良将军以

“我迄今所见过的最讨人喜爱的品格弥补了不会讲英语的缺陷”，朱绍良的品格无疑是他被选来作陪客的原因。威尔基没有一次在会议或宴会上结束讲话时，“不看见他最友善地朝我微笑”，这种微笑使威尔基觉得中国是个“处处有美国朋友的热心好客的国家”。

从威尔基按表面价值接受别人告诉他的事和让他看的东西的这种能力来说，他所获得的印象是值得称道的。他后来把这些印象分十期连续在报上发表，介绍给美国公众，并且写了一本名为《天下一家》的书，此书立即成了售量空前的畅销书。书商在头四天就提出了二十万册的订单，八个星期中销售量就达一百万册。中国人作的投资是再好不过的了。

中国在一个四周有洋式建筑的大阅兵场上为威尔基举行了一次军事检阅。观看检阅的显贵们衣着华贵，卫兵和警察戴着白手套，接受检阅的部队头戴钢盔，装备精良，肩扛武器以整齐的队形和德国鹅式正步从检阅台前通过，随后是坦克、装甲车和携带三角旗的骑兵队。这是一支供展览的军队。这位贵宾还观看了成都军校数千名学员作的“令人激动的”表演，他们手举步枪游过湍急的河流，在炮火的浓烟中爬上一个高地，剪开铁丝网前进。威尔基没有看见用绳子捆绑来的新兵，也没有看见经过三个星期训练就送往前线的士兵或是送往拉姆加尔填补受训部队缺额的骨瘦如柴的病兵。威尔基报告说，“中国的军队是团结的；其领导人都是训练有素的能够胜任的将领；军队是由那些知道自己为何打仗并且知道如何打仗的人组成的能征惯战的队伍。”这支军队的思想和士气如此之好，“就连那些富家子弟都在军中当兵”。讲这句话无疑

是董显光富于创造的想像力所造成的结果。

史迪威不悦地注视着威尔基听信那种冲淡改组中国军队必要性的宣传。在中国军政部于一个军事俱乐部为威尔基举行的一次有委员长出席的鸡尾酒会上，何应钦将军提议威尔基去西安附近黄河弯曲处的“前线”察看，这个地区恰好是史迪威二十年前修公路的地方。中国有若干专门供来宾参观的这类与日军占领区交界的前线，来客通常是由人陪伴去参观。“威尔基先生当然应该去，”史迪威将军在满厅中国高级军官之中大声说，“他不应错过这个机会。这是中国最大的市场。日本人和中国人在那里买卖各自需要的各种货物。”史迪威很少不讲礼貌，除非故意如此。他通常在不耐烦而又装出有礼貌的时候会说:“哎，别说得了。”他上面的那句话就是表达这个意思的另一种方式。

去前线的察看如期成行，威尔基认为这次察看是他自己的主意，并且是在克服了委员长“为我的安全的担心”之后才作安排的。访问团从西安出发，乘火车和四轮小车沿着史迪威曾经随着冯玉祥的军队走过的路线到达黄河。前线本身就是黄河，这一段河床宽一千二百码，威尔基发现“并没有我们原来料想的那种有形危险”而略感失望。然而能用望远镜“俯视日本人的炮口”是令人满意的。他的陪同、委员长的次子蒋纬国上尉表示，这个前线并不只是供人参观的场所，这话使威尔基感到满意。蒋纬国回到火车的餐车时双手抱了很多送给客人作礼物的日军骑兵战刀，还有法国名酒。他说，这两种东西都是袭击队夜间渡河缴获来的，还有其他战利品，包括“俘虏和军事计划”。但是没有让威尔基看一个俘虏。

常驻记者们对于参观这类“冷战场”都习以为常了，人们总是能看到成堆的日本枪炮、钢盔和其他装备。有人认为这些东西是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供人参观的。为了验明这种说法是否属实，一位报社记者说，他曾把他姓名的头几个字母刻在一个钢盔上，几个月后在另一次参观中又看见了这只钢盔。

除了中国恶性通货膨胀和腐败现象不容忽视以外，对于蒋介石的统治的任何缺点，威尔基都因考虑到盟国的事业和他把中国看得很理想的惯常态度而只字不提。至于会使人不愉快地想起法西斯的那种独裁统治现象，威尔基却婉转地说成是对中国生活的“集中控制”，这对于发展过程中的“监护阶段”是必需的。如果教员、编辑或大学校长告诉他有关贪污、镇压或同敌人做买卖的事，忠实的董显光总是向他作保证——然后他就向他的美国听众保证——说，同这些弊端作斗争的正派力量得到了委员长“坚定的支持”。蒋介石以他的沉着庄重以及穿着中国式长袍显示出来的“学者”风度，使威尔基觉得他“比人们传说的还要伟大”。向这位可能当美国下届总统的人大肆运用魅力的蒋夫人的热心助长了威尔基的这种印象。威尔基沉醉于圆通而热情的气氛之中，并且设想了继续这种交往的快活方式。他建议蒋夫人到美国作一次亲善访问。这将能达到他真心确信的双重目的：蒋夫人的访问“对于我国人民了解亚洲问题是极为重要的”。“蒋夫人以她的头脑、说服力和道义力量……以她的智慧和魅力，豁达和宽容的心胸，优雅而美丽的举止和容貌，炽热的信念……将是十全十美的大使……我们会以对别人从未有过的态度恭听她的见解”

——这个预言不久就证实是正确的。威尔基对他的想法非常热心，他在最后一次谈话中一再敦促蒋夫人“明天”一定要与他同机去美国，说他保证使罗斯福满足她要求得到的所有飞机。

委员长对英语一窍不通。据美国使馆中在中国长大并且在蒋介石的这几次接见中在场的约翰·卡特·文森特说，蒋介石觉得，体格健壮、宽胸脯、头发蓬乱的威尔基是中国人觉得身上有生牛肉味道的那种外国人，这种气味使得蒋介石在客人告辞后叫人把窗户统统打开，“把洋人的味道放出去。”

虽然史迪威讨厌图谋向别人施加影响的作法，但是他觉得这一次有必要向威尔基施加影响，因为刚从华盛顿回来的戴维斯带来了令人泄气的消息。“这个战区完蛋了。不会再给援助了……看来柯里是想卡我的脖子。中缅印战区没有多大希望了。‘主要战略努力是在别的地方。’陆军参谋长说不给地面部队。”在这同时，有人提醒史迪威说，“蒋介石在指挥权问题上正要阴谋诡计。”史迪威想在威尔基见到委员长之前把基本情况给他通个气，但是威尔基疲惫不堪，昏昏欲睡，对史迪威所说的话心不在焉。史迪威第二天又和他谈了一次。“什么用也没有。他连一个问题都没有问过。他完全被蒋介石夫妇骗住了。他还劝我去竭力恭维。他这套废话见鬼去吧。”这天过后史迪威又在日记本上写道，威尔基“不是疲倦不堪就是对我非常冷淡。实际上是既没有什么可说，也没有什么要问。这样的态度几乎十分明显。”

与这相反，顺着蒋介石夫妇的愿望，威尔基却非常乐于听取陈纳德提出的见解，陈纳德想趁此机会使他的计划得到采

纳：利用驻扎在中国的空军打败日本。陈纳德得出的结论是，只有让他本人代替史迪威任这个战区的指挥官，这个计划才能得到所必需的支持。蒋介石夫妇也是这个结论。只要史迪威掌权，他就会坚持把运过喜马拉雅山的供应物资大部分供中国步兵进行艰苦的地面作战使用，这个意见不合蒋介石的心意，陈纳德也反对，这两个人的利益暂时是一致的。委员长想满足美国对他作为一个盟友提出的积极作战的要求，他的办法是采取空军行动，而对于这种行动，他也仅仅是提供机场而已。陈纳德则由于同上司史迪威闹翻而愤愤不平，想单独用他的飞虎队打赢战争，以此来证明他的空军作战的理论，使自己名垂史册。两人出于各自的考虑，都想美国空军积极参战。就中国的未来而言，中国自己建立一支空军部队会比美国空军更顶用，但是正如陈纳德已经察觉到的那样，中国缺乏组建空军的志气。

陈纳德的战斗机队的声望到此时是很高的。他本人由此而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能力，因为他认为他们的行动在日本人五月份从缅甸突入云南时曾使日军未能越过萨尔温江。经过快速反应战术训练的战斗机飞行员们在屡次空战中取得了对日本人的优势，陈纳德认为在空中取得优势就等于阻止了日军在地面的行动。另外，他们使日军不敢到华东各个城市去狂轰滥炸，以他们的威名，加上在地面设置的使敌人信以为真的一排排假飞机，使重庆在二十多天内没有遭到日军的野蛮空袭。他们骁勇善战的佳话在中国广为流传，因而陈纳德成了中国人心目中最出名、最令人敬佩的英雄。

空军应当作为制胜的武器，这是自然的。但是谁也没有

忘记飞机如同鱼离不开水一样依赖于机场。史迪威在一次视察途中对工程兵军官亨利·拜罗德上校吼道，“你们建这个机场到底干什么用？”

“陈纳德说要用。”

“他打算怎样保护这个机场？”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陈纳德和他的追随者们眼睛盯着“最适宜条件”，他们假设机场的保卫工作可由中国军队负责，而中国军队对这项工作毫不了解。“飞行小伙子们”由于他们的行业，都倾向于忘掉地面而依靠斯科特上校作出的“上帝就是我的副驾驶员”的假设。斯科特就是在缅甸驾机援救史迪威的那位飞行员。飞行员对中国的看法由斯科特表达了出来，他写道，“西安在昆明的北面”，而这个情报的用处约莫同说波士顿在墨西哥城北面一样。

由于史迪威一个劲地强调地面行动，在陈纳德以及他的那帮狂热的信徒们看来，史迪威是阻挠用空军取胜的一个老朽无能、行动迟缓的死顽固。只要能把史迪威挤走，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也在所不惜，其中包括施加政治影响、幕后操纵、使用宣传办法。威尔基就成了可以把他们的意见直接传给总统的渠道。

陈纳德若是没有史迪威的许诺，是无权正式同威尔基接触的，史迪威明明知道陈纳德不怀善意，却同意他与威尔基接触，这使陈纳德大为意外。史迪威告诉他，他可以随意向威尔基谈任何事情，甚至陪同威尔基去重庆郊外的白石驿机场，在那里，陈纳德当时正背对他指挥的一排机首绘有鲨鱼形的P-40型战斗机站着，很有点画意。史迪威让这两个人在陈纳德

的办公室内单独谈了两个小时话。威尔基临走的时候带着一封转交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信上日期是1942年10月8日，这封信是有关战争的特别文件之一。

陈纳德在这封信里宣称，只要有一百零五架新式战斗机、三十架中型轰炸机、十二架重型轰炸机，并保证随时补足上述数目，他就能“叫日本垮台……或许只要六个月，至多不超过一年。”① 他告诉总统说，这是他作为一名专业空军人员提出的“内行意见”。这个军事任务是只需费吹灰之力就能完成的“简单的事”。陈纳德没有掩饰他的观点，而是大胆地提出让他拥有“美国驻华军事指挥官的全部权威。”假如有了上述权威，他打算向罗斯福保证取得不仅仅是军事方面的胜利。他以政治家自居，“相信……我不仅能使日本垮台，我还能使中国人永远成为美国的朋友”，“我能和中国人建立起非常亲善的关系，使中国在今后许多代人中成为美国的巨大而友好的贸易市场。”陈纳德避而不谈这个许诺的真实意图，而是回到他的军事战略的题目上来，他这样做也许是明智的。他的战略所依据的论点是“可以在中国打败日本”，他可以迫使日本空军“按照我选择的形势跟我作战”，从而打败只有有限的飞机生产能力的日本空军。只要这样缠住日本空军，美军在西南太平洋的攻势就可以“随意”推进，在这同时，“我保证摧毁

① 陈纳德原先打算用一百四十七架作战飞机在六个月时间内打败日本，后来战争打了三年多才击败日本。且不谈陆军和海军的战斗，单单空军，就有九支陆军航空队从印度、中国、太平洋、阿拉斯加等地出动参战，还有一支海军航空兵参战。海军航空兵到1945年有九十艘航空母舰，一万四千八百四十七架作战飞机。最后还是投了两枚原子弹，才打败了日本。1945年8月初，在袭击日本的一次行动中，就动用了八百零一架B-29型轰炸机。

日本的主要工业中心。”

为了使他能执行这项计划，得加强从印度经喜马拉雅山的空中运输线，并且要保证这条空运线的安全。但是他又显然以针对史迪威的口气补充说，不要按照当前“完全缺乏真正使用空中力量的主张甚至缺乏基本军事战略”的方式来办。陈纳德说，假如授给他“全权”，他就会像西皮奥·阿弗里卡纳斯以袭击卡西奇来保卫罗马那样，或者采用格兰特切断李的交通线来保卫南方的办法，以袭击日本本土的办法来保卫喜马拉雅空运线。整个计划是“容易的”，这个字眼在信中出现了四次，“我有把握取得胜利”这句话也在信中反复出现多次。假如授给我实权，“我能叫日本垮台。”先决条件是让“我完全有自由采取作战行动”以及同委员长直接打交道。他的信件中唯一提到地面行动的一处是说，他的计划将“使中国地面部队能够顺利地作战。”

这封信是一位军事救星的自荐书。它表明陈纳德是如何想当上最高指挥官，当不上最高指挥官，他的救星作用就无处发挥。这封信还说明为什么陈纳德对于阻挡他晋升之道的史迪威的愤懑变成了刻骨深仇。从军事角度讲，陈纳德的建议有一种“简单的逻辑”，假如战争中不发生意外的事情，这种逻辑是行得通的。由于陈纳德忽略了种种现实情况，正如马歇尔后来说，他的观点“纯粹是胡扯；连蹩脚战略都称不上，纯粹是胡扯。”然而罗斯福看得并不这么清楚。陈纳德的信具有经过实际考验的出色军人的权威，否则就可能被作为狂妄自大而抛在一边。陈纳德的直率性格和麦克阿瑟的自信性格相仿，这种性格在当时那个暗淡混乱的时代几乎是受欢迎的。

陈纳德之所以值得注意并不是因为罗斯福相信他能使“日本垮台”，而是因为如果他能实现他的许诺的哪怕一个部分，就值得给他以所需要的手段。

在陈纳德的信发出以后，委员长就通过他的美国密友、美国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麦克休上校向美国进一步施加压力，要求召回史迪威。曾担任过语言教官并编写过一本中文课本的麦克休，三十年代曾是委员长当时的顾问端纳的密友和高尔夫球伴，那时，他每星期总有三四次去蒋介石家吃午饭。作为内圈人物，麦克休曾是约翰逊大使的耳目，这使当时的另一位武官史迪威上校感到愤怒，他看见麦克休总是鬼鬼祟祟，总是跟大使嘀嘀咕咕。

蒋介石夫妇现在邀请麦克休共进午餐，并向他强调指出了以陈纳德替换史迪威对盟国事业的好处。麦克休在给海军部长诺克斯的一项报告中衷心赞同蒋介石夫妇的建议。他在报告中说，史迪威坚持收复缅甸是由他战败产生的个人雄心，那是浪费军力，会妨碍按照陈纳德的计划有效运用空军力量。“如果把史迪威将军和比斯尔将军及他们的大批参谋人员都撤换掉”，特别是“如果把指挥棒交给陈纳德”，委员长就会感到鼓舞，“这个战区的战争就会得到实在的好处。”委员长希望让陈纳德拥有全部控制权。无论是比斯尔还是布里尔顿还是史迪威的任何空军参谋人员都不了解空军战略的基本原则，史迪威本人“甚至都想不到空袭会给日本造成什么样的损失。”

海军部长诺克斯把这项报告转交给了陆军部长史汀生，史汀生又把报告交给马歇尔，马歇尔对这项报告火冒三丈。

当他得知麦克休在德里又向韦维尔提出他的主张时就更加恼怒。马歇尔认为，这样插一手给美国在中缅印战区的作战努力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他愤怒地要求海军不要让当时正在归国途中的麦克休再去中国任职。在这同时，麦克休报告的一个抄本送到了罗斯福总统那里，据说总统“以很大的兴趣”看了这项报告。

罗斯福已经打算把史迪威调走，因而就容易接受别人代表陈纳德向他施加的压力和把力量集中于空军的主张。但是他遭到了陆军部长史汀生和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反对，他们认为重新开进缅甸是必要的，不但同空军行动不矛盾，而且是对空军的支持。一条可靠的供应线对于满足在中国作战的陆军和空军的需要是必不可少的。史迪威本人曾错误地认为——正如他当时在给史汀生的信中所说——空军运输队“最多只不过能供应极少量的重要物资”。陆军部则不那么悲观，在评论陈纳德的计划和麦克休的报告时提出了一个基本论点，说即使空军运输队能得到加强，运输必要的供应品，但是只要日本人占领着缅甸北部，这条航线及其终点阿萨姆就容易遭到日军攻击。为了挽救这条空运线，有必要把部队开进缅甸。为了给中国地面部队运送作战物资，有必要再开辟一条地面运输线。作战处说，“只有收复缅甸”才能达到上述目的。

对后勤供应和空军的地面根基不感兴趣的蒋介石根本不愿接受这个建议。陈纳德和他的许多追随者也不愿接受。

对于陈纳德想取得最高指挥权的要求，陆军部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军事首脑机关认为他是一位自行其是的人，他

通过“外交渠道”直接向总统呼吁以及继续鼓动他的人四处游说，这就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使问题更加糟糕了。但是，自以为救星的偏见使他不愿承认这件事办不到。陈纳德在他的宣传助理约瑟夫·艾尔索普的狂热支持下，认为指挥权应当而且可以归于他。蒋介石夫妇认为毫无疑问，只要施以政治影响，任何事情都可以办到。由于蒋介石夫妇不停地使劲，也由于听信艾尔索普的哈里·霍普金斯的不断努力，要求采纳陈纳德主张的活动越来越见效了。

马歇尔和史汀生分别在同决定于 10 月 10 日返回重庆的宋子文谈话时明确重申他们支持史迪威。他们向宋子文说明了支持史迪威的用意——期望采取军事行动。正如史汀生所说，供应中国装备的问题依赖于重新开辟地面运输，重新开辟地面运输线又依赖于军事行动，而军事行动又取决于美国代表。由于英国人和中国人都承认相处不融洽，这就需要美国代表是一位“善于作战的军事领导人”，而不仅仅是一位圆滑的外交家式的人物。史汀生要求宋子文转告蒋介石，“更需要的是辣椒而不是蜜糖。”

马歇尔私下告知史迪威，有人想通过柯里和麦克休的活动使他被召回国。马歇尔向史迪威保证支持他。他还劝告史迪威要比常人耐心和有涵养，“比你通常耐心和有涵养得多。”

在重庆，冬季已经来临。随之而来的是细雨浓雾、道路泥泞，但是至少比夏季几个月中可怕的湿热好受一些。何应钦同史迪威又进入一个合作阶段。由于史迪威坚持要求中国采取行动实现筹建三十个师的计划，以便证明有必要继续按照

租借法案提供援助，何应钦答应“解决一切问题”。史迪威寻思，“上帝啊，能做得到吗？”何应钦每次作出的保证都使史迪威相信他是在向前迈进。

为了准备在缅甸采取地面行动，战略情报局派遣了由前财政部人员卡尔·F. 埃夫勒上校为首的特别小组，这个特别小组的首要任务是不让日本人使用缅甸的密支那机场。特别小组要组织人破坏铁轨、桥梁、铁路车辆和内河油船，使日本减少往这个空军基地运送的燃料。史迪威在这个小组临行前的指示是，“埃夫勒，如果我听不到从缅甸来的好消息，你就不要来见我！”

由于给史迪威配备了一名积极能干的助手，他马上授权办事。负责处理整个战区广泛的后勤事务的惠勒将军回忆说，“他从来不告诉我该干什么，只是告诉我他需要什么。”尽管怀有不满情绪的人时常要求调到有较多晋升机会的战区去，但是那些“可靠的老人员”仍然跟随着史迪威。他们是：他的指挥班子中的副长官和“台柱”比尔·伯金；他的高级助手卡尔·阿诺德；他以前的高级助手、现在被任命为炮兵指挥的多恩；作战指挥官鲍威尔；医官威廉斯；还有梅里尔和保罗·琼斯。史迪威派人调来了他的当时已是中校的儿子小乔，小乔于 11 月到达后在情报部工作。史迪威还叫他的女婿欧内斯特·伊斯特布鲁克上校同阿姆斯上校一道去拉姆加尔训练营地工作。他把保罗·琼斯从德里调来，因为他喜欢身边有个老朋友同他叙家常，而且琼斯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很顶用的。“无论你叫保罗干什么——管理铁路、搞后勤供应、管理苦力或是修理卡车，他都能干好。我希望手下有一百个像他

这样的人。”史迪威在平基·多恩的帮助下设计了一种老鼠勋章悬在双十字之间，他把这种勋章送给那些“躲开我们的人”。“平基的性格越来越粗暴——对许多人发脾气……他一直非常憎恨所有的伪君子和自命不凡的人。”

10月14日，在收到美方对三条要求作的答复之后，蒋介石着手准备在缅甸发动进攻。他向史迪威提交了一份中国的作战计划(事实上是史迪威自己的计划)，这项计划再次坚持要英美两国派遣足够的海军和航空母舰，在孟加拉湾建立海上和空中优势，并在仰光作两栖登陆，以此作为中国派遣十五到二十个师参战的先决条件。现在的问题是要英国表明态度。史迪威为此事于10月15日前往印度。为了使这两个话不投机的盟国共同行动，史迪威使用了他称为“拉袖子”的技术。他解释说，“活见鬼，我什么作用都不起，只不过是当跑腿人。我跑到重庆拉住委员长的袖子，告诉他最好准备向萨尔温江推进，因为英国人打算从南面进入缅甸……假如英国人单独行动，中国人就会大大丢脸。然后我又飞往印度，拉住阿尔奇的袖子”说，“委员长即将向萨尔温江推进，你们最好也行动起来。如果中国人敢打，你们不敢打，你们英国佬就会丢脸。”

英国人已在中国增加人去拉姆加尔受训的问题上制造麻烦。虽然韦维尔允许中国增加人数，但是印度总督林利思戈勋爵把这个问题提到伦敦去决定。史迪威的怒火一下燃烧起来。“他们决心要在这个问题上找麻烦。给乔治① 拍份急电请求帮忙。”如果英国人停止让中国军队去拉姆加尔训练，委

① 指乔治·马歇尔。——译注

员长由于受到侮辱，可能"推翻整个计划。"史迪威意识到，英国的动机是出于"长远政策考虑：担心中印合作。"这项长远政策——就英国人而言，关系到英帝国的利益，就中国人而言，关系到在国内能否维持下去的问题——事实上左右着两个盟国的作战行动。它们所关切的不仅仅是如何取得战争胜利，而是如何在战争中扩大或者至少是保全现存的利益。美国还没有采纳克劳塞维茨提出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见解。人们仍然认为战争是一种异常现象，应当尽快结束战争，社会才能继续它常规的生活。

在德里，韦维尔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困难，表明预定要来拉姆加尔受训的两个中国师不受欢迎，理由是铁路运输拥挤，每天最多只能运二百军人，卡车和牲畜运输力量都不够，这样运输军人是同印度军队争夺物力。史迪威说，"总之，他们不想让中国军队参加收复缅甸的作战。"韦维尔想了解还有多少中国军队要来，来干什么。"来干什么？我的天呀，我叫他们来帮助我们盟国收复缅甸。"

英国的担心不是毫无根据的。几个月后，中国新闻部于1943 年 7 月发表了一幅地图，这幅地图重申中国原来的要求，即整个北缅都是中国领土。

史迪威在同韦维尔会谈的第三天发现对方有了明显的变化。"他们将把利多划一个地段给我们。他们给我们供应物资……一切事情又获得圆满解决，显然是乔治使了劲。"韦维尔大体上同意以收复整个缅甸包括收复仰光的"安纳吉姆"行动计划作为"规划战斗的基础"。规定史迪威带领中国军队从拉姆加尔进发的路线是北缅的胡康谷地，英国人确信他无法

通过这个谷地。这支军队的目标是夺取密支那及其机场以及同驻扎在云南的部队汇合。成立了一个联合计划班子，梅里尔任史迪威的代表。据推算，要把中国军队从拉姆加尔运到利多，再从利多运到北缅并使他们坚守住战场，每天需要八百辆汽车沿三百五十多英里长的交通线运送供应物资二百吨。英国提供五百辆卡车，还有运载火炮的牲畜。英国人有某种先见之明，建议考虑空运。当时一百万印度劳工正在修建机场。根据进一步达成的协议，美国将负责修建一条公路，这条公路从利多开始，经胡康谷地随着前线部队向前推进，给部队运送补给。这条公路最终将同滇缅公路连接起来。

利多公路是美国"支援中国"政策的另一项工程，英国不需要也不喜欢这项工程。他们宁可使前线无路以利于英国在运输方面保持垄断地位，更重要的是，因为英国不想让中国人有进入印度的途径。由于华盛顿的坚持，也由于公开拒绝会更加引起中国人的激烈对抗，英国人才表面上同意筑路计划，但是他们在幕后从来没有停止过反对和阻挠这项计划的实施。虽然英国工程人员在荒山僻野中几乎同样困难的条件下修筑了一条穿过达武山口的道路，但是他们宣称无法修筑起自利多的这条路，筑这条路是劳民伤财。英国人同意仰光战役的原因是想使筑路计划拖延下去，但是由于英国人的真正意图是等待时机夺取新加坡而不是夺取仰光，他们的这个保证就不很可靠。

史迪威在家信中写道，"要鼓动两个民族来共同对付日本鬼子真不是容易事"，但是在他看来，前景似乎有了改善。他发现英国佬中有"一些好人"，他又一次同林利思戈勋爵一道

进餐，勋爵向他探问中国人在战后大概会采取什么行动。史迪威对勋爵的看法是，“他作了某种独立思考。”《简报》主编埃尔德里奇在给史迪威家属的信中写道，乔大叔仍然“象蟋蟀那样到处跳……无论什么事情都想过问”，违反了有关军服的所有规定。史迪威原先最不赞成穿短裤，“但他现在却穿着短裤去参加宴会”，虽然规定在日落之后禁止穿短裤。那顶旧军帽，通风凉爽，适用于热带地区，但却是用一根鞋带而不是用皮带系着的。

现在委员长来了个新的大转变，十分乐意和合作。他在11月3日的一个会议上同意调十五个师到云南方面，把他所有的炮兵分配到这十五个师，并命令它们在次年2月15日前准备完毕。史迪威说，只要部队训练有素，指挥得力，十五个师就够了，蒋介石在其夫人的示意下立即同意史迪威挑选十五个师并任命各个师的指挥官。史迪威寻思一番之后认识到蒋是要使他在失败时无法为自己开脱，假如他的提议照办了的话(而实际上从未得到贯彻)。蒋介石同意让史迪威指挥在拉姆加尔的中国军队，随时可以解除罗卓英的职务，并且重申他坚持要海军和空军取得支配地位，“否则他就不行动。”

“干了一些事。如果中国人说话算数就好极了。我们已向前迈出了最大的一步。”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的促进力量是宋子文，他刚刚回到重庆，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本人的立场取决于他能按照租借法案借到多少款子。宋子文在同史汀生和马歇尔会谈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他要把事情办得好一些就得同史迪威合作，不能同史迪威作对。他来的时候给史迪威带

来--只手表和一个打火机作礼物，并且显然说服了委员长，使他相信要是赞成而不反对史迪威采取军事行动，他就能从美国获得更多的物质援助。宋子文现在代替不久就要前往美国的蒋夫人，成了委员长的一位活跃的密友和中间人。史迪威没有给宋子文起含有贬意的绰号，就从这一点来衡量，史迪威对他的帮助的高度评价是真诚的。同中国军政部的会谈开始取得了结果。“开始显得有了某些成果。确实同意发动一场进攻战役。确实派遣军队，缩减师的数目，补足定员，补充武器，配备火炮……传出来的消息说我现在在这里起作用了；在他们对待我的态度方面，这是显而易见的。”

蒋介石曾经许诺过把第一次缅甸战役中的后勤负责人俞飞鹏和前第五集团军司令杜聿明调离同Y部队有关的任何机构，在史迪威的坚持下，宋子文甚至使这个诺言得到了贯彻，或者说当时在表面上这么办了。但是在杜聿明的问题上，中国人的内部彼此关系比诺言要牢靠，每次史迪威认为他摆脱了杜聿明，但是杜聿明又以另一种身份重新出现。

关于供应和运送改编的三十个师（Y部队就从这三十个师里抽调）的计划是由中国军政部作战处参谋人员同从德里来的惠勒将军谈妥的。军需库、运输管理、医疗、通信、工程服务以及从蚊帐到榴弹炮的各类问题都是议事日程上的事。改编中国军队一个团使之达到规定的实力所需的人员和物资的确切数字，以及按照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各种援助的比例已经由在中国作战处工作的美军人员于近数月具体拟订好了。为了保证Y部队最初阶段的作战需要，据估计在2月15日以前的三个月内需要经喜马拉雅航线运输四千三百吨物资。

由于运输这批物资要挤掉给陈纳德运输的燃料，陈纳德对此强烈反对。史迪威这个时候只是把陈纳德看作是多少能予以原谅的不守纪律的自负者，而没有把他看作主要对手。史迪威在陈纳德早些时候表示反对时指出，“陈纳德吵吵嚷嚷地抱怨别人，他是个可恶的家伙，仍然对比斯尔有怨恨。告诉他不得开口，要服从命令。”那些物资还不够。Y部队的需要以及据史迪威计算中国地面部队每月继续需要三千五百吨物资，不久就使争端公然爆发出来了。

史迪威早已在心中盘算来年再训练三十个师，最终第三批再训练三十个师，以便达到他为中国陆军组建一百个满员师的目标。他仍然计划在收复缅甸之后发动战役夺取汉口，夺取汉口以后再进攻他曾于1927年前去执行过重要使命的地点徐州，从徐州可以对日本发动空袭。史迪威根本没有忽视空军的力量，他在致宋子文的一份备忘录中敦促“要确实大规模加强空军，支援作战，并且立即利用空军对日本进行猛烈的连续轰炸。”

中国军界越来越多的人支持缅甸战役。据宋子文说，他们觉得史迪威是唯一信任中国军队的人。在全国军事委员会中围满了人的大会议桌旁，人们向史迪威提出了严肃而又实际的问题：“我们确实干起来了。”军械部门在待命，各个师都充实了人员，配备了火炮，美军供应署在听取意见。主管军械的俞大维“百分之百地站在我们一边。”李宗仁“非常赞许和友好……所有这些人现在都赞成收复缅甸。”史迪威11月19日写道，“我们行动起来了”，他还祈求好运道。他写道，“要是能鼓起韦维尔的热情就好了……”

不到两天，形势就捉摸不定了。“印度传来了不祥的消息。英国佬在考虑保持有限的战线。他们的目标是若开山、钦山、加列瓦，这简直是开玩笑。”英国海军上将詹姆斯·萨默维尔爵士和皇家空军采取推诿态度。“总的来说，英国人想固守北缅，等到来年秋后再认真行事。”这种又举棋不定的犹豫态度反映出北非战场情况难以捉摸。盟军于11月8日在北非登陆，随之历经一系列混乱局面，唯一确实的结果是这场战役得拖下去，使中缅印战场的大战役的序幕到1943年年底才能拉开。在太平洋上，两艘美国航空母舰为了守住瓜达卡纳耳岛而被击沉，使美国太平洋舰队只有一艘航空母舰了。在大西洋上，船只损失严重，特别是摩尔曼斯克航线，一个船队的四十艘船损失了十三艘之多。当各个战场要求增援时，盟国对于其战略目的争执最大的中缅印战区就成了难以一致同意增派力量的一个地方。

马歇尔在一封信中把上述情况向史迪威作了说明，史迪威恰好在感恩节那天收到马歇尔的信。史迪威概括了一下，“至于我们的‘战争’，我们获得了宽厚的待遇：(1)我们根据租借法案借到的资金；(2)有训练人员；(3)给了某些工程设备，究竟多少尚不清楚；(4)‘空运的效率日益提高。’我的天呀，这些就是我们得到的可以投入一次战役的支援。我不清楚他们会给非洲战场什么样的支援。我得用这样的前景来安慰中国人吗？”史迪威那天夜里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和我象在一只木筏上孤立无援，我们两人只有一块三明治，而营救船则在离开我们驶向远方。”

史迪威在给陆军部的一封愤怒的复信（这封信即使不是

寄给马歇尔的，也是有意让他看的）中说，如果要给他的实际上就是表示一下支持的话，他是不再要这种支援了。“我读了你的牢骚信，”马歇尔后来在复信中说，“我对你的态度表示同情。”

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一周年那天，韦维尔建议“取消”进攻北缅计划。北缅战役就此宣告完蛋了，虽然拖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完全寿终正寝。在韦维尔提出建议的同时，史迪威恰巧得到马歇尔捎来的话说，美国已决定加强对北缅攻势的支援，其依据是重新打通缅甸的地面通路将可以使驻扎在中国的空军加强活动。首先是满足北非战场的艾森豪威尔的要求，紧接着就是满足史迪威的要求，其中包括派遣六千名从事筑路等任务的勤务部队，这足以表明这一决定的意图是真诚的。

史迪威赶到印度。英军司令部“极为悲观，并采取阻挠态度”。韦维尔把各种障碍都唠叨了一遍：“一切事情都非常困难……雨季期间无法供应部队军需品。日本鬼子在内地有公路网……对中国Y部队的行动非常怀疑。英国军队要等到1943年11月才认真干。”目前，韦维尔把他原先计划使用的七个师削减为三个师，除了保证要拿下实兑和在钦敦江组成一条防线以外，不愿作任何承诺。

这一次华盛顿向伦敦施加的压力丝毫不起作用。史迪威以前手下的情报人员、现于陆军部任职的罗伯茨上校认为，“英国人将尽一切办法阻挠任何中国部队在缅甸作战。”英国人坚持说，他们缺乏控制孟加拉湾以及支援军队在仰光登陆

所必需的海军力量。由于以上两个行动是蒋介石提出的他采取行动的先决条件，如果不能满足这个条件，蒋介石肯定会缩回去。史迪威回到重庆后感觉到中国人有停止做战备的架势。何应钦又要起蓄意拖延的手腕，然后又以时间不足为借口。在商谈的过程中，史迪威收到何应钦给他的一封长信，“他告诉我，摔破了一些箱子，还摔破了一瓶碘酒。他解释了希望我们在这类事情上所遵循的办法。”史迪威发火了，何应钦这个人身兼史汀生和马歇尔两人所担任的职务，“就连在印度洒了一瓶碘酒也要唠叨一番。”这同缅甸战役失利期间蒋介石要求给部队发西瓜属于同一类鸡毛蒜皮的琐事。史迪威在盛怒之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民必定有极大的紧密团结力量，使他们能够经受得住他们的所谓领导人的玩忽职守和治政失当。”正是这种认识使史迪威直到他的使命结束都坚持不懈。

蒋介石于12月28日告知罗斯福说，他原先提出的在孟加拉湾建立海军和空军优势的条件没有实现。罗斯福强调重新打通陆地供应线的必要性，他敦促蒋介石在他不久可能同丘吉尔首相磋商[①]之前不要作出消极决定。马歇尔急忙致电史迪威，“必须想办法”务使进攻计划能实施，但是他无计可施。史迪威向宋子文递交了许多份备忘录，列举了关于中国的自身利益、今后战略和美国取消进一步援助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各种看法。史迪威竭力表明，假如中国不采取行动，他的政府肯定会问，“既然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如此，中国目前的人员状况、组织机构和政策均是这个样子，美国继续把力量和资

① 指预定于1943年1月14日至23日举行的卡萨布兰卡会议。

金投入中国战区是否值得？”史迪威地位的弱点就是没有权力敢于对上述问题作出否定回答。

1月8日，委员长正式拒绝发动攻势。他不需要等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磋商之后再作决定。事情已十分明显，罗斯福和丘吉尔不打算满足蒋介石提出的条件，蒋介石也决心不让他们把他推进收复缅甸的战争中去，即使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也罢，除非盟国全力支持缅甸战役。蒋介石告诉罗斯福，“如果海军无法控制缅甸海面”，缅甸战役最好推迟到秋季。如果在缅甸又遭失败，会给中国带来灾难，“在目前情况下，采取最谨慎的方针乃是我唯一可采取的办法”。他倒是提出了他一直希望的事，就是依照陈纳德的论点强调美国空军力量。他用的词几乎是陈纳德的原话，他列举出“空军发动一次进攻的相当大的潜力”，并且认为有希望“收到大大超过所付代价”的成效。

史迪威在日记中把这一天记为“倒霉的星期五”。① 他感到厌恶但不愿罢手。以前就已经遇到过那么多的拖延和阻挠，他怀疑能否按规定的日期行动。他意识到蒋介石在为陈纳德撑腰。但是史迪威明显感觉到，由于陆军部的支持（这种支持在史汀生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中得到了证实），他自己的地位更加牢固了；他还觉得，因为宋子文的热心相助以及中国军界内部对他的鼓励，就连那个小人物本人也不是完全无法控制的。史迪威估计中国人会设法重新博得美国的好感，以便美国继续向中国提供支援，他可以利用这种形势来继续推行他的改革中国军队和训练三十个师的计划。他觉得仍然有

① 迷信说法认为星期五不吉利。——译注

可能起草一项致蒋介石的最后通牒，“如果乔治赞成，就以华盛顿政府的名义发出通牒，”而不要提及总统。他继续施加压力要加强中国驻印部队（在拉姆加尔）和Y部队。曾士奎插进来讲了一句，“老话：‘为了四万万人民坚持到底。’”

1943年1月16日，在一次突然举行的仪式上，史迪威由于头年4月在东枝战斗中的英勇行为被授予优异服务十字勋章。史迪威走到他的司令部时，多恩在门口迎接他，他发现司令部的人员在院子里排好了队，态度十分严肃。伯金上校走上前同他握手说，“请您站在这儿。”

“什么事，处决我吗？”史迪威象受害者一样低声问道。

伯金宣读了给史迪威的嘉奖令，说他如何深入“中国某师部队的前线，身先士卒，作出表率，鼓舞着这个师振奋士气，拿下了东枝，还列举了他在前线的其他表现。史迪威显得窘迫不安，低声说“是谁编的一大套？”他的儿子小乔走上前低声说，“您站着别动”，并把勋章给他佩戴上。《纽约时报》记者阿特金森和《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用报界对他的一贯平淡的调子报道了这次仪式，《纽约时报》为此还发表了一篇题为《给乔大叔授勋》的社论。获勋者并不感动。“整个事情都是大话，借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来瞎吹，完全不值得受奖”，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实在令人难堪，但幸运的是，随着时间的消逝，人们会把这种事情忘记的”。

第十四章　总统的政策

1943 年 1 月—5 月

蒋夫人于 1942 年 11 月来到美国之后，由白宫转交给她的礼物中，有一件是新泽西州东奥林奇的凯思琳·奎因太太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夹着一张三美元的汇票和一张剪辑下来的新闻图片，图片上是日军空袭上海之后坐在铁道上啼哭的一个婴儿。写信人要求罗斯福总统把汇票交给蒋夫人；“这三个美元是我的三个女儿捐献给坐在中国某地的铁路上啼哭的这个婴儿的。”

蒋夫人在这次直到 1943 年 5 月才结束的长期访问过程中公开露面时，博得了人们极大的钦佩和欢迎，这是自从林德伯格① 成功飞越大西洋以来，任何人都没有受到过的待遇。正如威尔基预计的那样，美国人对她“洗耳恭听”。她于 2 月 18 日向美国国会发表的讲话，使她的听众们万分感动。一位议员说，“了不起，我从来没遇见过这样的事。蒋夫人使得我的眼泪差不多要夺眶而出了。”蒋夫人身穿黑色的富有魅力的中国式旗袍，身材苗条，举止端庄，说一口地道的英语，声音柔美，她使国会觉得是在“听世界上的一位伟人在讲话”。据《生活》杂志一位着了迷的也是很了解详情的记者说，议员们被她

① 1927 年 5 月 20 日至 21 日，林德伯格驾机从纽约长岛起飞，经过三十三小时又三十分钟到达巴黎，第一个中途不停留地飞过大西洋。——译注

的“优雅风度、妩媚和智慧迷住了……惊愕万分……完全倾倒了”。在议员们长达四分钟的起立欢呼之后，她的讲话的重点是，打败日本比打败德国更为重要，美国应当使它的人民能够在中国进行战斗，而不应在太平洋花费那么大的力量。她说，中国人经过五年半的抵抗之后确信，该“宁可光荣冒险，不愿屈辱认输”，她这番话博得了议员们的起立鼓掌。然而蒋介石不久前偏偏是不愿在缅甸光荣冒险，当然，公众对这一情况是不会知道的。

报刊就蒋夫人访问美国发表的社论强调了两个伟大民族之间的友谊，并感到高兴的是“在目前的困难情况下或许在今后更加困难的情况下”两国的这种关系是能够信赖的。英国驻美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以某种焦虑的神情向伦敦报告说，美国国会出现了在公众感情浪潮的推动下向中国作出他认为“难以实现的”许诺的危险。他的意思是说美国可能许诺为中国收复所有领土。

自十岁至十九岁在美国受教育、言谈和思维完全西方化了的蒋夫人使普通美国人产生的感觉是中国同他们自己是相似的，并不是不一样的。她同威尔基一道在麦迪逊花园广场①的二十万人集会上发表讲话，在好莱坞城的三十万人集会上发表讲话，在美国各地进行的资金筹集期间，在芝加哥和旧金山举行的会议上发表讲话，还在几家大广播公司发表了广播讲话。她每天都收到美国公众寄来的千百封信件，一次在美国中西部某地车站作短暂演讲时，车站站长的妻子送给她一盒自己制作的小甜饼。这位站长早上三时得知蒋夫人乘坐的

① 麦迪逊花园广场在纽约市。——译注

列车上午八时要经过该站，便叫醒妻子，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为了表达她的感情，她使出了最拿手的本事，制作小甜饼。蒋夫人激起了人们表示友善的强烈愿望，人们觉得她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普遍愿望的象征；正如卡尔·桑德伯格在《华盛顿邮报》上所写的那样，“她争取的是什么？她争取的是整个地球上的人类。”

然而背地里的情况则有些不同了。她要进行的访问曾经使得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成员感到不安，他们担心她会诱使罗斯福改变首先打败德国的战略。她自从1942年11月27日乘坐美国陆军部提供给她的飞机抵达美国、哈里·霍普金斯去迎接她的时候起，就立即开始想方设法改变罗斯福思想。蒋夫人患一种周期性的皮肤病，曾要求到美国某家医院治疗。随同她的有董显光、孔家的一个外甥和一个外甥女。霍普金斯驱车把他们送到纽约的哈克尼斯馆，该馆的第十二层楼全部供蒋夫人使用。她在同霍普金斯谈话时对于欧洲和太平洋的战事不感兴趣，“她的兴趣完全集中在我们在中国本土采取的行动上。”她明确表示“不喜欢史迪威，表示最赞赏陈纳德”。她告诉霍普金斯，史迪威“不了解中国人民，他迫使蒋介石把他最得力的几个师投入缅甸战役而损失殆尽，犯了一个可悲的错误”。为了达到她的第二个目标，即美国承认中国是四强之一，她用了很长的时间详细地论述她对和平谈判和战后世界的看法，敦促美国立即采取行动，倡议就战后问题举行“四强”会谈。

罗斯福夫人去医院看望蒋夫人，觉得她显得那么“娇小脆弱”，“我真想帮助照料她，好象她是我的亲生女儿似的。”蒋夫

人于1月初带着两名护士和孔家的外甥外甥女搬到白宫。孔家的外甥女总是穿男式服装，弄得罗斯福误称她为“小伙子”。蒋夫人随身带了许多丝绸被单，每天都要换，如果午后休息，每天就要换两次。她通常是在房间里用餐，白宫服务人员对于她用拍手的方式呼唤他们感到恼火，虽然每个房间都装有电铃和电话，她却不去使用。她住在纽约华道夫饭店时，特工人员在她外出后就清扫她的住处以及电梯与通道之间的走廊，这是孔家的外甥告诉特工人员说她已经外出才进行清扫。但是后来，她时常改变主意，直到数小时后才出去，或者干脆不出去。特工人员的头头要她固定她的活动安排，她就要求把这个人调走。孔家外甥、外甥女的特权虽然小得多，但也表现出同样的傲慢态度。

作为掌权的宋室人物和独裁者的夫人，她向往皇室的威严。有一次，当她知道 Madam 在美国是指鸨母的意思时，她相当恼怒地问多恩上校，为什么他和他的同事们称她 Madam 而不称 Madame。思维敏捷的多恩回答说，人们对英国女王的称呼是“Madam”，美国军官们用这个词称呼她是表示对君主的尊敬。蒋夫人的面部表情从不悦一下子变为满面喜色，多恩说，“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的面部表情变得这么快。”这位客人在后来的访问期间一直表现出非常优雅和具有女王的风度。

由于了解她的魅力，罗斯福在准备同她作第一次会晤时，不是象通常那样让客人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而是在他面前放一张牌桌，在桌子的对面放一把椅子让她坐。罗斯福向他的女儿解释说，他就是不想让他的客人“靠得太近”。经过长

时间了解，他发现蒋夫人的决心“坚如钢铁”，与他夫人描绘的甜蜜而温柔的性格完全不同。一天晚上，宾主在进餐时顺便谈起约翰·L. 刘易斯号召矿工举行的一次罢工，罗斯福问蒋夫人，假如中国政府在战争时期遇到这样的事，该如何处理，她用手指划过脖子做了一个杀头的手势，罗斯福仰头大笑，问坐在桌子那边的夫人，“埃莉诺，你看见她的手势了吗？”

蒋夫人同罗斯福总统谈的是她同霍普金斯谈过的同样问题。谈到史迪威和陈纳德两人时，她叙述了史迪威与蒋介石自西瓜事件以来的紧张关系。据她说，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指令持“公然极端轻蔑”的态度。她说，两人的关系自那以后一直不好。

她邀请罗斯福总统同她一道去中国访问，她对美国政府中的所有高级人士都发出过邀请，用罗斯福的话来说，就是对那些人进行“引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海军上将应邀到她在白宫的住处访晤她，但是他后来“一直没有弄明白她那次见他的目的是什么”。陆军部长史汀生发现她是“一位非常能吸引人哄骗人的小巧女人”，她“称赞我的双手生得漂亮”，但是史汀生告诫他的助理部长、应邀一同去拜访蒋夫人的麦克洛伊“警惕她说些什么”。她纠缠所有来拜访她的人，要求为空军运输队增派飞机，由于她竭力坚持，罗斯福在C-46飞机试飞以前就下令调拨柯蒂斯·赖特公司生产的这种飞机。C-46飞机投入使用之后，飞越喜马拉雅这段艰难航线时所暴露的结构上的毛病，使飞行员们送了命，使空军运输队已经低落的士气更加低落。

罗斯福尊重蒋夫人，认为她是中国政府中的实权人物，但

是不信任她，她在美国呆的时间越长，他就越不易受她的哄骗。她的圆滑同她的魅力相比稍逊一筹。在罗斯福为她在白宫举行的有一百七十二名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上，她向罗斯福提出了美国如何把供应物资运到中国的问题。总统回答说，我们将以上帝允许的速度尽快把物资运到中国，她却针锋相对地说“上帝帮助那些自助的人”。人们看见罗斯福的脸变得通红，但是，究竟是因为艰窘还是由于恼怒，无人知晓。

2月末，白宫招待室负责人代表蒋夫人给摩根索的私人秘书打电话，要求财政部指示海关税务人员免征刚刚给她运到纽约的一批特制英国香烟的关税。当发现这批香烟仍然装在船上尚未卸下，以蒋夫人名义打来的电话整天不断，最后财政部无计可施，只得指派一名人员“把香烟卸下用飞机运到这里”。同西瓜事件一样，英国香烟是一件具有意义很大的区区小事。蒋夫人的行为没有表现出她是引导她的国家走向民主前程的领导人。“总统……拚命想让她离开美国”，摩根索对他手下人员说。罗斯福并不是完全出于个人的恼怒，而是因为他日益担心蒋夫人的私下举止会受到不利的宣传而有损于她的公开形象——由此而有损于他的政策。

罗斯福除了一心一意要使中国成为战后结构中的四强之一以外，主要目标是使中国在当前继续参战，并在将来同美国结盟。他认为任何国家都不会象中国那样十分可能成为战后麻烦的根源。据最了解罗斯福的萨姆纳·韦尔斯说，罗斯福拟定的使中国未来更加稳定的四点原则是：第一，中国同俄国签订一项协定，防止俄国战后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中国收

复被日本和其它国家占据的全部领土，包括香港；第三，支持国民党政府，把它当作唯一能够统一中国的政权；第四，以中美两国密切的工作关系为基础来制订美国的远东政策。

罗斯福已经在使中国同各国一切平等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他通过谈判废除了美国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有其他治外法权、特权和租界。他还说服英国也这样做，只有香港问题除外。美国在 1942 年 10 月 10 日中国国庆节这一天宣布的行动，通过在 1943 年 1 月 11 日与英国人一起分别同中国签订的条约而正式肯定下来，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对中国领土长达一个世纪的入侵就此结束了。蒋介石欢呼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使独立的中国“处于和英国美国同等的地位”。

罗斯福的四项原则和他对中国政策的成功都依据这样一个设想：国民党政府是能够生存下去的。但是国民党政府能否存在下去却已经成了问题。到 1943 年，没有一个消息灵通的观察家相信国民党在战后能逃脱一次内部大挑战，谁也说不定其后果如何。然而尽管如此，由于强权概念的缘故，国民党必须受到完全的尊重，就是说这项政策要在神志清醒的假象的掩盖下推行。华盛顿得到的情报没有错。外事部门的报告是有见识的，稳妥的。在中国的大多数美国官员和记者的一致意见是，国民党无能，腐败，搞镇压，没有代表性，内部弱点很多，不大可能持久。在中国有二十年外交活动经历的乔治·艾奇逊 1943 年 5 月作为临时代办抵达重庆之后报告说，“实际上各方面的情况都在严重恶化”，经济方面的恶化正在“导致某种最终垮台的局面”。中国领导人“无法可想”，逃避现

实，只关心战后的问题。他的报告没有埋入陆军部的档案之中淹没无闻，而是送到李海上将的白宫办公室。赛珍珠在给罗斯福夫人的一封信中也提到了上述看法，她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戳穿围绕蒋夫人访美而出现的种种赞誉。她认为蒋介石政府和宋家是一个集团，没有代表性。她写道："这是一种独特而又有趣的局面，这种局面当然不会持久。我担心战争一过，人民的不满情绪会爆发，至少是在人民充分恢复元气之后会立即爆发。"另一位能直接与罗斯福总统交往的人柯里收到了白修德为《时代》周刊写的一篇未经新闻检查的报道文稿，白修德义愤地报道了他亲眼所见的1942—43年河南省的大灾荒。他报道了救灾工作"缓慢而不济事"，地方官员继续向饥民征收苛捐杂税，重庆政府"故作镇定"，因为在表面上免除了各种税务，作者最后承认河南农民由于"他们的政府的敲诈勒索已经丝毫不再忠于政府"。①

在国民党首都里的决策者们和外边现实之间总是有一道深沟，堆集在沟中的是由于努力归于失败和徒劳无益的行动而丧生的人们的累累白骨。华盛顿1943年的对华政策不是根据当时了解到的情况制定的，而是根据人们头脑中已经形成的毕生不变的概念制定的。美国的对华政策不是依据艾奇逊的报告或赛珍珠的信制定的，而是按1912年国会通过的决议（决议欢迎中国加入民主国家的行列，坚决祝贺中国人民"胜利地维护……自理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制定的，也是依

① 《时代》周刊1943年2月22日一期发表了白修德的报道，原文被删得只剩下七百五十字，原文中提到的官员们玩忽职守、贪污腐败、大发横财、继续征税以及人民日益仇恨当局的内容全被删去了。

据自那以后的三十年间相继出现的各种主张和形象制定的。从实地传来的情况得同这种日积月累的印象展开搏斗，除此以外，这种情况在其他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得到了罗斯福的注意和考虑。每当他听到有见地的意见，如果同他已经确定的一厢情愿的政策不一致，他仍然有可能不予理会。这是所有障碍中最令人可怕的障碍。要打掉一种已被接受的主张，就是说要重新研究一些假定，是令人烦恼的，需要拿出比一个国家的政府通常能够鼓起的更大的勇气。美国国务院在中国问题上没有从它派出的使节们的报告中作出推断，而对于这些使节的报告是需要作新的估量的。罗斯福总统不愿正视他决心给予支持的中国政权的弱点，因为他的意图是要使中国作为稳定的世界秩序的四块基石之一。如果除了蒋介石以外没有别人能够保持中国的统一，那么尽管蒋介石有弱点，美国也得支持他。

除了史迪威以外，还有许多人都认为必须用"新思想"来加强也就是说振作起中国政府的精神。面对中国的消极和颓废以及由此对盟军造成的作战潜能的丧失，这些人都想方设法找到某种办法来改善情况。艾奇逊报告说，外国贷款再也无济于事，但是如果中央政府能够收复宜昌和通往湖北南部和湖南的农村地区，棉花和农产品的源源而来就能使粮食和布匹的成本下降一半，这个看法是中国经济部长、中国政府中最受尊敬最优秀的官员之一翁文灏告诉艾奇逊的。艾奇逊怀疑盟军能帮助中国人采取一次"坚决的进攻行动来收复……诸如汉口、宜昌等地"。他被"必须有所作为"的要求所感动。"必须有所作为"是像翁文灏这样的中国人以及美国人的呼

声，但是同清朝末年改良派的努力一样，这一呼声只是向一个太虚弱太害怕采取改革行动的政府发出的。

美国公众在这段时间里所听到和真心接受的，只是单凭威尔基等人在报告中对中国情况的说法。新闻记者们都受到了约束，因为他们必须从陆军部领取资格证书，而他们为了得到陆军部的证书，得签署一项协议，同意把所写的全部报道送去接受新闻检查；如果违反协议，就有吊销证书的危险。部分是由于新闻检查，但大部分是由于自愿保持缄默，报界直至1943年都没有发表过关于中国这个勇敢的受到宠爱的盟国的任何现实情况。也许以前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对另一国政府的了解如此大错特错。

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会议的议程，列入了重新研究完全收复缅甸，包括夺取仰光的两栖行动的“安纳吉姆”战役计划的问题。由于主动权现在开始转到盟军一边，美国陆海两个军种的负责人马歇尔上将和金海军上将都强烈赞成把“安纳吉姆”计划作为在中国建立有效基地、以对日本工业和海运线施行空袭的先决条件。重新打通前往中国的道路还有可能使日军在他们控制区中的主要据点处于守势，如果中国军队能装备起来并振奋精神作战的话。从美国的观点来看，这样做比把美国军队投到西南太平洋潮湿的岛屿丛林中发动进展缓慢、战斗艰难、逐地争夺、代价高昂的战争要可取得多。日本人在这些岛屿上的反攻是激烈的，正如马歇尔所说，美国“吃不消再来一次巴丹战役。”如果使日军在中国处于被动，我们就可以“减少在太平洋的危险，发动对德作战”。马歇尔并不

是不愿搞讹诈的人，他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对英国人说，除非“安纳吉姆”作战计划得到实施，否则“在太平洋上随时都可能出现一种局势迫使美国不得不遗憾地撤消在欧洲战场上承担的义务”。

英国不赞成这个战役的理由还是那些。他们也能搞讹诈。他们说，既然夺取仰光需要英国的登陆艇，那么必须减少英国在欧洲战场上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中的任务。这个问题由美国海军上将金处理妥当了，他提出由美军从太平洋调拨出仰光战役所需的登陆艇。金解决问题大刀阔斧，相比之下，马歇尔则显得文质彬彬了。双方在金提出的意见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安纳吉姆”行动计划必须在一个战斗季节内，即在 11 月至次年 5 月之间完成。该战役的发动日期定于 1943 年 11 月 15 日，最后决定将在 7 月以前作出。

为了使蒋介石同意参加仰光战役，为了平息中国人未能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而产生的怒气（中国以为自己是四强之一，对不让它与会感到难堪），美英两国向中国派遣了一个高级使团同蒋介石磋商。这个使团的成员有美国空军将领阿诺德、美军供应署署长布里恩·B. 萨默维尔将军、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英方代表约翰·迪尔爵士。

在派遣这个使团的问题上存在着空中战略与地面战略之争。在蒋介石和陈纳德的压力下，罗斯福已经开始对“安纳吉姆”行动计划产生怀疑，赞成采取空军行动，认为这是摧毁敌人的最快最便宜的方式。他建议派遣急于“尽快对日本实行轰炸”的阿诺德作为空军行动的支持者去中国。马歇尔则把代表陆军部意见的萨默维尔派去，以他作为抗衡力量。陆军

部认为经喜马拉雅山的空中供应线运去的东西根本不会有地面供应线运的东西多。

这次使命向它的成员们揭示出中缅印战区的现实情况和脱离现实的情况。阿诺德在德里时觉得韦维尔制订的作战计划根本不成为计划，而是“几页措词华丽的文章，叙说这个使命为什么圆满实现”。阿诺德2月4日到达中国后发现，陈纳德对于他的作战行动的后勤工作的看法“不现实”，蒋介石甚至更不现实。阿诺德由史迪威陪同，在蒋介石的山顶别墅（史迪威称为“小人物的贝希特斯加登”①）参加几次会议后，觉得蒋介石“不愿意听别人的分析和道理”。阿诺德作出的给喜马拉雅航线调派一百三十七架运输机（每月运输五千吨补给品必须要这么多的飞机）的保证并没有使蒋介石息怒，答应给一批 B-24 轰炸机也没有使蒋介石平息下来。蒋介石不但没有象史迪威想象的那样觉得有必要再次博得美国的好感，反而提出了三个新条件：给陈纳德独立的指挥权；每个月经喜马拉雅航线空运一万吨补给品；至 11 月底以前给中国五百架作战飞机。

提出这三项要求的一个原因是重庆需要陈纳德的空军突击队的保卫，因中国没有空军。高思说，在美国受训的中国空军学员“没有实战经验”，“因而显然没有作战的能力。”俄国在兰州为训练中国空军人员所花的力气也同样毫无成效。俄国人发现他们给中国人的飞机都由没有经验的人驾驶，或被他们弄毁了，其他物资好像也很少用到抗日战争上去。俄国

---

① 西德巴伐利亚州有名的疗养胜地。——译注

人说“物资不见了，连个交代也没给。”由于训练计划没有完成，根据租借法案弄来的飞机大都损坏，又不屑于让外国人监导作战行动，中国空军在日本轰炸机春季恢复对重庆的轰炸时根本无力保护重庆。

谈到必须建立和保护机场以及供应燃料的问题，阿诺德发现蒋介石和陈纳德总是“挥挥手敷衍了事。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考虑后勤问题。”在蒋介石看来，对实际困难的一切解释都是“借口，借口”。他要求立即能达到每月空运五千吨物资的目标；“总是有做事情的办法的，事情是必须做的。”他又一次发出最后通牒：“告诉你们总统，除非他满足我的这三个条件，否则我不能打这个仗，他也不能指望我派我的军队参加这个战役。”

“我要是把这些话转告给总统，我就不是人”，阿诺德事后对史迪威说。阿诺德不理睬蒋介石的这道最后通牒，而是继续他的会谈，答应增加空运的吨位，仅此而已。他让机智圆滑的迪尔去“探明”蒋介石是否愿意参加 11 月份的攻势。蒋介石说他愿意参加，但是没有每月一万吨空运物资和五百架飞机，他不能保证取胜。史迪威进而问他，如果海军的支援有限，他是否愿意参加。“他发疯地吼道，‘我不是说过我愿意吗？’他要宋子文传话给我，说我公然使他难堪。他气得不得了，说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制服他。”蒋介石在 2 月 7 日给罗斯福的信中重申了他的保证，也重申了他提出的三项新要求。他在信中宣称，“中国军队将在确定的时间内定然执行它承担的任务。” 11 月的战役计划由各方于 2 月 9 日在加尔各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确定下来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有中国的

何应钦和宋子文；英国的迪尔和韦维尔；美国的阿诺德、萨默维尔、比斯尔和史迪威。据韦维尔概述，“一切都达成了协议”，剩下的问题只是“尽最大努力”为雨季过后立即就要开始的战事作准备。

史迪威高兴的是，他的客人们亲眼看到了“中国政府机器”以及他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人物——指蒋介石和何应钦——的人品。阿诺德离别时对史迪威说，“你应当得到一顶桂冠”，后来他在信中写道，“亲爱的乔，你的工作简直不是人能干的……。如果什么时候你觉得我能帮忙，请不要客气。”

陈纳德却来告急求援了，他的军事行动受到了喜马拉雅航线空运物资吨位的限制。空军运输队此时每个月只能运送三千吨物资，史迪威把其中的大部分物资用来训练和装备预定要参加缅甸战役的Y部队，其余一小部分给空军。一方面，报纸上公开发表消息大肆报道陈纳德表示的反对意见，另一方面，陈纳德的代理人、新闻记者艾尔索普在白宫私下向霍普金斯提出陈纳德的意见。艾尔索普这个人常常会突然大大改变见解。他是罗斯福家的亲戚，是华盛顿闻名的政论专栏作家，他鼓吹飞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性武器，在1941年任宣传助理时就把陈纳德当作他崇拜的偶像。几个月后，艾尔索普在香港被日本人抓住，并被遣送回美国，自那以后，通过霍普金斯设法为自己弄到了租借法案驻重庆代表的职位，并于1942年12月启程前往中国。罗斯福当时写信给艾尔索普说，希望能同他一道去看看陈纳德，并说陈纳德到华盛顿来也行。总统往往相信私人使节的报告，不相信官方代表的报告，艾尔索普具备这方面的有利条件。他能书善写，容易激动，能

说服人，对局势有肤浅的表面的了解，但是却固执己见，显得学识渊博。据霍普金斯的传记作者说，霍普金斯“无疑受到了”艾尔索普接连不断地寄来的信件的“影响”。

艾尔索普的报告是令人吃惊的。还没有到达中国，他就在同回美国的飞行员谈话的基础上夸张地告诉霍普金斯，美国空军在中国面临的局势是“一种国家悲剧……民族的耻辱……给总统、国家和军队丢尽了脸”。他恳求在两个月内召他回国亲自作汇报。抵达重庆以后，他去看望史迪威，经过一次交谈，史迪威在日记中把他错称为“阿尔斯洛普”。他不到两个月就带着中缅印战区的行动方案回到了华盛顿，把一份二十一页的热情和似乎有道理的报告交给霍普金斯。报告的要点是，在选定缅甸战役方案时，我们采用了“规模大、危险多、效果值得怀疑”的地面作战行动，忽视了“绝好的而且容易在空中取胜的机会”。

艾尔索普的方案是把史迪威调开。他认为史迪威是“过激的，眼光狭隘、思想陈旧的常规步兵将领”，“不了解而且完全低估”空军的力量，他对空军的根本态度“只能使我们大家非常接近于蒙受灾难”。他称史迪威对中国人的态度高傲自大。史迪威的训练计划被说成丝毫不切合实际，其目的是想“用美国人代替中国人在战场上进行指挥”。然而艾尔索普有一件事说对了，即史迪威带有蔑意的讲话由戴笠手下的特务们汇报给了委员长。艾尔索普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史迪威压制空军的作战能力并且明确表示只要马歇尔任陆军参谋长，他就继续控制物资的供应，因此，应当把史迪威调开。

想夺取缅甸西海岸的实兑的英军被日军击退，吃了一系

列败仗，士气低落，于是反对采取地面进攻的论点又有了得力证据。英军的败北使“安纳吉姆”行动计划的前景暗淡下来。丘吉尔觉得，收复缅甸好象是“一根一根地拔箭猪毛刺那样费劲”。罗斯福开始赞成丘吉尔的意见，并且向马歇尔表示，由于“安纳吉姆”行动计划同欧洲第二条战线的准备工作有冲突，也许应当放弃。这样一来，更有理由把作战行动的任务交给陈纳德，给他足够的支持，使他能卓有成效地作战。这个主意之所以合罗斯福的心意，是因为可以以此作为早日表明美国在中国战区有活动的最简便的途径，以便同美国作出的把主要力量用来对付德国的保证相平衡。罗斯福的习惯是，无论什么事情，他都让那些自己有强烈看法的顾问们去自由行事，看看会有什么结果。他打算宽容阿诺德对陈纳德的有限热情，并打算否决陆军部要求中国给予报答的意见，但是他不准备撤换史迪威，也不打算剥夺史迪威掌管租借法案事务的权利。

罗斯福的这个决定，同他在战争期间作出的许许多多其他决定一样，是一种妥协。3月8日，他下令让陈纳德指挥一支空军力量，独立于比斯尔的第十航空队，但是仍然在史迪威管辖之下。罗斯福向蒋介石保证打算建立一支有五百架作战飞机的空军，和达到每月空运一万吨物资的空运能力，而且不要报酬。然而在陆军部的坚持下，罗斯福又提醒蒋介石，空运物资绝不能满足要求，还必须打通地面运输线。罗斯福向马歇尔明确表示，虽然“仍然寄希望于缅甸战役”，但他想在1943年把重点放在陈纳德的空军行动上。修建和改建机场的工作要以“最大限度展开”；陈纳德要从供应的物资中得到

一份足以“真正能使他的部队继续作战”的物质，至少在四千吨物资中可以给他一千五百吨，只要超过四千吨，就可以给他二千五百吨。陈纳德可以“完全掌握”他自己的军事行动和战术，但要“经史迪威同意”，这显然是一个行不通的条件。

总统作出上述决定是出于政策考虑而不是出于战略考虑。他所关心的并不是在空中和地面行动之间作出某种具有历史意义的选择，而是致力于实现他使中国拥有大国地位的想法。支持陈纳德正是中国首领蒋介石所希望的，而史迪威坚持要改造中国军队则有损于中国的大国形象。罗斯福对于“加强中国军队战斗力”的努力根本不感兴趣，因为他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习惯于相信中国人发表的获胜战报，没有认识到加强中国军队战斗力的必要性，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史迪威整编中国军队的计划是蒋介石所反对的。在这方面，总统的直觉是对的，虽然理由并不是很正确。从根本上说，谁也不能违反统治者的意志来改造他的军队；不首先改造社会，就无法改造属于其产物的军队。然而更使人不安的是像“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之类的绰号，这个绰号触怒了与蒋介石同样身居统治地位的罗斯福。他觉得蒋介石应当得到与他自己一样的尊严，由于蒋介石处境困难，蒋介石享有的尊严甚至应比他自己还要多一些才好。

罗斯福在向马歇尔解释他否决陆军部要求的原因的一封引人注目的信中说明了上述论点。总统谈到史迪威在一封信中提到的美国必须对蒋介石采取较为严厉的态度并要蒋介石作出保证的那番话。总统说，这样做事的“方法完全不对头”。委员长不仅是总司令，而且是国家元首，“不能那么严厉地同

有这样身份的人说话，我们也不能像要求摩洛哥苏丹[1]那样要求他向我们作出保证。”蒋介石经历了艰难的道路才成为“四万万人民无可争议的领袖……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整个中国取得了我们花了两个世纪才取得的成就”。

这番话不是说给公众听的华丽词藻，它明白地道出了美国的幻觉。正如史迪威说过，中国人民具有一种“极大的团结一致精神”，使他们能够顶住坏政府。中国有一种比美国的任何事物都历史悠久和力量强大的文化统一，那种认为国民党只用了十五个艰难困苦的年头就取得了与美国同样程度的民族团结的看法是一种离奇幻觉，是有害的。这种看法使美国政策建立在一种必定要倒塌的基础之上。

史迪威时常斥责对中国军事情况抱有的同样幻觉。呆头呆脑的中国军队的确在可能的情况下保卫着他们的国家，但是，中国每天发布的战报说中国军队在萨尔温江战线上的“激烈反击”和“敌人的损失惨重”。史迪威估计，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假战报；然而战报上的东西在美国却受到大肆宣扬。史迪威在给马歇尔的信中写道，“当然，这使我的工作更难做了，如果中国军队这么样有战斗力，领导得这么好，还要我在这里干什么？”他仍然认为，只要授权予他要求中国为取得按租借法案提供的武器作出让步为条件，他就可以要求改造中国军队了。史迪威觉得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他时常为他的这个论点辩护。他从来没有怀疑过美国物资和技术，若由他自己作为一名军事训练的最出色的专业人员来指导，定能发

① 摩洛哥苏丹是摩洛哥国家元首的称号。1957年8月14日，摩洛哥国家元首的称号由苏丹改称国王。——译注

挥威力，取得预期的结果。史迪威也抱有幻想。

马歇尔给罗斯福总统的复信基本上是重申史迪威改造和供应地面部队的主张。马歇尔明确表示空军依赖于地面部队，因而有必要实施史迪威提高中国军队战斗力的计划。“只要我们的空军力量打击了日本鬼子，日本鬼子就会向我们反扑”，那时保护机场的任务就得依靠中国军队。“这是要考虑的最严肃的问题……我们必须现在就着手准备。”他指出，设在浙江的（原来打算用作轰炸日本东京的）几处基地早已被日本的地面部队破坏，迄今还没有修复。为了增加空军对日本的出击，必须开辟一条经缅甸的地面供应线，这也需要中国地面部队的配合。马歇尔强调：“必须使中国军队目前战斗力的情况有所改变，然后我们才能完全了解中国军队在这场战争中的潜力。克服这一问题必须成为派往中缅印战区代表美国利益的任何代表的首要任务。”

马歇尔的最后一句话涉及到了政策范围，他的主意并不是总统的政策。罗斯福不想违背中国领袖的意志而坚持要动员起中国军队的力量。他反对美国要中国作出报酬性允诺的做法，因为他认为中国人在那个基础上作出的任何承诺都是不会持久的。他情愿同蒋介石一道明确支持陈纳德的计划，特别是因为陈纳德的计划符合他自己的看法，即日本的商船队是个易打击的弱点。机场的保卫工作则依赖陈纳德的种种保证：五十架或一百架或一百五十架飞机就能使中国军队成功地守护机场。

遵照罗斯福总统的命令，陈纳德指挥的第十四航空队于3月11日如期正式成立，陈纳德的军衔晋升为少将。意见遭

到总统否决的陆军部立即采取对策。陆军部担心陈纳德的晋级会降低史迪威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影响，作战处建议授予史迪威一枚最高荣誉军团勋章①，从而“就尽到最大努力来使中国确信，史迪威将军完全受到美国的信任”，我们认为他是中国问题的“首席仲裁人”。马歇尔于3月16日批准授予史迪威这种勋章，但是事情到了罗斯福那里就搁住了，虽然并非永久搁下了，因为总统想让蒋介石成为获得这种勋章的第一位外国人，他认为，假如在同一时期授予史迪威同样的勋章，蒋介石就可能不那么感激了。

马歇尔适当地向史迪威转达了罗斯福含蓄指责按对待摩洛哥苏丹的办法来对待蒋介石(马歇尔为了保密，在电报中把蒋介石称为“部族首领”)。史迪威其后在日记中不时地使用“部族首领”这个词。

自从上一年12月蒋介石取消缅甸战役计划的那个倒霉的星期五以来，史迪威就集中精力设法调集、训练和装备Y部队，为今年11月再次实施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作准备。这个计划有两个方面：使各个师达到满员和训练军官。史迪威的副手陈诚将军被任命为Y部队司令，指定了一名中国人任参谋长和几名美国教官，三十个师挑选出来了，为在昆明建立训练学校作了实际安排，经云南省省主席龙云的同意和批准，训练学校定于4月1日开学。这项计划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进展缓慢，令人失望，但是拉姆加尔训练营地却为取得成绩提供了

① 荣誉军团勋章由乔治·华盛顿创立，1942年恢复。最高荣誉军团勋章规定授予国家元首和高级军官，是美国可以授予外国人的最高荣誉。

证据。第三十八师的一个团从拉姆加尔结束训练后已经进入缅甸北部，在筑路队前头巡逻。约翰·戴维斯3月曾预言，史迪威“也许仍然可以做到曾看来难以做到的事——使中国人向日本人发动一场进攻。”

物资方面没有什么希望。三十个师所在的十一个军都不满员，总共缺十八万五千人。三十个师只有一半拥有通常必备的武器，这些武器中有一半因缺少重要部件而无法使用。中国军政部一再保证按照同史迪威商定的确切日期给部队补充的人员从来没有送到，或者是在刺刀的押送下七零八落地来到，他们的身体等方面的情况十分糟糕，以致需要实行一个为时五、六周的特殊计划。为了使士兵们的体质能适应训练，给他们一日三餐，让他们睡足觉，第一周还作短途步行。在去兵站的路上，新兵们没有吃的，靠用枪从村中老百姓那里抢东西吃，这给乡村百姓又增加了愤恨和苦难。对多余的新兵总是按预计会减少的人数作安排。史迪威写道，“何应钦预计有三分之一的补充兵员在路上死亡或逃跑，何应钦对这种状况泰然处之。”1943年中国新兵因死亡或开小差造成的减员达百分之四十，就是说在一百六十七万人中，有七十五万人死亡或开小差，“这是对中国领导人的可怕的控告。”

在失望之中偶尔也会突然感到鼓舞。史迪威3月23日写道，“V表示胜利，已经发出命令要补充人员前来报到。征兵于4月底开始，5月底要到达部队……”史迪威3月24日写道，“蜜月在继续。多恩接见了坦克部队的士兵们，一切正如我们希望的那样……百分之百的一致……白崇禧昨天来到，表示愿意帮忙。他现在也想看看拉姆加尔训练的成果。

何应钦在讲话中也提到拉姆加尔训练的成绩；多么了不起呀！”史迪威给史汀生写信说，他得到中国军械和交通部门的“极好合作”。“建立起来的医疗机构大概是中国人迄今拥有的最好机构。”

昆明训练中心最初组建时打算接受四百五十人进行步兵训练，三百人进行炮兵训练，分别有一百五十人进行通信和军医训练，训练时间为六周。多恩上校任参谋长，阿姆斯上校（不久就晋升为将军）任训练计划的负责人，包瑞德上校任训练中心的行政负责人，曾士奎上校任中国当局的行政负责人，他自缅甸战役初始就担任史迪威的联络官。训练中心有教学楼、靶场、教员和设备。但是由于中国军队没有派足够的人员来受训，学员从来没有满额。炮兵科目原打算接受三百名学员，开课时只有八十七人；整个 1943 年，炮兵科目的人数约为原计划训练的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学步兵科目的人数约为原计划人数的百分之六十。在来受训的人中，许多人都不是当军官的材料，但是许多人都渴望学习，学得也很快。“他们确实接受得很快”，据一位美国指导人员说，“这是一段了不起的经历。我从来没有看到美国军人这么样”。

开训后不久，二十三名译员就举行了一次罢课，作为学识阶层的成员，这些译员都受到通货膨胀的沉重打击。曾士奎上校向一位美国朋友显示了中国是如何解决这类问题的。他给奉他之命去守卫这些译员住处的一个排部队发了弹药，命令他们，任何人离开住处就开枪打死，即使是去吃饭也不行。译员们第二天传话说他们愿意谈判，曾士奎派武装警卫把译员们押到他的办公室，他的桌子上放了一支子弹上了膛的手

枪和一份拟好的声明，要他们每个人在声明上签字，说他们对所得的薪金感到满意，不然“我就开枪打死你们”。译员们复课以后，曾士奎向那位美国人解释说，在上海之战中，他不得不枪毙了九名军官，因为这几个军官“非常严重地夸大了战术和后勤方面的形势，使我无法作出合理的决策”。那几个人的接替人“都干得很好”。他并不是对采取这样的措施感到自豪，但是他说，在中国军队目前情况下，这种措施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幕后的斗争在继续。史迪威认为，陈诚将军是真心合作的，但是军政部长何应钦在拖延。“何应钦认识到，假如陈诚取得成功，就会赫赫有名，他何应钦就会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何应钦对待这方面工作的失败若无其事，也许他还会积极设法进行破坏呢。”此外，何应钦担心在云南集结中央政府军会引起龙云的敌意。史迪威写道，云南的鸦片生意仍然很兴旺，“我们在这里势将影响大宗鸦片走私生意。”龙云的生财之道是无穷的。有一次他下令当地普通的两轮大板车必须装上橡胶轮胎，然后他就打开仓库出售他在滇缅公路通行期间没收来的橡胶轮胎。后来他又颁布一项新法令，对所有用橡胶轮胎的大车征税。

在缅甸那一边的利多，筑路工作由于地形和气候的影响进展极其缓慢。这里的气候同喜马拉雅山地区的气候一样变幻无常，道路经过许多峡谷和激流，密林和枝藤使人无法进行精确的勘探工作。这里的降雨量每年为一百五十英寸，雨季期间，有时一昼夜降雨量达十四英寸；泥泞、水蛭、疟疾是每天

都会碰到的危险。上一年在从伊朗、阿富汗和西藏通往中国的几条备用道路上作的勘探和试验证明那几条路线都无法使用。这样，唯一可以使用的只剩下穿过胡康流域的那条道路。日军没有占领缅甸西北角，但是经常有谣传说日军到了那里。惠勒将军作为一名工程人员不赞成这个筑路计划，但是只好绘制出线路图。每英里公路需要修建十三个涵洞，以便在暴雨时排水溢洪。包括一个营黑人士兵在内的美国工程兵同英国派来的印度合同工一道开始筑路。最后有八万人参加这项筑路工作，其中有五万是美国人，其余三万是中国人和印度人。这条路要修到胡康流域的信宾扬，据料那里可能会开始战斗，这段路共长一百零三英里，惠勒希望能在6月份完工。天气好的时候，全体人员出动每天才能筑单线路面四分之三英里。先头筑路队于1943年2月28日在距利多四十三英里的地区越过边界，并竖起一块路标写道，“欢迎来缅甸！此路通往东京！”随着中国巡逻队从拉姆加尔出发的西格雷夫博士和他手下的人员回去时走的是难走的小道，他们走过的每个水坑周围和斜坡下面都躺着成群尸骨。破碎的衣服粘在骨头上，这些是老百姓、军人、英国人、印度人、缅甸人的衣服，这就是前一年的可怕的大逃难的见证。

越过边界以后，筑路工作由于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而缓慢下来了。到5月11日雨季来临时为止，越过边界后只筑了四英里路，雨季又给筑路增添了重重困难。

从2月到4月间，史迪威经常在昆明、利多、阿萨姆铁路线上的查布瓦（空军运输队总部所在地）、拉姆加尔、德里、重庆之间来回奔波，视察部队，商谈问题，听取不满意见，确定轻

重缓急，同他的盟友们洽谈，鼓励他们。他到查布瓦事先没有打招呼，想亲自看看传说大食堂办得很糟的消息是否属实，这是空军运输队另一桩头痛的事。这个食堂办得一团糟，高级军官们丝毫不管，因为他们可以在别处就餐。史迪威察看完食堂中美国大兵的队形，坐在脏板凳上共享"肮脏"，接着他宣布，"小伙子们，给他们点苦头尝尝。"整个食堂顿时食物、盘碟横飞，桌凳四脚朝天。史迪威然后召见这个基地的负责人说，"这就是你们的食堂"，并且说除非他下次突然来视察时看到情形好转，否则他就把这位负责人解职回家。

史迪威带着"文件和懊恼"返回重庆，在蒋介石家里做了一次客："食物很简单，也没有什么礼仪，不过，气氛却够呛。在蒋介石面前，谁也不敢说话，也不敢发表意见。……从人们呆板的姿式和紧张的表情上可以看出，每个人都汗流浃背"。3月19日史迪威六十岁生日那天，他让"这可怕的日子悄悄地过去"，连封家信都没写。

史迪威无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都忙着整理他的笔记和备忘录，常常为寻找某个解决办法而苦思冥想。"夺取一个港口在华南投入美国军队吗？在华南同中国人合为一体。邀请赤色分子参加。……我在中国呆到底吗？"

"蒋介石是个瞎子。……解决办法——打通这条道路，目的是什么？要是蒋介石能掌管物资供应，这就意味着完全囤积起来供养国民党。"

"蒋介石不是个自由人：战区司令们，政治影响，赤色分子的捣乱，不愿意也不可能改编军队。"

有一段笔记谈到他自己的处境："无线可牵"。他读的书

有沃尔特·李普曼的《外交政策》，有拉铁摩尔的书，还有一些有关中国的书。史迪威关于中国局势记了一篇五页纸的随笔，一篇关于"印度问题"的随笔，还有一些关于东方、关于租借法案援助、关于俄国军队、关于道教不抵抗外来势力的信条、关于同英国关系太密切的危险、关于美国和俄国战后成为两个强国等方面的笔记。

从3月份开始，日本人发动了一场新攻势，沿长江而上，袭入华中米粮仓的湖南湖北两省地区。日本人的军事目的还摸不透，但是目标好象是夺取宜昌。这里的长江峡谷在通往重庆的道路上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何应钦坚持认为日军的攻势目标是夺取重庆，预先阻止盟军反攻缅甸的计划。他希望把Y部队撤回来保卫重庆，史迪威认为何应钦的这个要求正是日本人所希望的，因为日本人对于Y部队驻扎在云南越来越感到不安。4月19日，史迪威"同委员长举行一次糟糕的会议……嘲笑和抱怨。……谈到反攻和'士气不振'。唯恐要采取行动。"何应钦后来还是从Y部队中调回两个军和七万名后备人员，使训练计划又拖延下去。损失更大的是湖北战区司令陈诚被调回，委员长命令他回到湖北，防范日军进攻。

史迪威后来说，他4月份接到了华盛顿发来的要他回国的指示。华盛顿召他回去是"在陈纳德的帮助下有绝妙主意"的蒋介石采取行动的直接结果，即使说这个结果并不是他有意要达到的。独立指挥并没有解决陈纳德的问题。他没有得到物资供应上的优先权，总统曾下令优先供应他，但在作战方面未作决断。史迪威仍然控制着经喜马拉雅航线空运物资的

分配权，由于史迪威仍然负责筹建各方一致同意的发动缅甸战役的Y部队，他就继续把八分之三的供应物资给空军，八分之五的物资给地面部队及充作其他各种用途。吨位中包括给中国轻武器军械库的物资和数吨纸币，由于中国没有印刷厂和印刷材料，纸币只得在国外印刷，再用飞机运回中国，适应通货膨胀后增发纸币的需要。

被日本人的攻势吓坏了的委员长认定必须由第十四航空队发动一次大攻势，他要求罗斯福越过史迪威直接把陈纳德召回华盛顿磋商。罗斯福愿意这样做，因为他自己也有同样的想法，但是一直在考虑把史迪威召回同总统辩论的马歇尔立即告诫说，一个盟国干涉美国的指挥系统可能会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他建议，要解决这个难题，只有把史迪威和陈纳德同时召回国，让两位将军参加即将于5月份同丘吉尔首相举行的会议和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因而，史迪威和陈纳德一同于4月23日离开中国，4月28日到达华盛顿。报界对于同中国有关的一切事情都以十分乐观的态度转到了乔大叔回国的事情上来，《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说史迪威是在重庆受到尊敬的外交官："上至委员长人人都喜欢他。"

史迪威同来到华盛顿迎接他的夫人团聚后，首先去拜访马歇尔和史汀生，两人告诉史迪威，将指定他在次日的白宫会议上发言，希望他向总统陈述他反对蒋介石和陈纳德想采取的大规模空军攻势的论点。陈纳德带给华盛顿的计划是要求来一次为时六个月的作战行动，从日本人手中夺取空中优势，并对内河和沿海的船运进行轰炸，这一行动从南中国海开始，于年底逐渐伸展到日本本土。为了支援这个计划，他要求5、

6 两个月空运的物资全部供他使用，7 月至 9 月每个月给他四千七百吨，其后每个月需要七千吨。

陆军部认为这个计划时机不成熟，表示反对，因为除非有缅甸的地面攻势配合，否则就会惹起日本人来摧毁中国的机场，还会进攻阿萨姆的基地。蒋介石这个时候向罗斯福作“亲自担保”，如果敌人对中国的空军基地采取行动，“中国现有的地面部队能予击退。”

史迪威把他要对总统说的话写了一份备忘录。除了重申马歇尔在给总统的信中提出的打通缅甸通道和提高中国军队战斗力的论点以外，备忘录着重谈到了在指导亚洲战争方面的巨大活动余地，敦促制订一项“全面战略计划”，把未来在中国的军事行动同西南太平洋的战争紧紧联系起来。史迪威在备忘录中重申他希望美国陆军派一个军去中国作战，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希望。备忘录陈述了反对空军攻势的理由，并且预计，如果日军象在浙江那样对中国空军基地发动一连串的进攻，中国人决不会比那时更有能力击退日军。因此，他提出的为中国训练六十个师的计划是必要的，因而也必须开辟一条经过缅甸的地面供应线。这种概略的论述是有很大的说服力，但是后来在辩论中却没有能巧妙地展开。

次日，4 月 30 日，史迪威无法有力地向罗斯福阐明他的论点；相反，据马歇尔说，他闷闷不乐地低头坐着，口中“唠叨说中国不打”。罗斯福看他这副态度，怀疑他是生病了，他问马歇尔难道不应当让病人去休息吗。马歇尔回答说，这位“病人”在体力上可以顶得上白宫中的任何两个人；然而尽管如此，他感到懊恼和失望。史迪威后来说，他知道是他辜负了马

歇尔的期望。

史迪威不愿发言的原因可能是他觉得为自己的作战计划争辩是自我吹嘘。自吹自擂是史迪威压根儿不愿干的事情。当时在《名人录》中有关他的那一条的篇幅只有短短的六行介绍（而艾森豪威尔的介绍有十五行字，巴顿的介绍有三十三行，麦克阿瑟的介绍有五十五行）。收复缅甸和使中国军队能出色地作战的决心对他都具有深刻的个人意义，实际上是这种意义使他不好说话。在他看来，这件事的重要意义越是显而易见，他就越是不愿开口。他同科迪利亚一样，不愿说明不需要解释的事情。他自己对总统有愤懑，他知道总统在某种程度上也对他不满，这些都起一部分作用。总统明显倾向于满足委员长的要求的态度，总统对蒋介石和陈纳德似是而非的看法，以及他显然要不顾好歹试试空军力量的意图，所有这些都是史迪威不愿说出自己看法的原因。史迪威没有同他蔑视其见解的人圆滑地周旋的技巧和能力，他确实也容易对人产生蔑视情绪。他本来可以向罗斯福解释，蒋介石的“亲自保证”只不过是中国人的表面文章，他却没有设法作解释。他无法说出他写得很有说服力的论点：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地面部队同“毫无基础地增加空军活动”的做法相比，前者使中国得到的好处要持久和实惠得多。……“在我看来，如果没有什么东西需要空军去掩护，那么空军的掩护就分文不值了。”

史迪威那天晚上同他的夫人和麦克洛伊夫妇应邀去史汀生家吃晚饭，他向史汀生部长阐明上述问题就不感到困难了。当谈到上一次世界大战时，三个人才知道，他们大约在同一个时期都在法国的朗格勒。为了使史迪威的论点，也就是陆军

部的论点得到接受，史汀生打电话给罗斯福，说“我非常钦佩史迪威，因而消除了曾经对史迪威的明显的怀疑。”他还添油加醋地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了解史迪威，“当时我和他在朗格勒是同学”。打完电话，史汀生又写信给罗斯福，追述了他在挑选史迪威去中国的责任感。“我们当时曾故意让他担当这场战争中最重的任务。……他最近几天使我确信，他是我所知道的能够把这副重任担负到底的唯一人选。”

这也无济于事。因为罗斯福已经在5月2日把他的决定通知了马歇尔，绝不允许拖延已拟定的空军攻势。由于日军沿长江而上，徘徊不去的中国沦亡之幽灵又出现了，蒋介石本人明显的内心惊慌失措加剧了恐惧气氛。罗斯福在同霍普金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蒋介石的处境危急，他的整个政府有垮台的可能。”他决心尽量向蒋介石提供所需要的东西，不要他作任何酬答。在这个问题上，尽管罗斯福极为依赖和信任马歇尔，他还是准备否定他的军事顾问们的意见。他对马歇尔说，“从政治上讲，必须支持蒋介石”，他同意有必要供应Y部队物资，那将“据此对待蒋介石”。如果不这样做，就应当给陈纳德优先权。他只同意在缅甸北部执行经过修改的“安纳吉姆”行动计划，修改后的新计划不包括夺取仰光，但是就连这个计划也必须排在空军攻势的后面。

马歇尔把总统的这个决定告诉史迪威以后，史迪威说：总统的这项决定是“完全弄错了蒋介石的人品、意图、权威和能力”。史迪威私下里觉得，蒋夫人“把罗斯福弄得昏头昏脑”。蒋介石政府是“一幕独角戏。国民党是他的工具。蒋夫人是他的门面。愚笨的美国宣传是他的手段。我们都是受骗

者”。

“安纳吉姆”行动计划的命运和远东战争的未来战略仍然有待在准备召开的代号为“三叉戟”的全体会议上决定。这是迄今为止举行的规模最大的战略会议，也是第一次由中缅印战区战场指挥官参加的会议。韦维尔、史迪威、陈纳德都是为人注意的中心人物，虽然欧洲战区是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这次会议要作出决定，是采用英国赞成的地中海行动方案，还是采用美国赞成的横越英吉利海峡的进攻方案。为了能按自己的方案行事，美国人不时地扬言要以“太平洋的作战”代替在欧洲的作战。在远东问题上，丘吉尔一如既往，心里考虑的是政治目的。他坦率地希望“绕过”缅甸，赞成采取行动最终收复新加坡，他说新加坡“将是恢复英国在该地区威信的唯一手段。”美国的目标却非如此。罗斯福和军方都想把中国作为对日作战的基地，尽管他们在方法上存在着不同意见。

英美两国在这个战略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美国出于战略上及政策上的考虑，愿意援助中国；英国则不愿意。美国提出的让中国成为战后四强之一的设想不合英国心意。英国人并不希望看到中国在战争结束时取得日本曾经拥有的那种强大地位。如果中国居于强大的地位，英国的旗帜就不能长期在香港上空飘扬。英国人也不赞成罗斯福认为中国没有侵略和帝国主义野心的看法。中国宣布西藏属于它的领土（因而就给印度造成威胁），要求蒙古归它所有，而且还非正式要求取得缅甸北部领土。正如安东尼·艾登在筹备“三叉戟”会议时进行的访问期间对罗斯福所说，他“不大喜欢让中国人在

太平洋到处窜的主张”。另一方面，他希望中国战后发生一场革命，英国泰然看待中国会出现的革命，因为他预计革命会使中国陷入分裂和软弱的境地。

虽然美国在“三叉戟”会议上坚持要解除中国受到的围困，韦维尔和他的参谋班子仍然和以往一样悲观。英国人不是把他们的人力物力用于“安纳吉姆”行动计划和开辟通往中国的陆上通道，而是站在罗斯福一边反对美国陆军部，赞成投入更大的力量来加强喜马拉雅航线和空中供应。以金上将为首的海军部站在马歇尔一边。据金的一位助手说，金上将的暴躁脾气一旦发作，“他甚至敢俨然痛斥罗斯福。”金坚决认为，假如有弹药和装备，中国的军队就可以用来对付日本，这就是他赞成收复缅甸的原因，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以不懈的努力经海路接近中国”。由于金上将持上述看法，他“一贯相信并信赖史迪威”。

马歇尔对于罗斯福作出的赞成蒋介石—陈纳德战略的决定感到恼火。同总统接触时，他竭力一本正经，公事公办，在罗斯福逗趣时忍住不笑，在其他人大笑时，板着脸坐在那里。马歇尔的目的是避免同人建立随便的关系，以便显示出他们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是陆军部正式承担的义务，不致由于“烟斗一挥”而被推翻。马歇尔即使在不生气的时候也是一本正经——据说史迪威是称马歇尔为乔治的唯一军官——而当他发怒时则冷若冰霜。马歇尔把他在中国问题上的恼怒发泄到霍普金斯身上，而他同霍普金斯在所有其他问题上都可以相互尊重。到“三叉戟”会议时，他们俩人在对华政策上的争论已发展到见面不讲话的程度。马歇尔后来说，陈纳德问题

是他同霍普金斯之间唯一最严重的争论。马歇尔认为陈纳德不适合做独立的指挥工作，因为，正如他对罗斯福总统说过，虽然陈纳德“可能是一位天才策略家”，但是他丝毫不懂后勤学问，而且“多年来就受雇于中国政府，因而受委员长的影响过大”。他瞧不起陈纳德的谋划，并当着陈纳德的面表示不相信他。马歇尔战后同军队的史学家们每逢谈到陈纳德，“就会对他拍案申斥一番”。马歇尔尤其讨厌艾尔索普，他知道此人曾竭力劝说宋子文，使中国军队退出缅甸战役计划，因此他遭到马歇尔的激烈攻击并不是无缘无故的。罗斯福总统的两位最重要的顾问——政策顾问霍普金斯、战略顾问马歇尔——之间在中国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很大，根本无法讨论问题，于是罗斯福总统在所有问题上只得按他自己的意见作决定。

史迪威在家(“在家呆一小时比在中国周游一趟还强”)作了五天短暂休息，然后返回华盛顿参加5月14日召开的讨论“安纳吉姆”行动计划的会议。英国高级军官们在会议上的调子就是“不行——不行——不行”。英国与会者为首的是皇家军队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这位身材矮小、皮肤黝黑、不大和蔼的英国爵士不喜欢美国人，美国人也不喜欢他。这位英国爵士的态度激怒了史迪威，史迪威在日记中幽默地写道，他同“布鲁克角逐使金上将感到高兴”，但是两人的顶撞只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不是在基本政策上。后来会议移到白宫举行，由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亲自与会，史迪威又不作任何雄辩了。马歇尔对此更是恼怒。史汀生在听取马歇尔汇报后不快地写道，“显然史迪威象哑巴一样沉默不语，使人对他产生了不佳印象。”史迪威在日记中也承认，“我难于

说出自己的意见”。

如果史迪威是西塞罗①，也无济于事，因为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都反对按照“安纳吉姆”行动计划的要求，把主要力量放到缅甸。金上将竭力坚持该计划是必不可少的。丘吉尔说他决不做任何仅仅是为了安抚中国人的“蠢事”。史迪威还是开了口，说英国和美国都曾保证在今年执行北缅战役计划。在正式会议以后的讨论过程中，对蒋介石的人品极感兴趣的罗斯福总统询问史迪威和陈纳德对蒋介石的印象。史迪威回答说，“他是一个言而无信、动摇不定、诡计多端、不足依靠的老奸巨滑的家伙。”陈纳德却赞扬说，“阁下，我认为委员长是当今世界上两三个最伟大的军事和政治领袖之一。他从来没有违背过向我作的保证和诺言。”

参加会议的人又进行了一个星期的争论，中国人感到焦虑不安了。蒋夫人在会议期间又住进白宫，这使罗斯福大伤脑筋。她召见了她所能叫来的级别最高的官员麦克洛伊，坚持要美国方面完全满足委员长提出的要求。她说，蒋介石毕竟是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官。刚刚再次来华盛顿的宋子文在被邀来陈述中国对“三叉戟”会议的意见时也摆出了蒋夫人提出的论点。宋子文还明确声明，如果仰光不在攻克目标之内，中国将决不参加缅甸战役，如果不采取行动来全力减轻中国受到的压力，中国就拟单独同日本议和。罗斯福在会议上说，他认为中国并不是无事声张，盟国“一定不能弄到应对中国的崩溃负责的地步”。

---

① 西塞罗（公元前106—43年），全名为 Marcus Tullius Cicero，是古罗马雄辩家、政治家和哲学家。——译注

在对应该采取什么形式的军事行动的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以后，罗斯福的意见占了上风。罗斯福的主张是把主要力量放在扩大和加强喜马拉雅航线上，这一主张得到了英国军方的支持。最后，“安纳吉姆”行动计划被撇在一边，未作任何决定；这个计划依然是一纸空文，后来在历次会议上都一再被提出，一再被搁置。由于陆军部的坚持，收复北缅的计划保留了下来，并规定其代号为“鲁莽汉”行动计划。陆军部的看法是，喜马拉雅航线无法增加运输量，除非收复密支那，缩短空运航线。不管怎样，开辟一条通往中国的陆上通道是十分必要的。陆军部同意按需要投入力量，使喜马拉雅航线自7月份开始每月空运七千吨物资，到9月份时每月达一万吨。罗斯福总统明确指示：自7月1日开始，要从首次运进中国的七千吨物资中拨四千七百吨给陈纳德，拨二千吨用于“包括地面部队在内的所有其他方面”，其余的三百吨仍然给空军。

供“所有其他方面”使用的二千吨物资中，在满足“其他方面”的要求以后，实际上每月只有五百吨供Y部队使用。史迪威写道，“他们实际上是叫我无法筹建Y部队，然后又命令我用Y部队在北缅发动进攻……”但是在“三叉戟”会议以后或任何其他时间，史迪威都不曾要求解除他的职务。尽管得不到他所需的手段，尽管有各种议论非难他，史迪威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信念：不管怎样，他能通过缅甸战役实现收复缅甸的计划。史迪威的战区的要求是被排在最后的。正如罗伯特·舍伍德所写的那样，除了艾森豪威尔和尼米兹以外，所有指挥官都觉得自己是指挥官中间最遭忽视、最受凌辱和欺骗的人，但是，“最有权这么看自己的莫过于史迪威了”。史迪威

得对付印度战区指挥部里的失败主义情绪和中国方面的消极抵制；他本国的总司令和他被派去在其手下工作的那个总司令都要求把他召回国；他提出的派遣美国军队和授予他权威要求中国作出让步的主张均遭到拒绝，他的供应手段现在被转给了空军。史迪威对于他到重庆使命的习惯形容是“铲除粪堆”。然而，无论是出于责任心或者出于证明自己正确的愿望，或是这两个因素都有，他丝毫没有表示过他不愿再次去中国。

作为“中国的麦克阿瑟”，史迪威在华盛顿期间接受了许多记者的采访，并同有关官员进行了磋商。他同赫尔、亨培克、柯里、战略情报局的多诺万等人举行了会晤，并在国会山同参议员拉福莱特、康纳利、道格拉斯等人举行了两次“非常满意的”会议。史迪威设法尽量利用这个机会把中国问题的真相告诉美国人。戴维斯为《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尤金·迈耶安排了一次邀请史迪威和六至八名著名记者参加的晚宴；另外还有二十余位客人于晚宴结束后入席旁听。史迪威在渴望了解情况的众位听者面前讲得头头是道，他直截了当地坦率陈述了他所面临的形势，并要求戴维斯在他讲完以后谈谈形势的政治方面。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总是把事情看得很美的报界对于中国问题开始有不同意见了。后来，史迪威曾几次派遣戴维斯回美国，使报界正确了解情况。

史迪威逗留华盛顿期间，唯一愿意进一步听取他的意见的人就是丘吉尔。他邀请史迪威到英国大使馆谈了一次话，用他的话说，就是“结识结识”。史迪威在“三叉戟”会议上谈

到的问题之一就是韦维尔的失败主义和印度军队指挥机构的懒散状态，史汀生部长曾坦率地告诫丘吉尔要予以注意。在史迪威同丘吉尔首相会晤之前，史汀生曾给史迪威作了指点，“以便使他讲得有力，并且不要害怕丘吉尔”。在这次谈话当中，史迪威觉得丘吉尔以同情的心情听取他的讲话，因而他也畅所欲言，再加上他完全了解情况，这就使丘吉尔对他有了深刻印象。出乎史迪威的意料，丘吉尔完全赞成他关于英国人在印度办事不力的看法，丘吉尔实际上已经下决心撤换韦维尔和他手下的一些高级指挥官。这是丘吉尔“非常尊敬和喜爱史迪威将军”的开端。

在中国，政府对于日军4月和5月间的推进惊慌失措，据说有一次蒋介石在盛怒之下，抓起茶壶向报告坏消息的人砸去。史迪威从他手下的驻华人员那里获悉，日军“对宜昌进行了猛烈袭击”，他命令赫恩“做最坏的准备”，命令比斯尔从印度调四十架驱逐机给第十四航空队加强防务，并要他准备调出一个中队的中程轰炸机。在这期间，中国方面发表的战报宣布了连续不断的重大战斗，好几期战报中提到日本人“在中国军队的反击下溃退”，被“包围”、“歼灭”、遭到“重大损失”。日军最终于6月间在没有遭到追击的情况下撤出了这次显然是为征集粮秣和进行水路运输作的一次训练性出击。中国人把日军的撤退宣布为中国的一次重大胜利，美国记者们也欣然随声附和地予以报道。

史迪威取道伦敦和开罗再次到中国，途中拜访了驻在北非的诸位共事指挥官，史迪威对记者说这是“察看他们的战

术”。飞过喜马拉雅航线以后，“飞越大西洋就算不了一回事。你根本没有觉得正在飞渡大洋”。史迪威在伦敦期间进行了一系列高级会晤(会晤是根据马歇尔的指示安排的，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史迪威的声望)，最高潮是为他举行的一次国宴，席间英国副首相艾德礼致辞，史迪威致答辞。虽然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这样做是“过份重视这位乡下佬”，但是也许他那时对一个月来的军事势态并非完全漠不关心。他在伦敦逗留两天所写的日记中有这样一句含义隐晦的话，“在非常愉快的时刻，我静下来想到了自己的另一面”。

第十五章　史迪威必须走

1943 年 6 月—10 月

向中国提供物资、向中国的空军和地面部队提供军需品的工作是这场战争中最艰巨的后勤任务，大概也是任何战争中所未有过的艰巨的后勤供应问题。如果说地形和气候等自然障碍造成的困难极大，那么由于相互对抗和各参战国士气低落等人为障碍造成的困难也不轻。夏季几个月的季雨使上述困难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要按照“三叉戟”会议的指示把喜马拉雅航线的运输量增加到每月一万吨需要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

“C-46 飞机上到处都是毛病”，史迪威在他的视察日记中忧虑地写道，“汽化器结了冰。我们在喜马拉雅航线上已经损失了六架飞机，飞行员们的士气越来越低落”。机组人员有反抗精神，一旦飞机引擎熄火就立即弃机跳伞，或者天空有一点云彩就拒绝出机飞行。当飞行员们弄清了“中国人”并不打仗，运送给地面部队的物资都被弄到黑市上倒卖时，他们就不愿冒着生命危险去填满私人的栈房，虽然他们愿意冒任何风险为第十四航空队运送补给品。防范日本战斗机的工作做得很差，因为日本人把他们的飞机藏在有草皮覆盖的地洞中，这些地方从航空照片上很难看出来，就连克钦侦察员也难以发现日军掩藏飞机的地点。战略情报局所属部队在 1943 年

间共营救了一百二十五名空军运输队的机组人员，但是所营救的人数还不到被击落的飞机上的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余的人不是死了就是被俘了。但是，“三叉戟”会议之后，给空军运输队派去一名新指挥官和实行新的鼓舞斗志的措施，逐渐消除了C-46飞机的毛病，士气和飞行条件有了改善，运输吨位从5月份的三千吨增加到7月份的五千五百吨，9月份又增加到八千吨，雨季结束后，11月份增加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万三千吨。

但是空中运输的成果是以牺牲公路建设才取得的，因为修筑公路的人力以及许多推土机、卡车、平路机和铲土机都被调去修建阿萨姆机场。为留在筑路工地上的部队运送物资的工作在雨季受到了阻碍。汽车无法通过泥泞的道路；大象和那加地区的脚夫无法运送所需的食品、燃料和装备；劳动一天清理出来的路基可以在一小时内被塌方埋掉；推土机由于土地塌方而斜倒在路旁；所有这一切——人、机器、帐篷和地面全都泡在雨水中；粮食不足，疟疾蔓延。缅甸甚至出现了一种无法对付的丛林斑疹伤寒，这种伤寒能引起皮肤损伤、高烧、内出血、昏迷、说胡话，常常使人丧命。

在空军运输队扩大的同时，修路工程从5月至8月只推进了三英里。由于史迪威坚持要收复北缅，这条公路在这个战区中同史迪威密切联系在一起，人们普遍认为史迪威坚持收复北缅不怎么聪明。英国人总是说，由于自然条件决定了缅甸的公路都是沿河流成南北向，从来没有一条东西向的公路，因此要修好这条东西向公路是不可能的。自然条件诚然如此，但不一定是决定性的。很少人认为将来这条公路能够

运送很多东西，足以说明现在耗费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和吃这么多苦头是值得的。据斯利姆将军说，只有史迪威认为这条路“既有可能修好也值得耗费它所需的人力物力”，其实，他本人本愿用修这条公路所需的资源来发动一场全面的攻势，把从仰光以北的缅甸全部地方重新夺回来，这样，对中国的物资援助将比这条公路给中国运送的物资多得多。那是很明显的。史迪威比斯利姆更衷心期望如此。唯一的困难是斯利姆的上司，这一点史迪威很清楚。斯利姆的上司自始至终都激烈反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迪威并没有把修建利多公路作为很可取的办法，而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因为首先，北缅战役的全部补给物资必须经这条公路运输，最后在中国的战役的补给物资也得靠这条公路运输。他只是对汉尼巴尔说，“我一定要找出一条路，不然就修筑一条路。”

到了8月，困难已经清楚地表明，陆路和喜马拉雅航线加到一起也无法运送足够的自用物资和燃料以及供空军在中国扩大空中行动使用的燃料。面对着运送一吨物资到中国就得耗费一吨汽油这一严峻的事实，计划人员8月份在魁北克会议上决定：中国的形势需要铺设一条输油管道。这又会成为一项不切实际的冒失工程。从加尔各答到昆明有一千八百英里，中间要穿过大山和峡谷，要越过激流和河床，因为没有钢材，只有靠木材在河流上架起桥梁来支撑油管，这条输油管如果铺成，将是世界上穿越自然条件最差地区的最长的输油管，实际上这只是计划人员所做的管道美梦罢了。同利多公路一样，这条油管必须跟在进攻部队的后面铺设。除非北缅战役取得胜利，否则公路和油管都达不到中国境内。

中缅印战区之所以表现出种种无能，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能商妥一个为之奋斗和激励斗志的目标。在中国的普通美国人，买不到他们嗜好的啤酒和陆军消费合作社供应的物资（空军运输队的飞机腾不出较多的地方来运输），他们对于周围的贫穷和肮脏而给他们传染上痢疾、肠虫病和其他各种内脏疾病感到十分憎恶，不愿接近中国人的毫无生气、刻板而悲惨的生活。他们丝毫不了解由于中国人长期贫困和一无所有才使得偷盗和贪污行贿成风，因而也没有象浪漫主义者想象的那样，从接触中感受到所有的人都亲如兄弟。相反，他们认为所有中国人都腐败无能、不可信赖、十分讨厌、见东西就偷、毫无希望、东方王八蛋。在供应基地内外，总的来说，敌对关系又出现了。中国老百姓觉得美国人愚蠢、放荡、粗鲁、傲慢、常常是残暴而又容易收买。据美国大使馆的报告说，中国的“上层阶级”对于美国士兵闲遐时候的粗野行为和第十四航空队人员“粗鲁的”举动和“不修边幅、肮脏邋遢”的外表“感到惊讶和震惊”。

租借法案援助使双方无休止地憎恶对方。昆明的黑市上，从药品到半吨卡车，几乎应有尽有。连第十四航空队都报告说，“中国人贮藏汽油，把汽油上在我们飞机的帐上。”报告中举出一架飞机为例，这架飞机有一天加了八次油，总共七百加仑，而实际上总共只飞了四个小时。如果没有美国人纵容捣鬼，这种交易是很难做成的。在中缅印战区里，美国人也毫不迟疑地捞取好处。到 1944 年底，由美国空军、陆军、红十字会人员、文职人员走私的黄金、磺胺药物、外币、香烟、口香糖、陆军消费合作社供应的物资等等，估计约为四百多万美元。

美国陆军调查组调查人员一次就处理三百宗案件，其中最大的一件是第十四航空队的“鲍德洛案件”。这个地方除了涉及从华南名城桂林买来一批姑娘以及从印度经喜马拉雅航线运来一批姑娘的主要勾当以外，还是一个走私中心。史迪威得到有关情况的报告以后，不得不采取正式行动。“军官们拉皮条，把女人弄到飞机上乱搞。派人把陈纳德找来，他知道……更多有关偷汽油集团的内情。”此事受到了战区总监的调查，由于事情牵涉到陈纳德，实际情况比已知道的复杂得多，所以造成了进一步的恶感。陈纳德在中国的各种经济活动也是引起阿诺德将军不信任的原因之一。

处于殿后梯队地位的印度真惹人生气，原因既在于英帝国主义者也在于它国内懒惰的“东方佬”，美国人称印度人为“东方佬”。美国人往往把在印度的英国人同英王乔治三世联系起来，也把印度人 1942 年的起义同美国人在列克星敦、康科德、邦克希尔的反英斗争联系起来，但是美国人最初对印度人的同情很快就转变成了不耐烦和蔑视。许许多多的印度人十分明显地习惯于卑躬屈膝地生活。他们缺乏中国人的生气、欢乐、内心的自信。美国人虽然不停止批评帝国主义，但很快就接受了英国人对印度人的态度。有人说中缅印战区的英文缩写字母(CBI)代表着“思想混乱的印度狗崽子”Confused Bastards in India 的意思，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中缅印战区的美国人员都在袖子上戴着一个盾牌形状的中缅印战区徽章，徽章的图案是美国的星条，顶部是印度的星，中国的白日。这种徽章是用来区分美国人和英国人的，表明他们这些美国人是作为盟友到亚洲来击败日军的，不是来复活英帝

国的。虽然徽章由三个国家组成，但是人们却不能同心协力。由于在别的地方能得到荣誉或者提升，由于人们心怀不满、丑闻百出、心灰意懒、存在着各种错综复杂的怨恨，中缅印战区成了令人不快的战区，它的内部意见不和。

由于得不到物资和权力，史迪威现在得征得蒋介石的同意，以参加不包括仰光在内的缅甸战役。史迪威要执行的一个绝妙的任务是把罗斯福提议颁发的荣誉军团勋章授予蒋介石，还有何应钦，以此作为对他们的抚慰，也可以说是贿赂。而史迪威一直认为，中国军队软弱无能责任就在何应钦身上，他还一直鼓动撤掉何应钦的职务。史迪威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这真使我感到恶心”。（同时，史迪威顺便还向他的好友商震、红十字会的罗伯特·K. S. 利姆医生、普遍受到尊敬的军械署长俞大维等人颁发了荣誉军团勋章，以此作为对他们的一种照顾。）

史迪威的憎恶不只是出于个人原因。他觉得美国使自己居于“不得不支持这个腐朽政权的地位”是根本错误的，这种情况同美国在德国所反对的局面形成了奇异的对照。史迪威认为，中国和德国都是“由盖世太保（在中国是戴笠手下的特务组织）支持的一党制政府，由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神智不健全的人领导一党制政府”。史迪威时常试图使自己理解这种情况。他记下了同他的好友和顾问、中国的大学者蒋梦麟的一次谈话的详细情况。蒋梦麟提醒史迪威，欧洲已经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政治教育，中国才经历过五十年的政治教育，而且是依赖外来文明，不是自己的文明。他说，虽然委员长由

于没有受过教育而不足以成事，“但是眼下还没有比他合适的人”。史迪威从他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在中国的经验中知道，国民党把国家治理得这么糟，并非意料之外的事，因为中国还没有形成有别于家庭责任的公民概念，行使民政职能的官员阶层已遭毁灭。

但是史迪威个人受到的挫折是最大不过的。罗斯福作出的重用陈纳德的决定显然缩小了史迪威的影响，确认了委员长维持既不作战又不改革的决定。“我受到了忽视、轻视、阻挠、拖延、欺骗……”，史迪威再也忍耐不住了。

史迪威在等待蒋介石的答复，等了三个星期，却发现身为军政部长和参谋总长的何应钦对于“三叉戟”会议的建议丝毫不知；蒋介石没有告诉他。使史迪威恼火的是，何应钦想把配备给Y部队的武器调到湖北去使用。原来保证最迟在3月1日给Y部队派去几师部队的事仍然一拖再拖。陈诚拒绝回司令部，除非这些师到达。在未到达的部队中，原先曾保证“绝对”在5月20日以前赶到的一个师，到6月份还没有到达；时至7月，才到了象征性的一千二百人。给拉姆加尔训练营地补充兵员的情况也是如此。原来答应3月份派四千五百人去拉姆加尔受训，可是到7月份仍然未见一个人影。原来答应派去接受操纵重炮训练的二百人，经过中国医生检查就退回六十五人，美国医生又退回三十人；到拉姆加尔受训的只有三十五人。后来，在实际战况的逼迫下，派了一批十二到十四岁的孩子作替补。在同何应钦就卡车争议举行会晤以后，史迪威的那种始终不渝坚持不懈的精神几乎丧失殆尽了。“这次会晤后我的情绪再次下降，看来任何事情都绝对办不成了。”

史迪威认为，何应钦越来越强烈地反对派兵去拉姆加尔受训，是因为拉姆加尔的训练方法使他自己管理中国军队的那一套很丢人。史迪威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拉姆加尔营地直接把军饷发给士兵，它使得士兵在伙食和医疗方面的要求也提高了，这实际上在中国军队中会起坏事的作用。至于Y部队，史迪威觉得中国人是在拒绝别人帮助他们作好战斗准备的一切努力。"那是问题的症结——他们就是不想作好打仗的准备。"这的确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中国人不愿通过决定性的战斗来解决问题。事例之一就是中国军队1937年在上海主动要同日军打一仗，但是那一仗不是出于军事目的，而是为了影响国内外的舆论。中国人在Y部队问题上向史迪威作出种种保证是为了把物资弄到手，并不打算付诸实践。中国人一贯是把保证当作安抚人的一种办法，并不打算去做。史迪威深知这一点，但是他还是相信中国人对他作出的保证——他愤恨地把没有兑现的保证一一记下来——因为他无法摆脱他自己的设想：作一次保证总是说明一种意向。

也有一些中国人要求改革军队。昆明军校的许多军官都勤奋工作，渴望得到教导。被任命为昆明军校训练主任的白崇禧从首都来军校视察，显得热情颇高，他是第一个来军校视察的高级军官，而委员长和军政部的其他军官都没有来过。白崇禧视察了每一个科目的教学情况，要求看看操练指南，向军官们发表讲话谈了美国军队的方法，准备在广西省会桂林再开办一所军校，再训练三十个师。白崇禧的热情并不是没有私心的，因为搞这个计划就会加强他领导的广西派的实力。正是这个缘故，蒋介石感到放心不下。对于急于得到鼓励的

史迪威来说，白崇禧的支持似乎是一个“重大胜利”，白崇禧“也许是中国最出色的人”。

然而史迪威渴望有“真正的权力”来执行巩固和训练中国六十个师、使之成为中国具有战斗能力的一支军队的计划；要不然，租借法案的援助就是没有用到它原来的目标上——武装中国人与日本人作战。大约在这个时候，史迪威得出结论：如果他在中国军队中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指挥职务而只是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这个顾问职务的话，他就永远无法完成他的目标和他既定的使命。史迪威设想出“战地参谋长”的职务，他认为美国可以为他争取到这个职务，只要美国人愿意告诉中国说，不给他这个职务，就撤销租借法案援助。史迪威1943年6月在他的笔记中已经写下了这一计划，这一计划正是一年以后涉及他的使命的那项建议的由来。据史迪威设想，美国可以要求委员长任命他担任战地参谋长，并命令军政部执行他的各项决定。如果蒋介石拒绝这样做，美国就“停止对中国的一切援助……蒋介石无法拒绝。如果我们甩开他不管，他就会完蛋。中国向美国要五亿美元援助的谈判正在这里举行”。

史迪威给马歇尔去了几封信，建议按照他的计划办。信中对于美国政府没有用租借法案援助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感到不满。“我们的政策是错误的。我们的东方政策的想法是错误的。”由于罗斯福总统拒绝向蒋介石提出换取美国援助的条件，史迪威认为改革中国军队不成该由罗斯福负责。史迪威言过其实地谈了向蒋介石提出条件的作用，因为他没有权利提出这样的条件。情况很清楚，即使在最后通牒面前，蒋介

石也总能找到某种办法避免实行他所不敢实行的军队改革计划。史迪威内心也知道，用租借法案援助作讨价还价的手段决不是能改变中国制度性质的万能魔杖：他在一篇随便写的涉及蒋介石政权普遍玩忽职守的散记中写道，“要改革这个制度，就得把它彻底砸碎。”

马歇尔屡次致电史迪威催办给蒋介石授荣誉军团勋章的事。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马歇尔要他“务请合作，罗斯福要知道授勋的日期！”史迪威曾提出过相当天真的反对意见，说蒋介石不配获得这种勋章。而蒋介石大概也很不愿意让史迪威给他授勋，他建议由信使把勋章转交给他。史迪威认为由信使授勋是对美国能够给予一个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勋章的污辱。在这种气氛下，授勋仪式按时于7月7日举行，并拍摄了纪录电影。两个主角脸上毫无表情，史迪威用中国话照本宣读了给“自由旗手”的授勋词，称他取得了“杰出和鼓舞人心的成就”，史迪威隔着一段距离给蒋介石别上勋章。当时蒋介石望着远处，而身穿无袖印花上衣、脚穿有逼真蝴蝶结凉鞋、显得潇洒的蒋夫人则和善地在一旁看着。“小人物迟到了半个小时……他身旁的人都毫无表情……我拉住他的上衣给他别勋章时，他吓了一跳，好像害怕我刺杀他似的。”

五天以后，即7月12日，蒋介石同意参加缅甸战役，这一次是书面答复，并有他的签字。史迪威的笔好象习惯成自然，写下了使蒋介石达到这一步所经历的一长串障碍、骗局和“一般的别扭”。“天哪，我简直智穷力竭了。”史迪威没有心思回想英美两国在缅甸战役问题上有过多少次逡巡。他立即去印

度呆了六个星期，为缅甸战役作准备。在重庆得到很大收获以后，史迪威渴望在缅甸战役中让他指挥在拉姆加尔受训的军队。陈诚还没有返回指挥部，据说患了溃疡病，但他是因病还是不愿意或是因中国政界的内在矛盾而没有返回指挥部，还很难说。尽管Y部队的情况远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但是史迪威认为他再也没有办法了。训练计划仍旧由多恩负责执行，但是史迪威在调动军队和补充兵员来拉姆加尔训练方面，再也无计可施了。

到1943年仲夏，史迪威被迫认识到，他这个美国人想使中国达到的战斗效率是蒋介石所不想达到的。史迪威现在认识到，蒋介石违反他自己最大利益的令人费解的态度是有根源的，这就是他担心"一支训练有素的地面部队会落到一个将来可能是对手的人手里，这是个冒险"。史迪威在7月23日给马歇尔的信中承认了这个原因，并在日记中进一步谈到了这个问题。他现在认识到，曾经一再出现的使他烦恼和不解的阻碍来自蒋介石，因为蒋介石"害怕有人对自己的权威提出异议，还因为蒋介石怕人反对他的下述看法：空军是决定性的力量，因此没有必要把时间花费在地面部队身上。否则，他就不会使他的军队那么不象样子而自己对于这种状况带来的莫大风险却又那么泰然了。"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蒋介石"确实认为军队的情况很好，只要有武器就能使它成为可畏的力量。但很难想象一个军人愚蠢到如此地步……"事实上，与其说蒋介石是愚蠢还不如说他不了解情况，因为他只愿听好消息，不愿听坏消息。正如蒋梦麟所说，蒋介石"不知道实际情况。他的指示成百上千，象雪片一样乱飞，所有的人都说'是，

是，’但是他根本不知道究竟有什么结果”。看来蒋介石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总督叶名琛的转世。叶名琛在英国海军炮轰广州城的时候，既不愿谈判又不愿投降，因此广州人在当地的一首歌谣中唱道，“他既不愿打，也不愿和，又不愿守。他既不愿死，也不愿降，又不愿逃”。

这时候，为了消除战区存在的不满情绪和分割状态，中缅印战区的指挥权作了大调整，划分成几个部分。在“三叉戟”会议和下次魁北克会议之间的整个夏季中，英美两国在估价让中国参战的重要意义上有分歧，这阻碍了中缅印战区战略计划的制订。虽然韦维尔被提升为总督并且由原驻北非的英国第八集团军司令克劳德·奥金莱克将军接替他任驻印总司令，但是奥金莱克和他手下的人员对印度情况的看法同他的前任一样悲观。其根本原因是，英国不再相信印度军队愿意为英帝国打仗。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不愿作重大努力，仅仅为支援中国人而冒风险在缅甸北部的荒山中作战。英国人宣称，中国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总的来说毫无意义”，英国人也不想支持中国在将来实现稳定。参谋人员在伦敦举行了讨论，其间美军的计划人员争辩说，如果不开辟一条从缅甸到中国的供应线，中国就会崩溃，中国一旦崩溃，盟军就会失去进攻的基地，约翰·怀南特大使对戴维斯说，“丘吉尔首相非常愿意看到中国崩溃。”丘吉尔丝毫没有改变他的看法，他一直认为可以从日本周围发动进攻打败日本，从而把中国置于战略计划之外。

罗斯福仍同以往一样决心让中国成为战后世界秩序中的

四块基石之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于6月份建议当年晚些时候由他亲自同蒋介石会晤一次。他对于“我们在中国的整个工作成效”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委员长和陈纳德抱怨美国政府说话不算数，罗斯福总统仍然把这归罪于一些人。罗福斯7月15日与霍普金斯、马歇尔、李海、萨默维尔等人举行会议时说，“史迪威显然憎恨中国人”，他的电报里充满讽刺挖苦的词句，中国人和委员长显然都知道他的态度，“非常明显，委员长也不喜欢史迪威”。马歇尔承认史迪威不够慎重，但是说明他对中国官方和“对中国人民的伟大感情”是不一样的，并且坚持认为史迪威这样的人是必不可少的。

丘吉尔提议成立一个与现有的印度指挥部分开的新的东南亚司令部。这一建议看来会解决某些困难。由于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没有作战部队，也不打算派部队去那里，美国的原则是不为恢复英帝国的疆土而战，所以东南亚司令部的司令只得由英国人担任。在魁北克会议上，最后一致同意由英俊、潇洒、悦人的四十三岁的中将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出任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蒙巴顿是英王的亲戚，拥有永久的上校军衔，对法国迪埃普进行袭击失败就是他作为联合作战指挥官所干的事。

史迪威后来被任命为东南亚盟军最高副司令，并保留着他的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委员长的参谋长职务。他就是这样同时负担起三个司令部的重担的：通过蒙巴顿对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负责；通过马歇尔对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对委员长负责。此外，他还是拉姆加尔部队的作战指挥，为了便于军事指挥和造成敌人的错觉，拉姆加尔部队改称为北部

战区部队。根据这种安排，这个管辖区在地理上、作战指挥上和民族上相互连结交错重叠，非常复杂，当时及后来没有谁能把它们按照一般道理加以区分。蒙巴顿对这些地区感到摸不着头脑，甚至马歇尔也是如此；丘吉尔承认对这些地区弄不清楚；主要受害者史迪威并不是把组织工作看得比任务本身更重要的人，只是相当轻描淡写地把他的命运说成“使韦维尔、奥克、蒙巴顿、小人物、亚历山大（空军运输队指挥）和我交织在一起、混合在一起使人难以识别的中国之谜”。

戴维斯为史迪威所作的分析是，英国建立东南亚司令部旨在重新夺取它在东南亚的属地，如果英国想完全恢复它的第一流强国地位，它就必须在东南亚这么干。美国派人到印度和缅甸是使英国感到尴尬的事，但是英国人不得不容忍这一点，他们的目的是要“搞成伙伴关系，然后加以控制……以便使我们和他们的政策和行动一致起来”。戴维斯指出，这就是蒙巴顿的任务，蒙巴顿也许得到了丘吉尔要他“抑制他个人精力”的密令。

戴维斯接着指出，英国知道，无论英国在何种程度上参与美国旨在支援中国的行动，这都是与它本身的利益背道而驰的，而美国也想必知道，无论美国在何种程度上帮助英国恢复它的殖民统治和白人霸权，这也是同美国的政策背道而驰的，同美国对亚洲国家的态度和未来关系是背道而驰的。读过这份报告的一位国务院官员在报告上写道，“我对于我们军队中有人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感到极为高兴，但是，前途是多么令人失望啊！”

在魁北克会议上，计划人员决定把中国作为今后对日本

进行远程轰炸的基地。但是这个计划由于一个替代方案而黯然失色了，因为作了重要决定，从太平洋中部向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推进。这两个群岛离日本仍然有二千五百海里路程，从太平洋基地出发执行远程轰炸的战略构想在空军看来只不过有一线希望。长驱而下直取距离日本有一千四百五十海里的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仍然是很遥远的事。原设计活动半径为一千五百英里的 B-29 飞机的性能还不完全清楚。美国人在魁北克会议上坚持不可撇开中国，但是他们没有说服英国人。所有过去有争论的东西又拿出来争论一番。除了北缅战役以外，没有为东南亚部队制订出与它的新指挥机构相称的全盘战略。打败日本的预计日期提前了四年，即 1947 年，或者说，按照最乐观的计划，在预计于 1944 年打败德国的十二个月后打败日本。

“三叉戟”会议以后为中缅印战区采取的唯一步骤就是史迪威长期希望的事：投入美国作战部队，但是只是派往北缅战场的代号为“抢劫者”的三千人的一支小规模突击队。这支突击队是仿效温盖特突击队建立的，迄今为止温盖特突击队并不怎么成功。其领导人奥德·温盖特准将是非正规战术的天才，丘吉尔曾带他去参加魁北克会议。他在阿比西尼亚和巴勒斯坦期间在军事上有所创新，创立了一种远程深入战术理论，这种理论的基础是在被敌人占领的土地上建立分散的小据点，突击队可以从这些据点分头深入敌后，切断敌人的交通线。他的计划同陈纳德提出的快速省劲地摧毁敌人的方法具有同样的诱惑力。这年春季的作战计划取消以后，由温盖特训练的作好一切准备的突击队，获准到缅甸投入战斗，但是除

了可能显示英国人展开了活动以外，突击队没有任何战略目的。突击队的活动受到了大肆宣扬，但是对于它的活动的灾难性结果，三千人里面死亡和失踪竟达八百人之多，却避而不提。然而，突击队的方法被认为是有效的，并打算配合下次战役再次展开突击队活动。

马歇尔对远程深入战术有深刻印象，因此他同意再派一支美国突击队。他很想限制美国在亚洲的行动，并想快速结束战争。他认为，战争长期拖下去会对社会体制产生危险。由于温盖特突击队中受伤的人的不幸命运是当日军的俘虏，马歇尔和阿诺德都设想远程深入战术应完全依靠空军的支持，由空军提供补给，进行撤退和增援。虽然"抢劫者"突击队受史迪威的全权指挥，但是马歇尔还是同意让温盖特指挥突击队的活动。

史迪威的反应是可以想象的。"我们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要来一小批美国军队，可是他们现在却要我们让温盖特指挥它的行动！呀，难道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指导他们，只有那位爱出风头的人才知道！他派人到杰沙毫无成果地白跑一趟，破坏了一段我们的人早就破坏了的铁轨，在伊洛瓦底江东面被敌人包围，逃出来的时候损失了百分之四十的人员，除此以外，其他什么事也没干成。现在他倒成了专家。那真够叫基督伤心。"马歇尔安慰他，提醒他说："如果我们要在一起共同作战，我们都得受一点委屈。对日本鬼子的冲击是报偿。"在那之前，马歇尔还给史迪威一封信，敦促他要真正同英国人合作；作战处处长汉迪将军建议，作为附加条件，在英军奏《上帝拯救国王》时，史迪威可以不参加他们一起唱，但是他至少应

当站起来。

除了史迪威本人的不满之外，别人也不满起来：陈纳德的不满就比任何时候都厉害，史迪威在日记中对陈纳德作了辛辣的嘲讽。“他在大声疾呼地求援。‘日本人要把我们赶出中国了！’真是可笑。六个月前他曾夸下海口，说他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陈纳德在向第十航空队求援，因为他对日本商船队的袭击引起了日军对他的空军基地的袭击。由于陈纳德一直宣称日军这样干就使他的飞机有机会把日机从空中全部揍下来，所以史迪威不愿把他原来担任保护喜马拉雅航线的飞机拨出来支援陈纳德。

在魁北克会议的接待室里，哪里都去的宋子文戴着黑礼帽和黑边眼镜，手持藤杖，到处打听会议对有关中国的问题作出了什么决定。这个时候，美国人通过破译日本的密码电报获悉，日本人也已经破译了中国的密码电报。已经不严密的中国的保密工作出现了大的漏洞，吸收中国参加联合参谋长会议就是鲁莽行事了。英国坚决反对把会议的有关决定告诉宋子文，但是又无法把其中的原因告诉他。因为，要是这个情报让日本人知道，日本人就会知道他们自己的密码已被破译了。一贯坚定而又机智圆滑的马歇尔承担了处理此事的任务。他把宋子文召进他的办公室，要他举手发誓保守秘密，然后把魁北克会议的有关决定告诉他，并说中国的密码已被日本人破译。马歇尔对宋子文说，如果他不遵守誓言，用电报把这个消息发回去，美国陆军部能够监听到，那么他也就完了。他得亲自返回重庆作口头汇报。

就在举行魁北克会议的同时，美国报界第一次透露出中国军事上无能及其必然结果的真实消息：如果美国人期望中国人在最终打败日本的战争中发挥主要或决定性的作用，那是会铸成"灾难"的大错误。《纽约时报》军事记者汉森·鲍德温不得不在其他报刊(在8月份的《读者文摘》)上把真相告诉公众，他的文章的题目是《对中国的看法主观愿望成份太多》。他写道，"传教士、战争灾害救济运动、能干的大使和电影都向我们说了过头话。"中国"从我们方面的意义上说，并没有赢得战争，而是正输掉战争"。它的巨大贡献在于牵制了日军十五至二十二个师，但是"它没有达到我们标准的真正的军队"，它发表的战报"几乎毫无价值"。鲍德温利用他同陆军部的关系，用史迪威本人可能会运用的语言描述了中国军队在健康、训练、装备和防守精神方面的不足之处，但是他得出的结论却与史迪威的结论不同。他写道，无论喜马拉雅航线还是陆路运输，都无法运送在中国打一次重大战役所需的物资，如果不进行一次重大的两栖作战，也不可能夺取中国的港口。鲍德温的结论是：只有在海上击败日本，陆地上只有俄国人能够在满洲使用兵力。他的结论很重要，因为它反映了陆军部的新想法。

史迪威得忠于自己的使命，他仍然把中国看作是抗击日本不可缺少的一支力量。他自己制订了一个打败日本的长期计划，其中包括对广州沿海地区进行一次地面攻击，这次进攻的先头部队将是重新打通缅甸以后从印度调入中国的三师美军。这支部队将同麦克阿瑟指挥的从菲律宾和福摩萨向广州沿海出击的部队以及驻扎在中国基地袭击日本海运线的空军

协同作战。最后一个阶段预定向上海发动一次陆上攻势，同时对日本本岛进行远程轰炸。史迪威认为他的计划能够把魁北克会议上制订的时间表缩短一两年。这个计划的成败取决于美军的先头部队，在史迪威看来，取决于指挥这支中美联合部队的美国指挥官。史迪威手下的人员经常敦促他像其他战区的指挥官一样为自己的需要进行游说，或者像麦克阿瑟和陈纳德一样，利用报纸做宣传，但是史迪威拒绝了。“我决不给乔治·马歇尔制造任何压力。他在指挥着世界各地的战争。谁该得到什么应该完全由他去决定。”

但是，史迪威还是尽他的最大努力使由五名参议员组成的代表团看到实情。这个代表团在到盟国巡访期间于8月到达中国。史迪威经常提醒自己：如果把国民党政权的真相公布出来，由于美国对中国所抱的幻想破灭，重庆会因担心失掉美国援助而赶忙采取补救行动。史迪威从昆明陪同参议员们到重庆，“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尽量地影响他们的思想，但是蒋夫人施展了她的魅力，我不知道我和她谁胜了”。史迪威认为参议员们“至少已知道很多情况，会产生一些疑问”，离开的时候，“他们的自信心会动摇”。参议员们回到美国以后报告说，英国在利用租借法案的援助为英帝国谋利。但是在国务院的恳求下，参议员们没有公开批评中国。参议员洛奇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时仍然说，“有关中国的甜蜜宣传”现在该收场了。他的讲话被亨培克以《贬低中国》为题目报存国务院。

华盛顿流传的谈论证实以上的题目是有道理的。通过实行合作，美国人发现中国根本不像有关它的神话那样。这种

新看法反映在陆军部的计划和战略部门中，这个部门开始重新研究中国在打败日本的全面战略中所起的作用。同太平洋地区逐渐展现的良好前景相比，利用中国潜力所需要花费的力气看来不值得。为了使中国参战以对付日本所花的代价，拿驻中缅印战区的空军和勤务部队的人数来看，到1943年增加了五倍，总数达九万五千五百人。虽然这个数目同太平洋地区的七十万人和欧洲战区的一百四十万人相比为数甚少，但是这支部队是放在美国历来反对使用他们的地方——亚洲大陆。作战处10月份在一份题为《再析我们的亚洲战略政策》的文件中提出一个初步论点：在中国身上，美国除了使它继续参战而作的必需花费以外，一文也不多花；限制轰炸机进出基地的数目；只为中国训练三十个师；绕过缅甸；从中缅印战区撤出多余的勤务部队，调往其它战区。这个实际上包括了英国立场的果断建议没有被采纳，但是在战略上——即使不是在政治上——并非少不了中国的思想已扎下了根。

史迪威8月底从印度返回重庆以后，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历时两个月的动机神秘的奇异搏斗的目标。这场搏斗以他提出的牵涉到共产党人的第一个建议为开端。史迪威同国民党北方第二十二军军长邓宝珊将军、还同戴维斯和大使馆的谢伟思等人就同共产党的第十八集团军(即原来的八路军)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作了商谈，随后提出一项计划，让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方联合采取军事行动，牵制日军，使日军不能实施他们可能想逆长江发动新的攻势或威胁长沙的计划。他估计日军希望通过在长江或长沙采取的牵制行动来阻挠Y部队的集

结。作为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建议最好掌握主动，使日本人猜疑，不要让他们“采取牵制性进攻使我们顾此失彼”。他制订了一个“完全以军事考虑为基础的”具体行动计划，他还提出一个新的论点，敦促说，这个计划将是对共产党人公开表示的愿意在蒋介石指挥下抗日的诚意的考验。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共产党人“肯定不理会”他的计划。

当时史迪威没有和周恩来或其他共产党人接触过，除了戴维斯以外，他也不允许手下的任何人同共产党人接触。当多恩建议同共产党人接触时，史迪威警告他说，“我不想听到想这样做的事，我们到这里是同中国政府合作的。”六个月以前，周恩来曾重申，他邀请美国军事观察员到华北亲自调查，为今后开展军事行动奠定基础，但是对这个建议未予理会。

在这年夏天重庆和延安重开谈判期间，蒋介石提出了给共产党人合法地位的一个条件：共产党人放弃他们在华北独自建立的政府，把他们的军队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下。共产党人拒绝了蒋介石提出的条件。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内有一派力主现在同共产党人摊牌，因为俄国忙着在同德国打仗，无暇顾及中国的共产党人。当时谣言流传开来，说蒋介石计划在9月间向共产党人发动进攻。史迪威觉得这可能是中国不想参加缅甸战役的借口。他得到报告说，国民党军队在北上，他要求马歇尔考虑给予指示，万一中国发生内战，美国军队怎么办。他自己的意见是奉行一种严格的不介入政策。大使馆对有关消息也感到十分惊恐不安。美国通过外交行动开始施加压力，促使组成联合，这样美国就踏上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危机暂时平息下去了。蒋介石9月13日在中

央执行委员会发表的一次讲话中，否认了他打算用武力对付共产党人，并重申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应通过政治办法来解决。

就在蒋介石发表讲话的这一天，史迪威突然接到蒋夫人的邀请，请他到她的家中同她和她的姐姐孔夫人会晤。这次会晤是两姐妹通过以后的多次会晤同史迪威结成联盟的开始，这个联盟使人迷惑不解，它带有阴谋色彩。宋霭龄和宋美龄告诉史迪威，她们对于战备状况之糟感到震惊，很希望想点办法来改变中国的无所作为的状态。她们同意史迪威的看法：何应钦是作梗的主要障碍，甚至必须把他撤换掉。这就可悲地表明，委员长所信任的人非常之少，或者人才来源非常困难，或者这两种情况都存在，以致两姐妹提出的取代何应钦的人竟然就是蒋夫人本人。她们敦促史迪威继续施加压力，并且保证为史迪威在委员长面前出一臂之力。史迪威写道，“我们签订了一个攻守同盟”，史迪威不太清楚这个同盟要干什么，但是，无论这件奇怪的事的根源是什么，史迪威认为他的新同盟是真要干一番的。史迪威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这是他妈的打仗的办法吗？”

两姐妹告诉史迪威，有人在积极活动想把史迪威撤换掉（史迪威认为这是何应钦干的），并转告了人们抱怨史迪威的话：他曾经叫俞飞鹏“土匪”；他在备忘录上的签名是“美国中将史迪威”而不是“委员长的参谋长史迪威”；“我‘傲慢’、讨厌中国人……说中国人不是好东西，对他们不屑一顾。”到此刻为止，人们对史迪威的抱怨是有一些道理的，是为人们所相信的。的确，史迪威在日记中，无疑还在一些讲话中，对俞飞鹏

之流不是称"游民"就是称"匪帮"，这已成了他的习惯。无可否认，他瞧不起中国军队的官僚阶层，虽然许多中国人也瞧不起这些人。高思报告说，这些人以"不善管理和贪污腐化"闻名。史迪威的过错在于他一贯说话不够婉转。他奉派并奉命定要执行一项受惠者却竭力抵制的使命，他虽然不断受到阻挠，但并没有改变他的难以改变的僻性。

史迪威猜想，宋家两姐妹的建议源出于宋子文，他认为，宋子文大概要她们"最好支持我，同我合作"，宋子文这样做也许是马歇尔敦促的结果。实际情况则恰恰相反。宋子文在华盛顿以他当年支持史迪威任职的同样劲头展开活动，要求把史迪威召回美国。宋霭龄和宋美龄的行动就是对她们的哥哥的直接驳斥。宋子文声称，由于蒙巴顿任盟军最高司令，史迪威没有必要在中缅印战区任职。宋子文9月15日向罗斯福提交一份中缅印战区的新计划，其中包括由一位中国人取代史迪威，这个人应该有权指挥在中国战区作战的各国军队，而且还应该有权指挥空军运输队。宋子文同时还再次要求让中国参加联合参谋长会议和军火分配委员会。宋子文主要是想控制租借法案物资。只要他能争取到实现中国目的的美援物资，他的影响就会很大，但是史迪威坚持要实施缅甸战役计划，因而就会耗用供应物资，就会威胁到他的地位，所以他必须把史迪威撵走。

宋霭龄和宋美龄两姐妹对宋子文展开的反击反映了宋家内部的激烈争斗——主要是一场争夺权势的斗争。宋子文的最终野心是登上蒋氏宝座来领导中国。宋子文提出了像日本明治天皇为日本作出的抉择——采用现代西方世界的技术适

应自己国家的需要。作为中国未来的明治天皇，宋子文想确立一个权力根基，据以夺取他妹夫的权力，清除反对派，建立一个可以使中国现代化的政府。由于当前环境、困难成山以及对西方的幻灭，蒋介石越来越转而求助于过去，求助于孔夫子的伦理和义和团的精神。但是宫廷内部的对手关心的是地位而不是意识形态。宋霭龄和宋美龄是在为她们的丈夫，也是为她们自己的地位奋争，应付她们的哥哥提出的挑战——这同中国各朝代的历史中统治者家族内部冷酷无情的内讧导致暗杀继承人和毒死侄子的事件如出一辙。

史迪威的地位以及控制租借法案援助的权力曾经有一段时间成了这场斗争的焦点，其原因迄今还不完全清楚。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宋子文估计，只要史迪威一走，他就能对租借法案援助握有更大的控制权；也许宋子文想为蒋介石除去他的祸害史迪威，以此来显示他的影响，并使自己在爬向最高权力的阶梯上更加靠近他的最终目标。宋霭龄和宋美龄两姐妹决心要阻止的正是这种情况。

宋子文是他那个时代最不知难堪不怕疲倦的游说家。他运用了一切可以想象的接近罗斯福总统的渠道，其中包括詹姆斯·罗斯福、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等不计其数的人，这些人被他的令人难忘的说服力所打动，答应把他关于各种形势无可挽救的信件转交给罗斯福总统。由于他不享有英国皇家拥有的特权，宋子文7月份要求白宫让他最优先飞往英国，回来时允许他多带七个人和多带五百磅行李。（这个问题的答复没有记录可查。）9月份，宋子文呈上要求召回史迪威的信件以后，经常想把史迪威调回的罗斯福总统把这个问题交给

马歇尔处理，他给马歇尔写了个便条："亲爱的乔治，是否请你同宋博士谈谈这个问题？罗斯福。"

无论是由白宫、重庆、陈纳德之流还是现在由宋子文一再施展的要求撤换史迪威的诡计，都使马歇尔感到恼怒。马歇尔认为这些人在某种意义上是非难他本人。是他挑选史迪威担任这个职务的，他觉得派遣史迪威执行这个得到很少支持的使命①，浪费了他认为是美国最有能力的战地指挥官的才能，对此他感到自己负有责任。尽管相隔很远，马歇尔还是喜欢史迪威，给史迪威写了一些他很少动笔写的私人信，信中有时还开小小的玩笑，这在他同其他人的通信中是没有的。马歇尔告诉宋子文，他不打算改变指挥结构。宋子文不甘心失败，启程回中国打算用别的办法来达到他的目的。据宋子文对助手说，他已得到罗斯福总统的诺言（总统的诺言很可能是以霍普金斯作出保证的方式许下的），如果委员长正式提出要求，就把史迪威召回美国。

马歇尔和史汀生部长这时认为，把史迪威召回，让他担任一个"不那么难办的任务"（史汀生后来给史迪威去信是这么说的）也许是可取的。马歇尔考虑让史迪威担任第四集团军司令，马歇尔在珍珠港服役期间就属于这个集团军。这个集团军现在驻扎在阿拉斯加，与史迪威自己呆过的第七师在一起，该师将投入马绍尔群岛战役。马歇尔准备牺牲他手下的得力干将萨默维尔，让他去接替史迪威。萨默维尔当时正在去中国的途中，他是奉命去中国解决纠纷的。但是马歇尔的

① 马歇尔在他的第三个隔年一次的报告中说，史迪威的使命是"整个战争中困难最大的使命之一……得到的供应品和支持最少"。

这个打算没有实行，也许是因为中国的问题太难处理。阿萨姆交通线仍然阻塞着，空军运输队因而无法行动，陈纳德给敌人造成的损失不能令人满意。罗斯福现在对陈纳德不感兴趣了，他感兴趣的是在中国部署远程轰炸机，但是就连这个计划也同这个战区的各项工作一样受到拖延和阻碍。罗斯福厌恶地对马歇尔抱怨说，“什么事情好像都不对头。”这句话是人们对中缅印战区的典型怨言。

每次中国人同意加强各个师的人员配备，史迪威总是感到鼓舞。9月1日他接到作为第二批部队在桂林接受训练的三十个师的名单时兴奋地写下了“胜利”二字。他以为这个名单意味着他终于取得了进展，似乎真正想有所行动的宋霭龄和宋美龄也使他感到鼓舞，于是他又一次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整编中国军队的正式的八点计划，末尾史迪威的签名是“委员长的三军参谋长”。为了消除委员长真正担心的事，史迪威竭力表示经过很好地组织和训练的两批（各三十个师）部队会使“中央政府放心，服从它的命令”，并使中国能够在“战争结束时拥有保持稳定的手段”。史迪威没有真正期望收到答复，蒋介石的确也没有给他答复。蒋夫人这个时候告诫史迪威，由于他提出了有关共产党人的建议，他同委员长的关系出了问题。于是史迪威离开一个星期去视察他的部队，并去同刚刚到达印度的蒙巴顿会晤。

为了遵从马歇尔的意见，史迪威打算对人随和些，能使史迪威比较易于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蒙巴顿一人。蒙巴顿的显著魅力预计会为精神不振的中缅印战区带来生气。起鼓舞作用

的是，蒙巴顿选择了一只灰烬中起飞的不死鸟图案作为东南亚部队的徽章，同时作为一个欢乐的开端，他在随行人员中带了一批英国皇家海军女服务队员，甚至说服了马歇尔派遣五十名美国陆军女兵队员，尽管史迪威规定他的战区里不要女兵。蒙巴顿急于求成，但是他在印度遇到的悲观主义和惰性就连最达观的坎戴德也会感到失望。他的新司令部的人员和前线军官都对在缅甸发动进攻信心不足，他们认为预定同Y部队的汇合是史迪威的幻想。即将退休的陆军指挥官欧文将军告诉蒙巴顿，他接手的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司令部，士兵和空军人员的士气非常低落，没有两年时间的休整，无法打仗。由于蒙巴顿的军衔不高，东南亚部队的陆海空三军指挥官（皮尔斯空军中将、萨默维尔海军上将、吉法德陆军上将）都瞧不起他，越过他同伦敦联系。蒙巴顿给史迪威的印象是“好人”，“精力充沛，做事愿意尽力做成”，“是个和蔼的不拘礼节的人”。史迪威对预定担任蒙巴顿的美国参谋长的魏德迈说，“这个家伙还不错。我觉得他还正派，想干一点事情。”但是他又小心叮嘱说，“魏德迈，你要留心他才是。”

虽然史迪威的年龄和军衔都比蒙巴顿高，但是他对于在蒙巴顿手下做事并无怨言。这是他一贯的作风。这种事情他从来不去计较，也许是因为他没有夺取最高指挥权的野心和欲望；甚至在内心深处也没有觉得他该掌握最高指挥权。史迪威采取许多小小的办法不显露自己的身份：经常不佩戴表明他的军衔的奖章或徽章；自己排队买饭或理发；从来不用自己的军衔索取哪怕是通常的权利；在斯利姆将军看来，他在缅甸前线的住处显得“不必要的简陋”。他的一位朋友一次偶然

听说他这位四星上将一次在华盛顿打电话预订火车票时不愿说出自己的名字，只是要了一张上铺票。他就是属于那种虽然知道自己敏快，能力过人，但是为了某种原因却不自以为了不起的一类人，甚至也不以为其他大多数人都不行。这一点就使他的脾气有些古怪。但是，每当他同家里人或他所信任的人在一起，他总是乐观、快活、高兴的。

在拉姆加尔部队准备重新进入缅甸时，又出现了不祥之兆。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要求史迪威把博特纳将军撤换掉，由一名中国指挥官代行他的职务，这又引起了一场新的争吵。博特纳是史迪威成立的先头部队的副指挥。孙立人好几个星期来一直宣称，博特纳低估了日本人在胡康谷地的力量，命令中国巡逻队前进，使中国军队蒙受了一些损失。虽然孙立人是中国军队中比较有进取精神的指挥官之一，但是他也不想让他的部队蒙受损失，他的部队受损失会相应削弱他自己的地位；这次也许是蒋介石不想让部队受损失，在背后要孙立人把现在已是宝贵的拉姆加尔部队保存起来，等战后再使用。无论怎样，蒋介石支持孙立人提出的撤换博特纳的要求。后来的事实证明，博特纳对于日军在胡康谷地的力量的估计是极为错误的，但是史迪威认为孙立人的要求又一次表明中国人不愿参加缅甸攻势。史迪威想让一位会讲中文的军官（博特纳会讲中文）任北部战区部队的司令，他觉得对不起象博特纳这样的军官，因为这些人为了跟随他而放弃了到晋升机会较多的欧洲战区去。史迪威作出了一项后来引起了种种不幸后果的决定，他拒绝撤换博特纳的职务，理由是博特纳的职务包括指挥支援缅甸攻势的美国勤务部队，而且中国军官中没

有一个人适合接替他的职务。孙立人和蒋介石只好默认，当然不会高兴。

由于要回到重庆同各个阴谋集团打交道，史迪威的情绪又低落下来，他憎恨回去向那些人提出请求和没完没了地兜圈子。他在10月15日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如果几个月以后情况还不好转，我就会情不自禁地要求到一个少伤一些脑筋的地方，带一个师，或者一个团，或者一个班也行。”他渴望逃脱出来，去胡康谷地打仗。史迪威向史汀生汇报了中国方面答应使Y部队作好准备的保证全都没有兑现的一系列情况，他最后非常真诚地写道，“我在不耐烦地等待着开始行动，要是能离开这里去同军队呆在一起，参加实地战斗，真是太好了。”

史迪威于10月15日回到重庆，感到自己成了打击的目标。在他到达的几小时以后，委员长本人明确主张召回史迪威的要求使史迪威大吃一惊，理由是史迪威“失去了部队的信任”。委员长的这个要求是通过在他和刚刚抵达重庆的萨默维尔将军谈话时当翻译的宋子文之口说出的。宋子文已向萨默维尔透露过罗斯福总统同意召回史迪威，宋子文路经德里时还告诉蒙巴顿说，史迪威同中国军队的关系搞得很僵，任命史迪威为盟军最高副司令将会引起“灾难性的难以挽回的影响”。孙立人事件提供了一个根据。宋子文是一直和孙立人保持联系的。萨默维尔把委员长提出的要求透露给了史迪威，史迪威觉得这事已成定局：“一年零八个月的斗争就是这个结局。”

史迪威知道，蒋介石产生敌对情绪是对史迪威促使他作战和实行改革感到恼火。史迪威早些时候在总结他遭受挫折的原因时写道，“我向他讲了实话。我让他注意所有的低效率现象。我向他提出了关于他的军队状况的告诫。我向他提出了如何克服这些现象的办法。他对他的军队中的所有这些可悲状况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这种状况是一篇告发他本人、他的军政部和他的总参谋部的极其有力的起诉书。”而这却成了史迪威的罪过，他经常提起国民党政权的无能，这使蒋介石觉得丢了面子，特别是牵涉到他自己治军范畴。史迪威呆在中国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纸“极其有力的起诉书”。

宋霭龄和宋美龄俩姐妹立即展开了反击。接着举行了一些乱哄哄的会议。何应钦为了自身利益，出人意料地支持史迪威的主张。其原因是，何应钦的对手、军队中的少壮派代表陈诚支持宋子文的计划。由于陈诚也是史迪威看中并准备用来取代何应钦的人选，宋子文的计划在这方面成了一个难解的中国之谜。

蒙巴顿在发生危机的那一天也到达重庆，发现人们要把他的副手、最精通同中国关系（虽然感到不愉快）的人从他的身边弄走。蒙巴顿由于刚到新战区任职，需要有人协作。蒙巴顿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这一情况感到吃惊，他立即告诉史迪威，“如果你想保住职务，我去为你争取。”史迪威很清楚其中的原因。“他焦急是因为他将无可奈何地同一个新手共事，故想叫我留下来帮他熟悉工作。”史迪威深信他的使命到此结束，他觉得蒙巴顿大概不能扭转事态，所以在蒙巴顿到达时，他在门口向后退了一下，对蒙巴顿说，“不要让人看见你同我

握手，那对你不利。”但是蒙巴顿信心颇足。他在同委员长会晤前托萨默维尔捎话说，如果把指挥中国军队近两年时间的史迪威撤换掉，他无法实施运用中国军队作战的计划。无论蒋介石怎样希望尽量使他的军队不分担缅甸战役任务，要是正式不让中国军队参战那又将使他丢脸，使他无法忍受。

蒋介石现在受到压力，萨默维尔施展了他全部的圆滑手腕和劝说本领，宋美龄和宋霭龄也提出了各种各样而且显然是有力的论点。到了晚上，他们终于告诉史迪威，只要他去面见蒋介石，说他唯一的目的是为中国好，如果他有错误，那并非有意，只是由于误解，他愿意充分合作，事情就挽回过来了。他们提出的有说服力的论点是，如果把这件事了结，史迪威的地位会比以前更巩固；他“就会走运”。为了避免被免职，史迪威只好心中含愤同意，不这样做是不行的。史迪威“演了那出戏”，发现陷入内部权力斗争（这场斗争由于蒙巴顿的介入而加剧）的委员长“竭力采取调和姿态”。他们终于又和解了，危机在它爆发后不到二十四小时就解决了。显而易见，史迪威的地位得到了加强，即使在委员长的内心并非如此，正如史迪威日记中所写，这个事件无疑是以“小人物极为丢脸的方式结束的”。

蒋介石正式向萨默维尔提出召回史迪威的要求，后来又陷入他不得不后退的境地，这是整个奇怪事件的最奇怪的方面。蒋介石显然是被宋子文说服了，宋子文无法指望蒙巴顿的有利反应和指靠他的两个妹妹施加影响的力量。其结果是，宋子文实际上被迫放弃他原先的主意，离开权力舞台将近一年的时间。对于史迪威来说，这是一次“该诅咒的经历”，使

他回想起来“感到不是味道”，心里留下了痛苦印象。他没有宽容委员长（他只是后来才知道宋子文起了作用），他想到一条明喻是，一条响尾蛇没有发出响声就咬人了。

蒙巴顿现在可以着手公然开展他同委员长夫妇的正式关系了，他送给蒋夫人一只小手提包，上面用钻石镶着她名字的缩写，他向蒋介石介绍自己时称自己是一个来担负指挥重任但年轻而又相当缺乏经验的军官，说他准备“仰仗委员长的丰富经验，给自己帮助和指导”。蒙巴顿报告罗斯福说，他的话“非常受蒋介石的欢迎”。他对蒋夫人采取了类似的办法，同样取得了成功。蒋介石夫妇向蒙巴顿和夫人回送了两枚雕刻精美的中国玉石图章，使他在分别时觉得他交了两位真诚的朋友，“他们很友好，对我讲同样的看法。”现在遗留的“唯一困难”就是到中国的交通线和空运问题，“如果我们能把后勤供应搞好”，对前景是可以有信心的。罗斯福答复说，他对这件事“确实感到激动。两年来，我第一次对中国和缅甸战区的人事问题有了信心，这在很大部分应归功于你的为人”。

蒙巴顿依靠一点圆滑、一点小礼物的契约、一点优雅的品格——终于在重庆确立了和谐的关系。

第十六章　中国在开罗会议的时刻

1943年11月—12月

有一段时间，同重庆好象真的实现了和谐关系。委员长变得出奇地和蔼可亲，在讨论缅甸战役的各次会议上，态度既主动又合作。萨默维尔带着令人鼓舞的消息回到华盛顿，蒙巴顿非常满意地回到印度；而史迪威则认为他是被中国人的彬彬有礼的态度蒙骗住了。史迪威写道："他想他们什么事都愿意干。"中国军政部官员们现在对史迪威本人的要求表示的赞成也是慷慨的甚至是殷勤周到的。宋美龄和宋霭龄保证实施他提出的所有建议，并且向他表示可能让商震取代何应钦，这个可能性令人振奋。"宋美龄现在称呼我乔大叔"——这个战区的人一般都知道他这个名字。("醋性子乔"这个名字主要是报纸上用的。)宋家姐妹希望史迪威能在即将于开罗举行的盟国会议上为中国说话，而开罗会议是中国以正式伙伴身份参加的第一个会议。她们要求史迪威"置中国与其他大国平等的地位"。

这就是蛛丝马迹。中国人认为开罗会议是他们除了获得更明显的收获外还可得到地位的大好机会；他们需要史迪威在会上令人信服地说明中国在打败日本的事业中的军事作用，以突出他们的需要。据宋霭龄说，蒋介石准备持"非常友好"的态度。史迪威11月6日去同蒋介石商谈问题时，他的确

显得很友好。那次会晤是“和解日，是友好聚会！”“这条响尾蛇温存极了。”蒋介石在会晤的一开始就保证满足史迪威长期以来的要求：派五万名补充兵员（但是需要史迪威供应汽油运送这批兵员），同意向这批部队供应粮食，甚至同意给他们一些额外的配额。史迪威还有什么要求吗？没有了？“那么，我正式要求你在开罗会议上替中国讲讲情况。”宋霭龄后来说，蒋介石那天情绪“喜悦非常”，对于同史迪威的谈话“不仅感到高兴而且愉快”，他认为这次“是我们从来没有过的最令人满意的谈话”。

10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在莫斯科召开的外交部长会议上，正式承认中国成为一个大国。这就是蒋介石兴高彩烈的原因。在美国的坚持下，尽管苏联人死命反对，中国还是被列为签署四国宣言的签字国，四国保证战后采取联合行动，建立“一个普遍的国际组织……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因而，蒋介石终于是公认的同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有同等地位的人物了，他这次出席开罗会议就会使人明显看到他的这个地位。他对史迪威表现出谦和，是因为他需要史迪威在联合参谋长会议上为中国担起军事计划和后勤供应的重任——中国高级将领中没有一个人适合担当这个角色。

一个叫做帕特里克·J·赫尔利的少将以罗斯福总统特使的身份于11月7日到达重庆，他后来对史迪威的前途发挥了一点作用。他的任务是完成自7月份以来一直在谈判的为蒋介石作出同其他几位国家元首会晤的安排。由于苏联没有参加对日作战，要安排四强首脑会晤是不可能的。人们所期望的苏联对日开战是关键问题，赫尔利此次使命的部分任务

就是摸清中国对这件事的态度。蒋介石表示愿意同俄国合作。但是出于尊严，他坚持要求罗斯福在同斯大林会晤之前首先会晤他。后来的安排如下：在开罗同蒋介石磋商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前往靠近苏联边界的德黑兰同斯大林会晤。

赫尔利是一位活泼风趣的俄克拉何马州人，这位农村出身的人学过法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海外服役，善于幕后操纵，逐渐上升为胡佛手下的陆军部长。身材细高而英俊的赫尔利留着一撮尖尖的灰胡子，华而不实，但有一副自以为是的神情。包瑞德上校在重庆迎接赫尔利时对他的这副样子说了一句名言（即使有点不很恭敬）："将军，我看你除了谢兹起义① 战斗勋表以外，所有的战斗勋表都有了。"罗斯福挑选赫尔利担任外交使节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位总统任命一个人通常都要达到好几个目标。考虑到第二年要进行大选，罗斯福觉得赫尔利作为一个"驯服的共和党人"可能对他有用。史迪威觉得，赫尔利看来是"一阵新鲜空气，一位真正的美国人"。赫尔利从德里来到重庆以后，对史迪威说，蒙巴顿想把史迪威弄走，因为蒙巴顿在为英帝国的利益着想，他除了想取得"某种可以称做胜利的东西以外"，不想冒任何风险。赫尔利全面赞赏了史迪威的努力，说史迪威在美国被人们认为是"中国的救星"。赫尔利拼命恭维史迪威，"说他站在我（史迪威）的一边。"史迪威承认他喜欢与赫尔利作伴，因为他的"这种态度是非常罕见和极使人意外的"。

这个时候，史迪威对罗斯福总统的做法感到特别恼火，他

① 丹尼尔·谢兹，1786—1787年在马萨诸塞州西部领导一次起义，后称谢兹起义，起因是经济萧条，人民不满。——译注

认为总统放弃了同蒋介石谈妥中国作战事宜的一切机会。史迪威得知罗斯福通知蒋介石在中国部署 B-29 远程轰炸机计划以后写道，“总统又一次削弱了我的地位，所以我无法就那个问题同他们讨价还价。”史迪威 11 月 9 日提到罗斯福时竟然用了“橡胶腿”这个词，讽刺罗斯福软弱，史迪威后来在日记中对罗斯福只用了一两次这个绰号。

第三十八师的一部这个时候已经越过利多公路开到了胡康谷地边缘的信宾扬。史迪威在联合参谋长会议对这次攻势未正式授权、或者未肯定给予支持或声明赞同的情况下，率领不很热情的先头部队打回缅甸。他认为这个行动是对他的盟友们的一种不予理睬态度的催促。一旦缅甸战役打响，这支部队就会得到支持，并会使英国和重庆感到丢脸而不得不参加这个战役。眼下的任务是占领一块地方做简易机场。随后，在空投、车队及搬运工运来的物资的支援下，部队可以在前头掩护，使利多公路向前推进，一直达到塔隆河，预定于 12 月 1 日开始的主攻就是从这里为起点。这次进攻的整个计划需要分三个阶段挺进：从胡康谷地经孟拱谷地到密支那，需要由英国军队在南边从英帕尔越过钦敦江到英都的配合行动，但是英军的行动仍然未定下来。这支部队公开向胡康谷地运动，是因为北部战区司令部的情报机构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部队在第一阶段行军途中，除了会遇到小股缅甸新兵以外，不会有敌人阻拦。而实际上，在新加坡作战过的日军丛林部队已经越过塔隆河建起了桥头堡，为他们向印度发动进攻作准备。

在重庆，委员长保证派遣的五万补充兵员后来在何应钦

同史迪威的会商中改为二万五千名老兵和二万五千名新兵。“我们谈着谈着，二万五千人又变成了二万人，后来我问道派去的是什么部队，什么时候可以到达，二万人又变成了十八个营，按满员计算也不过是一万四千人。”就连史迪威有时候称为“天才”并寄于希望的陈诚，现在也同宋子文一起打退堂鼓了，并坚决辞去了Y部队司令的职务。陈诚的职务由第一战区司令，被称为“常胜卫”的卫立煌接任。史迪威在他担任驻华使馆武官的记载中就把卫立煌列为中国最有能力的战区司令之一。卫立煌一贯以有干劲著称，但是现在史迪威不知道他究竟怎样。要越过萨尔温江进入缅甸，“Y部队就需要一个有劲头的推动者，我怀疑此人是否是这样的推动者”。

在史迪威前往开罗参加会议的前夕，多恩报告说，组建三十个有战斗力的师的希望是渺茫的。到处都碰到困难，根本找不到负责机构打交道。多恩认为，中国军队的状况只会跟它的政府一样糟，他用失望的语气写道，“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除掉整个中国政府，重新开始。”否则，假如仍然打算利用Y部队，唯一的选择就是由美国绝对控制这支部队的全部训练、指挥和部署大权，而不必征求重庆的意见，“只是把情况告知它一下”。这个意见与史迪威自己计划里的结论非常一致。史迪威在计划中要亲自担任具有绝对权威的“战地参谋长”职务。多恩的建议是他同一些“认真思考问题”的中国军官商讨之后提出来的。这些中国军官对于局势的发展趋势感到担忧，认为不在最高层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改革”，想对军队实行一次有效的整编是不可能的。他们说，在重庆以外的地方，委员长的控制力很弱，云南几乎是独立的，贵州半年来一直在谋

反，四川有出事之虞，政府军同地方军打了三天以后，最后政府答应免税才算了结。在他们看来，中央政府“在战争结束之后不要半年就会被推翻”。

11 月 13 日，坐在这层薄冰上的统治者蒋介石接受了史迪威为中国起草的要在开罗会议上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蒋介石打算如何行事，第二部分论述蒋介石希望盟国采取什么行动。蒋介石在第一部分保证贯彻一项计划，使九十个师具有作战能力。训练工作共分三批进行，每批三十个师。第一批三十个师准备于 1944 年 1 月 1 日整训就绪以便投入战斗，第二批三十个师待打通起至印度利多公路后予以重新装备，于 1944 年 8 月作好战斗准备，第三批三十个师于 1945 年 1 月作好战斗准备。史迪威拟定的文件还进一步保证中国“按照一致商定的计划参加收复缅甸的战役”，从利多和云南同时发动进攻。缅甸打通以后，“将采取行动来夺取广州—香港地区，并从海上打通一条交通线”。委员长列举的希望是，盟国在 1944 年初作出“全面”努力，使用陆海空三军从缅甸重新打通去中国的交通线；由美国装备他的九十个师；保证给第十四航空队、中国空军部队和空军运输队每个月运输一万吨物资；将来远程轰炸机驻到中国基地采取行动；最后一项是史迪威梦寐以求的，即拿下广州以后，派一支由十个步兵师和三个装甲师组成的美国军队在中国登陆，前往华中和华北作战，由美国人任中美联合部队在上述地区的作战指挥。

这项计划所谈的是最高目标。史迪威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这个计划能实现是很难说的，尽管他知道中国的军事行动在

人力物力、政治、哲理方面都受到限制。当然啦，他认为自己是中美陆军联合部队的司令。虽然他对蒋介石的意图很怀疑，但是他相信自己的地位加强了，因此要达到上述目标看来并非不可能。他用历来深信不疑的“胜利”一词来表示他对委员长明确表示接受将来由一位美国人任司令的欢快心情。

史迪威和小人物在关系“亲热非凡”的时候，各自去开罗赴会。

开罗会议在位于沙漠边缘、可以眺望金字塔的漂亮的总统饭店里举行。用一位令人敬畏的会议参加者① 的话来说，这次会议是规模最大的聚会，“所有出名的英国军官和美国军官都出席了”，更有美国总统、英国首相，还有霍普金斯、安东尼·艾登和诸大使及文职顾问参加。史迪威记录了会议人员“争抢盥洗室”的情况。亚洲战场的战略目的将决定要在中国下多大的功本，以使中国和太平洋一道成为进攻日本的跳板。蒋介石和史迪威在表面上的和解使美国人又有了使用中国军队的想法，只要供应能够跟得上，受过正规训练和指挥得当的中国军队是可以使用的。在马歇尔和他的参谋人员们看来，蒋介石突然表现出来的合作态度表明他终于愿意参加打击日本的行动了。

在这个时候，有一种意见倾向于在太平洋进击，这派意见现在对中国的能力持怀疑态度，认为依靠中国只是一种主观愿望。中国仍然是B-29飞机必需的基地，中国在人力方面虽然据认为是有利条件，但是由于动用人力需要花费很大力气

① 即英国后来的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

克服很多麻烦，因而显得价值不大了。岛屿和现在越来越容易得到的航空母舰可以取代中国大陆的作用，可以缩短和加快战役的进程。据认为太平洋战略是最终包括使用俄国的空军基地，同时俄国在满洲发动一次地面攻势。

开罗会议也有一个政治目的。罗斯福决心要使会议从中国人的观点看来是个成功。他想利用这次会议作为基础，解决中苏关系以及很可能打乱战后秩序的国共磨擦。罗斯福的心中在考虑着殖民地的前途，重新划分日本占领的地方的问题提上了会议日程。虽然罗斯福的强烈的反殖民主义思想在丘吉尔那里碰了壁，但他仍然期待着同蒋介石和斯大林举行会晤，他相信，通过个人之间的友善情谊可以使有关问题得到解决。罗斯福认为，莫斯科四国宣言确认几亿中国人战后属于盟国一边，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罗斯福认为，当前在中国的任务简而言之是这样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使中国牵制住日本军队。"罗斯福在德黑兰告诉斯大林，这是"我们的一大目标"。由于长期担心中国崩溃，因而看不清下面的事实：自身的利益使中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参加对日作战。根据莫斯科会议建议，中国只要收复日本占领的满洲、福摩萨等地，如果它站在正在取胜的盟国一边的话。

罗斯福对蒋介石的信心大不如以前了。罗斯福向萨姆纳·韦尔斯抱怨说，他一年来在同蒋介石打交道的过程中遇到了"无数困难"，他现在对蒋介石的看法比较接近史迪威的看法而不再接近陈纳德的看法，他认为蒋介石是"非常神经质的"。他激愤地谈到蒋政权的"腐败无能"，说他厌恶蒋政权

“对中国人民大众的苦难无动于衷的态度”。然而，不管委员长的军事视野多么“有限”，“他的军队的作战情况多么糟”——这是罗斯福新近承认的一个情况——他仍然是战后唯一能使中国人民保持团结的人。罗斯福对他的儿子说，“尽管蒋氏夫妇的缺点很多，我们还是得依靠他们。”

史迪威在约翰·戴维斯和梅里尔上校的陪同下，于 11 月 20 日抵达开罗。那天，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开罗以东七千英里处的吉尔伯特群岛登陆，这一步的最终效果是打消对中国的依赖。如果人们能有先见之明，开罗会议上的讨论就会短一些，当然也会简单一些；实际上，与会人员按计划根据已知情况开会。每个人都不隐瞒好奇心想看看蒋介石。由于安全原因，蒋介石抵达开罗机场的时间事先没有宣布，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没有去迎接他，这却挫伤了委员长的自尊心。

罗斯福认为蒋介石是他见过的“第一个地道的东方人”，不同于他认识的那些在西方受过教育的东方人。自始至终持不友好态度的艾伦·布鲁克爵士认为蒋介石“精明狡猾的脸”象鼬子，是一位“对战争的较大方面并不通晓但却决心在讨价还价中捞到最大好处”的人。丘吉尔对蒋介石“镇静、缄默和胜任的风格”有深刻印象，但是又对美国人对中国问题过份的注意感到恼火。罗斯福“很快就同委员长举行了长时间的密谈”，坚持要让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的开幕式，因而阻碍了英美两国在开幕前的磋商。结果，在丘吉尔看来是“冗长、复杂而细小的中国事务……在开罗会议上不是居于末位，而是居于首位了”。

中国的目的是，只要有机会就要求获得武器和收回它以

前的领土，包括取得日本东面的小笠原群岛。中国提出的把满洲和福摩萨归还中国的要求已得到了盟国的同意，这一要求写进了尚未发表的开罗宣言中，这个宣言要等到同斯大林磋商后才能定稿。罗斯福同委员长夫妇会谈当中谈到了一些更微妙的问题，如大连及俄国的其它租借地问题；香港以及同英国的关系；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这些会谈都没有作记录。自从国共两党9月间有发生冲突的危险迹象以来，美国顾问们急欲使中国避免内战。有些人认为，美国给中国的进一步援助应当以解决中国国内问题为条件，他们寄以希望的理论是，暂时弥合分裂的办法可以设法使两个势不两立的对手结成有成效的联盟。

开罗会议用了三天时间讨论军事问题，缅甸攻势的命运在会议结束时比会议开始时显得更加不妙了。东南亚司令部为蒋介石坚持要求采取的海军和两栖作战行动（因为他认为这种作战行动会使日本人转移注意力，无法对地面攻势作出重大反应）制订的作战计划规定要夺取缅甸沿海的安达曼群岛。这个计划的密码代号为“海盗”行动计划。地面攻击计划要求英国军队在钦敦江上建立一个桥头堡，派空降部队占领通往密支那的铁路线上的英都，除此之外没有进一步确定具体目标。计划动用大批部队和登陆艇来保证这场战争的胜利，蒙巴顿认为这是个必需的条件。

史迪威认为这两个行动都是“流产的”计划。参加两个行动的部队不曾向任何地方进发或取得任何成果，他们只是显示一下活动，满足蒋介石提出的海军行动的要求，并在某种程度上牵制了敌人。蒋介石并不知道孟加拉湾战役的实际目

标，只知道有一个战役。除了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以外，“海盗”行动计划的主要缺点是英国三军首脑，特别是丘吉尔不愿采取这一行动，原因同在欧洲第二条战线问题上的争端有关系。丘吉尔不愿采取跨越英吉利海峡的“霸王”行动计划，他愿意实施经地中海夺取欧洲下腹部地区的外围进攻计划。丘吉尔要求把“海盗”行动计划中需要的登陆艇用于进攻希腊的罗得岛，其目的是把土耳其拖入战争。丘吉尔总是随时能够提出避免采取他不喜欢的行动的代替办法。马歇尔强烈反对丘吉尔的罗得岛进攻计划，那将“完全毁掉我们的后勤供应工作”，并会分散力量，削弱美国人一心要求采取的“霸王”行动计划。美国三军首脑们决心执行“海盗”行动计划，为的是实现对蒋介石的许诺，从而使中国军队从云南进入缅甸，没有这支军队，史迪威就无法从后面打通去中国的道路。马歇尔和金海军上将对于蒋介石赞同史迪威的计划深为满意；他们认为这表明蒋介石的态度有了转变，决不应当使他扫兴。

马歇尔的主张被中国人的所作所为挫伤了。蒋介石贪得无厌，反复无常，尽管蒋夫人作了工作。蒋夫人不相信官方的翻译转达了“委员长希望表达的全部意思”，她把蒋介石所说的每句话以及别人同蒋介石说的每句话都重新作了翻译。蒋介石坚持说，在缅甸战役的同时，喜马拉雅航线的物资运输量必须保持在每个月一万吨，他不管后勤需要发生的冲突，坚持要增加运输机来保证做到这一点。马歇尔认为已拨用于喜马拉雅航线的运输机的数目很多，对于欧洲战场的军事行动起了有害影响，他愤怒地提醒委员长，这些都是美国的飞机、人员和物资，如果中国需要更多的物资，它就应该打通陆上通

道，美国无法再增加运输量："在这一点上不要有任何误解。"

在 11 月 23 日的会议上，史迪威预定要代表中国提出方案，他接到蒋介石的一封来信，叫史迪威不要代表中国提出方案，由蒋介石亲自与会。后来又陆续收到委员长的几次来信，一会说不来，一会又说来。在这同时，由艾伦·布鲁克爵士主持的英美两国讨论缅甸战役的会议发生了激烈争吵。"布鲁克出言不逊，金上将火冒三丈。金几乎跳到桌子上揍布鲁克。天哪，他气得发疯，我真希望金上将痛揍布鲁克一顿。"

那天下午，蒋介石带着他的几位将领来参加会议。"他们的表现真糟糕透了，什么问题也提不出来。布鲁克对他们挖苦凌辱。我帮助他们给解了围。"英国人在三国元首在场的情况下，询问中国人关于云南军队的情况，他们答不出来，史迪威代他们回答了。蒋夫人是出席会议的唯一女性，别人都着军服，她身穿印着金色菊花的黑缎旗袍，头上戴着用黑丝线扎的蝴蝶结，脚穿一双露出足趾的高跟鞋，行动时故作文雅姿态，开边旗袍两侧露出匀称的腿部，她竭力以这些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具有典型英国人作风的布鲁克认为对外国人应予以冷落，如果这个外国人又是非白人，那就应该踩他一脚。布鲁克进一步逼难堪的中国人，他要中国人谈谈他们对早先给他们审阅的作战计划有何看法。据他说，接着是一阵"死一般的沉默"，后来中国人"凑在一起小声地议论着"，然后其中一个人说："我们希望听听你们的高见"。由于中国人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况且又是在语言不通的国度里举行，出席会议的大都是军界大人物，因此这次会议是他们很难露一手的场合。

在这次令人不快的会议结束以后，布鲁克用嘲笑的口吻

对马歇尔说，“纯粹是浪费时间”，后来又说，“只是由于马歇尔和美国的观点，我们才不幸遇上这种令人扫兴的事情。”

史迪威那天晚上整晚帮助中国人拟订了第二天在会议上提出的问题，并向蒋夫人谈了情况，使她出席马歇尔邀请她参加的午餐会议。史迪威写了一些提要交给蒋夫人，供她在讨论派美国军队到中国的问题时参考。在次日下午的会议开始以前，委员长在出席会议的问题上又改变了两次主意，他后来还是出席了会议，但是要求史迪威代表他发言。可以理解，蒋介石对于东南亚司令部的作战计划的短期目标不满意，他对于依据这个计划投入Y部队的问题踌躇不决，同时他却坚持要空军运输队增加运输量。

在陷入这种僵局的情况下，罗斯福派蒙巴顿这个有魅力的人设法向蒋介石说明现实情况，争取他答应派中国军队越过萨尔温江；史迪威写道，“把我换下来，让别人设法去敲定问题，值得欢迎。”蒋夫人做翻译，蒙巴顿竭力向蒋介石说明，要想增加飞机是根本不可能的。蒋介石却一味坚持要五百三十五架运输机。蒋介石对蒙巴顿说，“罗斯福总统决不会拒绝我的要求，我要什么他就会给什么。”蒙巴顿作最后努力对他说：即使能够搞到那么多飞机，既想满足委员长提出的喜马拉雅航线的运输量，同时又发动他要求在雨季以前向曼德勒进行空降袭击，是无法办到的。这时候，蒋介石夫妇进行了很长的交谈，直到蒙巴顿不耐烦地瞪眼询问，蒋夫人才转过脸来对他说，“不管你信不信，他不懂得雨季的事。”

这是个启发人的证据，它说明了史迪威同委员长交往中某些困难的所在。雨季是东南亚重要的现实生活和战争条

件。但是蒋介石是这个中央王国和中央王国中人民的统治者。中国没有雨季，所以，他也就丝毫不懂什么是雨季。

11月25日感恩节的下午，史迪威由马歇尔陪同，前去会见罗斯福，向他提出关于派遣美军去中国以及在中国建立一个美军司令部的问题。史迪威心中想的第一个问题是“战地参谋长”的职务，这个职务成了后来发生危机的根源。这个想法最先出现在史迪威的笔记中，他在笔记中写着“问罗斯福”的标题下记着他要同罗斯福交谈的问题概要。他列举了战地参谋长职务的五个方面：兵力、执行权、美国部队、中美联合部队、保留对中国驻印部队和另外一个军的指挥权。史迪威在笔记中写道，“不论小人物答应什么，如果中国最高指挥权的问题不解决，就是白费劲。”史迪威打算告诉罗斯福，需要任命一位新军政部长来替换何应钦，或者“彻底改组”军政部，或者象多恩上次提出的建议那样，由“美国人完全接管并指挥中国第一批三十个师”。史迪威在这行字下面加了着重号。

史迪威这一次真正努力阐述了他认为的局势的各个方面的需要。他觉得总统对他所谈的意见“不怎么经心”。罗斯福打断史迪威的话，谈起安达曼群岛。他在回答史迪威提出的派遣美军到中国去的问题时，表示愿向重庆派一个旅的海军陆战队。他说，因为“海军陆战队闻名天下。海军陆战队到过整个中国。到过北京、上海等各个地方。陆军只到过天津”。这种明显的离题千里不着边际的看法，几乎同蒋介石不知道什么叫雨季一样，这证明在同国家元首们沟通思想时可能特别难办。也许这是罗斯福总统拒绝派部队到中国去的一种婉转的方式。但是，罗斯福确实同意装备中国的九十个师，虽然没

有确定期限。这于其说是罗斯福对改革中国军队抱有信心，倒不如说他想给蒋介石一些东西，以表明他不虚此行。史迪威认为这是开罗会议上作出的"确切"保证之一。中国人虽然从来没有提供九十个满员师，但是作为一个保证，他们后来努力了几年。

罗斯福对于未来确实持有积极的看法。史迪威记录了罗斯福战后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计划：三个专员，英国人、中国人、美国人；"决不再归法国！"至于对他本人的建议，史迪威在他的笔记本上记载建议的地方用笔重重地划了一道线，写道"当心，罗斯福不感兴趣。"

罗斯福在谈话中说，委员长在同他单独会晤后现在接受了东南亚司令部制订的缅甸作战计划，并同意派遣Y部队参战。那天晚上九点钟，史迪威接到霍普金斯的电话，要他赶回住处，到那里后史迪威听说蒋介石两个小时前撤销了他的许诺，"我的上帝，他又不认账了。"

第二天上午，蒙巴顿、史迪威、萨默维尔、阿诺德、惠勒、斯特拉特迈耶（中缅印战区新任空军司令）、陈纳德等诸将领前去拜访委员长。"约翰·刘吓得脸色铁青，因为我们迟了三分钟。商震的眼睛瞟着门外，脸色灰白，双腿发抖。这些人的日子好不难过呀！整天吓得呆头呆脑。"蒋介石又坚持一个月要空运一万吨物资，但是在众位来客的说服下，又答应参加缅甸战役——至少客人们是这么想的。蒋介石第二天在启程返回中国之前又推翻了自己的保证，他叫史迪威留下来表示反对，坚持要对曼德勒进行空降袭击以及每月空运一万吨物资。这个时候，罗斯福、丘吉尔以及欧洲战区的人员已经去德黑兰，

史迪威留下来等待他们返回开罗再作最后的定论。“我们现在处境怎样？”史迪威感到迷惑，结论是，由于由一帮人指挥战争，执行人就处在既为难又危险的地位了。“路易斯·蒙巴顿对小人物已经厌烦了”，史迪威写道，“谁又能不这样呢？”

史迪威的上述结论是正确的，蒙巴顿的日记证实了史迪威的看法。蒙巴顿在日记中写道，开罗会议是罗斯福、丘吉尔和联合参谋长会议成员第一次同蒋介石谈判，“他们被逼到了完全发疯的地步”。蒋介石也有理由发疯，因为事实上，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希望他参加的战役问题上从来没有作出一个肯定的决定或者达成一个可靠的协议。蒋介石一直坚持说，如果不进行一次重要的两栖作战使英国人投进去的话，他决不把中国军队重新开进缅甸。根据昔日的经验，中国人不怎么能相信西方国家的话。蒋介石是有理由持怀疑态度的，因为事实上，丘吉尔认为罗斯福总统是不顾他的反对答应在孟加拉湾进行一次两栖作战的，丘吉尔在他自己的记录中认为他并没有承担什么义务。

马歇尔在开罗同史迪威私下交谈中告诉史迪威，9月间他曾打算问史迪威愿不愿调离中国到第四集团军任职。马歇尔问史迪威，如果把他调离中国，他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史迪威只是回答说“我只得服从。”史迪威接受了人们对他的批评，因为他在司令部里谈到委员长时使用了一些伤人感情的言词。他手下的参谋人员听到这些言词以后，把这些话传播到中国各地。史迪威保证不再说这类话，但是马歇尔后来说，两个星期以后，史迪威又故态复萌了。

德黑兰会议期间，史迪威在埃及一股劲地观光游览。他乘飞机到了耶路撒冷，还沿着尼罗河到了埃及古城底比斯的遗址卢克苏尔，参观了拉穆赛斯王朝① 图坦卡蒙② 等法老的陵墓和卡尔纳克神庙，他对所看到的一切极感兴趣，他的观光感想比他在开罗会议上的笔记还多。他给妻子写信说，“我是个古迹迷，这里恰恰是多古迹的地方。我可以在这里一连呆上几个月……如果不是这次愚蠢的会议在这里举行，我可能一辈子也没有机会看到这些古迹”——权衡起来，他如此看待此行并不是毫无道理的。

德黑兰会议上有两件事使开罗会议的结果具体化了。这两件事就是斯大林坚持尽快实施“霸王”行动计划还加上“铁砧”行动(在法国南部的协同登陆)计划，并重申了他10月份在莫斯科对哈里曼和赫尔说过的话，即在打败德国以后俄国立即参加对日作战。尽管丘吉尔在会上力争要进攻罗得岛和土耳其，但是美国和俄国的支持使“霸王”行动计划获得了通过③。这立即给丘吉尔找到了借口，要求取消“海盗”行动计划，把英国登陆艇用于法国南部。丘吉尔坚决拒绝执行上述两件事，尤其是因为他认为，既然俄国许诺要参加对日作战，也没有必要花主要力量来支持中国。“海盗”行动计划将是白费劲，他坚持认为，俄国参战的前景改变了一切。

---

① 拉穆赛斯王朝，公元前1500至1000年。——译注

② 图坦卡蒙，古埃及拉穆赛斯王朝的一位法老，在位时间公元前1358—1350年。其陵墓于1923年11月4日被完整发现，1924年开放。——译注

③ 史迪威对德黑兰会议的简要概括是：“丘吉尔想从外围突破并占领罗得岛，但是斯大林说不行，所以‘霸王’行动计划被采纳了。只要打败希特勒，斯大林马上就对日作战。”

罗斯福同样很重视俄国的许诺，虽然他在开罗会议以前就知道俄国的这个许诺，但是这次由斯大林亲自在最高级会议上加以重申就增加了保证的份量。由于同斯大林的会晤是在美国同中国人打交道遇到困难的时候举行的，这次会晤就提出了苏联代替中国成为美国战时或战后伙伴的可能性。罗斯福刚刚对蒋介石感到失望，他现在更加急切地想让斯大林成为他战后蓝图中的第四块坚固的基石。罗斯福曾经对布利特大使说，“我觉得如果我尽可能地给他(斯大林)一切东西而不要任何回报，他作为要人理应行为高尚，肯定不会吞并任何地方，肯定会同我一道为实现一个民主与和平的世界而努力。”罗斯福相信，通过在“霸王”行动计划这样的问题上同斯大林进行全面的友善的合作，通过满足他提出的诸如使用象大连这样的不冻港的合理要求，他就可以使苏联全心全意地加入计划建立的联合国组织。通过一次历史性会晤的融洽气氛，罗斯福得出了结论，认为斯大林是“可以接近的”人，可以把他拉入战后为共同目标进行的合作中。罗斯福 11 月 30 日在丘吉尔寿辰的宴会上答谢说，“我们已经在这里在德黑兰证明，我们各个国家虽有各不相同的理想，但可以形成一个和睦的整体。”在这种存在于想象中的和睦整体里，中国的问题开始显得不那么迫切了。

斯大林漫不经心地使这个和睦整体日益衰颓。罗斯福把缅甸攻势计划以及云南部队的作用告诉斯大林以后，斯大林说，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低弱是由于“领导不行”。斯大林对于拟议中的关于归还中国领土以及将来让朝鲜独立的宣言没有表示异议，只是说“必须使中国人打仗，迄今他们并没有

打仗”。

12月1日，由英国、中国、美国签署的开罗宣言公开发表，这标志着国际上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完成了罗斯福的政策目标，而罗斯福这时已开始产生一些怀疑。宣言保证把“日本侵占的所有中国领土”归还中国，并规定各签字国必须战斗，一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现在正式排除了中国同日本单独媾和的可能性——这也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因而它扬言要退出战争的威胁也没有什么作用了。但是通常要经过一段时间，事件的角色们才能认识到他们自己促成的变化。除了那些已经了解中国的这个唯一的讹诈手段的人以外，许多人对于中国的这种讹诈手段毫不可怕这一点还不是很快就能认识清楚的。

罗斯福等人再到开罗以后，“海盗”行动计划成了一场激烈斗争的核心。美国三军参谋长们坚决反对废除这个计划，他们否认该计划分散了执行“霸王”行动计划的精力，否认“铁砧”行动计划需要用“海盗”行动计划中的登陆艇。他们坚持说，如果不执行“海盗”行动计划，委员长就有理由扣住Y部队不放，因而就会使缅甸战役计划无法实施。马歇尔和金上将担心，如果不发动缅甸战役，日本就能更顽强地抵抗太平洋上的进攻。李海上将仍然担心“蒋介石可能退出战争”。罗斯福说，他向蒋介石承担了道义上的责任，蒋介石是带着一个明确的谅解从开罗回国的：盟国将发动一次两栖战役，尽管他自己没有做任何保证。丘吉尔仍然持坚决拒绝的态度。丘吉尔提出的“海盗”行动计划所需的人力物力可以在别处发挥更大作用的论点由于蒙巴顿的要求而更加有份量了。蒙巴顿提出，要

执行“海盗”行动计划需要五万人部队，这个数字超过了实际需要。在向东南亚司令部问及各个选择方案时，东南亚司令部本部人员重申，没有云南部队参加，连接中国的陆上通路就无法打通。这场激烈争吵持续了三天。据李海上将说，无论在这以前或以后的会议上，英国人都没有如此“坚决地反对”过美国的建议。

这时又发生了一个冷酷的事件，帮了英国人的忙。博特纳将军拍来一份电报，说中国第三十八师的前沿部队行进到胡康谷地时出乎意料地遇到了日军的狙击，他们掘壕据守，屡次违抗命令，拒不前进。这份拍给史迪威的电报被错交给了在东南亚司令部任职的魏德迈，他就把这个消息捅给了他的英国同事们。英国人如获至宝，从史迪威自己的司令部得到了一个证据，证明中国不愿打仗。不到几小时，这个消息就在全体会议人员中间传开了，英国人想以此证明史迪威建议同Y部队会师是想入非非。胡康谷地发生的事实真相是，博特纳根据他的老经验，把中国人得到的情报打了百分之二十的折扣，拒绝了中国军官提出的派遣炮兵的要求，也没有亲临前线弄清情况。

12月5日，罗斯福在给丘吉尔的短信中作了让步：“取消‘海盗’行动计划。”为时两个星期的开罗—德黑兰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在这两个星期里，中国居于次要地位了。开始的时候，罗斯福决心要利用会议机会为中国人取得成功；但是到了结束的时候，罗斯福为了取悦于斯大林而牺牲了蒋介石。他在舞会上找到了一个新舞伴。他给丘吉尔的短信标志着他同中国关系中的一个转折点，虽然人们当时还没有承认这一点。

罗斯福总统并没有意识到他做了任何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他也没有这样做的习惯。总的来说，他知道应该遵循的方向，但是路途中的决定却是根据经验作出的。罗斯福的朋友艾夫里尔·哈里曼说，他在某个既定日期同敌人作战的方法就是“当天早上权衡桌上的报告”。在必须作出选择的时候，罗斯福所作的选择同一开始就赞成把欧洲放在首要位置的选择是一致的。从战略方面来看，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海盗”行动计划基本上只是一种姿态。

开罗会议取得的结果并不是原来想取得的那种结果。中国刚刚被承认是一个强国，对蒋介石的诺言就撕毁了，好象他就是摩洛哥的苏丹一样。双方接触的结果是，中国对西方的不信任加深了，西方对蒋介石的信任也一落千丈。

罗斯福打电报把计划的变更情况通知了蒋介石，电报问蒋介石，在不采取两栖行动的情况下，他是否愿意打北缅战役，或者再等待一年，等到盟国明年雨季发动一场大规模登陆作战时再打，而在这期间盟国将使喜马拉雅航线保持最高运输量。虽然史迪威没有义务传递这个消息，但是罗斯福和马歇尔认识到，这一形势又使史迪威成了仇人。史迪威要是空手返回重庆很可能使他处境艰难。马歇尔提出把史迪威调往另一个战区，让他指挥美国部队，使他有机会发挥才能。史迪威谢绝了马歇尔的搭救。他从来没有过多地考虑“海盗”行动计划，取消这个计划除了可能影响Y部队以外，并没有使他感到不安。蒋介石的不情愿态度非常坚决，任何进一步的解释都无法大大改变形势。此外，史迪威认为，到时候，中国人不得不参加战斗来打通他们自己的交通线。虽然史迪威从来没

有在笔记中记载下来，但是可能从他撤出缅甸之时起，任何事情也没有动摇过他打回缅甸的决心。

史迪威在离开开罗之前，想从罗斯福那里知道，取消“海盗”行动计划的决定是否反映出政策的改变，他在新形势下应当如何同委员长打交道。在戴维斯的陪同下，史迪威到罗斯福的住处又同罗斯福和霍普金斯进行了一次交谈。史迪威关于这次交谈的记录——只记下交谈的内容而没有评论——同现存的任何文件一样，生动地体现出罗斯福谈话的情景。

“嗯，乔，你对这个坏消息有什么看法？”这是罗斯福总统开始说的第一句话。接着他谈到了美国同中国的友谊、传教士、德拉诺家族在广州的情况、抑制中国通货膨胀的计划、使香港成为自由港的计划（“但是我们首先得升起中国旗帜，然后蒋介石第二天就会作出重大姿态，宣布香港为自由港。这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办法！大连问题也采取同样的办法！”）、为印度支那和朝鲜制订一个二十五年左右的托管计划（“……直到我们使他们能自立时为止，就象菲律宾那样。我曾经直截了当地问蒋介石，他是否想要印度支那，他说‘丝毫不想！’——正象那样——‘丝毫不想！’”），还谈了其他许多问题。后来还用了很长时间谈了同孔祥熙就美国为中国发展运输业提供五千万美元贷款问题的商谈情况。尽管史迪威和戴维斯几次试图想把话题从贷款问题转到当时的政策上来，但是他们实际上无法把话题引过来。

罗斯福总统暗示他心中有些新疑问。他问史迪威，“你认为蒋介石能支撑多久？”史迪威回答说，中国的局势是严重的，如果日军再来一次象去年夏天那样的攻势，蒋介石就会垮台。

罗斯福问，“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寻找另外某个人或几个人来支撑局面。”史迪威表示，这样的人选“很可能都要指靠我们”，这个问题到此没有再谈下去。史迪威离开时仍然坚持他的看法：“这个人（蒋介石）是个浮躁的笨蛋……毫无希望。”罗斯福和史迪威两人都急欲搞好同中国的关系，但是两人的意见竟然各不相同，两人之间没有丝毫的互相谅解，这真是历史的无情捉弄。不过，霍普金斯想了个法子来弥合两人在了解情况方面的差距，他提出今后要阅读戴维斯发回的报告，后来他还经常把有关报告转给罗斯福总统阅读。

蒋介石带着他引以为自豪的大国地位证书从开罗回国。他逢人便说他得到了盟国在孟加拉湾采取军事行动的保证。但是他刚刚回到国内，取消孟加拉湾军事行动的电报就跟着拍来了。他立即以抬高要价的方式来对他遭到的耻辱进行报复。蒋介石要求美国给中国十亿美元的贷款，理由是他动员全国人民继续抵抗日本的任务现在变得“肯定困难多了”，中国军事和经济上的软弱地位使它“无法”坚持六个月，更谈不上坚持一年，而中国战区的崩溃将会给“全球战局造成严重的后果”。他还要求至少把第十四航空队和中国空军的飞机数目增加一倍，为了使空军展开有效行动，蒋介石要求把喜马拉雅航线的空运量增加到每月二万吨。

史迪威回到重庆以后的最初想法是劝说蒋夫人反对搞讹诈。史迪威告诫说，“我们的人听烦了。”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谁能说服蒋介石。蒋介石召见高思大使，向他说明支持中国货币是何等紧迫，而蒋夫人则大谈特谈为了维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力量花费了多少多少钱。高思是很不容易被说服的

人，所以委员长很长时间来就象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一样也希望美国召回高思。高思向华盛顿建议说，由于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形势“恶化得非常快”，给中国提供贷款也无济于事，为了防止中国崩溃，“必须尽早采取军事措施，收复缅甸，重新打通连接中国的陆上运输线。”

蒋介石这种实际上是为继续参战索取金钱的做法使华盛顿对中国更加失望。摩根索也以同高思一样的理由反对向中国提供贷款。他对罗斯福总统说，中国无法运用这笔贷款，用它来控制通货膨胀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中国人已经使得美国1942年给他们提供的那笔贷款成了一次大失败；而且中国人在美国仍然有四亿六千万美元没有动用。中国人拒绝实行比较现实的兑换率，坚持保持二十元兑换一美元的人为的高兑换率（这个兑换率是实际兑换率的六倍，到1943年11月，实际兑换率已达一百二十元兑换一美元）。这种做法使得同中国有来往的所有政府和私人机构越来越不满。据高思报告，中国官员利用这个形势从“我们花费在战争上的钱财中捞取了大量美元”。美国财政部获悉，中国政府有一笔八十六万七千美元的资金已经转到了蒋夫人的姨侄小孔以及蒋夫人的另一个党羽吴博士的帐下。

摩根索财长在一份说明“事实真相”的备忘录中建议美国政府拒绝向蒋介石提供十亿美元贷款，他提出了详细理由，说明中国需要的是食品、货物、机器和大量武器，其需要量很大，就看陆路或海上运输能力如何了。他提出为了重新打通陆上和海上的运输渠道，中国自己应当分担作战任务。使他感到意外也使赫尔国务卿感到苦恼的是，罗斯福总统建议把这份

备忘录原原本本地转交给蒋介石，总统也的确这样做了，只是在备忘录中加了一些保证有诚意的话来安抚蒋介石。

在重庆，史迪威竭力想诱导蒋介石参加缅甸战役，尽管盟国已违背自己的保证。经过两次长时间的会晤，蒋介石仍然坚持驻扎在缅甸的日军是八个师团，不是五个师团；说东南亚司令部的作战计划不足以解决问题；还说尽管盟国军队加强了力量并有空军掩护，但是获胜的机会比 1942 年还小；他说最好还是采取守势，让日本人发动进攻；他绝不能冒着被日本打败的风险，因为吃败仗将会给中国人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史迪威驳回了蒋介石的所有论点，但是没有什么作用。“他完全是疯了……即使被切断援助也在所不惜——仍然不愿冒打败仗的风险。”宋美龄和宋霭龄也象疯了似的，怕得睡不着觉。“宋美龄恳求小人物。她对我说，她除了杀他以外，什么都干了。”不过，蒋介石还是同意驻扎在利多的部队按原计划参战，并以书面形式授予史迪威不受任何干涉的全面指挥权以及“革掉任何人直至撤掉所有指挥官的权力”。蒋介石说，这是史迪威指挥的部队，只要注意不为英国人利益而牺牲这支部队，史迪威觉得怎样合适就怎样办。对于罗斯福总统的一再催促（罗斯福是应史迪威的要求催促蒋介石的，而史迪威则是按照蒋夫人的建议提出要求的），蒋介石在答复中拒绝在缅甸战役中使用 Y 部队，除非盟国军队拿下安达曼群岛或仰光或毛淡棉，切断日军的后路。

在美国拒绝提供十亿美元贷款后，蒋介石又提出一项十分离奇的新要求：美国应当按照官方汇率偿付在开罗会议上决定的为实施 B-29 轰炸计划而在成都地区为 B-29 飞机修

建机场的费用。如果美国觉得它做不到这一点，中国政府则抱歉地告知美国，它“没有力量来满足驻华美军的需要……无法进一步承担物质上或财政上的任务，其中包括军用建设项目。”原定于 1944 年 1 月 15 日开工的机场修建工程就此耽搁下来了。

史迪威写道，“我的天哪，用五千万金元修建机场，五千万金元是敲竹杠！”在华盛顿，摩根索财长怒不可遏。他吼叫道“他们是一帮混帐王八蛋！我决不到国会山上……要求拨给他们一个铜子。”摩根索建议，“我们要他们都跳长江里去”，我们自己通过黑市活动花钱来修建机场；他愿意“每天给萨默维尔将军送去价值一百万美元的珠宝和金条”。平静下来以后，摩根索同手下人员讨论了替代方案，他的手下人员建议说，按照一比二十的官方兑汇价格来建造机场，造价极为昂贵，支付不起；估计约要八亿美元。现在情况越来越清楚了，就连美国这个富国也花不起在中国打仗的开销。

美国人认为，蒋介石要求美国用六倍于实际费用的标准出钱去打败占领中国领土的敌人，是一种神经错乱，没有道德心，实在令人愤慨。但是，基督教传统中的道德心与孔教的道德心是不同的。也许，中国对西方所积蓄起来的所有蔑视和幻灭之感在蒋介石提出偿付要求时都考虑进去了。开罗会议的结果进一步加重了蒋介石的根深蒂固的仇外心理，这是完全有道理的。他对于美国把租借法案援助的大部分转给英国和俄国而怀恨在心。

同所有在金钱问题上的争吵一样，美国与蒋介石的这次争吵使人心里很不痛快。摩根索财长说，“也许我们不需要他

们，的确——”摩根索要寻找某种军事方法来解决问题。他召见了萨默维尔将军，询问他如何才能解决问题。“我气得发疯，难道我非得忍气吞声吗？你们没有什么办法能摆脱出来采取其他行动吗？”萨默维尔同马歇尔和史汀生磋商以后报告说，陆军“非常不满”，准备“采取强硬立场”，上至一度是最坚决支持中国的人、陆军部长史汀生也都如此。史汀生那天在日记中敏锐地写道：“既然我们非常密切，我并不担心中国人会退出战争。”

1944 年 1 月 20 日，萨默维尔同摩根索会晤时说，陆军准备停止在中国修建机场，准备从“另外一个方向进攻日本”。他又提出了一个更加令人吃惊的主张：美国“可以通过撤销援助的办法搞垮蒋介石”，或者，如果美国人愿意，“花一亿美元的代价收买蒋介石的某个对手”来搞垮蒋介石；可以物色的蒋介石对手大有人在。卢修斯·克莱将军建议，不要再向中国运送任何租借物资，或者把租借物资的一部分转交给地方将领，“或必要时干脆撤出中国，或者呆在中国什么事也不干，继续以缓慢的速度行事。”

从这次会议以后，可以说，美国对于蒋介石政府的支持既没有信心也没有诚意。不过，美国的支持并没有中断，美国也没有试图扩大它的选择余地，找其他门路。同掌权者打交道是最方便的途径，对外政策是有惯性的，不允许作任何改变或去碰运气。华盛顿政府内一致认为，美国不能接受也不愿接受中国提出的官方兑汇率，但是国务院切望不要削弱蒋介石的地位，罗斯福也不打算抛弃蒋介石。美国提出建议，把兑汇率定为四十比一，孔祥熙应邀到华盛顿进行进一步的商谈。

中国人仍然要求美国要么提供十亿美元贷款，要么把兑汇率定为二十比一。孔祥熙在启程去华盛顿之前同高思大使谈话中谈到中国崩溃的可能性时说，日本一直在提出"某些非常好的建议"。

到2月份，美国军队在太平洋地区的推进提出了提前几个月到达中国港口的可能性，这一前景使得更有必要修建机场支援进攻了。军界原来所持的没有中国照样可以打仗的看法不复存在了。金钱问题上的争吵仍在继续。将近一年以后，孔祥熙博士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仍然满脸堆笑地坚持二十比一的兑汇率。

与此同时，根据各项临时的财政折衷方案，中国老百姓修建了一些机场，B-29飞机抵达中国。四川省从当地各县区聚集了四十五万民工。每个县都派足了规定的男女民工及童工的定额，并携带工具和九十天的口粮。民工们步行前往工地，把物资放在独轮车上推着。民工们在没有卡车、挖土机、混凝土的情况下修建了九座机场，其中四座机场有九千英尺长的跑道。民工们用扁担挑着柳条筐，把千百年来辛勤开垦的水稻田表层熟土运走。男民工们拉着石滚子来来回回压平下面的土层。他们用无数手推车从河边运来鹅卵石铺了一层地基，上面铺一层用泥浆搅拌的土层。女民工的任务就是整天坐着用锤子砸碎石。然后铺一层碎石，接着再把表层熟土运回来铺在上面，重新压平。各村的工头拿着代表各村的小三角旗，按照工程师们的指示，负责指挥本村民工劳动。工程师中，除了十四个美国人以外，其余都是中国人。六十天以后，第一批B-29飞机开始使用机场，九十天后机场全部完工交

付使用。

在建议孔祥熙去美国之前，美国对蒋介石提出的第一项反建议表示，美国每月可以向中国开支二千五百万美元，条件将由高思大使和史迪威将军共同商定。当这个难办得要命的任务落到史迪威身上的时候，史迪威已不在重庆，他也不打算很快再到重庆去。他于 12 月 20 日，即蒋介石书面授权他指挥拉姆加尔部队(现在称为新一军)的第二天，离开重庆前往缅甸前线。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能成功吗？”他带着这个不很有信心的问题逃脱出来，到“绝无战事”的缅甸战场上去了。

第十七章　公路修复

1943 年 12 月—1944 年 7 月

人们总认为一位将军级的战区司令是不会亲临前线到师一级去的，更不用说下到团或营一级了。史迪威回到缅甸采取了与这种传统不一样的做法，他完全不是因为在上层酒足饭饱呆腻了，也不是单纯想打仗，而是由于他有一个实际认识：只有他亲自临阵指挥，才能使中国军队采取攻势，才能使战役有可能获胜。

1943 年 12 月底到 1944 年 7 月之间，史迪威除了一两次因事赶忙飞到德里和重庆以外，一直在缅甸的丛林中呆了七个月，尽管有人批评他离开司令部，还有人嘲讽他是“美国陆军中最优秀的三星连长”或者说他“在缅甸进行排一级的战争”。史迪威有着同潘兴将军同样的信条。潘兴将军 1913 年任菲律宾某省省长时，曾经代行一位阵亡上尉的职务，亲自带着一个连部队进攻摩罗的一个堡，后来有人推荐授予他国会荣誉勋章。潘兴在致陆军部的信中表示不能接受这枚勋章，他的理由很简单：“我到前线那个地方是因为那里需要我。”

史迪威开始行动的时候，心中考虑的重要问题是打通去中国的陆上通道，其目的是最终同美国军队在中国沿海汇合，从而证明他坚持已久的论点是对的，这就是只要装备齐全、训练有素、指挥得当，中国军队比得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

史迪威得到了蒋介石的保证：北部战区司令部下属的中国军队各师均由他指挥，不受任何干涉。尽管史迪威这时对中国的所有保证深感怀疑，但是他认为这次出征的目标并不是蒋介石想要阻挠的目标。史迪威没有权利指挥Y部队在他的前面开道，也无权调动英国军队按原计划在他的后面护卫；这个问题只好留给上级去施加有效的压力了。无论如何，他认为继续在重庆和德里使劲对付无休止的躲避和搪塞是没有意义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开始采取军事行动来强行解决问题。他的目标是在雨季以前拿下密支那。

根据联合参谋长会议批准的代号为"首都"的作战计划，要发动钳形攻势拿下北缅，东面由Y部队同敌人作战，西面由英军第十五军向钦敦江挺进，同数师团日军作战，从而防止日军阻挠史迪威部前进。在这同时，史迪威率部象一把尖刀直插缅甸北部，作为开辟这条公路的先头部队。

史迪威的作战计划是简明扼要的："我们不得不通过一个耗子洞，还要一边前进一边继续打洞。"这个耗子洞就是三个河谷地带：胡康谷地，其终点是叫做坚布本的山脊；第二条是通往南北向铁路干线的孟拱谷地；第三条就是位于铁路另一侧、是缅甸中央走廊的开阔的伊洛瓦底谷地。日军在最北面的重要驻军和空军基地密支那就位于孟拱谷地以南四十英里，在铁路线和河流的一侧；从密支那有一条公路向南连接着通往中国境内的旧滇缅公路。指定北部战区司令部所属各部走的道路是一条茂密的丛林小道，长满枝藤，有的时候一小时只能前进一英里。这条路的两边都是连绵的山脉，由于大雨的冲刷，山坡方向多变，这里是世界上最难作战的地方。

北部战区部队将要迎战的敌军部队是闻名的日军第十八师团，这是攻克新加坡和参加第一次缅甸战役的部队，据认为是日本陆军中训练最好、最骁勇善战的几个师团之一。该师团长田中新一将军是一位体格健壮、长相端正的军官，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军人，知道怎样最合理地使用他所掌握的兵力。当时，日本在缅甸的驻军共有五个师团，在后来的两个月中增加到八个师团，另外有四个泰军师，勤务部队以及对他们没有多大用处的一些投靠日军的小股印度和缅甸部队。

盟军即使不在作战部队的数目上超过日军，也在部队的总人数上超过了日军：史迪威指挥的三个师，每师都是一万二千人——第二十二师和第三十八师是在拉姆加尔经过整编的；第三十师是一点一点从何应钦手中要出来的，经过几个月的时间飞机才陆续把他们空运到印度，其中一个团留在利多作后备力量，另一个团正在拉姆加尔受训，（“我们决不会弄到第三个团了。”）加在一起，北部战区部队在开始时有三万到三万五千人。

英国人指挥着六个师（五个印军师和一个西非师），组成两个军，即第四军和第十五军，加上温盖特指挥的钦迪突击队三个旅，还有其他团队和辅助部队。他们的主要基地在利多以南二百英里、靠近缅甸边界的印度曼尼普尔邦的英帕尔。印度军队五个师大体上三分之二是印度人和尼泊尔人，三分之一是英国人，每个团或营中都是肤色相同的人。所有的高级军官和一部分下级军官由英国人担任，所有的军士都由印度人担任。1944 年 1 月，史迪威进入缅甸不久，第十五军就在若开山区同日军的一个师团交火，试图南下顺沿海向实兑

的港口和机场推进。由于取消了“海盗”行动计划和夺取缅甸南部的计划，这场战役的目标除了使东南亚部队定能获胜——事实证明这是很困难的——以外并没有多大的必要性。

驻扎在缅甸另一端的云南境内的是Y部队的十一个师，这十一个师仍然按兵不动。

盟军除了在人数和装备上对日军占优势（即使在团结和目标方面并非如此）以外，现在还取得了制空权，不仅在作战实力上是如此，而且在补给、增援、撤退和保护地面部队机动性方面也是如此。这就是能够打这个战役的因素。正如一位军官所说，在利多公路前面推进的、分散在各条路上的北部战区部队，“得靠飞机空投食品”。空投还使盟军有可能在敌后采取行动以及在关键时刻运送部队。空军力量的新用途以及在缅甸北部沿用的运送办法后来用于法国和凸地之战[①]中，发挥了作用。

史迪威采用的战术同日军1942年采用的钓钩战术相同，另外还采用了他在1940至41年的历次作战中擅长运用从远侧包抄的战术。他的意图是在正面把敌人拖住，同时穿过丛林从侧翼展开真正的进攻，并派出一支进行包围的部队穿过高地占领敌后的某个地点，其目的是建立一道障碍，切断敌人的退路。他打算随着北部战区部队的推进，分割包围和歼灭日军第十八师团。由于遇到一些疾病的意外障碍，实际行动上经常没有达到原来的要求，由于信奉孙子“穷寇勿追”格言的中国军队不愿收紧网口，原来的意图就更难实现了。中国军

① 1944年12月16日德军向盟军发动最后一次反攻，攻入比利时突出地带，后为盟军击退。——译注

队宁愿进行U字形的伏击，留下一条很明显是让穷寇逃脱的路线，以免陷入罗网的日军作殊死战斗。敌人一次又一次地从史迪威布置好的决定性战斗中撤出，虽然敌人让出了地盘，但是仍然要在南面再次进行战斗。因此，时间的压力增加了，要在雨季到来之后消灭敌人，就得采取更拚命的手段。

在拉姆加尔受到训练和得到新装备并不能全部消除中国军队以为在军事上不如日本人的自卑感；他们不相信自己能够打败日本人——这就是指挥官们裹足不前的因素。为了证明中国军队能够打败日军，史迪威在多次交战时特地让中国军队在人数上占优势；如果要消灭日军的一个连，他就派出中国军队的一个团去完成任务。史迪威用尽了威吓、赞美、凌辱、诱劝、贿赂、催促、授勋、嘉奖、在报上刊登图片以及在宣传方面的各种办法，甚至他亲临前线持续不断地施加压力，才使缅甸的攻势继续下去。有许多次，在斯利姆将军看来，上述办法"是能够真正推动部队的唯一办法"。

在情报方面，史迪威依靠战略情报局下属的第一〇一侦察分队组成的克钦游击队。这支游击队由可爱的、勇敢善战、有强烈反日情绪的人组成，他们很快就学会了使用无线电的技术，他们探明敌人的地点，给北部战区部队做向导，炸毁敌人的火车和桥梁，拔除日军孤立的据点。至于他指挥的部队中的情况，史迪威就靠他以"顾问"名义安置在中国军队团一级有时是营一级部队中的联络官。这些联络官自己有电台，每天用密码向史迪威报告各部队的行动和进展，这些报告经常与他从中国指挥官那里收到的报告不一致。虽然史迪威吩咐这些人不得干预中国军队各级的指挥，并严令他们在判断

不一致的时候尊重中国人的判断，但是这些人可以施加自己的影响，办法是运用自己在传递供应需求方面的转达权——或者说是否决权。史迪威至少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要求中国作出让步了。顾问制度除了在中美人员之间培植了持久的友谊以外，也在他们中间引起了争吵。从整体来讲，顾问制并没有发挥原来所希望的那种效用，即维持战场秩序，灌输进攻精神。

12 月 21 日，史迪威到达胡康谷地的时候，北部战区部队原来打算在塔隆河一线开始发动的进攻已经比原计划晚了一个月。日军也在试探阵地以便展开一次攻势（日军也在计划发动进攻），他们占领了通向渡口的要地尤邦加以及利多公路要穿过塔隆河的那个地方。孙立人指挥的第三十八师所属的三个营遭到日军部队的突然打击，只得掘壕固守，他们遭到敌人的分割包围，由于空投物资有限，这三个营欲进不得，欲退不能。解救这三个营的努力都失败了。孙立人将军和博特纳将军在供应问题上和要求炮兵支援的问题上愤怒地争吵起来。蒋介石在从开罗回国的途中，出于他囤积实力的本性，提醒不要在塔隆河畔部署超过一个团的兵力，他说，“因为我们在那里只有六个团，如果放上两个团，万一被敌人干掉，那么我们就只有四个团了。”

史迪威在信宾扬成立了司令部，指挥战役的第一阶段。在他抵达的一周以后，利多公路就推进到了这个地方，使卡车和吉普车能够把供应物资运上来。史迪威同孙立人以及该团团长一起制定了向尤邦加发动猛攻的计划，安排了火炮网和

侧翼攻击，并向部队发表了讲话，说这是一次重要的进攻，只能打胜不能打败。跟随先头部队活动的西格雷夫注意到，“史迪威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些成效”。部队于12月24日发起进攻。史迪威于早上六点半动身到前线，步行两小时才到达前线指挥所，在指挥所呆了整整一天观察形势。火炮向进攻部队前面三十码的地方开火，第一阵炮火之后，接着就是五分钟的可怕迟疑，接着传来中国步兵部队的号声，然后步兵上去了。要清除丛林深处的日军孤立小据点以及穿过敌人的布雷区和隐蔽机枪阵地去夺取河道是困难的。史迪威头戴钢盔，毫不在乎敌人一个隐蔽机枪手为试探指挥所距离而射来的子弹，他这样干可吓坏了孙立人和他手下的军官们，他们担心史迪威被击中，他们要对此负责。

中国军队的进攻，虽然在史迪威看来过于谨小慎微，但并没有停止。孙立人“发誓要为老先生（史迪威）争气，部队因为有我跟他们在一起而精神振奋”。日军在掩体和散兵坑中顽强抵抗；当一个单独作战的机枪手被击毙以后，另一个人就会从树林中冲出来继续使用这挺机枪。用了一个星期才把尤邦加拿下，把各个小块据点扫清。到12月底，中国军队第三十八师的损失情况是三百一十五人死亡，四百二十九人受伤，但是它第一次在缅甸打败了敌军。作为对美国训练工作的第一次检验，这个结果是至关紧要的：它向中国人证明，他们确实可以打败日本人。第二十二师的一个连在首战告捷以后，用竹杆挑着日本人的头举行游行，吓得魂不附体的美国联络官要求辞职。从中国军队打仗质量、装备和空投的情况来看，日本人也认识到他们碰到了新的敌手。

史迪威身临前线，他同普通士兵一同生活，这给中国军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摆脱缠身的司令部的日常琐事、大量文件、信件和追逐他的殿后梯队的信使，他经常离开设在信宾扬的司令部和以后随军移动的前沿司令部，而呆在他自己设在树林中的个人作战指挥部里。他同助手狄克·扬住在一间竹屋里，有时住在帐篷里，地下挖有防空掩体，带着的行李箱当桌子用，唯一的侈奢品是两把柳条椅子，这是对他这一级人的优待。他睡在拴在两树之间的吊床上，洗脸刮脸时用钢盔盛水，同士兵一道列队，在集体食堂中吃普通饭菜。在营地的时候，史迪威一天三餐的饭菜都由名叫朱尔斯·雷纳德(大家叫他格斯)的一位中士给他做。格斯抱怨他的上司吃得"象鸟一样少"：主餐通常只吃两片格斯为他烤制的葡萄干夹心面包，涂上黄油和果酱，外加一杯咖啡。格斯想方设法弄来一点蔬菜，代替他吃腻了的火腿片，做好以后站在上司的身后，直到他吃下去才走开。成为史迪威生活中主要支柱的家庭有这样一些成员：在北部战区部队情报部工作的儿子小乔；他的两个女婿：欧内斯特·伊斯特布鲁克上校和埃利斯·考克斯少校。史迪威的两个女婿都在中国军队中任他的联络官。

行军中，每当看到中国士兵抽用树叶卷成的烟卷，史迪威就把自己的香烟拿出来递给中国士兵们，他还特别作了一些安排，设法让飞机把香烟运送到前线。一位中国军官说，史迪威"特别关心下面的人"，士兵们只要一看见他，就把"我们的司令"围起来，都想跟他说话。其中最鼓舞士气的因素就是史迪威坚持要把受伤士兵送到野战医院治疗，必要时，派飞机送

到设在利多的第二十总医院治疗。由于史迪威一再坚持，施加了很大压力，才给第二十总医院修建了一座机场，他满足了该医院院长伊西多·拉夫丁上校提出的各项要求。拉夫丁过去是一名非军职医师，经史迪威提议，他成了医疗后备队员中第一个晋升为准将衔的人。拉夫丁抱怨说医院里没有斑疹伤寒病人急需的电扇，史迪威听到后就给他驻在德里的副手丹·萨尔坦将军发去电报，“想法解决一百五十只吊扇，一百六十只台扇，十一部空气调节器……你我都知道什么地方能弄到这些东西。”由于利多总医院急需电扇，东南亚司令部美国参谋人员聚居的帝国饭店中的电扇被拿走很多。星期日早上，史迪威通常都是坐飞机到利多医院看望上个星期负伤的伤员们。他下令在中国伤兵出院时不得对他们进行搜查，结果药品、毛毯、病号衣、医疗设备不断丢失，但是发这些东西时就预计到会发生丢失情况的，史迪威还特地下达命令说明拉夫丁对于医院丢失的所有东西不负任何责任。

在担架队、野战医院到第二十总医院的美国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伤兵的死亡率从通常的极高比率下降到百分之三点五。中国士兵常常说，他们并不怕在战场上战死，而是怕负伤后躺在战场上无人过问，只得等死。而中国军队中，士兵由于在战场上负伤后无法行走，通常就是那样死去的。士兵们感到，北部战区司令部精心照料他们，因此他们有了新的自豪感和信心。士兵们还知道，飞机可以不断向他们运送弹药，因而他们就不象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那样舍不得使用自己的弹药了。

国民党军队是年轻人组成的，许多人只有十五岁左右。

虽然身体不算强壮，但是他们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共产党兄弟一样，是世界上最能步行的军队。大体上，他们都具有优秀军人所具备的勇敢、顽强、自觉和考虑国家的气质，正如温盖特所说，他们的主要特征是欢乐。“在欧洲人会感到忧伤的条件下，中国人的脸上能够露出真正欢乐的笑容。”精确计划的时间对中国军队并不重要，任何按照确切时间制订的计划都没有什么得到按时执行的希望。任何不照顾脸面的计划也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由于熟知国内军队根本得不到真正的供应、运输和医疗，这些士兵已经惯于吃变了质的东西以求活命，他们会拿走或者偷走任何可以弄到手的东西。

黎明时分，史迪威总是要定时步行三五英里，通常要花两三个小时，到各个团的指挥所转转，后面跟着他的助手、卫兵，还有两三个纠缠不休的记者。史迪威一面走一面察看和记住周围田野和村庄的地势，晚上就在烛光下勾绘出简要的地形图，在图的旁边标出部队的行动和战斗。他在指挥所讲述自己的意见，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不作直接的指挥。日本人得知史迪威亲临前线，日本人在仰光电台广播说，他们打算活捉史迪威，这使得史迪威所要去视察的中国部队的指挥官们十分担心，如坐针毡。他们都担心万一总指挥在自己的驻防范围内被日军巡逻队击毙或者中埋伏被活捉，自己会犯下死罪。如果某位指挥官推迟或拖延军事行动，史迪威就利用这种担心心情在他的指挥所里呆着不走，直到同意下令行动为止。

要给中国高级军官灌输进攻精神仍然是困难的。由斯利尼将军训练、由能够胜任、精力充沛的中国军官指挥的炮兵部队是朝气蓬勃和可以信赖的，但是拉姆加尔训练营地所花的

努力并没有完全消除中国军官中的懦弱习气。以第三十八师一位姓郑的少校营长为例，他在史迪威到达胡康谷地之前的一个月时间里，没有占领预定要他占领的阵地，四个星期中没进行过进攻性巡逻，没有给一支特别巡逻队发放补给物资，无法交代这段时间内飞机给他空投的三万一千份口粮和二十八吨弹药的下落。

中国人和美国人在供应问题上发生的磨擦是频繁的。一方面，中国人提出的要求量通常是某支部队所需要或所能使用的二倍；另一方面，当天气不好飞行员们不愿作空投飞行时，部队有时候就接近挨饿的状态。史迪威要求空军人员和地面部队换个位置，让空军人员去尝受几天在泥泞中依靠火腿片和热水过日子的滋味，这样他改变了空军人员不愿执行空投任务的局面。保罗·琼斯后来回忆说，“空军人员了解到地面部队的情况后，每天都出机空投。在人们认为无法出机，即云压树梢的恶劣气候下也出机执行空投任务。”

这期间，史迪威的指挥所收到了重庆和德里接连不断地发来的加急电报，“两个地方都使劲叫我去决定这决定那。”史迪威派驻德里的副手萨尔坦少将是马歇尔 1943 年派去帮助史迪威的一位陆军少将，他才华超群，值得信赖。用他的上司的话说，“丹·萨尔坦是这个战区最突出的人物”。但是军事系统的特点是，任何事情，无论是什么小事，都得经过上级批准才行，如果上级没有出色的行政长官的气质，事情就会使人烦恼。这种情况在民政体系中屡见不鲜。陆军部长史汀生抱怨说，罗斯福是“我为之效力的最差劲的行政长官”。史迪威无法回避的——也是军界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他在指挥

系统中的地位问题。他于 12 月 31 日连夜赶到德里去解决这个问题。

作为北部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史迪威在东南亚部队的指挥机构中临时担任军指挥，还兼任盟军最高副司令。这种状况就象《美女与贵族》① 中的大法官，竟然向他自己的监护人求婚，不知道他是同意自己的这桩婚姻，还是在自己没有同意的情况下结婚。假如没有自己的同意而结婚，他能因自己藐视自己的法庭而传讯自己吗？对固有的荒谬有一点点认识是不能解决东南亚司令部的问题的。盟军最高司令蒙巴顿要求史迪威与斯利姆一同作事，斯利姆在东南亚司令部陆军司令乔治·吉法德将军属下担任由英国两个军组成的第十四集团军的司令。史迪威看不起吉法德其人，称他为缅甸的何应钦，美国人当中风传说，上面之所以让吉法德担任此职，是因为“他确信在缅甸无仗可打”。史迪威认为吉法德会设法阻碍他挺进，因而坚决拒绝归他管辖。由于有盟军最高副司令这个头衔，史迪威说他的职位比吉法德高。史迪威的另一个借口是，他是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罗斯福总统未许可他接受吉法德的指挥。斯利姆认为，史迪威从他的一个司令部办公室敏捷地转到另一个办公室（史迪威在中缅印战区的各级机构中担任了不下五个职务）的熟练方式是“机动的攻守战术的一课”。蒙巴顿越是跟史迪威说理，史迪威越是坚决拒绝，斯利姆认为，史迪威的坚决拒绝态度显示了“他那种极其顽固的性格”。

---

① 《美女与贵族》是英国歌剧作家吉尔伯特和英国作曲家沙利文合作创作的歌剧，该剧于 1882 年 11 月 25 日同时在伦敦和纽约两地首次公演。——译注

事情就这么僵着，后来史迪威突然使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地宣布，“我打算在到达加迈之后军事行动上接受斯利姆将军的指挥”。加迈位于孟拱谷地的中段，大约是位于通往密支那的路程的中间。史迪威对于斯利姆的作战意图感到有信心，知道作这样的安排不会妨碍他自己的作战行动。斯利姆的较低军阶算不了什么，史迪威说：“只要让我打仗，叫我接受下士的指挥都行。”

斯利姆认为史迪威是“具有两种性格的人”：单独同他交谈时是一种性格，在众多的人面前讲话时他是另一种性格，因为他在这种时候往往采取“醋性子乔”态度。“他具有人们少有的胆识，他常常按偏执的想法下决心，这种决心产生一种动力……他无疑是东南亚部队中生动有趣的人，我就喜欢他这样的人。”史迪威在某些听众面前有点装腔作势这是事实。他与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轻松自然；在家里，喜欢说些笑话；可是对于他以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无论他是由于意识到彼此差异、或感到自卑、或不耐烦或者蔑视别人）而感到怀疑的人，他无疑会采取一种粗鲁或挖苦的态度，有时采取粗俗的态度，甚至会故意采取粗野的态度。他在嘲弄人时就是这样的。在第二次缅甸战役期间，史迪威的粗暴态度在对待殿后梯队方面更是明显了。他在前线和衣而睡，受到炮火的袭击，同时，毯子上满是苍蝇卵，掩体中蝎子横行。于是他只好跑到德里参加一些有许多事情待办的会议。史迪威同情那些坐办公室的将校们，这些人都具有史迪威爱读的莎士比亚在一个剧中描写的火暴性子霍茨波的情绪，每次战斗以后，由于“愤怒和极端劳累”而口干舌燥的霍茨波总是对上头派来的自以为是的人

火冒三丈。

马歇尔认为，史迪威“是他自己的死对头”，他对英国人和中国人“无所事事”的态度毫不掩饰地表示不满，因而恶化了他同英国人和中国人的关系。马歇尔觉得，尽管史迪威有充分理由对英国人表示不满，但他个人的缺点妨碍了蒙巴顿想和他设法相处的努力。史迪威当然缺乏马歇尔具有的严格控制感情的涵养，但是他把关系弄僵的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英国人和中国人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胆小如鼠，自那以后他们都想方设法不采取行动。史迪威同他认为具有实干精神和军人气质的英国人和中国人的关系历来是很好的。因此史迪威才经常希望自己能指挥具有上述两种特色的共产党军队，才敬佩在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顽强抵抗的俄国人。史迪威在苏联红军建军二十六周年之际发去了贺电，并收到了斯大林的回电。

马歇尔听说史迪威愿意接受斯利姆指挥的消息以后，给蒙巴顿写信说，“如果透过表面现象，你将会发现，他（史迪威）希望的只不过是办事毫不拖延……他对任何进攻建议和作战方案都会拿出极大的精力、勇气、智谋和无限的才能与想象力。他的头脑比我们所有的将领机敏得多，他所经受的锻炼和理解能力达到了一种不平常的高度。他的缺点是对保守和行动迟缓有急躁情绪——但是在这次非常任务中是个好样的。”

史迪威同他的下属参谋长们（包括他指定指挥“抢劫者”行动的梅里尔中校）匆忙举行会议以后，于二十四小时之内就

返回了信宾扬。他此行的收获是，由于取消了缅甸战役的大规模作战计划，史迪威要求把“抢劫者”突击队重新交他指挥的顽强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温盖特得悉此事时气愤地说，“你告诉史迪威将军，他可以把他手下的美国人带走——。”但是，军事行动是要求连最不和谐的盟友也都要团结起来协调行动计划的。温盖特于1月3日来到信宾扬同史迪威磋商。会议由随同温盖特来的军官之一伯纳德·弗格森准将担任记录。弗格森相当紧张，他知道两个头目“可能都表现出粗暴的举止，一旦发生争执，谁也解劝不了”。

温盖特年方四十，长得英俊，留着胡子，身材魁梧，两道浓眉下有一双锐利的蓝眼睛。他的长相、举止和爱好都象一个先知，与史迪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史迪威已年逾花甲、细瘦而憔悴、金丝眼镜后面闪动着一对挖苦人的眼睛，他具有美国东部沿海地区农场主那种精明、怀疑、猜测的神情。弗格森认为俩人都具有先知者的特征：“远见卓识、不善容忍、精力充沛、勇敢无畏”，但是这种评价是过分称颂史迪威了。虽然史迪威显而易见具有后三种特征，但他不是先知，只是一位现实的人，他的行动原则是“好好干成功”。在他人身上少见的是史迪威的那一股要完成一项使命的劲头以及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献身精神。温盖特既是一位实干家又是一名战士，他厌恶印度军队中普通英国军官们，这些军官也十分厌恶他。史迪威认为这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史迪威和温盖特的会晤进行得很和谐。温盖特答应很快派去美国人，把他指挥的远程深入部队部署在英都周围，把敌人的注意力从北部战区部队那边吸引过来。

史迪威非常渴望美国兵的到来能使在胡康谷地开始又按兵不动的中国军队振奋起来。他在1月2日的笔记中写道，“孙立人没有行动，却十分荒谬地要求空军的支援，要求提供弹药和火炮。”中国士兵打得很好；“只是上级软弱无能……如果我有两师美国军队就好了！”史迪威经常担心的是兵员补充问题，他对于徒步去前线指挥所和观察所也越来越觉得累了。有一次他来回共走了十八英里的路程，还有一次三个半小时才走了三英里路程。“每走一步就绊一次脚，就要咒骂一声。”有一次，史迪威一行人突然遭到日军密集的炮火的袭击，一颗炮弹就在离他不到十码的地方爆炸。日军经常对羊肠小道开炮轰击，妄图击中运输牲畜队或者小股部队。史迪威对一个团顺利渡河感到自豪，“毫不慌乱、纪律严明，没有人用手榴弹炸鱼……高水平的渡河”。该团团长傅中校“声称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看到这样一次真正的对敌包围——那可少见”。但是孙立人无法作解释的迟疑不前“现在将要付出生命代价”。

整个1月份都是在努力荡清达鲁平原上的敌人，不让日军在主力部队的后方留下一兵一卒。达鲁平原是个谷地，在胡康谷地以南，与其平行。现在一种可疑的反抗做法变得逐渐明显了。奉命打到达鲁平原的那位姓郑的少校营长仍旧呆在平原的边缘没有移动，他的上司孙立人师长“没精打采，脸色阴沉”。史迪威同孙立人争论了这次行动的重要性，并向他说明这次行动失败的后果，警告他不要给日军喘息的时间。几天以后，史迪威发现第三十八师的另外一个营没有进入阵地，他“怒斥”该团团长，“要他回去好好查一查是谁违抗了命令”。当这类情况第三次出现时，史迪威怀疑孙立人一定接到

了委员长的指示，叫他放慢行动，免遭严重损失，这是要重犯第一次缅甸战役期间的致命错误。史迪威毫不转弯抹角地明确警告孙立人，如果他的总指挥的命令得不到执行，他就辞职并把情况报告华盛顿政府，同时建议华盛顿采取"非常果断的措施"——意思就是停止美国的援助。

第二十二师的情况好一些。一位姓李的营长感到满意，"说我给他带来了运气……第六十五团团长傅中校说，如果给他的部队配给品，他们什么地方都愿去。"但是五天以后，第六十五团的行动"可悲地告吹了"，军队停滞不前。傅被撤掉了团长职务。关于作战的每一个命令都要经过一番斗争。最后第六十五团又行动起来了。由罗思韦尔·布朗上校指挥的有六十辆轻型坦克的坦克营"在艰苦的条件下干得非常出色"。这个坦克营是由美国人直接指挥的唯一一支中国部队。1月28日，第六十五团扫清一处日军孤立据点，打死日军二百五十人；两天以后，"第六十五团到了达鲁[illegible]"为主力部队扫清了道路。

蒙巴顿非但没有参战，而且在往后退缩。1月8日，东南亚司令部提出了修定后的代号为"公理"的作战计划。该计划建议停止滇缅公路的修建，停止史迪威要重新拿下缅甸北部的努力，声称鉴于蒋介石拒绝投入Y部队，要在雨季以前拿下缅甸北部是不可能的。蒙巴顿却建议恢复经过马来亚和苏门答腊的海上战略，并意味深长地把香港包括在东南亚司令部指挥的范围之内。史迪威概括的一句话就是"路易斯避而不执行整个计划"。史迪威发电报给马歇尔，敦促他努力促使

委员长进军缅甸，使英国人找不到借口，史迪威还派遣他的参谋之一约翰·克利夫兰上校去重庆游说。克利夫兰带着糟糕的消息回来了：委员长仍旧坚持要英国军队登陆并在缅甸南部发动一次大规模战役，然后他才出师入缅。“我们处于为难的危险境地。”史迪威说。

蒋介石不愿派Y部队出征，再加上他提出了过高的金融要求，这就使得华盛顿深信，他实际上是要求美国为他在缅甸打仗付钱。由于缅甸战役的目的是为了解中国之围，由于Y部队是美国为此目的而装备起来的，现在既然蒋介石不愿帮忙解救自己，显而易见，美国应当采取的办法是放弃上述努力。但是，由于美国的战略中需要中国，加之美国长期担心中国的崩溃，美国并不打算这么做。罗斯福用了有些愤怒的语气，几乎提出了史迪威早就希望提出的要求：要么全力以赴，要么索性不干。罗斯福1月14日给蒋介石的电报说，“如果不调遣Y部队，看来我们目前不宜向其运送极为重要的物资……并削减在印度继续进行物资储备。”由于蒋介石深信美国少不了他，他对罗斯福的话毫不害怕，Y部队仍然按兵不动。

史迪威不甘心陷入困境。当他得知蒙巴顿派遣魏德迈率领一个有不下十七名参谋人员(其中有三名将军)组成的代表团去伦敦和华盛顿说服联合参谋长会议接受“公理”作战计划时，史迪威也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去华盛顿“挫败英国佬”。他选派博特纳和戴维斯二人前往。在战区里，蒙巴顿要召开一次由高级指挥官参加的战略讨论会，讨论他提出的新的作战计划，但是会议必须等待史迪威前来，一直等到他拿下达鲁

平原以后才召开。史迪威于1月31日前往德里参加这次会议，不管这次会议从他的观点来看是多么消极，但是至少是他二十九天来第一次有机会洗个澡。史迪威的儿子在家信中写道，“他差点儿在浴盆里睡着了。”

“公理”作战计划的海上战略是所有反对史迪威陆路战略的人的一次协调一致的努力，是要摆脱在缅甸的危险、困难以及十分讨厌的条件下作战，魏德迈已成了东南亚司令部中第一个积极鼓吹海上战略的人。所有人的论点是，史迪威是在目前作战季节中无法获胜的情况下浪费盟军的精力和物力，即使取胜，能够运到中国的物资也不会很多，足以抵消付出的代价。永远是老谋深算的丘吉尔很好地表达了英国的利益所在。丘吉尔强烈反对将来在缅甸北部发动大规模战役，认为在这里同日军打仗是再糟糕不过的选择了。要是在缅甸北部甚至在其南部“受到牵制或者陷了进去，我们就无法在远东胜利中获得应享有的份额”——就是说恢复帝国的道路是经过新加坡到香港，他想在坐到和谈桌旁之前先把这些地方拿到手。缅甸虽然也是英帝国的一部分，但是它除了通往中国(在英国看来，中国不是理想的地方)以外并不能通向别处。英国的意图是在中国人从陆路到达香港之前先从海上到达香港。丘吉尔最后美滋滋地说，“我赞成蒙巴顿的新计划。”

陈纳德的那帮非常积极的追随者也反对北部战区司令部的作战计划，因为他们要把该司令部所属部队应得到的物资弄到手，虽然他们为什么指望不经过打仗就能使他们也需要的输油管通到中国还是个谜团。不知疲倦的艾尔索普在给霍普金斯的一连串信中写道，“我郑重告诫你，”史迪威要部队强

行通过一个“无路无粮的荒山区”的傲慢做法要“招致灾难”。艾尔索普自认为是蒋介石的发言人，他提出了蒋介石的论点，预言史迪威会被日本人打败，日本人“将切断中国与外界的联系，那时中国人的抵抗肯定会垮台，我们就会失去中国这个基地”。艾尔索普在1月份又写道，史迪威在利多“拿士兵的生命作儿戏”。他想使“缅甸战役这个尸体复活……在我看来，他这样做比登天还难”。

艾尔索普还认为，有可能会从陈纳德手中夺走物资供应优先权的超远程B-29轰炸机轰炸计划“是危险的理论”，把成都定为B-29轰炸机基地是对“史迪威将军的一种错误的让步，史迪威经常提出的理论是日本人只要想干，随时都能拿下华东前沿空军基地”。艾尔索普说，改变这种局面的最简便的方法是“把最高指挥权交给魏德迈将军，他知道如何同人协作”，何况魏德迈年轻有为。

同陈纳德不一样，四十六岁的魏德迈深受陆军部的器重，是史迪威潜在的新对手。魏德迈1930至1932年间曾服役于驻守天津的第十五步兵团，现在是总参谋部中的佼佼者。魏德迈以优异成绩从利文沃思军校毕业以后，又于1936至1938年在纳粹政权的德国军事学院进修总参课程。一位观察家说，魏德迈从德国回国时，“有一副德国总参谋部中最杰出人物常有的那种镇定而自信的神态”。魏德迈身材修长，仪表堂堂，八面玲珑，有办事能力，雄心很大，回国后在陆军部计划处工作期间干得很顺利，在东南亚司令部工作期间也同样很顺利。随着他的晋升，他喜欢看到自己的优点，后来还在一部书名上有他姓名和感叹号的书中为他的发迹辩护。“这位年轻

人自以为了不起”，史迪威曾温和地谈及魏德迈一两次，但是觉得还没有必要送他一个挖苦的绰号，当然有时候史迪威也并不是不想送给他一个绰号。

1 月 31 日会议上提出的“公理”作战计划规定英国军队不参加缅甸战役，把英国军队保存下来到下一个旱季，即 1944 年和 1945 年冬末春初采取行动，去进攻苏门答腊和马来亚。预料到那时候，可以从欧洲战区腾出一些登陆艇，下一个阶段就是向中国沿海进军。东南亚司令部宣称，无法赶在雨季以前拿下密支那，把公路修到那个地方，也无法在 1946 年以前打通从密支那通往昆明的滇缅公路，因而为时太晚，来不及支援从太平洋向中国沿海发动的进攻。据认为，应当放弃夺取密支那的目标，史迪威到达孟拱谷地就应当止步，因为他可以从那里保障空军运输队的安全，史迪威为了发动缅甸战役和修建滇缅公路而积蓄的人力物力可以用于扩大喜马拉雅航线的空运能力。

在史迪威看来，会议上提出的全套地图和计划文件都是“妄想图，假数字，肮脏的意图”。史迪威在会议上发表了上述看法。他说，如果英军各师和 Y 部队能按原计划参战，经陆路到达中国比从海路到达中国要快得多。立即能够做到的事为什么要等六个月才做？缅甸战役存在的困难已经弄清楚，而对于在马来亚和苏门答腊作战的困难现在还心中无数。他认为，盟军不能指靠 1944 年击败德国，制订长期作战计划应当根据现有力量，不能依赖尚未到手的东西。在中缅印战区打败日军的办法是建立一支强大的陆军，向海岸推进。魏德迈站起来解释说，实现上述想法取决于在中国内地建立和保持

各种运输线路，而“我们的技术专家说，我们至少在两年内无法做到这一点”。① 据说，史迪威对魏德迈的回敬具有酸葡萄的味道。史迪威针对种种所谓不可能的论调以挖苦的口吻提醒说，克莱夫② 只带领一百二十三人就征服了印度。因为单单东南亚司令部中的人员就是此数的十倍，毫不奇怪，其他与会者对史迪威的这番讽刺一声都不吭。

决定要由华盛顿和伦敦去作。博特纳和戴维斯立即动身去美国，比魏德迈率领的代表团早五天，这使蒙巴顿大为恼怒，他认为史迪威私自派代表是对他这位盟军最高司令的不忠。博特纳和戴维斯俩人抵达美国以后发现，他们进行这番游说是多余的；“公理”作战计划在华盛顿没有被采纳的可能。罗斯福根本不赞成这个计划，认为这个计划不是根本办法，并且带有新殖民主义色彩，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个计划也没有任何兴趣。太平洋战略的目标现在是夺取菲律宾的吕宋岛—福摩萨—广州这个三角区，由史迪威训练的第七师于 1 月 31 日德里会议开幕的那天在马绍尔群岛中的夸贾林岛登陆。美国的意图是对日本的袭击由美军来担当。美国海军尤其要把英国军队排斥在外。部分原因是双方的利益不一致，但主要是拥有新式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不想让式样陈旧、航速缓慢的英国舰只妨碍它的行动。史迪威的作战计划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大力支持，因为据认为拿下密支那是实施超远程轰炸机计划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吕宋—福摩萨—广州三角区

① 1945 年 1 月 28 日，即在魏德迈作此预言之后的整整一年差三天，第一批物资沿着完工的滇缅公路运到了中国。

② 克莱夫，全名：Clive, Robert, Lord (1725—1774)，英国将军，政治家，曾带领英军征服印度，是英帝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创建人。——译注

的军事行动也需要超远程轰炸计划的支援。博特纳觉得他可以直接去面晤罗斯福总统。

“年轻人，给我讲讲缅甸的形势”，罗斯福总统说。罗斯福对博特纳和蔼可亲，表示欢迎他。博特纳随身带了一幅很大的彩色地形图，用深红色标明喜马拉雅山，用淡绿色标明伊洛瓦底平原。他把地形图展开放在罗斯福总统座椅旁边的地板上，身子匍伏在地上，一边谈一边用手指点着图上的地方。罗斯福的军事助手帕·沃森进来两三次想把博特纳领出来，以便让总统遵照预定时间行事，但是罗斯福却挥手把助手赶开，“由我自己掌握我的时间”。罗斯福总统的热情使博特纳鼓足勇气要求罗斯福“向丘吉尔先生施加压力，要他向驻印度的英国军队施加压力，促使他们帮助史迪威将军，不要阻挠史迪威将军。”

“好吧”，罗斯福表示赞同，“你和我来给丘吉尔发一份电报。”博特纳既惊讶又高兴。他突然感到自己是在口述，总统则用铅笔在一个便笺上记下他的建议。博特纳正打算告辞，罗斯福总统说，“年轻人，谈谈你对法属印度支那前途的看法。”博特纳毫不迟疑地谈了自己的看法。跟平常的情况一样，博特纳的谈话视对象不同而有所区别。这一次博特纳说，“我已经告诉蒋介石，叫他做好准备在战争结束时接管印度支那。法国人因玩忽已经丧失了取得印度支那的权利。”

经过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润色，给丘吉尔的电报陈述了在当前的季节非得拿下密支那的有力论点，说如果英国军队参战，史迪威有信心拿下密支那，“迫切”希望“您最大限度地支持立即在缅甸北部打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丘吉尔是很难说

服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在魏德迈呈送“公理”作战计划以后正式否决了该计划。

如果不是敌军插了一手，又会出现一个僵局，使史迪威处于困境。同珍珠港事件一样，日本人解决了他们对手的困难。3月7日，日军向英帕尔平原发动了计划已久的进攻，迫使英军在边境上同日军交手，最后打过了边界。这样就使得英军后来重返缅甸战场了。用诱使敌人发动进攻的办法，史迪威成功地把他的盟友拖进了战争，虽然同他原来计划的并不一样。这一仗后来成了决定性的一仗，虽然英国人很不情愿打这一仗，最后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战后蒙巴顿居然成了缅甸的蒙巴顿伯爵。

在发生这些事态的同时，史迪威在千方百计捕捉驻扎在孟关的日军第十八师团的大部。孟关是日军在胡康谷地的主要基地。史迪威计划来一个包抄，由第六十五团在右边从达鲁平原向前推进，由美军突击队从左边经过很难寻找的小道兜个大圈子绕到孟关以南的瓦劳本，然后占领那里唯一的一条大路，截断敌军的退路。中国军队的五个团和坦克部队沿胡康谷地中部并行向孟关进发，公路及油管铺设工程随后平稳地推进。富有朝气的筑路工程指挥者、美国密苏里河大坝的设计师刘易斯·皮克将军（当地人称他是能人中的能人）2月5日来见史迪威。他保证能在2月20日以前把公路铺到新指挥部所在地泰帕，并保证在三天内把机场交付运输机使用。三天以后，机场修好，“是在炮火下用十四小时修出的一条极好的四千六百米长的平整的跑道”。

“现在的问题就是天气，”史迪威2月1日写道，“只要老天爷给几个晴天，我们就能开始干了。”但是其后的四天中有两天下大雨，接着的一个星期又开始下雨。迄今1月份已下了十二天雨，后来2月份下了十八天雨，3月下十天雨，4月也下十天雨，虽然这几个月份算是“旱”季。今年和往年不一样，气候反常，缅甸北部降雨量是一百七十五英寸。

第六十六团进行的一次计划好的行动，由于发现部队“走错了路”无法找到他们而告失败。联络官们束手无策，巡逻队外出寻找两天毫无结果（史迪威写道“我坐在那里急得发疯”）。到了第三天，史迪威亲自带着助手和卫兵，拉来该师师长廖耀湘，还有一两名中国军官和美国军官，出去寻找不知下落的这几个营。他们依靠指南针行路，弄不清离敌人远近，翻山越岭，在一人多高的荒草中行进，视线完全被挡住了，但是他们于傍晚时分找到了失踪的第六十六团。史迪威听了该团团长作的令人难以信服的解释以后，命令撤掉他的团长职务，并指示接任的新团长如何到达目的地，然后史迪威就在掩体中睡觉。第二天回去的行程把史迪威累得精疲力竭，“难走得要命”。在一个陡坡上，史迪威转过身对麦凯布上校说，“要是有个背包，我就会从山坡小道滚下去”。麦凯布说，这是他第一次听到他的上司承认劳累。他们一行人踉踉跄跄地走进第二十二师师部的时候，已动弹不得，连身上的背包都是别人帮助解下来的。要是第六十六团如期赶到指定的地点，就会切断日军的退路，但是这么一耽误，日军却逃之夭夭了。

这时候，即2月19日，美军突击队在现在晋升为准将的梅里尔率领下进入胡康谷地。这支突击队的正式名称为五三

〇七暂编团，一位士兵厌恶地说，该团名称“听起来好象洛杉矶街道上的一个通讯处”。这支突击队到达胡康以后，驻北部战区司令部的记者们给它取了一个更漂亮的名字，叫梅里尔的抢劫队。作为美国在该战区的第一支也是唯一的一支地面作战部队，抢劫队引起了报界和史学界的较多注意，类似的部队在其他地方就得不到这样的注意了。结果，突击队最终的悲剧日益临近了，事情几乎弄到了国会举行听证会的地步。

为了使突击队员们适应环境，突击队奉命从利多经那加山岭步行一百三十多英里。尽管一位在缅甸时间很久的人告诫说最好保存力量，不要徒步行军，梅里尔则有他自己的道理，不愿听从这个意见。梅里尔的一位同事称他为“天生的领袖”，他愿意让部队冒的风险绝不会超过他本人甘愿冒的风险。参加“抢劫者”行动的部队并不是原来设想的由身体健壮敢于冒险的志愿人员组成的体质上很好的部队。为了调集有丛林战经验的士兵，各有一千人的这三个营是从西南太平洋和加勒比地区各个部队抽来的。从新喀里多尼亚调来的一支部队中已经有许多人染上了疟疾。另一支部队是从驻特立尼达的第三十三步兵师抽调来的，这个师被认为是美国陆军中的垃圾场，专门放置种种不合格和智力低下的人，正如他们的一位军官所说，他们来参加“抢劫者”突击队只是从如下意义上说是志愿者，即“这些人只要能离开特立尼达，什么事都愿意干”。征集一批志愿去执行为期三个月、但有可能同敌军实地交锋的危险任务的号召，不仅吸引了包括在太平洋地区参加过战斗的老兵在内的许多勇敢善战的人，而且还吸引了许多性格粗鲁、长期有不满情绪的人。医务人员报告说，“我们

原来以为这些人都是经过挑选的，但是我们发现其中许多人都患有慢性病……还有许许多多精神病患者。”在印度受训的三个月中，这些人的行为粗野，纪律松散，看不上英国人提供的膳宿，但是逐渐产生了部队的自豪感和大胆战斗的精神，培养出了对他们的第一任指挥官、仍在梅里尔领导下的查尔斯·亨特上校的忠诚。在去利多的火车上，一位军官惊恐地发现，一些士兵从车窗向外射击正在地里干活的“东方佬”和耕牛。

史迪威会见了这支突击队，这是史迪威自投入战斗两年多以来第一次见到美国作战部队。据一位人士回忆，史迪威向这支部队发表了“简单而平静”的讲话，说出现了两件非常令人鼓舞的情况：中国人出现了进攻精神；他和所有的人一直在等待的突击队终于到来了，这是一支能够“解决问题”的能打硬仗的美国部队。

后来在史迪威的住处，参谋人员围着梅里尔讨论如何写书面指示的措词。“哎，别胡来了”，史迪威突然打断了大家的话题。“弗兰克，我们到外面商量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蹲在屋外的一棵树下研究一份地图。史迪威指着孟关以南大约十英里的瓦劳本说，“你于3月3日打到这里。”当年潘兴将军接办法国人关于攻克圣米耶尔突出地带的指示以后，把作战指示从厚厚的两本缩减到十四页。史迪威像潘兴一样也认为，只要明确了目的地和主要行军路线，没有必要把每英里的路程都列入刻板的时间表中。有一次孙立人向史迪威询问指示，史迪威答复说，“非常简单，继续前进。”作为陆军中的杰出战术家之一，史迪威通过研究和熟记地形地理情况，十分精确地知道向什么地方走，该如何走。“无论史迪威叫你在缅甸做些

什么，”阿姆斯将军说，“你就放心那决不会错，这就是一个军人希望知道的事。”

大雨和行军中的混乱妨碍了向孟关的进军。战斗机在前面破坏公路和桥梁，阻挠日军的行动，但是空军的支援在丛林地区不起多大作用，因为飞行员们无法看清地面的目标。从若开传来的消息说，英军的一个师突然遭到日军的激烈攻击，英军师部遭到威胁，该师阵地遭到日军的包围和围困。这次攻击是日军的一个牵制行动，目的是使盟军不去注意他们在英帕尔前线的战备。虽然英军在若开地区是三个师对付日军这一个师团，但是英国人还是急急忙忙地从英帕尔空运一个师前来增援。空军运输队的飞机不得不转用来运送部队，这引起了史迪威的愤怒，虽然曾经达成过协议，言明蒙巴顿在紧急情况下有权调遣空军运输队的飞机运送部队。

最糟糕的还是雨；雨水使丛林中的生活比平常更难忍受，雨还使得运载供应物资的飞机无法飞来向走在公路前头的部队运送东西。除非公路路面铺上了石子，否则雨水就把公路泡得象泥沼，甚至连吉普车都陷进去，卡车运来的食品只够筑路工人维持生命。作战部队需要空军的支援，不仅是需要空军给他们运食物，而且需要空军帮他们撤退伤员。夜里下雨时，史迪威躺在床上睡不着，他听着雨声咒骂道“每一滴雨点都使我痛苦”。一天早上史迪威凝视着他住处屋外阴沉沉的天空对保罗·琼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史迪威说此话时眼中含着泪水。接着传来了发动机的声音，一群飞机飞近了。

“抢劫者”部队在丛林中用八天时间进行了六十英里的艰苦跋涉，终于按时来到了给他们实行空投的地点，并夺下了瓦

劳本的那段公路，但是第二天就遭到敌军的激烈反击。“抢劫者”部队和中国第三十八师的一个团会合一起同敌军进行了五天的激烈战斗，这是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第一次并肩作战。由于各种失误和混乱以及中国军队的一个团在行军时过于小心谨慎，日军的主力逃掉了，虽然日军丢下了一千五百具尸体，地盘也丢给了盟军。在瓦劳本缴获的战利品中有若干是日军在仰光缴获的盟军方面的租借物资项目中的吉普车和卡车。史迪威以严峻而满意的心情在日记中记下了敌军的一则广播，敌军的广播称胡康谷地这一仗“很可能是在亚洲进行的一次最激烈的战斗”，虽然其规模不算大。史迪威对日本人的憎恨是强烈的。被审问人员围着的一名胆战心惊的日军俘虏想同他握手时，史迪威甩开他的手吼道，“我不愿同你握手，肮脏的狗畜牲。”

在若开，英国军队在空运师的援助下粉碎了日军的进攻，恢复了局势。对这个结果“欣喜若狂”的斯利姆将军飞来同史迪威磋商把温盖特率领的几个空降旅投到北部战区挺进部队以南地区的问题。这支空降部队的目标是切断日军的运输线，防止日军袭击北部战区部队的侧翼，增援密支那的守军。一个旅从利多步行二百五十英里到达英都；另外两个旅由菲利普·科克伦上校指挥的美国空军突击队的二百五十架运输机和滑翔机在3月5日至11日之间空运到准备好的简易机场。尽管发生了坠机和其他事故，飞机出动六百五十架次，在六天中运送了九千人和一千三百头骡子。温盖特在谈办事日程时说，“我们所有的部队都已渗入敌人的内脏”，他的这番言词使那些意见正确的英国军官畏缩了，“我们决心打败敌人，

重新拿下缅甸北部地区。让我们……奋力前进，把剑插进敌人的胸膛……现在是一个永垂史册的时刻。”

直到这个时候，委员长还没有提出什么主意来折磨史迪威，不论他私下给孙立人下了什么样的指示；现在他却突然清醒过来了。他于3月6日打电报给史迪威说，如果英国人不在若开地区推进，“我军就留在目前的阵地，使我军不致被敌军各个击破”。这话显然表明他对若开地区的情况有疑虑，或者是对于把喜马拉雅航线给中国运送物资的飞机又调去援救英军感到恼怒。象昔日的军事情报处一样，蒋介石要求史迪威事先汇报他的作战计划。“好吧，现在就开始汇报吧”，史迪威沉吟着，心里当然不愿遵命。

史迪威虽然已深入丛林之中，但也摆脱不了政治的缠绕。马歇尔发来一封电报，表示遗憾地说，史迪威和蒙巴顿由于在派遣博特纳率代表团去华盛顿以及转调喜马拉雅航线运输机的问题上发生争执而产生了“不和与猜疑”，他指示史迪威要与蒙巴顿重建融洽关系。史迪威觉得受了委屈，但是盟军最高司令蒙巴顿没有麻烦史迪威要他走出森林，而是亲自到胡康谷地去见史迪威。史迪威亲临前线部队指挥所的做法，不论从司令部的角度看来是多么令人遗憾，却引起了报界的兴趣，使蒙巴顿处于某种不利的地位。他们俩人不和的原因之一就是蒙巴顿抱怨史迪威向报界发表了一些谈话，使人觉得好象东南亚司令部中只有他史迪威一人在打仗。宣传领域的战争在亚洲实际上是最活跃的战线。蒙巴顿到胡康谷地的主要目的除了吸引注意力以外，就是要调整在公报和报纸的

报道中他与史迪威俩人相对的声望，协调他的战区里英美双方的宣传，这对于英帝国是一个极端重要和敏感的问题。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英国那样在军事历史上大吹大擂。无论是撤退还是前进，赢还是输，胆小还是勇敢，极端愚蠢还是顽强不屈，统统都说得很体面，描绘得很光荣。每一次交战都是勇敢的，每一仗都是决定性的行动。最高一级中从来没有退缩的人，因而每一次战役都有人升为将军，或显示出了将才、被誉为战争中最杰出的人。每个人都是出色的，因而士兵是坚强的，指挥官是冷静的，战斗是漂亮的。无论败得多么惨重，始终是沉着冷静的。错误、失败、愚蠢或引起灾难性后果的其他原因都神秘地消失了。记载灾难时谨慎而自尊，经过虚饰，灾难变成了大好事。官方的史料中记录着每个行动的许许多多有纪念意义的细节，但是这些细节起了模糊真相的作用。新加坡为什么落入敌军之手以及锡当事件如何发生，对这些仍然守口如瓶。其他国家也是想自尊的，但从未达到英国这样的程度。英国达到的这种程度的自尊不是凭其威力，是依赖于英国百年来左右世界的那种自我想象的力量。这种态度是无法改变的（没有一个后来人愿意继承这种做法），然而在 1944 年，这一点还不是很明显的。

丘吉尔极为关心东南亚司令部的宣传，居然派空军上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英雄菲利普·朱伯特爵士主管这项工作。至于蒙巴顿，据他的宣传事务班子的一位成员说，“蒙巴顿没有不露锋芒的时候。”蒙巴顿对一切宣传，特别是有关他本人的宣传极感兴趣。不对头的东西报道太多使他陷入窘境，报道得太少他又不高兴。蒙巴顿阅读司令部收到和发出的所有有关

宣传的信件，他还亲自修改许多信件。每次视察部队，蒙巴顿总是喜欢使人觉得他有“自然而然的生气”。在到达所要视察的部队之前，蒙巴顿总是先派人把他活动的具体程序写成书面指示送去，比如规定部队背对着太阳坐在场地上，这样阳光不耀眼，士兵们在他讲话时就可以看清他了。他乘坐吉普车前往，敏捷地跳下车，灵活地跳上事先精心准备好的货箱上，发表“绝对第一流的而显然是即席的讲话——简单、明了而又真正鼓舞人心。士兵们喜欢听他这样的讲话。”

3月6日，蒙巴顿在十六架战斗机的护送下到泰帕视察北部战区部队。史迪威说，他的十六架护航机用掉的汽油“够我们用来打一个星期的仗……我们在战场上有四架战斗机”。这位盟军最高司令身穿笔挺的棕黄色热带军服，饰有三道绶带和一对六英寸长的金肩章，肩章上镶着星星、皇冠、交叉的宝剑、官杖和皇家缩写字母。蒙巴顿到胡康时显得漂亮潇洒，好象置身于伦敦西区的阔佬区似的。自称为“乡下佬”的史迪威前来迎接蒙巴顿，既没有佩戴勋章，也没有佩戴军衔标志。史迪威在作战地区把勋章和军衔标志都取下来，因为他喜欢同人交谈而不被人认出来是谁，他时常就是这样同人交谈的。有一次，史迪威戴着一顶中国兵的猎人式大舌帽，膝上放着一支卡宾枪，坐着吉普车经过一群“抢劫者”部队的面前，其中一个仇视任何坐车人的队员望望车上嘀咕说，“该死的打野鸭的”。公路上一个属于工程兵部队的美国兵则较有同情心。“瞧那个可怜的小老头”，他说，“一些征兵局什么缺德事都干得出来。”后来，多恩告诉史迪威，他不应把勋章和军衔标志取下——这个倒霉的地区的军人需要看到他们的总指挥来鼓舞

士气，他会使士兵们十分感动，他们会在家信中把看到他的情景描写一番——经过再三考虑，史迪威才把勋章和军衔标志都戴上。

史迪威和蒙巴顿设法实现个人之间的和好，即使不是战略方面的和好。史迪威在给妻子的信中说，他和蒙巴顿相处得"顶好"。史迪威"忍辱"就他事先未打招呼派人去华盛顿一事向蒙巴顿表示了歉意。由于史迪威的意见在华盛顿占了上风，叫他道歉并没有什么难处，这次道歉使蒙巴顿非常高兴。

在蒙巴顿看来，史迪威希望同敌人厮杀是"胸有灵感"，却不懂得全球战略——计划者们最棘手的问题——而别人又无法使史迪威对行政事务产生丝毫兴趣。蒙巴顿向迪尔报告说，"史迪威的确是一位出色的老勇士"，但是"只有三位一体神灵"才能同时存在于德里、重庆和缅甸。因为蒙巴顿正在努力建立一个能顺利工作、气氛愉快的班子，他觉得史迪威尖刻的话语和直言不讳的批评会损害和破坏盟国的事业。他希望把史迪威调出东南亚司令部，把史迪威的指挥权局限于中国，让魏德迈或者萨尔坦接替史迪威在德里的职务。

蒙巴顿在别人陪同下视察瓦劳本战场时，被死尸的腐臭味熏得够呛，他说在海上打仗比这干净得多。该战区所有的人都感觉到，尽管蒙巴顿和史迪威两人都显示了盟国之间的热忱，但是两位指挥官在作风、方法、意志上，就如同在国家利益方面一样，是有根本差异的。蒙巴顿第二天在视察途中眼睛里钻进一个竹屑，只好到第二十总医院动手术，此事，美国士兵中却流传说，是乔大叔"赏了这位英国佬眼睛一拳头"。

就在此刻，在最高司令“失去战斗力”的时候，日军向英帕尔和阿萨姆—孟加拉铁路发动了进攻，这次进攻是一次赌博，其破坏作用原可能与珍珠港事件的破坏作用一样。

自从日军在征服欲的驱使下以比预料还快的速度于1942年攻占缅甸以来，日军战地将领和日军缅甸战区司令部同设在东京的帝国司令部的陆军将领们在是否进攻印度——即便只是攻到曼尼普尔和阿萨姆地区也罢——以便拔除盟军可能用以进行反击的基地的问题上争执不休。许多日本人认为，史迪威当年撤出缅甸时所经过的地形险恶、没有道路、疾病蔓延、被英国人迄今视为印度屏障的那加山区，对于想打过来的盟军来说，似乎已不是那么险恶难行的地方了。反对发动进攻的人争辩说，要让一支部队大举穿过那加山区或者期望盟军会发动反攻是不切实际的。日本人决定留在原地巩固所获得的成果。但是1943年，云南部队和拉姆加尔部队的集结，温盖特下属部队看来是为即将发动的进攻做侦察的第一次渗入，阿萨姆空军基地日益增多的活动，所有这些看来都表明盟军方面有进攻意图，从而使得赞成对英帕尔发动攻势的日军将领们的论点更有力量了。

日军在日本驻缅甸第十五军军长牟田口将军的领导下于1943年夏天开始制订计划。牟田口是一位身材粗矮、圆脑袋、厚嘴唇、目光凶狠的军人，他毫不理会难以解决的补给问题，他的参谋人员都怕他的暴躁脾气，没有敢提出他们的疑问。牟田口的计划要求他的部队于一个月内抵达指定目标，部队在这期间要带足维持生命的大米，再加上能够掠夺到的食物和可以在前线军需处临时储存的东西。日军预计一个月

内能够拿下英军在英帕尔地区的仓库。根据计划，这支部队要向科希马前进，在雨季前到达横跨铁路的迪马普尔，建立牢固的阵地。为了支持这次进攻，日军赶修了一条通到钦敦江畔的霍马林的公路，同时日军总部仍在进行辩论和争吵。直到1月19日，即达鲁平原行将落入北部战区部队手中从而预示日军要丢失缅甸北部之时，东京总部才下令执行向英帕尔进攻的计划。

虽然英国人知道日军将要发动一次攻势，空军侦察不断报告敌军运动的迹象，并发现了通往霍马林的公路以及乌尤江上集结的木筏，然而英国人未作任何准备。不到一个星期，牟田口的部队渡过了钦敦江，第二个星期翻山越岭到达距离英帕尔三十五英里的乌克鲁尔的郊外，第三个星期，3月29日，日军切断了英帕尔通往科希马的公路，使英帕尔除了依靠空军联系以外成了一座孤城。东京电台宣布了这次进军，说即将攻克印度。整个日本帝国到处都响彻"万岁"的欢呼声。实际上，日军的这次进攻原不打算超过曼尼普尔，虽然日军指挥官们当时希望这次进攻的成功会使攻势进一步向前推进。

真正的和重大的灾难威胁着整个东南亚司令部。如果在经过两年的准备并且获得空军优势以后，英国第十四集团军现在从英帕尔后撤，把印度边境省份丢给敌军，这对印度精神上的影响将是无法估量的，阿萨姆同加尔各答的联系就会被切断，恢复人们的意志(即使不是军事手段)来收复阵地会困难得多。积极调军进行防御的斯利姆将军要求立即把派去增援若开的那个师调回来，这就意味着又要求助于空军运输队。

在中国问题上一直小心谨慎的罗斯福告诉蒙巴顿，他不想出面再次调动空军运输队的飞机，但是新的紧急状态是燃眉之急，3月14日出院的蒙巴顿下达了调动飞机的命令。

萨尔坦将军向蒙巴顿提了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为什么英军总部人员两年来一直声称英军无法经这条山路派出一支远征部队，为什么日军三个师团能大举从相反方向经过同样的山路威胁英帕尔呢？蒙巴顿的解释跟东南亚司令部通常的解释一样：由于兵员和后勤原因等等，但是真正的原因是意志。在军事问题上同在涉及人的其他问题上一样，意志是决定事情的因素。有些情况是可以改变或削弱人的意志的，但是在进攻或防守的问题上，意志是必不可少的，缺乏意志就会招致失败。英国人固守印度的意志是坚定的，退却是不能容许的，英军也是按此种精神作战的。从若开空运一个师部队的工作结束以后，空军运输队的飞机又在英军前线继续出力两个半月，以保证英帕尔和被围困的科希马的守军得到食物。空军运输队同英国皇家空军一道，为十五万三千人运去了供应物资，并把伤员及非战斗人员撤了出来。

对于史迪威来说，日军第一个月攻势期间的前景是骇人的。万一英军撤退，日军切断阿萨姆—孟加拉铁路，北部战区部队就会在缅甸陷入孤立无援境地，他所有的努力和希望就会化为乌有，除了再次丢脸以外没有其他可能，除了经喜马拉雅航线败退到中国以外，别无其他办法。史迪威一听到日军发动进攻的消息时写道，“这一下子要毁掉一切”。那天夜里又下起雨来，史迪威的阴郁简短的概括是“上帝跟我过不去了”。他打电报给马歇尔，说他现在需要帮助；必须使委员长

投入Y部队。

现在迫切需要在萨尔温江开辟第二条战线，蒙巴顿就象韦维尔1942年认识到他的困境一样，突然向他一贯瞧不起的中国人求援。他要求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火速亲自向蒋介石发出呼吁。蒋介石在答复罗斯福的急信中仍然坚持说中国太弱，它的经济遭到的破坏太大而无力发动一次大战役；共产党人在华北地区有得势之虞，日军准备在长江以北发动进攻；在这种情况下，要中国军队从云南发动进攻是"不可能的"。由于蒋介石已经派了四十五万军队围困共产党人，云南的部队很难对那种形势发挥重要作用，尤其还因为中国在运输方面困难很多。蒋介石的答复惹怒了罗斯福，罗斯福在他的地图室里可以从插着针的地图上了解战场的形势。他看到与中国军队隔着萨尔温江对阵的只有一个师团的日军，罗斯福打算给蒋介石一个尖锐的答复。

史迪威继续作出新的努力，想推进到日军第十八师团的南面，形成对该师团的包围。他现在的目标是越过坚布本并在沙杜祖地区同敌军交火，同时再派一支部队从背后包围敌人，切断敌人向卡迈的退路。卡迈是日军在孟拱谷地的主要阵地。"抢劫者"部队和第三十八师的一个团奉命执行这个任务，他们要进行八十五英里的行军，同时史迪威压阵促使中国军队在正面采取行动。"项目：推一下动一下，至少可以说是巧合，每次我推一下，他们就动一点。"

第六十六团于3月19日史迪威六十一岁生日那天拿下了坚布本。手下人做了一个写有"乔大叔生日愉快"字样的巧克力大蛋糕，这在当时的森林环境中似乎是奇迹，蛋糕放在大

树下的一张临时搭起来的行军桌上，为生日增添了欢乐气氛。史迪威穿着一件旧汗衫，用餐刀切开蛋糕，把蛋糕分给在场的军官和从这里经过的士兵们。两年来史迪威的脸色变了很多。同他在战争开始时结实健壮的外表相比，他现在显得衰老，嘴角和眼角都出现了深深的皱纹，头上也长出了一撮白发。史迪威当时正患肝病，但是他决心要及时实现他的目标，拒绝住院治病。马歇尔给他的生日贺电要他确信，“你的工作很可能对这场战争以及中国的前途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他的参谋人员从重庆发来的电报说，“您的司令部中的每一个人对您都是钦佩、敬爱和忠诚的。”《中缅印战区简报》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位引起争论的战区司令的分析性文章，文章的结尾是，“将来当这次战争只是成为一种记忆的时候，史迪威在亚洲的整个经历就会公布出来，那将是一个谦逊的人手持宝剑，跨步把灾难之龙斩于洞穴的一部史诗。”

灾难之龙现在逼近了史迪威。史迪威3月23日写道，“我的天呀，日本鬼子到了乌克鲁尔。”斯利姆的告急电要求史迪威“把Y部队调来”，好象经他要求，史迪威就可以调遣Y部队似的。情报人员报告说，一千名日军沿着“抢劫者”部队的路线开过来（“我的神经一阵紧张”）。好象又有了珍珠港事件以后的那种“衰竭之感”。史迪威努力使自己耐下心来，“竭力忍着火气和高血压……我总有一天会爆炸成一千块碎片……我是个军人，对此我毫无办法可想。”但是，当其他人对日军向英帕尔发动的进攻感到担忧的时候，史迪威却说，“如果说日本鬼子在我们背后，我们也在他们背后。”

戴维斯从华盛顿回来向史迪威汇报情况。他说“公理”行

动计划已被打掉，但是他认为罗斯福对委员长“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史迪威决心亲自试一试，“如果我说不动小人物，这个季节就一切都完了”。史迪威于3月27日飞到重庆同委员长会晤，史迪威在这次会晤中即使未得到Y部队，也至少得到了蒋介石的保证：给他两个师加强北部战区部队，对密支那发动最后进攻。这个保证过了一个月才实现，第十四师和第五十师以创记录的八天时间空运到了阿萨姆，部队在阿萨姆经过武装和休整以后，又乘飞机前往胡康的中间集结待运地点。3月30日回到前线以后，史迪威发现长期患心脏病的梅里尔身体非常虚弱，他只好不顾梅里尔本人的反对硬是命令他去利多医院治疗。现在的天气，六天就有五天下雨，更糟糕的是，前线的局势看来象是日军就要从英帕尔—科希马之间突破，推进到公路和铁路沿线。

史迪威处于一种痛苦的境地。如果不把后方安排好，他决不能在前方进军。他必须弄清楚英军能否坚守阵地，他决心耍一个有风险的花招来试验一下形势。史迪威要求蒙巴顿和斯利姆4月3日在阿萨姆空军基地之一的乔哈特同他会晤。史迪威在会议上提出把第三十八师撤走（该师有两个团当时留为后备部队），把该师交给斯利姆帮助阻止日军前进。从中国空运第十四师和第五十师的工作已于同一天即4月3日开始。即使这样，由于调走提高了战斗力的第三十八师，如果说不会使整个战役陷于停顿，那也会放慢整个战役的速度，使拿下密支那的希望归于破灭。但史迪威是否真的预期英国人会接受中国人的帮助，那是有疑问的。史迪威在印度陆军几个师保卫印度西北边境省的问题上经常进行挖苦讥讽，他

的这个建议可能是他进行讥讽的一种方式。如果斯利姆接受他的建议，史迪威就没有任何选择了，因为日军在他后方的突破就会最终使他的这次战役完蛋。

据斯利姆说，虽然史迪威“明显地恼火和失望，但是他没有提出批评也没有进行指责”。而斯利姆自己(按他的堂而皇之的说法)由于认识到史迪威现在进攻是大好时机，拒绝了这个建议。事实上，要把中国军队调来帮助守卫印度的英军阵地，其害处几乎同把这些阵地丢给日军一样。虽然史迪威觉得斯利姆“紧张而又不安”，但是斯利姆确信他能够阻止日军的前进，并保证北部战区部队的交通供应线在十几天内不被日军切断。他说，英帕尔之战是决定性一战，他保证英军不会败北。

如释重负的史迪威返回了设在沙杜祖的司令部，召集了一次由中美双方高级军官参加的会议，命令“向卡迈全速前进”。在卡迈三十英里以外就是沿广阔的伊洛瓦底谷地边缘穿过孟拱和密支那的铁路。为了防止北部战区部队夺取铁路，守路日军奉命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孟拱。“抢劫者”部队的两个营经过一次紧张的行军和同日军的几次小冲突，于3月23日赶到以切断卡迈以北二十英里的敌人后方的公路时，他们的出现遭到敌人的反击，被迫退入山中。这两个营进入一处山头阵地，在日军发动的猛烈的围攻下坚守了十一天，后来由于日军的背后受到中国军队和“抢劫者”部队第三营的威胁，日军才于4月8日自动撤退，这一次对日军的包围又没有收住网口。

在南边，钦迪突击队的行动有效地阻止了敌人对史迪威

侧翼的进攻。3月24日，温盖特因飞机撞到山上而丧生。温盖特在死前不久同斯利姆的最后一次见面时，临走的时候在门口转过身来对斯利姆说，“你是东南亚司令部中不希望我丧生的唯一高级军官！”他的死使远程深入部队的效能遭到了很大削弱。斯利姆写道，“他创建了这支部队，鼓励它，保卫它，赋予它信心。这支部队是他生动的想象力和耗费极大精力的结果。没有其他任何人象他这样培养和关怀这支部队。”旅长威廉·朗泰涅准将奉命接替温盖特的职务，他后来同史迪威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因考虑到北部战区部队把日军从英帕尔吸引过来，钦迪突击队的唯一任务就是支持史迪威的作战行动，接受史迪威的全面指挥。斯利姆同史迪威联系的联络官乔治·迪米特里艾迪上校认为，“如果没有北部战区部队的战斗，日本鬼子就会在英帕尔取得胜利。”

在继续努力逼近卡迈的过程中，孙立人和廖耀湘明显地在拖延时间，史迪威现在确信他们是奉蒋介石的命令这么做的。中国军队没有执行史迪威再三下达的要他们前进的命令，坦克部队的中国军官告诉布朗上校，只有蒋介石认为保险并允许进军，廖耀湘才会发动进攻。关于这个问题，在史迪威的质问下，廖耀湘承认委员长直接同他联系，但是命令他“即使史迪威错了”也要听从史迪威的指挥。但是廖耀湘仍然拖延，这使史迪威确信，肯定是密切注意英帕尔战役形势的蒋介石命令廖耀湘小心谨慎。

史迪威总是呆在下面，这在各总部中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思想混乱和愤恨。重庆、昆明、德里之间的电报来往频繁。萨尔坦告诉史迪威，他的副手中没有一个能明智行事，他要求史

迪威在阿萨姆召开一次会议，要史迪威在会上谈谈他的意图，“使我们都一致行动”。史迪威却决定要他们到孟关开会。听着窗外的雨声，计算着日期，史迪威无法离开，担心他一走，部队就会放松一天的压力。在所有的司令官中（无论是什么战区或什么前线的盟军司令官还是敌军司令官），唯独史迪威无法指靠战地指挥官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命令。遵从命令归根到底是由于担心受制裁的心理，但是孙立人和廖耀湘都很清楚，能给他们制裁的是蒋介石而不是史迪威。

在缅甸战斗受到大肆宣扬的时刻，Y部队按兵不动在重庆引起了人们的非难，并引起了许许多多对于蒋介石的解释不满意的中国人的不安。但是蒋介石依然无动于衷。罗斯福一再敦促蒋介石采取行动，罗斯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或者说是被陆军部拖着迈出了这一步——用他曾经拒绝向蒋介石使用的对待摩洛哥苏丹的语调同蒋介石说话。罗斯福4月3日给蒋介石的电报说，“我无法想象，你的美式装备的Y部队无法向目前已经力量衰竭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进击。我认为进击时机已经成熟……不要再作任何拖延。……萨尔温江畔有一师团力量已大大削弱的敌军与你们对峙……我们一年来装备和训练你的Y部队，就是为了利用这样一个有利的时机。如果不把Y部队使用到这个共同事业中，我们作出巨大努力空运装备和提供教练人员就无必要了……我的确希望你能够采取行动。”罗斯福的电报锋芒不外露但是语气强硬；电报的意思是要不然就另作打算了。据蒋夫人说，蒋介石对于罗斯福电文的语调很是恼火，很可能不予回答，以此作为他

不丢面子的办法。

这时候，美国的不耐烦情绪终于达到了要求中国对于美援作酬答的地步，虽然象某些历史时刻的情况一样，这是谁的决策还不清楚。罗斯福没有去佐治亚州的温泉度假。史迪威同马歇尔联系，收到的答复肯定了下面一点：如果Y部队按兵不动，美国就停止向它提供租借法案援助。史迪威在一封信中指示他在重庆的参谋长赫恩将军："我完全同意乔治的意见。如果委员长不顾他自己的诺言和我们的种种努力而不愿打仗，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再浪费我们一吨物资了。我建议把向中国任何部门运送物资的飞机转用来开展空军作战活动。"为了再次避免使蒋介石丢面子，接着进行的谈判是在最高一级指点下由赫恩和何应钦在工作一级举行的。赫恩告诉何应钦，除非使Y部队投入作战，否则目前每月经喜马拉雅航线运输的物资就转给第十四航空队。委员长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震惊，被迫同意采取行动，但又不必亲自出来作出让步。赫恩提出上述条件的两天以后，何应钦于4月14日在命令Y部队各师越过萨尔温江的命令上盖了官方的大印。何应钦还特地告知马歇尔，这个决定"是中国人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主动作出的"。

美国派来任Y部队参谋长的多恩写道，"要是他们提前三个月行动就好了"。多恩向史迪威报告，Y部队各师仍然没有满员，但是军官们都渴望完成这次使命。卫立煌的参谋长肖毅肃很能干，完全赞成出击。负责供应的卢泽将军"是一团火。每当他说汽车将要到达时，汽车已经到达一天了。"就连何应钦也赞成这次出击。但是这一仗立即显示出中国军队特

有的拖拖拉拉的老毛病的兆头。“我的上帝，”史迪威打电报给多恩，“他们又开始玩老一套了。要提前三天通知我，否则切勿自作主张。”

史迪威现在向密支那发起了最后的进攻。由于拖延和几次未能消灭日军第十八师团，加上孙立人和廖耀湘的故意敷衍，现在除了孤注一掷以外没有他途。4 月 21 日，史迪威决定派一支由“抢劫者”部队和中国军队组成的突击队，越过古蒙山进行一次迅速的秘密渗透，夺取密支那的简易机场，让飞机把夺取密支那城镇所需的增援部队和重武器运进来。克钦人告诫说，除了旱季，驮武器牲口是难以通过陡峭的古蒙山脉的。但是史迪威决心试一试。除了第二十二师的一个炮兵连以外，被挑选来参加这次行动的中国军队既不是孙立人的部队，也不是廖耀湘的部队，而是从第三十师调来的一个团和从刚刚到达的第五十师调来的一个团。即使如此，史迪威还是觉得，如果没有美国军队在前面开路，他无法指望这些中国军队能有什么进展，因此有必要把已受战争创伤的“抢劫者”部队的残部再派来担当一次先锋。

这是一个重大决策，因为美国军人由于行军打仗已弄得身体不适，晕头转向，精疲力竭，他们认为自己已无能为力，需要撤下去休息休息，他们的想法是对的。现在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人主要由于患病而撤走了；原来的三千人中还剩下一千四百人。他们虽然十分苦痛和愤怒，但是这些人是史迪威能够指望按自己命令行事的唯一部队。亨特上校虽然开始憎恨史迪威，但他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受到过要严格服从命令的

教育，而梅里尔则是随时准备恢复全面指挥。“抢劫者”部队的九十天使命将于5月7日满期，但是不管九十天的使命是否满期，史迪威认为战争需要他们继续干，他们的军官也表示这支部队能够胜任。

但是士兵们想的则不同。在他们迄今所走的三段路中，共走了将近三百英里，途中路滑难行，障碍重重；与密林搏斗；使劲拉跌倒的驮重牲口；等待飞机空投；吃的是应急冷口粮；睡的是潮湿的地面；他们忍饥挨饿，身体发烧，口渴难忍；但是最主要的是担心——每前进一步就使他们更深地进入一块敌视的国土，更靠近使人惊恐的敌人。据查尔斯·奥格伯恩中校叙述，最糟糕的是人们的“危险”感，这比什么都糟。由于觉得他们得不到赏识，由于他们认为史迪威过于奖赏和表彰中国军队而感到气愤，美国兵的士气不振。如果这位指挥官将军亲自给他们鼓励、给他们嘉奖、提升、授勋，或者象他赏识中国人那样赏识他们，即使有种种困难，许多不满情绪都会烟消云散的。史迪威在瓦劳本之战后曾向这支部队表示祝贺，但是同潘兴的一贯做法一样，史迪威对于向他的同胞们授勋是掌握很紧的。史迪威和梅里尔都不是图舒服的人，正如史迪威在这次密支那激战之后的一次谈话中所讲的那样，他认为美国军队不需要别人“拍拍肩膀表示赞赏或者紧紧握手表示祝贺”才去打仗。

“抢劫者”部队经历了在恩庞加的血战和惨重伤亡后，接到的命令不是叫他们返回印度，而要他们继续前进，翻过一座六千英尺高的山口，前往一个比以前的条件更艰难的地方。这时，“抢劫者”部队的幸存人员惊慌万状。他们简直无法相

信“我们的营长和我们队的指挥官们以及我们营团的军医们都串通一气，奇异地认为这支部队的大部分人员的状况还可以继续作战……”他们觉得是把他们派去送死，原因只是某人办事失当，或者是因为史迪威决心要向中国人创造一个记录，“必要时，牺牲美国在这个战区的一支步兵部队也在所不惜。”

史迪威告诉梅里尔，他知道他对这些士兵的要求过分了，但是他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史迪威授权梅里尔，一旦拿下密支那简易机场，“如果一切按原计划实现，不必等候进一步的命令”就开始撤退“抢劫者”队员。由一千四百名美国兵、四千名中国兵和六百名克钦突击队员组成的特遣队于4月28日开始行动。同时，孙立人和廖耀湘好象脱掉了无形的僵绳，重新向卡迈挺进。也许是受到英军4月20日解除科希马之围的鼓舞，蒋介石大概允许孙廖二人行动了。

现在，天上乌云翻滚，大雨倾盆，小道成了河流。史迪威焦急万分。他是极其秘密地组织和派遣这支特遣队去密支那的，甚至连蒙巴顿都未让知道，因为他担心万一部队行动失败，东南亚司令部会幸灾乐祸。史迪威在这之前每次同斯利姆谈到特遣队行动的目的时，总是要求斯利姆不要把此事告诉任何人。虽然密支那是史迪威作战计划中的最终目标和最高目标，这一点在这个战区并不是什么秘密，罗斯福2月25日给丘吉尔的信中也具体地提到过此事，但是蒙巴顿的手下人员却向他保证，密支那不可能拿下，即使拿下也难以守住，即使能守住也不值得去守，所以蒙巴顿认为史迪威至多不过能在雨季在孟拱谷地取得一个栖身处。4月间，东南亚司令部仍然没有想到在英帕尔取得胜利时乘机收复缅甸北部，反

而越来越在海上推进，若是不能向苏门答腊发动进攻就向仰光发动攻势。对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敦促他执行原先制定的夺取北缅的计划，蒙巴顿4月14日答复说，按原定日期攻克北缅地区是“办不到的”，即使推迟日期要攻克该地区也是“不妥当的，不应当想干这种事”。

4月14日，东南亚司令部把它的总部从德里迁到南面一千五百英里的锡兰的康提，明显地向贯彻海上战略的方向前进。锡兰为海军在印度洋提供了基地，它离马来亚和苏门答腊近多了，但是比德里距离缅甸地面战场更远了。

美国紧接着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战略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5月4日重申打算在菲律宾、福摩萨和中国沿海登陆，正如金海军上将满怀信心地所写的那样，在中国沿海登陆的目的是供应军需品和“利用中国的兵力作为在亚洲大陆打败日本人的最终陆地力量”。两年来学到的许多东西说明，使中国领导人执行美国的作战计划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是不会一吹哨子就能使他们行动的。然而过去的想法又是不容易丢掉的。海军尤其渴望打仗。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认为，如果由于日军力量的削弱，盟军能够绕过菲律宾，那么，进程就能缩短，他只是在给金上将的信中提到这种可能性。但是，这种看法使麦克阿瑟将军“大发雷霆”，发表演说大谈他的“神圣职责”——“他要全力拯救一千七百万人民——等等”。尼米兹和金一致认为，应由史迪威从同中国军队汇合的观点来提出在中国沿海登陆的最好地方，还应尽早同史迪威协商最后使中国军队作战的问题。

陆军的想法中较多的是把中国作为重型轰炸机基地，不

是利用中国的军力去打仗。史迪威得到通知说，他所指挥的空军部队的首要任务是提供军需品，以便在11月份对菲律宾、来年2月份对福摩萨发动进攻。出于这个打算，参谋长联席会议5月3日给史迪威发出一条新指示：他的主要目标是拿下密支那，这一行动与东南亚部队司令部没有关系，他的整个使命的新目标是打通前往中国的陆路，并在中国境内采取军事行动，对太平洋战争予以最有力的支援。

虽然没有公开承认，但这实际上标志着美英两国在亚洲悄悄地各干各的了。谁也没有详细地这么说。东南亚司令部中的美国人员随着他们的英国同事们一道迁到了康提，仍然象以前一样行使职能。但是，穿过太平洋直接挺进——同时得到史迪威穿过缅甸打向中国的行动的支持——这时已是既定政策，尽管英帝国在向外移动。

已经作好的安排是，进攻密支那的特遣队在他们确信四十八小时之内能到达目标时，就向运兵飞机发出信号。在这支特遣队在山里以每天四、五英里的速度艰难前进的同时，史迪威率部经孟拱继续向前推进，他心神不安地等待着特遣队的信号。天气则一反常态，一连有好几个晴天，可是他又受到了拖延战术的阻挠。尽管越来越疲乏（奔到山的指挥所里，劳累不堪……上气不接下气，两腿不听使唤……我步履艰难地走进指挥所，觉得自己象个老人了），史迪威还是强使自己前进到各个指挥所，继续用使中国人丢脸的办法促使他们行动。“叫他们打仗，不然我就沿途赶着他们到前线。这能使他们前进，而且是使他们前进的唯一办法。”但是战斗的伤亡使人感

到担忧。“第二十二师有五十七名连长阵亡。在这种情况下无法促他们上阵……我觉得毫无办法。”

攻打密支那的特遣队缓慢地前进着，他们在山中攀越，有时用手和膝部爬行，在泥泞斜坡上掘出登脚的台阶前进，辎重队的驮畜有半数累死，或者滑下山坡跌下了深谷。特遣队包围了日军占领的一个村庄，经过一次激烈的战斗拿下了这个村庄。三个作战小队之一的指挥官金尼森上校和另外几个人死于斑疹伤寒。两个作战小队口粮吃完以后，就在预先确定的开阔地停下来等待飞机空投食物。亨特率领的作战小队继续前进，于5月14日发出了四十八小时内抵达的信号。正当史迪威在孟拱谷地焦急等待的时候，第十航空队运兵飞机队指挥官奥尔德将军前来与他汇合。5月15日，史迪威收到下面部队发来的这个信号。5月16日，亨特上校率领的作战小队运动到离密支那简易机场只有两英里的一个临时露营地，以便从这里向机场的守敌迅速发动突然进攻。原来担心沿途同日军巡逻兵交火会引起密支那日军守卫部队的警觉，但克钦侦察人员没有发现日军任何戒备的迹象，他们报告说守卫机场的日军兵力相当单薄。事实上，当时守卫在密支那的日军只有七百人。

5月17日上午十时整，第五十师的第一〇五团向密支那简易机场发动了进攻，“抢劫者”部队的第一营奉命夺取附近伊洛瓦底江上的一个渡口。袭击完全出于敌军预料，简易机场很快就被包围拿下。十时五十分，史迪威收到梅里尔从特遣队总部发来的预先准备好的“进入圈子”(即“到达机场”)的信号。亨特上校确信他已牢牢控制机场之后才发出肯定信

号。一接到"进入圈子"的信号，奥尔德将军就乘一架侦察机飞往密支那简易机场上空，但是他返航以后报告说什么也看不清。"我们只好束手无策地等待"，史迪威写道，史迪威那天不时地把焦急心情写在他的袖珍日记本上。一直等了四个小时，下午三时三十分，"威尼斯商人！"即"运输机可以着陆"的信号终于来了。史迪威在日记本上只写下"欢呼！"一词，他命令炮兵增援部队马上出发；"第一批于四时出发……告诉他们连夜前进……这会使英国佬火冒三丈！"

的确是这样。要在东南亚攻克的第一个日军重要阵地被史迪威的特遣队拿下了，而英国军队连若开还没有拿下来。盟军最高司令蒙巴顿猛然发现，他的部队中的一支队伍到了密支那，这使他极为尴尬，因为他对这次已经打响的出征事先并不知道。虽然，鉴于参谋长联席会议5月4日的指示，蒙巴顿不了解情况只可能是由于他注意其他方面了。蒙巴顿对于史迪威事先未告知他极为恼怒，丘吉尔的尖锐质问更使他狼狈不堪，丘吉尔要蒙巴顿解释，"美国人用了什么样的高招使我们在密支那难堪。"舆论界对于史迪威的这次突然行动感到意外，但是在内部关系紧张了一天半以后，以蒙巴顿的名义给史迪威发了一道讲得很漂亮的嘉奖令。嘉奖令的内容是，"在你的英勇领导下，加上你所率领的美国军队和中国军队的勇气和耐力，你们完全出敌所料，夺取了密支那机场，你们取得了一个非常杰出的成就。"穿越古蒙山脉被称为"将载入军事史册的一个功绩"，他还特地提了钦迪突击队一笔，说他们"在密支那及其以南地区之间切断了日军交通线"，因而功劳也有他们一份。包括魏德迈在内的全球战略家们乘飞机一直飞到

这片丛林中的开阔地，与他们共享取得了曾经被称为不可能实现的胜利的喜悦。

这一仗是史迪威两年来屡遭挫折后取得的第一个胜利，这对于他焦虑不安的心灵尤如甘露。但是这次胜利并未最后彻底完成。胜利立即受到了不幸和逆转的威胁和干扰。北部战区部队的所有人都指望，密支那简易机场的启用，会使增援部队源源抵达，因而有助于迅速拿下密支那本城。史迪威决定让中国军队获得夺取密支那的光荣；第一五〇团的两个营于5月17日下午向密支那进发，由于在黄昏时分受到日军狙击火力，这两个营陷入混乱，在慌乱中互相开火，在无法呼应的情况下相互厮杀，直到把双方都撤出来以后才停止。美军部队中也出现了一时的混乱，梅里尔和亨特事先要求运送步兵和食品，第十航空队却给他们运去了一个高射炮连。

人们当时还没有认识到这些错误造成的全部后果，仍然抱有很高的期望，史迪威第二天上午到达简易机场，至少还有十二名记者随行。乘飞机先来掌管指挥权的梅里尔到机场迎接史迪威，史迪威走下飞机时，两人高兴得紧紧拥抱，放声大笑，记者们摄下了这一镜头。可是那一天的情况相当糟糕。第一五〇团第二次袭击时仍然出现了第一次袭击时的那种混乱状况。“抢劫者”队员接到了要他们继续行动的命令，他们原先坚持行军是因为认为，只要夺取密支那简易机场，就会把他们空运到利多去。亨特急忙召集掉在后面的两个作战小队。飞机给这两个小队空投的食物，有时没有投放，有时投错了地方。许多人一连好几天没吃东西，许多人因为身上生了脓疮，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患痢疾的人干脆把裤子的后片剪

掉，免得打起仗来碍事。用梅里尔的话来说，他们“有点可怜但是看上去仍然象支出色的部队”。5月19日，梅里尔由于心脏病复发而躺倒了，只好撤走。

日军从东、北、西面的各地抽调守军，火速向密支那增援。一个星期以后，尽管有钦迪突击队在南面阻击，日军在密支那的兵员增加到三千，两星期后增加到五千。日军象在太平洋诸岛的战争中一样拼死守卫。由于盟军没有能立即拿下密支那，雨季日益临近，局势僵住了，陷入了无法摆脱的种种麻烦、争吵和失误之中。史迪威十分忧虑地寻思，“天呀，在密支那会有怎样的结局呢？”为了继续向孙立人和廖耀湘施加压力，要他们肃清孟拱谷地的敌人，使公路能沿谷地继续向前修筑，史迪威留在北部战区司令部中。“下雨——飞机无法降落，我们就无法运输军队……这就是令人愁得要命的时刻，使人觉得如果死去倒好了。”6月间总是连续不断地下雨。即使在能见度为零的气候中，空军仍然向密支那地区运送兵员和物资，用一直在前线任职的西格雷夫的话来说，飞行员们好象是“靠嗅觉找到密支那机场的”。但是情报部严重地低估了守卫密支那的日军人数。中国军队虽然由于新调来几个团加强了力量，仍然不能击败固守的敌人。正如史迪威在一次视察时不得不承认的那样，“‘抢劫者’部队已筋疲力竭。”

“抢劫者”队员们觉得他们受了骗，给他们许下的诺言没有兑现，再也不愿打仗，不仅不信任而且痛恨他们的战区司令。他们变成了一支支离破碎的队伍，一心想离开密支那地区，离开缅甸。患病的人以每天七十五至一百人的速度撤出，病员撤离的标准是连续三天发烧华氏一百〇二度，但是这支

部队的骨架仍然保留着。作为盟军司令，史迪威觉得他不能在让中国军队和钦迪突击队继续打仗的同时把美国军人撤走。史迪威在整个这段时期中和朗泰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因为同"抢劫者"部队一样只剩下少数疲惫不堪人员的突击队坚持要撤走。有一次，他们把史迪威认为非常重要的阵地放弃了。既然史迪威愤怒地拒绝把他们撤走，他也就无法给美国军人以不同的对待了。奉命阻击日军反攻的"抢劫者"部队的最后一批人，在枪弹炮火中睡着了，其指挥官麦吉上校在指挥作战时昏倒过去三次。一个士兵后来遗憾地说，史迪威去视察的时候，"我的步枪瞄准了他，我原可以打一枪，谁也不知道这个狗娘养的是不是日本鬼子打死的。"

史迪威有时曾想让三名美国指挥官接替梅里尔的职务。大多数情况下，部队由博特纳将军负责。6月份的食品和物资供应下降到了最低限度，因为日军用迫击炮轰击机场，运输机无法降落。有的时候，手边只有一天的存粮。在6月初的危机阶段，曾经有迹象表明日军可能夺回机场。史迪威召见了第三十师师长胡将军和第五十师师长潘将军，告诉他们"无论如何不得后退一步"。现在要是把密支那地区丢掉是受不了的。史迪威不愿再让中国军队付出伤亡，他命令从修路的工程兵中调出两个营，他按照利文沃思军校的原则，在紧急情况下把作战工程兵作为步兵后备队使用。虽然名义上叫作战工程兵，这批筑路人员从接受基本训练时起连枪都没摸过，所以开始时一点也不顶用。刚刚从美国到达印度并且未经训练就空运到密支那地区来接替"抢劫者"部队的两个营的情况也是一样糟。"他们在许多情况下简直被日本鬼子吓坏了"，博

特纳报告说；他们不愿按军官的命令行事，拒绝发动攻击，在炮火中逃命。

在身居中缅印战线尽头的史迪威看来，美国军队曾似乎是能采取可靠行动的。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博特纳来了一封可怕的信。”史迪威还沉痛地加上两句：“美国军队靠不住。这真令人难以置信。”为了保持一支美军力量，而且由于知道中国军队的直接战斗伤亡率比美军高得多，史迪威现在命令“抢劫者”部队中已经恢复健康能够上前线的人全部返回前线。这是最后的打击。据奥格伯恩讲，五三〇七部队所有的人现在认为，史迪威的名字是“斗牛场上的红旗”，奥格伯恩本人认为，史迪威显得“冷酷无情，完全是铁石心肠，毫无恻隐之心”。从“抢劫者”部队的观点来看是可以理解的，鉴于史迪威的真正性格，这次的决定只能看作是中缅印战区的又一个悲剧。第二十总医院的拉夫丁虽然对史迪威命令“抢劫者”部队人员返回前线持有异议，但是他认为史迪威“是我所认识的指挥官中最关心部下的”司令。四个月以后，军人小报《美国人》称史迪威是“抢劫者”部队中“美国兵最喜爱的人物”，史迪威取消了不准他的战区美国兵饲养玩赏动物的规定，（“士兵养玩赏动物是自然的”），从饭厅和咖啡间取下了“只准军官入内”的牌子，禁止军官们与美国陆军女兵队的女兵们约会，为的是使普通士兵也得到机会。他的事迹很平常，因而不能说他是巴顿式人物。

在中国，在日军发动危险的新攻势的威胁下，形势看来不妙。蒋介石仍然完全相信陈纳德的论点，即空军有能力替他

同日军作战，能保卫中国各处的空军基地。蒋介石6月3日要求史迪威“立即”到重庆见他，他要求史迪威给第十四航空队增拨飞机、物资和燃料。由于要对付即将变得更危险的局势，史迪威急急忙忙赶到重庆，于6月4日和5日在重庆呆了两天，尔后又尽快地返回使人“忧虑、忧虑、忧虑”的缅甸前线。史迪威急忙把阿姆斯将军从昆明召来，要他在战线后方进行组织工作，以便对工程兵和“抢劫者”部队的补充兵员进行基本训练。这批部队每天的训练、打仗、睡觉时间各占八小时。部队得到了整顿和加强。密支那地区仍然控制在手中，但是“神经仍然在受折磨。我们雄心太大了吗？敌人能压住我们吗？日军要突然袭击吗？我们进行反击吗？我们的部队能坚守住吗？伤亡会太重吗？我可以说已经近于厌烦了……”

就在这些事使人不安的时刻，蒙巴顿提出了让钢琴家诺埃尔·科沃德演出的事。在蒙巴顿看来，科沃德的演出虽不如全球战略那么重要，但也足以称得上是一件要事。科沃德当时正在缅甸前线作巡回演出，蒙巴顿希望美国军队能同他一道欣赏这位音乐家的演奏。蒙巴顿要求史迪威派车把音乐家和他的乐队送到利多前线，这一要求遭到史迪威拒绝。史迪威之所以拒绝，也许是出于个人偏见，也许是因为有一种看法：中国军队和美国士兵欣赏不了科沃德的才能，但是不管怎样，这伤害了蒙巴顿。他对惠勒将军抱怨说，“我觉得这是给了我一记耳光”，他在给史迪威的一封信中也表示了生气。惠勒建议史迪威就此事向蒙巴顿表示歉意，康提和沙杜祖之间为此事的信件来往频繁。科沃德最后到了利多，据说那里的人对待他的首场演出“非常平淡”；而在第二十总医院第二次

听他演奏的士兵们“奉命要对演出表示出欣赏”。史迪威打电报给萨尔坦，“要是再派这样的钢琴家来，你知道钢琴会落到什么样的下场。”

最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Y部队于5月11日出发，越过一万英尺高的山峰和萨尔温江峡谷慢慢向旧滇缅公路上日军占领的龙陵前进。这条路线位于喜马拉雅山的一条支脉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战场。这次战役错综复杂地体现出了中国军队以人力作出的特殊努力、许多方面的软弱无能、过分小心谨慎。士兵们的全部旺盛精力和始终不渝的服从和忍耐精神以及许多军官的活力和勇气被上头传下来的惰性和不愿有所作为的情绪断送掉了。不愿干、拖延和消极被动的具体表现是兵员的补充成了长期解决不了的问题。本来答应到1944年春给这支部队增派九万五千人；到5月份才派来二万三千人，后来补充兵员的工作就停止了。等到Y部队现在已正式称为中国远征军投入战斗的时候，其人员低于编制定额十一万五千人，在作战期间，每个月的损失人数在五千以上。

经过长时间的拖延，中国远征军在美国联络官和医疗队的随行下乘竹筏和橡皮船渡过了汹涌的萨尔温江，多恩随后在给史迪威的信中写道，“他们总算干得不错。”萨尔温江的两个渡口水深为六十英尺，江上到处是旋涡。肖毅肃说，千百年来占据这个地方的中国人从来没有能在这两个渡口挥师渡河。日军还没有弄明白，这支部队就出其不意地穿过峡谷，爬上了云雾缭绕而寒冷的群山。多恩写道，“部队甚至热情高涨”。远征军司令卫立煌将军“拍桌子，肖毅肃对着指挥官们

吼叫……他在尽最大努力”，但是就连卫立煌和肖毅肃也“无法使某些糟糕的家伙振奋起来”。他报告，第一天有三万二千人渡过了江，并在倾盆大雨中把上千头驮重的马、牛、骡子和脚夫带上了很陡的山坡。“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批欢乐的人”，他所到之处，“整个队伍里就发出挺好和问候的叫声，还有其他已在中国远征军中流行的美国用语”。能在这样条件下保持欢乐情绪、在这种条件恶劣的山区进军并且继续不断地行进的部队，“只要在领导和装备方面大加改善，什么事都能办到”。

但是，这一次的结果却又是令人扫兴的。中国军队于6月10日拿下了龙陵，但是一个星期后被日军发动的一次拼命反攻撵了出来，日军这次的反攻比在密支那的反攻打得漂亮。中国军队结集起来打算再次进攻。夺取龙陵是打通缅甸到中国的必经之路，一旦拿下密支那，史迪威手下的部队也从这条路进来。虽然中国远征军的人数以十比一的优势超过日军，但是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才再次拿下龙陵。

蒋介石对于盟军在密支那的漂亮仗印象很好，故而放松了他对于在缅甸的中国军队的限制。孙立人突然向前挺进，他率部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奋战，于6月16日拿下了卡迈。史迪威第一次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打个盹。我需要打个盹……我们总是一分不停地拼命干。”十天以后，在史迪威的严厉推动下，钦迪突击队第七十七旅残部同时从南面挺进，孟拱拿下了。在拿下孟拱是谁的功劳的问题上，内部又爆发了一场宣传战。

北部战区部队终于到达了位于伊洛瓦底谷地入口处的铁

路的两侧。由于伤亡过半，日军第十八师团的人数减到三千人，外加二千余人的其他部队，但是该师团成功地撤往曼德勒。除了孟拱和密支那之间的一小段以外，远至伊洛瓦底江源头的北缅地区现在都收复了，接着利多公路的建设工程节节向前推进。北部战区部队和中国远征军之间还有一段地方有待收复，然后才能会师。能否会师取决于能否保持住部队进攻的势头。

日军在密支那遭受的伤亡逐渐削弱了它的防守力量，盟军部队正逐步向前推进。在印度边境地区，当日军对科希马的包围被打破以及英帕尔和迪马普尔之间的公路交通于4月底恢复时，日军的赌博也输了，虽然战斗还在继续。牟田口将军的部队远陷在丛林小道上，得不到后勤供应，雨季中的大雨滂沱，日军一面继续作战，一面因饥饿和疾病而死亡。到6月底，日军这次异想天开的进攻失败了，部队泡在雨水中，陷入了不可收拾的混乱。到7月中旬最终接到撤退命令时，日军的伤亡数目(包括病员)达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原来的十五万五千人中，死亡六万五千人。1942年难民撤退时倒毙的山道上，现在又留下了一堆堆日本占领军的腐臭尸体。无情的战争浪潮在人们对之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向缅甸北部地区冲刷过去，现在又退了回来。

在中国，日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势：过去曾三次顶住日军进攻的长沙于6月18日不战而陷落；美国空军基地链条中的第一个环节衡阳遭日军包围。华盛顿政府惊恐不已。7月2日史迪威收到"乔治来的信"，其中有个意义不寻常的建议。史迪威有了新的任务。

第十八章 “整个亚洲的前途危若累卵”

1944年6月—9月

史迪威在缅甸的几个月中，中国的局势由于政治和经济瘫痪的关系，由于日军发动新攻势以及中国内部日益加深的不团结和不满情绪的影响，令人非常吃惊地恶化了。对政府不满的情绪在去年12月爆发出来了，那时蒋介石正在参加开罗会议，一帮年轻军官密谋要干掉何应钦、戴笠、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以及他们认为是贪污而又无能的其他高级文武官员，但是他们并不想搞掉蒋介石本人。这件事还未来得及动手，就被戴笠手下的特务们知道了。据说，后来公开出来的这次青年军官谋划事件牵涉到二百至六百名军官，结果有十六名将领被处决。蒋介石陷在他所信任的极少数人（孔祥熙、何应钦是他最重要的人）的狭小圈子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青年军官们感到不满的那些问题。

从1月到6月间，美国派驻昆明、桂林、西安、兰州等地的外交人员所写的报告中，列举了日益增多的事实，证明局势已恶化，人们有不满情绪。他们担心的是，中国会愈来愈丧失斗志，官场会充满前所未有的腐败现象，军队会失去战斗力，政府会陷入慢性自杀境地，一直干得很欢的事情就是准备向共产党人发动内战。在战争和敌人占领的长期重压下，中国团

结的外表在出现裂缝，军阀割据的局面又在出现。广系在两位国民党元老余汉谋、张发奎的领导下重新抬头，在南方各省影响很大的李济琛元帅也属于这个系，他对蒋介石政权的不满情绪有可能比该系中的其他人更强烈。据说四川和云南的地方派系在同广系靠拢，可能打算在重庆政府一旦崩溃的时候成立自治政权。驻守稻米产区湖南省的第九战区司令薛岳公开对重庆政府表示不悦。成都各派鼓吹按照民主路线改革中央政府。据美国领事馆的一份报告称，云南省谴责中央政府是"完全缺少民众支持的集团"。华北地区以前曾反叛过的军阀当中有人又跃跃欲试了，其中有可能再次造反的是"模范督军"阎锡山，史迪威 1921 年曾经首次为阎锡山修筑公路。

美国外交人员呈送的调子沮丧的报告表明，由于重庆政府奉行一项强行以只有生产成本三分之一的价格购买产品来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中国的经济会停滞下来。广西省的八家煤矿有七家关了门，重庆的十八家铸铁厂有十四家关了门。政府根本不去作切实可行的运输安排，实行配给，或是调整税收。由于下面官员的贪污和效率不高，中央政府收得税款的总额低于它应收税款的三分之一。农民们承受着从来没有过的沉重的征募负担，树木和牲畜都被没收，除了数不清的合法和不合法的捐税以外，农民还被迫上缴定额粮食。人们可以看到，由于饥饿或疾病掉了队、背井离乡、无依无靠的士兵们，手捧讨饭碗，弯腰站在道路两旁，默不作声，遭遇凄惨。被拉去修建机场的民工们在武装卫兵看守下干活，拿不到工钱，只有那些家在附近有人送饭的民工才能吃上饭。许多人是要被裁减下来的地方部队士兵，给他们吃的东西很少，通常

都是饿死。国家经济处于病态，然而当官的却通过各种难以想象的手段巧取豪夺，大发不义之财。一位美国上尉在成都呆了半年以后承认，“我真想请一年假离开这个军队，在这个国家里搞一次真正有效的革命。”

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新闻检查制度感到不满的外国记者们也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在4月份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联名抗议书，说中国新闻检查机构只准他们发出使人对中国产生很好印象的报道，不准他们发出含蓄批评中国政府，披露“中国经济形势真正严重程度”的报道，或是对“中国军队的方向、状况及使用”有任何一点疑问的报道，如果这种政策不改变，他们就无法发挥名副其实的新闻记者作用。蒋介石只是答复说，只要不是不利于中国抗战的消息，完全可以考虑让他们发出去。

在重庆，尽管官方进行镇压，不满情绪还是日益表面化。前四川省主席、民盟主席张澜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大胆地抗议政府的独裁统治。一直在家族中成为政敌的孙中山夫人现在也公开站出来批评政府，就连政府赞赏的几家报纸也要求实行民主改革。昆明要求民主改革的呼声也很高，昆明街头出现了不满的人的标语，学生们举着标语和请愿牌上街游行。在整个这件事中，蒋介石的不愿顺应民心的态度使人迷惑不解和不可思议。高思大使6月8日的一份报告说，许多中国人认为蒋介石在5月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没有采取任何改革措施是“中国局势的转折点”。高思大使告诫说，从这个时候起，中国政治动乱的浪潮预料会高涨。

日军发动的代号为“越后”行动的新攻势给中国的局势造

成了大混乱。战争现在已经转而对日本不利。日本的西方敌手正跨越太平洋无情地向它逼近。偷袭珍珠港、夺取了从沈阳到新加坡大片领土的妄自尊大的日本人就要得到这种人的传统下场了。日本的手伸得太长，超过了它的能力，虽然它的优势已丧失，但是它仍然不愿在中国松手。“越后”行动的整个目的就是通过建立从天津到广州的牢固交通线，通过拔除美国的空军基地来巩固日军在中国大陆的地位。间接地说，这也许是日军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的最后一次努力。

日军进攻的第一阶段于4月份开始，由黄河向南，向京汉铁路之间的地区发动进攻，日军迄今还没有占领这一地区。据第十四航空队获得的情报，驻扎河南的中国军队三十四个师（其中有几个师是中国政府的最精锐部队）丝毫没有迹象说明他们有“阻止日军前进的计划或能力”。日军还没有到达，中国军队就闻风而逃，河南陷入一片混乱，散兵游勇把老百姓的家洗劫一空，缴到武器的农民就象1927年的红枪会一样变成土匪。共产党部队在这个崩溃的时刻从邻近的山西省进入河南。美国大使馆派驻西安的一位观察员报告，当地老百姓预计共产党在打败日本人以后能控制河南，“如果事情的结果证明老百姓的话是对的，看来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日军“越后”行动的第二阶段是从汉口向南进攻第十四航空队在华东各地的基地，第二阶段进攻从6月开始，有一切迹象表明日军几乎能取得与第一阶段一样的胜利。中国总参谋部没有制订任何计划来保卫这些机场以及与各机场毗邻的城市。6月18日湖南省会长沙陷落以后，由于河南遭受的劫掠而产生的对政府松懈表示的愤懑扩散到了南方。且不说军事

状况，仅国内的前景就令人沮丧了：粮食储存减少，贸易中断，难民涌入非日军占领区，自由中国地盘缩小，导致征募和税务的增加。美国使馆人员的一份报告概括说：这种情况意味着民心涣散、士气低落，中央政府的地位会削弱，地方集团的地位会相应加强，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将延续下去。总而言之，中央政府还能支撑多久呢？该报告的作者谢伟思认为，中央政府可以支撑一段时间，但是其软弱程度会继续增加，从长远观点来看，其垮台只是个时间问题。

谢伟思是美国使馆人员中另一位在中国出生的人，据埃里克·塞瓦赖德说，谢伟思"是我迄今所见到的美国驻外国一个使团人员中能力最强的年轻外交官之一。他们是驻在中国的消息最灵通的外国人。"谢伟思最近同美国大使馆的另两名二秘雷蒙德·卢登、约翰·埃默森一道，奉召前往重庆史迪威的司令部任政治顾问，美国大使对此甚为不满。

日军在华南进攻造成的非常状态使陈纳德和史迪威之间的争吵发展到最激烈的程度，促成了陈纳德及其助手们对史迪威的长期积怨和辱骂，这种积怨和辱骂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以后。当时陈纳德空军的效能问题在每个人头脑里所占的地位比在历史记载中占的地位要大得多，当时这个问题在人们的态度和决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第十四航空队对日军补给线进行了持续的破坏性打击，有效地阻碍了日军的进攻，但是没有制止住日军的进攻。情况证明，光靠空军是无法阻止日军向美国空军基地的进攻，陈纳德使劲要求史迪威给他派出更多的飞机、物资和燃料，甚至要求史迪威把供给地面守卫部队的武器调拨给他。陈纳德声

称他的物资“根本不够用”，坚持要给他一万吨物资。史迪威认为陈纳德这样说是个手法，为的是“推开错误地夸下海口后造成的后果”。陈纳德曾向蒋介石保证，只要得到充分的支援，第十四航空队可以制止日军前进，现在发现根本做不到，所以陈纳德“想方设法为自己找借口，说只要向他再增加一些支援，他仍然能抑制住日军，但是我们不愿再给他支援了。”如果要满足陈纳德提出的增加物资的吨数，那就只有从给 B-29 轰炸机队的物资中调拨，但是史迪威认为，由于地面部队的软弱，这样做是浪费。正如史迪威在“三叉戟”会议上所说，由空军掩护毫不善战的地面部队，那么这种掩护就没有价值了。

这场争论是史迪威 6 月 4 日被委员长从缅甸召到重庆的原因。在蒋介石施加的极大压力下，史迪威同意，如果陆军部许可，他可以从 B-29 轰炸机队的物资中调出一千五百吨，凑足陈纳德需要的一万吨物资。马歇尔拒绝让史迪威调拨物资。马歇尔的结论是，为支持陈纳德的空军攻势所花的巨大努力是不值得的，而且由于在喜马拉雅航线上用了许多运输机，欧洲战区的运输机不足，这使得在欧洲取得胜利的时间推迟了。马歇尔对于这一点是极为不满的。史汀生抱怨说，“喜马拉雅航线把我们的运输机都耗光了。”6 月 6 日，即马歇尔给史迪威答复的前一天，罗马被攻克，盟军在诺曼底登陆。马歇尔认为，假如当时在中国战区的运输机可以用到欧洲战区作空中支援，盟军在意大利和法国取得的胜利就会快得多。

还有，军界的想法现在非常赞成对敌人的工业设施实行远程战略轰炸。马歇尔在一份拒绝把远程轰炸机物资调拨给陈纳德部使用的电报中说，无论如何也不得妨碍 B-29 轰炸

机向日本发动袭击。他说，从长远观点来看，这样做比把物资调拨给陈纳德部使用对中国更为有益。他还为蒋介石着想，指出欧洲战区的经验证明，“纯粹的空军抵抗”对于一场地面攻势的作用是有限的。

就如一位皇帝在政论者的一场争论中表示对某个论点不赞成一样，马歇尔的答复标志着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陈纳德的要求给予明确的拒绝。这次的拒绝有个不足之处，就是陈纳德和他的支持者们根本不知道事情的原委，结果他们就把长期的恼火发泄到史迪威身上。当然，史迪威对事情是非常清楚的。他答复马歇尔，“所作指示我都明白，同我所期望的完全一样。”史迪威对华东命运似乎无动于衷的态度是由于他相信：日军最终将无法保住它过长的供应线，攻势自然会停止；同时，要挽救日军攻势所指的第一批机场已为时太晚。在他重新打通滇缅公路以后，史迪威的计划是把Y部队一些师和北部战区部队调回中国西南部，加上Z部队一些师和美国陆军一个军(他当时仍然希望能来一个军的美国部队)，汇集成一支二十五万人的部队，用这支部队打通到沿海的道路并夺取一个港口。

要在美国报纸上继续用善意的编造来掩饰中国的情况是不再可能了。报纸上出现了批评中国当局的文章，就连卢斯报系的报刊也不得不仔细地利用不良的局势，承认中国有种种弊病和效率低下，并把这些归咎于中国遭到封锁，说美国没有尽到责任来打破对中国的这种封锁。《生活》杂志5月1日刊登了白修德写的一篇提出严厉批评的坦率报道，

这篇报道称国民党是一个“把坦慕尼厅① 和西班牙宗教法庭的某些最坏的恶习集于一身的腐朽政治集团”，他说，国民党内部情况的逐步恶化使得将来同共产党人打内战的结局令人难以捉摸。得出的这种有偏差的结论（可能是出自国内某些编辑人员之手）是，美国目前有“义务用比两年来所使用的大得多的力量”来支持国民党这个反民主、行将失败的政权。

有人怀疑用这种办法能解决问题；例如美国军事情报部官员格雷厄姆·佩克就认为，由于美国提供的全力援助会使国民党依赖美国而不去依赖自身力量，这种援助可能会成为“一种想给予帮助但实际上却起有害作用的行动”。

上百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奋斗着要使自己摆脱腐败政府，但是每次改革或革命的努力都在转瞬间变成了镇压和破坏，就好像在魔术中王子一转眼成了蛤蟆一样。中国的腐朽政治并不像治理无能那样是个绝对病症。如果一个政权因执政的软弱而腐败，那么随之而来的政治交易、贿赂和妥协，就使这个政权更加腐败不堪。三十年来，高思大使一直注视着中国的上述情况，并于1944年6月厌倦地认识到，美国影响这种情况的手段是有限的。高思给国务院的信中写道，“我承认，我提不出我们可以施加影响的任何办法来。”

无能为力的见解是美国精神所不赞许的。据认为美国可以做到的一件事就是推动、说服或是迫使中国用它可以运用的全部军事力量来抗击日本，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必须迫使国民党弥合同共产党人的分歧，因为这一分歧使国民党无法致力于抗日战争。高思大使6月15日奉命向蒋介石阐明这一

① 1789年以纽约市坦慕尼厅为地点组成的民主党一派。——译注

点。他敦促蒋介石同共产党人签订一项协定，结束对共产党的封锁，使双方的武装力量能用来打击日本人。在答复中国人最近提出的增加援助以及战后继续提供租借法案援助的要求时，高思大使告诉蒋介石，由于美国要在欧洲作战，目前无力向中国增加军事援助。高思大使能说的就是这些。

蒋介石依赖美国，但是并不言听计从。他和他的同伙们确信，美国决不敢冒风险撤销对他的支持。然而美国国务院5月份在发给其官员的一份政策指令中说，美国"没有义务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国民党政府"。如果授权高思把这一点转告给蒋介石，这种表示可以不依赖国民党政府的惊人议论可能会起作用，但是没有证据说明高思得到了这样的授权。宋室的劝说和联系、教会机构和赈济中国联合会，即中国国防物资公司的分支——后来成为院外援华集团的核心——的影响以及官场中潜在的习惯力量都起了作用，使中国同美国之间的关系保持下来了。美国偶尔也象国务院5月份的政策指令一样，在中国人的蜘蛛网上拍打几下，但是没有能把中国的蜘蛛网撞破。

1944年夏天，由于对重庆政府的无能为力越来越不耐烦，美国军方的兴趣转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潜力上。据说共产党军队在山东、河北、山西、苏北等地积极展开对日军的游击战，虽然没有得到任何直接的证据，因为驻重庆的外国人均不准去封锁线以外地区察看。共产党已牢固地立足于华北，该地区是最后击败日军的关键地区。除满洲以外，在中国大陆的日军大部分以及日本人的工业设施的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一

地区。如果俄国在远东参加对日作战，俄国军队作战的地方也会靠近这一地区。

自 1937 年以来，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后到达延安的幸存者在一个有日本面积那么大的地区成立了政府。七年来，共产党控制的地区面积从大约三万五千平方英里扩大到十五万五千平方英里，人口从一百五十万增加到五千四百万，武装部队从十万人增加到四十七万五千人。共产党在日军背后、在苏北、湖北、南方的广州附近、海南岛等地有一些小块游击区。这些游击区是共产党人在日军推进时插入敌后建立的，因为日军推进时背后有大片地区没有足够的部队守卫。共产党以有力的政治和军事组织打入上述地区，提出减租减息，打击那些与傀儡政权勾结的地主，取得了民众的支持。由于共产党保护农民不受敲诈勒索，不被拉去当壮丁，农民们平生第一次觉得他们缴税得到了一些好处。随着共产党根据地的扩大，他们与中央政府相对的地位加强了，他们的信心随之增加了，而国民党在河南的溃败揭示了自己的软弱无能，这种软弱状态迅速恶化。

美国所关注的是既要防止中国在内战中解体，又要取得共产党的军事合作来抗击日本。中国如果发生内战，不仅会使出现一个稳定的中国——为了保持将来的和平需要有这样一个中国——的希望破灭，而且可能引起美苏之间的冲突。出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考虑，看来有必要使中国的对立双方实现某种形式的联合。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在口头上表示过赞成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于 1943 年为达成政治解决开始举行谈判，举行谈判的原因很可能并不是出于相信会实现联合，

而是因为任何一方都不愿显得自己好象在推行打内战的政策。美国对中国实现联合抱有希望是因为当时占上风的看法是:共产党的目的不是统治中国,而是要同重庆当局达成政治解决,使全国一致抗日。据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根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斯大林亲自向哈里曼大使也是这样保证的),而是冒牌的共产党人,或者说是一种"萝卜",外面红里面白。

由于美国的观点而形成的又一个想法是,共产党人作为一支较有生气的力量可能最终赢得一场内战。让一种敌对的意识形态(不管是不是萝卜)在战后统治中国,这并不是美国投入对日作战的目的。因而,在苏联还没有介入之前实现国共两党联合政府看来是可取的。苏联介入中国事务是蒋介石更担忧的事。据说蒋介石正用从河南撤下来的军队加强封锁线,并准备在盟军仍然忙于欧洲战争、苏联尚不能进入远东以及美军尚未在中国登陆的时候,向共产党发动进攻。

外国记者和美国政府几个月来一直要求重庆政府允许他们派人去共产党控制区察看。重庆政府 1943 年 11 月曾答应报界派人去察看,经过半年时间的推诿,到 1944 年 5 月才最后允许三名代表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报界的联合报道记者组① 去解放区采访。华盛顿提出的向共产党控制区派出一

① 派出的三名记者是:哈里森·福尔曼,代表《纽约先驱论坛报》、合众社、伦敦的《泰晤士报》;冈瑟·斯坦,代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美联社、伦敦的《新闻纪事报》;伊斯雷尔·爱波斯坦,代表《纽约时报》、《时代一生活》杂志社、《联合劳动新闻》、澳大利亚悉尼的《论坛晨报》。随行人员还有:代表美国教会刊物的沙纳汉神父;受中国新闻部雇用的莫里斯·沃陶,他以《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的身份随组活动,同行人员骂他是"国民党走狗"。由于记者们施加强大压力,重庆政府于9月份允许由布鲁克斯·阿特金森、白修德和《新闻周刊》记者哈罗德·艾萨克斯等人组成的第二批外国记者去共产党控制区采访。

个军事观察组的要求也得到了重庆政府彬彬有礼的赞同，但迟迟没有能派出。

向延安派出美国军事观察组以及美国在延安设立领事馆的建议最初是由戴维斯 1943 年 6 月在给史迪威的一份报告中提出来的，这份报告讲了这个地区在军事上的重要意义以及它与苏联日后介入的关系，并指出访问过共产党控制区的唯一的美国官方观察员是 1938 年派出的卡尔森上尉。戴维斯和总参谋部的廷伯曼将军（此人也曾在第十五步兵团中呆过，目前则是中缅印战区司令部驻重庆总部人员）上书马歇尔，陈述派人去共产党地区访问的必要性。戴维斯于 1944 年 1 月递交上去的第二份报告送到了白宫霍普金斯手中。2 月份，罗斯福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要求，请他允许美国军事观察员“立即”去山西和陕西两省，罗斯福巧妙地避而不提这些地方是共产党控制区。蒋介石宽宏大量地答应为此行“提供方便”，他还说，美国观察员当然只能去上述两省中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

经过蒋介石的同意，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制订了观察计划，并且暂时不去理睬重庆政府施加的使此行毫无意义的限制。为了确保观察人员不受他们的东道主摆布，史迪威挑选的都是懂汉语并且熟悉中国情况的人员。他任命包瑞德上校为负责人，谢伟思做他的政治助手。据说包瑞德是美国驻华人员中唯一能够以很流利的汉语同中国人说笑话的人。

史迪威本人对于这个问题之所以有兴趣是因为他天生就渴望同他认为有朝气、有活力的军队取得联系。他铭记着共产党人 1937 年在平型关使日军遭到了即使是有限的、但是使

人震惊的失败。他还同所有其他人一样，对共产党人自那以后发动的成功的有力的游击战有深刻印象。共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及其助手们1938年给史迪威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史迪威也没有忘记周恩来在缅甸战役失利之后托人转告他的话："我可以在史迪威将军领导下工作，我可以服从。"① 当史迪威奋力同国民党军事系统的沮丧情绪进行斗争的时候，共产党人在他脑海中的良好印象就具有更大的意义了。史迪威有一段时间曾经想用共产党的军队来作为Y部队迫切需要的补充兵员，每百人连队中安排二十名共产党士兵。这个主意在多恩同Y部队参谋长肖毅肃商讨之后被放弃了。肖毅肃说，即使是百分之二十的共产党士兵，两个星期后他们就能使全连的人都变成共产党分子。史迪威现在才知道，只要蒋介石掌权，改组军队、提高军队战斗力的目标永远达不到，这个认识使史迪威想同远在共产党控制区中、尚未见到的军队进行接触的主意更加迫切了。在目前，所需要的就是了解第一手情况。

美国军事观察组于3月份整装待发前往共产党控制区，但是蒋介石仍然阻挠。观察组用的代号是"迪克西"，这个词在美国南北战争时代表南方反叛者，也代表叫做《他们有关迪克西的说法真实吗？》那首歌。罗斯福总统于4月间再次提出要求，但是仍然未获结果。这个时期，这个问题转交给另一位特使、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处理。

如果说华莱士之行负有什么使命，那就是要说服蒋介石同共产党人谈判。美国政府的特点是，越是重要的问题，它就

① 原文如此，无从查考。——译注

越不想让非常了解情况的人去处理。罗斯福总统对中国的问题深为关切，千方百计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很想采取行动，但又不知如何下手，所以只好采取派遣私人特使这一招。像罗斯福这样的人总是认为，只要他能亲自出马，他就可以把事情安排妥当；其上策是派出一位私人代表。要派私人代表，谁能比副总统更合适呢？

实际上，罗斯福挑选华莱士作为访华的私人特使主要是与国内竞选有关，并不是出于中国局势的需要。正在准备竞选第四届任期的罗斯福知道，出席7月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肯定会反对再次提名树敌众多的华莱士为候选人。罗斯福迫切希望避免一场分裂党的内讧。罗斯福牢记着伍德罗·威尔逊的教训。他想在国会巩固议员们对他的支持，以便建立联合国，他认为建立联合国是未来的主要任务。他在考虑抛开华莱士，挑选某个普遍乐于接受的竞选伙伴，在目前情况下，自然想把华莱士打发到国外去。因此就派遣他出访中国。当中缅印战区总部人员接到华莱士行将访华的通告时，他们要求美国政府授权华莱士“坚持”要蒋介石允许美国军事观察组访问共产党地区。后来的结果证明，上述要求是华莱士在中国的八天访问期间取得的唯一成就。否则，华莱士访华的主要结果就要算蒋介石再次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了。

蒋介石在6月21日至24日之间与华莱士举行的四次长谈中，否认了当时流行的看法：共产党人是“农民民主者”，蒋介石说，共产党人的确要夺取中国政权，他们实际上“比俄国共产党人更共产化”。当谈到要他允许美国军事观察组访问

延安的问题，蒋介石一开始拒绝了这个要求，但是第二天又来了个令人意外的大转弯。蒋介石的这一转变可能是指望罗斯福给他相应的好处。蒋介石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想摆脱史迪威和高思，这两人控制着他通往美国的一切渠道。但是在史迪威的问题上遭到多次失败以后，蒋介石这一次没有直接要求美国撤换史迪威，而是要求罗斯福总统派出一名私人使者，使他不必经过国务院或陆军部而同白宫直接联系。由再次得宠的宋子文做译员，蒋介石令人同情地历数了史迪威不满足第十四航空队许多需求的做法，并说他本人对"史迪威将军对事物的分析判断缺乏信心"。虽然华莱士并不因此而同情委员长，但是他觉得在这个方面他可以发挥作用。正如华莱士后来所说，"我对于在绝望中呼救的人深为同情。"

陈纳德利用一切机会加深这种印象。华莱士抵达重庆时，陈纳德以及给他做"空军助手"的艾尔索普中校到机场迎接。其后，他们两人负责在昆明接待华莱士。陈纳德和艾尔索普并不知道他们得意的时候已过去了，确信只要他们能赶走史迪威，在中国利用空军作战的计划就能占上风。他们结识了宋子文这位有说服力的盟友，在上次企图赶走史迪威的尝试失败以后，宋子文要赶走史迪威的念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由于他们的促使，华莱士得出结论，史迪威必须调离中国，这个结论并不使人意外。虽然华莱士倾向于让陈纳德接替史迪威的职务，但是有人建议让魏德迈接替史迪威的职务更为现实。华莱士征求高思的看法时，高思也说，委员长再也无法同史迪威进行有效的合作。

高思的看法当然是正确的。史迪威本来也确实可以召

回，这不是由于陈纳德和宋子文提出的不足为信的理由，而是因为让他执行的调动中国作战力量的使命因蒋介石不愿让他调动这些力量而无法完成。美国这种无能为力的状况——与第十五步兵团“能够胜任”的口号相矛盾——是史迪威、马歇尔以及大多数美国人不愿承认的事情。

华莱士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一份电报中（后来艾尔索普说这份电报是他起草的）大力建议总统采纳蒋介石的要求，“派出一名私人代表作为你和他之间的联络员”。此外，或者说是作为选择方案，华莱士敦促总统派一名能力最强的将军替换史迪威，比如派遣能够取得委员长信任的魏德迈去替换。蒋介石曾“直截了当地”告诉华莱士，他根本不信任史迪威。电报接着谈到了中国方面总是给来访的美国人提出的保证：“只要有适当的人来，就有可能劝导委员长改革他的政权。”电报说蒋介石急需援助，甚至急需“指导”，“如果对他采取明智的方针”，蒋介石愿意进行“相当果断的变革”。

华莱士不愿意征求他建议撤换掉的中缅印战区司令史迪威本人的意见，史迪威也不愿意向华莱士谈自己的意见。由于忙于指挥坚守密支那地区、夺取孟拱的战事，史迪威拒绝离开缅甸去见华莱士。史迪威派戴维斯和琼斯代表他去见华莱士，并邀请他到孟拱谷地同史迪威会晤，但是华莱士没有接受邀请。

由于华莱士的建议牵涉到史迪威，这些建议都遭到了马歇尔的反对。马歇尔深知这些建议来自何人，他对史汀生说，这些建议都是艾尔索普平时对史迪威持“敌视”态度的结果。此外，这些建议已经过时，因为向华莱士做工作的说客们并不

知道，就在他们千方百计要把史迪威赶出中国的同时，英国人已经施加了更大压力，要把史迪威排斥出东南亚部队司令部，把他赶到中国去。

华莱士返回美国以后又撰写一份报告，敦促美国应利用一切可能的途径对蒋介石施加影响，要他奉行进步的政策，以便获得民众的支持，使中国的抗战得到新的活力。

这是从中国发出的各种报告中越来越多地提出的一种请求。在美国军事人员很多的昆明，中国开明人士向美国总领事威廉·兰登提出要求，要美国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迫使它扩大其政治根基；这些开明人士说，否则美国提供的军事和财政援助只能加强国民党反动政权。他们通过兰登正式呈交的不偏不倚的报告发出了绝望的呼声：蒋介石集团“没有能力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没有就战后的恢复制订出“合理的计划”。蒋介石本人是一位能力有限、目光短浅的人，中国要是在他的“领导下前途暗淡”。兰登本人得出的结论同史迪威的结论一样激烈：如果中国的最高层无人事变动，任何办法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兰登写道：“只有蒋介石死去或是发生一场成功的革命，中国目前的趋势才能改变。”

只要美国政策摆脱不了中国现在的这个当权者，兰登关于中国问题的论点就会提出一个根本性问题。正如一位外交官后来在一次听证会上所说，当“我们甩不开一个日益失去力量的政权时”，我们该怎么办？那正是问题的症结。高思曾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说：“我什么法子也想不出来……”对这句话能找到什么答案吗？谢伟思在为华莱士准备的一份情况简要中指出，对高思那句话的答案在于扩大美国的选择余地，办

法是不仅支持中国的开明分子，而且要撤销对中国政府的无条件支持。因为如果举行自由选举，百分之八十的选民肯定不会投这个政府的票。谢伟思认为，如果美国对中国奉行一种无法找出其他选择的政策，那就是一种懒惰的“目光短浅的权宜政策”。

参谋长联席会议关心的不是解决中国的问题而是如何打赢战争。他们就中国危机提出的解决办法同华莱士提出的建议恰恰相反：扩大而不是中止史迪威在中国的权力——总之一句话，让史迪威指挥中国的武装部队。

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扩大史迪威在中国的权力的决定性因素是日军的“越后”行动计划取得成功，而不是由于美军在华东地区的空军基地即将丢失。6 月 15 日，当美军攻打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塞班岛的时候，战略的重心已明显地转到了太平洋地区。轰炸机从塞班岛出发可以轰炸日本。经过为时三个星期的激烈争夺，美军终于拿下了塞班岛，并开始在岛上建造 B-29 轰炸机机场。这样一来就削弱了中国作为美军空军基地的重要性，但是仍然存在着另一个问题。

日军“越后”行动计划取得的成功以及中国军队在日军攻势面前的被动局面引起了人们的担心，这就是在中国的日军可能在中国大陆扎下根来，即使日本在本土战败以后仍然继续在中国与盟军作战，这样就可能把战争延长好几年才能把日本打败。假如出现那样的情形，俄国参加对日作战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了，也就会给俄国在满洲提供新的机会，这种前景是美国完全不欢迎的。华盛顿更不欢迎的是下面的主张：

在欧洲战场获胜以后，把美国军队调往亚洲，结果这个主张引起了美国公众的怒骂。史迪威曾以日军有可能使战争延长下去的危险为由，不时地要求给他调若干师美军，他争论说，假如绕过中国战场，在中国大陆的日军就不会投降，而中国人自己力量太弱，无法打败日军。

参谋长联席会议医治中国瘫痪病症的处方是用史迪威本人而不用美国军队。因此就制订出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的计划，使他有权加强和指挥中国的军事工作。这个计划的另一个好处是满足了英国坚持要史迪威离开东南亚部队司令部到中国去的愿望。英国现在已经闹到了正式提出要求的地步。在马歇尔6月份访问伦敦期间，英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勋爵对他说，得解除史迪威担任的蒙巴顿副手的职务，因为他同英国的三军领袖们无法相处。英国人提出要求的另两个因素是英国对于史迪威处理钦迪突击队的方式以及他随便发表憎恨英国佬的言论感到愤怒①。马歇尔冒火了："布鲁克，你们在印度有三位司令；但是他们一个也不愿意打仗。我们在那里有一个人，他愿意打仗，你们却要把他排挤出去。这是搞什么鬼名堂？"虽然布鲁克对于马歇尔的这种态度感到恼火，但是他告诉马歇尔说，在蒙巴顿的坚持下，正把那三位司令召回国。这才免得马歇尔再做文章。

中国的形势发展要求、英国人也在推动作出共同解决办法，马歇尔采纳了史迪威本人曾提出的主意。开罗会议期间，

① 1944年11月，由于报纸报道史迪威说英国的驻印军队没有生气，军官无能，保守党议员雷金纳德·珀布里克在下院要求宣布史迪威在任何有英军的地区是不受欢迎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好几年，亚历山大将军在同博特纳将军的一次谈话中说，"亲爱的老乔（指史迪威）有的时候太任性了。"

史迪威同马歇尔讨论了这个主意，就是由史迪威担任中国军队“战地参谋长”，使他有权规划中国军队的行动。在扩大史迪威指挥权的同时，马歇尔建议把史迪威晋升为上将。6月30日，陆军部就史迪威的晋级和给予新指挥权问题起草了一份有说服力的声明，声明指出，史迪威克服了包括遭到盟友冷遇的各种困难，“在缅甸建立了一支有战斗力的中国军队”，在攻打密支那的过程中“发动了一次将载入史册的辉煌战役”。

到这个时候为止，中国两年半来一直不想对日军发动进攻。那么，陆军部为什么觉得可以改变蒋介石的既定意图并能逼他采取某些行动呢？答案是美国军方的自信。在中缅印战区，美国军人虽然历尽艰难困苦，但是仍然取得了一些非凡的战绩——利多公路、喜马拉雅航线、石油管道以及在人们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从缅甸北部打回来。为什么要认为蒋介石更难对付呢？看来有可能只要施加足够的压力，就可以使蒋介石去做美国人要他做的事情。另外，随着喜马拉雅航线运输能力的扩大、随着输油管道和利多公路即将投入使用，从而能把现在经过大大增加了运输能力的阿萨姆-孟加拉铁路运来的东西转运到中国，现在的后勤力量已比原来大大增强了。蒋介石在目前情况下抵制美国压力的能力据认为已比原来削弱了许多。无论如何，史迪威除了晋升以外的另一条出路就是或迟或早被召回国，向他的对手屈服，而这种做法正是马歇尔长期以来坚决反对的。马歇尔7月1日同史迪威谈话的时候没有谈到给他晋升的问题，为的是不影响史迪威作决定。

马歇尔问史迪威，一旦密支那拿下来以后，他是否认为

有必要把他的主要精力转到在中国本土“复兴而且实际上是指导”中国军队方向上来？马歇尔很圆通地告诉史迪威，英国要求“调整指挥关系”。马歇尔承认史迪威遇到的麻烦比他本该遇到的要多，“我相信你所遇到的麻烦之大是现代任何指挥官都没有遇到过的”。马歇尔显然清楚他无法给史迪威什么好处，所以他最后说，“不要让麻烦和困难发展到爆炸的程度。”

史迪威的答复并不是简单地说“派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假如他觉得在他个人同蒋介石的斗争中有什么乐趣的话，这种乐趣被他奉命来挽救的艰难局面冲淡了。史迪威用非常悲观、非常明白的语言向马歇尔谈到：

> ……如果总统给蒋介石一封语气非常强硬的信，强调我们在中国的功本和利益，并且强调中国忽视军队而肯定要遇到的严重困难，还坚持指出恶症需要恶治，这样蒋介石就可能会被迫给我一个指挥职务。我相信中国军队愿意接受我。何应钦将只得让出参谋长的职位，或者是他保持这个头衔，但把权力交出来。如果没有指挥中国军队的绝对权威，我就不接受指挥职务。即使让我有绝对的权威，中国军队遭到的破坏非常大，我认为只有一个办法才有可能弥补。这个办法就是从山西发动一次反攻……共产党军队也参加山西的反攻，但是除非蒋介石同共产党人达成一项协定，否则共产党人就不干。两年前，共产党人曾表示愿意同我一道打仗。他们现在可能还愿意听我的意见……除了这一着，我看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挽救目前的局势……总而言之，要在中国采取某种挽救行动尚存一线希望，但是行动要迅速果断，蒋介石必须让一位指挥官享有全权……这样的可能性当然不大，但是我看目前没有其他办法。

这并不是说史迪威热心接受这项工作，但是马歇尔没有给他什么回旋余地。二十四小时之后，马歇尔以参谋长联席

会议的名义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给史迪威晋级以及任命史迪威指挥中国武装部队的建议，他还向总统递交了向蒋介石通告上述情况的信件——信件包括了史迪威的许多主意，有一些还是史迪威的原话。为了使罗斯福无法拒绝，马歇尔在信的一开头就用严峻的措词概括了自“三叉戟”会议以来的结果，这些结果都直率地提醒这位总司令，事实证明为了支援陈纳德而在运输方面花的巨大努力是“方向不对头并且很可能完全是徒劳无益的”，史迪威所作的预言是正确的，即如果第十四航空队获得效能，那只会招惹日军对其机场进行反击，要想保住机场，必须加强地面部队的战斗力。

对于罗斯福来说，这个建议意味着彻底改变他先前在应当如何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的看法，但是自开罗会议以后，罗斯福倒是比以前愿意改变他的看法。由于中国问题使他左右为难，加上马歇尔逼得他无路可走，罗斯福全盘接受了马歇尔提出的建议。作为一位讲究实际的人，罗斯福现在愿意象当初试用陈纳德那样试用史迪威。谁都很难说，罗斯福内心是否相信能使蒋介石同意上述建议。蒋介石身上经常表现出来的软弱无能表明他可能无法拒绝美国提出的建议；无论如何，罗斯福终于开始认识到，在军事上不能对蒋介石有任何指望。罗斯福几天前对孔祥熙说，“我想弄明白的问题是，中国军队在哪里，他们为什么不同日军打仗？看来日军想把中国军队赶到哪里就能把他们赶到哪里。”由于罗斯福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想不出其他办法，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史迪威。作为美国战争期间在中国所作努力的最高潮，由一名美国人指挥中国武装部队的建议在部分意义上说明对美国影响的效力是深信不

疑的，在另外一部分意义上说明是不得已的最后一招。

陆军部起草的、由罗斯福总统一字未改就签字的“口气非常强硬的信件”于7月6日发给了蒋介石，这封信的强硬口气正是史迪威所希望的。信件说：

……依我看，中国目前的严重局势需要赋予一个人协调盟国各种军事力量——包括共产党的力量——的权力。

我觉得我完全理解你对史迪威将军的看法，然而……我知道，除了史迪威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人有能力、力量和决心来消除目前威胁着中国和我们打败日本的全盘计划的灾难。我决定给史迪威晋升为上将军衔并希望你赶紧考虑把史迪威从缅甸召到中国，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挥下统帅所有中国部队和美国部队，让他全面负责，有权协调和指挥作战行动，阻止日军的进攻浪潮。我认为中国的情况非常严重，如果不立即采取果断而适当的措施，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挫折。

……我向你保证，本人无意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向你发号施令；不过，整个亚洲的前途以及美国在亚洲地区作的巨大努力有可能毁于一旦。因此我有理由对这个问题给予深切关注。

务请记住，在意大利、法国以及太平洋上，事情已清楚地表明，单单依靠空军是无法阻止顽敌进攻的。

罗斯福总统的信件没有照顾蒋介石的情绪，也没有避而不用使中国人非常不悦的坦率言词。罗斯福的信件否定了蒋介石奉行的尽人皆知的政策；为一个他多次设法撵走的美国人索取在中国境内行事的权力；抛弃了蒋介石与陈纳德提出的依靠空军制胜的论点，而罗斯福一年前曾经支持过这一论点；明确建议把蒋介石惧怕的国内政敌共产党包括在美国援助的范围之内。这封信的调子是强硬的，内容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这就否定了罗斯福自己提出的让中国成为一个强国的

主张，接受了史迪威认为蒋介石没有能力使中国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的看法。这封信的言外之意是说蒋介石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为了不致有人仿效宋子文的一贯做法在转信过程中篡改信件内容，罗斯福的这封信是由美国当时驻重庆的高级军官费里斯将军亲自交给蒋介石的，由陪同前往的谢伟思任译员。这一程序是罗斯福总统5月份命令规定的，因为罗斯福5月份发现，在他多次致电蒋介石要求派Y部队投入战斗以后，蒋介石发来回电同去电内容不切合。这一程序在将来的最后冲突中起了重要作用。

马歇尔这时把为他晋级和罗斯福总统信件的内容通知了史迪威，并且严肃告诫史迪威不要进一步得罪蒋介石。

蒋介石接到罗斯福的信件时是何种心情无历史记载，但是可以说，且不说史迪威的种种缺点和冒犯之处，即使他有一张能甜言蜜语的妙嘴、圣人的性格以及象日本艺妓的特有魅力，委员长也决不愿意让史迪威统帅中国的武装部队，就如同他决不愿把统帅权交给毛泽东一样。宋子文打电报给霍普金斯，“华盛顿今天又作了一项致命的决定，陆军部想硬逼他（蒋介石）接受史迪威将军……我本人毫无保留地向你保证，委员长在这个问题上不会也不能屈服。”①

然而，由于依赖美国的援助，蒋介石得谨慎行事。他的答复是温和的，甚至是恭敬的，除了对问题的紧迫性的看法以外，他似乎愿意接受罗斯福的建议。他表示要有一个“准备阶

① 现存的这封电报的副本没有注明日期，可能是在后来发生的危机中的某个时候发出的，但是副本中的原则与上面提到的电文内容是相同的。

段，使史迪威将军能够毫无障碍地对中国军队行使绝对指挥权”。蒋介石再次提出设立一名联络员的要求，这个人享有“全权”，“可以调整我同史迪威将军之间的关系。”宋子文坦率地向高思解释说，这个意思就是授权某人向史迪威发布蒋介石的指示。蒋介石只是在一个问题上显得不悦——对于递交信件的方式。蒋介石建议，假如罗斯福总统今后有什么信件要给他，可把信件交给孔祥熙博士转交。

罗斯福愿意赞成蒋介石提出的派遣一名私人使者的主张，但是马歇尔坚决反对。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蒋介石开始提出条件了。7月23日，蒋介石提出三个条件：共产党军队不得接受史迪威指挥，除非他们接受中央政府的权威；对于史迪威在同他的关系中的地位应当明确规定界限；租借法案援助要“完全由中国政府掌管”。孔祥熙后来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中提出了进一步限制，从这些限制来看，蒋介石想把史迪威的指挥权局限在确定同日军作战的那些部队范围内，而不让他指挥后备部队。

这样就必须提出一个问题：史迪威鉴于他多年的经验，是否认为他的新职位能够使他实施真正指挥权。对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在于史迪威在军校学过的军官准则。这个准则是，在作出一切努力去完成一项任务以前不得认为这项任务不可能完成。同其他人的看法一样，史迪威认为中国的局势非常令人吃惊，蒋介石已没有选择余地。史迪威已经放弃了加强一些部队和改组中国陆军的希望，但是仍然希望能得到某种默许，让他有权协调所有部队的行动，这一点中国是从来没有做到的。史迪威认为，建立至少可比目前形势好一些的局面

是值得的。史迪威知道，他居于那个职位后发布的命令会受到阻挠、削弱或消极抵制，但是他相信，如果他能切断重庆通往前线的指挥渠道，他就可以有效地行使职能。白崇禧曾经对史迪威说，“如果把同重庆联系的电话线全部切断，我们前线的指挥官就是真正的指挥官了。”

驻守衡阳的薛岳部队在第十四航空队的大力支持下，在整个7月间顶住了日军的进攻，但是中央政府没有给予任何帮助，也没有向日军发动牵制性的进攻。史迪威当时仍然在缅甸，他命令向薛岳部队运送一批武器，中央政府驻桂林的代表表示反对，说这批武器可能会落入“土匪”的手中。因此，尽管陈纳德不断要求，还有史迪威派驻重庆的副手赫恩将军也提出请求，史迪威拒绝再运送武器。史迪威在答复赫恩的信中认为，上述决定得由委员长来作，而蒋介石两年来一直坚持一切东西都交给陈纳德。陈纳德6月份收到一万二千吨物资，如果陈纳德现在认识到他无法阻止日军的进攻，他应当把情况告诉委员长，委员长“可能提出他认为合适的主张”。

由于蒋介石疑心薛岳对他不忠，没有提出任何主意。薛岳也没有向中央政府提出任何要求，因为据驻桂林的美国参谋人员说，蒋介石“肯定会拒绝他的要求”。据说薛岳现在同张发奎、李济琛等人携手，打算万一同重庆的联系被切断，他们自己就成立一个自治政府。衡阳于8月8日失守。一眼望不到头的逃难人群，他们用独轮手推车推着行李锅碗，载着老人小孩，涌向最后一班火车向西逃奔。日军由于供应线受到第十四航空队的袭击，攻势中止了一个月，补充给养，然后继

续向下一个空军基地进攻，这个目标距离桂林只有一百英里路程。

处在绝望中的陈纳德现在表示愿意在拨给他的物资中调拨一千吨武器弹药给薛岳，但是不经过中央政府转手。他象所有人一样清楚，这位防守华东空军基地的人并没有得到委员长的支持。陈纳德以现实的口气向赫恩承认，“我不愿把这批武器弹药交给中国军政部，因为很可能军政部根本不把这批武器转交给薛岳。”陈纳德这次值得注意的承认使他所坚持的论点出现一个漏洞。陈纳德曾坚持认为，由于史迪威未提供武器，华东地区的失败应由史迪威负责。但是勇敢的雄辩家总是不在乎有漏洞的。陈纳德在慷慨激昂的艾尔索普支持下，继续鼓吹他的论点，而这种论点到时候使委员长有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史迪威给了他们种种帮助。一年来，由于蒋介石坚持、罗斯福也同意优先供应陈纳德军需品，史迪威打算装备Y部队以及准备训练出三十个有战斗力的师的地面部队的努力完全放弃了。事实证明陈纳德的论点是不能成立的，史迪威现在不愿意拨出武器来掩盖陈纳德和蒋介石的错误；他要把他们的错误公布于众。虽然薛岳是一位好样的军人，但是史迪威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现在帮助薛岳有什么用处。薛岳守不住长沙，就没有理由认为他会在衡阳干得出色些，特别是在他完全接受蒋介石指示的情况下。史迪威丝毫不信任蒋介石的军事领导才能，他认为蒋介石的领导有政治目的，军事上是卑劣的，因此他决定，美国武器只能在美国行使某种控制的情况下用于对日作战。他拒绝了陈纳德提出的调拨一千吨武器弹药

给薛岳部队的建议。直到蒋介石亲自提出上述建议，史迪威才粗声粗气地对赫恩说，“让他们受受去吧。”

7月30日，史迪威离开缅甸去康提，他这一次是永远离别缅甸。在任命他指挥中国军队的问题悬而未决的时候，史迪威受命在蒙巴顿逗留伦敦期间接替东南亚部队的指挥职务。人们原先预料史迪威决不会接受这次正式请他担任东南亚部队(史迪威当然称之为“可悲的东南亚部队”)副司令的意见，但是当宣布他实际上愿意担任此职的消息时，在康提引起了类似罗马等待匈奴王① 的情绪。史迪威知道，蒙巴顿去伦敦的目的之一是想撤掉他的副司令职务，但他并没有为此感到过分不安。“有些时候，所有最精明的人都想把碍事的东西搬开，但是有时也会被它绊个跟头——至少到目前为止的情况是这样的。”史迪威“到康提小伙子们中去”的意图只不过是想借机休息一下而已，他到重庆是得不到休息的。史迪威从日军战俘的口中知道，日军防守密支那的阵线即将垮台，现在残存的日军每天只有半碗米饭维持生命，他去康提心里可以不感到内疚了。

蒙巴顿派他的插有盟军旗帜的黑色高级轿车去机场迎接史迪威，史迪威说，“给我弄辆吉普车来。”史迪威把腿悬在吉普车的一边，有些人觉得他这样地显示自己的藐视有点不必要。吉普车沿着山路向康提驶去，蒙巴顿派来的高级轿车则装着行李走在前头。史迪威在蒙巴顿的王宫公寓中同蒙巴顿

① 匈奴人于公元410年以前征服罗马。——译注

会了面。蒙巴顿举行了告别午宴，史迪威宴后说，“我只好耐着性子同路易斯一起吃饭，我倒是喜欢蹩脚的鸡尾酒。”两天后，即8月3日下午三时四十五分，经过七十八天的围攻，密支那终于落入盟军手中。“终于拿下来啦”，史迪威第二天上午写道，“感谢上帝。今天上午一点忧虑也没有了，至少有五分钟是这样。”

在关于收复密支那的所有评论中，最有意思的莫过于布鲁克在伦敦发表的谈话：“很清楚，既然史迪威已把我们带领到了密支那，我们就应当在缅甸继续打下去。”

由于经历过缅甸北部的生活状况，史迪威发现锡兰简直是一个天堂。康提海拔为二千英尺，它的北面是七千英尺高的避暑胜地纳瓦拉埃利耶，空气清新凉爽，使他想起美国黄石公园的景色。这里还处处有瀑布，近看树木葱茏，远眺景色宜人。这里有绿柏树林，有湖，还有各种百合花。尽管王宫别墅周围有白水莲池、各种木槿树林、一座兰花花园，园中有白色孔雀漫步，还有一座九穴高尔夫球场，但史迪威还是不愿住在这座白色的小王宫里，他把住处安到一位美国官员的平房里。这里除了身体感到舒适以外，史迪威发现他的新司令部并不合他的心意。东南亚司令部的总部人员达三千人，其中有一支三十人的乐队和别墅高级轿车车队人员。军官俱乐部里有舒适的皮面椅子，很好的图书馆里有各种英文报纸，到处有赤着脚的服务人员。英国一位前文官觉得这里的总部人员显得“整洁、敏捷、朝气勃勃”，但是史迪威却觉得“设在康提的司令部有些不对劲……我总是觉得昏昏欲睡”。

每天下午都召开一次由各个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正式会

议，会上报告各个战场的形势。在英帕尔和密支那战役把英国卷入缅甸战争之前，这种会议的主题是全球战略，就是讨论明年在别的什么地方打仗。现在，会议关心的是在缅甸已扩大了的向曼德勒方向发展的战况。由于供应线有可能不断延长，蒙巴顿认为他无法推进到曼德勒以南的地区，因此他建议向仰光发动两栖进攻（再次实施“海盗”行动计划），然后挥师北上，到缅甸中部同其他部队会师。蒙巴顿伦敦之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得两栖作战所需的登陆艇及其他手段。丘吉尔现在愿意放弃他提出的夺取苏门答腊的设想，以很大热情转而支持仰光战役计划，以此作为向新加坡发动攻击的前奏。丘吉尔说新加坡是“英国的最重要的目标”。

史迪威对于总部计划工作毫无兴趣。后勤工作由其他人负责。每当要规划一个战役或一次行动，史迪威总是迅速拟订一个既无地形图又无附录的战术计划，他的理论是“我们都知道要往哪里去”。在康提的时候，史迪威并不想掩饰对那些需要他主持的无休止的会议感到厌倦和不耐烦的情绪。他在日记中称这些会议“十分可怕”，“毫无生气”，“可悲”，“废话比寻常还多”，“等于零”。“我一直对这些虚假的行为感到不安。”但是，他对于自己能任一个英国殖民地（缅甸）的军事长官感到高兴，并喜欢认真思考他可能发布的各种命令——比如“让克钦族人自由，等等”。

8月7日，史迪威晋升为上将的消息正式宣布，梅里尔为史迪威佩戴上第四颗星。史汀生写道，“我从来没有签署过能比这更使我满意的委任状”。北部战区部队一个团给史迪威寄来的祝贺信说，没有任何事情能比得上“您在这个战区所取

得的圆满成就。人们原以为，除非在伊利亚特史诗①之中，根本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7月间，中国的局势显得“非常暗淡”，史迪威写道，如果危机发展到“刚刚足以把小人物赶下台而又不致于使整条航船沉没，那也是值得的”。在衡阳陷落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看来确实出现过机会。8月9日，李济琛向美国驻桂林领事阿瑟·林沃尔特派去的密使说，他打算在广东和福建两省建立一个独立政府，同时公开要求蒋介石辞职。李济琛称他能调动六至八个师的兵力，他希望同美国谈判合作问题，由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林沃尔特认为，这个信件应当予以认真的考虑，因为，假如李济琛等人得到共产党及民主党派的支持、中央政府果真垮台的话，“其结果对中国以及盟国的事业也许并非绝对有害。”

史迪威得知这一消息时说，“好极了！”但是由于对这些不走运的南方分裂分子的活动有长期的了解，使他不抱多大希望或是贸然给予帮助。史迪威派廷伯曼去桂林调查情况，但是史迪威的指示不容他冒险行事：“我们的政策是不介入中国内政……听取人们可能提出的一切建议，但是切不可表态，也不要发表任何意见。就说你一定把有关人士提出的建议报告上去。”持同样谨慎态度的高思大使认为，李济琛的目的是想试探一下美国是否愿意支持他的行动。高思劝林沃尔特持超然态度。

---

① 伊利亚特：古希腊史诗，相传为荷马所作，叙述了一系列的杰出战绩。——译注

所有人在考虑的问题是，李济琛究竟得到多大范围的支持，当地的共产党是否可能同他携手。据美国驻昆明领事兰登说，虽然这一企图说明蒋介石遇到了“真正的坚决反对”，但是反对者不团结，没有领导人才和军事力量，他认为这“对蒋介石是否愿意改组他的政府不会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兰登认为，由地方军阀和民主团体组成的非共产党反对派不大可能取得成功，即使取得成功，也会处于“克伦斯基”①的地位，很快就会被共产党人推翻。廷伯曼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他发现共产党人没有参加进来，白崇禧也没有参加，白崇禧仍然忠于政府，并且已经把他的家属自桂林西迁，仅他的家产就装了好几节火车车皮。他认为，李济琛的力量“太弱小，我们除了继续奉行目前倾听和观察的政策以外，不便采取其他行动”。高思大使的报告也同这个估计一致。中国南部出现的情况没有向美国提供什么抉择余地。

就在这个时候，自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批访问共产党地区的外国记者发出的报道与公众见面了。这些报道的调子是热情的。这批记者对共产党抱友好态度，因为他们对于在重庆遭到的种种职业上的挫折已厌烦极了：重庆有专横的新闻检查制度，那里的人总是一味作空头保证和一味推托，还有最令人生气的中国人老毛病——发表平淡无味的声明和宣言，而发布者和听取者都知道完全是一派胡言。这些记者离开乌烟

① 克伦斯基，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1881—1970)，俄国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第二任总理。十月革命时，化装逃出冬宫，后来在美国定居。——译注

瘴气的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共产党地区，如同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他们首先对共产党地区的人民的体质状况印象很深，“他们比中国其他地方的人吃得好，体质强壮，精力充沛”。他们还敬佩这里的人把曾经是不毛之地的陕北改造成农牧两旺的地方。共产党军队经过垦荒运动实现了自给自足，不再依靠农民养活。所有的记者都在报道中强调了这一点，认为这是共产党军队受到当地人民拥护的一个最大因素。

通过组织手工业和小作坊生产、共产党地区在工业方面取得的成就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延安以其土制产品和自给自足的意志，成了它的人民的“不屈不挠精神和坚强决心的光辉象征”。记者们买了用当地纺织的粗布做的大衣和服装，后来他们发现，为他们缝制衣服的师傅竟是最高人民委员会的委员。7 月 23 日抵达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的人员还穿上他们定做的肥大的八路军军装照了像。《纽约时报》记者报道说，八路军士兵是“属于本记者在中国各地所见到的穿得最好吃得最好的人之列”。他们看到了数百名日军战俘，这样就找到了开展游击战的确凿证据。在国民党统治区，除了在各地都看到一些象征品以外，谁也没有见到过国民党所宣称的日军俘虏，而那些象征品只不过是拿到各处去陈列的一批日军钢盔。在参观者看来，很明显，共产党军队同南斯拉夫游击队一样，在战争中是“可贵的盟友”，如果对他们使用得当，可以加速实现胜利。斯坦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写道，任何一位盟军司令都会为能够“指挥这样身体健壮、顽强善战的军队而感到骄傲”。

虽然这些报道在重庆受到严格的新闻检查，有的甚至整

篇被砍掉，但是消息中的热情态度是抹不掉的。记者们向报纸读者介绍了共产党领导人，使他们知道这些领导人是通情达理的。消息谈到毛泽东如何刻苦读书，发奋上进；党的西北局负责人高岗①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其父因交不起驴头税，被陕西军阀的地方官活活打死；干劲十足的杰出旅长王震当年怎样在京汉铁路上当火车司炉。记者们谈到医务人员、学生、大学教员以及以前的基督教青年会人员都在“干劲十足地为他们的祖国工作，深信他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第二批新闻记者秋天去共产党地区访问时，他们报道说，共产党地区的梨、葡萄、南瓜、西红柿、荞麦、小米、棉花、烟草等粮食水果都获丰收。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兴高彩烈地叙述了地方戏剧艺术以及延安的十辆汽车用油不受定额限制，《纽约时报》还为他的报道加了一个友好的标题《延安，中国的一座仙境城市》。记者们报道了他们的所见所闻，十分遗憾，关于这一切，长期严酷的历史证明，他们报道的一切居然全都是事实。

谢伟思在汇报美国军事观察组去共产党地区参观情况的报告中也有同样深刻的印象。他发现共产党军队的士气高昂，人们干事认真，在得力领导下有责任感，目标明确。苦力能看报纸，新兵走路不需人看守，没有宪兵，没有官僚主义，没有“重庆的那种华而不实的东西”，也没有重庆的失败主义情绪。共产党地区有某些自满情绪和以为自己的事业正确的思想，但是没有任何人觉得受到限制或压抑。人们有自信心和

① 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露和批判了高饶反党联盟的罪恶活动。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将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开除出党。——译注

自重感，强调同普通人民保持联系，对于同人民关系很密切的工作给予很大推动力，这种动力“是不容易破坏掉的”。

美国派军事观察组去共产党地区考察的目的是：估价共产党在抗日方面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这个观察组由空军、医务部队、信号部队、步兵等部门派出的九个人组成。一个月以后又派遣了第二个军事观察组去共产党地区。军事观察组还奉命估计出“援助共产党的最有效办法，以便增加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这就意味着美国要向共产党提供援助并同共产党建立关系，而这正是蒋介石所担心的事，也是他千方百计阻挠观察组前去参观的原因。

毛泽东也想到了美国援助。他明确表示希望美国军队在中国登陆。他说，如果美军不能在中国登陆，那对中国是不幸的。“国民党将继续执政——而它并没有能力执政。”

包瑞德、谢伟思在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举行的会谈中，共产党的主要论点是，国民党是无能的“垂死”势力，而共产党已经建立了一个有生命力的政府，而且提议可以在“盟国”指挥下而不是在“腐败的”国民党指挥下同美国进行有益的合作。共产党人只字未提在史迪威指挥下作战的事，也没有要求向史迪威转达这样的建议；包瑞德上校确实感到，“共产党人从未对史迪威将军有多大兴趣。”

共产党谈到的是联合而不是革命。他们这个时候的公开目的是重新建立统一阵线，派代表参加要建立的国民议会，解除对共产党的封锁，让共产党在自己的地盘内保持自己的政权，同时共同努力抗日，即使不是携手一起也罢。这个主张既不包括效忠于中央政府，也没有接受蒋介石提出的承认中央

政府权威的要求。

1944 年的中国共产党并不令人感到可怕，恰恰相反，它同许多尚未取得成功的挑战者一样，倒是有些吸引力。共产党人的粗布衣衫，诚挚的谈话，艰苦的工作，简朴的生活，他们的精力、活力和诚心诚意，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对照，使人振奋。这是共产党人吸引人的主要方面。中央政府不愿同日军作战，尤其在日军发动"越后"行动以后更是如此。因此美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必须同共产党人合作。作为军人，共产党人看来是顶用的。正如多恩将军后来证实，同国民党军队相比，共产党人是"体质较强的人，吃得较好，穿得较好……士气也比国民党军队高"。总的来说，共产党领导人能力比较强，腐败现象较少，从根本上比国民党领导人坚强得力。

蒋介石很清楚，如果史迪威或是其他任何美国人——不论是谁——掌握了中国的军队领导权，他这个委员长就无法控制美国同共产党人合作或者给共产党援助的程度了。他不需要再有其他什么理由来决定他的态度。8 月 9 日，华盛顿方面向蒋介石提出由赫尔利将军任联系人，并且强烈要求他对史迪威的任命"立即采取行动"，"否则也许就为时太晚了"。蒋介石仍然躲躲闪闪。他一方面表示高兴接受赫尔利为联系人，另一方面答复说，史迪威的任命问题需要作充分准备和"深思熟虑"。

挑选赫尔利担任联系人纯属偶然，最后成了不幸的事，虽然挑选他时还是有信心的。马歇尔对此是有责任的。他曾经坚决反对在罗斯福总统和委员长之间设立一名联络员的主

张，但是当他听说霍普金斯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便急急忙忙抢先一步。他希望能务必挑选一个同史迪威友好的人，担心霍普金斯受到宋子文、陈纳德集团的影响。当史汀生提到他希望给“帕特·赫尔利找一个适当的职务”时，马歇尔就抓住这个机会，认为赫尔利是史迪威能接受的人，而且这个人能够平息由于史迪威的“极不圆通”造成的紧张关系。马歇尔当天就征求了赫尔利的意见，几小时后，渴望提名的赫尔利就来到国务院，告诉斯退丁纽斯副国务卿说，马歇尔派他去中国，他愿意以大使的身份去中国。虽然斯退丁纽斯劝阻赫尔利，但是赫尔利坚持要把他的要求转告给赫尔国务卿。在史汀生看来，挑选赫尔利担任联系人是“非常值得庆幸的”。“赫尔利忠实、明慧、精力极为充沛……既心情愉快又有外交家的风度”，“他是我和马歇尔俩人都认为能够根本扭转史迪威遭到暗中辱骂和指责的窘困局面的唯一合适人选。”马歇尔征询史迪威的意见，史迪威同意赫尔利这个人选，他的理论是，“要做好菜，既要有醋，也要有油。”

罗斯福对选定赫尔利也是满意的。有一次，摩根索对派遣私人使节是否有用表示怀疑，罗斯福回答说，“唯一能够不受人议论的事就是我了解我手下的人。”他相信赫尔利有能力恰当地完成他担负的使命，但罗斯福打电话问马歇尔，能否让近来任军备生产局局长的唐纳德·纳尔逊（以前是澳大利亚罗布克人）也随赫尔利去中国，马歇尔真是弄得不知所措。当时纳尔逊和他的继任人查尔斯·E. 威尔逊之间发生的激烈争吵正把政府弄得乌烟瘴气。马歇尔询问为什么要派纳尔逊去中国，罗斯福平静地答复说他想把纳尔逊弄出美国，马歇尔

后来说，他是同情这个主意的。马歇尔赞成纳尔逊去中国的条件是，纳尔逊去中国不得干预政策或者战略方针，只能出售刮脸刀片。为了便于公开宣布，纳尔逊去中国的任务被说成是“考察中国经济”。

对纳尔逊的任命是根据政治原则而任命的。摩根索这时同他的助手哈里·德克斯特·怀特谈起纳尔逊说，“你在华盛顿要呆上三年时间才能知道你是不是饭桶”。怀特回答说，“假如是饭桶，就能得到高升重用。”

8月23日，美国对蒋介石提出的三项条件的答复包含在罗斯福给蒋介石的第二封信中，这封信的语气比第一封信更加傲慢了。这封信与往常的信件一样，是由陆军部起草的。对蒋介石认为是要素的三个条件，这封信则认为是“枝节问题”。这是罗斯福和马歇尔俩人同孔祥熙讨论之后所获的印象，孔祥熙无疑按中国人交际中的温和方式缓和了蒋介石的措词。

对于第一个牵涉到共产党的条件，罗斯福说，“我认为对于要受史迪威将军指挥的军队是不应加以限制的……当敌人逼我们陷入可能的灾难时，要拒绝任何愿意杀日军的人的援助看来是不明智的。”美国一心把日本视为敌人，罗斯福及其政府以为中国也视日本为敌。在罗斯福及其政府看来，这样一种情况从来不是真实的：委员长竟然视共产党人是比日本人更危险的敌人，并据此制订对策。霍普金斯在中国问题上也同样是迟钝的，他同戴维斯谈话时不理解，为什么戴维斯认为史迪威对他即将担任的新指挥职务会持“怀疑态度”，为什么觉得史迪威的指挥权“总是会受到削弱”。霍普金斯认为，史迪威会拥有“很大的权力”，因为他会让白宫为史迪威撑腰。

对于第二个有关指挥关系的条件，罗斯福建议，蒋介石同史迪威的关系应当是“一位国家元首同他的战地司令的关系”。史迪威的新职务应当意味着“他在你的直接领导下指挥中国的武装部队”。

关于租借法案援助，罗斯福告诉蒋介石，华盛顿正在作新的安排，“卸掉史迪威将军的这个担子”，并将随后把新的安排告知委员长。与此同时，罗斯福还严厉地提醒蒋介石，“使考虑和安排的时间拖下去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后果。”他敦促蒋介石“采取必要措施，尽早让史迪威将军在你的领导下指挥中国军队……如果再拖下去，可能会为时太晚，无法避免对于中国以及盟国尽早打败日本的计划带来的灾难性的军事悲剧。”

蒋介石并不那么感到迫切需要这样做，这是因为他并不象华盛顿那样怀疑他能继续掌权或者担心他垮台。蒋介石从内心里完全打算置身于战争之外，必要时他就呆在中国西部的几个省，不管在中国东部丢掉了多少地方。等到盟军打败日本，他就可以站到胜利者一边。不管日军“越后”行动攻势造成的局势多么危急，由于这次攻势是对准华南地区同他有矛盾的势力的，蒋介石也许并不完全感到不高兴。中央政府的军队并没有投入战斗。

的确，正如高思报告所说，蒋介石同外界的接触越来越少，“除了他自己以外谁也不相信”，结果对他的国家和人民的状况恶化到了什么程度茫然无知。他没有表现出十分惊恐，这就引起了一种传说：他心里是安定的，因为他已同日本人达成了某种协议，但是这种传说却不大可能有什么根据。他的军队的状况并没有使他非常发愁，一部分原因是他从来没有

见到过挨饿的士兵，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的全部希望是美国继续装备他的军队，使他的军队比共产党的军队强大。他把力量和军备等同起来，忽略了组织、动员、领导和基本营养。至于其他方面，他一直被陈纳德说服，相信可以依靠空军取得胜利。他根本不切望美军在中国登陆，也不急于搞中美联合军事行动。他不喜欢让大批外国人进入中国的主张，尤如在他以前的北京朝廷不喜欢外国人进入中国一样。蒋介石认为他无需再作什么努力就有人替他打败日本。要说蒋介石有什么政策，那就是趁盟国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打败日本的同时他继续保住自己的权力。至于外部敌人，蒋介石作了一个精明的估计，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估计是有道理的。

美国派军队去中国会不受欢迎，这种看法在华盛顿是不容易为人接受的——虽然在中国的一些美国人是懂得的。谢伟思6月份为华莱士访华准备的情况简介中说，在我们认识到蒋介石政权能够打却不愿再去打日本人之后，“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认识到它甚至有可能企图进行阻挠，不让中国成为向日本地面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战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谢伟思的上述看法被陆军部或白宫所接受。即使史迪威欣赏谢伟思的这种看法（史迪威不可能不欣赏），在史迪威的脑子里，不放过接管中国军队指挥权的机会的考虑和他对自己的信心很可能比这种看法更起作用。

华盛顿在研究租借法案援助的安排时规定在重庆设立一个中美委员会或有关机构来估量各种要求，在得到华盛顿批准后，有关物资就可以直接运给前线部队；直到那时才把所有权交过去。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消除对史迪威职能的最有争议

的方面，特别是预计到重新打通滇缅公路以后运送的物资会大大增加。这种新的安排还会使中国处于更类似其他大国的地位。马歇尔就这个问题给史迪威去的一份电报中设想，今后的援助将交给中国的各支军队，其中包括共产党军队，假如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联合起来抗日的话。在解决指挥方面同中国关系的方案中，最后决定把中缅印战区分开，史迪威勉强同意了这个决定。

赫尔利和纳尔逊9月4日抵达新德里，史迪威前去迎接。史迪威对于他们两人显然打算去“敲桌子”的意图感到鼓舞。赫尔利和纳尔逊两人都是大高个，仪表堂堂，谈起来更是大话连篇。他们两人成了美国手腕的绝妙体现者。赫尔利说，“首先我们要告诉蒋介石该做什么”，纳尔逊接着补充说，“然后我们再向他解释美国打算做什么”。纳尔逊对此作了阐述。他说，他们打算向蒋介石提出两个条件：其一，中国必须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意思大概是要同共产党人求得解决办法），其二，中国必须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以此证明它希望帮助盟国打败日本。纳尔逊说：如果蒋介石拒不合作，他们就“建议罗斯福总统抛弃中国，把我们的基地转移到俄国”。如果蒋介石愿意合作，他可以指望美国战后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并把日本的企业机构转交给中国。史迪威忍不住高兴的心情，觉得他提出的要求中国对美援给予酬答的主张终于得到了支持。

史迪威于9月6日抵达重庆，次日上午他奉召于九时三十分与委员长会晤，而蒋介石知道赫尔利和纳尔逊于十一点钟去见他。“为什么我一人在他们之前去见他？是为了消除

积怨吗？”蒋介石说起话来就似乎史迪威的指挥职位已不成问题，就如同他在1942年以前第一次缅甸战役时期谈话的神情一样。史迪威说，“蒋介石告诉我，以前，我的工作百分之百是军事性质的；现在，作为中国军队的司令，我的工作百分之六十是军事性质的，百分之四十是政治性质的。如果我使用共产党军队，他们就得承认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权力。他愿意时常给我出主意……他完全信任我。他相信我认为中国军队指挥官无能的看法……现在要我来干……我该怎么做？”

第十九章　“胜任”的限度

1944年9月—11月

解决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因为蒋介石迄今仅仅是口头上表示接受而已，他向美国提出的三个条件一个也没有得到满足。赫尔利9月8日与蒋介石开始谈判时新的争论出现了。委员长要求在密支那的中国军队向南面的八莫发动进攻，把龙陵的日军吸引过去。史迪威反对这个要求，理由是密支那军队需要休息，而自从5月份参战以来没有得到兵员补充的Y部队，如果补足兵员，是可以拿下龙陵的。史迪威估计，不论怎样，日军不需从龙陵调动部队就能顶住对八莫的进攻。按正式的关系，史迪威的拒绝是有道理的，因为蒋介石无权向蒙巴顿的战区发布作战命令。但是史迪威这样藐视蒋介石的见解，就成了蒋介石痛恨他的一个新起因，这个痛恨不久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关于共产党军队的问题，蒋介石重申了他的条件：他们必须合编到国军中去，必须完全归他管辖，然后史迪威才能指挥他们。作为国家元首，蒋介石的要求是不能再低了，但是这个条件不大可能实现。英国政府这时询问它的驻华大使霍勒斯·西摩爵士，英国是否应该出面促使国共两党达成一个妥协，西摩大使认为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结果。他认为，国民党早已威信扫地，国民党的军事指挥“极为幼稚无能”，中国军人

很强的作战能力完全被浪费了。深知国民党这一状况并且意识到自身力量的共产党人肯定不会对中央政府作重大让步。连霍勒斯爵士都明白这一点了，蒋介石是不会完全没有觉察出来的。按照他的这个条件，任命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的事肯定要告吹，且莫说其他什么条件了。

谈到租借法案援助时，宋子文明确表示租借法案援助必须由委员长掌握。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赫尔利要他"在记录中着重写上双方'意见不一致'……蒋介石想得到的是：美国给他处理物资的全权。现在我们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候了。"由于史迪威在缅甸北部取得的胜利，这种全权现在比以前更有油水了。夺取密支那使空军运输队可以在更靠南面的航线上飞行，不用担心日军战斗机的攻击，因而大大缩短了喜马拉雅航线的距离，降低了飞机飞行的高度。空运物资6月份增加到一万八千吨，7月增加到二万五千吨，8月达到二万九千吨，后来，9月几乎达到三万吨，10月达到三万五千吨，11月达到三万九千吨。实际上，拿下密支那以后，喜马拉雅航线就不再使用了。到1945年1月滇缅公路重新打通时，空军运输队每个月的运输量高出地面的运输量，这使得史迪威的对手们幸灾乐祸地以此来证明，史迪威坚持要重新打通滇缅公路是多么愚蠢和陈腐。但是喜马拉雅航线上飞行高度的降低是事先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而起作用的正是地面作战部队。

直到这个时候，中国军队的糟糕状况使蒋介石不能再不去注意了。起初，蒋介石根本不相信生病挨饿的新兵在重庆闹市转运站奄奄一息的消息，他派他的儿子前去调查，调查的结果证明是事实。据几小时之后重庆全市流传的消息说，蒋

介石亲自到重庆街头视察，发现情况确如所报，看到墙角躺着两具饿死的新兵，顿时火冒三丈，用他的手杖朝着征兵部门头目的脸上抽去，下令逮捕他。蒋介石任命另一人来担任征兵部门的头目，但是征兵部门的情况并未好转。整个 8 月间，共有一百三十八个士兵倒毙于昆明街头。据说蒋介石终于考虑采纳史迪威两年前建议采取的加强各部队的措施。

在这种岌岌可危的形势下，蒋介石极需掌握军事物资的分配权，尤其是务使军事物资不落入共产党人的手中。在 9 月 12 日与赫尔利举行的第二次谈判中，蒋介石的态度“非常难办”。他坚持要控制租借法案援助，他说史迪威“在中国握有的真正权力”比他大，这大概是由于史迪威控制着租借法案援助的缘故。根据美国提出的新建议，租借法案援助的分配工作由设在重庆的一个美国委员会负责，中国派一名代表参加该委员会，但是在蒋介石看来这并不保险。高思清楚地看出并说出了蒋介石的心事：随着战争向中国沿海逼近，“看来我们势必要决定是否给同日军作战的中国共产党人供应美国武器装备的问题。”高思指出，由于这样做可能会违背蒋介石的意愿，这个决定就会使蒋介石政权倒台。

史迪威在给赫尔利的一份备忘录中直接和坦率地陈述了他对共产党人的立场。“将使用（共产党）第十八集团军。在这一点上不应有任何误解。可以在他们不会同中央军发生冲突的地区使用他们，但是应当同意他们是危机期间的伙伴。”

上面这个见解未必就象后来在歇斯底里式反共时期所说的那样，是一个阴谋家利用共产党推翻蒋介石的秘密阴谋。后来参加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反共歇斯底里的赫尔利当时

接受了史迪威的主张，并没有提出异议。史迪威也同样向马歇尔坦率地谈了他的意见。“如果让蒋介石和共产党人控制供应物资，你知道谁会得到供应物资。你也知道谁不会得到供应物资。我们必须设法把武器交给愿意打仗的共产党人。”“愿意打仗”这几个字是史迪威的兴趣所在。

史迪威于9月13日接见了共产党的两位使者，这两位使者向史迪威转达了朱德和毛泽东的问候。史迪威没有记录他同两位共产党使者讨论了什么问题，只是向马歇尔汇报说，“他们转告我，愿意在我的指挥下打仗，但是不接受蒋介石任命的中国军官指挥。”据史迪威的日记记载，他告诉这两位使者，他愿意去延安访问，两位使者离开的时候很高兴。

共产党人在延安同谢伟思举行的讨论中，对中央政府的某种反对态度比史迪威更强烈。他们在谈话中似乎小心翼翼，不愿承认中央政府权威。他们显然不指望立即得到美国的支持，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们极为谨慎。周恩来说，任何“积极合作”的行动肯定都会遭到国民党强烈而顽固的抵制。谢伟思问到延安的军队是否愿意在美国人指挥下打仗，周恩来说是的，“如果中央政府同意的话”，但是这个问题要等到美国的人员和物资大批进入中国和向日军发动的反攻确实已在望的时候才能定下来。周恩来认为，在目前，可以慢慢来，谨慎行事，实现“适当的合作”。谢伟思的报告建议，这种合作可以采用向共产党提供它“奇缺”的基本军事物资的形式，并帮助共产党军队训练如何使用这些装备，随着战争的发展，这种合作能够成为“实际的战术合作”。

在当时的情况下，不仅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亲”共产党的

人，任何其他人也都会主张美国同延安政权建立联系，向它提供援助或是进行战术合作。这是一种显然是由于中央政府的无能和华北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军事权宜。日本令人畏惧的关东军在满洲和华北地区虎踞龙盘，如何对付估计日军要进行的长期抵抗的问题是美国作战计划制订人伤脑筋的事。美国军事观察组去延安的正式目的是想探明共产党的军事潜力。在设想派观察组时共产党并未插手，在美国政府中的特工人员也未协助。在史迪威主张派观察组时以及在陈纳德主张派观察组时——这是很怪的事——都同样是没有意识形态内容的。陈纳德9月份认为妥当的办法是给罗斯福总统写信，谈谈他不愿对他的保护人蒋介石说的事，他在信中说非常有必要支持“在重庆实行彻底的改组，然后使重庆和延安实现真正的统一”，这件事必须摆在“绝对优先的位置，优先于所有其他军事或政治目标”。陈纳德所说的“真正统一”与他的要打垮日本的大话一样是痴人说梦，但是并不能因此而称陈纳德是亲共产党分子。

要求同延安建立关系的主张是在1944年的形势下提出来的。有些人看到的也许不只是军事上的得策，他们希望美国给延安援助可能导致国民党的垮台。这些人抱这样的希望也许是相信这样做完全对中国有利。据认为取代国民党政权的不会是刻板的共产主义制度。为什么不会是刻板的共产主义制度呢？原因就在于谁也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种否定的假设是从下面的推理中得出来的：虽然共产主义据认为是一件坏事，但是在中国它则多方面起到了好事的作用；因此它不可能是正统的共产主义。罗斯福

总统和卡尔森上尉当时在来往信件中称中国共产党为“所谓的共产党人”①，这就解决了如何称呼中国共产党的难办问题。这个称法后来就成了官方函件中的习惯用语。史迪威一贯称共产党人为“赤色分子”，他在国民党初期也称国民党为赤色分子(在1911年间也用“造反分子”一词)，他用这个词是表示他认为他们是革命者。在得过邦克希尔战役英雄称号的史迪威看来，革命这件事没有任何本质上不合美国传统的地方。中国长时期以来就一直需要开展革命。在大多数认为有此需要的美国人看来，共产党人好象是现代的太平军。共产党人被认为是一批精神饱满的进步分子，或者用当时的话来说，是“土地改革者”（史迪威曾经称他们是“农业自由主义者”）。这也不一定是天真的看法。

毛泽东和他那一批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农民运动方面取得的胜利的象征。对于列宁关于党的作用及党夺取政权的教条，他们则使它像座冰山，只露出不那么显眼的尖端。他们的目的是要以有益于中国农民的手段而不是以马克思所开列的在西方工业化社会中进行革命的那些手段来争取中国的主要力量——农民。实际上，土地改革是共产党人建党建军、建立根据地、开始改造中国的过程中主要关心的问题。在1944年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往后在国际事务中与谁结盟未必已成定局。如果美国同它建立联系，中国共产党会走什么样的道路呢，这个问题由于错过机会已经永远也无法解答了。唯

① 1944年11月15日，罗斯福总统写信感谢卡尔森转给他周恩来的一封有关美国军事观察组的信件，罗斯福说，“我希望并祈求能同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真正解决问题。”

一能够肯定的是，事情不可能弄得糟糕。

史迪威关于他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的设想应具体地包括他原先想改组中国军队的计划。他把这个设想写进了由他起草的蒋介石在任命他为中华民国战地地面部队和空军司令的同时发出的一项指示之中。这个指示授权史迪威立即着手准备对日军发动反攻，改组和调动中国军队，其中包括有权“越过地方和战区司令”的管辖权，成立新部队，解散旧部队，在部队之间调动人员或是从某地方或指挥官那里调出部队，调到另一个地方或指挥官那里。在这方面，这个草案除了含蓄地留有余地之外，只字未提共产党军队。这个草案还进一步授权史迪威“立即制订出改善官兵生活状况的计划……以便至少达到与后方人民相当的生活水平”。

由于这个指示草案中承认中国军队的生活条件差，要指望蒋介石签发这个指示是不现实的，这个草案也许代表了史迪威的最大愿望。史迪威甚至可能相信，由于他得到他以为现在为他撑腰的美国政府的支持，可以迫使蒋介石接受这个指示草案。赫尔利自然没有反对意见，就把拟就的委任书和指示呈交给蒋介石过目。在通常的等待批准的期间内，史迪威同何应钦就Y部队补充兵员问题发生了争论，Y部队的有效战斗能力现在已下降到一万四千人。史迪威想方设法以一批加拿大制布朗式轻机枪换取了何应钦给Y部队补充一万兵员的保证。“他们在河南损失三十万兵力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我要一万人补充战斗减员却累断了脊梁骨。”

在中国东部地带，美国的第二个空军基地陷落了，日军正

向中国南方素有巴黎之称的桂林推进。一切迹象表明，桂林的陷落就在眼前。东部地带守卫部队疲乏而缺乏组织，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沙俄军队缺乏计划和粮秣弹药的状况一样。部队用的是陈旧的武器，有时还不能每人一支步枪，或是有枪没有子弹。虽然一般说部队配备的机枪不少，但是配备的火炮很少，炮弹不足。即使有的师有足够的野战炮，这些炮也被一门一门地分散到下面部队。由于前线指挥官同重庆之间的争吵，由于总参谋部摇摆不定的战略和极不称职，由于蒋介石举棋不定和他对南方诸指挥官不信任，协调行动成了一句空话。结果，给南方前线指挥官们的军需品供应和增援部队不是数量极少就是时间拖得太久。蒋介石竟然以为，桂林以北七十英里的山区防线可以坚守三个月，但是日军只用了三天就打通了道路。蒋介石有一种嗜好，在使用一支部队的同时保留一支部队，以免双双遭损失。由于蒋介石的这一嗜好，薛岳和桂林地区战区司令张发奎想把军队集中到一处的努力都遭到了失败。在这同时，瘦骨嶙嶙、衣衫褴褛的士兵们冒着酷暑爬上山顶，坚守他们孤独无援的阵地，结果都葬身于日军的炮火中。

就在日军进击广西的同时，蒋介石为了封锁共产党而部署在华北的十六个军却按兵不动。中央政府派往桂林解围的第九十三军对当地的地形不熟，打仗的时间还没有抢劫的时候多。据随军采访的白修德报道，第九十三军的军长"不知道他的侧翼在哪里，不知道同其他部队的距离有多远，不知道日军占领了哪些村庄"，没有打一枪就把他应该守住的阵地丢弃了。背井离乡的老百姓堵塞路上，而为日军效劳的第五纵队

则趁机放火制造惊慌。

史迪威于9月14日飞到桂林同张发奎磋商，并决定对大批美国空军设施如何处置。张发奎告诉史迪威，委员长命令他带着唯一剩下的几个师退到桂林城里，在城内守住桂林，这种主张是张发奎所不同意的。史迪威认为，蒋介石的这个决定是要把桂林变成"又一个鼠夹"。张发奎说他可以坚守桂林两个月，但是除了动用不可靠的第九十三军以外，他没有力量保护桂林机场。在同陈纳德磋商以后，史迪威狠心下了一道命令：撤退美国人员和装备，破坏机场所有的跑道，只留一条跑道，以便在最后时刻为被围困的桂林守军运送武器弹药。史迪威离开桂林以后，空军运输队的运输机就飞到桂林，把当初经过喜马拉雅航线付出高昂代价一吨一吨运来的炸弹、汽油、零配件、卡车以及修配所设备运走。空军运输队留下五百五十桶汽油，供爆破队烧毁有关设施时使用。这就是蒋介石1943年"亲自"向罗斯福作出的他的军队定能保卫空军基地的保证的价值。

两个月以后，即11月底，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人员在桂林以西二百英里的贵州省独山附近的一座山洞里发现了一批秘密贮藏的武器。在大约二十座每座约有二百英尺长的仓库里，一共贮藏了五万吨武器弹药，其中有五十门崭新的野战炮和许多炮弹，这批武器弹药是中央政府近年来储存以便在华东局势需要时使用的。到后来，桂林和柳州陷落了，日军向贵州挺进，重庆战战栗栗，而这批武器弹药仍然放在那里准备对付危机呢！

史迪威到桂林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就奉召回重庆同委员

长举行会议。对日军的突破感到惊恐不已的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等于是最后通牒的要求：要么命令在缅甸的军队于一个星期之内向八莫发动进攻，解除在龙陵的中国军队的压力，要么他就命令Y部队撤回萨尔温江以北，保护昆明。他担心龙陵失守以后，日军会向昆明发动进攻。由于昆明和重庆同处在一条内线上，日军可能向昆明发动进攻的前景一直使蒋介石最为担忧。蒋介石的最后通牒实际上就是结束在缅甸北部的战役，当时这个战役眼看就要取得最后胜利了，而拿下缅甸北部就完全打通了通往中国的公路。

史迪威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这个发疯的小杂种，利多公路的小事被忘却了。整个战线上我们唯一没有控制的地方是龙陵，而他却要把它放弃掉，破坏我们整个的艰难计划——使两年半来我们为帮助中国所花费的人力、金钱、物资、时间和汗水付诸东流。真不可思议。他的榆木脑袋根本想不到这个……常常是一些荒诞的理由和愚蠢的战略战术概念。他这个人叫人无法容忍。”正在这个时候，Y部队拿下了有城墙的腾冲，腾冲控制着一条通往缅甸的小路。由于何应钦保证给史迪威派去一万名补充兵员，拿下龙陵看来大有希望。

史迪威立即把蒋介石的意图报告给马歇尔，史迪威说他对委员长的意图“感到吃惊”，并且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但是没有使蒋介石信服，因为他“根本不听任何道理……。我现在确信，他认为华南的灾难性局势没有什么了不起，相信日本鬼子不会在华南地区进一步找他的麻烦，他觉得他可以撤到萨尔温江阵地以北，在那里坐等美国打完这场战争。”蒋介石和史迪威两人作战理论发生根本思想冲突的原因就在这里。

在史迪威整个任职期间，委员长的每个行动和决定都是从保存人力物力以待夷人打败夷人的这一原则出发的。在中国人看来，这样做是明智而有道理的。在提供财力并相信只有采取行动才能左右命运的美国人看来，这样做是不可接受和没有道理的。这种看法上的分歧是永远也无法弥合的。

史迪威决心设法同宋子文进行一些“坦率的交谈”，希望通过宋子文把看法传给蒋介石。由于宋子文受过西方教育并熟知西方想法，他是最有可能成为史迪威同蒋介石联系的桥梁，但是此人办事非常圆滑，有些时候靠不住。宋子文的坦率和友好态度对外国人非常起作用：赫尔利给他迷住了，纳尔逊向他作出保证。由于宋霭龄和宋美龄姐妹不在国内，宋子文的地位得到了加强。人们谣传说蒋介石拒绝把他的一个姨太太赶出家门。谣言传出几个月之后，蒋夫人于7月1日离开中国去看望住在巴西的孔祥熙夫人。委员长在为夫人饯行的宴会上公开否认他有外遇。蒋夫人9月间抵达美国时，关于蒋介石夫妇婚姻纠葛的传闻非常多，中国大使馆不得不出来予以否认。蒋夫人在国外呆了一年多时间，直到1945年9月才回国。

史迪威同宋子文进行的坦率交谈不仅没有弥合双方的分歧，反而把双方分歧彻底暴露出来了。双方都对分歧之大感到吃惊。据史迪威事先记下的笔记，他打算告诉宋子文，委员长必须打定主意“做他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就是任命一位享有全权的总司令——如果他不愿这样做，史迪威要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建议就是“完全从中国和印度撤出，在其他地方建立基地”。史迪威还打算要求任命陈诚和白崇禧分别接替

何应钦的军政部长和参谋总长职务。当史迪威讲了这些以及在他的指示草案中提出过的条件，宋子文“对于我们关于战地司令的想法同委员长的想法分歧之大感到吃惊”。宋子文反过来向史迪威解释委员长关于这个职位的想法时，史迪威十分愤慨，他把蒋介石的想法加以概括，说这就是要别人当一个“地道的傀儡”。

史迪威告诉宋子文，他并不想担任那个“像上帝那样威风的职务”，但是如果让他担任这个职务，他就应当享有充分的权力，否则他不担任这个职务。如果他担任这个职务，“委员长就不得染指我的事务。”史迪威说他四十四年来一直渴望着能有机会指挥美国军队，如果他不是中国的真正朋友的话，他的希望可能早就如愿以偿了。

同任何处于进退维谷的人一样，史迪威的心情是矛盾的。他当初确实放弃了指挥美国海外作战部队的机会而来到中国，但是当初交给他执行的“体育家”行动计划的艰苦条件也可能促使他作出了到中国的决定。按常理，他确实不想在中国担任目前仍然有争议的这个职务，然而同时他又想担任这个职务并尽一切努力去争取它。他对中国的责任感是非常强烈的。史迪威同白崇禧就桂林局势举行磋商以后，拟定了一项比委员长“特别鼠夹”计划有效得多的防守行动计划。这项计划并不是要求留守部队在桂林城里受围困，而是要求这些部队在特定的阵地和带着特定的目标灵活作战。一旦作战失利，这些部队不至于全部损失，至少可以撤出来同史迪威打算在贵州集结以便最终向沿海发动进攻的部队会合。这个计划于9月18日呈交给了委员长。

史迪威向马歇尔汇报时所说的蒋介石扬言要把Y部队撤回萨尔温江以北的威胁点燃了最后的“爆竹”。史迪威给马歇尔的电报是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期间发出的，丘吉尔和罗斯福在这次会议上就今后如何对待德国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联合参谋长会议也就战略和计划方面的新旧问题展开了争论。不管双方的语言多么刻薄，所有这些争论至少都表明事情有了进展。中国问题是会议感到严重失望和不知所措的领域，无论是两位政治家还是指挥官们都没有就在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方针的问题达成一致或调和的意见。

罗斯福任总统，从萧条时期到战争年代，已经有十二个年头。最近的三年中，他每天至少要花十六个小时作决定、解决危机。他实在被纠缠得精疲力竭，不想提出任何新的思想或作新的努力。在军事上，形势已表明中国是盘输棋，到现在为止，除了把中国继续作为牵制性战区以外，已不十分需要它了。在这次魁北克会议上形成的战略目的就是继续使中国参战，只此而已。美国不打算向中缅印战区派遣任何部队；马歇尔在这一点上是明确的。尽量把在缅甸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任务留给英国，这样美国就不会卷入收复英帝国殖民地的行动——也可以说美国是有意避开的。

现在，除中国东部一带不断陷落以外，蒋介石又傲慢地拒绝或是威胁地拒绝继续参加为打破他自己遭到的封锁的努力。在9月16日的会议上，马歇尔当着罗斯福和丘吉尔的面把史迪威电报的要点报告给与会人员。马歇尔来时显然已拟好了答复蒋介石的文件，因为会议记录中以许多含蓄的用语记载着如下的话，罗斯福总统给蒋介石发去了一份“函件”，指

出委员长必须为他的行动引起的一切后果负全部责任。这份六百字的“函件”是由随同马歇尔出席魁北克会议的参谋人员起草的，上面还有马歇尔亲笔给罗斯福写的建议：“我建议你把如下所拟电文发致委员长。”罗斯福在文末大笔一挥签了名。

美英两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对外政策都是在军方左右下的各次重要联盟会议上制定的，在这类会议上，军事参谋人员是会议的工作人员，至于文职官员，除了两国的元首以外，即使有人出席会议也是为数极少。身着壮丽军服的人把持着会议，每个人都显得比穿便服时威风得多。人是容易犯错误的，但这却被满胸的勋表和笔挺的服装掩盖起来了。从他们建议发给蒋介石的函件的性质来看，军界在执行对外政策，但是无人对此提出异议。史迪威在陆军部里的同事们与他一样愤怒，并且准备持强硬态度——不能说其中没有白人优越感的因素；美英两国恐怕不会向欧洲其他国家的首脑发出内容相似的函件。罗斯福不考虑蒋介石的尊严，或者说他漫不经心地在马歇尔的函件文本上签了名——但这两者是一码事。

函件电文的口吻就象一位校长对待一位迟钝而又无可救药的笨拙学生那样。电文重复了史迪威曾经设法塞进“榆木脑袋”的所有论点：如果不增援和支持Y部队，让它继续完成打通滇缅公路的任务，Y部队的英勇牺牲就全部白费了；把Y部队撤到萨尔温江以北正是日军所希望出现的后果；如果蒋介石打断这次军事行动，“我们就会失去打通同中国陆路联系的一切机会，并且会立即危及喜马拉雅空运线。对于这种结

果，你本人必须准备承担一切后果，承担个人责任。”电报接着说：

近几个月来，我曾屡次敦促你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抵御正在日益临近中国和逼近你本人的灾难。现在，由于你还没有让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所有军队，我们面临着在中国东部丢掉一个极重要的地区的危险，而这有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我们的军队正在跨太平洋迅速推进，但是，除非你现在就积极采取行动……来保卫你经过多年奋斗所取得的成果，来维护我一直为支持你而作的努力……否则此番进军对于解救中国也许太晚了。

我确信，你目前能够阻止日军达到其在中国的侵略目标的唯一办法是立即增援萨尔温江部队，继续使他们发动进攻，同时立即使史迪威将军能不受限制地指挥所有中国军队。我要你采取的行动将有利于我们作决断，也有利于美国为保持和增加对你的援助而打算继续进行的努力……。在我们这里所有的人看来，事情已经非常明显，如果再作拖延，你和我们为挽救中国所作的一切努力将付诸东流。

这份电报中没有任何一点站不住脚的地方；不足之处就是没有仔细考虑到它的影响。除非人们准备停止支持一个国家的元首，要不然向他发出字里行间说他不能胜任治国重任的函件就是毫无意义的了。由于美国并不打算停止对蒋介石的支持，这份电报就成了一份不中用的最后通牒，发电报的人必然要退却。

这份电报发给史迪威，由他转交蒋介石。史迪威当然认为这份电报表明华盛顿采取了果断的坚定立场。在他看来，“罗斯福终于醒悟了……。经过很长的时间，他终于坦率地说了话，在每一句里都有许多充满了火药味的用语……火药味

非常浓。”作为驻重庆的美国高级军官，史迪威有义务亲自把罗斯福的电报转交给委员长。假如他想避免做得罪一位国家元首(他需要得到这位元首的同意才能办事，并且必须同他合作)的人，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想出个办法，让赫尔利把电报转交给蒋介石。但是以罗斯福总统名义发来的、对蒋介石显然表示不尊敬的电报中的尖锐措词，激励史迪威不再自制。况且电报是发给他史迪威的，不是发给赫尔利的，也没有同时发来指示要(也无迹象表明希望)他缓和一下电文的冲击力。以前，蒋介石坚决不作战，这使史迪威的工作和使命两年半来无法完成，史迪威痛恨他，蔑视他。当蒋介石宣布打算撤离龙陵时，史迪威所积累起来的愤怒和蔑视情绪一下都爆发出来了。史迪威看到罗斯福总统电报中要求让他对所有中国军队有“不受限制的指挥权”，他欣然抓住这个机会，狠刺小人物的要害。

史迪威命人把电报译成中文，然后带着中文文本前往黄山公馆，蒋介石正在那里同赫尔利、宋子文、何应钦、白崇禧等人就史迪威拟任中国军队总指挥的条件举行会议。进入会议室以前，史迪威派人把赫尔利叫出来，把电报的内容给他看。赫尔利出于外交家的本能，主张缓和。他建议把电文的大意口头转告给蒋介石。这正是宋子文、蒋夫人等人过去转递信件时的一贯做法，史迪威亲自递交函件正是为了防止这种做法。他不同意向蒋介石口头转达电文大意，他亲自进会议室把电报呈交蒋介石。史迪威后来极其得意地写道，他“把这束辣椒交给了小人物，然后坐到椅子上深深地吸一口气。这一下正击中蒋介石的要害。”蒋介石毫无表情地看了一下电报的

中文译文，然后看看史迪威说“我知道”。蒋介石沉默地坐了一会儿，轻轻地晃动一条腿，然后宣布散会。史迪威后来写道，他当时心里想“怎么回事！没有发脾气？没有，只是镇静地沉默一会儿。我立即走出会议室，返回重庆的住处。长江对岸景色美丽，重庆已是万家灯火。”

史迪威后来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用诗详细表达了他的心情，他曾用这种诗来写那位“王八大使”。这首诗本来不应发表，但是尽管有不足之处，现在还是发表出来，以飨读者。

我等待复仇已良久，
机会终于来到。
我瞪眼怒视小人物，
朝他腿上飞去一脚。

旧有的鱼叉在手，
我掌握好目标和时机。
一股劲地刺下去，
刺他个前后心穿透。

小杂种哆哆嗦嗦，
呀！已无讲话之力。
他面色铁青肌肉抽动，
还竭力克制想不呼叫。

我劳累地征讨，

历经悲痛的时刻。
但我终于交好运，
今朝大煞小人物威风。

我深知自己还会受煎熬，
仍须艰难跋涉。
但是，啊！多么幸运、愉快！
我已使小人物丢尽了脸。

罗斯福的电报对蒋介石无疑是晴天霹雳。据说蒋介石这次会后狂怒不已。他很快就意识到罗斯福电报的含意。他知道，他要是接受美国提出的要求，只能使自己被抛弃。如果美国人成功地不顾他的意志而把史迪威强加给他，他们就有可能在共产党问题上也照此办理。高思并不是唯一能看出这可能会导致国民党倒台的人。这个问题要认真对待。在宋子文现实建议的引导下，蒋介石认为美国绝不会抛弃他，他准备来考验美国一下。罗斯福9月18日的电报给蒋介石找到了长期求之不得的借口。据宋子文透露，罗斯福的电报使蒋介石取消了让史迪威统帅中国军队的保证。

蒋介石和宋子文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取消对史迪威的任命而又不显得怪罪于罗斯福总统，他们不能疏远罗斯福，怕失掉美国的租借法案援助。就在宋子文施展他的技能来完成这项任务的同时，蒋介石却一反常态，镇定地接受了史迪威提出的防守桂林的计划。白崇禧被派去监督桂林防卫计划的执行。白崇禧9月20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史迪威，并且提到另一

个积极的迹象，第九十三军军长已被处决，史迪威用伏尔泰[1]的话说这是为了“鼓励其他的人。”

史迪威这个时候已经听说蒋介石发怒的事，但是他和赫尔利（尽管他事后曾解释）两人当时都没有觉得这是决定性的。桂林的情况看来令人鼓舞。史迪威认为他的地位加强了，因为他断定华盛顿已给予他非常有力的支持。为了打破在他任职问题上的僵局，史迪威于9月23日提出了一整套新建议，建议的内容是由他负责去延安同共产党人谈判他们承认中央政府权力以及接受通过他本人进行的军事指挥的问题。根据史迪威提出的建议，共产党军队部署在黄河以北，与中央军脱离接触。美国只向共产党军队的五个师提供装器装备。“这个建议肯定会取得成功！”赫尔利满有把握地说，并把建议呈交给蒋介石。

赫尔利大吃一惊。蒋介石告诉赫尔利的不仅是拒绝让史迪威担任指挥中国军队的职务，而且还正式要求美国政府把史迪威将军召回去。

在争取达到一个目的方面，蒋介石与史迪威一样是始终不渝的。蒋介石已决心要除掉继续与他本人和他的政权作对的一股力量。如果说他是压在史迪威身上的沉重负担，那么史迪威就是抽在他身上的鞭子。他们两人过去以及未来的关系都处在危急关头，而其中的根本问题是陈纳德计划和史迪威计划争议中包含的原则。因为一个是建议用美国空军为中国打仗，另一个是主张使中国人能够自己去打仗。如果蒋介石有魄力懂哲理因而接受了史迪威提出的改组中国军队的计

① 伏尔泰(1694—1778)，法国作家。——译注

划，他原会有力量抵抗日军1944年攻势的，并且非常有可能在后来同共产党发生的磨擦中打败共产党人。那样的机会现在已经过去了，蒋介石既不大可能承认有过这样的机会，也不会为失去这个机会感到惋惜。他所关心的问题就是除掉给他带来不可忍受的压力的根子。

蒋介石现在觉得他能冒风险来干件事了，因为赫尔利和纳尔逊两人的来到使他感到放心，美国会继续支持他。中国人很喜欢赫尔利，他们发现赫尔利与他们情投意合，通情达理，并且成了蒋介石的一条可以不必经过史迪威和高思而向罗斯福总统转达他的意见和希望的渠道。此外，纳尔逊起草了一项美国支持中国战后经济恢复的庞大计划，并且向委员长保证让他掌管租借法案援助物资，或者是由于交谈时译员译得很糟糕和听对方讲话时所怀的主观愿望使蒋介石产生了一种印象——好象纳尔逊已答应由他控制租借法案援助物资了。这的确是当时事态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①

蒋介石在白天举行的两次长时间会议上都提出了美国召回史迪威的要求，赫尔利竭力劝说蒋介石改变上述决定，因为这一决定意味着赫尔利自己的使命已部分失败。但是蒋介石觉得自己并非无所恃，他坚决不退让，就像他在西安被扣时一样的顽固。蒋介石把所有的罪过全部推到了史迪威身上。据蒋介石说，史迪威亲自向他递交罗斯福总统的电报是把他放

① 纳尔逊受到了大肆吹捧。蒋介石要他再到中国负责中国的经济恢复工作。他如果接受这个要求将是给中国以最大希望的“历史性事件”。“假如您不来，那么中国就似乎毫无希望了……。我把您当作一位中国公民，希望把恢复中国经济的全部责任都委托给您……。我将无条件地把中国的全部经济大权交给您。”

在史迪威的下级地位。委员长说史迪威拒不执行他的命令，拒绝下令进攻八莫，如果他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史迪威就会搞兵变来反抗他。蒋介石在一份备忘录中详细地叙述了他的理由。他指责"史迪威无意同我合作，而是认为他实际上是奉命来指挥我的"，史迪威"不适合承担新的指挥职务会加在他身上的重大而复杂的责任"，任命史迪威会给中美军事合作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备忘录向罗斯福总统保证，蒋介石仍然愿意任命一位美国人指挥中国的武装部队，并愿意进行有助于中美"协调"行动的其他重要改革。史迪威说，"这个文件毫无疑问出自宋子文之手。"

从这个时候起，在又持续了三个星期的谈判中，能确知谈判结果的只是蒋介石一人。蒋介石的地位虽然软弱，但他意志坚定，美国虽有各种有利条件，就是没有坚定的意志。在当时参加谈判的人看来，当时的事情并没有这么清楚。一心想当大使的赫尔利倾向于接受宋子文和蒋介石的论点：史迪威递交电报的做法是事情的起因，该予责备，并于9月25日在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中讲了这个看法。赫尔利还很入耳地听了宋子文的一番话。宋子文表示，他本人和蒋介石都认为，那份横蛮无礼的电报是出自史迪威之手，根据这个说法，电文内容是由史迪威向华盛顿提出的，然后安排以罗斯福总统的名义把电报再发到中国。要是史迪威真有这种无限权力，他倒是会感到高兴的。

在蒋介石正式要求美国把他召回的情况下，史迪威还继续争取得到指挥中国军队的职务，由此可以看出史迪威低估了蒋介石。他要得到这个职务不是为了提高他个人地位，而

是作为严惩敌人的一种手段。在同仍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进行的战争当中，打败日本是他关注的头等问题。他一心要获得上述权力是为了能够向中国沿海地区发动久已计划好的反攻。同以往一样，史迪威头脑里不愿承认有些事办不到，虽然他知道事实上是存在办不到的事情。他于9月26日明确地向马歇尔指出，蒋介石无意继续努力进行这场战争，“任何人迫使他采取行动必将受到阻挠或排斥。”但史迪威却继续迫使蒋介石采取行动。蒋介石过去在这类问题上曾经多次反复，因而有理由认为他这一次也可能有反复。据史迪威了解，蒋介石没有把他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的事告知全国军事委员会，甚至连何应钦也没有告诉，这表明他为自己依据华盛顿的反应再采取行动留有回旋余地。蒋介石显然在焦急地等待着华盛顿的反应，宋子文“极为紧张和心绪不安的状况”表明了这一点。

9月28日，按林蔚的建议，史迪威提出一个折衷方案。林蔚并不知道蒋介石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而是认为如果抛却指挥共产党军队参加战争的这一争议，蒋介石就会同意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史迪威把他的折衷方案交给了何应钦，表示愿意暂不讨论共产党军队的作用问题，集中精力建立一支由北部战区部队、Y部队和Z部队组成的一支大军，使这支军队“能在六个月之内发动进攻”。史迪威知道，这正是蒋介石不能容忍的压力，但是史迪威不得不提出这个要求，因为在他看来，除此以外还能用什么办法打败在中国大陆的日本军队呢？

在华盛顿，蒋介石又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的行动直接击

中了美国立场中的薄弱环节。这是因为马歇尔促使罗斯福采取了罗斯福本来就不真正认为会行得通的态度。罗斯福之所以接受马歇尔的意见，一部分原因是自开罗会议以来他对蒋介石感到幻灭以及对蒋介石长期以来拒绝动用Y部队感到恼火；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史迪威已经用行动证明是有才干的人；最后一个原因是罗斯福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可想。在战争时期盟国不听话是最难办的事。但是罗斯福现在还不准备违背一位国家元首的明白意愿把一位美国指挥官强加给他。那样做同他本人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主权所作的努力是无法调和的。由于蒋介石公言愿意任命另一位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罗斯福非常愿意在史迪威问题上退却。马歇尔坚决反对，就在两人为这个问题争执不下的时候，霍普金斯非正式地在一次晚宴上向孔祥熙谈了总统的态度，孔祥熙立即于10月1日打电报把罗斯福的态度告诉了宋子文。

无论霍普金斯可能说了什么，孔祥熙发回去的结论是，由于此事关系到中国的主权问题，罗斯福总统打算同意召回史迪威的要求。一俟他同马歇尔讨论此事并解决接替史迪威的人选问题，他就回答蒋介石。这正是蒋介石和宋子文一直等待的以及他们所需要的。蒋介石立即不再为他自己留退路了，他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上宣布他打算撤销史迪威的职务。该委员会定期于每个星期一下午开会，会议情况极为保密，通常要等三天以后才会传出会议的一些内容。但是10月2日的会议内容当天就透漏给了高思，无疑是让高思把会议内容报告给华盛顿，因而堵死了其他退路。

蒋介石在这次会议上情绪激动，拍桌大怒，坚持要史迪威

将军“必须走”，租借法案援助物资必须全部由他分配。蒋介石说，今后的美国指挥官，如果有的话，只能同蒋介石拨给他指挥的中国军队接触。虽然他感激美国取消了排外法和排华法案，但是美国人现在以另一种方式侵犯中国的主权。“这是一种新形式的帝国主义；如果我们同意这种新帝国主义，我们只能做傀儡；我们也可能要倒向汪精卫。”蒋介石重申他决不会在主权问题上妥协。他抱怨史迪威不遵从他的命令，拒不进攻八莫，并说史迪威吹嘘说他如果去延安，就能争取到红军的合作，但是他决不允许史迪威去延安，“除非共产党服从我的命令。”蒋介石在会议上说不必担心美国现在撤销援助。“没有他们我们也行……我们仍然能够在四个省坚持下去。”

虽然常务委员会的人员议论纷纷，但是只有一个人敢于站起来讲话。他说，史迪威可能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既了解中国又了解中国人民生活方式”的最好的人，若换一位新人就可能很糟，“因为美国人一般都考虑欠周，也许新来的人比史迪威更想迅速地解决问题，也可能比史迪威更唐突”。这番话至少是对史迪威的唯一赞颂。

史迪威一听到蒋介石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上的讲话以及霍普金斯向孔祥熙透露了罗斯福总统的态度（宋子文特地告诉赫尔利的），他知道这场斗争已经接近尾声，虽然美国的正式答复还没有来。那一天，史迪威给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中国军队高级司令官们写了告别信，并且告诫他的夫人他们准备“把我扔上垃圾堆”。史迪威认为，罗斯福总统的让步是决定性因素。“如果老软弱(指罗斯福)像他显然已经做的那样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小人物从现在起就无法加以控制了。”

那天晚上，梅里尔出席魁北克会议后来到重庆，他向史迪威概括谈了魁北克会议对中国战区不感兴趣的事，他这次就好象是来证实史迪威的地位已靠不住了。梅里尔汇报说，尼米兹海军上将等人认为需要在中国沿海确立基地的谈话纯粹是为了掩护“我们真正的军事行动”（指即将对菲律宾发动的进攻）；在所有对日作战计划中，除了要牵制住在中国大陆的某些日军以外，并未设想在中国采取任何行动；不打算“使大批美国军队陷在中国大陆的战斗中”；表明事情已无可挽回的最后迹象是作战处的汉迪将军承认，到现在为止，“史迪威的使命主要是政治性的，并没有希望中国人采取许多真正的行动。”这句话是承认史迪威的使命的确结束了；召回史迪威已是定局，只存在方式问题了。

这出戏并未完全演完。引起这场指挥职务危机的马歇尔拒绝默认召回史迪威，因为这既涉及史迪威是否忠实的问题，同样也涉及马歇尔本人的政策。马歇尔针对蒋介石的指责起草了一个“激烈的答辩”，这一次罗斯福拒绝签发。

史迪威本人认为，问题关系到中国的作战。史迪威一再向马歇尔强调，如果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能为所欲为，那就无法指望中国在战争中再采取什么行动，美国今后在中国的努力也是白费力气。如果蒋介石既能撤掉史迪威的职务又能继续得到美国的援助和支持，那就是承认他若采取倔犟态度就会得逞。由于丧失了选择余地，美国只得不管好歹把自己拴在蒋介石的战车上。这是事实，但困难是在史迪威指挥权——由于同中国的主权有抵触——的问题上，理由不充分，

难以给予支持。

美国几乎采取了停止支持中国的抉择。参谋长联席会议考虑了放弃喜马拉雅航线的选择方案，正如史汀生记载的那样，还考虑暂时不再“援助中国”。这种考虑主要是出于普遍对中国的不满，而不是出于有远见的政策。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得不得出结论：这样做会给中国的士气产生非常坏的影响，并且给日本人许多话题，因此美国不能那么干。决定是极难作的，因为感到经喜马拉雅航线给陈纳德运送物资的长期努力全部白费了，而且如史汀生所写，很可能要在“这场战争的主要战场再受一冬的艰难困苦”。由于缺少空军运输力量，从法国瑟堡到荷兰阿纳姆的整个前线的盟军先头部队的攻势缓慢下来了。史汀生特别感到愤慨。虽然陈纳德“经喜马拉雅航线”得到了“几乎两倍于他所要求的武器装备”，但是他却没有能够阻止住日军的进攻，而事实已证明“在整个中缅印战区取得唯一胜利”的史迪威却成了牺牲品。

人们等了很久，罗斯福给蒋介石的答复于10月5日发出，复函对蒋介石提出召回史迪威的要求只满足了一半。马歇尔成功地制订出一项妥协方案，根据这一方案，将解除史迪威担任的蒋介石参谋长的职务以及负责租借法案援助的职务，但是仍然担任在缅甸和云南的中国军队司令的职务。复函通知蒋介石，美国不指派其他人担任中国军队的司令，因为中国的战局形势自原来提出建议以来已大大恶化了，美国政府“不应来承担责任”。这当然不会给蒋介石造成任何损失。复函措词也是严厉的，但是其中并没有蒋介石所害怕的东西——停止提供军需品。相反，蒋介石得到保证，要继续经过

喜马拉雅航线提供物资，因为那对“你的政府的稳定极为重要”。美国也是注意保全面子的。

虽然问题已经解决了，律师出身的史汀生“相当肯定”蒋介石不愿接受这个折衷方案——他过去也没有接受过折衷方案。蒋介石抓住主权问题做文章，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再次要求把史迪威从中国召回。“只要我是中国国家元首和中国军队最高统帅，我觉得毫无疑问我有权要求你们把我不再信任的军官召回。”同时，蒋介石还发表了说明理由的长篇声明，想推卸他对中国军事形势的责任，把史迪威描绘成罪魁祸首。

蒋介石的眼睛把实际情况看反了，一切事物都被颠倒过来。他的声明就好象出自《透过镜子》中的红色女王之手似的。他刚刚采纳了史迪威制订的防守桂林的计划，现在却又用令人印象深刻的累赘的同义词宣布“我不仅对史迪威将军这个人没有信心，而且对他的军事判断力也没有信心。”缅甸战役是问题的根源。蒋介石指责说，缅甸战役不仅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而且“消耗掉了中国大部分训练有素、装备良好的后备军队”（闭口不提是谁训练和装备了这些后备部队），“大大减少了对中国的空运吨位”（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样就使得中国无力抗击日军的进攻。因此，史迪威将军对于华东的丢失负有“严重责任”。三年来蒋介石一直叫喊中国马上就要崩溃，现在他终于来了一个转变，不同意说中国局势“恶化到罗斯福总统认为的非常严重的程度”，他也未“预期会有任何从根本上摧毁中国作战能力的灾难”——虽然美国的继续援助当然是十分必要的。

委员长要求召回史迪威的理由由赫尔利于 10 月 11 日转

告给罗斯福总统。赫尔利表示赞同委员长的理由，他的基本根据是蒋介石和史迪威“根本互不相容”，这完全是实际情况，也很有道理。赫尔利接着奉劝罗斯福总统，“如果你在这场争议中支持史迪威，你就会失去蒋介石，也就很可能会失掉中国。”美国可能会失掉蒋介石，这是不大可能的事，但是没有多大关系，因为赫尔利在此事中的作用对于事情的结局没有产生任何重大的影响，虽然与这件事有关的人似乎并不这么看。

史迪威立即抓住这种谬论，他电告马歇尔“这并不是在甩掉我或是失掉蒋介石从而可能失掉中国这两者之间作选择的问题”，而是“如果现在让蒋介石支配一切，就会使中国失掉潜在努力”的问题。史迪威又提出了最后一刻的折衷方案，他主张成立中美委员会。他想以这种折衷方案来照顾蒋介石的面子，同时使他本人居于能确保各项命令得到执行的地位。真令人难以置信，史迪威在现在为时已晚的时刻仍然在尽力而为。史迪威是个在任何问题上从来不放弃希望的人。10月14日，史迪威到桂林以南的柳州同张发奎、白崇禧等人磋商反攻计划。

10月6日至15日，马歇尔在法国；他回华盛顿以后立即去白宫，准备再次为史迪威力争，但是已经没有用了。罗斯福深信蒋介石决不能容忍史迪威，他下达了“直接和积极”的指示，立即把史迪威从中国调出来。不论罗斯福的指示是对是错，如果美国要继续支持蒋介石政权，罗斯福就不可能作出其他决定。

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是否有别的办法——或者说在政府的最高一级寻求一个办法——来支持国民党？人们很久以来

一致的见解是只有蒋介石能够统一中国，因而美国的政策是据此来制订的，影响美国决策的另一个因素是长期以来一直担心中国会倒退到军阀混战、国家分裂的局面。现在新的意见认为，虽然蒋介石依赖我们，但我们不一定依赖他；正如戴维斯有一次在他的报告中说，“我们没有必要无限期地保证支持一个政治上已破产的政权。”但是象美国这样一个曾经是勇敢无畏的年轻共和国现在都变成了维持现状的国家，它倾向于支持另一个甚至已破产的当权者。任何其他道路都是难办和有风险的。在中国，就会导致同共产党人打交道，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生气勃勃组织得很好的集体，足以构成一种现实的挑战力量。美国要转而支持延安是行不通的。可行的办法是努力使国共两党合作，美国的政策已经在积极促成这种合作。

“斧头砍下来了。”史迪威于 10 月 19 日得到了要召他回国的消息，马歇尔给他发来电报预先告诉了他。罗斯福总统随即作了正式答复，他通知蒋介石，他已发布指示“立即把史迪威将军从中缅印战区召回。”罗斯福的这份答复是所有信件中用词最冷淡的，复信提醒蒋介石注意，发动缅甸战役的决定不是史迪威作出的，而是联合参谋长会议作出的，由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批准的，由于要支援中国，就必须发动这个战役。复信明白地要蒋介石注意这样一点：由于进行了缅甸战役，低空飞行线开辟成功了，于 9 月 27 日修通了到密支那的输油管道。由于召回史迪威必须随之作某些调整，罗斯福的答复宣布解散中缅印战区，把它划分为两个战区：缅印战区和中国战区。萨尔坦将军接替史迪威在缅印战区的职务，魏德

迈将军接替史迪威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和驻华美军司令。[1] 罗斯福表示希望拉姆加尔部队的训练活动继续下去，“否则这些部队的作战能力将必然迅速衰退。”罗斯福还希望Y部队继续在缅甸作战。

这场指挥危机就这样结束了，史迪威的使命也随之结束了。在霍普金斯透露消息问题上、或是在赫尔利作用问题上、或是在史迪威转交信件的问题上所引起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没有抓住关键；这些问题并不是起因，而是方法问题。由于中国依赖美国和缺乏主动精神，美国就设想可以把美国人的解决办法强加于中国，这次召回史迪威正是这个设想的必然结果。对此马歇尔有责任，因为他首先主张这么干，罗斯福也有责任，因为他授权这么干，史迪威本人也有责任，因为他赞同这个主意并促其实现。从深一层的意义上讲，表面上看是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势不两立，根本上说，是两种目标水火不相容。

史迪威接到回国的通知后只在重庆停留了四十八小时。史迪威匆匆离去以及秘而不宣都是马歇尔将军的命令中提出的要求，因为马歇尔担心史迪威心直口快，急于要在宣布这一消息和报界大肆报道他之前就把他从中国战区召回华盛顿。当时正值美国总统竞选运动达到双方互相诋毁的白热程度，马歇尔希望避免出现史迪威大发一通脾气的情况，那样可能就难于再任命史迪威担任重要职务了。

史迪威很想说明他这一方的情况，他的这种苦恼在日记

① 史迪威担任的东南亚部队副司令的职务由惠勒将军接任。

中有所表露："是否要就解除我的职务的事发表一项声明？""是否允许我发表声明？"他召见白修德和阿特金森两人，秘密地把发生的情况告诉了他们，要求他们把情况作为历史事实记载下来。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这个消息足以最终引起极大的愤怒，但是要从重庆发出上述消息是办不到的。原定一个月内离开中国的阿特金森决定立即回国，迫使报界发表史迪威被召回的消息——这个行动很快就引起了强烈的爆炸性反应。

史迪威这时还命令谢伟思返回华盛顿力陈同共产党人建立关系的理由，谢伟思在延安提出的报告已作了十分令人信服的陈述，他这次回华盛顿引起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包瑞德上校前不久曾写信给史迪威，"共产党人愿意同日军打仗，他们的军队有战斗力……。他们愿意在你的指挥下打仗。"虽然现在要成为局外人了，但是史迪威时刻想到的仍然是日本在中国大陆的二十四个师的军队，他认为必须安排使共产党军队采取某些军事行动打击日军。毫无疑问，史迪威也对共产党对国民党不友善的态度感到鼓舞。在要派谢伟思回国问题上，史迪威征得了谢伟思的上司高思大使的同意，高思长久以来就对史迪威司令部挖走他最得力的人员感到不满。高思完全了解史迪威的动机，因此他向国务院解释说，"我们的一些军官，很可能包括史迪威本人都赞成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这就是派遣谢伟思回华盛顿的原因。谢伟思这次返回华盛顿的使命导致了后来对于在美国驻华外事机构中供职的军官们的悲剧性和毁灭性打击。

史迪威在临行前的几小时里写了一些告别信，其中有一

封是写给陈纳德的非常好的信，信中对陈纳德所取得的成就引以自豪，承认陈纳德受到中国人的钦佩。另一封信是写给延安的朱德，史迪威在信中对于他无法“同你及你”在与日军作战中“创建的杰出军队”建立联系表示“非常失望”。唯一收到史迪威一封并非正式告别信的英国人是奥金莱克将军，史迪威在信中说，他把奥金莱克“作为朋友”加以怀念，他希望奥金莱克也能如此对待自己。史迪威临别时还拜会了孙中山夫人，孙夫人流了泪，希望她自己能有机会去美国把事实真相告诉罗斯福总统。史迪威还同高思正式道别，并得悉高思不久也要离任回国。高思被所有特别使节撇在一边（其中赫尔利和纳尔逊两人对他是最后的致命打击），蒋介石也对高思不理不睬，因为高思没有什么影响力，高思自己也知道白宫不会听取他的意见，加之已对毫无希望的任务感到厌倦，所以，他拿定主意在罗斯福总统本届任期结束时辞职。

还有一个最后的告别仪式。蒋介石派人给史迪威授青天白日特别勋章，这是外国人能够得到的中国最高一级奖赏。史迪威拒绝接受勋章是意料之中的事①，但是他不得不硬着头皮接受出席茶会的邀请。蒋介石显得很和蔼，宋子文就坐在他的身边。他对所发生的这一切表示非常惋惜，说这只是由于性格不同造成的，希望史迪威继续做中国的友人。他请史迪威对中国的局势，尤其对柳州的局势提出批评和意见，当他

① 中国政府最初于1944年3月建议给史迪威授青天白日勋章。史迪威告诉陆军部，为了保持他完全的行动自由，他既不想接受中国的勋章，也不愿接受英国的勋章，如果无法“平安无事地”做到这一点，他就以陆军部关于禁止掌管租借法案物资的人员接受外国勋章的规定来打掩护。陆军部以此为理由代表史迪威最后拒绝了青天白日勋章。

知道史迪威已经亲自去过柳州时感到非常惊讶。史迪威的讲话非常简短。他要求蒋介石记住的只是他的动机是为中国好，他说了一句“最后胜利”，随即就起身告辞了。

10月21日，凉风习习，云层密布，天空灰暗，史迪威登上了他的飞机。陪同人员有伯金将军，伯金一再坚持，如果要他的上司走，他坚决不留下来。陪同人员还有赫尔利的助手麦克纳利上校，他在中缅印战区呆过两年，同伯金有同样的心情。赫尔利本人也显得不悦。他向史迪威承认这件事是他“弄糟的”，史迪威倾向于同意他这个说法。史迪威认为，自己除了是“蒋介石逐出的”以外，也是“被赫尔利弄出中国的”。由于史迪威奉召回国是秘而不宣的，只有赫尔利和宋子文两人到机场为史迪威送行。阿特金森随机离开中国。在最后时刻，何应钦乘车赶到机场，何应钦从车中钻出来，举手向史迪威行礼，史迪威回了礼，然后环顾四周问道，“我们还在等什么？”随即飞机就起动了。史迪威途中只有三天时间可在昆明、在Y部队总部所在地包山、在密支那、在拉姆加尔等地停留，私下同他的老同事们话别。没有让史迪威向在他指挥下打回缅甸的部队、筑路工人以及空军人员正式发表告别讲话，“这使我感到伤心”。史迪威于10月24日抵达德里，两天以后，即在为最难以实现美国的作战目标作了两年又八个月的不懈努力以后，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对他的使命最后记载是：“离别啦——这是我在中缅印战区的最后一日。”

曾经同史迪威一起作战的美国人和许多中国人觉得，召回史迪威将军是一次清算，是一次巨大努力已经完结的明白

信号。对召回史迪威的消息感到兴高彩烈的第十四航空队人员当然不这样看。的确已经作了努力，但是正如一些人觉得的那样，这次努力是白费了。在许多人看来，如果曾经给这次努力以鼓励和指导的人现在已经离去，而且临走时既没有举行礼仪也没有受到表彰，那么留下来也完全是无益的。多恩从萨尔温江前线写给伯金的信概括地表达了这种情绪。多恩在信中解释说，他无法离开前线，因为他觉得在战役胜负未定的时候丢下他指挥的中国和美国军队是不对的，但是他又写道，"越是想到这一点，我越是觉得前途没有希望。过去一切事情总指望'将来'，现在却没有什么'将来'可言……过去我一直相信，就是在通常的混乱时期我还是相信，我们可以在这里取得一些成就，现在我却不相信了……"

在华盛顿，随着美国大选进入最后一个星期，华盛顿在提心吊胆地等待史迪威的归来。史汀生写道，"我预见到会有很多的麻烦，史迪威取得的成就使他在美国人民中间很孚众望。"用罗斯福的话来说，这次的总统竞选是"历史上最肮脏的一次"，在这个时候把一位深孚众望的英雄召回国会使人提出搞诡计的指责。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州长吹起了冷战前夕的凉风，他在最后时刻的演说中声称，共产党人取得了对新政的控制权。尽管罗斯福总统的一帮人毫不怀疑总统能击败杜威，但是报界却预计两人的票数将不相上下，而罗斯福是希望他能尽量取得选民的强有力支持的。史迪威召回国的消息迄今未宣布，并且采取了特别预防措施，使报界无法找到史迪威。

布鲁克斯·阿特金森早已把史迪威召回的报道写好，他

在史迪威动身之前离开了德里。在开罗机场，一位宪兵要求旅客把公文包打开，对其中一切文件和东西进行检查，阿特金森的那篇报道幸好放在衣服口袋里。阿特金森把稿子带到突尼斯，在那里他把稿子交给了在旅行方面有更大优先权的谢伟思，要谢伟思直接把稿子交到《纽约时报》，他自己则尽量乘下一趟班机。谢伟思安然把稿子交到《纽约时报》，但是由于战争时期的新闻检查制度，这篇报道没有获准发表。《纽约时报》力争发表这条消息，斗争了三天，与此同时，阿特金森到达美国，这就躲过了消息来源的问题。这个争执提交给罗斯福，罗斯福决定，由于其中讲的事实有足够的根据，《纽约时报》有权发表。在史迪威回到美国之前，《纽约时报》于 10 月 31 日在第一版刊登了这则消息。

这篇报道说，史迪威将军被从中国召回是中国“垂死的反民主政权的政治胜利”，并使美国对于“在中国越来越丧失民心和得不到信任”的政府至少必须给予消极的支持。这篇报道说蒋介石对“中国崩溃的速度感到惊恐不已，不知所措”。这篇报道还嘲笑指派另一位美国人给蒋介石当参谋长的决定，认为这“实际上是要我们默认一个不开化的残忍的独裁政权……它不能代表堪称我们好盟的中国人民。”消息称史迪威是自“中国的”戈登之后在中国最能干的战场指挥官，他“个人无法会对蒋介石采取一种毕恭毕敬的态度”，但即使他不是这样，也没有任何外交天才能克服蒋介石的“根本不愿意”冒风险把他的军队派去同日军打仗的这种态度。

阿特金森的这篇报道引起了轩然大波。高思大使的辞职（这个消息传到了报界，似乎高思的辞职同召回史迪威有关

系）使得事情更加轰动一时。所有在中缅印战区采访或者以前曾经在这个战区采访过的记者都写了他们多年未获准发表的报道。新闻特写、社论、专栏作家评论、电台评论员评论构成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约瑟夫·C. 哈希所谓的“巨大幻灭情绪的突然爆发……把中国的丑事抖搂出来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人们不禁要问曾经在重庆和缅甸呆过很长时间的美联社记者索伯恩·瓦恩特，为什么一直不把事实真相告诉美国公众，这也是人们必然要问的问题。他说，这是因为华盛顿一直希望能整顿好中国乱七八糟的局面，但是史迪威奉召回国就证明美国是做不到的。蒋介石的热情崇拜者周以德博士却说，任何有自尊感的国家元首都不会接受别人要他办的事。“史迪威没有犯这样的错误……。我们必须从我们本来就不该采取的立场后退。”

不得不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问题的罗斯福显得比任何时候都和蔼。罗斯福总统说，史迪威和蒋介石两人只是个性冲突，蒋介石和史迪威将军发生过“一些争吵——啊，老早的事了——前些日子终于解决了”。他们两人的争吵没有涉及政治，甚至连中国政治都没有涉及；罗斯福在回答一个接一个的问题时说，史迪威与蒋介石的争吵不涉及战略，不涉及政策，不涉及租借法案援助，不涉及喜马拉雅航线的空运吨位，也不涉及赫尔利和纳尔逊，也不涉及高思的辞职，同“所谓的共产党人”也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个性问题”。《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点明了有关史迪威和高思两人个性的问题。“不可想象，美国派出比较老练圆通的代表（即使史迪威和高思两人都不够老练圆通），就能消除阻碍中国作战的那种混乱

和腐败现象。”

在报界的一片吵嚷声中，史迪威于 11 月 2 日星期四，即在大选开始的前五天抵达美国沿海棕榈滩，第二天就被偷偷摸摸地接到华盛顿，对他采取的保密措施非常严，好象他是刚刚从敌人那里叛逃过来的鲁道夫·赫斯①。史迪威战争期间在中国的使命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荣誉和感谢，他在国内受到的对待也大致相同。史汀生曾经称史迪威担当了“整个战争期间分配给任何美国人的最困难的任务”，但是现在对他的欢迎同他担当的困难任务相比很不相称。史迪威是他的上司们感到为难的人物；他确是使他们为难的人物，他一来到他们就得退避。为了转移对史迪威的注意力，白宫和陆军部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不让他露面。大概是怕引起报界的注意，马歇尔和史汀生都没有前去迎接史迪威。事实上，史汀生知道史迪威飞机到达的时间，但是却在史迪威的飞机到达机场以前半小时，乘飞机离开这个机场去家乡度周末。史迪威在机场受到他的夫人和马歇尔的助手弗兰克·麦卡锡上校的迎接。麦卡锡上校得到的指示是把史迪威接下飞机，悄悄地把他带出机场，不要让人看到他。史迪威被护送到马歇尔住宅对面的梅耶堡宾馆里，他在宾馆中受到汉迪将军和陆军新闻局长瑟尔斯将军的迎接，两人告诫史迪威不要发表讲话。

夜幕降临后，马歇尔来看史迪威。马歇尔当时觉得对史迪威的最好酬答是让他任负责国内军训工作的陆军地面部队

① 鲁道夫·赫斯，全名 Walther Richard Rudolf Hess，德国政客。1894 年生于埃及亚历山大港。1921 年加入希特勒的政治组织，曾任希特勒的秘书和卫士。1939 年升为第三帝国的第三号人物。1941 年单独驾飞机逃到瑞士，1946 年以战犯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译注

司令，并且答应以后在欧洲或太平洋地区给他某个新职位。史迪威承认，“确实没有适合我做的工作”，当时已是四星上将的史迪威要求让他带一个师；马歇尔笑着对他说，先休息一个月再说。史迪威很清楚，他们是想先把他打发开，让他不讲话，等到大选以后再安排他的工作。

这就是史迪威回国后的情况。当初担心史迪威可能发表议论看来是过分了。史迪威愿意遵从不发表议论的命令，尤其是随着战争打到了关键时刻，史迪威不希望被闲置在一边。但是史迪威一贯不怕得罪人，这个脾气可能影响了马歇尔。甚至从在本宁堡步校时起，马歇尔就不得不多方保护史迪威，竭力防止他由于这种性格而遭到不幸。在宪兵陪同下，史迪威从首都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家乡，沿途对他采取保护性措施，对公众则采取保密措施，他到家以后仍然保持缄默。史迪威每到一处，都有一群手拿笔记本和麦克风的记者跟着他，准备记下他要讲的任何话。他自己也感到非常有必要讲话，他打电报问瑟尔斯将军，不让他发表讲话的禁令何时解除。史迪威得到的答复是官场遁词：“你说得越少，你的地位就越强有力。”不让他发表议论的借口是不再成立了（如果说还曾经成立的话），但是谁也不希望史迪威象以前那样坦率陈词，说明这次所发生的事对于美国的努力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

就个人来说，史迪威是能感到宽慰的——虽然宽慰的时间从来不长久——他在卡梅尔的家中非常愉快，同他心爱的家属团聚在一起，牵着爱犬自由自在地沿海滩散步。中缅印战区传来了他曾经只得丢弃的对他的赞扬。第一个拿下密支那的中国第五十师师长潘将军写信给史迪威说，“我们都觉得

是损失”。筑路指挥皮克将军写道，“以前也有司令官离开我的时候，但我从来没有象你离开时那样惋惜，感到那样大的损失。”战区宪兵司令哈里·库珀上校要求派他同史迪威一起工作，“无论你到哪里我都愿意去。”一些美国人觉得，他们所做的是为了一个人，“是为了给乔大叔争光”，而中国人在他们的信中说，他们觉得史迪威做的一切工作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中缅印战区简报》在一首题为《致敬》的短诗中表达了对史迪威的怀念之情。这首诗在预测未来的艰难时刻写道：

……一个敏捷的
矮小的身影出现在利多公路上
斜戴着军帽——
坐着吉普车呼喊着向孟拱疾驶
……我们要说
“看见没有？他没有真正离开。”

与史迪威一起打过仗的中国人对史迪威功绩的估计与蒋介石的估计大不一样。萨尔温江前线Y部队司令、“常胜将军”卫立煌回忆说，政府为了表彰他在反共战争中的胜利，把四个县的税金归他所有。卫立煌对多恩说，“象史迪威将军这样的人，政府一定至少会给他十个县的税金！”对史迪威的最好和最后评价是曾士奎将军的一封来信。他在第一次缅甸战役时期就和史迪威一起工作过，他在来信中写道，“至少在有三年长的一段时间里，你办成了本来不可能办成的事。”

史迪威一贯认为，有关中国局势的欺骗宣传是他的死敌，

每当他十分沮丧的时候，他就自问，“美国人民在得知事实真相时会怎样呢？”幸好，没有什么事。美国官方的政策依然顺着它已开辟的渠道前进。赫尔利当然被任命为驻华大使，接替高思的职位，因为赫尔利那时在中国，因为他向往这个职位，也因为他是那个国家元首中意的人，虽然中国的职业军人认为蒋介石有一半是假象，“赫尔利就是”看不上他。另一位圆通和受欢迎的人物魏德迈填补了给蒋介石当参谋长的位子。

在史迪威离开重庆那一天，美国海军在菲律宾的莱特湾同日本海军打了一仗，战争向中国的方向发展了，但是美国除了因陷入困境无可奈何只得支撑重庆并使中国继续参战以外，在军事上对中国的兴趣减退了。11 月中旬，日军发动的两路攻势（一路从沿海向内地进攻，一路穿过广西南进）在柳州汇合。柳州在桂林陷落几天之后就被日军占领。其后不久，日军的攻势在贵州的冰封的山路上因严寒和战线拉得过长而停下来。自 4 月份以来，国民党政府丢了八个省，损失了五十万军队，丢掉了一亿人民，通往沿海的最后一个通道也丢失了。国民党在民众中的信誉受到了无可挽回的损害。蒋介石仍然掌权，深信美国会给他援助。正如一位中国人所说，蒋介石当时的状况是，“你要他治国，他力量太弱，治理不了；但你若要推翻他，他却力量太强，推翻不了。”四年之后，一位给蒋介石撰写赞美性传记的作者转弯抹角地表示，许多大人物如果有头脑早一点离世，那他们就更伟大了，例如拿破仑在滑铁卢大战之前，威尔逊在凡尔赛之战以前，“蒋介石在史迪威将军召回以前。”

第二十章 “现在——我们该脱身了”

1945—46年

史迪威意外地碰到了好运气，他机灵地抓住了机会，终于象他所希望的那样在战场上干到战争结束。然而，在他回国后的最初几个月，他的命运看来是做平淡无味的办公室工作。他于1月23日被任命为美国国内陆军地面部队司令，负责训练工作，但是在国外的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这个职位对他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他给妻子写信说，“我将尽量忍耐，实在忍耐不住就会爆炸。”马歇尔无法向他明确说让他到太平洋地区担任什么指挥职务，史迪威认为，罗斯福总统总是不接见他，是个不祥的兆头。

陆军地面部队的司令部设在华盛顿，但是史迪威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下面度过的，他从一个军营跑到另一个军营，视察训练工作，处理回国军人的种种问题。他同一般进行视察的将军不一样，不去察看部队的营房，而是跟他在拉姆加尔时的做法一样，立即去察看操练和实弹射击情况。在视察中，史迪威发现人们把他当作重要人物，说明这一点的主要标志是：在他乘坐的飞机降落以后，从奥尔巴尼到华盛顿的途中都有警察护送。他每到一处，都要为他举行会议，发表讲话，给他以赞扬；在公开宴会上，人们专门向他特别热烈地鼓掌；他被

邀请去西点军校给毕业生讲话，副总统杜鲁门也邀请史迪威与他会晤，因为杜鲁门“想同他谈谈”。正如后来任司法部长的法官贾奇·文森讲了一番话，说“美国人把我当成了大名人。我的上帝呀！”

利多公路终于完全同中国连接起来了，后来这条公路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这个荣誉对于史迪威来说真是既苦又甜。1月初，Y部队和在缅甸的军队会师，紧接着，利多公路抄近在八莫与旧滇缅公路连接，并于1月25日正式通车。筑路指挥官皮克将军给接替史迪威担任在缅甸军队司令的萨尔坦将军发出电报，“我组织了一支车队，希望你允许这支车队进入中国。”从阿萨姆开出的第一批卡车经过二十四天的艰难行程到达昆明的时候，数千欣喜若狂的群众挥舞着彩色小旗前来迎接，小旗上用汉字写着“欢迎经史迪威公路开来的第一支车队”。参加庆祝集会的群众举着蒋介石和罗斯福的画像，其中也有史迪威的画像。蒋介石宣称，“我们打破了敌人对中国的包围。请允许我以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名字为这条公路命名，纪念他杰出的贡献，纪念他指挥下的盟军部队和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役中以及修筑公路的过程中作出的卓越贡献。”史迪威对此表示惊讶，“我怀疑有谁让他这么讲的。”

美军印缅战区司令部正式颁布命令，肯定了史迪威公路这个名称。史迪威就此事在电台的军人节目里发表的谈话中赞扬了“修筑公路并为公路而战斗的”所有人——步兵、工程兵、医务人员、空军人员、汽车人员、劳工——唯独没有提到他自己的作用，好象他没有到过那里。萨尔坦在给史迪威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承认，开辟通往中国的公路是史迪威“不屈不挠

的意志”，这句话比任何荣誉和礼仪都更好地概括了实情。

无论史迪威对罗斯福总统对待他的态度感到多么不满，但是他无论私下还是公开场合都没有表露出不满情绪，甚至没有意味深长地微笑一下或皱一皱眉头。史迪威的一位朋友认为这台戏已完了，他说“幕已放下，一直碰到地板了”。史迪威的内心感到痛苦，波涛起伏，他把苦闷心情倾注在日记中，思考当时他的指挥权的争执的前因后果和中国问题。史迪威在史汀生部长家中举行的晚宴上对中国局势得出了不可避免的结论，史汀生记下了这个结论：“除非我们撇开蒋介石，否则我们在中国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同样不可避免的对应结论是：有什么其他办法可想呢？因为没有其他现实答案，但是不仅如此，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积极为变革奋斗，史迪威相信作为中国“农业自由主义者”的共产党人有可能愿意让美国在中国发挥积极作用。在另一次谈话中，参议员莫尔斯发现史迪威象对蒋介石一样，也“同样批评”共产党人。史迪威说，中国将陷入“长期的内战，我们对此毫无办法”。史迪威在笔记中写道，我们只有等中国结束其动乱。只要蒋介石还掌权，中国不要说在统一问题上，就连在行之有效的联合问题上也不会取得任何进展。由于支持重庆的反动政府，美国在中国被人骂得狗血喷头，并且使自己同老殖民制度为伍。“除非我们完全不沾边，否则，人们就会认为我们同法国、英国、荷兰、重庆是一丘之貉。”

史迪威的主要精力用于编纂由他的参谋人员整理的《中缅印战区史》这部材料，并为其提供他的司令部的大量正式文件。这份材料包括作战报告、政治工作、军队各兵种和部门的

情况，并配有注释。后来，整个材料完成时装满一只皮箱，于3月7日送往陆军部。有人在五角大楼的走廊里见到史迪威帮助抬箱子，便问他箱子里是什么东西，史迪威回答说，“给汉迪将军的一封信”。这份材料在结尾一章里总结概括了的中心论点是：美国在支援中国时不要求中国答应采取行动以换取租借法案援助，这是奉行一种“摇摆不定的政策，白白浪费政府的资金”。关于他自己在战场的指挥问题，史迪威的结论是，他的指挥权由于无权向他的部队发布“命令”而遭到损害，其结果使他无法制定战略，也无法指挥战术行动。史迪威批评了美国和美国军界，他认为，美国的军事教育是有缺陷的。由于对外国的方法和特点缺乏了解，我们的人“只知道按美国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一旦办不成，他们就不知所措，失去耐心。”史迪威认为，如果美国想将来在国际上保持军队的领先地位，军事教育制度应当考虑到上述问题。

史迪威的报告对美国政策提出了异议，最后还谴责了蒋介石政权，责备美国一心支持蒋介石政府，预言蒋介石政权会垮台。按总参谋部的意见，这份材料的内容压缩到七百页以下，以便于处理和保管。但是尽管这样，总参谋部还是告知史迪威，如果他想正式发表这份报告，就得把报告中严厉批评蒋介石和英国人的有关部分删掉。史迪威拒绝作删节，这无疑就使这份报告被扣压下来，得不到发表。

史迪威的见解原是值得听取的。自1932年到1950年间任《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等报驻中国记者的A. T. 斯蒂尔写道，“当时——或许以前——在中国的美国人当中没有任何人居于史迪威那样有利的地位，看清蒋介石的长处和短处。”

还有一些美国人的建议也没有被政府听取。由于对政府奉行的对华政策恼火，美国驻华使馆的政治官员于2月份趁赫尔利不在使馆的时候，由临时代办艾奇逊签字，向政府发了一份前所未有的联名电报。他们告诫政府，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的政策会使蒋介石不愿作出任何妥协；与此同时，根据他们当中有人在华北的三个月旅行中亲眼所见，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日益壮大，使美国更加接近于一种不可避免的窘境，就是美军在中国登陆以后，美国将不得不决定同意与共产党人合作还是拒绝与共产党人合作。魏德迈的司令部已经拟定计划，把美国伞兵部队派到共产党地区——这一说法是天真而又傲慢的——去"组织、领导和指挥"共产党游击队的抗日活动。然而，在蒋介石解决共产党加入政府的条件以前，无法为上述计划作任何具体安排。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说，迫使蒋介石实现统一的唯一办法是吩咐他而不是要求他。他们建议，美国现在决定同共产党人合作，不管蒋介石赞同与否，并把上述决定告诉蒋介石。他们的电报由副国务卿格鲁于3月2日转交到白宫，格鲁在转交电报时还附上表示赞同的意见。史迪威就是在这一周中向五角大楼提出报告的。

美国驻华使馆人员趁赫尔利大使在华盛顿的机会采取的这一步骤绝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的建议从客观效果上和主观意图上说都是对赫尔利大使的不信任票。赫尔利接到的指示是支持美国所承认的蒋介石政府，防止它崩溃，并努力争取使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立即实现统一。他的任务是在国共两党中间充当调解人，使双方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开始的时候，赫尔利显得精神抖擞，信心十足，但是没过多久，尽管他

生来机灵，还是无能为力了。国民党向他的阿谀奉承、殷勤款待使他感到喜悦，他不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也不了解中国问题的深度，所以他倾听蒋介石集团的花言巧语，相信了他们多次作出的保证，即一切事情将会安排妥当。但是，尽管多次开会、休战，提出建议和反建议，在美国政府力促实现国共两党联合的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真正进展。对于华盛顿来说，国共两党实现联合的紧迫性是越来越大了。中国濒于内战边缘就无法填补日本战败留下来的真空。另外，美国还担心，如果国共两党的分裂得不到弥合，苏联就有可能同中国共产党就控制满洲问题达成某种协议。

挫折和困难使赫尔利感到烦恼，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动辄发火，张口骂人，破坏了使馆的每一种日常工作秩序，疏远了使馆的工作人员，弄到了完全互不信任的地步。赫尔利认为，谢伟思、卢登等人要求政府奉行一项现实政策、更加不依靠国民党、更多地意识到共产党存在的报告是破坏他的努力。他深信这个报告是针对他的一个阴谋，因此他只带一名军士做速记员，同国民党人开始举行复杂的谈判，并且不同他手下人员磋商，独自向华盛顿汇报。使馆人员则深信，赫尔利向华盛顿所作的汇报是极其片面和错误的，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自己再写报告，并且没有呈交身为使团团长的赫尔利过目，最后于2月份以联名电报的形式发给华盛顿政府。

罗斯福总统支持赫尔利反对使馆人员，他决定美国不能援助中国共产党人，除非得到蒋介石的同意。这个决定的理由与他召回史迪威的理由相同：事情牵涉到中国的主权。美国政策继续恪守其固有的立场，就是拒绝与在国内同一个主

权政府发生冲突的持不同政见集团打交道，也不予以援助。这个立场是无可挑剔的，然而是不现实的。蒋介石的中央政府的主权只是徒有其表，就象他的民主是一个幻影一样。赫尔利在对周恩来的一次谈话中说过，中国共产党不只是因为它拥有武装而同中国其他党派不同的一个政党，而且因为它是事实上具有国家特征——有自己的政治组织、自己的领土、自己的军队——的几乎独立的实体。中国共产党人当时推论说，他们只是国家中的一部分，愿意按一定条件谈判统一问题。共产党朝气勃勃，日益壮大，国民党则日益削弱。

对此华盛顿并非不了解。国务卿斯退丁纽斯（他于1944年11月接替了身体欠佳的赫尔）于1945年1月劝告罗斯福总统说，蒋介石之所以反对同共产党联合，是因为联合就意味着国民党统治的结束，“为更强有力、深得民心的共产党人……铺平道路，共产党人的力量在一天一天地强大”，会扩大他们的影响，有可能会达到控制政府的地步。另一方面，如果同共产党人达不成协议，又可能引起“国民党最终被推翻的危险”。

委员长却不如此担忧。美国对他的一贯支持使他觉得自己更强大了，实际上并非如此。美国对他的一贯支持反而损害了美国自己原先的目的，因为使他采取了十分强硬的态度，未能促使他作出让步。蒋介石低估了共产党的力量，看错了他自己的处境，因为，正如史迪威时常抱怨的那样，没有一个人向他讲实情——或承认实情。何应钦对中国共产党力量所作的“荒唐”估计，说明他“极卤莽地无视事实”。在关注中国事务并感到愤怒的史迪威看来，这种估计显示“只要何应钦这样的人发挥重要影响，为在中国实现团结所作的努力都是毫

无希望的”。

天生怕与新事物打交道的美国政府下不了决心削弱对蒋介石的支持，不敢冒蒋介石垮台的风险。自从作出支持赫尔利的决定以后，美国驻华使馆中与赫尔利大使持不同意见的外交人员全都被派任他职。共产党人由此得出必然的结论，美国的政策将不会对他们有利。他们开始对美国持怀疑态度，后来的事件使这种怀疑态度逐渐加深，发展成为敌视。无论如何，共产党的敌视态度在骨子里头同根本的仇外情绪以及在意识形态上对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憎恶有很大关系。在美国方面，视共产党为剥夺财产者的这种同样强烈的内在恐惧情绪当然是决策过程中的一个因素。不管罗斯福是否也是如此，他非常清楚这种恐惧情绪在国内政治中具有危险的威力。也许在罗斯福心中最起作用的理由是，他现在不能让蒋介石倒台，虽然他本人对于蒋介石政府治理下的中国能否发挥他曾计划让它发挥的大国作用现在已不再抱什么幻想了。

表明罗斯福这种心情的证据是他在不让蒋介石知情、也不征得蒋介石同意的情况下，在雅尔塔会议上把中国的某些权益给了苏联。1945年2月的雅尔塔协定是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为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进行的一次艰巨的讨价还价的结果。雅尔塔协定对斯大林作出的让步，除了涉及波兰问题以外，还包括恢复沙俄时代对大连和中东铁路的控制权。同时，苏联则承认中国对满洲拥有“完全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把蒋介石视为公认的政府的首脑，同他缔结一项友好同盟条约。雅尔塔协定后来成了引起争议的问题，这倒不是因为作

出这些让步，而是因为把俄国势力请回了满洲。

决定必须这样行事的因素是中国不顶用。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打败日本驻在满洲的关东军当然需要俄国地面部队参战。这是绝对必要的，在这个问题上罗斯福总统得依赖军方的建议来作决定。当时，原子弹还没有试验，欧洲的战争还没有取胜，由于军队情报部门对日军抵抗能力的估计错误，认为有可能在战胜德国以后十八个月才能击败日本。尽管有些人持相反意见，但是战略家们的普遍看法是：对日本本岛直接发动进攻是必要的，可能还要以多达一百万美国人的伤亡作为代价。此外，美国担心的是几乎独立存在的日本关东军会同驻扎在中国大陆上的日军一道继续作战，而且，如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使团团长迪恩所认为的那样，“可能建立一个新的日本国。”

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所作的让步是以美国人的生命为考虑依据的。他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因为正如斯大林坦率地说，如果俄国什么好处也得不到，它为什么要参加对日作战呢？如果中国能在军事上发挥积极作用，俄国参战的必要性就会相应地减少。倘若当初史迪威提出的在中国建立九十个师的善战部队的计划完全实现，可能根本就不需要召开雅尔塔会议。

1945 年 2 月 10 日，虽然为时已晚了些，还是给史迪威授了荣誉军团勋章，表彰他“意志坚定，始终热情”工作，同时还因他在打通滇缅公路中的“丰功伟绩”，再次授予他优异服务勋章。陆军部长史汀生为史迪威佩戴勋章。史汀生说，他颁

发过勋章，但从来没有象今天颁发勋章这样高兴。史迪威认为，这两枚勋章根本无法弥补他未能参加正在其他地方进行的战斗的这一损失。史迪威憎恨华盛顿，在他看来，华盛顿是“同重庆一样大的粪堆”。他给妻子写信说，“除非我能有某种很有生气的工作，否则我就准备按我告诉过你的（要求带领一个师）去办，并把责任推到陆军部。”

在史迪威的内心深处，他希望能让他指挥最后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的战斗。吕宋-福摩萨-华南这个三角区在战略计划中仍居重要地位。2月7日，史迪威注意到合众社播发的一篇猜测性消息，消息列举了可能挥师进军中国的指挥官的人选，名单顺序为：史迪威、麦克阿瑟、尼米兹。史迪威从来不是等待好运气找上门的人。尼米兹到华盛顿以后，史迪威前去拜访，不管谈话是否涉及到上述问题，但是据他记载说两人谈得“非常融洽”。3月8日，史迪威陪同一批军人去白宫，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说明罗斯福总统会在这个问题上作梗。“会议结束以后，罗斯福把我留下来，谈及兵力短缺以及向日本发动的进攻事关重大。说他对于用我的名字命名利多公路感到高兴。他的身体看上去极差，但是并不象雅尔塔会议期间的照片显得那么糟。”从白宫出来的时候，史迪威甚至向助手勉强地表示了赞许，就好象当他现在厌倦得要命的时候，他有片刻感到罗斯福还有一点可爱之处。再过一个月稍出头一点，即4月12日，罗斯福总统逝世。这位最始终不渝地支持中国成为强国、决心使未来的中国站在美国一边（不管他有多少是幻想）的人死得太早，未能知道——除非他模糊地感觉到——他的努力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在史迪威看来，重返中国并非是不可能的事。从中国战区回来的梅里尔对史迪威说，人们都想念他。“在我的问题上，赞成蒋介石意见的不到十个人”，孙立人提议中国军官联名向罗斯福提出请愿书，要求派史迪威再去中国。据说魏德迈和他的班子说我们“把事情弄得非常糟，即使他们来也难于解决”。但是，当日军似乎马上就要向昆明发动进攻的时候，蒋介石和魏德迈的援救办法是命令第二十二师和第三十八师从缅甸撤回，这两个早期组建的师都是由史迪威训练的，并且在史迪威的指挥下作过战。第二十二师和另一个在拉姆加尔受训的第十四师被空运回中国应付紧急事态，后来的事实证明根本无此必要。由于美国空军增加对日军的出击，加上日军必须保护广汉铁路和防备美军可能在中国沿海登陆，日军没有在华南再发动攻势。

魏德迈同他的前任史迪威一样，也计划用中国军队从沿海向广州发动一次进攻，但是他所掌握的物力人力比他的前任大得多。1945 年 1 月，喜马拉雅航线的运输量空前增加，达到了四万六千吨，此外史迪威打通的滇缅公路和输油管道也运来了物资和燃料。蒋介石赞成魏德迈制订的作战计划，但是，尽管与重庆关系和谐，实际情况证明，如同昔日的史迪威一样，魏德迈的这一战役也发动不起来。魏德迈出色地使自己同蒋介石的关系搞得很融洽，他还显得乐意尊重礼仪，这就使他得到了蒋介石的合作，可是他给马歇尔的报告的语调仍然是人们很熟悉的语调。魏德迈在报告中也哀叹，“中国人要是合作就好了！”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们“软弱无能，惊慌失措”，最高指挥部由于“政治上的阴谋诡计和虚荣心”而弄得很

愚蠢，指挥人员由于“力不胜任而无法发布恰当的命令”，中国的后勤供应“薄弱得骇人”。

摆脱了在中国的这些问题上的烦恼后，史迪威现在注视着争夺太平洋部队指挥权的斗争。史迪威在陆军部的一位朋友在一次长谈之后说，他告诉我“指挥权最后将落到我的身上。政府不会接受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相反，麦克阿瑟像座喜马拉雅山，无法避开他。麦克阿瑟自认为是指挥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当然人选，但是直至现在，尼米兹和麦克阿瑟是按地理形势分开指挥太平洋地区的战争的。4月份，随着作战重点转向日本本土，美国的太平洋部队指挥机构作了调整，麦克阿瑟任太平洋地区所有美国陆军部队总司令，尼米兹任统帅太平洋地区所有海军部队的司令。

4月1日，美军向位于福摩萨和日本岛南端之间的琉球群岛中最大的冲绳岛发动进攻，这一仗是当时所有岛屿战斗中打得最激烈、代价最高的一仗，该岛也是日军防守最顽强的地方。占领这个距日本本土三百五十海里的岛屿，可以使B-29轰炸机对日本工业和大陆的交通路线发动的袭击比从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关岛和塞班岛进行的空袭更为猛烈。由于其海军不是美国的对手，日本拿出了最后一种孤注一掷的武器——由敢死队员驾驶满载炸弹的神风飞机去撞击目标。日复一日，日军飞行员驾驶着飞机呼啸着向集结起来支援这次进攻的美国海军舰船舍身俯冲，给美国海军造成了可怕的破坏。在海岛沿岸，日本守军集结了能够调来的数量最大的火炮，同美国第十集团军的大炮、飞机、火焰喷射器较量。在战斗中，这个海岛上泥土翻滚，成为废墟一片，但是日军终究没

有能够挡住进攻的美军。由于日军无法派增援部队，这场战斗的结果就不言自明了。

5月8日，欧洲战场取得胜利。怎样进行对日作战的最后阶段呢，主张向日本直接发动进攻的意见占了上风，否定了那种以为轰炸、封锁和包围就足以迫使日本投降的意见。现在采纳的作战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向日本本土最南端的九州发动进攻为开端，日期定在1945年11月1日，第二阶段是四个月以后向日本主岛本州发动进攻。第一阶段定名为"奥林匹克"行动计划，由有十二个师的第六集团军执行；第二阶段代号为"加冕"行动计划，由有二十五个师的第八和第十两个集团军执行。从欧洲战场调到亚洲的第一集团军作为后备力量。麦克阿瑟负责指挥陆上作战，尼米兹负责指挥海上和两栖作战。

苏联参战将牵制住在中国大陆的日军，这是麦克阿瑟设想的打败日本的先决条件，虽然在以后的年代里，冷战的激烈气氛把这个问题遮盖了。当时官方所作的估计反映出预计进攻日本时会遭到困难。官方估计打败日本需要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尽管当时欧洲战场已取得胜利，尽管陆军部里有一批人看法较乐观一些。

美军拿下冲绳排除了使用中国沿海的必要性。据估计，驻扎在华东和华南的日军可能会退守长江流域或是增援日本本岛。如果这样，美军进军华南港口就不会遇到抵抗。美军没有制订在中国强行登陆的任何计划。史迪威在中国期间人们长期盼望的这一隐约可见的高潮就此告吹了。随后，日军于6月份开始撤出他们在1944年进攻中在华东占领的地区。

日军在撤离以前把桂林、柳州、南宁等城市烧光毁尽，然后撤向沿海和北方。中国军队不发一枪进入了上述已成废墟的地区。

史迪威在西点军校学习期间就认识了麦克阿瑟，当时他们两人只差一个年级。如果说有什么机会的话，史迪威断定机会是在太平洋。史迪威决定，如果他能去，他就去试一试。马歇尔在这个问题上是合作的。他安排史迪威去太平洋前线调查军队指挥官们关于陆军地面部队发挥作用方面的要求。在5月10日进行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史迪威说，马歇尔"除了叫我自行安排以外，提不出什么建议……显然道格拉斯已控制不住了；陆军部怕他。所以我要到各处去看看。我把这个问题跟多恩、伯金、琼斯谈了，他们都赞成我去。"虽然没有接到正式命令，多恩和伯金都打点行装跟史迪威一同出发，作史迪威的核心参谋人员，有事可以商量。史迪威于5月21日启程，在对沿途的各个岛屿视察以后，5月25日抵达马尼拉。麦克阿瑟给史迪威热情而适切的接待。麦克阿瑟讲了话，说他"需要有一位朋友出来为他讲话"。麦克阿瑟要求史迪威到各处走一走，同大家见见面，去同第六集团军司令克鲁格和第八集团军司令艾克尔伯格两人谈谈，向他本人提出建议，帮他出出主意。

史迪威这一趟走了一个月时间，其间包括到冲绳察看一次。史迪威带过的、来自奥德堡的第七师编在第十集团军作战。在冲绳岛上，地窖、洞穴和墓穴比比皆是，美军的火焰喷射器把日军赶出了这些地方。史迪威说，"可怜的冲绳人，连

他们的祖先也被炸得粉碎了。”人们一连几天被连绵不断的炮火压制在两英尺深的烂泥里，双方都在死亡和困苦中奋战，撕杀得天昏地暗。战争结束后，双方在这个六十英里长的海岛上伤亡人数是：美军死一万二千人，伤三万六千人；日军死十万余人，被俘八千多人。

6月18日，即在史迪威要离开的前一天，麦克阿瑟问史迪威是否愿意做他的参谋长。史迪威说，“我告诉他我不干，我自认为是一位战场指挥官的材料。”麦克阿瑟又问，尽管他是四星上将，他是否愿意指挥一个集团军，史迪威回答说，只要让他带兵打仗，要他指挥一个师他都愿意干。麦克阿瑟说，“哪能，哪能，你要是愿意指挥一个集团军，我宁愿要你而不要我所认识的任何其他人。”第十集团军是麦克阿瑟同尼米兹之间不和的根源，尼米兹当时仍然担任冲绳作战指挥官的职务。第十集团军司令西蒙·博利瓦·巴克纳将军倾向于尼米兹。麦克阿瑟说，要是他能把第十集团军从海军方面弄过来，他就想让史迪威来指挥这个集团军，若能得到马歇尔同意的话。史迪威第二天就启程回国。到回国途中的第一站关岛，史迪威得悉第十集团军司令巴克纳将军在冲绳岛上被炮弹炸死。他给麦克阿瑟去了一封电报，告诉他怎样和他联系，然后继续向东。他抵达檀香山时，史迪威接到了心中盼望的消息：“担任第十集团军司令。立即返回关岛。”

6月23日，史迪威接过了第十集团军的指挥权，他期望能率领这个集团军向日本发动最后的进攻。十天以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他们制订出有关计划，准备应付日本突然崩溃或者突然投降的局面。在美国国内的新墨西哥州，曼哈顿

计划已接近于准备就绪，对其产品进行第一次试验。这次试验的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在前线作战的指挥官们也不知道有这么一项计划。冲绳岛上的战斗已经到了扫荡阶段。剩下的任务是把冲绳岛建成一个基地，进行修复工作，为第十集团军参加最后决战作好准备。史迪威发现这项任务极度紧张，每天要工作二十四小时，由于缺乏协作和干劲，工作受到了妨碍。“我得做坏人，不然就要冒发生灾难的风险。”史迪威后来说，当时给他最大安慰的是第七师的官兵们，当他乘吉普车从他们的掩体前经过时，第七师的士兵们从洞中向外看，高喊“伙计们，乔回来啦！”从这些话中可以听出他们感到高兴的心情。

史迪威的笔记中写满了各种进攻计划和设想，其中包括增加战术航空兵的运用，并且希望把战术航空兵划归地面部队，显然是要让他的一位老同事指挥，以保证比过去更好地进行配合，“如果协调得当”，可以取得良好的结果。7月6日，正当史迪威等人在制订上述计划的时候，他们的对手陈纳德将军愤然辞去了第十四航空队指挥的职务。陈纳德的辞职是由马歇尔和阿诺德促成的，他们在组织变动过程中任命斯特拉特迈耶为驻华空军司令，位居陈纳德之上。陈纳德的奋力作战的记录并不能消除他借助于外部渠道和外部压力的做法使他的上司对他所产生的不信任。陈纳德在艾尔索普为他起草的长篇辞职信中“痛心地”结束了他的军事生涯（艾尔索普的好非难的态度也是促使陈纳德辞职的原因之一），并把中国一切搞糟的事一股脑儿推到史迪威身上。

7月16日，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试验成功，但是试验仍然是保密的。从7月17日到8月2日，杜鲁门和丘吉尔在波

茨坦会议上会晤了斯大林，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就会“立即遭到彻底毁灭”。这项最后通牒遭到了日本居于统治地位的军人的拒绝，虽然文职官员经天皇同意后已通过俄国的安排开始谈判媾和。这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诫麦克阿瑟和尼米兹，“有必要赶紧”作好接受日本可能投降的准备工作。8月3日，史迪威收到了代号为“黑名单”的行动计划，该计划决定，假如日本投降，由第十集团军占领朝鲜。史迪威在笔记中写道，“马尼拉总部对此非常乐观。”同时，向日本发动进攻的计划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史迪威获悉，英国要派出由一师澳大利亚部队、一师加拿大部队和一师印度部队组成的一个军参加“加冕”行动计划。史迪威说，“我的天哪，要我指挥这个军。”英国国防部已经批准了上述安排。“他们说这些部队知道同我的关系……蒙巴顿不得不拿出这些部队来参加这次行动。生活就是这么捉弄人的。”

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8日，俄国军队参加对日作战。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革新派干得不错。但人类文明迅速走向自我毁灭。我现在承认日本人可能投降。俄国出兵加上原子弹理应奏效。”原子弹所起的事先没有料想到的作用是给日本迅速投降提供了挽救面子的理由，随后的事态发展比原来料想的要快。经过就天皇地位问题进行激烈的斗争，美国最后同意保留皇位，日本于8月14日宣布投降。

“战争就这样结束了。”史迪威以前在1918年就在日记中这样写过。虽然这意味着永远失去了指挥美国军队作战的机会，但是他同所有的人一样大大松了一口气。任何有理智的

人都不期望进军日本。史迪威最先想到的是他刚满十八岁的小儿子。“谢天谢地，我们不必把儿子抛进深渊了”，史迪威给妻子写信说，“我太感谢了，所以我并不在乎他们怎样处置该死的天皇……好极了！好极了！我们总算熬过来啦。我们家人中没有人伤亡，我们是幸运的人。”

史迪威本人近期的前景看来是令人失望的。由于麦克阿瑟和尼米兹相互仇视的结果，第十集团军将被拆散。除了个别军以外，第十集团军看来要被排除在占领军之外。史迪威还从麦克阿瑟那里得到一个纠纷：蒋介石曾询问华盛顿，所传史迪威将军将任在中国沿海登陆的美军司令一事是否属实；杜鲁门总统答复说，史迪威部不会在中国沿海登陆。麦克阿瑟自称他认为，如果询问华盛顿是否把朝鲜算在中国沿海区域范围之内，华盛顿无疑会作肯定的答复。麦克阿瑟不想冒风险使部署占领军的工作受到拖延。他答应，如果能作安排，他过些时候将把第十集团军部署在日本。史迪威很不高兴。“这又是要掐死我”——为的是遵照蒋介石的意志办事。

前去访问的记者们自中国大陆发出了消息。“中国一团糟。美国有卷入旋涡的危险。共产党同俄国人携手。”要安排好在中国大陆的一百多万日本军队以及在满洲的几乎数目相同的日本军队的投降，确实是十分巨大的问题。中央政府突然遇到了要接管从广州到北京这样的重要城市——更不用说日本统治了十五年的满洲和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了——的极其繁重的任务，这个任务又来得很快，出人意料之外。对此，中央政府既无计划和组织工作，也没有必要的财力物力。交通运输历来是中国最大的障碍，当时的运输能力差不多已破

坏殆尽，百分之九十的铁路不能使用，车辆和内河船舶被毁，公路同以往一样不够用。为了最终控制全中国，当务之急是要在共产党下手之前，使中央军回到华北和满洲的各大城市。美国提供飞机和舰船把国民党军队运送到上海、北京、天津、青岛等城市。在华北，中央军与向同一港口或城市进军的共产党部队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在这场竞争中援助一方而不援助另一方的做法使自己非常有可能卷入中国的内战，而且肯定会使没有得到援助的一方增加对美国的仇视。史迪威认为只有一个解决办法。他于8月19日在日记中坚定地写道，“现在我们该脱身了。”

史迪威得悉他将有一件开心的事：他正式接受日本的投降，这即使不是由于他在缅甸的战功，至少也是由于他在琉球岛的贡献，他还将参加定于9月2日在东京湾正式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史迪威同其他军官一道，在仪式开始前两天就抵达日本，严峻而高兴地到横滨的一些烧成一片废墟的地区巡视了一趟，他凝视着一度很傲慢的“獠牙狗杂种”，现在他们却住在用木头和白铁皮搭成的小窝棚里、掘脏土种洋葱了。史迪威对日本人三十年代在中国的凶残行径以及污辱外国人的做法所产生的未消之恨在这里洗雪了。“我们对日本遭到的破坏感到高兴，来到这里心中很痛快。”

在史迪威看来，在“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的受降仪式不大符合将来写入教科书时所需要的质量。作为美国代表团中的高级美军军官，史迪威领头登上了“密苏里”号战舰的后甲板，坐下等候仪式开始。日方代表十一人，文职官员由重光葵外相率领，军方由梅津美治郎率领，登上“密苏里”舰的甲板；

史迪威后来说，“我们凝视看的时候，他们忍辱受屈的脸上表现出凶残仇视的神情。日本人以立正姿势站成一排，默不作声，眼睛直视前方。“谁也不说话。我们只是盯着他们……有十好几分钟。这段时间对于他们肯定犹如十年之久。”被指定代表所有盟国的麦克阿瑟从舰长室走出来，站在他的位置，他在发表讲话时手脚都明显发抖。“克鲁格说麦克阿瑟的手脚发抖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痉挛，但是太难看了。”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了字，接着是麦克阿瑟在上面签字，麦克阿瑟签字的时候，温赖特将军和珀西瓦尔将军站在他的身边。这两位将军分别在巴丹和新加坡向日军投降的，从那以后一直呆在日军战俘营里。史迪威对珀西瓦尔有评语，开头是说，“他是我所见过的人中骨头最软最软的家伙，甚至在英国军队中也未见过。”另外他还讲了许多话。史迪威的评论似乎有点过于刻薄。每当史迪威对某人某事发泄成见时，他的醋性子就流于言表。

在代表美国的尼米兹率领下，盟国代表们分别在受降书上签了字。在史迪威看来，除了尼米兹海军上将和中国代表以外，其他盟国的代表看起来象“临时拼凑起来的一帮人”：英国代表胖得象个红色“汤团”；澳大利亚代表肥头大耳；加拿大代表象个“老色鬼”；法国代表穿戴“非常讲究”，但是带着两个“难看的巴黎阿飞”作助手；荷兰代表肥胖而秃顶；新西兰代表象是来客串的人。“在日本鬼子看来，这群人的脸谱是多么滑稽可笑。代表人类的就是这样一些不成样子的人。”

9月7日，史迪威本人在琉球岛主持了日本的投降仪式，日本方面由两名陆军将领和一名海军将领为代表。日方代表

在众目睽睽之下忍辱立正等待了十分钟，史迪威才露面。美国士兵们高声叫喊着，“好，乔，叫他们等着。让他们等等，乔！”乐队奏了将军进行曲，史迪威在桌边坐下，在受降文件上签了字，并通过一名美籍日人军士指示三名日本代表在文件上签字，一百架海军战斗机和六十架B-29轰炸机编队在上空飞过，然后结束仪式。史迪威说，“完全是冷酷无情的事。”他所打的仗就此打完了。

后来史迪威听说第十集团军不参加驻日本的占领军，而是要在10月15日回美国，他再次设法到中国看看。他在第二次去日本本岛检查工作期间，于9月26日打电报给马歇尔，要求允许他去北京探望旧友。斯特拉特迈耶征求蒋介石的意见，一个星期以后，史迪威接到的答复是不行。蒋介石显然担心史迪威的影响或意图，他答复说：由于北京既有共产党军队又有日本军队，局势“混乱”，史迪威将军在国民党军队进驻北京以前（国民党军队在日本投降后六个星期还未到达北京）去访问很可能被共产党人所利用。蒋介石答复说，“只要中国局势恢复正常”，就立即正式邀请史迪威访华。说来不幸，中国的局势并未趋向于正常。史迪威认为蒋介石这番话的言外之意是“不希望我踏上亚洲的这块大陆……可能蒋介石认为我会掀起一场革命……。如果能做到，我倒真的完全乐意这么干。”在史迪威未来到的情况下，中国闹起了革命。史迪威后来没有再到过中国。

1945年10月18日，史迪威回到了美国国内，再过一年差一个星期，史迪威将与世长辞了。在通常情况下，史迪威可以预期在1947年3月满六十四岁时退休。由于第十集团军

解散，史迪威暂时奉命到华盛顿任军备局局长，史迪威对担任这一工作的看法是，“我显然适合干别的事情，我完全愿意滚开。”«军队时代报»讲得较恰当。该报推荐史迪威任参加和会的军方代表，因为他“在这次大战中比其他任何高级军官亲临作战前线的次数都多”。世界性的和会没有开成，幸好史迪威在华盛顿担任的职务只有几个星期。1946 年 1 月，史迪威被任命为负责美国西部防务的第六集团军司令，史迪威本人感到高兴，他担任这个职务也很合适。第六集团军的司令部设在旧金山的普勒西迪奥，距他在卡梅尔的家只有几小时路程。

在史迪威离开华盛顿前往普勒西迪奥上任之前，美国人在中国纠葛上又爆发了一场激烈争吵。这场争吵同召回史迪威的那场争吵不相上下。11 月 25 日，赫尔利辞去了驻中国大使的职务，并且耸人听闻地公开指责说“我们国务院内有相当一部分人总是努力支持共产党，特别是在中国”。

对日作战胜利以后，美国对中国的支持以保持魏德迈的指挥权和继续提供租借法案援助的方式延长了六个月，直到日军战俘可以遣送回国和危恶的中国内战阴云消散了一些以后才停止。经过美国各种机构的说服和调解，重庆和延安之间的谈判一直在进行着，但双方的军队已偶尔有接触和交火。毛泽东和他的两位主要副手周恩来、朱德多次抗议美国派飞机和军舰把蒋介石军队运往北方，抗议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国民党军队到达之前替它占领城市，抗议美国继续向重庆供应武器。美国提供这种援助的理论依据是大批武装的日本人还不祥地呆在中国。当时正在竭力扩大对华北的控制并取得满

洲的共产党人认为，那种做法是一种干涉。援助加剧了共产党人对美国的敌视情绪，削弱了美国作为调解人的影响，因为美国在调解中显得偏袒一方。

美国时刻都有卷入中国内乱的危险，爆炸性事件常常差一点儿就爆发。美国海军的一支护航队在驶近与大连湾隔海相望的战略港口烟台的时候，共产党军队警告他们不要在这里登陆，因为八路军早已占领了该港口及周围地区。指挥这支护航队的美国海军将领和海军陆战队将领在弄清情况确实如此、并确知该地区情况正常、既没有日本军队也没有日军战俘以后，明智地报告说："此刻没有任何军事上的理由派美国军队在此登陆"，然后就撤走了。但是总不能期望冷静和常识永远占上风。就在这同时，蒋介石对美国给他援助的要求增加了，其中包括要像罗斯福总统在开罗会议上漫不经心地保证过那样，用租借法案援助为他装备九十个师。蒋介石的组织工作和物力财力十分明显都跟不上去，无法确立控制地位。他用人宁愿只求忠顺而不问能力，因而他的总参谋部和一批官员手足无措，不知如何解决他们面临的众多问题。他们不久就陷身于随着从前傀儡政权手中接管城市而风行的无休止的受贿活动和秘密交易之中。在国民党政府缺乏民众支持的北方，形势尤其无望。早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美国派驻延安的军事观察组新任组长耶顿上校就告诫过，尽管共产党军队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是"经过一个长时期，作为占领势力的国民党即使有美国的帮助也难以支撑下去"。

鉴于这种前景使人担忧，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奉命制订出一项政策。该委员会所能拿出的最出色的

意见就是 10 月 22 日提出的基本方针：美国的目的是使中国成为一个友好的、统一的、独立的国家，它“有一个依赖——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于中国人民自由地表示支持的稳定政府”。在这种幌子掩护下，对中国采取的每一个行动和作出的每一项决定都继续把美国和一个丝毫不符合上述标准的政府紧紧地拴在一起。

由美国有关机构运送到华北各省的国民党军队自然和共产党军队发生接触和冲突。11 月 11 日，美国驻重庆大使馆武官报告，“国共双方军队的战斗越打越激烈，双方投入的人数越来越多。”美国以为可以解除所有日军武装并将之遣送回国而又不卷入中国内战的想法看来越来越不可能实现了。美国必须赶紧作决定是否撤销魏德迈在中国的指挥部、是否如期于 1945 年年底结束对中国提供的租借法案援助。美国是中止对委员长的援助，听任形势自然发展——这就意味着中国发生内战以及美国目的无法实现——还是继续努力扶持一个日益衰败的政府，把它的统治扩大到竭力反对它的那些地方去呢？

美国决定继续支持蒋介石，这是由新的世界阵容决定的。法西斯刚刚被打败，共产党就日益成了新的敌人。现在，苏联军队呆在满洲以及他们同中国共产党人联合起来的前景是使美国感到担忧的事，尽管俄国人与蒋介石达成了正式协议。美国在中国的窘境越来越突出了。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同杜鲁门总统举行的紧急认真的磋商没有提出别的方针，仍然是主张继续在蒋介石身上下本钱，同时向国共双方施加压力，要双方都作出让步，成立一个有代表性的政府。

中国的局势使赫尔利大使很头痛。在杜鲁门总统的新政府领导下，赫尔利又一次认为他是一起阴谋的牺牲品。他认为杜鲁门总统、贝尔纳斯国务卿、艾奇逊副国务卿听信那些批评他的人，准备派一位“适当的民主党人”取代他。赫尔利11月份返回华盛顿以后，又提出了他早先的辞职威胁，但是杜鲁门和贝尔纳斯终于说服他再去中国作一番努力。第二天，赫尔利突然变卦，既未通知杜鲁门总统也未通知贝尔纳斯国务卿，直接向报界戏剧性地宣布他辞去了职务。

赫尔利的指责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自从美国同苏联在战争时期结成的联盟解体以后，美国人思想中固有的对共产党的恐惧和仇视再次出现。依靠这种邪恶的刺激因素，妒忌、野心和报复心理能更加发展，蛊惑民心的政客可以得势。赫尔利的行动是个开端，以后美国就很快朝着参议员乔·麦卡锡轻而易举地强加于美国的恐怖时代的方向迈进了。歇斯底里发作的时代到来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是这个时代的重要争议，蒋介石的代理人和支持者，即通常以院外援华集团著称的一批人，是助长歇斯底里的人。1945年6月间已采取了第一个步骤，突然搜查倾向共产党的《美亚》杂志社，并逮捕了谢伟思等六人。在搜查《美亚》杂志社时，在资料中发现了谢伟思从延安写回的几份报告的抄件。这几份报告是去年秋天由史迪威寄回华盛顿的，谢伟思不慎把这些报告的底稿借给了《美亚》杂志社的主编，作为使报界了解情况的一种方法。大陪审团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可以对谢伟思起诉。经史迪威推荐，谢伟思又被任命为麦克阿瑟驻东京的参谋人员。但是通过不断扩大的忠诚问题的调查和防颠覆搜查来对美国驻华使馆人员进

行的迫害仅仅是开始。其后不久在美国对华政策问题上进行的打击和蛮干毁掉了一批人的前程，损害了一些人的声誉，最后解除了戴维斯、谢伟思等人的职务，这使得后来外交机构中的人在作独立判断时畏缩不前了。

当时，中国使美国政府遇到了会引起严重后果的外交危机和国内危险。杜鲁门总统迅速采取了行动。由于希望消除赫尔利突然辞职造成的影响，杜鲁门请既超脱政治又得到全国人民尊敬的马歇尔将军出使中国，促成中国的国共双方停战，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马歇尔刚刚在一个星期前离开陆军参谋长的职位退休。马歇尔已连续六年担负陆军参谋长重任，他希望退休以后能同他的夫人一道过一段安闲日子。但是同史迪威的一贯作风一样，马歇尔的责任感使他对这位总司令的要求只能作出一种答复：接受去中国的使命，由于他深知史迪威在中国的经历，他可能也犹豫过，但他迫切感到必须努力保住美国在远东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作为对日战争胜利的主要缔造人，马歇尔可能格外希望保护这个胜利。

为了迫使国共两党达成协议，马歇尔得到的指示是把向华北运输部队作为他施加压力的手段。为了进一步肯定给他的指示的精神，马歇尔本人谈了给他的指示的最重要之点。他对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国务卿说，他的理解是：如果共产党人拒绝作出合情合理的让步，他就把国民党军队运到华北去。另一方面，即使蒋介石拒不让步，使美国促成中国统一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也不能抛弃他，因为抛弃蒋介石“就会引起中国分裂以及俄国可能在满洲掌权的可悲后果……结果我们在太平洋战争中争取达到的主要目的就会受到影响或化为乌

有。”马歇尔的理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任务是“继续支持蒋介石向华北运送军队”，至少在日军战俘遣返完毕以前要这样做。杜鲁门总统和贝尔纳斯国务卿表示同意马歇尔的理解。

从根本上说，这个决定是支持反革命的决定。美国对前殖民地也作过相同的决定。在前殖民地，美国军队正积极帮助法国恢复对印度支那的统治，反对那里强大的独立运动，这种做法恰恰同已故罗斯福总统的意图相反。在宪章和宣言中，美国的目的是支持民主，但是在实际做法上，执行者都愿意支持旧政权。在中国问题上，美国的决定不仅是无效益的，它还使中国老百姓认为美国是站在压迫者、地主、税吏那一边的。这个决定还使自由主义力量感到灰心，并引起了中国后来的统治者的极大敌对情绪。尽管许多人感到美国的努力可能是被引入歧途了，但是美国的政策是无法调整的。美国宁愿保持现状，即使现状犹如一条正在下沉的船也罢。看来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抛弃中国的合法政府而去支持共产党人，这是美国干不出来的事，而且这也意味着美国在国内进行政治自杀。另一个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史迪威提出的主张：“现在就脱身”，史迪威的这个主张是在一年半以前提出来的。

史迪威从拜罗德将军那里得知马歇尔赴华使命的条件时，对这些条件嗤之以鼻。拜罗德将军将要作为马歇尔的主要助手随同马歇尔前往中国。马歇尔由于珍珠港事件听证会分不开身，直到他启程前的最后时刻才派拜罗德前去征求史迪威的意见。拜罗德也是在中缅印战区呆过的军人。史迪威

询问马歇尔得到的指示是什么，然后他得出结论说：马歇尔的使命不会取得成功。一旦蒋介石嗅到形势，他只会更加倔犟。史迪威在同拜罗德谈话过程中好几次问到："难道你不懂得中国人只尊重力量吗？"后来，随着史迪威看到出现了争端，他以尖刻而又恰如其份的话给马歇尔的使命作了概括："他们还期望什么呢？乔治·马歇尔无法在水上步行。"

上面这句话是史迪威 1946 年 4 月 6 日在一封信中所写的，这封信后来因为其中的另一句话而闻名了。史迪威在信中写道："满洲的情况难道不是奇观吗？"接下去就是对马歇尔的评论，再下面的一句便是"这使我渴望扔掉手中的铁锹，到中国去扛起枪同朱德一道打仗。"① 对于史迪威正如对于许许多多其他人一样，这种渴望心情象征着倾向于中国共产党人，这与他对国民党的厌恶情绪是一种对照。史迪威在私人信件中随便讲的话被极左和极右分子所利用，被看成是他的坚实的思想基础，从而来证明他是支持延安的。在艾尔索普的促使下，陈纳德将军 1952 年在国会一个调查委员会作证时对史迪威的思想的随意捏造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陈纳德说，1945 年 7 月，史迪威打算把预定要进攻日本的第十集团军派往陕西河[原文如此]以北、上海以北沿海，他要在那里武装二十万到三十万共产党军队，然后率领共产党军队南下夺取上海。总之，照陈纳德的话来说，在战争的可怕的激战时期，

① 这封信不知是写给谁的。史迪威手书的这封信后来落到了倾向共产党的自由撰稿人乔纳森·斯迪尔的手中。史迪威逝世以后，斯迪尔在他的叫做《世界事务报道》的时事通讯第一期(1947 年 1 月份) 中发表了这封信的影印件，但是把收信人的名字撕去了。艾尔索普 1951 年在参议院国内安全听证会上作证时很多处利用了史迪威提及朱德的话。

史迪威完全擅自定计划，要把进攻日本的舰队的一半力量引向别的目的地，把进攻日本的任务留给第八集团军单独去执行。只有麦卡锡时代的随心所欲的指责再加上艾尔索普和陈纳德的恶毒敌意结合在一起，才能编造出上述惊人的奇闻。

史迪威在旧金山担任西部防御司令期间，仍然同军备局保持联系，因此他作为司令被派去观察 1946 年 7 月在马绍尔群岛的比基尼岛进行的两次原子弹试验的影响。外出一个月回来时，他的妻子发现他身体有很大变化：他显得干瘦而又不舒服，他自己也说全身乏力。在这年夏季剩下的时间里，史迪威患了几次感冒，有时觉得头昏眼花，一阵阵精疲力竭，有几次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医疗化验发现“我的肝部有可疑的东西”。第二天，好象表示他并不在乎，他散步走了好几里路——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次散步。9 月 28 日，史迪威住进莱特曼陆军医院，10 月 3 日接受了一次腹部手术，医生发现史迪威患的是胃癌，已经扩散到肝部，超过原先的预计，病已到了晚期。这个病在史迪威体内肯定有很长时间了，但是史迪威没有觉得任何疼痛，这使医生们也感到迷惑不解。

虽然史迪威荣获了优异服务十字勋章、优异服务勋章和荣誉军团勋章，他还是希望能得到一枚作战步兵奖章，这是一种普通的刻有一支步枪图案的纪念章，在火线经得住考验的步兵都能得到一枚。10月 11 日，接替史汀生担任陆军部长职务的帕特森宣布授予史迪威将军一枚作战步兵奖章，帕特森亲自把奖章送到了旧金山，但是没有在史迪威的病床旁举行仪式给他别上奖章，以免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在生命

的最后两天中，史迪威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他有一会儿清醒过来时问护士："今天是不是星期六？"（那天确实是星期六）。1946 年 10 月 12 日午后不久，史迪威在睡眠中与世长辞。

根据史迪威的遗愿，没有为他举行公葬；他的遗体火化后，骨灰撒到太平洋中。各家报纸在评论和赞扬史迪威的社论中多次提到史迪威说过的"我宣布我们被狠揍了一顿"的话，证明他"思想坚强"，不搞做作。报纸都强调了"醋性子乔"这个绰号，据《亚特兰大宪法报》说，他深孚众望，在美国历史上，像史迪威这样深孚众望的军事人物只有少数几个。梅里尔将军用简洁的话概括说，"美国需要有很长时间才会造就出史迪威这样的人。"

报界对史迪威在中国的工作未作评价，因为中国当时的混乱状况和动荡不定的局面使人无法正确地看待史迪威的作用。最近乎对史迪威在中国的工作的评价的要算卡尔森上校的一番话了，他用自己惯用的最高级语法结构说："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民最坚定的朋友舍史迪威其谁。"蒋介石只是在南京的一座私人宅邸举行一次规模很小的基督教仪式来悼念这位非常贬低他的人，他在举行这次悼念仪式时，事前没有见报或发公告，只邀请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少数几位美国人，没有邀请任何中国人参加。在参加仪式的人看来，为一个曾经指挥过美国在华作战工作的人举行这样的仪式似乎是太不像样子，规格太低了，但是，规模不适当正说明史迪威有关军队的主张已得到非常强有力的支持，使蒋介石感到很不舒服。

史迪威没有能亲眼看到他提出的"脱身"主张已为人所接

受。马歇尔的努力毫无结果。他既不能使国共双方实现团结，也无法在他的努力失败时使中央政府振作起来，撑持下去。在对日作战胜利之后的一年中，美国的有关机构向上海、南京、满洲和华北的大城市运送了四十万至五十万国民党军队；五万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中国登陆，驻守海港、煤矿和铁路枢纽；美国以租借法案援助的形式向蒋介石提供了六亿美元的武器弹药及其他物资，还向蒋介石提供了经济援助。给蒋介石的援助再多也不顶用，因为援助没有用在恰当之处。为了迫使蒋介石停止他不可能取胜的战争，马歇尔于 1946 年 7 月停止了对国民党的武器援助，但是未奏效。马歇尔后来也同意已故史迪威的看法：蒋介石“根本不知道实际情况”。在国民党内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反动集团”，他们坦率地讲了他们的看法：同共产党人合作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解决问题。蒋介石在这帮人的支持下仍然冥顽不灵，指望美国不管怎样都会支持他。共产党内占主导地位的一派也不愿意设法同国民党达成协议。共产党虽然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是他们指望利用游击战争加速政府的经济崩溃，从而使政府垮台。马歇尔注意到，同国民党相反，共产党从基层到上面都组织得很好，“得到民众的支持，因而有力量”。

1946 年 10 月 1 日，马歇尔提醒向张家口发动进攻的蒋介石，除非能立即确立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的基础，否则他就中止调停。蒋介石没有表示要作任何让步。同年 12 月，马歇尔亲自告诫蒋介石，共产党力量很强，想在军事上打败他们是不可能的。避免中国经济崩溃的唯一办法就是同共产党举行谈判。蒋介石理解不了马歇尔的这个建议。同月，在中国进行

一年努力之后，马歇尔告知杜鲁门总统，他的使命已告失败。马歇尔于 1947 年 1 月初被召回国担任国务卿。华盛顿宣布停止进行使国共两党达成协议的调停，撤回美国军队。远东取得胜利后不到一年半的时间，美国原来想达到的目标却已远不可及了，这是对美国努力的嘲弄。

任国务卿后，马歇尔依然确信，没有美国的军事干预，国民党不可能在内战中获胜。而马歇尔是毫不动摇地坚决反对在中国进行军事干预的，公众也没有提出这个要求。在政治压力逐步增大的情况下，要求给蒋介石提供其他方面援助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恢复了向国民党出售武器的做法，向中国派出了各种使团，1948年还通过援华法案，向蒋介石提供了四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共产党谴责美国提供的这笔经济援助是妄想毫无意义地拖延内战时间，他们利用这笔援助在疲惫的老百姓中掀起了一股新的反美浪潮。蒋介石军队是由“世界上最无能的领导人指挥的”（此话出自新任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尔将军之口），许多重大战役中都吃了败仗；整师整师的部队向共产党投诚；经济混乱加剧了老百姓对已经名誉扫地的国民党的憎恨。1948 年 10 月，蒋介石宣称，亚洲之得救系于中国，他希望“美国人民及其政治家委身于此任。”蒋夫人来到华盛顿，要求美国制订出在今后三年内给蒋介石政权三十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并且要求声明美国决心击败共产党。

现在无论给国民党什么样的支持也无济于事。国民党诞生于未完成的 1911 年辛亥革命之中，还没有完全牢固地确立地位，日本人就给了它严重摧残，加之它背叛了原先的宗旨，这样它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失去人民的支持。1948 年 12 月，

共产党军队拿下了“兵家必争之地”徐州。1949 年 4 月，共产党军队横渡长江。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中，蒋介石政府带领大约二百万追随者逃到福摩萨，在美国的支持下，它在那里又站住了脚。中国进入了一场新的革命的剧烈时期。

如果当时让史迪威改组国民党军队，建立一支有很强战斗力的九十个师的部队，中国是否会有不同的命运？曾经是战略情报局缅甸游击队队长的威廉·R. 皮尔斯将军写道，“我本人确信，假如史迪威提出的装备、组织、训练中国地面部队的计划得到彻底贯彻，日本步兵 1944 年就无法攻占华南的空军基地……。共产党军队也无法在对日作战结束之后达到他们的目的。”

亚洲若是西方手中的泥土想捏成什么就捏成什么，上述设想就可能成为现实了。但是，“革新主张”——无论是史迪威的还是其他人的——都是无法从外部强加给亚洲的。如果不改革国民党军队在其中成长起来的那个政治制度，要改革国民党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史迪威本人承认，要改革这个政治制度，“必须把它打得粉碎。”

伊拉兹马斯写道，在大的事情上，做过一番尝试就够了。史迪威的在华使命就是美国头等重要的尝试。史迪威作了最大努力，他性格刚毅，他不是不作最大努力的人，他也从来没有放弃努力。然而他的使命没有实现其最终目的，因为这个目的是无法达到的。推动力不是来源于中国人自己。战斗力与进攻精神，就同外国传教士和顾问带来的基督教义和民主精神一样，是他人带来的，并不是这个社会和文化的固有要求。甚至连史迪威 1921 年修筑的黄河公路也在十二年之后无影

无踪了。中国是美国面临的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美国欲保持现状所作的努力未能使一个腐朽的政府获得力量和实现稳定，也无法使它得到人民的支持。美国的努力既无法支持住一个躯壳，也不能长期推延循环不已的天意的改变。最后，中国还是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好象美国人从来没有到中国去过一样。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filename": "44CK5Y+y6L+q5aiB5LiO576O5Zu95Zyo5Y2O57uP6aqMICDvvIgxOTExLTE5NDXvvIkgIO+8iOS4iuOAgeS4i+WGjO+8ieOAi18xMDI0MTQ0Ni56aXA=",
  "filename_decoded": "\u300a\u53f2\u8fea\u5a01\u4e0e\u7f8e\u56fd\u5728\u534e\u7ecf\u9a8c \uff081911-1945\uff09\uff08\u4e0a\u3001\u4e0b\u518c\uff09\u300b_10241446.zip",
  "filesize": 50414583,
  "md5": "5f44f81e4c703e9e35c0e053873d30cc",
  "header_md5": "2febc199c3578c5270a148f691b29597",
  "sha1": "52171ec8b07024d60c9d3d94e7a6cebe1a2483e6",
  "sha256": "09c46d8477ac8c1bffe45790fb36b1b0308a060f8e3eb1a649edca4e6b2a3879",
  "crc32": 3315070623,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50874124,
  "pdg_dir_name": "\u00ed\u2562\u2569\u2556\u2561\u2567\u2550\u25a0\u2559\u03b4\u251c\u2514\u2563\u00b7\u2558\u250c\u2557\u00ac\u255b\u00a1\u2564\u0398 \u00fa\u00bf1911-1945\u00fa\u2310\u00fa\u00bf\u2554\u2567\u00ed\u00f3\u2567\u252c\u2593\u00df\u00fa\u2310\u00ed\u2556_10241446",
  "pdg_main_pages_found": 772,
  "pdg_main_pages_max": 772,
  "total_pages": 788,
  "total_pixels": 2594372592,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